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十二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2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二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9\frac{3}{4}$  · 插頁 7 · 字數 705,000

1962 年 8 月第 1 版

196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531 定價（四）2.30 元

## 目 录

第十二卷說明 .....	IX—XXX
卡·馬克思。在“人民报”創刊紀念会上的演說 1856年 4月14日在倫敦发表.....	3—5
卡·馬克思。上院和約克公爵的紀念像 .....	6—16
卡·馬克思。撒丁 .....	17—22
卡·馬克思。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第一篇論文).....	23—29
卡·馬克思。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第二篇論文).....	30—34
卡·馬克思。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第三篇論文).....	35—40
卡·馬克思。*西班牙的革命 .....	41—47
卡·馬克思。*西班牙的革命 .....	48—53
卡·馬克思。*欧洲的經濟危机 .....	54—58
卡·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 .....	59—63
卡·馬克思。*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	64—69
卡·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貨幣流通史片断 .....	70—76

---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編者注

- 卡·馬克思。\*英国—波斯战争 .....77—79
- 卡·馬克思。\*法国的经济危机 .....80—86
- 卡·馬克思。\*欧洲的危机 .....87—89
- 卡·馬克思。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90—95
- 卡·馬克思。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96—103
- 卡·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 .....104—111
- 卡·馬克思。\*英中冲突 .....112—117
- 弗·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 .....118—126
- 卡·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 .....127—132
- 弗·恩格斯。\*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 .....133—139
- 卡·馬克思。英国的新预算 .....140—147
- 卡·馬克思。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148—153
- 卡·馬克思。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 .....154—160
- 卡·馬克思。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 .....161—165
- 卡·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 .....166—168
- 卡·馬克思。英国的选举 .....169—174
- 卡·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175—178
- 卡·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 .....179—180
- 卡·馬克思。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 .....181—185
- 弗·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186—191
- 卡·馬克思。选举的结果 .....192—196
- 卡·馬克思。工厂工人状况 .....197—200
- 卡·馬克思。英国工厂制度 .....201—208
- 弗·恩格斯。俄国军队的改革 .....209—212
- 卡·馬克思。英国的金融舞弊 .....213—217

卡·馬克思。CRÉDIT MOBILIER .....	218—227
(一) .....	218—222
(二) .....	223—227
弗·恩格斯。波斯和中国 .....	228—234
卡·馬克思。有趣的揭露 .....	235—240
卡·馬克思。*新的法兰西銀行法 .....	241—245
卡·馬克思。与波斯簽訂的条約 .....	246—250
卡·馬克思。印度軍队的起义 .....	251—254
卡·馬克思。欧洲状况。——法国財政状况 .....	255—258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 .....	259—262
卡·馬克思。印度問題 .....	263—268
卡·馬克思。来自印度的消息 .....	269—272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的現狀 .....	273—276
卡·馬克思。东方問題 .....	277—282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 .....	283—286
卡·馬克思。*欧洲的政治形势 .....	287—290
卡·馬克思。*印度刑罰的調查 .....	291—296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 .....	297—303
卡·馬克思。*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 .....	304—307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 .....	308—312
卡·馬克思。*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	313—317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 .....	318—322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 .....	323—326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 .....	327—332
卡·馬克思。*印度起义 .....	333—338



- 卡·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英格蘭銀行法和英國的  
金融危機 .....339—344
- 卡·馬克思。英國貿易的震蕩 .....345—351
- 弗·恩格斯。\*德里的攻占 .....352—360
- 卡·馬克思。\*英國的貿易危機 .....361—365
- 卡·馬克思。\*歐洲的金融危機 .....366—371
- 卡·馬克思。\*歐洲的危機 .....372—374
- 卡·馬克思。法國的危機 .....375—380
- 弗·恩格斯。\*勒克瑙的圍攻和強攻 .....381—387
- 卡·馬克思。英國的貿易 .....388—397
- 弗·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救 .....398—406
- 卡·馬克思。即將發行的印度公債 .....407—410
- 弗·恩格斯。溫德姆的失敗 .....411—416
- 卡·馬克思。對波拿巴的謀殺 .....417—422
- 卡·馬克思。\*法國的經濟危機 .....423—427
- 卡·馬克思。御用軍人的統治 .....428—431
- 卡·馬克思。得比內閣。——帕麥斯頓的假辭職 .....432—435
- 卡·馬克思。時代的表征 .....436—440
- 卡·馬克思。波拿巴目前的狀況 .....441—445
- 卡·馬克思。佩利西埃在英國的使命 .....446—449
- 卡·馬克思。馬志尼和拿破侖 .....450—455
- 卡·馬克思。倫敦的法國人審判案 .....456—463
- 卡·馬克思。\*法國財政狀況 .....464—468
- 弗·恩格斯。勒克瑙的攻占 .....469—475
- 卡·馬克思。迪斯累里先生的預算 .....476—480

- 
- 卡·馬克思。英法联盟 .....481—487
- 卡·馬克思。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 .....488—494
- 弗·恩格斯。\*攻占勒克瑙的詳情 .....495—501
- 卡·馬克思。奥德的兼并 .....502—507
- 卡·馬克思。历史上有趣的一頁 .....508—515
- 卡·馬克思。\*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問題 .....516—519
- 卡·馬克思。\*波拿巴的財政手段。——軍事专制 .....520—522
- 弗·恩格斯。\*印度起义 .....523—525
- 弗·恩格斯。\*英国軍队在印度 .....526—530
- 卡·馬克思。英国的貿易状况 .....531—537
- 卡·馬克思。\*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538—541
- 卡·馬克思。英国政府和奴隶貿易 .....542—546
- 卡·馬克思。\*印度的捐稅 .....547—552
- 弗·恩格斯。印度軍队 .....553—557
- 卡·馬克思。关于印度的法案 .....558—561
- 卡·馬克思。布尔韦尔-利頓夫人的囚禁 .....562—567
- 卡·馬克思。\*英国瘋人数目的增加 .....568—573
- 卡·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銀行法 .....574—578
- 卡·馬克思。\*英国的貿易危机和貨幣流通 .....579—583
- 卡·馬克思。鴉片貿易史 .....584—587
- 卡·馬克思。鴉片貿易史 .....588—591
- 卡·馬克思。現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 .....592—599
- 卡·馬克思。\*英中条約 .....600—605
- 卡·馬克思。英国的貿易和金融 .....606—610
- 弗·恩格斯。\*印度起义 .....611—615

- 卡·馬克思。馬志尼的新宣言 .....616—620
- 卡·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約 .....621—626
- 卡·馬克思。\*关于俄国廢除农奴制的問題 .....627—630
- 卡·馬克思。普魯士国王的瘋癲症 .....631—635
- 弗·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細亚的进展 .....636—642
- 卡·馬克思。普魯士国王的瘋癲症 .....643—647
- 卡·馬克思。普魯士的摄政 .....648—651
- 卡·馬克思。普魯士状况 .....652—656
- 卡·馬克思。普魯士状况 .....657—660
- 弗·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661—665
- 弗·恩格斯。对蒙塔郎貝尔的起訴 .....666—670
- 卡·馬克思。新內閣 .....671—675
- 卡·馬克思。新內閣 .....676—680
- 卡·馬克思。普魯士状况 .....681—684
- 卡·馬克思。\*法国調整粮食价格的方案 .....685—689
- 卡·馬克思。普魯士状况 .....690—694
- 弗·恩格斯。\*一八五八年的欧洲 .....695—699
- 卡·馬克思。\*普魯士状况 .....700—704
- 卡·馬克思。伊奥尼亚群島問題 .....705—710
- 卡·馬克思。爱尔兰的惶恐 .....711—715
- 卡·馬克思。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716—725
- (一) .....716—721
- (二) .....722—725
- 卡·馬克思。普魯士状况 .....726—730

## 卡·馬克思的遺稿

導言(摘自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	733—762
I. 生产、消費、分配、交换(流通) .....	733—762
1. 生产 .....	733—738
2.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費的一般关系 .....	738—750
(a) [生产和消費] .....	740—745
(b) [生产和分配] .....	745—748
(c) 最后, 交换和流通 .....	749—750
3. 政治經濟学的方法 .....	750—759
4. 生产。生产資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国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 关系。家庭关系 .....	759—762
注釋 .....	765—842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	843—865
人名索引 .....	866—905
期刊索引 .....	906—909
地名索引 .....	910—921
譯后記 .....	922

## 插 图

1857年的波斯、阿富汗和中亚細亚地图 .....	76—77
弗·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的手稿的第一頁 .....	119
卡·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的草稿的第一頁 .....	129

---

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华鴉片战争图 (1839—1842 年和 1856—1858 年) .....	187
1857 年的德里图 .....	355
1857—1858 年的勒克瑙图 .....	383
1857—1859 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图 .....	474—475

## 第十二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6 年 4 月至 1859 年 1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本卷所收的絕大部分文章和通訊曾发表在当时进步的美国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少数文章曾刊载于英国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和倫敦的“自由新聞”，并且其中有几篇曾同时发表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編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写作时期，标志着馬克思所說的“难忘的十年时代”开始临近結束，这个“十年时代”是在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到来的，它的特征是一方面世界資本主义經濟蓬勃高漲，另一方面黑暗的政治反动橫行欧洲。这个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資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 1857—1858 年世界經濟危机，它席卷了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

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认为五十年代的欧洲反动时期只是一个暫时的阶段，只是历史賜給資產階級旧社会的一个“喘息时机”。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反革命的胜利不是长久的；他們甚至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也不曾放棄欧洲很快将掀起新的革命浪潮的信念。他們曾指望迫近的經濟危机将成为全欧革命的先声，将加强民族解放斗争并加快欧洲几个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的到来。早在五十年代初，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在总结 1848—1849 年革命被鎮压以后的革命运动时，便得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

有可能”的結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4頁）。對1848—1849年革命以後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全面分析，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堅定了他們的這一見解：經濟危機是引起革命危機的最強大因素之一。

到五十年代後半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過程基本上已經完成。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已經大致制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初步原理已經確定。從社會生產的發展在社會歷史上起決定性作用這一唯物主義歷史觀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對於無產階級特別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規律和將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地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的嚴謹的經濟理論。在兩位無產階級領袖看來，在經濟危機之後，歐洲必然要爆發新的革命，因此，經濟危機的即將到來便促使馬克思從1856年10月起更加緊從事他的經濟研究工作。

在1857年8月危機最嚴重的時候，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所收集的材料，集中精力着手寫作他的經濟巨著。馬克思進一步充實這些材料，並部分地進行加工，打算把他這部經濟著作分六冊出版。這部著作開頭部分的初步方案保留下來了，這就是篇幅龐大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曾於1939年以《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的標題用原文出版。這些手稿反映出馬克思經濟學說形成中的重要階段，他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性進行研究的重要階段。手稿中已經制定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它們後來由馬克思在所有三卷“資本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以及

“剩餘價值學說史”中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馬克思闡述了他那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的最基本的要點。

本卷刊載了馬克思在1857年8—9月為上面提到的那部他未能按最初計劃完成的經濟著作所寫的“導言”草稿。雖然這篇“導言”不是最後完成的作品，但是它富有深刻的思想，並且具有很大的獨立的科學價值。馬克思在這裡揭示了政治經濟學對象的本質，分析了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問題，同時指出了生產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決定性作用。“導言”中特別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其中還包含有一些將馬克思主義關於一系列社會現象的學說加以發展和具體化的卓越見解，例如，關於作為社會意識的形式之一的藝術在一定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發展規律的重要原理。

從1858年8月起，馬克思利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有關章節，加緊寫作他的經濟著作的第一冊第一分冊。他在1859年1月結束了這一分冊的付排準備工作，並且用“政治經濟學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的書名在柏林出版。但是馬克思未能出版以下各分冊。後來他放棄了最初的經濟研究計劃而制定了一個新的計劃，“資本論”就是這個新計劃的體現。

馬克思在為發展他的經濟學說而從事緊張理論工作的同時，在這幾年還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對國際生活和歐洲各國國內政治的一切重大問題做出反應。革命的政論作品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個反動時期進行政治活動的主要形式之一，在這幾年，兩位無產階級領袖正是利用它作為主要手段來對無產階級施以革命影響，培養他們的階級覺悟，闡明他們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具有



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他們在未来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中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无产階級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刊載了馬克思于 1856 年 4 月 14 日在紀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創刊四周年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說记录。在这篇篇幅不大但內容非常深刻的演說中，馬克思用生动的、为英国广大工人群众所能理解的語言扼要地闡述了他的革命学說的本质。馬克思指出，資产階級社会的矛盾只有用一种办法才能够解决，这就是資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階級革命。馬克思着重指出了无产階級是資产階級社会中能够改造旧世界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階級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他說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們，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見本卷第 4 頁）

編入本卷的馬克思的很多文章和通訊都是專門分析 1857—1858 年世界經濟危机的发展的。馬克思从危机在信貸和貨幣流通領域中只有最初的、甚至还不明显的征候时起就开始研究它，他仔細地着重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各个經濟部門的危机的表現形式。馬克思对这几个当时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发展情况所以特別感到兴趣，是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期正是在这些国家会爆发无产階級革命。

馬克思关于危机的文章包含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概括和結論，它們揭示了一般資本主义发展的規律性，特別是資本主义在五十年代这个时期发展的規律性。馬克思指出，大規模的投机企业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在克里木战争結束以后，投机活动得到特別蓬勃的发展，它相继侵入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經濟生活的各个主要部門：借貸資本、商业、工业和

农业，很快便带有普遍的性质。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很快便蔓延到德国。所有經濟比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这个漩渦。早在1856年秋天，在經濟危机开始以前几个月，馬克思便正确地預見到，这种普遍的投机倒把現象将必然以普遍危机告終（見“欧洲的經濟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等文章）。在一系列探討信貸貨幣关系的文章中，馬克思对世界金融市場的状况，特别是五十年代非常发达的期票信貸領域，作了卓越的分析。

全面了解世界工业和貿易的状况，深入研究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值，仔細考察作为世界金融市場中心的英格兰銀行的貼現率的变动，經常观察成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的漲落，探究黄金比白銀貶值以及白銀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往亚洲的原因，——这一切使馬克思能够早在危机前的擴張时期就完全准确地不仅預見到普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預見到它的发展的特殊性。在“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銀行法”、“英国貿易的震蕩”、“英国的貿易危机”、“欧洲的危机”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馬克思預先就确定了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性质，他指出，就其强烈程度和涉及的范围來說，这一次危机必然要超过以往的一切危机，并且最終要酿成世界的工业危机。

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1857—1858年的經濟危机在个别国家中发展的特点。他在“英国的貿易”和其他几篇文章中，強調指出了受危机侵襲最大的是英国，因为它当时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中心。英国危机的特点就在于它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即工业，而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在上述这些文章以及“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銀行法”、“英国的貿易危机和貨幣流通”、“英国的貿易和金

融”等文章中，对于英国自由貿易派以自由貿易原則作为防治危机的万应灵药的观点都有尖銳的批評。馬克思闡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妄想找到防治危机的丹方只是白費气力，駁斥了他們关于1857年危机以及一般危机的起因的簡單化的庸俗說法，同时做出了关于危机理論的重要結論。馬克思指出，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像自由貿易派所說的那樣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貨的濫用，而是在于資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經濟条件。他指出，危机“是現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見本卷第607頁）

在馬克思有关經濟和金融的文章中，关于当时著名的法国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 的几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該銀行的投机的交易所伎倆曾大大加剧了1857年的經濟危机。

馬克思分析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找出这个股份公司不同于其他股份公司的特点，同时在“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第三篇論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在理論上很重要的关于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資本主义时期的意义和作用的原理。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还只是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且“还远沒有为自己創造出适当的結構”，但是它們在当时就已經是发展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馬克思写道，它們对資本主义各国国民經濟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計再高也不为过的”。（見“英国的貿易和金融”）馬克思把股份資本形式的发展同資本主义經濟往后的进化联系起来。他写道：“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現代各国經濟生活中的新时代。”（見本卷第37頁）一方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把个体資本联合起来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因而

能够創辦单个資本家力所不及的那种規模的工业企业。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在迫使小資產階級破产的同时，加速生产的积聚和資本的集中，造成工业資本家寡头集团日益加强的統治。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在增长，对于剝削他們的資本來說，他們将“随着代表这种資本的人数的减少”而成为愈益可怕的革命力量。在这些論断中，馬克思实际上已經天才地預見到了資本主义壟断阶段的若干特征。

馬克思和恩格斯探討殖民主义問題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在这一时期仍繼續对資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和到五十年代中期已具有广泛規模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給予最大的注意。

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事件的文章中，馬克思發揮了他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的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革命前景之間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賴的关系的思想。

馬克思曾強調指出，成为欧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的白銀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向亚洲的現象，跟太平軍起义有部分的联系，并且写道：“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見本卷第76頁）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牵制了英国的大量武装力量。馬克思曾将这一起义与别的决定性因素相提并論，认为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促使英国被卷入即将到来的革命。（見“欧洲状况。——法国財政状况”、“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两种因素互相影响的思想，奠定了馬克思主义关于民

族殖民地問題的學說的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中國、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文章中所包含的關於無產階級在民族殖民地問題方面的政策的基本思想，後來由創造性地深入研究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弗·伊·列寧全面地發展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闡述各被壓迫民族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時，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教育歐洲的工人階級，主張堅決支持波斯、中國、印度、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關於1856—1857年的英國—波斯戰爭、1839—1842年和1856—1858年的兩次對華鴉片戰爭、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義的文章，是對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鮮明的揭露性文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些文章中憤怒地抨擊英國在亞洲的殖民擴張，揭露英國在印度和中國推行殖民政策的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英國這個當時最大的資本主義強盜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借以取得殖民壟斷地位的方法和手段時，指出英國資本主義用公開的搶劫和暴力或者用收買和欺騙來實現它在亞洲大陸各國的侵略。

在“英國—波斯戰爭”、“英中衝突”、“對波斯的戰爭”、“英國—波斯戰爭的前景”這些文章中，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強調指出了英國在亞洲的外交活動的侵略性質，這種外交活動是英國殖民擴張的主要手段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國殖民主義者所慣用的和典型的外交方法，是給地方當局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說它違背了條約的義務或者沒有遵守某些外交禮節上的無關緊要的規定。這些都被當做武裝侵略、強占領土和締結新的不平等條約以使這種占領及其他對英國侵略者有利的條件合法化的借口。英國資本家

为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独占势力，不仅自私地利用了居住在这两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之間的部落的、民族的和宗教的糾紛，而且还人为地煽起了这两个国家同相邻各国之間的仇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鴉片貿易史”等）中写到对中国的鴉片貿易，这种貿易是英国侵略者踐踏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利益的有力证明。英国侵略者在基督教伪善的文化傳播者的假面具下面，使他們所壟断的鴉片走私貿易成了他們发财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英国政府口是心非地宣布自己反对鴉片貿易，实际上却在印度推行了并且为自己取得了鴉片生产的壟断权，使得向走私商人出售鴉片合法化，而且早在十九世紀初便由这种貿易取得了大量收入。馬克思得出結論說，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財政，不只是依賴对中国的鴉片貿易，而且正是依賴这种貿易的走私性质。

馬克思表明，鴉片貿易如何掏空了中国的国庫，破坏了国家的經濟并且使人民遭到体力衰竭和道德堕落的威胁。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当局对这种貿易的反抗而挑起了两次所謂鴉片战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和說明它們的海盜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們所占領的中国領土上的和平居民橫施的暴行。恩格斯在分析第一次对华鴉片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时，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自始至终是极端殘忍的。（見“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馬克思写道：“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們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驅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頑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燒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軍官亲笔記載

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見本卷第 309 頁）在就第二次鴉片战争所写的“英中冲突”、“議會关于对华軍事行动的辯論”、“英中条約”等文章中，馬克思得出結論說：以殘酷轰击广州和平居民开始的第二次战争，也与第一次战争一样，具有强盜的性质。

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談到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頑强而积极的斗争。他們駁斥了那些对中国人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极尽辱罵之能事的殖民主义资产階級辯护人，认为中国人民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殖民主义者，条件相差悬殊，这些方式是必須采取的。恩格斯写道：“英国政府的海盜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絕灭战的性质。”（見本卷第 232 頁）恩格斯认为中国人民群众在第二次鴉片战争期間对英国侵略者的反抗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即“为了保存中华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恩格斯解釋道，——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規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見本卷第 232 頁）

科学共产主义的創始人曾經以先知之明預言过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誕生。他們深信这个偉大而古老的國家将会得到解放，并且认为这一解放必然将对东方各国的进步发展具有最偉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們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掙扎，同时我們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紀元的曙光。”（見本卷第 234 頁）

本卷中刊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印度 1857—1859 年的偉大民族解放起义所写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揭示了起义产生和失敗

的原因，評述了起义的性质，并作出了对起义的历史评价，闡述了战事的进程。

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把印度的起义看做是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整个解放斗争的一部分，論证了印度起义和英国在亚洲的几次殖民战争之間的相互依賴关系。在“波斯和中国”、“与波斯签订的条約”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結論：英国—波斯战争和中国的第二次鴉片战争，由于基本上是以英印军队进行的，便給印度人民增加了更加不堪忍受的負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印度起义的爆发。而这一起义又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匆忙同波斯締結和約，并且把在中国的軍事行动中断了好几年。

英国統治階級力图掩飾印度起义的真正性质和規模，想把它說成仅仅是西帕依（孟加拉英印军队中的土著部队）的軍事叛乱。英印当局費尽心机掩盖印度广大阶层居民参加起义的事实，企图证明起义是伊斯兰教徒发动起来的，似乎并没有得到印度教徒的支持。

馬克思和恩格斯駁斥了这些虛伪的論調，他們一开始就把印度起义看做全民族的运动，看做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統治的革命。（見“印度军队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起义”、“勒克瑙的解救”）他們认为下面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即在起义期間，不仅是不同宗教的代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不仅是不同种姓的代表——婆罗門、拉吉普特人，往往也包括錫克人，——而且还有印度社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都团結在一个反对英国統治的共同联盟中。馬克思写道，“西帕依团杀死了他們的欧洲軍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們相互間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們共同的統治者；‘騷动由印度教徒开始，而实际



上其結果是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經不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軍隊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統治的普遍不滿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軍內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見本卷第 252 頁）

馬克思在“印度起义”这篇文章中无可辯駁地证明了，印度人民是同情并且支援起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都广泛参加了起义。馬克思說，单是起义得到极大規模的发展，而英国人在給自己軍隊保证运输和彈药方面到处遇到阻碍这一点，就已证明了印度农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敌对态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动印度起义的直接原因，与英国在印度的統治条件到十九世紀下半叶初期所起的变化，特别是土著軍隊职能的改变，有紧密的联系。馬克思指出，英国能够征服印度并且在一百五十年来占有它而沒有发生任何巨大的动蕩，主要是靠一个基本原则，即“分而治之”。在不同的种族、部落、宗教、种姓和个别自主的公国之間煽起仇恨，是英国在印度巩固它的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从十九世紀中叶起，这一統治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工具的东印度公司，这时完成了領土占領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征服者。为了使印度人民馴服順从，它不得不依賴它所建立的土著軍隊，要这种軍隊担当的主要已不是軍事职能，而是鎮压被奴役人民的警察职能。这样，印度人民的馴服就由土著軍隊的忠誠来决定了。但是，印度的英国当局建立这样一支軍隊，“同时也就組織起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見本卷第 251 頁）馬克思正是以此來說明，为什么发动起义的并不是飢餓的、被搶得精光的印度农

民，而是处于特权地位的、收入很好的西帕依。

但是，起义的动力决不限于土著军队的士兵。馬克思指出，西帕依在起义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見“印度問題”）。起义具有无比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都植根于印度人民对于长期的殖民压迫、对于英国侵略者在印度的强盜行为以及实行殖民剝削的殘酷方法普遍感到不滿。馬克思在“印度刑罰的調查”、“印度的捐稅”这两篇文章中強調指出，极其繁重的捐稅、敲詐勒索以及在征收國稅时到处采用的暴力行为和酷刑，在印度农民的生活中是常見的現象。刑罰成了英国在印度的財政政策的官方认可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所征收的捐稅沒有拿出一絲一毫来以公益設施的形式还用于人民，“这种公益設施对亚洲国家比对任何地方都更加必不可少”（見本卷第 552 頁）。

馬克思指出，靠兼并仍然独立的国土和沒收土著公国的土地来强力扩大英国領地的政策，也是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見“奧德的兼并”、“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問題”）。这种政策引起了印度大部分有产階級，特別是封建地主对英国統治的不滿。在起义时期，在印度資產階級中間也可以看到对英国統治的反对情緒，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是，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为印度战争的需要而发行公債，沒有获得成功。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們相信，只要所有一切能够与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特別是印度南部和中部的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起义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如印度的封建割据、印度居民的民族复杂性、印度人民在宗教上和种姓上的隔离以及絕大部分領導起义的地方封建主的背叛，並沒有出現这种共同行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起义者沒有統一的集中领导,沒有总的軍事指揮,以及他們內部发生分歧和爭執。对起义有致命影响的,是起义者的軍事力量和軍事装备不及敌人,他們沒有作战經驗。这一切就使得起义参加者的內部組織不穩定,减少了他們在作战中获胜的机会,削弱了士气,使他們的队伍陷于瓦解并且最終导致起义的失败。(見“德里的攻占”、“勒克瑙的圍攻和强攻”、“勒克瑙的解救”、“勒克瑙的攻占”)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斗争的条件很困难,然而起义者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特别是在防守起义的主要中心——德里和勒克瑙的战斗中。他們在防守德里遭到失败以后,明显地显示出民族起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恩格斯写道,不在于正規战,而在于游击战。

在“印度起义”和“攻占勒克瑙的詳情”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的”英国殖民軍殘酷虐杀被战胜的起义参加者和肆意搶劫从起义者手中夺得的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抨击。

馬克思在评价印度起义的历史意义时指出,虽然起义并没有使印度的殖民体制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它显示了印度人民对殖民奴役制度的仇恨和为爭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起义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略微改变了殖民統治的形式和方法,例如,完全撤銷东印度公司,因为它的政策在印度引起了普遍的憤怒。

馬克思研究了印度起义对欧洲危机发展的影响,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英国的貿易状况”等文章中着重指出,起义把印度市場封鎖了几个月,从而瘫痪了英国的出口,加剧了英国在1857年夏季发生的危机。但是,另一方面,起义对英国工商业的活跃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

求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大大增长了。

恩格斯在关于中国和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中，以及在他的“山地战的今昔”这篇文章中，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了军事科学问题。恩格斯利用人民起义的各种历史事例，在这里发展了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原理，认为这种战争是旨在反对外国奴役者的广泛全民运动所特有的战争形式。

在本卷所载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从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新的欧洲革命的前景这个角度作了评价。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和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分析了危机时期的国际事件的进程，确定了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力量的分布、各党和各政府的立场和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他们密切注意了国际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每一个新的步骤。

1856年7月间，马克思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对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涨作了反应，这一革命早在1854年就已开始，它是欧洲革命运动在漫长的反动时期之后复苏的最初征候之一。马克思就西班牙的七月事件写了两篇文章，它们以“西班牙的革命”为题收入本卷，这是马克思在1854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革命事件的文章的直接继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

马克思在确定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特点时，着重指出这次革命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指出它已完全失去西班牙以往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所固有的王朝性质和军队性质。马克思指出，革命的一个新的特点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加入了斗争，从而改变了革命中的阶

級力量的分布，使得一方面是宮廷和軍隊，另一方面是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人民。1856年革命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反映了西班牙“許多進步的徵兆之一”的事實，是西班牙農民熱烈支持革命。馬克思寫道，在1856年的革命中，如果運動的領袖們願意並且善於利用西班牙農民的力量，西班牙農民就可能成為“抵抗運動中一個最強有力的因素”。這種思想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在這幾年進一步發展了他們關於工农聯盟的天才原理，認為農民群眾在反對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的鬥爭中應起重要的作用。

在關於西班牙的文章中，馬克思又一次揭露了大資產階級背叛人民群眾的反革命作用。西班牙資產階級在1856年革命中的行為，證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1848—1849年革命的經驗所確定的階級鬥爭的歷史規律性；西班牙資產階級被工人的共和民主要求、被可能摧毀君主制和發生內戰的危險所嚇倒，在最緊要關頭背叛了在反抗反動勢力時支援過他們的工人。由於工人階級的軟弱、農民運動的孤立和自由資產階級的背叛，1856年的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遭到了失敗。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可能爆發革命的前景出發，分析了主要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國內狀況，認為在危機時期這些國家成熟了革命形勢的徵兆。並且，據他們看來，法國爆發革命的可能性最大，因為在那裡危機大大惡化了勞動群眾的經濟狀況，動搖了波拿巴政府的地位。危機所引起的工業停滯、農業困難、商業蕭條和威脅着國家的財政災難，——馬克思寫道，——必定“會使法國人民處於他們通常起來進行新的政治試驗時的思想狀況。隨着經濟繁榮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隨而來的對政治的漠不關心的消失，第

二帝国繼續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見本卷第 427 頁）

在“对波拿巴的謀杀”、“御用軍人的統治”、“波拿巴的目前状况”、“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馬志尼和拿破侖”等文章以及上面已經提到的几篇关于 *Crédit Mobilier* 的文章中，馬克思对第二帝国的制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評，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公开的資產階級專政、軍閥的把持、群众性的政治恐怖、普遍的貪污腐化、盜竊國庫、駭人听闻的投机勾当和拿破侖第三政府为了轉移劳动人民对国内政策問題的注意而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冒險行徑。这些文章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书中就已提出的那个經典論点，即波拿巴專政是靠在各个階級之間随机应变，同时与法国資產階級中最凶狠、貪婪和无耻的成分保有千絲万縷的联系。馬克思指出，投机成了第二帝国的“根本原則”，而政府在政变以后不久建立的公司 *Crédit Mobilier* 是波拿巴制度的支柱。（見《*Crédit Mobilier*》、“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Crédit Mobilier* 和在法国盛极一时的濫設企业和投机活动被波拿巴政府广泛利用来满足資產階級想获得巨額利潤的企图，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他們离开政治斗争，最后，保证波拿巴集团的个人需要。

馬克思指出，法国社会所有各阶层对波拿巴制度的不滿情緒逐漸增长；他得出結論說，“延緩法国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发一場欧洲大战”（見本卷第 703 頁），在这次战争中，受到沙皇俄国支持的法国和撒丁必然联合起来反对奥地利。馬克思的这一預言在 1859 年完全得到了证实。

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失敗后，馬克思依然认为，欧洲的无產階級革命只有在英国无產階級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馬

克思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中仔細研究了英国国内的状况。

在“法国财政状况”、“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銀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等文章中，馬克思表示深信危机的发展使英国有可能爆发革命。一方面，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剝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迅速增长，旧的执政党趋于瓦解。另一方面，英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与拿破侖第三結成联盟，并且它的軍事力量和装备受到印度起义和中国战争的牵制。馬克思得出結論說，在欧洲大陆爆发重大革命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它不可能占据“它在1848年和1849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的地位”，也不可能“阻碍显然在日益临近的欧洲革命”。（見本卷第255、539頁）

馬克思探討了五十年代后半期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特点。在“帕麦斯顿內閣的失敗”、“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頓、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敗”等文章中，他一針見血地評述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議会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就在于“在某些隆重庄严的时刻，要末是由輝格党把自己的不負責任的職責移交給托利党，要末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給輝格党。內閣大臣的責任在这里就是追逐有利可图的职位，这种追逐已經成为議会中各党派的主要操勞了”。（見本卷第659頁）馬克思还指出了英国两个傳統的执政党——托利党和輝格党——在繼續着的瓦解过程。馬克思在着重指出这两个旧政党变成一个貴族政党的趋势时指出，托利党和輝格党只有在使它們的共同利益服从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能繼續存在下去。他同时指出了英国资产阶级与貴族妥协

的趋向。馬克思以此揭示了英国两党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这一发展过程后来使托利和輝格这两个旧貴族政党变成了两个輪流执政的英国資產階級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馬克思指出，因取得貿易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感到完全滿意的英国資產階級，由于害怕工人階級和为了避免对它的让步，在五十年代公开与貴族結成联盟。在“选举的結果”和“英国工厂制度”这两篇文章中，馬克思談到英国資產階級放棄为爭取对英国国家制度进行民主改造的斗争。他写道，所謂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1857年的选举中的失败，是英国資產階級放棄它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夺的对国内民主运动的领导的明证。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見到，曼彻斯特工业資產階級的領袖的失敗必然会促使爭取英国选举改革的宣傳活跃起来。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这种宣傳可能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会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的发展。

馬克思写道，旧貴族政党的瓦解和軟弱无力以及資產階級的缺少革命力量，为以帕麦斯頓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执掌政权創造了条件。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說明，这个执政的貴族寡头政治集团的典型代表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实行任何改革的敌人，是殖民擴張的鼓舞者和对外侵略政策的热忱捍卫者，英国資產階級企图用这种政策来轉移无产階級对国内問題的注意。馬克思在揭示获得“真正英国大臣”荣誉的帕麦斯頓具有广泛的声望和影响的原因时，指明他的政策是渴望扩大銷售市場和加强英国工业和殖民壟断的英国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典型表现。

在闡述普魯士状况的文章中——“普魯士国王的瘋癲症”、“普魯士的摄政”、“普魯士状况”、“新內閣”，馬克思揭示了霍亨索倫王朝統治的反动本质，极其严厉地批評了普魯士君主专制的国家制



度的基础，把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变成僵死条文的反动的普魯士宪法。馬克思揭露了官僚制度的专横，这种官僚制度浸透到普魯士国家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馬克思指出，普魯士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保存，是由于普魯士资产阶级采取了怯懦的自由主义态度，他们一心所想的只限于拚命追求有利可图的国家职位。

本卷刊载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关于俄国的文章。如果说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续把沙皇俄国看做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始终是沙皇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那末，他们对于另外一个俄国，即非官方的俄国，对于在这个国家中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抗的力量，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充分暴露了沙皇军事官僚机器的腐朽性的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农民骚动急剧增长的影响下，对俄国革命发展的前景表现了愈益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前景还相当遥远，那末这时他们得出了俄国革命正日趋成熟的明确结论。

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八五八年的欧洲”、“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俄国看做孕育着反农奴制的人民革命的国家，他们指出，俄国人民群众的运动在获得对专制制度很危险的性质，农民起义可能成为“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見本卷第 725 頁）馬克思在研究 1858 年下半年的欧洲国际形势时，认为俄国革命是西方革命运动的潜在的同盟军。他写道，如果说这个强大的国家在十年前还“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那末“现在它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立刻燃烧起

来”。（見本卷第 539—540 頁）在“一八五八年的欧洲”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在指出欧洲各国政治运动重新兴起的征候时，特別注意到俄国的政治活跃，这就是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的准备。

馬克思在評述 1858 年末欧洲的国际形势时，得出一个充滿深刻意义的結論：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只可能有一种抉擇，不是革命就是战争。馬克思強調指出，正是在目前，欧洲“正在这两个路口上徘徊”。（見本卷第 703 頁）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沒有收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六篇文章。其中有几篇的俄譯文曾在苏联不同杂志上发表过。其余各篇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文章后面的編輯說明中都注明了。

除四篇文章以外，本卷所刊載的全部文章在发表时都沒有署名。但是，絕大多数文章的作者能够通过馬克思在 1857 年和 1858 年的筆記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其他文件来确定。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的，“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會任意处理他們的文章，特別是那些沒有署名而以社論形式发表的文章。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中，編輯部曾經作了許多增补和整段的补充。本版从正文中删除了这种明显的增补，而把它們作为对該篇文章有关地方的注釋。

“紐約每日論壇报”和其他报纸在刊印专有名词、地名、数字、日期和引文方面出現的明显錯誤，已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利用过的資料作了修改。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和通訊的标题，是与报纸上发表的主题一致的。当原文沒有标题而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

加上的时候，标题前加有一个星花。报纸上的文章标题和馬克思在筆記本中所加的标题方案如果不一致，在注釋中有所說明。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馬克思的筆記本加上的文章标题，也在注釋中加以說明。如果在馬克思同时发表于两种不同报刊上的文章中有重大的差别，或者刊印出来的原文与保存下来的手稿有不一致的地方，凡是重要的異文都放在当頁脚注中。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6年4月—1859年1月



#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SATURDAY, APRIL 19, 1856.

卡·馬克思

## 在“人民报”創刊紀念会上的演說

1856年4月14日在倫敦发表<sup>1</sup>

那些所謂的 1848 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細小的裂口和縫隙。但是它們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淵。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現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蕩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們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階級解放这个十九世紀的秘密，十九世紀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 1848 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紡机甚至是比巴尔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們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們可感觉得到嗎？同样，欧洲社会在 1848 年以前也沒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圍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們十九世紀特征的偉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一衰頹的征象，这种衰頹远远超过羅馬帝国末期那一切載諸史册的可

怕情景。

在我們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飢餓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財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变成貧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別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純洁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为愚鈍的物质力量。現代工业、科学与現代貧困、衰頹之間的这种对抗，我們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間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爭辯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現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現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們不会认錯那个經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現的狡猾的精灵。我們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們，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現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資產階級、貴族和可怜的倒退預言家惊慌失措的現象当中，我們认出了我們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sup>2</sup>，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現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們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們的本階級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資本的統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階級从上一世紀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資產階級历史家把它們

掩盖起来和隱瞞不說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統治階級的罪行，在中世紀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 «Vehmgericht» [“菲默法庭”] 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紅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 «Vehm» 的判決。現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紅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階級就是执刑者。

載于 1856 年 4 月 19 日  
“人民报”第 20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 卡·馬克思 上院和約克公爵的紀念像

正当約翰·羅素勳爵这个

“发育不全的三寸丁”<sup>①</sup>，

把他那些滑稽可笑的，对那名叫人民的巨人进行教育的矮子計劃之一，拿来給下院消遣解悶的时候，他的同僚們在上院显示了天生的大不列顛統治者們所受教育的实例。他們討論的題目是下院委員會提出的一个报告，报告建議为了当地的原因、把約克公爵的紀念像从滑铁卢廣場撤走。克蘭里卡德侯爵就这一点說道：

“約克公爵不仅由于自己高貴的出身而聞名，而且还在担任公职期間为王室和祖国做了巨大的工作…… 哀悼他的逝世的，不仅仅是一些亲近的朋友，这种哀悼是普遍的。大家都爭先恐后地证明，約克公爵是多么热誠地履行了托付給他的职责。”

兰斯唐侯爵认为：

“不應該那么輕率地撤除或搬走几年以前才为紀念我們大家所敬重的卓越人物而建立的紀念像。”

阿伯丁这位走过不少地方的賽恩<sup>②</sup>說，这个紀念像是“相当神圣的”。馬姆茲伯里伯爵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二場。——編者注

② 苏格兰貴族。——編者注

“完全同意高貴的伯爵的意見，這些意見可以說是表達了我們在這方面的感情”。

讓我們也來回顧一下上院這樣加以尊崇的皇家英雄的一生吧。

約克公爵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他的誕生——發生在1763年。二十六年後，他由於脫離單身漢的生活而結了婚，成了舉世矚目的人物。反雅各賓戰爭給了皇家親王一個成為皇家統帥的方便機會。雖然在他的永遠著名的弗蘭德遠征中，以及在他同樣馳名的赫耳德遠征中<sup>3</sup>，英軍經常吃敗仗，然而英軍總是由於自己的皇家統帥每次都能安然無恙地歸來而得到安慰。大家知道，他在岡德斯霍特附近，是多麼機智地從烏沙爾面前溜走，他對敦克爾克的圍攻比之對特羅亞的圍攻，是如何地略勝一籌。他在弗蘭德遠征中贏得了這樣巨大的光榮，以致小皮特由於嫉妒公爵的榮譽而迫使陸軍大臣鄧達斯向殿下發出急件，急切地通知他回國，要他為更危險的時刻保存自己個人的勇敢，要他記住費邊的一句古老名言：*famae etiam jactura facienda est pro patria* [為了祖國，甚至應當犧牲榮譽]。這些急件是派一個名叫科克倫·約翰斯頓的軍官送去的，關於這個軍官，我們回頭還要再談。正如當時的一個作者寫的：“約翰斯頓十分迅速而堅決地執行了這個任務，因而博得了全軍的贊揚。”<sup>4</sup> 公爵在財政方面的功績比他在這次遠征中的戰績還要偉大，因為每座軍需庫發生的救急的火災，一勞永逸地把他所有的軍需官、承包人和小供應商的賬目都一筆勾銷了。儘管有這些成就，我們在1799年又發現殿下在領導赫耳德遠征，這次遠征，不列顛的報紙在小皮特的公開庇護之下，把它描繪成一次純粹的遊逛，因為不可想像，有控制着須德海的艦隊作後盾的、由不倫瑞克

王朝后裔領導的一支 45 000 人的軍隊的來到，竟不能徹底粉碎

“利木贊的一個在法國革命時期的球場上受到軍事和政治教育的、叫做布律恩的印刷所學徒所指揮的”

兩萬法國人組成的一群烏合之眾。

但是，帶着這些雅各賓將軍們所固有的粗野的厚顏無恥習性的這位利木贊的印刷所學徒，每次碰上殿下，都竟敢這樣蠻橫無禮地把他打得落花流水。而當殿下認為祖國而生比為祖國而死更值得贊許的時候，他就竭盡一切努力想回到赫耳德去。但是，在公爵沒有在規定釋放當時被俘在英國的 8 000 個法國和荷蘭水兵的那個著名的阿爾克馬降約<sup>5</sup> 上簽字以前，布律恩是那樣地不知禮節，竟不讓公爵回到那里去。

當約克公爵對遠征感到厭倦時，他就很明智地讓自己的名字沒沒無聞一段時期，這對英軍總司令部里的總司令來說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在这里，他也是領導一個每年花費人民 2 300 萬英鎊的部門，這個部門給了他以只受國王監督的充分權力，可以決定共約 12 000 名的參謀和其他軍官中不論多少人的升降。

殿下不放棄機會去做這樣一些事情來贏得社會的十二萬分的感激，比如發布一些規定所有士兵和軍士都要剪除 queues [辮子] 的文明通令；在他們的行裝中增添一塊海綿，用來保持頭部清潔；規定向右看齊、向左看齊；快步走、慢步走；橫列靠攏、橫列疏開；轉彎和轉向；英武地練槍；規定要剪髮、穿黑色護腿套，保持武器和裝具的清潔；用緊身坎肩來束緊約翰牛的寬大胸部，用奧地利式的頭盔戴在他的愚蠢的腦袋瓜上，用難看的軍大衣披在他寬闊的脊背上，——以及諸如此類的作為司務長學問的內容的重要事情。同時，他在對科克倫·約翰斯頓上校進行的那場國內戰爭中，表現出

了一个战略家和战术家的卓越才能。科克倫·約翰斯頓就是小皮特当时派去制止約克公爵向弗兰德胜利进军的那个軍官。在1801年是西印度第八团(黑人)团长和多米尼加島总督的約翰斯頓,由于这个团发生嘩变而被召回英国。他对自己团队中在发生嘩变时直接指揮团队的約翰·戈登少校提出控訴。这位戈登少校和公爵的秘书戈登上校同样是屬於著名的戈登家族。这个家族出了許許多多偉人,如像搞出了一个阿德里安堡和約<sup>6</sup>的戈登,走过不少地方的阿伯丁賽恩以及他的同样著名的、在克里木表現得那么出色的儿子戈登上校。因此,約克公爵要报复的不仅仅是那个誹謗戈登家族的人,而主要是那个递送伤脑筋的急件的人。不管約翰斯頓上校怎样再三再四地要求,約翰·戈登直到1804年1月才到軍事法庭受审,虽然法庭认为約翰·戈登的行为是非法的、輕率到了犯罪的地步,应当受到各种各样的譴責,然而約克公爵还是保留了他的全部薪餉以及他原来的軍銜;可是,約克公爵在1803年10月从晋升为陸軍少将的名单中,把約翰斯頓上校的名字勾掉了。約翰斯頓看到这个名单上的一些資格比他淺的軍官都被优先提升。約翰斯頓向公爵提出的申訴过了九個星期,在1803年12月10日才得到殿下的答复,說他的名字沒有被列入应当晋升为將軍的名单,是因为有人“对他提出了控訴,控訴的理由还没有查明”。約翰斯頓再也未能得到任何答复,直到1804年5月28日他才知道控訴他的就是戈登少校。約翰斯頓的案件从一个开庭期推延到另一个开庭期,因为审理他的案件的軍事法庭一会儿到坎特伯雷去了,一会儿又到切尔西去了,直到1805年3月才开庭。法庭宣告約翰斯頓完全无罪,并恢复了他的名誉,于是約翰斯頓請求重新把他列入晉級的名单,但是在1805年5月16日遭到殿下拒絕。

6月28日，一个福克斯集团<sup>7</sup>的成员費茲帕特里克將軍在議會中宣称，对約翰斯頓的不公正态度“引起了全軍极为强烈的不安”，为了维护約翰斯頓的利益，他建議議会在下次會議开始的时候，专门开一次会来处理这件事情。下次會議开始了，但当时成了陸軍大臣的費茲帕特里克在大臣席上宣称，他将不提出他早先威胁說要提出来的那个建議。不久以后，这位陸軍大臣，这位一生从未聞过火药味，从未見過敌人的人，这位在二十年以前就把自己連长职位卖了<sup>8</sup>、并且从此就沒有服役过一天的人，被約克公爵派去当团长。这样一来，費茲帕特里克陸軍大臣就必须听取費茲帕特里克团长的报告了。約克公爵就是用这样的軍事巧計战胜了約翰斯頓团长，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战略天才。

公爵虽然有一些在光荣的不倫瑞克王朝里稟受下来的迟鈍，但他仍然是一个自有其机灵之处的人物。下面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乔治三世的“家庭內閣”（密室家庭會議）的首脑，也是那个名叫“国王之友”<sup>9</sup>的皇党的首脑。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下面这件事：虽然他每年的收入有61 000英鎊，但他还是想方設法以借款作幌子，从內閣榨取了54 000英鎊，而且尽管有了这笔国家貸款，他还是設法不偿还他的私人債務。完成这样的功业，需要有真正敏捷的心机。既然大家都知道“高官厚祿吸引着許多人的眼光”<sup>①</sup>，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格倫維耳政府并不感到难为情地建議殿下摆脱与其职务有关的某些次要职责，而这种摆脱，正如公爵花钱出版的一本小册子<sup>10</sup>伤心地指出的，会使总司令的作用簡直化为烏有。应当指出，那个叫做亨利·配第勋爵的兰斯唐也

① 莎士比亚“量罪記”第四幕第二場（未用原話）。——編者注

就是这个政府的成員。这个政府威胁說要用一个軍事會議来牵制光荣的將領，偽称，如果不派一批軍官来协助沒有經驗的总司令，“国家”似乎就会灭亡。这个卑鄙的集团如此地逼迫公爵，甚至要求調查公爵在英軍总司令部的活动。幸亏乔治三世出来直接干預，或者确切些說，下了命令，才制止了格倫維耳党的这个阴谋。乔治三世虽然是个尽人皆知的蠢人，但毕竟还有足够的智慧来了解自己儿子的才能。

在1808年，皇家統帥为勇敢精神和爱国心所驅使，硬要去担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英軍的指揮。但是这时，群众普遍担心英国会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失去这样一位將領在国内的效劳，这种担心表现得異乎寻常地喧嚷、不客气和几乎是不成体統。有人提醒公爵回忆他过去在国外的失敗，劝他保存力量来对付国内的敌人，劝他当心遭到社会的仇恨。寬宏大量的公爵毫不考虑地叫人出了一本小册子，来证明自己仍然有权像在弗兰德和荷兰那样，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被人打敗。但是，唉！当时的“紀事晨报”<sup>11</sup>写道：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人民，执政党和在野党，在看法上是完全一致的。”

一句話，关于公爵的任命的議論似乎要使英国发生一場真正的吵鬧。例如，我們在当年倫敦的一家周报<sup>12</sup>上讀到：

“不仅仅是在客棧里、咖啡館里、集市上、大街上以及爱閑聊的人通常聚集的地方，都在談論这个題目。这种談論滲透到所有私人的家里，成了飯桌和茶几上必不可少的茶餚；人們在大街上互相招喚，停下来談論約克公爵前往西班牙的事情；性急的倫敦人甚至在去交易所的路上也停下来打听約克公爵是否确实打算到西班牙去。何止于此！甚至在乡村教堂的走廊上，在平常談論社会問題很少超出直接稅范围的那些穿粗麻布短衫的政治家中，也可以看到，十来个人几乎紧紧靠近一个讲话的人，打听 *«zarten if the Duke*

of York be a gooen to be zent to Spain»<sup>①</sup>。”

所以很明显，尽管嫉妒公爵的那些誹謗者做了許多努力，但是不可能把公爵往昔的功績隱瞞起来，使世界无法知道。每个人在看到整个国家所考虑的只是如何能把公爵留在家里的时候，該感到多么快意啊！而公爵当然就只好让自己高貴的头腦做一番巨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的英武的热情，而安心地留在英軍总司令部里。

我們在談到他的偉大的一生中最光輝的时期以前，必須中斷一下我們的叙述而指出，早在 1806 年，公爵父亲的忠臣們就对公爵做过充分的完全公开的評价。科貝特在自己的这一年的“政治紀事报”上写道：

“他仅仅是由于临陣脫逃，使英軍蒙受耻辱而聞名。这个半痴半呆的人同时又是极端的卑鄙狡猾。他的同样著称的特点是，既有純女性的軟弱又有极毒辣的殘酷，既傲慢而又卑鄙，既揮霍而又貪婪。他取得軍权以后，就把托付給他的事业敗坏了，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无耻地掠夺用高薪托付他来保护的人民。他預先收买和恫吓所有他认为可能会揭露他的人，于是放肆地干出許許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恶行，使自己遭到虽然是暗中的但却是普遍的憎恨。”

1809 年 1 月 27 日，沃德尔上校在下院提議“指派一个委员会来調查总司令在軍中有关晋級和調动的工作”。他在自己的一点也不客气的发言中，詳細列举了他可以用来說明自己的提議的种种理由的所有事实，提出了他打算找来为自己提出的事实作证的所有证人的姓名，控訴現在的上院所崇拜的英雄，說他的一个叫做

---

① “約克公爵是否确实打算到西班牙去”(方言)。——編者注

克拉克夫人的情妇拥有提升一切軍官的特权，軍中的調动也归她处理，她的影响扩展到軍隊司令部里的任命事項，她享有扩大国家武装力量的权利，从所有这些源泉中，她获得了一定的金錢報酬，总司令不仅是她的一切勾当的秘密参与者，不仅利用她的金錢来使自己少掏一些腰包，甚至除了克拉克夫人弄到的以外，总司令还企图亲自用她的方法来为自己个人謀取收入。簡而言之，沃德尔上校断定，皇家統帥不仅靠不列顛的軍隊来供养自己的情妇，而且还让他的情妇来供养他自己。下院听取了這個提議后，决定傳訊证人。傳訊一直延續到2月17日，逐条逐条地对证了沃德尔上校的无礼誣告。結果证明，英軍总司令部实际上不在白厅<sup>13</sup>，而在格罗斯特大街的克拉克夫人公館里，她在那里有一座豪华的房子，有許許多多的馬車，有整整一大批穿着僕役制服的侍从、乐师、歌手、艺人、舞者、食客和拉皮条的。皇家統帥自己本人的这个軍事总司令部，是他在1803年建立的。虽然每年两万英鎊也不足維持这样的住所的花銷（除了这个住所外，在怀布里奇还有一座郊外公館），但是，根据证人的证詞确定，克拉克夫人每年从公爵私人腰包里得到的錢从来没有超过12 000英鎊，这样一个数目只勉强够付僕役的工資和购买僕役的制服。其余的錢，克拉克夫人是靠做軍官官銜证书的批发生意弄来的，这种证书現在要靠裙带关系才能得到。有人把克拉克夫人的价目表写好了交給下院。少校軍銜通常的价格是2 600英鎊，克拉克夫人只卖900英鎊。大尉軍銜她卖700英鎊，而規定是1 500英鎊，如此等等。在西蒂，甚至有一个按这样的低价出售軍銜的特別事务所，这个事务所的主要代理人声称，他們是有权勢的寵姬的受托人。每当她抱怨經濟困难的时候，公爵就告訴她說，“她有比王后更大的特权，应当加以利用”。有一次，



有个人不願同总司令的情妇簽訂一个可耻的合同，火气很大的总司令就把这个人的薪餉减少一半，以示懲罰。另一次，他攫取了一笔 5 000 英鎊的款子。还有一次，由于克拉克夫人的坚决要求，他授予几个还在学校学习的小娃娃以尉官軍銜，任命一些人当軍医，但从不要他们停止私人业务而到自己的連队中去。有一个叫弗倫奇的上校从克拉克夫人那里得到一封“公函”，即一張授权給他招募 5 000 士兵入伍的文件。有人在下院談到，公爵和他的情妇因为这件事进行了下面这段對話：

**公爵：**弗倫奇先生老是为这件招募的事来糾纏我。他总是来央求这样那样。他对你怎样？亲爱的！

**克拉克夫人：**很平常，不大好。

**公爵：**那就叫这个弗倫奇当心点，不然的話，我要立即同他算賬，停止他的招募工作。

另外还提出了这位光荣的公爵的几封信，在信里，爱情的傾吐同軍火买卖的問題混雜在一起，其中 1803 年 8 月 4 日的一封信开头是这样的：

“我找不到言詞来向我最亲爱的，我的心肝表达你那宝貴而美好的信給我带来的快乐，或者說，我是多么强烈地感受到了你在信中向我表达的温存啊！我为此表示千万次千万次的感謝，我的天使。”

了解到公爵这种典型的風格以后，就不会奇怪为什么牛津圣約翰学院的大学者們会授予殿下以法学博士的文凭了。这对情侶并不满足于做軍銜买卖，他們竟想到干起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教职任命买卖来了。

另外还弄清了一些同样值得光荣的不倫瑞克王朝后裔引以为荣的事情，例如一个姓道伯尔的軍官是克拉克夫人多年的情夫，克

拉克夫人同道伯尔在一起，是想忘掉她同公爵在一起所感受到的忿恨、嫌棄和厌恶。

公爵的朋友們罵他的天使是“卑鄙无耻的女人”，为他們的五十来岁的、已結婚二十年的溫柔青年辯解說，因为他有一种占据了整个身心的激情。但是，順便說一句，这种激情並沒有阻止住公爵在同克拉克夫人分居七个月后，就停止把他們約定好的每年的補助費付給她，並沒有阻止住公爵在她糾纏不已地要求时，用示众和下牢来威胁她。正是这种威胁成了克拉克夫人向沃德尔上校揭露的直接原因。

要談論下院各次會議及其种种骯髒的細節，或者評述英勇的公爵 2 月 23 日（1809 年）的恳求信（他在信中“以亲王的荣誉”郑重地向下院起誓說，連他的亲笔信所证明了的东西，他也一点都不知道），那是枯燥无味的。只要引证弗格森將軍在議院讲的話就够了，他說，“如果公爵留在自己的职位上，那就会影响全軍的荣誉”。此外，还要补充一句，財政大臣派西沃先生在 3 月 20 日宣布公爵辞职，后来，議院就通过了奥尔梭普勋爵提出的決議案，決議案說“既然約克公爵殿下已經不再担任軍隊指揮，議院并不认为必須繼續追究”，如此等等。奥尔梭普勋爵解釋說，他提出这样的建議，是希望

“把公爵的辞职声明載入議院的會議記錄，以表明公爵永远失去了国家的信任，因而他不应当希望在什么时候重新回到他原来的地位”。

为了嘉奖沃德尔上校大胆出来揭露公爵，人們紛紛向他表示感謝。大不列顛所有的郡、市、城、鎮，都向他致意。

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四世）摄政期間的最初行动之一，是在 1811 年恢复約克公爵的总司令职务。应当說，这个由于是人类

最渺小人物而被称做欧洲第一紳士的皇家的卡列班<sup>14</sup>，就他的整个統治來說，这第一个措施是极其典型的。

就是这个只配用粪堆来裝飾其紀念像的約克公爵，被克兰里卡德侯爵称之为“杰出的总司令”，被兰斯唐勋爵称之为“大家都敬重的卓越人物”。这就是阿伯丁伯爵所謂的“用神圣的紀念像”来使之永垂不朽的那个人物。总之，这就是上院的守护天使。的确，信徒是无愧于自己的圣者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4 月 25 日  
左右

載于 1856 年 4 月 26 日“人民报”  
第 20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 1940 年  
“无产階級革命”杂志第 1 期

## 卡·馬克思 撒 丁<sup>15</sup>

薩瓦王朝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它靠在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間、在意大利各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間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发迹兴起并扩大版图；第二个时期，它靠在法国和奥国之間的战争<sup>16</sup>中时而投到这一边，时而投到那一边而发展兴隆；最后一个时期，它竭力利用世界範圍內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正如同它曾經利用各族人民与王朝之間的对立一样。在这所有三个时期中，模棱两可的态度是这个王朝的政策圍繞着旋轉的一个始終不变的軸心，自然，这种政策所得到的成果規模不会大，并且其性质也是极其可疑的。我們看到，在第一个时期末，与欧洲建立巨大的君主国的同时，薩瓦王朝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君主国。在第二个时期末，維也納會議賞給了它一个热那亚共和国，而奥地利并吞了威尼斯和倫巴第，神圣同盟箝制了所有一切不管叫什么名字的第二流国家。最后，在第三个时期当中，皮蒙特得到許可出席了巴黎會議，起草了反对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备忘录<sup>17</sup>，向教皇提出了英明的忠告，受到了奥尔洛夫的嘉許，它的頒布宪法的願望得到了 coup d'état [政变] 的鼓励，而它的独霸意大利的美梦获得了那位曾經在 1848—1849 年如此成功地出卖过皮蒙特的帕麦斯顿<sup>18</sup> 的支持。

对于撒丁的代表說来，以为立宪制度——而他們这时可以亲眼看到这种制度在大不列顛受尽煎熬，并且 1848—1849 年的革命已經暴露出它在欧洲大陆陷于破产的状况，证明了它既不能对付国王的刺刀，也不能对付人民的街头堡垒，——以为这种立宪制度現在不仅要庆祝它在皮蒙特舞台上的 *restitutio in integrum* [完全恢复]，而且甚至还要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力量，这是极其荒唐的想法。这种想法只有小国家里的偉大人物才能产生。任何一位公平的观察家都会确信不疑：如果法国是一个大君主国，那末皮蒙特就必須安于做一个小君主国；如果法国是皇帝专制，那末皮蒙特的存在就至少要仰承这种专制的鼻息；如果法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那末皮蒙特的君主国就要消失并融化在意大利的共和国之中。撒丁君主国所賴以存在的条件本身就使它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負。它只有在欧洲停止革命、而法国到处是反革命横行的时代，才能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的角色。在这种条件下，它可以設想自己作为唯一具有进步傾向、拥有本民族王朝和本民族軍队的意大利国家，而把意大利的領導角色担当起来。但是这些条件又使它受到帝制法国和帝制奥国的压力。如果这两个毗邻的帝国之間发生激烈的摩擦，撒丁就必然会成为其中一方的附庸和双方的战場。而如果它們之間建立了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协商] 的关系，它就必須滿足于苟延殘喘，即滿足于暂时延緩自己的毀灭。依靠意大利的革命政党，对它說来簡直就是自杀，因为 1848—1849 年的事件已經打消了关于这个政党的革命使命的任何幻想。这样，薩瓦王朝的希望是与欧洲的 *status quo* [現狀] 休戚相关的，但是欧洲的 *status quo* 却使皮蒙特不能在亚平宁半島上扩大疆界，使它只能对意大利扮演比利时式的微賤角色。

因此，皮蒙特的代表企图在巴黎會議上重新下 1847 年的那局棋，只能显得相当可怜。他們在外交棋盘上所走的每一着，都是將他們自己的軍。他們在激烈抗議奧地利对意大利中部的占領时，不得不只是很謹慎地涉及法国对羅馬的占領<sup>19</sup>；他們在抱怨羅馬教皇的神权政体时，不得不低头忍受教会长子<sup>①</sup>的虛伪态度。他們不得不要求那位在 1848 年对爱尔兰那么亲切寬厚的克拉倫登給那不勒斯国王<sup>②</sup>讲授人道課，不得不要求凱恩、拉姆別薩和貝耳島的獄卒<sup>20</sup>开放米兰、那不勒斯和羅馬的監獄。他們在宣称自己为意大利的自由战士的同时，奴顏婢膝地屈服于瓦列夫斯基对比利时出版自由的猛烈攻击，而且，还說这是由于自己深信，

“如果一个国家的报纸宣傳极端的观点并且攻击邻国政府，那末这两个国家很难保持彼此之間的友好关系”。

奧地利根据皮蒙特的代表对波拿巴教义的这种愚蠢的信仰，便立即坚决要求他們制止皮蒙特报纸所进行的反奧斗争和懲办这些报纸。

皮蒙特的代表一面假装他們在以各国人民的国际政策与各个国家<sup>③</sup>的国际政策相对抗，同时又欣然締結了一个恢复薩瓦王朝和罗曼諾夫王朝之間数百年友誼联系的条約。他們为了想在旧欧洲的代表面前施展自己的口才，不得不忍受奧地利的冷遇，被它看做不能討論头等重要问题的第二流国家。当他們怀着极其滿意的心情草拟备忘录的时候，奧地利得到許可，不顾維也納条約的規

---

①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② 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③ 在 1856 年 5 月 31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这里印的不是“国家”，而是“王朝”。——編者注

定，在撒丁从波河直到亚平宁山脉的整个边界上布置军队，占领帕尔马，在皮阿琴察建筑防御工事，并且在亚得利亚海沿岸，从费拉拉和博洛尼亚直到昂科纳，拉开它的军队。4月15日，即向巴黎会议提出这些控诉过了七天以后，法国和英国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特别条约，它清楚地证明了备忘录使奥地利蒙受了多大的损失<sup>21</sup>。

这就是那个在自己的父亲在诺瓦拉战役中一败涂地并禪位之后<sup>22</sup>当着义愤填膺的军队去同查理-阿尔伯特的死敌拉德茨基握手言欢的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尊贵代表们在巴黎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如果皮蒙特不是故意视而不见，它现在就应该看到，正如它以前受到战争的愚弄一样，现在它受到了和约的愚弄。波拿巴准备利用它在意大利把水搅浑，并从浑水里钓上一顶王冠<sup>23</sup>。俄国准备拍拍小小撒丁的肩膀，用意是要在南方惊扰奥地利，从而在北方削弱它。帕麦斯顿为了达到只有他自己了解的目的，准备重演1847年的喜剧，甚至连唱腔也懒得改换。但是尽管如此，皮蒙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外国列强手中的玩具。至于英国议会中的演说，布罗费里奥先生已经在撒丁的下院（他是下院的议员）中说过，“这些演说从来不是德尔斐的神谕，而是特罗芬尼的神谕”。他的错误只是把回声当成了神谕<sup>24</sup>。

皮蒙特演的这幕插曲，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任何意义；它只表明，萨瓦王朝在执行祖传的随机应变的政策和再次企图使意大利问题成为它进行王朝阴谋的支柱方面，又遭到了失败。但是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虽然英国和法国的报纸都故意避而不谈，撒丁的代表却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备忘录中曾特别暗示过。奥地利的敌对态度（它是由撒丁代表在巴黎所采取的态度引起的）“使撒

丁不得不繼續保持武装，不得不采取对于那已因 1848—1849 年的事件和它所参加的战争而陷于枯竭的財政說来負担极重的措施”。但是，还不止于此。

撒丁的备忘录<sup>25</sup> 說道：“民众的騷动近来似已平息。意大利人看到他們本民族的国君之一与西方大国結成联盟……于是抱着希望，以为他們所受的灾难未得到安撫以前，不会簽訂和約。这个希望使他們变得平靜和馴服；然而一旦他們得悉巴黎會議的消极結果，一旦他們知道奥地利不顾法英两国的善意斡旋和友好調停，甚至反对进行討論……那末，毫无疑問，暫時平息的怒火将会比过去更猛烈地燃燒起来。意大利人看到再不能对外交寄予任何期望，就会带着南方人所固有的火气重新投身到富有破坏性的革命政党的队伍中去，意大利又会成为阴谋和騷乱的中心，当然可以采取加倍严厉的手段把这些阴谋和騷乱鎮压下去，但是只要欧洲稍有騷动，它們又会異常猛烈地发作起来。皮蒙特周圍所有各国中革命热情的觉醒——这种革命热情由于它所由产生的原因而能够博得民众的同情——将使撒丁政府遭遇到異常严重的危險。”

这就是問題的实质。在战争期間<sup>①</sup>，倫巴第的富裕资产階級可以說曾經屏住呼吸作过无謂的希望，以为在这場战争結束以后，他們能够通过外交活动和薩瓦王朝的庇护获得民族解放或公民自由，而不必涉越紅色的革命海洋，不必对农民和无产階級作出让步；他們根据 1848—1849 年的經驗已經知道，对这种让步的要求已經成为任何民众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这回他們的貪图安乐的希望破灭了。这場战争唯一显著的結果，至少是意大利人的眼睛唯一可以看到的結果，就是奥地利在物质方面和政治方面得到了优势，也就是說，这个可恨的国家由于一个所謂独立的意

---

① 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大利国家的合作而重新得到了巩固。皮蒙特的立宪派又摸到了好牌，但是他們又把它輸掉了；他們又确信自己不能扮演他們曾如此大声要求的意大利领导者的角色。他們自己的軍隊将要求他們作出交待。資產階級又得求助于人民的支持，并且把民族解放和社会复兴說成一回事情。皮蒙特的恶梦結束了，外交的魔力消散了——革命的意大利的那顆火热的心又开始更有力地跳动起来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5 月 16 日左右

載于 185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报”第 211 号，署名：卡·馬·并載于 1856 年 5 月 31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717 号，沒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并根据“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 卡·馬克思 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第一篇論文)

从倫敦“泰晤士报”<sup>26</sup> 5月30日的社論中可以看出，該报因发现社会主义在法国从未消失，而近几年来“确切些說是被遺忘了”，感到非常驚訝。“泰晤士报”談到这点时，趁机庆賀英国沒有这种禍患之忧和庆賀它沒有供有毒植物生长的階級对抗。这种話竟出自这样一个国家的一家主要报纸，是够大胆的，因为該国的一位杰出的經濟学家李嘉图先生在他的一本論政治經濟学原理的名著<sup>27</sup>中，一开始就談到，社会（就是英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階級，即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雇佣工人彼此处在你死我活的和不可調和的对抗之中，因为地租的提高和降低同工业利潤的提高和降低成反比，而工資的提高和降低又同利潤成反比。按英国法学家的說法，三种敌对力量的均势构成英国宪法这个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基石，按李嘉图先生（大概他对这点比“泰晤士报”要懂得稍微多一些）的說法就是，英国社会的整个制度充滿着作为生产的主要动力的三个階級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

“泰晤士报”一面輕蔑地嘲笑法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面又情不自禁向法国的皇帝的社会主义<sup>①</sup> 投射出貪婪的目光，并且欣

① 見本卷第27頁。——編者注

然把它提供給約翰牛作为仿效的榜样，因为該报剛剛收到了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先驅 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寄来的密密麻麻三栏的通告，即“董事会在 1856 年 4 月 23 日向貝列拉先生主持的定期股东大会提出的报告书”。这个使“泰晤士报”的股东馋涎欲滴和使它的編輯眼花缭乱的报告书如下：

### 負 債

1855 年 12 月 31 日

	法 郎	生 丁
公司資本.....	60 000 000	00
活期存款余額从 1854 年 12 月 31 日的		
64 924 379 法郎增至.....	103 179 308	64
应付債权人期票金額和其他賬目.....	864 414	81
后备資本.....	1 696 083	59
1855 年收入的利潤（撥作后备資本的 除外）.....	26 827 901	32
总 計.....	192 567 708	36

### 資 产

	法 郎	生 丁
現有：1. 无期公債.....	40 069 264	40
2. 債券.....	32 844 600	20
3. 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	59 431 593	66
总 計.....	132 345 458	26
該数应当減去 12 月 31 日以前不能提取 的数目.....	31 166 718	62
资产余額.....	101 178 739	64

	法 郎	生 丁
定期国庫債券、延期国庫債券、以股票和 債券等作抵押的貸款·····	84 325 390	09
房屋和家具的价值·····	1 082 219	37
現金庫存和 12 月 31 日应收入的股息·····	5 981 359	26
<hr/>		
資产总額·····	192 567 708	36
1854 年 12 月 31 日无期公債、股票和債 券的总額·····	57 460 092	94
1855 年上列項目认购和购买的数額 ·····	265 820 907	03
<hr/>		
总 計·····	323 280 999	97
已实现的 217 002 431 法郎 34 生丁 加上现有的有价证券 132 345 458 法郎 26 生丁 ·····	349 347 889	60
<hr/>		
由此得到的利潤·····	26 066 889	63

以 6 000 万的資本取得 2 600 万的利潤，就是說利潤为  $43\frac{1}{3}\%$ ，——这的确是一个誘人的数字。还有什么事情是这个神奇的 Mobilier 用自己的大約 1 200 万美元“巨額”資本所沒有做过的呢！手里有 6 000 万法郎，起先它认购了 25 000 万法国公債，后来又认购了 37 500 万；它取得了法国主要铁路的股份；它根据同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簽訂的合同发行了債券；它是瑞士西部铁路和中部铁路的股东；它参与了建造从薩拉哥沙到地中海的埃布罗河流域的运河大工程。它插手于合并巴黎公共馬車企业的工作和建立海事总公司的工作；在它的干預下巴黎所有老的瓦斯公司合并成了一个企业；据它自己說，它給人民送了一份值 50 万法郎的

礼物，因为它以低于市場的价格售給了人民一批粮食；它通过自己的債券来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問題，建立新的铁路和支持老的铁路，为城市装設照明，刺激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投机，最后，把自己的势力扩充到国外，把这类机关的能結丰硕果实的种子撒遍整个欧洲大陆。

可見，Crédit Mobilier 是現代最不寻常的經濟現象之一，应当最认真地加以研究。沒有这种研究就既不可能判明法兰西帝国的前途，也不可能理解在整个欧洲出現的普遍的社会震蕩的症状。首先，我們要研究董事会称之为自己的理論原則的东西，然后再来檢驗它們在實踐中是如何實現的。報告书中說，到目前为止，这些原則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但是将来它們会得到无比寬广的发展。

这个公司的原則在它的章程中和向股东提出的許多報告书中，主要是在章程中，都已闡明。根据章程的引言，

“鉴于創辦一个旨在鼓励发展公共事业和把一切企业的各种有价证券合并成一个共同的基金，从而使这些有价证券的兌換也得以實現的这样的公司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Crédit Mobilier 的創辦人决定实现一个非常有益的計劃，因此联合起来創立一个叫做 Crédit Mobilier 总公司的匿名公司。”

我們的讀者应当注意到，法国人把“匿名公司”一詞理解为股东責任有限股份公司，并且这种公司的成立要看政府是否酌情賞賜特許权。

可見，Crédit Mobilier 的第一宗旨是“鼓励发展公共事业”，这就是說，公共事业的发展完全由 Crédit Mobilier 来裁夺，从而也就是由波拿巴个人来裁夺，因为这个公司存在与否要以他的意

志为轉移。董事会沒有忘記指出，它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扩大它和它的强大的創造者对法国整个工业的保护。属于各股份公司的各种工业企业是由各种有价证券——股票、債票、本票、債券等代表着的。当然，这些各种各样的证券都根据投在它們身上的資本，根据它們带来的利潤，根据它們的不同的供求关系以及其他的經濟条件，在金融市場上有不同的价格。

Crédit Mobilier 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是以 Crédit Mobilier 自己发行的单一的股票来代替各种股份公司发行的所有各种有价证券。但是它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办法就是 Crédit Mobilier 用发行自己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而得来的資金去收购各种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但是，收购一切本票、股票、債券等等，——一句話，即某个企业的全部有价证券，这就等于购买了企业本身。因此，Crédit Mobilier 公开承认，它打算使自己变成法国各种工业的所有者，使小拿破侖<sup>29</sup>变成最高董事。这就是我們所說的皇帝的社会主义。

为了實現这个計劃，当然必須有金融业务；伊薩克·貝列拉先生在拟定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計劃的时候，自然感到基础不牢靠而不得不向公司提出一定的限制，他把这些限制看成純粹是偶然的，打算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加以取消。公司資本定为 6 000 万法郎，分为 12 万股，每股 500 法郎。公司所有的业务，正像章程中規定的，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为支持工业所必需的业务；第二类是发行公司的有价证券来代替或者轉換各种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第三类是办理国家证券、商业期票等的一般銀行业务。

第一类业务目的是建立公司对工业的保护，这在章程第五条

中已經載明, 条文如下:

“认购或购买作为匿名公司的各种已經在發揮职能或将要建立的工业企业或信用机关, 特别是铁路、运河、矿場和其他公共事业企业的国家证券、股票或債券。負責发行和派銷各种公債, 以及向一切同公共事业有关的企业撥款。”

我們看到, 这一条已經超出了章程引言中所闡明的要求, 因为这一条不仅想把 *Crédit Mobilier* 变成这类大的工业企业的所有者, 而且还想把它变成国庫的僕役和商业信用的統治者。

第二类业务是以 *Crédit Mobilier* 发行的有价证券去代替其他一切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 其內容如下:

“发行公司自己的債券, 发行量应同认购公債和购买工业有价证券的数目相等。”

第七条和第八条規定了公司有全权发行的債券的限額和性质。这些債券或本票

“可以达到超过資本 9 倍的数額。它們总是应当完全用公司現有的国家证券、股票和債券来偿付。这种证券只有在 45 天以前預先通知才能給以支付。接受的活期存款和发行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債券的总数不得超过已實現的資本的一倍”。

最后, 第三类业务是有关商业证券的流通的。“公司接受活期存款”。它有权“出賣各种屬於它的国家证券、信貸凭证、股票和債券或者用它們偿付公債以及換取其他证券”。它发放以“国家证券、股票和債券”为抵押的貸款“和開設存上述各种证券的往来戶”。它向匿名公司提供私人銀行通常所提供的各种服务, 如接受一切支付款記入这些公司的戶头, 代这些公司发股息、利息等等。它接受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作为存款, 至于同商业证券、期票、棧

单等有关的业务，曾“特此声明，公司不得为赚取贴水而进行秘密买卖”。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6 月 6 日  
左右

載于 1856 年 6 月 7 日“人民报”  
第 214 号，署名：卡·馬·

并載于 1856 年 6 月 2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735 号，沒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 卡·馬克思

# 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第二篇論文)

應該提醒一下，波拿巴发动 coup d'état [政变] 时曾經凭借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口实：一方面，他宣布他的使命是使**資產階級**和“**經濟秩序**”避免似乎在 1852 年 5 月一定会出現的紅色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是使劳动人民摆脱集中表现为国民議会的**資產階級**专制制度。此外，他必須償清他本人所欠的債務以及十二月十日会<sup>30</sup>的那批威風凜凜的恶棍所欠的債務，并且使他自己和这批恶棍靠牺牲**資產階級**和工人两方面的利益大发橫財。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个人的使命充滿着互相矛盾的困难，因为他不得不同时既扮演强盜，又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长似的恩人。他要是不从一个階級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給另一个階級一些什么。他要是不掠夺这两个階級，就不能滿足他本身及其党羽的需要。在弗倫特运动<sup>31</sup>时期，吉茲公爵被称为法国的最該受感激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財產变成了他的党徒所持有的債券。波拿巴也想成为法国的最該受感激的人，办法就是把法国的全部財產和整个工业变成路易·波拿巴自己所持有的私人債券。窃取法国，然后去购买法国，——这就是这个人需要解决的大問題，而在这种先从法国攫取一些东西，然后再把它归还給法国的过程中，对他說来，相当重要的还是他本人和十二月十日会从中能够取得的利息。怎样才能使这些互

相矛盾的要求协调一致呢？怎样才能解决这个微妙的经济问题呢？怎样解开这个难解之结呢？波拿巴过去所积累的各方面的经验指出了—一个帮助他摆脱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妙法——信用。正巧在法国出现了圣西门学派，这个学派在产生和衰落的时期都沉湎于一种幻想，以为随着普遍的幸福生活的到来，一切阶级矛盾就必定会消失，而这种幸福生活是可以靠某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获得的。在 coup d'état 时期，这种类型的圣西门主义还没有彻底死亡。曾经有个米歇尔·舍伐利埃，“辩论日报”<sup>32</sup> 的一位经济学家；有个蒲鲁东，他企图用奇形怪状的假面具掩盖圣西门学说中最坏的部分；还有实际上同证券投机和路特希尔德都有关系的两个葡萄牙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时期是安凡丹天父的信徒，他们凭着自己的实际经验敢于透过社会主义认出证券投机，透过圣西门认出罗。这两个人——艾米尔·贝列拉和伊萨克·贝列拉都是 Crédit Mobilier 的创办人和波拿巴社会主义的倡始人。

有句俗话说：«Habent sua fata libelli» [“书有自己的命运”]。和书一样，学说也有自己的命运。圣西门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庇护天使，欺诈行为的先知，普遍营私舞弊的救世主！也许除了在 juste-milieu [中庸] 者——基佐身上体现出圣茹斯特，在路易·波拿巴身上体现出拿破仑以外，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更为辛辣的讽刺了。

人的思想跟不上事变的进程。当我们研究了公司的原则和经济情况，指出 Crédit Mobilier 结构本身预示破产不可避免的时候，历史已经在实现我们的预言了。5 月底，Crédit Mobilier 的董事之一、拥有 1 000 万法郎产业的普拉斯先生破产了。只不过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天以前，他还作为 dieux de la finance [财神] 之一，“被莫尔尼先生介绍给皇帝”。Les dieux s'en vont! [财神走了!]

几乎就在当天，“通报”<sup>33</sup>公布了关于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两合公司]的新法令，这项法令似乎是为了抑制投机狂而让这些公司听任 Crédit Mobilier 支配，使它们根据政府或 Crédit Mobilier 的意志来建立。而英国报刊甚至不知道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和 sociétés anonymes [匿名公司] 之間存在着区别，不知道前者就是后者的牺牲品，竟对这种波拿巴式賢明的偉大的“理智行为”备加贊揚，并設想法国的投机家不久也会具有英国的薩德勒、斯佩德尔和帕麦尔那样的稳健。与此同时，著名的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 刚刚頒布的土壤改良法，就直接違反拿破侖过去的一切法律和法典，准許剝夺以不动产作抵押的債務人以利于波拿巴政府，后者就是想通过这种狡猾手段来霸占土地，正像它通过 Crédit Mobilier 来霸占工业，通过法兰西銀行来霸占法国商业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财产不受社会主义的威胁！

同时，我們认为，繼續分析一下 Crédit Mobilier 这个机关并不是多余的。我們想，这个机关必定还会显示出巨大的成績，上述一切同这些成績相比，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开端。

我們知道，Crédit Mobilier 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以資本供給屬於匿名公司的工业企业。讓我們引用伊薩克·貝列拉先生報告書中的一段話：

“Crédit Mobilier 对于代表工业資本的有价证券所起的作用，类似貼現銀行对于代表商业資本的有价证券所發揮的职能。这个公司的第一个取責就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帮助那些靠自力而有很大困难的大企业建立起来。它的使命之所以比較容易完成，是因为它拥有私人所得不到的各种通报和調查材料，来正确估計向它求助的企业的实际情况或发展前途。在繁荣时期，我們的公司将导致資本找到能够盈利的場所；在困难时期，它的任务是用大量的資金来維持工人就业和緩和由于資本迅速縮減而引起的危机。我們

的公司将努力把自己的資本投入一切企业，只是投資額和限期要使公司能够不經受風險而收回自己的資本，这种努力使公司有可能用增加 partial commandités (股票上的投資)① 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业务，在短期內使大量企业获得成效，以及减少自己合作的風險。”

了解到伊薩克怎样发展波拿巴的思想以后，我們认为重要的是再看一看波拿巴怎样評論伊薩克的思想。这一評論可以在內务大臣② 1854年6月21日向波拿巴呈递的关于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和管理原則的报告中找到：

“在世界上現有的一切信用机关中，法兰西銀行被公正地认为是那种可譽称为最穩固的組織。〈它是如此穩固，如果没有賴德律-洛兰之流的支持，甚至連 1848 年小小的二月風暴在一天內就能把它刮倒。临时政府不仅規定了法兰西銀行可以暫不履行以硬币支付其銀行券的义务，从而使挤滿通往該行各条街道的銀行券和本票持有者向后轉，而且还授权該行发行票面价值为 50 法郎的銀行券，虽然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来不准它发行票面价值在 500 法郎以下的銀行券。这样一来，政府不仅以自己的信用弥补了这家銀行的无支付能力的現象，而且还把国家森林抵押給它以取得国家接受貸款的特权。〉法兰西銀行既是我国商业的支柱，同时又是它的向导，它的物质影响和道义影响为我国市場創造了极为寶貴的穩定性。〈这种“穩定性”就是，每当美国和英国商业上只不过出現小小的破产的时候，法国人都会遇到周期性的工业危机。〉由于在一切业务中以謹慎和明智作方針，这个卓越的机关也就起着調节者的作用。但是商业天才首先需要鼓励，才能創造出他所孕育的一切奇迹。正因为在于法国投机活动受到极严格的限制，除了法兰西銀行以外，再根据另一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建立一个在工商业范圍內应当体现出主动精神的机关，不但没有任何不便之处，相反地，倒有很大的优越性。

这种机关幸好已經有了榜样。做出这一榜样的是那个在一切商业业务上以一絲不苟、明智和穩健著称的国家。尼德兰总公司用自己的資本、自己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里的話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② 培尔西尼。——編者注

的信用和自己的道义威望为一切健康的思想和一切有益的事业服务，它在荷兰扩大了运河网，进行了土壤改良工作，采取了成千项其他改良措施，以使其财产价值增加几百倍。为什么法国就不能同样借助这个已被了不起的经验证实确为优越的机关来得到好处呢？这就是根据 1852 年 11 月 18 日的法令建立 *Crédit Mobilier* 的想法。

根据章程规定，除了其他业务以外，该公司还可以买卖国家机关和公法机关的有价证券或工业股票，以它们作抵押品来贷款和借款，包销国家公债，简单地說，就是发行本公司的长期债券，数量同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有价证券相等。

可见，公司拥有在有利条件下用来吸收和随时集中大量财富的手段。这一机关的活动的成效如何，就要看这些资本的使用是否得当。的确，公司可以酌情对工业进行投资（*commanditer*），取得不同企业的股份，参加长期业务，也就是说，去做法兰西银行和贴现银行的章程禁止各该银行做的一切事情。总之，公司的行动是自由的，并且可以根据商业信用的需要改变它的活动方向。如果它善于从经常出现的企业中辨明哪些企业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它能及时利用它所支配的巨额资金，来帮助完成那些本身极能生利但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否则就会半途而废的工作，如果它的合作确实表明思想是有益的或者计划是得当的，那末，*Crédit Mobilier* 就应当受到而且一定会受到普遍的称赞，游资将会大量流向那些靠公司保护而能得到最可靠的使用的渠道。可见，这个公司之所以成为实现各种社会有益思想的参加者，是因为实例和威信比任何物质帮助更会使公司的任何支持具有吸引力。它将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推动工业的发展，并且处处刺激发明精神。”

我们一有机会就竭力设法指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怎样勉强地遮掩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计划：使法国的整个工业卷入巴黎交易所的漩涡，并把它变成 *Crédit Mobilier* 的先生们及其保护人波拿巴手中的网球。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6 月 12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6 年 6 月 2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737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第三篇論文)

日益逼近的波拿巴財政破產的跡象繼續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5月31日，蒙塔郎貝爾伯爵在反對提高一切印刷品、書籍等的郵費的法案時，發表了下列聽來驚慌不安的演說：

“任何政治生活都受到壓抑，但代替它的是什麼呢？投機之風。偉大的法蘭西民族不能讓自己沉眠不醒，毫無作為。代替政治生活的是投機的狂熱、追求利潤的欲望，對有價證券買賣的迷戀。每個地方，甚至在我們的小城市，甚至在我們的鄉村，人們都害了牟取暴利狂（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暴利是無需忙碌奔波、不要花費力氣並且往往是用卑鄙的手段取得的。除了你們剛才拿到的反對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兩合公司] 的法案以外，我用不着再找什麼其他證據了。這個法案剛剛發來，我還沒有時間把它讀完，但是我願意支持它，儘管在我看來里面有若干條例太嚴酷了。如果用語的確如此必要，並且下藥又得如此之重，那末，應當認為病情是不輕的。這種疾病的真正原因就是，法國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沉寂了……但是，我這裡所指的疾病，並不是由同一個原因產生的唯一惡果。當上層階級和中層階級這些老的政治階級醉心於投機活動時，另一種活動便在下層階級中間開展起來，他們的運動產生了几乎是法國所經歷的一切革命。有價證券買賣把几乎整個法國變成了一個大賭博場。當一部分受到社會主義者影響的人看到這種可怕的迷戀於有價證券買賣的景象時，他們也空前地被牟取暴利的欲望腐蝕了。因此，秘密公司顯然增加了，那種自稱為社會主義其實可以說是敗壞社會主義的瘋狂的激情更加強烈和加深了。不久以前在巴黎、翁熱和其他地方

的审判案中,这种激情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就是波拿巴商行的最早的股东之一蒙塔郎貝尔为了维护秩序、宗教、财产和家庭而說的話!

我們从伊薩克·貝列拉那里听說, *Crédit Mobilier* 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則: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風險,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如果揭开圣西門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則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們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賺取貼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說,工业发展的基础应当是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更确切些說,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Crédit Mobilier* 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風險”呢?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因为 *Crédit Mobilier* 是得到政府支持和拥有比較大量的資本和貸款的享受优待的公司,毫無疑問,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在市場上就能賺到貼水。*Crédit Mobilier* 从罗那里学会了在自己的股东中分配新股票的办法,即其票面价格同这些股东在母亲公司中所拥有的股票数量成一定比例。用这种办法保证这些股东得到的利潤,首先影响到 *Crédit Mobilier* 本身的股票价值,而这些股票的行市高,就保证新发行的股票价值也高。*Crédit Mobilier* 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监督用于工业企业投資的相当一部分借貸資本。

总之,除了获取利潤是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圍着轉的真正軸心以外,它的目的显然是用同商业銀行的业务完全相反的方法对資本发生作用。商业銀行用貼現、貸款和发行銀行券使固定起来的資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而 *Crédit Mobilier* 实际上是把游

資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資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設上的資本却是固定的。如果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設備方面投放的那一部分資本和用于支付工資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資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馬上关厂。对于整个国家來說，也是同样的道理。几乎現代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資和固定起来的資本之間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这样說来，像 *Crédit Mobilier* 这样的机关，既然它的直接目的是尽量把国内的借貸資本固定起来，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塢、輪船、冶金工厂和其他工业企业，而不考虑国家的生产能力，那末它的活动会有怎样的結果呢？

*Crédit Mobilier* 的章程規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公司經營的工业企业。結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傾向，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并且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現代各国經濟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資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規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記，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資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資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結果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現了，他們的权力同他們的責任則成反比，因为他們只对他們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負責，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資本。他們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成員，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更。工业巨头依靠該公司的影响和財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員和職員組成的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他們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增的普



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們的資本数量的增加，他們的依賴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資本的人数的减少，他們也越来越具有危險性。傅立叶不朽的功績在于，他預言了这种現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sup>34</sup>。毫無疑問，伊薩克·貝列拉先生也罢，艾米尔·貝列拉先生也罢，莫尔尼先生也罢，波拿巴先生也罢，都不能发明工业封建主义。在他們以前的时代，也有向工业股份公司进行貸款的銀行。至于他們所发明的則是力图把私人高利貸者早先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动壟断起来的股份銀行，其指导原則应当是建立大量的工业企业，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資，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潤。他們所想出来的新思想，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納貢者。

根据章程，Crédit Mobilier 的資本定为 6 000 万法郎。同一章程准許公司接受活期存款的寄存代付金，总数可以大于資本的一倍即 12 000 万法郎。因此，受公司支配的款項共有 18 000 万法郎。同实现保护法国整个工业的大胆計劃相比，这当然是很不大的一个数字。但是这笔款項的三分之二——正因为它是一經提取就必须归还的——未必可以用来购买工业股票或那些还不能保证能否立即推銷出去的債券。由于这个原因，章程为 Crédit Mobilier 开辟了另一个門路。章程准許公司发行总数大于原始資本 9 倍即 6 亿法郎的債券，換句話說，以貸款給全世界为己任的机关，有权作为拥有大于它的資本 9 倍的債務人在市場上出現。

貝列拉先生說：“我們的債券共有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它应当同我們各种暫时的投資額相适应。”

我們在这里对这种債券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根据章程第八条，发行这种債券的目的，只是要补足应当从活期存款得来的并且过

去也完全是这样得来的 12 000 万法郎所不足的数额。至于另一种债券，

“它们的支付期限很长，应当用贖回的办法来清偿，并且应当同我们在国家证券方面或工业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方面的投资额相适应。根据作为我们团体的基础的资金制度，这些有价证券不仅要有在政府监督下得来的相应数额的基金（由于采用互惠原则，这个数额将充分给予补偿和分担风险等优待）作保证，此外，还要有为此目的我们已经增加了相当数目的资本作担保”。

可见，Crédit Mobilier 的这种债券纯粹是仿效铁路本票，即在一定期限内和在一定条件下应当贖回并能带来固定利息的债券。但是也有区别。铁路本票常常以铁路本身作抵押来担保，而Crédit Mobilier 的债券以什么来担保呢？Crédit Mobilier 是用自己的债券买来无期公债、股票、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业公司的证券作担保的。这样说来，发行债券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得到Crédit Mobilier 的债券应付的利息同公司放款取得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为了使这项业务十分有利可图，Crédit Mobilier 应当把发行债券所得的资本投放在能够取得最多收入的地方，即投放在价格波动和变化很大的股票上。因此，公司的债券主要由该公司所创建的那些工业企业的股票来担保。

因此，铁路本票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资本担保，而Crédit Mobilier 的债券只有票面额同它相等的资本担保，但是每逢证券交易所的行市下降时，这种资本也必定缩小。由此看来，这些债券的持有者要分担股东的全部风险，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利润。

上年度的报告书说：“但是，债券的持有者不仅有它（即Crédit Mobilier）以放款进行的投资作担保，而且有它的原始资本作担保。”

对 12 000 万法郎存款负担担保之责的 6 000 万法郎的原始资

本,除了或許必須向 *Crédit Mobilier* 有权創建的无限量的企业提供担保以外,它还应当作为 6 亿法郎的債券的担保。如果公司能够把所有的工业公司的股票都换成它自己的債券,那末,它的确会成为法国整个工业的最高指揮者和所有者,而許多过去的所有者則像拿年金似的得到同債券利息相等的固定收入。但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由于上述經濟条件而随之发生的破产,会使厚顏无耻的冒險家受到阻碍。其实, *Crédit Mobilier* 的真正創辦入并不是看不见这种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相反地,他們已經考虑到这一点了。当破产发生的时候,当它涉及許許多多法国人的利益的时候,波拿巴政府就像英国政府在 1797 年干涉英格兰銀行的事务<sup>35</sup> 一样,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去干涉 *Crédit Mobilier* 的事务。法国的摄政王<sup>①</sup>, 路易-菲力浦的可尊敬的先輩,曾企图把国家債券換成罗的銀行的債券以摆脱国家的債務, 路易·波拿巴这位皇帝社会主义者則企图把 *Crédit Mobilier* 的債券換成国家債券以掌握法国工业。是不是他比 *Crédit Mobilier* 更有支付能力呢? 問題就在这里。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6 月底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6 年 7 月 1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751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① 奥尔良的菲力浦。——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西班牙的革命

“亞細亞號”輪船昨天帶來的消息，雖然比我們先前得到的報道近了三天的時間，但是其中並沒有什麼東西表明西班牙的內戰會很快結束。奧當奈爾的 coup d'état [政變] 雖然在馬德里獲得了勝利<sup>36</sup>，可是還不能說已經最後成功。法國的“通報”最初把巴塞羅納的起義描寫成一場簡單的騷動，現在不得不承認“那裡的衝突非常激烈，但是女王的軍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根據這家官方報紙的說法，巴塞羅納的戰鬥從7月18日下午5時到7月21日下午5時，持續了整整三天，據說“暴動者們”在這以後被趕出了他們所在的街區，逃往鄉村，並受到騎兵的追擊。然而人們斷言，起義者仍然掌握着卡塔盧尼亞的若干城市，包括赫羅納、拉忠克腊和一些較小的地方。同時據稱，木爾西亞、瓦倫西亞和塞維爾已經發動了反對 coup d'état 的 pronunciamientos [兵變]；潘普洛納警備部隊中被該城行政長官派去進攻索里亞的一個營，已經在途中宣布反對政府，並前往參加薩拉哥沙的起義；最後，在薩拉哥沙，在這個从一开始就為人所公認的抵抗中心，法爾孔將軍檢閱了16 000人的基幹部隊，他們受到15 000人的國民軍以及郊區的農民的支援。

無論如何，法國政府認為西班牙的“暴動”還沒有被鎮壓下去，

波拿巴决不以派出几营军队陈兵边境为满足，他已经命令一个旅向比达索阿河前进，这个旅正由来自蒙彼利埃和土鲁斯的增援部队补充成一个师。此外，根据7月23日直接从普伦贝尔发出的命令，大概还直接从里昂军团调派了另一个师，这个师现在正向比利牛斯山前进；到现在，在比利牛斯山已经集结了25 000人的整整一个 corps d'observation [观察兵团]。如果反对奥当奈尔政府的力量能保持住自己的阵地，如果他们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抗，以致使波拿巴陷入对比利牛斯半岛的武装侵略之中，那末马德里 coup d'état 就可能成为巴黎 coup d'état<sup>37</sup> 的崩溃的信号。

就一般的情节和 dramatis personae [剧中人物] 而论，这次1856年的西班牙阴谋，看来不过是1843年的类似的企图<sup>38</sup> 的重演，自然有一些微小的改变。那时，和现在一样，伊萨伯拉在马德里，而克里斯蒂娜在巴黎；路易-菲力浦，和今天的路易-波拿巴一样，从土伊勒里宫对运动进行指挥；一边是埃斯帕特罗及其 ayacuchos<sup>39</sup>，另一边是奥当奈尔、塞拉诺、孔查以及那时是在前台而现在则在幕后的纳尔瓦艾斯。1843年，路易-菲力浦由于同蒙尼奥斯夫人解决了西班牙王室的婚姻问题<sup>40</sup>，便由陆路送出了两百万金币，由海路送出了纳尔瓦艾斯和他的伙伴们。而波拿巴——他或许已经解决了他的堂弟拿破仑亲王和一位蒙尼奥斯小姐的婚事，或者他无论如何都必须继续以模仿其伯父<sup>①</sup> 作为自己的使命，——则是这次西班牙 coup d'état 的同谋犯，可以表明这一点的，不仅是“通报”在上两个月当中对于加斯梯里亚和纳瓦腊的共产党人密谋发出的狂暴攻击；不仅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杜尔哥先生（此人在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波拿巴自己的 coup d'état 时期曾担任他的外交部长)在这次 coup d'état 前后和 coup d'état 期间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波拿巴的姻兄弟阿尔巴公爵在奥当奈尔获得胜利后立刻出来担任馬德里的新 ayuntamiento [地方自治机关] 的主席;不仅是老亲法派分子罗斯·德·奥兰諾第一个在奥当奈尔內閣中获得了一个位置;而且不仅是波拿巴在这个事变的消息刚刚傳到巴黎时就派遣納尔瓦艾斯前往貝云。这种同謀关系,其实在事先早就可以看出,因为在馬德里的危机实际发生之前两个星期,就有大量軍火从波尔多运往貝云。而尤其能从中看出这种关系的,是奥当奈尔在盜襲馬德里人民时的行动計划。在事变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宣布,即使毀掉馬德里也在所不惜,在战斗期間他也正是按照他自己的話去做的。可是要知道,奥当奈尔虽然是一个胆大的家伙,但沒有一条安全的退路,他是从来不敢貿然前进进一步的。正像他的臭名远揚的伯父、那个在叛变方面出人头地的人物一样,他在渡过卢比康河的时候是从来不把桥梁燒掉的。在这两个奥当奈尔身上,好战的特性很奇特地受到謹慎小心和躲躲閃閃的特性的抑制。显然,任何一个將軍如果威胁着要使首都化为灰烬,那末一旦失敗就会丢掉脑袋。既然如此,奥当奈尔怎么敢冒这样的風險呢?太后克里斯亭娜的御用报纸“辯論日报”泄露了这个秘密:

“奥当奈尔估計到有一場大战,而且至少要經過激烈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还預先考虑到失敗的可能性。如果这种不幸竟然发生,这位元帥就会放棄馬德里,率領他的殘部,护送女王,轉赴北方諸省,以图到达法国边境。”

从这一切来看,难道不像是他和波拿巴一起制訂了自己的計划嗎? 1843年,路易-菲力浦和納尔瓦艾斯也正是这样制訂过同样的計划,而那个計划又是从1823年路易十八和斐迪南七世的密

約<sup>41</sup>抄襲來的。

承認在 1843 年和 1856 年的兩次西班牙陰謀之間存在這種表面上的相同之處以後，我們還應該指出，這兩次行動具有很多不同的特點，表明西班牙人民在如此短促的時期中獲得了巨大的進步。這些特點在於：最近一次馬德里的鬥爭的政治性質；它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最後，與 1843 年埃斯帕特羅和納爾瓦艾斯各自所處的地位相比較，1856 年埃斯帕特羅和奧當奈爾各自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在 1843 年，所有的黨派都對埃斯帕特羅感到厭惡。為了要他下台，moderados 和 progresistas<sup>42</sup> 之間組成了強有力的聯盟。革命的洪達<sup>①</sup>如雨後春筍一般在所有的城市建立起來，為納爾瓦艾斯及其追隨者鋪平了道路。但在 1856 年，我們不僅看到一邊是宮廷和軍隊，一邊是人民，而且在人民的隊伍裡面，我們還看到那種在其他西歐國家中所有的分化。7 月 13 日，埃斯帕特羅的內閣被迫提出辭職；13 日至 14 日的夜間，奧當奈爾的內閣組成了；14 日晨，風傳受命組閣的奧當奈爾邀請了 1854 年 7 月血腥的日子裡的那位不祥的大臣里奧斯-伊-羅薩斯<sup>43</sup> 入閣。上午 11 時，“日報”<sup>44</sup> 證實了這個傳聞。於是議會便召開會議，出席的議員有 93 人。根據議會的章程，有 20 個議員的提議即可召開會議，50 個議員就構成開會的法定人數。此外，議會還沒有正式閉會。議長印范泰將軍只得順從普遍的願望，召開一次正式的會議。會上提出了一項決議案，大意是說新內閣沒有得到議會的信任，並且應當將此項決議通知女王陛下。與此同時，議會召集國民軍準備行動。議會的委員們攜帶了不信任新閣的決議書，由一隊國民軍護送，往見女王。

① 洪達在西班牙語中有團體、協會、委員會等意思，這裡用來指委員會。——譯者注

当他們试图入宮的时候，正規軍的部队向他們和他們的护送者射击，把他們赶回去了。这一事件成为起义的信号。議会在当晚7时发出开始构筑街垒的命令，但是議会的會議接着就被奥当奈尔的軍隊驅散了。战斗就在这天夜里开始，国民軍中只有一个营投到了王室的軍隊方面去。应当指出，早在13日的早晨，埃斯帕特罗政府的內务大臣埃斯科苏拉先生即已电告巴塞罗纳和薩拉哥沙，說 coup d'état 即将发生，必須准备予以反抗。馬德里的起义者的首領是馬多斯先生和埃斯科苏拉的兄弟瓦尔德斯將軍。一句話，对 coup d'état 的反抗，毫無疑問是由埃斯帕特罗派以及市民和一般的自由派发动的。当他們和国民軍一起在从东到西橫貫馬德里的一条綫上作战的时候，普切塔領導下的工人占領了馬德里城的南部以及北部的一部分。

15日晨，奥当奈尔采取了主动。即使照“辯論日报”上有所偏袒的話来看，奥当奈尔在当日上午并没有取得显著的优势。突然，在下午1时左右，没有什么显著原因，国民軍的队伍就潰乱了；2时，他們的人数变得更少，6时，他們完全从戰場上消失了，使战斗的負担完全由工人承当。工人一直战斗到16日下午4时。所以，在这三天的屠杀中，实际上有两場截然不同的战斗，一場是在工人支持下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国民軍与軍隊的战斗，一場是軍隊与被国民軍背棄后的工人的战斗。正像海涅所說的：

“这是一个老故事，  
但永远是新聞。”<sup>①</sup>

埃斯帕特罗背棄了議会，議会背棄了国民軍的指揮官，这些指

---

① 海涅“抒情間奏曲”。——編者注



揮官背棄了他們的兵士，這些兵士又背棄了人民。但在 15 日，當埃斯帕特羅出現了一會兒的時候，議會又重新召開了會議。阿森西奧先生和其他議員提醒他記住他反復許下的莊嚴諾言，即一旦國家的自由遭到危險，他就要立即拔出他的盧恰納長劍<sup>45</sup>。埃斯帕特羅指天作證，來表明他的堅貞的愛國心，在他離開的時候，大家滿以為不久就會看到他領導起義。但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前往古列阿將軍家中，像帕拉福克斯一樣藏在一間地下避彈室裡；以後便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國民軍的指揮官們在前一天晚上還用盡一切方法來激勵兵士拿起武器，現在却同樣急切地設法各自回家了。下午 2 時 30 分，在幾個小時內僭取了國民軍指揮權的瓦爾德斯將軍，在大廣場召集了他直接統率的兵士，告訴他們說，那個應該領導他們的人不會來了，因此各人可以隨意離去。於是，國民軍的兵士們跑回家裡，急忙脫去軍服，藏起武器。這就是一個消息靈通的權威人士所提供的情況的要点。另一個人指出，這次向陰謀突然屈服的行動，是由于考慮到國民軍的勝利勢將導致王權的沒落，而使共和民主派取得絕對的優勢。巴黎“新聞報”<sup>46</sup>也告訴我們，埃斯帕特羅元帥看到了民主派在議會中所造成的事態的趨向，不願以王權為犧牲，或者陷入無政府狀態和內戰的危險，因此使盡一切力量來促使奧當奈爾獲得成功。

的確，關於反抗 *coup d'état* 的時間、情況和潰敗的細節，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大家在主要的一點上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埃斯帕特羅背棄了議會，議會背棄了首領們，首領們背棄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又背棄了人民。這對 1848—1849 年歐洲大多數的鬥爭和以後將在西歐發生的鬥爭的性質，提供了一個新的說明。一方面，有現代工商業，它們的當然首領資產階級是反對軍事

专制主义的；另一方面，当他們开始进行反对这个专制主义的斗争的时候，現代劳动組織的产物即工人們自己，便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要求取得他們在胜利果实中应得的一份。資產階級被这样迫使他們違背自己意志結成的联盟的后果所吓住，便又重新縮回到他們所憎恨的专制主义的炮台的保护之下去。这就是欧洲各国的常备軍的秘密，不知道这个秘密，未来的历史家就不能理解它們。这样，就让欧洲的資產階級懂得了：他們要就必须屈从于一个他們所憎恨的政治权力，放棄現代工商业的利益和以現代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要就必须放棄現代的社会生产力組織在其始初阶段只賦予唯一的一个階級的特权。連西班牙也提供了这个教訓，这真是既触目惊心而又出人意外的事。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7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6 年 8 月 8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775 号

## 卡·馬克思

### \*西班牙的革命

薩拉哥沙于8月1日下午1时30分投降，抵抗西班牙反革命的最后中心就此消失。从軍事观点來說，馬德里和巴塞羅納的起义已經失敗，安達魯西亞的起义的牽制力量很微弱，而薩拉哥沙又受到了来自巴斯克地区、納瓦腊、卡塔卢尼亚、瓦倫西亞和加斯梯里亞的具有压倒优势的軍队的联合进攻，所以它已經很少有成功的机会。而領導抵抗队伍的是埃斯帕特罗的老副官法尔孔將軍；“埃斯帕特罗和自由”被用作战斗的口号；薩拉哥沙的人民又已經知道了埃斯帕特罗在馬德里的极端可笑的慘敗<sup>47</sup>，因此即使可能有过任何的成功的机会，也都被这些情况断送了。此外，从下面摘自7月29日“馬德里报”<sup>48</sup>的这一段話可以看到，埃斯帕特罗的总部已經对薩拉哥沙方面的部屬发出直接的命令，要他們停止一切抵抗：

“埃斯帕特罗政府的一位前任大臣，参加了杜耳塞將軍和薩拉哥沙当局之間所进行的談判，同时埃斯帕特罗派的議員璜·馬丁涅斯·阿隆索受命去通知起义的首領們：女王、她的大臣們和將軍們具有极为諒解的精神。”

这次革命运动几乎波及西班牙全境：在加斯梯里亞的馬德里和拉曼徹；在安達魯西亞的格拉納達、塞維爾、馬拉加、加迪斯、哈安等城；在木尔西亞省的木尔西亞和卡塔黑納；在瓦倫西亞省的瓦

倫西亞、阿利康特、阿耳西拉等城；在卡塔卢尼亚的巴塞羅納、雷烏斯、菲蓋斯、赫羅納等城；在阿臘貢的薩拉哥沙、特魯韋爾、韋斯卡、哈卡等城；在阿斯土里亞的奧維耶多；以及在加利西亞的拉科魯尼亞。在埃斯特勒馬杜腊、累翁和旧加斯梯里亞，没有什么行动，因为这些地方的革命派已于两个月前在埃斯帕特罗和奥当奈尔的共同贊助下被鎮压下去；巴斯克地区和納瓦腊也平靜无事。但是后面这些省份是同情革命事业的，虽然这种同情在法国观察兵团面前不能表现出来。如果考虑到下面所說的情形，这一点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即在二十年前，正是这些省份形成了卡洛斯派<sup>49</sup>的堡垒，卡洛斯派当时得到了阿臘貢和卡塔卢尼亚的农民的支持，但是这一回，阿臘貢和卡塔卢尼亚的农民却极其热誠地站在革命一边；而且，如果不是巴塞羅納和薩拉哥沙的首領們的怯懦无能使他們的精力无处發揮，他們会成为抵抗运动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甚至新教的正統拥护者、二十来年前曾为宗教裁判所的唐·吉訶德式的騎士唐·卡洛斯效劳的倫敦“先驅晨报”<sup>50</sup>，也公允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被它弄得很窘。这是西班牙这次革命所显示的許多进步的征兆之一。这种进步誠然很緩慢，但是在这个国家里，«a la mañana»〔“明天再說”〕是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禪，每个人都会告訴你說，“我們的祖先用了八百年才把摩尔人赶走”，因此只有不熟悉这个国家的奇特的風俗习惯的人，才会对这种进步的緩慢感到惊異。

尽管各地普遍发动了 pronunciamientos〔兵变〕，西班牙的革命仍只限于馬德里和巴塞羅納。在南方，革命为 cholera morbus〔霍乱〕所破坏，在北方，又为埃斯帕特罗瘟疫所破坏。从軍事观点来看，馬德里和巴塞羅納的起义并没有提供什么令人感兴趣的和任何新奇的特点。在軍隊这一边，事事都是預先准备好了的；在另

一边，事事都是仓卒进行的；攻势从来没有易手。一方面，是装备优良的军队在将军们的指挥下顺利行动；另一方面，则是首领们被装备不全的人民推着勉强前进。在马德里，革命者从开始就犯了错误，他们把自己封锁在市内地区，配置在连接城市东西两端的一线上；而这两端是掌握在奥当奈尔和孔查手里的，他们经由城外的大道互相联系并与土耳其的骑兵取得联络。这样，起义者就被隔绝开来，并且暴露在奥当奈尔及其同谋者所预定的集中攻击之下。奥当奈尔和孔查只须使他们的部队会合，革命力量就被驱散到城市的南区和北区，而不可能再行集结。这次马德里起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街垒筑得很少并且只筑在突出的街角上，而房屋则被用来作为抵抗的中心；再者，这是巷战中前所未闻的，起义者用刺刀冲锋去对付进攻的纵队。但是，如果说起义者从巴黎和德勒斯顿的起义<sup>51</sup>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那末，军队从中学到的也不比他们少。房屋的墙垣一一被打垮了，起义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袭击，通往街道的出口又受到炮火的射击。马德里之战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孔查和奥当奈尔会师以后，普切塔被逼退到城市的南区（托勒多区），便把西班牙山地的游击战法搬到马德里的街道上来。起义者被打散了以后，转身退到教堂的拱门下面，狭窄的胡同里，房屋的楼梯上，一直在那里坚守到战死为止。

在巴塞罗纳，战斗还要更为激烈，而那里却全然没有领导。从军事上讲，这次起义和巴塞罗纳以前的一切起义一样，由于蒙茹伊克要塞保持在军队手里而遭受失败。斗争的激烈可由这样一事实看出，即在起义者已被赶出巴塞罗纳以后所顽强争夺的郊区格腊西阿，有150名兵士被烧死在自己的兵营里。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德里，正像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所说明的，无产阶级被资产阶

級出賣和背棄了<sup>①</sup>，但巴塞羅納的織布工人們却在一開始就宣告他們決不與埃斯帕特羅派所發動的那一個運動發生任何關係，而堅持要宣告成立共和國。這一點被拒絕以後，他們中間除了一些聞到了火藥氣味便忍不住要打仗的人以外，都對這場戰鬥保持消極的旁觀者的態度。這場戰鬥於是就失敗了，因為巴塞羅納的一切起義，都是取決於它的 2 萬名織布工人的。

1856 年的西班牙革命和以前歷次革命不同之處，在於它完全沒有王朝性質。大家知道，1804 年至 1815 年的運動是具有民族性質和王朝性質的<sup>52</sup>。1812 年的議會雖然宣布了一個差不多是共和主義性質的憲法，但它是以太迪南七世的名義進行的。1820 年至 1823 年帶有胆怯的共和主義色彩的運動<sup>53</sup>是完全沒有成熟的，它要求群眾支持，而群眾卻反對它，當時的群眾是完全依附於教會和王室的。西班牙的王權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要使新舊社會之間的鬥爭帶有嚴肅的性質，也需要有太迪南七世的遺言以及使相敵對的原則體現為卡洛斯和克里斯蒂娜這兩家王族支系。即使為一個新的原則而戰，西班牙人也需要有一面古舊的旗幟。從 1831 年到 1843 年，鬥爭便是在這種旗幟下進行的。然後革命結束了，新的王朝遂得以在 1843 年至 1854 年間作一度嘗試。因此，1854 年 7 月的革命，不能不意味着對新的王朝的進攻；但是天真的伊薩伯拉卻因為人民的憎恨集中於她的母親身上而得到了掩護，人民不僅為他們自己的解放而歡欣鼓舞，也為伊薩伯拉從她的母親及其宮廷奸黨下面解放出來而歡欣鼓舞。

1856 年，這件外衣脫落了，伊薩伯拉本人由於實行了那個激起革命的 coup d'état [政變] 而與人民處於針鋒相對的地位。她證

<sup>①</sup> 見本卷第 45—46 頁。——編者注

明自己是斐迪南七世的冷酷殘忍而又怯懦偽善的、对父亲毫无愧色的女儿（斐迪南七世这个人欺妄成性，尽管他极度迷信教义，即使借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帮助，也决不能使他相信像耶穌基督及其門徒这样高尚的人曾說过真話）。天真的伊薩伯拉感到欣然滿意的7月14日至16日的屠杀，甚至使1808年繆拉特对馬德里人的屠杀<sup>54</sup>也要相形見絀，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騷动。那些日子給西班牙的王权敲响了喪钟。只有欧洲的低能的正統派分子才会想像，在伊薩伯拉倒台之后，唐·卡洛斯会起而代之。他們总是以为，如果一个原則的最后的体现者要消逝，那只不过是為了让它的最初的体现者再度登台。

1856年，西班牙的革命不仅失去了它的王朝性质，而且也失去了它的軍队性质。为什么軍队在西班牙历次革命中起过如此显著的作用，这可以用几句话來說明。从来存在的鎮守司令区制度使这些司令官成为各省的帕沙<sup>55</sup>；反抗法国的独立战争，不仅使軍队成为国防的主要工具，而且也使軍队成为西班牙的第一个革命組織和革命活动的中心；1815年到1818年的各次阴谋都是由軍队发动的；1833年到1840年的王朝战争<sup>56</sup>，双方依靠的都是軍队；资产階級自由派的孤立，迫使他们們用軍队的刺刀去对付乡村的僧侶和农民；克里斯亭娜及其宫廷奸党曾不得不用刺刀来对付自由派，如同自由派曾用刺刀对付农民一样；所有这些先例产生了一种傳統，——这些就是賦予西班牙的革命以軍队性质、而又賦予軍队以御用軍性质的原因。迄至1854年，革命总是由軍队发动的，而直到那时候为止，除了发动革命的軍人的級別不同以外，各次革命在外表上沒有任何差別。甚至在1854年，仍旧是由軍队首先发难的；但是奥当奈尔的曼薩那累斯宣言<sup>57</sup>证明，西班牙革命以軍队为

主的基础已經变得何等薄弱。奥当奈尔是在什么条件下终于能够中止他从維卡耳瓦罗走向葡萄牙边境的毫不含糊的漫游而回师到馬德里的呢？只是在答应了立即削減軍隊、代之以国民軍、不使革命的果实由將軍們分吞以后，才能如此。如果說 1854 年的革命只限于这样表現它对軍隊的不信任，那末，仅仅在两年以后，革命就发现它自己受到了軍隊的公然的直接的攻击，——这个軍隊現在是值得与拉德茨基的克罗地亚兵、波拿巴的非洲軍隊和弗兰格尔的波美拉尼亚軍隊<sup>58</sup>相提并論了。西班牙軍隊何等欣賞它的新地位的荣誉，从 7 月 29 日馬德里的一个团的叛变就可以看出，这个团不满足于伊薩伯拉的一点烟叶，为了爭取五个法郎的硬币和波拿巴的腊腸<sup>59</sup>而罢工，而最后他們得到了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次軍隊是完全与人民为敌的，更准确些說，只是反对人民和国民軍的。这就是說，西班牙軍隊的革命使命已經告終。埃斯帕特罗，这个集西班牙革命的軍隊性质、王朝性质和資產階級自由派性质于一身的人，現在已經墮落到如此地步，甚至比最了解他的人依据命运的一般規律所能預見到的还要低下。如果——像一般所傳說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埃斯帕特罗分子要集合在奥当奈尔之下，那末他們就会以自己的正式行动来证实他們的自取灭亡。他們并不能拯救埃斯帕特罗。

下一次的欧洲革命将发现，西班牙已經成熟到能够同它合作。1854 年和 1856 年是西班牙达到那种成熟程度所必須經過的过渡时期。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8 月初

作为社論載于 1856 年 8 月 18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78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歐洲的經濟危機

歐洲的投機狂在目前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普遍性。過去也有過投機狂，糧食的、鐵路的、採礦的、銀行的、棉紡業的，總之，有過各種各樣的投機狂。但是，在 1817、1825、1836、1846—1847 年嚴重的商業危機時期，投機狂雖然波及了工業和商業的一切部門，而占主導地位的，只是某一種投機狂，它賦予每一個時期特殊的色調和性質。當時投機之風遍及一切經濟部門，但是每一個投機者只限於在自己的專門部門活動。相反地，目前的投機狂的代表者——Crédit Mobilier 的指導原則，卻不是在一個固定的方面進行投機活動，而是普遍地進行投機活動，並且把它集中起來的騙術推行到一切經濟部門。此外，目前的投機狂在產生和發展方面，也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這就是它不是開始於英國，而是開始於法國。目前這一類法國投機者和上述時期內進行活動的英國投機者的關係，就像十八世紀法國的自然神論者和十七世紀英國的自然神論者的關係一樣。一個提供材料，另一個制定概括的形式，使自然神論得以在十八世紀傳遍整個文明世界。英國人想為自己慶幸，慶幸投機活動的策源地已從他們自由的清醒的島國移到了混亂的、受專制暴君壓迫的大陸。但是，他們忘記了，他們在以多么不安的心情注視着法蘭西銀行每月的月報，因為這些月報

影响着英格蘭銀行聖所中的黃金儲備。他們忘記了，用聖水來供應歐洲 *Crédits Mobiliers* 的大動脈的正是大量的英國資本。他們忘記了，英國商業的過分擴大和生產過剩這些他們稱為“健康的”而且現在還在大肆吹噓（據說出口數字已達 11 000 萬英鎊左右）的東西，是他們現在所揭露的大陸上的“不健康的”投機活動的直接產物，正如 1854 和 1856 年他們的自由主義政策是波拿巴 *coup d'état* [政變] 的產物一樣。但是不能否認，把皇帝的社會主義，聖西門主義者的證券投機和哲學家的騙術組成一個叫做 *Crédit Mobilier* 的奇妙的混合體，這不是英國人的過錯。和大陸上的這種巧妙的做法完全相反，英國的投機活動又恢復了赤裸裸的毫不掩飾的純粹欺騙的最粗魯和最原始的形式。這種欺騙成了保爾、斯特蘭和貝茨的秘密，成了薩德勒氏梯培雷里銀行、倫敦西蒂的柯爾、戴維遜和戈登的巨大業務的秘密；並且正是倫敦英國皇家銀行的可悲的、然而卻是簡單的故事的梗概。

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別巧妙的辦法，只要用巨額的紅利安慰公司的股東，用騙人的報告書引誘存戶和新股東，就能把公司的資本侵吞。為此，只要懂得英國的法律就夠了。英國皇家銀行的事件所以轟動一時，與其說是由於資本的規模，倒不如說是由於被它吸收為股東和存戶的小百姓的數量。這個企業的分工極其簡單。它有三類董事：一類滿足於把 1 萬美元的年俸裝入自己的腰包，而他們獲得這筆收入是由於他們對銀行的事情不聞不問，保持了自己良心的純潔；另一類確實很想管理銀行，但只是為了要當銀行的主要賬戶，或者确切些說，當掠奪者。由於這後一類董事在貸款方面要依賴經理，所以他們一開始就使經理自己有獲得貸款的可能。除了經理以外，他們同樣還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訴銀行的監事和法

律顧問，監事和法律顧問因而以貸款形式獲得賄賂。董事和經理除了得到銀行貸給他們本人及其親屬的貸款以外，還假立許多戶頭竊取貸款。現在全部已付的資本為 15 萬英鎊，其中 121 840 英鎊已直接或間接地被董事們據為己有。銀行的創辦人麥克格萊哥爾先生這位格拉斯哥的議員，著名的統計學著作<sup>60</sup>的作者欠了銀行 7 362 英鎊的債；另一個董事丘克斯貝里的議員漢弗利·布朗先生，利用銀行為自己償付競選經費，有一個時候他欠銀行 7 萬英鎊的債，而且完全有可能，現在還欠 5 萬英鎊。經理凱麥隆先生得了 3 萬英鎊的貸款。

銀行開業以來，每年都虧損 5 萬英鎊，但是董事們年復一年地向股東恭賀生意興隆。雖然正式的會計師科耳曼先生宣布股東根本不應當得到任何紅利，每一季度仍支付紅利 6%。只是在去年夏季，才向股東提出了一個數目在 37 萬英鎊以上的偽造的財務報告，報告中貸給麥克格萊哥爾、漢弗利·布朗、凱麥隆及其同伙的貸款，列入了容易銷售的有價證券的不固定項目里。當銀行已經完全沒有支付能力的時候，發行了新的股票，同時提出了關於銀行業務發達的充滿樂觀主義的報告並對董事們投了信任票。這種發行新股票的办法決不是作為銀行擺脫困境的最后的絕望手段，而完全是董事們的騙局的新的源泉。雖然這家銀行的章程中有一條規定，禁止銀行買賣自己的股票，但是，實際情況看來一直是這樣：只要董事手里的本行股票一跌價，他們就以抵押的方式把這些股票強加給銀行。關於“一部分誠實的”董事所謂受騙的情形，他們當中有一個歐文先生在股東大會上曾說過如下的話：

“當開辦本行的一切工作都已準備就緒時，凱麥隆先生被任命為我們的經理，不久我們就認識到，讓一個過去從來沒有同倫敦的任何一家銀行有過

联系的人来当經理是多么不幸。这种情况就产生了許多困难。我要說的是两年多以前发生的事，当时我已經离开銀行。甚至在我离开的前夕，我还不知道有哪怕是一个股东在貼現或貸款业务方面会欠銀行1万英鎊的債。有一个时候我听到这样的傳說，有人抱怨他們当中有人欠了大量貼現期票的債務，关于这件事情我問了一位會計。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既然我已經离开銀行，銀行的事情就与我无关了。凱麦隆先生說过，任何一个董事都不应当把自己要貼現的期票提交董事会。他宣布說，这种期票应当送交經理，因为如果把它們提交董事会，那末殷实可靠的商界人士就永远不会同我們銀行往来了。要不是有一次凱麦隆先生病危，我还不知道这件事。董事长和其他几位董事趁他生病的时候，进行了某些調查，結果发现凱麦隆先生有一个用特别的鎖鎖起来的本子，这个本子过去我們从来没有见过。当董事长打开这个本子时，我們大家都非常吃惊。”

对于凱麦隆先生，应当說的是：他不等这些发现有个結果，就很快地有預見地离开了英国。

英国皇家銀行最不平常和最突出的交易之一，就是它同威尔士一些铁工厂发生的关系。就在公司已付的資本只有5万英鎊的时候，仅仅貸給这些铁工厂的貸款就达到7万—8万英鎊。当公司第一次占有这个制铁企业时，这个企业已經无法經營了。当这个企业投入了約5万英鎊的資本而恢复起来时，它却落到了一个叫克拉克先生的手里。克拉克先生利用了它“一段时期”之后，又把它摔給了銀行，并且“表示确信他是放棄了大批財產”，但是事实上他給銀行加了一笔两万英鎊的“企业”債務。就这样，当这个企业估計是有利可图时，它就脫离了銀行，当需要得到新的貸款时，它就又回到了銀行。甚至在最后招供时，董事們还企图繼續耍这种把戏，还在证明工厂能赢利。据他們說，工厂似乎每年能赢利16 000英鎊，但是他們忘記了，在公司存在的每一年內，他們要股东付出17 742英鎊的代价。現在，根据大法官法庭<sup>61</sup>的判決，公

---

司即將撤銷。但是在此以前，英國皇家銀行的所有冒險家，將為歐洲普遍危機的洪流所吞沒。

卡·馬克思寫於 1856 年 9 月 26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作為社論載於 1856 年 10 月 9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828 號

---

## 卡·馬克思

# 歐洲的金融危機

1856年10月3日于倫敦

大約發生在1847年秋而延續到1848年春的歐洲普遍商業危機，是由倫敦金融市場的恐慌開始的。這次恐慌開始於1847年4月底，到5月4日達到了頂點。在這些日子裡，一切金融交易都停止了，但是從5月4日起，緊張局面開始緩和下來，因此商人們和記者們就互相慶賀這次恐慌是純粹偶然的和暫時的。然而沒有過幾個月，就爆發了商業和工業危機，金融恐慌對這次危機來說，只是一種預兆和先聲。

現在，歐洲金融市場上正發生着與1847年的恐慌相似的風潮。但是這裡並不完全相似。目前的恐慌不像1847年那樣由西方向東方發展，由倫敦開始經過巴黎到達柏林和維也納，而是由東方向西方發展。它開始於德國，從那裡向巴黎蔓延，最後到達倫敦。當時，這種緩慢的發展過程使恐慌具有地方性，而現在，蔓延之迅速立即表明它具有普遍性。當時，它持續了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星期左右，而現在，它已持續了三個星期。當時，只有少數人看出這種恐慌是普遍危機的先聲，而現在，除了那些讀着“泰晤士報”，想像他們是在創造歷史的英國人以外，誰也不會懷疑這一點。當時，甚至最有遠見的政治家所擔心的，也不過是1825年和1836年危

机的重演，而現在他們却相信：他們面临的不仅是扩大了1847年危机的再版，而且是扩大了1848年革命的再版。

欧洲上层阶级的惊慌不下于他們的絕望。从1849年年中起，他們完全是左右局势的人，只有战争<sup>①</sup>才是他們社会观中的唯一阴影。現在，当战争已經結束或者被认为結束的时候，他們到处遇到的情况就同英国人在滑铁卢会战和1815年締結和約以后遇到的情况一样；当时代替战 bulletins [报]出現的是关于农业和工业遭到困难的报道。为了拯救自己的財產，当时他們采取了所能采取的一切办法来屠杀群众和镇压革命。而現在，他們認識到，他們自己就是財產关系上的革命的工具，而且是比1848年的革命者所想的革命規模大得多的革命的工具。他們正面临着普遍破产的形势，他們知道，这种破产将在巴黎借貸資本的巨大中心的付款日发生。1815年，英国人在“向来忠于职守的人”卡斯尔里自杀以后，很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疯子，而欧洲证券投机商人們在波拿巴的脑袋沒有掉之前就开始問自己：波拿巴究竟什么时候曾有过清醒的头脑。他們知道，所有的市場上都充斥着进口貨；有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甚至連过去从来沒有染上这种疾病的人，現在也卷入了投机倒把的漩渦；沒有一个欧洲国家躲过这个漩渦；各国政府耗尽了本国納稅人的能力。在1848年，直接引起革命的事件都是純粹政治性的，例如：法国的改革宴会，瑞士的宗得崩德之战，柏林的联合議會中的辯論，西班牙的婚姻，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糾紛<sup>62</sup>，等等，并且当革命的士兵——巴黎的工人宣布1848年的革命为社会革命时，革命的將軍們也和世界上其余的人一样感到意外。而

---

① 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現在則相反，還在政治革命宣布以前，大家都認識到這是社會革命，而且是這樣的一種革命，它不是由工人中間的秘密社團的密謀引起的，而是由屬於統治階級自己的各種 *Crédits Mobiliers* 公開實行的鬼蜮伎倆引起的。因此，歐洲上層階級除了驚慌之外，還痛苦地意識到，他們對革命勝利的本身，只不過有助於在 1857 年創造物質條件來實現曾經僅僅存在於理想中的 1848 年的傾向。由此可見，從 1849 年年中起到目前為止的整個時期，是歷史賜給歐洲舊社會的一個純粹的喘息時機，使它能夠最後一次集中地顯示自己的一切傾向。在政治上是崇拜刀劍，在道德上是普遍敗壞以及偽善地恢復已經破除的迷信，在政治經濟上是不花力氣生產而狂熱地追求發財致富，——這就是 1849—1856 年這段反革命狂歡暴飲的時期內這個社會所表現的傾向。

另一方面，如果把這次短暫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馬志尼宣言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對照一下，那末，從 1849 年開始的高明的革命家們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會失去其神秘性。他們不了解人民的經濟生活，他們不了解歷史發展的實際條件，當爆發新的革命時，他們比彼拉多有更多的理由來推卸責任，說他們與流血事件無關。

我們說過，歐洲當前的金融恐慌首先發生於德國。波拿巴的報紙就抓住這一點，企圖使人相信他的制度同造成這次恐慌沒有絲毫關係。

巴黎的“立憲主義者報”<sup>63</sup> 寫道：“政府甚至在和約締結以後，還力圖抑制企業家的事業心，推遲實行某些新的租讓並禁止依靠交易所實現一些新的計劃。不幸，別的它再也做不到了，它不可能防止一切無節制的行為。但是這些無節制的行為是從哪里產生的呢？如果說，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法國市場上產生的，那當然只是較小的一部分。我們的鐵路公司出於競爭的情緒可能太匆忙地發行了本票，其收入預定用於擴大鐵路網。但是，如果沒有大量企業



突然在国外出現，这也許不会引起困难。特别是沒有参战的德国，輕率地把注意力全放在各种企业上。由于自己沒有足够的資源，就只得借助于我們的資源，又因为官方的市場不对它开放，我們的投机家就向它开放了黑市交易所。这样，法国就成了世界主义的投机活动中心，这种投机活动可以靠牺牲本国的民族利益而使別国发财致富。結果我們的金融市場上資本的供应减少了，而我們的有价证券因买主少而跌价，在有那么多的財富和繁荣的因素的情况下，这种跌价使得公众莫名其妙。”

我們举出了帝国官方胡說的欧洲恐慌的原因的例子，同时，也不能不举出在波拿巴制度下允許存在的反对意見的例子。

“国民議会报”<sup>64</sup> 宣布說：“可以否认危机的存在，但是，如果注意一下不久前我們的铁路收入和以商业期票抵押的銀行貸款的减少以及今年头七个月的出口稅减少 2 500 万法郎，那末不能不承认，繁荣的状况是略有消退的。”

总之，从 1849 年的反革命时期起，德国的資產階級的一切积极人士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上，就像德国的思想界为了自然科学而放棄哲学一样。德国人由于在战争 中保持中立，在战争期間积累的資本相当于他們的邻居法国人在战争中所失去的資本。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看到德国人的这种情况，看到他們的迅速发展的工业和資本的积累以后，放下架子承认了德国人是自己合适的业务对象，因为波拿巴同奥地利的消极联盟已經使这个公司的注意力轉移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未經考查的地方去了。但是，*Crédit Mobilier* 做出了榜样，在德国开始了投机活动以后，对于在它自己推动下建立的投机企业和信貸企业的大量收入，自己都感到惊奇。在 1855—1856 年，德国人承襲了法国 *Crédits Mobiliers* 的完全現成的欺詐法規，就像在 1831 年他們承襲了法国的現成的政治宪法<sup>65</sup> 一样。如果一个十七世紀的法国人看到萊茵河对岸造了規模大一百倍的路易十四的宫廷会感

到惊奇的话，近十年来的法国人看到德国有 62 个国民议会，而他們本国，非常勉强地才产生了一个，也同样会感到惊奇。归根到底，德国完全不是一个地方分权的国家，全部问题只在于集权制在这个国家里是分散的，因而不是存在一个中央，而是存在许多中央。所以，这个国家完全适合于在最短期间和在一切方面开始采取 Crédit Mobilier 教給它的各种鬼蜮伎俩，就像巴黎的时装在德国比在法国流行得更快一样。这就是这次恐慌首先发生于德国并在那里蔓延最广的直接原因。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会談到这次恐慌本身的经过并考察它产生的直接原因。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10 月 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6 年 10 月 1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833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 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約在本年 9 月中开始的德国金融危机于同月 26 日达到了最高峰,后来开始逐渐緩和下来,这同 1847 年英国的金融恐慌相似,那次恐慌在 4 月底第一次露头,至 5 月 4 日达到最高潮,然后逐渐平息下去。当时,倫敦几家主要的銀行为了在恐慌期間創造一个暫息时机而作的牺牲,成了几个月后自己破产的起因。德国也将很快产生类似的后果,因为在德国,产生恐慌的基本原因并不是缺乏流通手段,而是游資同当前工业、商业和投机企业的巨大規模不相称。恐慌賴以暫时克服的手段是,各个政府的銀行、股份銀行和私人銀行提高了貼現率,其中有些銀行把自己的貼現率提高到 6%,有些甚至提高到 9%。由于这样提高了貼現率,黄金外流暫时停頓,外国的产品停止輸入,外国資本为高利的誘餌吸引,未清償的債款都要求提取,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一个月以前还用通融划款的期票支付承包德国铁路的費用,現在不得不用現金来支付,同时,一般地說,法国也不得不用硬币来支付自己在谷物和食品輸入方面的差額。由此可見,德国的金融恐慌波及了法国,而且在那里立即采取了更加吓人的形式。法兰西銀行效法德国的銀行,把自己的貼現率提高到 6%——这样做已經迫使它在 9 月 30 日向英格兰銀行提出了貸款 100 万英鎊以上的要求。由于这样,英格兰

銀行甚至沒有等到通常在星期四舉行的董事會議開會，就在 10 月 1 日把本行的貼現率提高到 5%，這是 1847 年金融恐慌以來沒有先例的措施。雖然採取了這種提高利息的措施，但是黃金每天以 4 萬英鎊之數繼續由針綫街<sup>66</sup>的地下室外流，而法蘭西銀行每天要外流 600 萬法郎硬幣，當時造幣廠每天只能製造 300 萬法郎，其中銀幣只有約 12 萬法郎。為了制止法蘭西銀行對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的有害影響，大概在一星期以後，後者又把期限為 60 天的期票的貼現率提高到 6%，期限更長的期票的貼現率提高到 7%。為了報答這番好意，法蘭西銀行在 10 月 6 日發布了一項新的指示：它不再辦理期限在 60 天以上的任何期票的貼現，並且宣布，它提供的用有價證券作抵押的貸款，不超過票面額的 40%，用鐵路股票作抵押的貸款，不超過票面額的 20%，而且期限總共只有一個月。雖然採取了這一切措施，英格蘭銀行還是不能制止黃金流往法國，就像法蘭西銀行不能減輕巴黎的恐慌或者減少硬幣流往歐洲大陸其他地區一樣。法國的恐慌的威力已為下列事實所證明：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行情由 1 680 法郎（9 月 29 日的行情）跌到 1 465 法郎（10 月 6 日），即在八天內跌了 215 法郎，而且直到 10 月 9 日，雖然作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把股票的行情提高 15 法郎以上。不用說，國家有息證券也相應地跌價。恐怕沒有比這樣一件事更可笑的了：我們聽到 Crédit Mobilier 的偉大創始人伊薩克·貝列拉先生冠冕堂皇地擔保說，法國資本具有天生的特殊的世界主義性質，而法國人卻不幸地抱怨他們的資本逃往德國。在這一片混亂當中，法國偉大的魔法師拿破侖第三煉好了自己的萬應靈丹。他禁止報刊談論財政危機；通過自己的憲兵向銀錢商暗示：最好撕掉櫥窗里貼水收購白銀的廣告，並于 10 月 7 日在自己的“通

报”上登載了一个以他自己的財政大臣的名义写給他本人的报告，报告中肯定說，一切都很好，只是公众对事情作了不正确的估計。不幸，两天以后，法兰西銀行的總裁突然出現，在他的月报中提供了下列材料：

	10月	9月
	(单位：法郎)	
現金庫存.....	77 062 910	113 126 401
分行的現金庫存.....	89 407 036	122 676 090
貼現期票.....	271 955 426	221 308 498
分行貼現期票.....	239 623 602	217 829 320
黃金和白銀的貼水.....	2 128 594	1 496 313

換句話說，在一个月內庫存的現金减少了 69 332 545 法郎，期票的貼現增加了 72 441 210 法郎，同时，收购黃金和白銀支出的貼水超过 9 月份 632 281 法郎。同样不幸的是，目前，法国人积存的貴金屬减少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关于法兰西銀行有可能停止支付硬币的風声一天比一天傳播得广。拿破侖对金融市場的干預，正如他对卢瓦尔河水災区的干預，其效果大致相同<sup>67</sup>。

欧洲目前的危机所以复杂，还因为貴金屬的外流（商业震动通常的預兆）和黃金同白銀相比价格下跌交織在一起。不管这种或者那种商业的和工业的因素怎样，这种下跌不能不使实行复本位制的国家和必須按法定比例（但已被經濟事实所推翻）支付黃金和白銀的国家，把自己的白銀輸到实行金本位制和白銀的官价不偏离其市場价格的市場上去。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有关情况正是这样，只要法国沒有以金币代替銀币，白銀自然就由法国流往英国，而黃金由英国流往法国。一方面，很清楚，一般流通手段的这种交换会带来一些暫时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或者像过

去做过的那样实行金本位制，停止白銀流通，或者像 1851 年荷兰和不久前的比利时做过的那样，停止黄金流通，确定白銀为唯一的本位。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除了黄金同白銀相比价格下跌以外，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那末，白銀由整个欧洲和美洲的普遍外流自己就会終止和停頓，因为在缺乏白銀收入的专门来源的情况下，这么多的白銀突然退出和停止流通，就必然会降低它同黄金相比的价格，因为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暂时地取决于供求关系，只有在几年以内平均起来才取决于生产費用。荷兰和比利时銀行停止黄金流通对白銀的价值只能起非常小的影响，因为白銀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交换手段，所以说这种变动具有經濟性质，还不如說它具有法律性质。同时，可以认为，这种变动为供应白銀开放了不大的市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減輕了一些困难。

誠然，在最近四五个月內，奥地利国家銀行的硬币由 2 000 万元增加到 4 300 万元；这个数目全部都保存在銀行的地下室，因为奥地利还没有恢复用硬币支付。在这增加的 2 300 万元中，主要部分是从巴黎和德国由 *Crédit Mobilier* 购买铁路得来的。毫无疑问，这是造成不久前白銀外流的原因之一，但是，不管在多大的程度上，如果把最近以来金融市場上发生的現象都归咎于这一点，那是錯誤的。不应当忘記，从 1848—1855 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开采的黄金投入世界金融市場的达 10 500 万英鎊，俄国和其他旧的产地开采的不算在內。据最乐观的自由貿易論者认为，根据目前貿易的发展，在这 10 500 万中，需要有 5 200 万用做通貨、銀行准备金、各国貿易中和平衡收支差額相互結算的金錠或用来制造奢侈品。至于其余的 5 300 万，正像自由貿易論者所认为的，只是代替过去在美国和法国使用的白銀——美国 1 000 万，法国

4 300 万，而我們认为实际数字要稍低一些。究竟怎样代替，从下列关于法国在 1855 年間黄金和白銀变动情况的官方关税报告表中可以看出：

1855 年輸入的黄金		1855 年輸入的白銀	
金錠.....	11 045 268 英鎊	銀錠.....	1 717 459 英鎊
硬幣.....	4 306 887 英鎊	硬幣.....	3 121 250 英鎊
<hr/>		<hr/>	
总 計.....	15 352 155 英鎊	总 計.....	4 838 709 英鎊
1855 年輸出的黄金		1855 年輸出的白銀	
金錠.....	203 544 英鎊	銀錠.....	3 067 229 英鎊
硬幣.....	6 306 060 英鎊	硬幣.....	9 783 345 英鎊
<hr/>		<hr/>	
总 計.....	6 509 604 英鎊	总 計.....	12 850 574 英鎊
黄金入超.....	8 842 551 英鎊	白銀出超.....	8 011 865 英鎊

因此，誰也不能断定說，所以騰出这样大量的白銀(5 300 万英鎊)是因为法国和美国貨幣流通发生变化或奥地利銀行积累宝物，或者是由这两者同时造成的。指出下列情况是完全正确的：和黄金不同，由于白銀沒有貶值的危險，所以意大利和东方地区的商人对它比对其他硬幣显然更偏爱，阿拉伯人收买和积累了大量的白銀，而且，法国粮商为了支付黑海和阿速夫海进貨的款項，宁願从法国輸出白銀，而不願輸出黄金，因为在法国，白銀仍然保持着同黄金的原来比价，而在俄国南部，黄金和白銀的比价就变了。虽然考虑到白銀外流的这一切原因，但是我們仍然不能断定由于这些原因而外流的数字多于 1 500 万或 1 600 万英鎊。經濟学家們在英国报刊上非常荒謬地提出了东方战争是白銀外流的又一个特殊原因，虽然他們已經把这种外流算在由于現代貿易日益增长的

需求而必需的 5 200 万英镑黄金的总数中了。当然，他们不可能让白银来担负黄金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这一切个别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造成白银外流的比较重大的因素，这就是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相当有趣的是，这个因素也就是 1847 年大危机的主要特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头来谈，因为这对研究欧洲所面临的危机的经济预兆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读者将会知道，不管金融恐慌和贵金属的外流（这是金融恐慌的直接原因）有着怎样暂时的原因，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在欧洲已经存在。在法国，由于蚕茧收成不好，葡萄歉收，1855 年因局部歉收而输入大批谷物，1856 年发生水灾，此外，因波拿巴先生的经济诡计造成巴黎房荒，所以这些因素还要更加加深。至于我们，我们觉得只要仔细地了解一下我们在星期六发表的曼涅先生的财政宣言，就会同意这样的假设：不管现在召开的第二次巴黎会议怎样，不管那不勒斯问题<sup>68</sup>怎样，如果 1857 年给法国带来的预兆不比十年以前伴随 1847 年而来的预兆坏，那末，拿破仑第三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为自己庆幸。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0 月 14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0 月 2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843 号



---

卡·馬克思  
\*欧洲的金融危机。——  
貨幣流通史片断

我們已經从法兰西銀行最近的一个报告书中看到，它的金屬儲备降到了非常低的程度，約为 3 000 万美元，而且仅仅在上一个月中就减少了 25%<sup>①</sup>。如果再繼續这样减少下去，那末到年底，銀行的儲备就要耗尽，現金支付也将停止。为了防止这种极危險的現象，曾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方面，警察局应当阻止将白銀溶化出口，另一方面，法兰西銀行决定以巨大的牺牲作代价，同路特希尔德先生們簽訂一項借款 600 万英鎊的合同，使自己的金屬儲备增加一倍。換句話說，为了补充自己黃金的不足，銀行又扩大了黃金的买价和卖价之間的差价。由于这个合同，10月11日曾向英格兰銀行支取了 5 万英鎊，10月13日——4 万英鎊，而昨天到达这里的“亞細亞号”輪船带来了关于繼續提取 50 多万的消息。因此，倫敦普遍担心英格兰銀行为了防止自己的基金流往法国，会重新擰紧螺絲，提高自己的貼現率。英格兰銀行为了做好准备，除國庫期票以外，已經停止发放以任何国家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貸款。

但是，法兰西銀行能够成功地装进自己柜子的全部黃金将像

---

① 見本卷第 66 頁。——編者注

流入時那樣迅速地流出——一部分用來償付外債，彌補貿易赤字，一部分用於國內需要，代替正在退出流通的白銀（收藏白銀的現象自然會隨着危機的尖銳化而加速起來），最後用於最近三四年來建立的大工業企業的需要。例如，一些曾希望以發行新債券來繼續自己的工程並支付股息和貼水（目前談不到這樣做）的大鐵路公司，正在採取最冒險的措施來彌補自己財力的空虛。如法國西部鐵路需要 6 000 萬法郎，東部鐵路——2 400 萬，北部鐵路——3 000 萬，地中海鐵路——2 000 萬，奧爾良鐵路——4 000 萬，等等。據統計，所有鐵路公司所需要的總數達 3 億。曾自鳴得意地以為借助於證券投機就能使人忘掉政治的波拿巴，現在却熱衷於用各種政治問題——那不勒斯問題、多瑙河問題、貝薩拉比亞問題、關於新的巴黎會議問題<sup>69</sup>——來轉移人們對金融市場的注意，但是，一切都徒勞無益。不僅法國，而且整個歐洲都堅信，所謂的波拿巴王朝的命運和歐洲社會目前的情況一樣，都將取決於看來現在已經在巴黎露頭的商業危機的結局。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sup>①</sup>，白銀同黃金相比價格突然上漲，是危機爆發的最初原因。如果不注意到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開採的大量黃金，那就可能認為這種上漲僅僅是由於從西方國家流往亞洲、特別是流往印度和中國的白銀日益增加而造成的。從十七世紀初起，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對歐洲和美洲的金銀市場一直起着嚴重的影響。白銀是這些東方國家的唯一交換手段，由於同東方進行貿易，從西屬美洲大量輸入歐洲的財寶，有一部分就從歐洲大陸外流，於是，美洲輸入歐洲的白銀，就這樣由於從歐洲輸往

① 見本卷第 66—69 頁。——編者注

亚洲而得到了平衡。誠然，与此同时，黄金从亚洲輸往欧洲。但是，如果把 1840 年和 1850 年期間烏拉尔开采的黄金除开不算，那末这种出口是微不足道的，不可能产生任何显著的结果。

当然，亚洲和西方之間白銀的流通，随着貿易差額的变动，有其漲潮和退潮的交替时期，但是总的說来，这个世界性运动的經過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十七世紀起到 1830 年左右；第二个时期从 1831 年到 1848 年，最后一个时期从 1849 年到現在。在第一个时期，向亚洲輸出的白銀，总的說来是增加的。在第二个时期，这种輸出开始削弱，直到最后出現回流，亚洲第一次把它在几乎两个半世紀內吸收来的財宝的一部分归还了欧洲。在第三个时期，仍然处在上升的发展阶段，情况又起了变化，現在，亚洲正以空前的規模吸收白銀。

在較早的时期，在美洲发现白銀以后，甚至在葡萄牙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以后，欧洲向亚洲輸出白銀还不怎么能觉察到。到十七世紀初，当荷兰人和后来的英国人扩大了自己同东亚的貿易时，对这种金屬的需要量才比較大。但是，从十八世紀英国茶叶的消费开始迅速增长的时候起，对白銀的需要量就增加得特別快，因为英国人购买中国的茶叶几乎完全要支付白銀。到十八世紀末，白銀从欧洲向东亚的外流已經达到十分巨大的規模，甚至吸收相当一部分从美洲輸入的白銀。就在这一时期內，白銀也开始从美洲直接輸往亚洲，虽然总的沒有超过墨西哥船队从阿卡浦尔科带到菲律宾群島的数量。十九世紀头三十年，欧洲更加觉察到亚洲在这样吸收白銀，由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爆发革命<sup>70</sup>，美洲的白銀輸出，从 1800 年的 4 000 多万美元降到了 1829 年的不足 2 000 万。另一方面，在 1796—1825 年期間，美国向亚洲輸出的白銀增加了 3

倍，而在 1809 年以后，开始（虽然规模较小）直接向东亚输出白銀的，不仅有墨西哥，而且还有巴西、智利和秘魯。从 1811 年到 1822 年，欧洲向印度和中国输出的白銀超过从这些国家輸入的黄金 3 000 多万英鎊。

在 1831 年开始的时期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印度公司不仅被迫放棄它对欧洲与其东方領地之間的貿易的壟断，而且作为商业企业全部撤銷（如果不算它对印度支那的壟断）<sup>71</sup>。这样，由于东印度的貿易对私人开放，不列顛向印度输出的工业品开始大大超过大不列顛从印度輸入的原料。因此，貿易差額越来越明显地变得有利于欧洲，結果，白銀向亚洲的输出迅速下降。不列顛貿易在世界其他市場上遇到的各种挫折，現在由于它在亚洲的新的扩張而开始得到弥补。如果說，1825 年的貿易震动已經使不列顛对印度的輸出有了增长，1836 年的英美危机又給了它更加有力的推动，那末，1847 年不列顛危机的特点，甚至是由对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过多的輸出造成的。

对亚洲的輸出在 1697 年不到不列顛出口总額的  $\frac{1}{52}$ ，而 1822 年已經达到約  $\frac{1}{14}$ ，1830 年达到  $\frac{1}{9}$  左右，1842 年达到  $\frac{1}{5}$  强。在这个經濟过程只波及印度和亚洲西部地区的时候，白銀由欧洲向亚洲的外流削弱，但是沒有停止，更沒有变为由亚洲流往欧洲。只是到后来，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鴉片貿易，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門，金屬货币流通中才发生这种急剧的轉变。因此，当中国的白銀流到中印边境的时候，英国和美国把自己的工业品大量傾銷到中国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也就說明为什么 1842 年白銀在現代貿易史上第一次大量地真正由亚洲輸往欧洲。

但是，亞洲和西方之間貴金屬流通中的這種全面的變動是暫時的。在 1849 年就已經出現了尖銳的日益強烈的反復。就像中國給第一個和第二個時期指出了方向一樣，它也給第三個時期指出了方向。中國的起義<sup>72</sup> 不僅中斷了同印度的鴉片貿易，而且也使外國工業品的購買陷於停頓，因為中國人堅持要用白銀購買他們的商品，而他們自己則採取了東方的經濟專家在政治和社會動蕩時期所慣用的措施——積累財寶。中國出超之所以非常可觀，還同歐洲最近蠶茧的收成不好有關。根據不列顛駐上海領事羅伯遜先生的報告書，最近十年來中國茶葉的出口增加了 63%，絲的出口增加了 218%，而工業品的進口減少了 66%。羅伯遜先生估計，現在從世界各地平均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比十年前多 558 萬英鎊。下面我們列舉 1849—1856 年期間中國進出口的確切材料（每年到 6 月 30 日為止）：

### 茶葉的出口

（單位：磅）

	輸往大不列顛 和愛爾蘭	輸往美國
1849 .....	47 242 000.....	18 072 000
1855 .....	86 509 000.....	31 515 000
1856 .....	91 035 000.....	40 246 000

### 絲的出口

	輸往大不列顛 和愛爾蘭	輸往法國
1849 .....	17 228 磅.....	—
1855 .....	51 486 磅.....	—
1856 .....	50 489 磅.....	6 458 包

	英 镑
1855 年中国向大不列颠出口的实际价值 .....	8 746 000
1855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实际价值 .....	2 500 000
总 計.....	11 246 000
扣除 20% 的运费和其他費用 .....	2 249 200
中国总计应得.....	8 996 800

**进 口**

	英 镑
1852 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2 503 000
1855 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1 000 000
1856 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1 277 000
1853 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3 830 000
1855 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3 306 000
1856 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3 284 000
1855 年的进口总值.....	4 306 000

	英 镑
1855 年中国的顺差.....	4 690 000
1855 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的价值.....	1 000 000
中国同世界各国贸易结算中的顺差总额(1855) .....	5 690 000

除了同中国进行贸易而引起白银由欧洲流向亚洲以外，由于最近几年来贸易差额不利于欧洲，白银还流向印度，这从下列的表中可以看出：

	英 镑
1856 年不列颠从印度的进口 .....	14 578 000
东印度公司转拨扣款.....	3 000 000
进口总额.....	11 578 000
印度从不列颠的进口.....	8 927 000
印度的顺差.....	2 651 000

必須說明：1825年以前，在印度還沒有實行單一的銀本位法以前，黃金一直是法定的支付手段。因為幾年以後，黃金在商業市場上比白銀受重視，東印度公司宣布準備接受黃金作為對政府的付款。但是在澳大利亞發現黃金以後，公司也和荷蘭政府一樣，由於擔心黃金貶值，根本不願意在將來接受黃金而支付白銀，於是突然恢復了1825年的單一銀本位制。因此，必須用白銀清償同印度的貿易中的債務就具有頭等的意義，同時造成了印度對這種金屬的大量需求。由於從這個時候起印度白銀的價格（同黃金的價格相比）比歐洲上漲得快，不列顛的商人發現，向印度輸出白銀來投機是有利的，可以換取印度的原料，從而給印度的出口以新的推動。總起來說，從1848年到1855年，僅僅從南安普頓一地輸出的白銀，就有2100萬英鎊，此外，從地中海各港口還輸出很大的數量。據統計，今年南安普頓就已經向東方輸出了1000萬。

從印度貿易的這些變化和中國革命的性質來看，不能期待白銀很快就會停止向亞洲流動。因此，斷定這次中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一定比俄國的所有戰爭、意大利的宣言<sup>73</sup>和歐洲大陸上的秘密社團所起的影響大得多，這決不是輕率的。

卡·馬克思寫於1856年10月17日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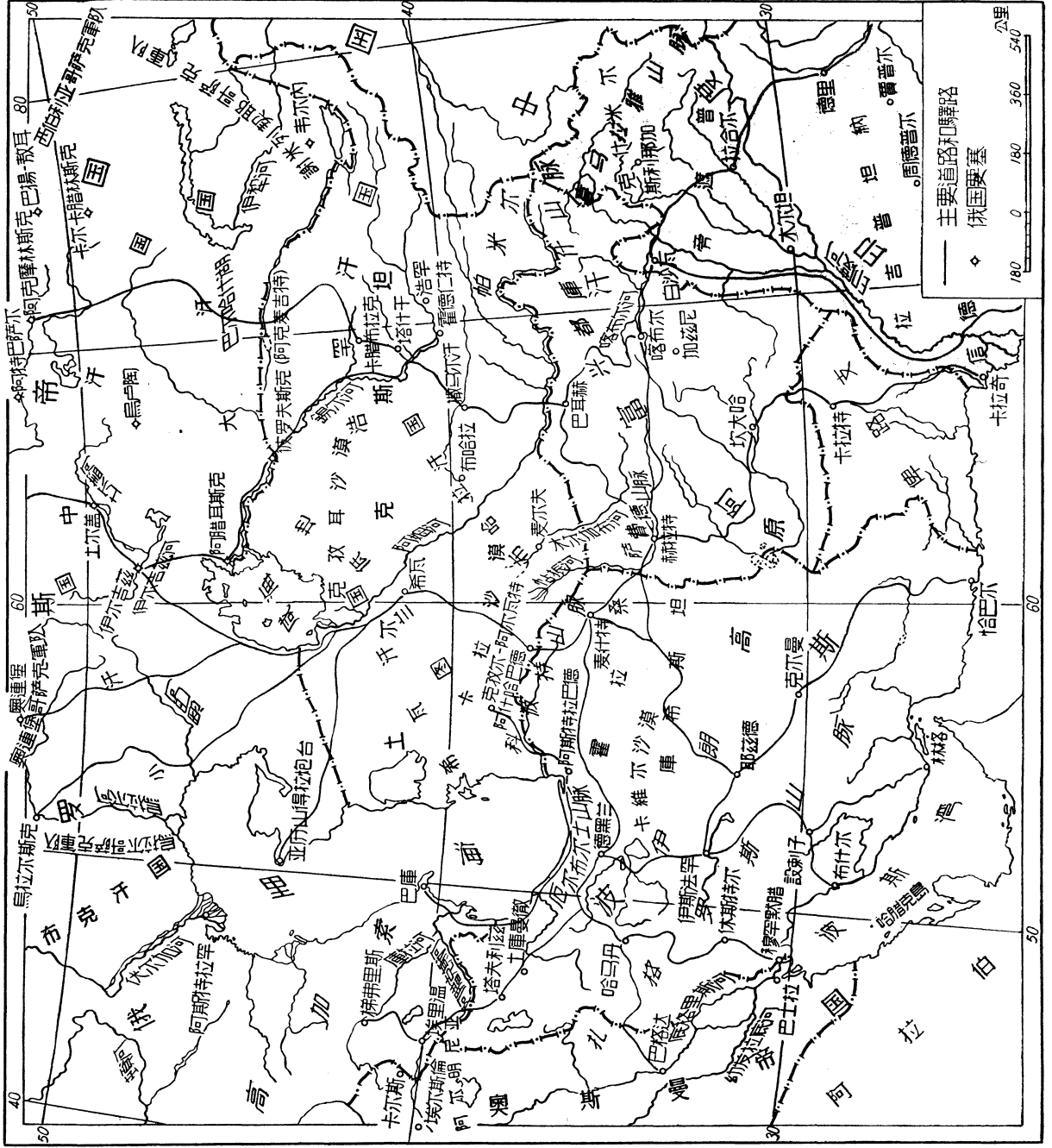
作為社論載於1856年11月1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4848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1857年的波斯、阿富汗和中亚细亚







## 卡·馬克思

### \*英国—波斯战争

英国，或者說得确切些，东印度公司对波斯的宣战<sup>74</sup>，是英国借以在亚洲大陆上扩张自己領地而重复使用的狡猾而冒险的外交伎俩之一。只要东印度公司垂涎于任何一个独立君主的領地、任何一个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或者盛产黄金宝石的地域，被猎取的对象就会被指控破坏了某某臆想的或既有的条约、违背了想像中的诺言或约束、犯下了莫须有的罪行，接着便宣布开战，于是又一件证实邪恶永存、证实狼和小羊这个寓言的永恒寓意的血腥事件被载入了英国的史册。

多少年来，英国一直渴望在波斯灣有一个立脚点，尤其想霸占位于波斯灣北部的哈腊克島。几度出使波斯的大名鼎鼎的約翰·馬尔科姆爵士曾经历数这个島对英国的价值，他断言，由于它与布什尔、里格港、巴斯拉、格林巴貝里亚和盖提夫相邻，可以成为英国在亚洲的最繁荣的領地之一。因此很自然的，这个島和布什尔已經落在英国手中。約翰爵士认为这个島是对土耳其、阿拉伯以及波斯通商的樞紐。該島气候良好，同时还具备了成为一个繁荣場所的一切必要条件。远在三十五年以前，这位大使就向当时的印度总督敏托勋爵談过自己的看法，他們两人都打算实现这个計劃。的确，約翰爵士曾受命統率远征軍侵伐該島，并且已經准备踏上征

途，但这时又奉命調返加尔各答，而哈福德·琼斯爵士被委派为駐波斯外交使节。1837—1838年波斯人第一次圍攻赫拉特期間，英国利用同現在一样站不住脚的借口，即以保护它一向視若死敌的阿富汗人为名，夺取了哈腊克島，可是某些情况，也就是說俄国的干涉，迫使它放棄了自己搶夺到的地盘。最近波斯又进攻并攻克赫拉特，这給了英国一个口实来譴責沙赫对它背信棄义，并占領哈腊克島作为采取軍事行动的第一步。

由此可見，半个世紀以来英国一直力图建立（尽管很少成功）它对波斯沙赫的政府的压倒优势。然而，波斯沙赫不愧为口蜜腹劍的敌人的对手，他們躲开了假惺惺的拥抱。波斯人除了亲眼看到英国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以外，大概还謹記着1805年有人对費特赫-阿利-沙赫所进的諫言：“不要相信貪得无饜的商人国家的話，这个国家在印度是用人命和王冠来做生意的。”强中更有强中手。在波斯的首都德黑兰，英国的影响极小，因为——姑且不談俄国的阴謀活动——法国在那里占着显著的地位，而在这三个海盗中波斯最須防备的是英国。目前，波斯使团正在赴巴黎的途中，也許已經到达那里。很可能，波斯不久前局势的复杂化<sup>75</sup>将是外交談判的对象。其实，法国对占領波斯灣的島屿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使問題更趋复杂的是：法国翻出了一些早已被人遺忘的羊皮紙文件，按照文件，波斯沙赫已經两次把哈腊克島割让給法国——第一次是在1708年，路易十四統治时期，第二次是在1808年，——固然，两次割让都附有条件，但条文上却讲得清清楚楚：必須让出某些权利，或者认可具有强烈反英情緒的国君的現代模仿者对島屿的要求是合理的。

倫敦“泰晤士报”在最近給“辯論日报”的答复中，以英国的名

义表示愿意把欧洲事务的领导权让给法国，而亚洲和美洲事务的管理权无疑应属于英吉利民族，任何其他的欧洲强国都不得干预。然而，路易·波拿巴是否同意这样瓜分世界，还值得怀疑。总而言之，当不久前英国和波斯发生纠葛的时候，法国在德黑兰的外交没有对英国表示热心的支持；而法国报刊翻出老账，重新提起高卢人对哈腊克岛的要求，这件事大概预示着英国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进攻和瓜分波斯。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0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 月 7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04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法国的經濟危机

歐洲的金融界沒有任何緩和的跡象。我們由“尼亞加拉號”輪船帶來的郵件得悉，金銀由倫敦流往歐洲大陸的現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而進一步提高貼現率的建議，在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會議上僅以一票的多數遭到否決。不用說，造成這次危机的原因，還是應該在法國尋找，我們收到的最近一期“經濟學家”雜誌<sup>76</sup>，對事態的描寫也極為陰暗。這家雜誌寫道：

“沒有任何好轉實際上就是惡化，況且，令人遺憾的是，根本看不到會有任何長時期的好轉。本月份與去年同月份相比，幾乎在每一方面都是令人沮喪的，而去年10月，這個國家還進行着在當時看來離結束仍遙遙無期的可怕戰爭。”

在這種悲嘆調子的驅使下，我們不嫌麻煩地將巴黎證券市場10月份的情況跟前一個月的情況作了一番比較，我們調查研究的結果可由下表看出：

	9月30日	10月31日	漲	跌
三厘無期公債	67 法郎 50 生丁	66 法郎 70 生丁	—	80 生丁
四厘五無期公債	90 法郎	91 法郎	1 法郎	—
法蘭西銀行	4 010 法郎	3 850 法郎	—	160 法郎
Crédit Foncier	600 法郎	585 法郎	—	15 法郎
Crédit Mobilier	1 552 法郎	1 372 法郎	—	180 法郎

	9月30日	10月31日	漲	跌
奥尔良铁路	1 267 法郎	1 241 法郎	—	26 法郎
北部铁路	950 法郎	941 法郎	—	9 法郎
东部铁路	877 法郎	865 法郎	—	12 法郎
巴黎—里昂铁路	1 265 法郎	1 267 法郎	2 法郎	—
地中海铁路	1 750 法郎	1 652 法郎	—	98 法郎
中央大铁路	610 法郎	603 法郎	—	7 法郎

从9月至10月31日,各公司股票行市跌价的情形如下:

Gas Paris Company .....	30 法郎
Union des Gaz .....	35 法郎
Lits Militaires .....	27 1/2 法郎
Docks Napoléoniens .....	8 1/2 法郎
Compagnie Maritime.....	40 法郎
Palais d'Industrie .....	5 法郎
Omnibus company .....	35 法郎
Messageries Impériales .....	50 法郎

再沒有比巴黎的波拿巴派報紙竭力用以解釋交易所股票不断跌价的方法更加巧妙的了。且举日拉丹先生的“新聞报”为例。这家報紙說道:

“投机家仍然不願意拋棄他們关于有价证券会跌价的信念。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价格經常忽起忽落,使人們把这种股票看得非常危險,以致許多投机家不敢碰它們,而只限于做«primes»〔“貼水”〕交易,以期能事先减少蒙受損失的風險。”

法兰西銀行为了防止或者至少是为了延緩停止兌現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已經开始对工商階級发生强烈的影响。目前在 bona fide〔真正的〕商业界和工业界,已經营业的投机性股份公司和新計劃建立的投机性股份公司之間,的确进行着一場真正的激战;它們都在爭相夺取这个国家的游資。这种斗争的必然結果是:即使

不存在法兰西銀行、沒有任何金銀外流現象，也一定会使利息提高、工业各部門的利潤下降以及各种有价证券貶值。只要看一看法国铁路网的发展情况，就能了解到，撇开一切国外的影响不談，这种对法国游資的压力一定会日益增加。我們要向讀者提供的事实，是由“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問題报”<sup>77</sup>发表的，这家报纸也和这个国家的其他报刊一样，只能发表波拿巴政府許可发表的东西。总的說来，特許修建的铁路总共长达 5 584 英里，其中已經建成和通車的只有 2 884 英里。因此，目前正在修建或即将动工的还有 2 700 英里。但是还不止于此。政府正在修建比利牛斯山区的几条綫路，并且已經下令修建土魯斯至貝云、阿仁至塔布、蒙德馬松至特拉貝斯坦的新綫路——这些綫路全长超过 900 英里。实际上，法国正在修建的铁路甚至比它已經拥有的还要多。用于法国旧的铁路网的費用估計为 3 亿美元，但是它的修建拖了很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曾目睹过三届政府的上台和下台，——而現在特許修建的綫路至迟必須在六年內建成，并且在商业周期最危急的阶段开始通車。陷于財政困难的公司都紛紛要求政府准許它們通过发行新的股票和債券来筹集資金。政府知道这样做只能使市場上旧有的证券更加貶值，同时使交易所的业务更加混乱，因此不敢让步。而另一方面，錢又必須弄到手；停止工程，不仅将意味着破产，而且还将意味着革命。

当国内为了开办和維持新企业而对資本的需求如此增长不已的时候，外国企业对法国資本的吸收絲毫沒有减少。誰都知道，法国資本家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承担了大量义务，而且 *Crédit Mobilier* 还在給他們招攬新的义务。尤其是西班牙，現在正給法国增加困难，因为那里的白銀奇缺，以致巴塞羅納的厂主感

到很难支付工人的工資。

至于 *Crédit Mobilier*, 我們已經說过<sup>①</sup>, 这个机构的意图与它的名称根本不符。它的意图是使資本固定下来, 而不是使它流通<sup>②</sup>。它所要流通的只不过是所有权而已。的确, 它所創办的各公司的股票完全是流动性质的, 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資本却陷住不动。*Crédit Mobilier* 的全部秘訣就在于把資本吸引到工业企业里, 使它陷在那里不动, 然后以出卖代表这种資本的股票来进行投机。只要 *Crédit Mobilier* 的董事們能够从新股票的初次发行中获得貼水, 他們当然就能够以斯多噶式的冷漠态度来看待金融市場的普遍緊張、股票持有者的最終命运以及現有各公司的困难。这也就說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 虽然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在交易所不断跌价, 但是它的活动却不断向全欧洲扩展。

除了金融市場的普遍緊張以外,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影响着法国的工业。里昂有一大批工厂由于生絲缺貨和价錢昂貴而停工。同样的原因使牟罗茲和卢昂的工业陷于停頓。在那里, 高昂的棉价使紗价猛漲, 然而紡織品却滞銷, 工厂主不能按过去的条件成交。其結果是增加了工人的苦难和不满——特別是在里昂和法国南部, 那里普遍存在着憤激情緒, 这只有 1847 年危机所带来的那种情緒才能与它相比。

現在讓我們把話題从交易所、铁路、商业和工业轉向法国的农业。最近公布的法国关税报告书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實: 今年的歉收比“通报”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1855 年 9 月进口的谷物为

① 見本卷第 35—37 頁。——編者注

② 双关語: «Mobilier» 的意思是“可以动的”; «to mobilize» 的意思是“将……变成活动的”, “使……流通起来”。——編者注



270 146 公担，而 1856 年 9 月却进口了 963 616 公担，这比以歉收聞名的 1855 年的 9 月的进口数量还超过 693 470 公担。然而，如果认为促使法国明显地从谷物出口国变成谷物进口国的原因仅仅是水災、恶劣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現象，那将是錯誤的。从未达到高度发展的法国农业，在現存政权下确实是衰退了。一方面，我們看到稅收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劳动者因战争<sup>①</sup>而暂时离开了土地，因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而长期离开了土地），同时資本被愈来愈多地从农业中抽去經營投机事业。所謂拿破侖的信貸民主化，实际上不过是投机买卖的普遍化。Crédit Mobilier 提供給資產階級和上等階級的东西，帝国貸款把它提供給了农民。帝国貸款把交易所搬到农民的茅屋里，榨干了他們的私人积蓄，刮走了从前用于改进农业的小額資本。

因此，法国农业的严重困难既是自然災害的結果，也是目前政治制度的产物。如果說小农由于低价而受到的損失沒有英国大农场主所受到的那样大，那末另一方面，他們却由于产品缺乏而受到損失，这对英国大农场主說来則往往成为利潤的来源。由此便产生他們那表现为纵火事件的不滿情緒，这种纵火事件极其頻繁，尽管法国報紙奉皇帝的命令从不加以报道。如果农民在二月革命以后意識到，强加于他們身上的 45 生丁的新稅是为了維持巴黎的国家工厂，因而感到憤慨<sup>78</sup>，那末，現在的农民看到，對他們的枯竭資源課征捐稅是为了让巴黎人能按照低于成本的价錢购买面包，就更加憤慨不已了。如果考虑到拿破侖归根到底正是农民投票选举出来的，那末，这个階級現在所表現的革命情緒就使波拿巴王朝

<sup>①</sup> 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的胜算完全改观了。这个王朝为了緩和和防止貧苦农民提出带有威胁性的要求，現在已經不得不訴諸可怜的权宜之計，这可以由各省省长在“鼓励”举办慈善事业的公文中所用的措辞看出来。例如，薩尔特省省长給他手下的专区区长們这样写道：

“务祈以全副身心致力于作为行政工作的最崇高职责之一的任务，即为那些需要資助和就业的公民找到提供資助和工作的手段，你們这样做将有助于維持社会安宁。請勿担心慈善事业的財源可能已經枯竭或者私人錢囊已为近几年的捐献——不論这些捐献的数目多大——掏空。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最近获得了大量利潤，他們特別关心保持乡村的安宁，因此会了解，捐献不仅是他們的义务，而且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

如果在上述一切引起不滿的原因之外，再加上巴黎的房荒和粮荒、首都零售貿易的困难以及巴黎工业各部門的罢工，我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受压制的出版自由会突然以反叛标語从房屋的墙壁上冲了出来。我們从巴黎一位可靠的通訊者那里接到一封私人信件，其中写道，从10月1日至12日，至少发生了900起逮捕事件。这些逮捕事件的起因有一些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是表明政府惶恐不安的惊人标志。有一回，一个据說是“在交易所做生意”的人，由于說了一句“他认为克里木战争不过是白白毀掉許多人命和糟蹋許多錢財”而被捕；另一回，一个商人由于說“生意跟政府一样糟糕”而被捕；有一个人被捕是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張关于大卫·丹热和大学生們的歌詞<sup>79</sup>；政府的一个四等文官被捕是因为印行了关于財政危机的傳单；有一个裁縫被捕是因为打听了自己几个朋友是否真的像他所听說的那样遭到逮捕；最后，有一个工人被捕是因为跟自己一个当宪兵的同乡談到食品价格昂貴，而宪兵把工人的話說成是反对政府的言論。

鉴于这一切事实,法国的商业和工业恐怕很难避免崩潰,这种崩潰将引起比較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将不仅对欧洲的而且对美洲的信贷与商务的稳定性发生最严重的影响。Crédit Mobilier 現在跟欧洲許多大銀行一起着手进行的对俄国铁路建筑的大規模投机,只能加快向这一深淵的急速奔馳。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 7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6 年 11 月 22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866 号

---

---

## 卡·馬克思

### \*欧洲的危机

根据本星期抵达的两只輪船从欧洲带来的消息来看，为大洋两岸人們本能地預感到的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命運打击——投机活动和有价証券买卖的彻底垮台，大概要推迟到将来了。但是，这种延期决不意味着垮台可以避免。相反，目前金融危机具有的慢性病似的性质，不过預示着它会有更殘酷、更有害的結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欧洲現在就好像一个瀕于破产的人，不得不照旧进行已經使他傾家蕩产的一切事务，同时又采取各种冒險手段，希望借以防止或摆脱最后的可怕打击。人們紛紛要求支付公司股息，而这些公司大多数只有虛名。大宗現金投入了投机企业，从那里就再也抽不出来，同时高利率——目前英格兰銀行为7%——好像是在无情地宣布审判即将到来。

即使在目前所进行的金融騙术得到极大成效的情况下，大陆上无数証券的投机活动也不能不很快垮台。仅在萊茵普魯士就有72个新的采矿公司，其股份資本为79 797 333塔勒。正好是現在，奥地利的Crédit Mobilier，或者确切些說，在奥地利的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由于企图按照自己的第二要求获得支付，正經受着巨大困难，因为奥地利政府的措施使恢复現金支付一事处于瘫痪状态。购买铁路、矿山所支付的款項，按照合同規定，应向御庫

交納硬幣，這一事實表明，到 1858 年 2 月為止，Crédit Mobilier 的資金每月將要虧損 100 萬美元以上。另一方面，法國鐵路承包商非常缺乏現款，以致中央大鐵路不得不解雇牟羅茲段的 500 名職員和 15 000 名工人，而里昂一日內瓦公司只好縮減或暫時完全停止自己的業務。由於透露了這些事實，“比利時獨立報”<sup>80</sup> 在法國國會兩次遭到沒收。在法國政府採取這種絕不容許任何揭露法國工商業的真實情況的行動的條件下，注意一下檢察長的助手佩蒂先生在巴黎法院審判開始時脫口而出的下面一段話是很有意思的：

“看一看統計，你們就會得到關於商業目前趨向的一系列有意思的資料。破產數字逐年增長。1851 年為 2 305，1852 年為 2 478，1853 年為 2 671，而 1854 年為 3 691。這種增長情況無論在欺詐破產和一般破產方面都是一樣。前者數字從 1851 年起增長了 66%，而後者增長了 100%。至於在賣出的商品的性質上、質量和數量上的欺詐和使用假尺假秤的犯罪行為，其數字已經增長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1851 年審理了 1 717 起這種案件，1852 年——3 763 起，1853 年——7 074 起，而 1854 年則是 7 831 起。”

誠然，不列顛報刊不顧大陸上的這類現象，硬要我們相信危机的最壞時期已經過去，但是，我們要想為此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明是徒勞無益的。無論從英格蘭銀行把貼現率提高到 7%，或是從法蘭西銀行最近的報告書中，我們都找不到證明。而從法蘭西銀行的報告書中，不僅可以看出報告書是偽造的，而且可以看出，儘管對債券、貸款、期票貼現和發行銀行券有極嚴格的限制，法蘭西銀行還是無力阻止貴金屬的流失，或非加黃金貼水不可。無論那里情況怎樣，十分明顯，法國政府決不抱着它力圖在國內外散布的那種樂觀看法。在巴黎已知道，最近六個星期以來，皇帝不管遭到什麼樣的財政損失，也不管損失多大，都要把無期公債保持在 66% 以上，因為他不只是相信，而且堅決相信，無期公債下降到 66% 以

下就意味着敲起帝国的丧钟。可见，在这方面法兰西帝国与罗马帝国不同，因为一个怕灭亡于异族的进攻，而另一个却怕灭亡于证券投机商人的退却<sup>81</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 21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2 月 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87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奧地利的海外貿易

可以說，奧地利的海外貿易，是从威尼斯和隶属于它的亚得利亚沿海地区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約（这个条約后来又为呂內維尔和約所确定）<sup>82</sup> 初次划入奥地利帝国时起开始的。所以，拿破侖是奥地利这部分貿易的真正奠基者。固然，拿破侖一看出自己以此給了奥地利多少好处，就先用普勒斯堡条約，后来又在 1809 年簽訂維也納和約时把这一让步收了回去<sup>83</sup>。但是，既已被引上正确道路的奥地利，利用了头一次到手的合适时机，通过 1815 年的条約<sup>84</sup> 恢复了它在亚得利亚海区域的优势。这部分貿易的中心是的里雅斯特；从下表就可以看出它——甚至在較早的时期——比奥地利的所有其他港口所占的优势：

	港口：	阜 姆	的 里 雅 特 斯	威 尼 斯	其他港口	总 計
		(单 位： 弗 罗 倫)				
1838 年	进口	200 000	32 200 000	9 000 000	8 000 000	49 400 000
	出口	1 700 000	14 400 000	5 300 000	2 000 000	23 400 000
1841 年	进口	200 000	22 300 000	8 500 000	5 300 000	36 300 000
	出口	1 600 000	11 200 000	3 100 000	1 900 000	17 800 000
1842 年	进口	200 000	24 900 000	11 500 000	5 100 000	41 700 000
	出口	1 300 000	11 900 000	3 400 000	2 600 000	19 200 000

1839年，威尼斯进口总值同的里雅斯特进口总值之比是1：2.84，它們的出口总值之比是1：3.8。同一年，二者船舶进港数的比例是1：4。目前，的里雅斯特所达到的优势，已經压倒包括威尼斯在內的奧地利的的所有其他港口。但是，的里雅斯特在亚得利亚海占据了威尼斯地位的这一事实，不应归功于奧地利政府的特别保护，也不应归功于奧地利的劳埃德<sup>85</sup>的有效的的工作。的里亚斯特本是一个无人知曉的峭壁重叠的海灣，十八世紀初还只有少数漁民居住，到1814年法国軍隊快撤出伊斯的利亚时，变成了有23 000居民的商港，而它的貿易在1815年就超过威尼斯两倍。1832年，即成立奧地利的劳埃德前一年，的里雅斯特的居民超过了5万人；在劳埃德的作用还未必能說有多大的时候，的里雅斯特就已經在对土耳其貿易方面占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而在对埃及貿易方面則占第一位。这从1835年至1839年期間士麦那的进出口統計表中可以看出：

	披亚斯特 <sup>①</sup>	披亚斯特
英国.....	126 313 146	44 618 032
的里雅斯特.....	93 500 456	52 477 756
美国.....	57 329 165	46 608 320

从1837年埃及的进出口統計数字也可以看出：

	法郎	法郎
的里雅斯特.....	13 858 000	14 532 000
土耳其.....	12 661 000	12 150 000
法国.....	10 702 000	11 703 000
英国和馬尔他.....	15 158 000	5 404 000

① 埃及的輔币名，100披亚斯特 = 1埃鎊。——譯者注



成为亚得利亚海航海事业复兴的搖籃的是的里雅斯特，而不是威尼斯，这是为什么呢？威尼斯是一个屬於回忆的城市；而的里雅斯特則像美国一样，它的优点是沒有任何过去的包袱。它是由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希腊、阿尔明尼亚和犹太族的各式各样的商业冒險家建設起来的，它不像礁湖之城那样为傳統所束縛。例如，威尼斯的谷物貿易在十八世紀还老是抱住它旧有的关系不放，而的里雅斯特却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命运同敖德薩这个新出現的明星結合在一起，因此，到十九世紀初就已經把自己的竞争者威尼斯从地中海的谷物貿易中完全排挤出去了。十五世紀末由于发现繞道非洲的航綫而給古老的意大利諸商业共和国带来的致命打击，又由拿破侖的大陆关稅制度以縮小的規模重复了一次。这一次把威尼斯的貿易彻底消灭了。威尼斯的資本家由于失去了从对这里的衰落的海上貿易投資获取收益的任何希望，就自然而然地把他們的資本移往亚得利亚海的对岸，因为在那里，的里雅斯特的陆上貿易这时正有加倍发展的前景。威尼斯便这样亲自养大了的里雅斯特——这是所有海上霸主的共同命运。荷兰这样为英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英国又这样造成了美国的强盛。

的里雅斯特在并入奥地利帝国之后，立即取得了完全不同于威尼斯所曾經占有过的那种地位。的里雅斯特为它背后的那些广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貿易提供了一个天然出口；威尼斯則一向只是亚得利亚海上的一個独占世界海上貿易的孤立而偏僻的港口；而它的这种独占，又是建立在那些沒有認識到自身有利条件的国家的落后状态的基础上的。因此，的里雅斯特的繁荣，除去目前在奥地利統治下的那一批国家广大土地上的生产力和交通運輸的发展程度这一条件外，不受任何限制。的里雅斯特的另一个优越性就

是它紧靠亚得利亚海东岸，这給它提供了一个几乎是威尼斯人聞所未聞的沿海貿易基地，同时东岸又是出产威尼斯从来不善于充分利用的勇敢水手的地方。威尼斯当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沒落，現在，的里雅斯特的优越条件則随着奥地利对土耳其的优势的增长而增加。威尼斯貿易的发展，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期，也因东方貿易之被分割而受到阻碍，而这种分割完全是由于政治原因。一方面，曾有一条同威尼斯的海上貿易几乎从来沒有任何联系的多瑙河貿易綫；另一方面，当威尼斯在天主教国王庇护下壟断着摩里亚、塞浦路斯、埃及、小亚細亚等地的貿易的时候，热那亚人曾在正教皇帝的庇护下几乎壟断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貿易。的里雅斯特第一次把东方貿易的这两大干綫同多瑙河貿易联在一起。十五世紀末，威尼斯好像在地理上改变了位置。随着繞道好望角的航路的发现，亚洲貿易的中心起初轉移到里斯本，然后轉移到荷兰，最后轉移到英国，而威尼斯也就跟着失去与当时的亚洲貿易中心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为邻的优越性了。威尼斯所失去的优越性，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現時大約将为的里雅斯特所获。的里雅斯特的商会不仅参加了法国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而且也派遣了自己的代理人去調查紅海和印度洋沿岸，以便发展預定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貿易活动。一旦运河开通，的里雅斯特无疑将以印度商品供应整个东欧；它同北回归綫的距离将和它現在同直布罗陀的距离一样远近，它的船舶將經 5 600 浬的海路而到达巽他海峡。

以上我們大略地描画了的里雅斯特的貿易发展前景，現在我們引证下表作为补充，这个表說明了最近十年中該港口貿易的发展情况：

年份	船只	吨数	年份	船只	吨数
1846.....	16 782	985 514	1851.....	24 101	1 408 802
1847.....	17 321	1 007 330	1852.....	27 931	1 556 652
1848.....	17 812	926 815	1853.....	29 317	1 675 886
1849.....	20 553	1 269 258	1854.....	26 556	1 730 910
1850.....	21 124	1 323 796	1855.....	21 081	1 489 197

如果把这时期的最初三年的平均数字同最后三年的平均数字比較一下(973 220 对 1 631 664), 就会发现, 这样一个短时间的增长比例是 68 比 100。馬賽远沒有达到这样迅速的发展。此外, 的里雅斯特繁荣的基础比較巩固, 因为它是建立在扩大同奥地利本国港口以及外国港口的貿易往来之上的。例如, 从 1846 年至 1848 年的对内貿易量平均每年达 416 709 吨; 从 1853 年至 1855 年增长到平均每年 854 753 吨, 亦即增长了一倍多。从 1850 年至 1855 年为止进出的里雅斯特港的奥地利船只总吨数为 6 206 316 吨, 外国船只总吨数为 2 981 928 吨。同一时期, 同希腊、埃及、东方以及黑海沿岸各国的貿易量从平均每年 257 741 吨增长到平均每年 496 394 吨。

尽管如此, 的里雅斯特的貿易和航运事业还远沒有达到这样一种水平, 即貿易上的周轉具备有一定的固定形式而且是国内各种資源充分开发的自然結果。这一点, 只需看一下奥地利帝国的經濟状况, 它的不够发达的国内交通, 它那很大一部分还身着羊皮而且根本不知道文化生活需求的居民, 就可以看出。只要奥地利本国交通的发展达到哪怕是像德意志各邦已經达到的水平, 的里雅斯特的貿易就会迅速而有力地为自己鋪平通向帝国心臟的道路。从的里雅斯特到維也納的铁路連同从威利到佩斯的支綫的建成, 将引起奥地利貿易的全盘变革, 从这场变革获益最大的中心城

市莫过于的里雅斯特。这条铁路的運轉量无疑一开始就会比馬賽的運轉量大。然而,这种運轉量可能达到的規模,只有注意到下述情况才能判定:以亚得利亚海为唯一出口的各国共有 30 966 000 人口,即等于 1821 年法国的人口;的里雅斯特港将为之服务的地区广达 60 398 000 公頃,即比法国領土还要大 700 万公頃。因此,的里雅斯特在最近的将来,就注定要起馬賽、波尔多、南特和哈佛尔加在一起对法国所起的那种作用。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底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1 月 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90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奧地利的海外貿易

在前一篇文章里<sup>①</sup>，我們探討了使亞得利亞海的貿易在的里雅斯特興盛起來的自然環境。這裡的貿易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奧地利的勞埃德——一家由英國人創辦、但從1836年起就掌握的里亞斯特的資本家手裡的輪船公司——活動的結果。最初，勞埃德只有一艘輪船，每周在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之間開航一次。不久就改成了每日一次。逐漸地，勞埃德的輪船就包攬了沿伊斯的利亞和達爾馬威亞海岸綫上的羅文尼奧、阜姆、皮腊諾、薩拉和腊古扎的全部貿易。接着納入這家公司活動範圍之內的是羅馬尼亞，後來又有阿爾巴尼亞、伊皮羅斯和希臘。在阿希佩拉哥、薩羅尼加、士麥那、貝魯特、托列邁達和亞歷山大里亞等地要求把它們納入該公司所計劃的運輸網以前，勞埃德的船隻一直沒有離開過亞得里亞海。最後，勞埃德的輪船終於進入黑海，當着土耳其和俄國的面佔據了君士坦丁堡同西諾普、特拉比曾德、瓦爾那、布來洛夫和加拉茲等地的交通綫。這樣，原來僅為服務於奧地利的亞得利亞海岸而組織的公司，漸漸地擴展到了地中海，並且在把黑海穩穩掌握到手以後，看來只等蘇伊士運河掘通就要進入紅海和印

---

① 見本卷第90—95頁。——編者注

度洋。

勞埃德最初的資本是 100 萬弗羅倫，後來由於不斷地招募新股和借債，它的資本增加到 1 300 萬弗羅倫。1836 年以來的資本周轉和使用情況在董事們最近的一次報告里表述如下：

	1836—1837 年	1853—1854 年
資本.....	1 000 000 弗羅倫	8 000 000 弗羅倫
輪船數目.....	7	47
馬力.....	630	7 990
噸數.....	1 944	23 665
船隻總值.....	798 824 弗羅倫	8 010 000 弗羅倫
出航次數.....	87	1 465
航行哩數.....	43 652	776 415
載運旅客人數.....	7 967	331 688
載運貴金屬值.....	3 934 269 弗羅倫	59 523 125 弗羅倫
載運信件與快訊.....	35 205	748 930
載運包裹.....	5 752	565 508
總支出.....	232 267 弗羅倫	3 611 156 弗羅倫
十七年中公司的全部支出(包括支付股息).....		25 147 403 弗羅倫
全部收入.....		26 032 452 弗羅倫
收入超過支出.....		885 049 弗羅倫

从上表可以看出，勞埃德本身就是個非常重要的商業企業，所以它對它的船隻所到之處的當地工商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按每一奧地利担貨物的價值為 300 弗羅倫、每個旅客行李的價值為 10 弗羅倫計算，勞埃德在 1836 年到 1853 年間共運輸：

商品價值.....	1 255 219 200 弗羅倫
行李價值.....	84 847 930 弗羅倫
貨幣和貴金屬價值.....	461 113 767 弗羅倫
總 值.....	1 801 180 897 弗羅倫

一位法国作者写道：“无疑，这家商行多年来对东方事务所起的虽然不大但是从不间断的作用，至少和奥地利外交所起的作用同样有效，而且要有益得多。”

亚得利亚海上貿易的复兴和輪船航运业的发展，迟早要使从威尼斯衰落时起消失了的亚得利亚海軍重新建立起来。拿破侖曾独出心裁地想要不等海上貿易恢复就去建立这样一支海軍；他在安特卫普和威尼斯同时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既然能够沒有人民的支持而建立起了陆軍，他就毫不怀疑他能够沒有商船队的依靠而建立起海軍。但是，不仅这个計劃本身无法实现，而且拿破侖还遇上了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当地所特有的一些困难。在他把最能干的工程师派到威尼斯以后，在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已經建成，漂浮matériel〔器械〕已經修好，过去的造船厂已經重新恢复工作以后，突然发现：海战和航海方面的技术进步已使威尼斯海港变得毫无用处，正如新的貿易綫已注定它的貿易和航运事业毫无成果一样。这时才明白：无论威尼斯海港用来停泊古老的帆船是多么便利，但对現代的战列舰說来它的水却太淺了，甚至巡洋舰只有先把大炮卸下才能进港，而且还必須在刮南風和大漲潮的时候。而对一个現代海軍港口說来，最要紧的是，必須能让舰只随时入港；不論为了进攻或防御，其深度和面积必須足以容納一支完整的舰队。除此以外，波拿巴发现他还犯了另一个錯誤：按照簽訂于康波福米奧和呂內維爾的条約，他把威尼斯同亚得利亚海东岸割开了，从而失去了舰队人員补充的来源。他曾在伊宗察河口到腊万納这一带搜罗慣于航海的人員，但是枉費心机，因为在威尼斯的船夫和礁湖的漁民（他們既胆小而且人数不多）中間根本不可能招募到任何够条件的水兵。只有这个时候，拿破侖才看出威尼斯人早在十世紀时

就已經發現了的道理，即亞得利亞海的統治權只能屬於占有亞得利亞海东岸的人。他明白了他的康波福米奧條約和呂內維爾條約是巨大的失策，因為這兩個條約使他把亞得利亞海的慣于航海的居民劃給了奧地利，而給自己只留下了一個失去意義的海港的虛名 (*magni nominis umbram*<sup>①</sup>)。為了補救過去鑄成的大錯，他通過後來在普勒斯堡和維也納簽訂的條約攫取了伊斯的利亞和達爾馬威亞。

很早以前，斯特拉本就指出過<sup>86</sup>：亞得利亞海的意大利海岸完全沒有海灣和海港，而在它對面的伊利里亞海岸卻布滿着優良的港口。的確，我們看到，在羅馬內戰期間，龐培在伊皮羅斯和伊利里亞海岸輕而易舉地就組成了龐大的艦隊，而凱撒在意大利海岸上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搜集到為數不多的船隻來一批一批地運輸軍隊。伊斯的利亞和達爾馬威亞海岸由於有很深的海灣，有荒野的岩島，有大量的淺灘和優越的天然港，便成了培育身體強壯、大膽無畏、受過幾乎每天都在亞得利亞海上咆哮的大風浪鍛煉的優秀水手的頭等地方。這裡海上的大禍害 *Borà*<sup>②</sup> 總是來得非常突然，它掀起旋風式的風暴來襲擊水手，只有最有鍛煉的水手才能在甲板上呆得住。這種風暴有時一連不停地發作幾個星期，受害最大的地區正好在卡塔羅港和伊斯的利亞南端之間。但是，達爾馬威亞人由於從小就習慣於同這種大風暴作鬥爭，所以在它的猛烈襲擊下他們只能鍛煉得越發堅強，而把其他海洋上的一般風暴完全不放在眼裡。這樣，空氣、陸地和海洋就共同培育出了這一帶海岸上的堅強而沉着的水手。

① 一個偉大名字的影子。——編者注

② 布拉風(強烈的東北風)。——編者注



西斯蒙第曾說过，制造絲綢对倫巴第的农民說来是这样自然，正像吐絲之对于蚕一样。同样，对达尔馬威亚人說来，海上生活是这样自然，就像对于海鳥一样。正像綠林豪杰是古条頓族詩歌的主題一样，海上英雄成了他們民歌的主題。达尔馬威亚人至今仍念念不忘烏斯考克人<sup>87</sup>东征西討的功績：这些人曾在一个半世紀当中使威尼斯和土耳其的正規軍隊不敢輕举妄动。只是在1617年土耳其和奥地利簽訂条約以后他們才停止了活动，可是这以前烏斯考克人是享有皇帝廕庇之便的。烏斯考克人的历史只有第聶伯河畔的哥薩克人的历史可与之相比：前者是从土耳其被赶出去的，后者是从波兰被赶出去的；前者横行于亚得利亚海上，后者在黑海大逞雄威；前者最初受到奥地利的秘密支持，但后来却被奥地利消灭，对于后者，俄国起了同样的作用。海軍上将埃梅里奥的地中海战舰的达尔馬威亚水手是为拿破侖所贊賞的。所以說，毫無疑問，亚得利亚海东岸具备第一流海軍所需要的兵源。这些人所唯一不足的就是紀律。拿破侖根据1813年的人口調查得知这海岸上共有水手43 500人：

的里雅斯特·····	12 000
阜姆·····	6 000
薩拉·····	9 500
斯普利特·····	5 000
腊古扎·····	8 500
卡塔罗·····	2 500
<hr/>	
总 計·····	43 500
現时他們的人数至少應該是·····	55 000

拿破侖为建立亚得利亚海舰队找到人員以后，就去寻找港口。

伊利里亞各省是根據 1809 年維也納條約被他正式拿到手的，但是從奧斯特利茨戰役以來這些地方就被法軍佔據着，拿破侖利用戰爭狀態為他打算在和平時期要大規模修建的工程進行了準備。1806 年，博丹-博普雷先生奉命率領一批法國海軍的工程師和水文測量員去勘察伊斯的利亞和達爾馬威亞海岸，為計劃在亞得利亞海上建立的海軍基地選擇一個最適宜的地点。他們考察了整個海岸，最後工程師們看中了位於伊斯的利亞半島南端的波拉港灣。威尼斯人只想把自己的海軍保持在威尼斯本地，因此不僅輕視波拉港灣，而且還極力散布風聲，說這個港灣有淺灘，軍艦不能開進。但是博普雷先生查明該地沒有任何淺灘，波拉符合一個現代軍港的一切要求。在各個時代它都作過亞得利亞海上的海軍駐地。它在羅馬人遠征伊利里亞和班諾尼亞的時期是羅馬人的海軍行動中心並且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經常性的海軍基地。它在不同時期被熱那亞人、威尼斯人、最後還被烏斯考克人佔領過。波拉港灣的各個部分都既深且寬，海上有島嶼為屏障，背後有俯臨全港的山岩為依靠。這裡唯一的缺陷就是氣候有害於健康和熱病流行，而這個缺陷，據博丹-博普雷先生斷定<sup>88</sup>，採用當地至今尚未見過的排水設施就可以克服。

奧地利人遲遲不能習慣他們在成為海軍強國的想法。直到最近，他們的海軍署在他們自己眼中還只不過是陸軍的一個部門而已。陸軍上校的軍銜等於海軍上校的軍銜；陸軍中校等於海軍巡洋艦艦長；陸軍少校等於海防艦艦長。對奧地利人說來，軍銜表上的這種相等似乎就保證了陸軍軍人和海軍軍人在職務上的真正相等。他們認為他們找到了培養一名海軍士官的最好辦法，那就是先讓他成為一個驃騎兵的旗手。海軍兵員的補充辦法和陸軍相

同；唯一不同之点只是，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馬威亚两省专门為海軍提供兵員。服役期限也一样，即無論在陆上或海上都是八年。

陸軍和海軍分开，也像奧地利現代的一切进步一样，是 1848 年革命的結果。奧地利人絲毫也沒有从拿破侖吸取教訓；到 1848 年为止，威尼斯一直是奧地利的唯一的軍火庫。奧地利人就沒有考虑过威尼斯海港的缺点，因为事实上他們並沒有現代化的海軍。他們的全部海軍只包括：6 艘巡洋艦、5 艘海防艦、7 艘双桅艦、6 艘单桅艦、16 艘輪船和 36 艘軍用艇，共有大炮 850 門。作为对意大利人鬧革命的懲罰，奧地利人把海軍学校、了望台、水文測量局、漂浮器械和炮場由威尼斯移到了的里雅斯特。造船厂和器材庫則留在原处；因为官僚的报复心理，海軍部門就这样被分置在两地。但是这样奧地利並沒有懲罰了威尼斯，而只是把自己的海軍基地的这两部分都削弱了。奧地利政府只是逐渐发现，無論的里雅斯特是多么出色的商港，但是用它作海軍基地却是不合适的。最后奧地利政府才想起了拿破侖在亚得利亚海上所受到的教訓，而把波拉作為他們的海軍管理的中心。海軍总部迁到波拉后的头几年時間，他們不是用来修建造船厂，而是完全按照奧地利的办法：用来修建营房。波拉防御系統的基础，是从港灣入口处的島屿上組織交叉火力，跟一連串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配合起来，这些塔楼的作用是阻止敌艦对港口进行轰击。除了战略上的优点以外，波拉还具备一个作为优良港口所必备的条件：它能够保证一支龐大海軍的物資供应。伊斯的利亚的橡树林按质量比那不勒斯的毫不逊色；卡尔尼奥拉、克倫地亚和施梯里亚有用不尽的松木林，它們現在已經成了的里雅斯特的主要出口項目；施梯里亚有丰富的铁；昂科納的大麻經波拉向外运出是再便当沒有的了；煤迄今仍要从英

国运来，但是达尔馬威亚的塞貝尼科地区的煤矿已开始生产质量更好的煤了，而一俟維也納至的里雅斯特的铁路通車，就能够从塞美林运到质量最好的煤。伊斯的利亚的一切农产品，由于是在白堊土质上生长出来的，所以都能耐得住长途运输。植物油非常丰富；匈牙利的谷物向这里供应非常方便；从多瑙河流域可以运来大量的猪肉。这些猪肉现在都销售于加拉茲和汉堡，但是铁路将会把它运到的里雅斯特和波拉。

所有这些恢复亚得利亚海的海軍威力的优越条件只遇到一个障碍，那就是奥地利本身。假如奥地利凭着它现有的組織和现有的政府能够在亚得利亚海上建立一支强大的商业和軍事的舰队，那它就要推翻全部历史傳統，——按照历史傳統，海上势力的强大永远是同自由結合在一起的。但是，推翻傳統則意味着推翻奥地利自身。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底

載于 1857 年 8 月 4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08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霍亨索倫王朝的神權

目前歐洲所關心的只有一個重大問題——紐沙特爾問題<sup>89</sup>。至少普魯士報刊是這樣認為。固然，紐沙特爾公國加上瓦蘭壬伯爵領地，從數學上來看，是相當小的數字——14 平方德里。可是，正如柏林的御用哲學家們所說，通常使事物偉大或渺小、崇高或可笑的，是質而不是量。對他們說來，紐沙特爾問題是革命和神權之間的永恒的爭論，是一個很少受地理面積影響的矛盾，正像萬有引力定律很少受太陽和網球的差別影響一樣。

讓我們來探討一下，霍亨索倫王朝稱之為他們的神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關於我們現在所談的問題，他們的依據是 1852 年 5 月 24 日於倫敦簽訂的一項議定書。根據這項議定書，法國、英國和俄國的全權代表

“承認按照維也納條約第二十三條、第七十五條的規定屬於普魯士國王的管治紐沙特爾公國和瓦蘭壬伯爵領地的各項權利，此等權利從 1815 年至 1848 年曾與按照同一條約第七十三條賦予瑞士的權利同時並行。”

這一“外交干涉”對普魯士國王管治紐沙特爾的神權的承認，只不過是在維也納條約規定的限度內。維也納條約所根據的，又是普魯士在 1707 年所取得的權利。而 1707 年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紐沙特爾公國和瓦蘭壬伯爵領地，在中世紀時屬於勃艮第五國，在大胆查理失敗<sup>90</sup>以後，成了瑞士聯邦的盟國，後來雖屢易封建“宗主”，却始終處於伯爾尼直接保護下的盟國地位，直到維也納條約把它們變成瑞士聯邦的成員為止。管治紐沙特爾公國的宗主权最初為夏龍-奧倫治世家所得，後來由於瑞士的干涉，轉入朗格維爾公爵家族之手，最後，當這個家族的男系人物全都死亡後，則傳給了公爵的姊妹<sup>①</sup>，寡居的奈穆爾公爵夫人。在公爵夫人接收這些領地後，英國國王兼納騷-奧倫治公爵威廉三世提出抗議，並把他想取得紐沙特爾和瓦蘭壬的權利讓給他的堂弟，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但這個決定在威廉三世在世時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奈穆爾公爵夫人瑪麗死後，弗里德里希一世提出了他的要求，但是由於又出現了十四位繼承者，所以他聰明地提出由紐沙特爾和瓦蘭壬的等級會議來解決這場爭論，並且事先買通評議委員來取得對他有利的裁決。於是，普魯士國王靠行賄當上了紐沙特爾公爵和瓦蘭壬伯爵。他的這兩個爵位曾被法國革命所取消，但維也納條約又給恢復了，後來又再次為1848年革命所取消。為了反對人民的革命權利，他訴之于霍亨索倫王朝的神權，但看起來，這個神權不過是賄賂的神權。

瑣碎細小是一切封建沖突的特點。但是，也必須注意到它們之間存在着很大的區別。法國國王成功地取代自己的諸侯時所使用的不可勝數的小沖突、陰謀詭計、背信棄義等手法，無疑將永遠成為歷史學家所喜愛的題目，因為它們是一個大國形成的里程碑。另一方面，講述某個諸侯如何為自身利益割去德意志帝國的相當

<sup>①</sup> 1857年1月9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公爵的姊妹”作“最後一個公爵的姊妹”。——編者注

大一部分領地，却是完全无益和乏味的題目，除非有某种特殊情况，像奥地利历史上所有的那种情况使它生色。在这里，我們看到：同一个公爵，既是由选举产生的帝国首領，又是帝国一个省的世襲諸侯，竟为了本省的利益而阴谋侵害帝国；这个阴谋取得了成果，因为他的南侵行动似乎使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之間的傳統冲突复起；而他的东侵行动似乎延續了日耳曼种族和斯拉夫种族之間的殊死斗争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的反抗；最后，他利用巧妙的亲族关系使他的家族势力达到这样高的地位，以致一度不仅大有把帝国罩上表面的光彩而一口吞下之势，而且簡直要把整个世界葬于一个世界君主国的墓塋中。这样規模宏偉的大事，在勃兰登堡边区侯国的历史上是怎样也找不出的。它的对手的历史听起来像一首魔鬼的史詩，而它的历史則只不过像一段家庭丑聞。两者之間，甚至在本来可以希望发现利益相似（即令不是利益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显著的差異。勃兰登堡和奥地利这两个边区起初对德意志防御和进攻邻近斯拉夫部落具有前哨的意义。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勃兰登堡的历史也是缺乏色彩、生命和魅力的，因为它湮沒在同沒沒无闻的斯拉夫部落的小争斗之中了。这些部落散居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間的一小块土地上，而且其中沒有一个发展到足以在历史上占有任何位置的程度。沒有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斯拉夫部落曾經被勃兰登堡边区侯国征服过或者被它同化过，这个侯国甚至也从沒有能够把自己的势力伸展到邻近的温德海。自十二世紀以来就为历代勃兰登堡边区侯爵所覬覦的波美拉尼亚，甚至到1815年也还没有全部并入普魯士王国<sup>91</sup>。当勃兰登堡选帝侯开始蚕食它的时候，它早已不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了。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南岸的变化，部分是由于德意志

市民的商业雄心，部分是借助了德意志騎士的刀劍；这变化屬於德意志和波兰的历史，而与勃兰登堡的历史是无关的。勃兰登堡只是来收获不是它自己种下的庄稼。

可以有把握地說，在对于冠有阿基里斯、西塞罗、奈斯托尔和赫克脫这些古典名字的人物多少有所了解的无数讀者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曾經想到过，勃兰登堡的砂土地不仅在我們的时代出产馬鈴薯和綿羊，而且还出过好些选帝侯，他們有四个之多，名字是：阿尔勃萊希特·阿基里斯、約翰·西塞罗、約阿希姆第一·奈斯托尔和約阿希姆第二·赫克脫。正是这些曾促使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緩慢地发展为一个可以姑且称之为欧洲强国的庸人們，使它的不大高明的历史得免于过分輕率地暴露在公众眼前。基于这一事实，普魯士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就用最大的努力来使全世界认为，仿佛普魯士是 *par excellence* [标准的] 軍事君主国，从中可以得出結論，霍亨索倫的神權应当意味着刀劍之權，即征服之權。但是沒有比这种概念更不符合事实的了。恰恰相反，可以断言，在霍亨索倫王朝現時所据有的所有省份中，严格說来，只有一省——西里西亚是他們征服的，这是他們王朝历史上唯一的一項業績，以致給弗里德里希二世带来了一个“唯一王”的綽号。我們要知道，普魯士王国的国土有 5 062 平方德里以上，其中勃兰登堡省，即使按其現有的疆界計算，也不超过 730 平方德里，而西里西亚則不超过 741 平方德里。那末，霍亨索倫王朝怎么竟能占有面积达 1 178 平方德里的普魯士、536 平方德里的波茲南、567 平方德里的波美拉尼亚、460 平方德里的薩克森、366 平方德里的威斯特伐里亚、479 平方德里的萊茵普魯士呢？这是靠賄賂的神權、公开的购买、零星的盜窃、对遺產的猎取和分贓的叛賣性条約获得的。



在十五世紀初，勃兰登堡边区侯国隶属于卢森堡王朝，这个王朝的首領西吉茲蒙特同时也掌握着德意志帝国的王权。当他非常缺錢而且被債主逼得很厉害的时候，他碰上了一个性情随和、容易商量的朋友，紐倫堡的軍政长官弗里德里希。論起家世，弗里德里希是一个属于霍亨索倫世家的王公。1411年，弗里德里希被任命为勃兰登堡的最高长官。勃兰登堡仿佛是作为皇帝向他借款的抵押品而交給他的。正像一个已經初步占有敗家子的房产的精明高利貸者一样，弗里德里希繼續用新的貸款使西吉茲蒙特陷入新的債務中，直到1415年弗里德里希得到勃兰登堡世襲选帝侯国从而借貸双方以此了清債務为止。为了不致对这件事的性质留下任何疑点，它附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卢森堡王朝保留可用40万金弗罗倫贖回选帝侯国的权利；另一个条件是弗里德里希及其继承者在每次选举皇帝的时候，必須投卢森堡王朝的票。第一个条件明显地說明所締結的協議是一項交易，第二个条件表明它是一种賄賂。为了成为选帝侯国的絕對主人，西吉茲蒙特的这位貪得无厭的朋友只需要再做一件事——取消可以贖回的那个条件。为此弗里德里希等着了一个好时机，即西吉茲蒙特在康斯坦茨宗教會議<sup>92</sup>上又由于帝国代表团的开支而感到手头拮据，这时他就急忙从自己的边区赶到瑞士，傾囊相助，于是这个致命的条件便被消灭了。这就是在位的霍亨索倫王朝迄今据以占有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神权所由来的途徑和手段。普魯士王国就是这样产生的。

弗里德里希的直接继承人是一个十分軟弱无力的人，因为他有一种总是身披铁甲在公众面前出現的怪癖，所以有“铁人”的外号。他用10万金弗罗倫从条頓騎士团手里买下了新边区，正像他父亲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老边区和他的选帝侯的爵位一样。从此以

后，零星收买欠債君主的領土的方法成了历代霍亨索倫选帝侯习以为常的事情，正像武装干涉曾經是羅馬元老院的家常便飯一样。我們且把这种骯髒交易的枯燥詳情放在一边，来看看宗教改革运动的時代吧。

不要以为：既然宗教改革运动成了霍亨索倫王朝的主要支柱，那末霍亨索倫王朝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支柱。完全相反。这个王朝的創业人弗里德里希第一的統治是从他率領西吉茲蒙特的軍隊攻打胡斯派<sup>93</sup>开始的，后者为他的这种热心曾狠狠地打击了他。1499—1535年在位的約阿西姆第一·奈斯托尔对待宗教改革运动，就如对待塔波尔派<sup>94</sup>运动一样。他一直到死都在迫害这个运动。約阿希姆第二·赫克脫，虽然自己信奉了路德教，但是正在新教被查理五世的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弄得精疲力尽的时刻却不肯拔劍相助。他不但拒絕参加施馬尔卡尔登联盟<sup>95</sup>的武装反抗，反而在暗中援助皇帝。因此，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从霍亨索倫王朝方面所遇到的，在它产生时是公开的敌对态度，在它斗争的早期是虛伪的中立，而在它可怕的最後一幕，即在三十年战争<sup>96</sup>时期，則是畏縮动搖、胆怯的消极和卑鄙的背信棄义。大家知道，选帝侯乔治-威廉曾企图切断古斯达夫-阿道夫的解放部队的去路，古斯达夫-阿道夫曾不得不施展各种手段把选帝侯赶进新教陣营，后来这位选帝侯同奥地利簽訂了片面和約<sup>97</sup>，企图溜出这个陣营。然而，即使霍亨索倫王朝不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騎士，无疑也是它的财务管理。他們不願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事业奋斗，却热衷于借宗教改革运动之名进行打劫。对他們說来，宗教改革运动只不过是使教会财产世俗化的宗教根据，所以他們在十六和十七两个世紀中所获得的产业的最好部分都可以归之于一个丰富的来源，即

掠夺教会。这的确是神权的相当奇異的表现方式。

在霍亨索倫君主国形成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有三件事：取得勃兰登堡选帝侯国；普魯士公国和这个选帝侯国的合并；最后是普魯士公国晋升为王国。我們已經知道取得选帝侯国的情形。普魯士公国的获得則是通过三个步驟。首先，使教会财产世俗化；其次，用相当曖昧的通婚：选帝侯約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娶了膝下无子的普魯士公爵、精神錯乱的阿尔勃萊希特的次女，而他的儿子約翰-西吉茲蒙特則娶了公爵的长女；最后是用右手收买波兰国王的近臣，用左手收买波兰貴族共和国的議會。这些收买勾当非常复杂，以致整整延續了好多年。把普魯士公国变为王国也是采用这一类办法。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第三亦即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为要取得王位，需要得到德意志皇帝的同意。为了取得皇帝的天主教良心所憤怒地反对的这个同意，弗里德里希第三收买了耶穌会教徒沃尔弗（列奥波特一世的懺悔牧师），而且附加了3万名勃兰登堡人，他們得在奥地利爭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sup>98</sup>中充当炮灰。霍亨索倫选帝侯返回到了用活貨币付賬的古日耳曼习俗时代，区别只在于：古日耳曼人用的是牲畜，而他用的却是人。禀承天命的霍亨索倫王国就是这样起家的。

霍亨索倫王朝从十八世紀初鴻运亨通以来，更加完善了他們的扩大領地的方法：除賄賂和交易之外，又加上了同俄国訂立瓜分某些国家的条約，他們並沒有战胜这些国家，但是当这些国家被打敗之后，他們却突然向它們扑过去。例如，我們看到，霍亨索倫王朝同彼得大帝串通起来瓜分了瑞典領土；同叶卡特林娜二世串通起来瓜分了波兰；同亚历山大一世串通起来瓜分了德意志<sup>99</sup>。

因此，那些以紐沙特尔是霍亨索倫王朝靠賄賂得到的为理由

来反对普魯士要求占有它的人們就犯了一个可悲的錯誤，即忘記了霍亨索倫王朝之取得勃兰登堡、取得普魯士就是靠了賄賂，而且取得王位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不可能有任何疑問：他們占有紐沙特尔是和占有他們的其他領地一样，凭着同一个神權，并且他們不可能放棄其中的一个而不使所有其余的都受到危險。

卡·馬克思写于 1856 年 12 月 2 日  
左右

載于 1856 年 12 月 13 日“人民報”  
第 241 号，署名：卡·馬·  
并載于 1857 年 1 月 9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4906 号，沒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報”，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報”校对过

## 卡·馬克思 \*英中冲突

昨天早晨由“亞美利加号”輪船带到的邮件，有許多是关于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当局的冲突和海軍上将西馬糜各厘的軍事行动的文件<sup>100</sup>。我們认为，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細地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間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錯誤是在英国人方面。英国人硬說，造成冲突的原因似乎是某些中国官員沒有向英国領事提出請求而自行登上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一只划艇<sup>①</sup>，强行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并且扯下了飄揚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但是，正如倫敦“泰晤士报”所写的，“这里的确有許多引起爭論的問題，如划艇是否悬挂着英国国旗、領事采取的措施是否完全正确等”。提出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如果我們記得，領事硬套用于这只划艇的条約規定<sup>101</sup>，只适用于英国船只；可是，許多材料都表明，这只划艇，从任何正确意义上来看，都不是英国的。但是为了使我們的讀者能够看到事件的全貌，我們且把双方照会中最重要的部分摘引出来。首先是英国駐广州領事巴夏礼先生于10月21日給叶总督的通知：

“本月8日早晨，一大队身穿軍服的中国官兵，事前根本没有照会英国領

---

① 近海航行的帆船。——編者注

事，就擅自登上与其他船只一起停泊城外的英国划艇‘亚罗号’；他们不顾英籍艇长的抗议，竟将划艇十四名水手中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加以逮捕、捆绑而去，并将艇上的旗帜扯下。当天，本领事即将这一公开侮辱英国国旗和严重破坏善后补充条约第九款的全部详情通知贵大臣，要求贵大臣对这一侮辱事件提供赔偿，并保证在本案上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然而贵大臣令人莫解地不顾正义和条约规定，既不对这一侮辱事件提供赔偿，也不表示道歉，而被你们逮捕的水手仍然扣押在你们狱中这一情况，说明贵大臣赞同这次破坏条约的行动，使英王陛下政府无法相信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看来，划艇上的中国水手所以被中国官员逮捕，是因为后者获悉这批水手中有些人曾参与抢劫某一中国商船的海盗行为。于是英国领事就指控中国总督逮捕水手、扯下英国国旗、拒绝作任何道歉并将被捕者囚入监狱。中国总督在给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信中肯定说，他在查明被捕者当中有九人无罪后，已于10月10日指派一名军官把他们送回船去，但巴夏礼领事拒绝接受他们。至于划艇本身，则这位总督声称，在船上逮捕中国人时就认为它是一只中国船，而这是正确的，因为这只划艇是由一个中国人建造的，属于一个中国人所有，船主把这只船在英国殖民地船籍登记簿上注册，骗取到了一面英国国旗，——这大概是中国走私贩惯用的办法。至于侮辱英国国旗的问题，则总督指出：

“贵国划艇泊下旋，向将旗号收下，俟开行时再行扯上，此贵国一定之章程也。到艇拿人之际，其无旗号已属明证，从何扯落。巴领事官屡次来伸，总以扯旗欲雪此辱为名。”<sup>①</sup>

根据这些前提，中国总督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违背条约的行为。虽然如此，英国全权代表<sup>②</sup>在10月12日不但要求交出划艇

① 见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五页：十月初三日致英酋照会。——译者注

② 包令。——编者注

的全体被捕水手，并且要求道歉。总督对此答复如下：

“二十四日卯刻发去巴領事官劄，并申明犯案之梁明太、梁建富并見证之吳亞认共三名，連前九名，共計十二名，一并交还，而巴領事官将解还之人犯十二名并劄文不收。”<sup>①</sup>

可見，巴夏礼这时是有可能取回他的所有十二名水手，而那封他没有拆閱的信很可能是含有道歉的意思的。就在同一天晚上，叶总督曾再一次詢問，为什么不接受他送去的人犯，为什么他的信得不到任何答复。这一点沒有受到任何理会，而到了24日，攻击炮台的炮火却响起来了，有几处炮台被占領了。直到11月1日，海軍上将西馬糜各厘才在他給总督的信中解釋了巴夏礼領事这种显然不可理解的行为。他写道，水手是送回給領事了，可是“并非公开地送回到他們的船上，并且沒有按照破坏領事裁判权的規定表示道歉”。这样，全部事情就归結为这么一个詭辯：似乎沒有把包括三名刑事犯在內的一群水手以应有的隆重仪式送回船去。对这一点，两广总督首先答复說，十二名水手实际上已經移交給領事，并无“任何拒絕遣送他們回船”的情况。直到城市被轰击了六天之后，中国总督才知道这位英国領事还想要些什么。至于道歉，叶总督坚持无歉可道，因为沒有任何錯誤。我們且引用他的話：

“本大臣办事人員进行逮捕时，未見任何外国旗帜，并且委派办理此案的官員在审讯犯人时，证实該艇决非外国船只，因此本大臣认为沒有任何錯誤。”

确实，这个中国人的邏輯力量是如此令人信服地把这全部問題都解决了，——显然，这里不再存在任何別的問題，——以致海

<sup>①</sup> 見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五頁；十月初三日致英魯照会，引文中“二十四日”是指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即1856年10月22日。——譯者注

軍上將西馬糜各厘終于只好宣稱：

“對於‘亞羅號’划艇事件的是非曲直，本統帥斷然拒絕再作任何辯論。本統帥對於巴夏禮領事向貴大臣陳述的事實經過完全滿意。”

但是這位海軍上將在占領了炮台、打開了城牆、連續轰擊廣州六天以後，突然發現一個嶄新的行動目標，因為他在10月30日對中國總督寫道：

“貴大臣目前應當同本統帥舉行緊急會議，以結束現狀，這種狀況的有害後果現在已經很大，如果不予補救，必將招致最嚴重的災難。”

中國總督答復說，按照1849年的協定<sup>102</sup>，海軍上將沒有權利要求舉行這種會議。接着他說：

“惟所稱進城一節，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間，貴國公使出示在公司行，內稱本總督出示，不准番人入城等語，載在新聞紙，諒貴提督早已知悉，況不能進城，出自廣東百姓，眾口一詞。此番攻破炮台，焚毀民房，其心不甘，已可概見。本大臣有恐貴國官民因此受害，莫若仍照文公使所議辦理為是。至所稱熟商一事，本大臣前已有委員雷州府蔣守矣。”<sup>①</sup>

於是海軍上將西馬糜各厘干脆宣稱，他根本不理会文翰先生的協議：

“貴大臣回信要求本統帥注意英國公使在1849年公布的關於禁止外國人進入廣州的告示。在這種情況下，本統帥應當提醒貴大臣，雖然我們確實有充分理由對中國政府違背在1847年允許外國人於兩年後進入廣州的諾言，表示不滿，但是本統帥目前所要求的，與以前有關這一問題的交涉毫無關係，本統帥並不要求允許其他人員入城，而只要求允許外國官員入城，這樣做只是出於前面所說的簡單而充足的理由。對於本統帥提出的親自同貴大臣談判的建議，承貴大臣相告，數日前已經派一知府前來。因此本統帥不得不

<sup>①</sup> 見華廷杰“觸藩始末”卷上第十五頁：十月初三日致英會照會。——譯者注



认为貴大臣的全部来信极端不能令人滿意，只能謹此附告，如果不能立即得到貴大臣同意我們建議的明确保证，本統帥即将采取积极的軍事行动。”

叶总督提出反駁，再次詳細叙述了 1849 年的协定：

“1848 年，前大臣徐与英国公使文翰先生曾就这一問題往复辯論很久，文翰先生确信在城內会晤已无可能，就在 1849 年 4 月致函徐大臣称：‘今不再与貴大臣爭議这个問題。’随后文公使在各商館出告示，不准一个外国人入城；这一告示曾在报上登載，公使并将这件事奏明英国政府。任何中国人或外国人都认为这个問題不应再爭論。”<sup>①</sup>

于是，不耐煩辯駁的英国海軍上将就用武力为自己鋪平通向广州总督府的道路，同时摧毁停在江面的帝国舰队。这样，这出外交兼軍事的活剧就截然分成两幕：在第一幕中，借口中国总督破坏 1842 年的条約，开始炮轰广州；而在第二幕中，則借口那位总督頑强地坚持 1849 年的协定，更猛烈地繼續炮轰。起先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破坏条約，后来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遵守条約。同时，就是在第一种場合下，甚至也不是借口沒有給予賠償，而只是借口沒有以应有的形式給予賠償。

倫敦“泰晤士报”就这个問題所提出的观点，就是比尼加拉瓜的威廉·沃克將軍<sup>103</sup>也无逊色。

这家报纸写道：“由于这次爆发了軍事行动，現有的各种条約就此作廢

① 此段在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九頁所載十月二十日复英會照会中的文字如下：

“至进城一节，前大臣徐既与前公使文往复辯論，罢議此事，来文所称进城之議，前公使文未奉准罢之，亦未自行罢之等語，如果未罢，何以文公使出示在公司行內有不准番人入城之語，載諸新聞紙內，豈非自罢之确据乎。并查文公使前次来文，內称有具奏貴国之語，是以本大臣前在巡撫任內亦会同前大臣徐，以英人罢議进城一事奏明大皇帝在案。”

前大臣徐是指叶名琛前任两广总督徐广縉。——譯者注

了，我們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安排我們同中華帝國的關係了。廣州最近發生的事變警告我們，應當堅持要求取得 1842 年條約規定的自由進入這個國家以及進入對我們開放的那幾個口岸的權利。人們不應當再對我們說，因為**我們已經放棄**履行那條許可外國人進入自己商館以外地區去的條款，我們的代表必定為中國總督摒棄不見。”

換句話說，“我們”開始採取軍事行動是為了撕毀現有条約和堅持要求實現一項條約中明文規定的“我們”業已放棄的要求！不過，我們也樂於報道，英國輿論界另一家著名的報刊卻用比較合乎人情和恰當的語氣表示了意見。

“每日新聞”<sup>104</sup> 寫道：“真是奇怪，為了替一位英國官員的被激怒了的驕橫氣焰報仇，為了懲罰一個亞洲總督的愚蠢，我們竟濫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惡的勾當，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戶去殺人放火，使他們家破人亡，我們原來是像不速之客那樣闖入他們的海岸的。且不說這次轟擊廣州的後果如何，無所顧忌地和毫無意義地把人命送上虛偽禮節和錯誤政策的祭壇，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丑惡和卑鄙的。”

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對於這種以違背了無中生有的外交禮節為借口，不先行宣戰就侵入一個和平國家的做法，是否贊同，或許還是一個問題。如果說第一次對華戰爭儘管借口並不體面<sup>105</sup>，但由於它展示了打開對華貿易的前景，各列強也就耐心地觀望着，那末，這第二次戰爭豈不是要無限期地阻礙這種貿易嗎？這次戰爭的第一個後果，必定是把廣州同絕大部分依然掌握在帝國臣民手中的產茶區<sup>106</sup> 隔斷開來，——這種情況只能對俄國的陸路茶商有利。

卡·馬克思寫於 1857 年 1 月 7 日

作為社論載於 1857 年 1 月 23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918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弗·恩格斯 \*山地战的今昔

由于不久前瑞士有可能遭到入侵<sup>107</sup>，并且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没有完全消失，大家很自然地不仅对这个山地共和国的防御能力发生兴趣，而且还对一般山地战发生了兴趣。人们通常倾向于把瑞士看成一个不可攻破的国家，把入侵的军队想像为罗马的斗士，这些斗士在出征前要高呼 «Ave, Caesar, morituri te salutant» [“光荣啊，凯撒，决心牺牲者向你致敬”]，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人们常常向我们提到森帕赫、莫尔加顿、穆尔顿和格兰桑等会战<sup>108</sup>，同时指出，敌军进入瑞士也许相当容易，但是正如奥地利的阿尔勃莱希特的弄臣所说，想再从那儿出来就困难了。甚至军人也会数出许多险要的山道和狭谷的名字，在那种地方只要很少一些人就能轻易地抵挡住一两千名最精锐的士兵。

关于被称为山地要塞的瑞士是不可攻破的这个传统概念，早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对奥地利和勃艮第的多次战争中就形成了。在对抗奥地利的战争中，入侵者的主要兵种是全身披甲的骑士队，它的威力在于对那些没有火器配备的军队进行歼灭性的攻击。但是在像瑞士这样的国家里，正好不能进行这种攻击，在瑞士，骑兵（除了最轻装的而且是很少量的以外）甚至到现在也无用武之地。至于那些披戴着成百斤铁甲的十四世纪的骑士，就更无能为力了！

Whenever there is a chance of Switzerland being involved in a war, the general public look upon that country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awe, and are inclined to ~~see~~ <sup>view</sup> the invading army <sup>(arguing list of)</sup> with the Roman gladiators whose: Evse, Caesar, movituri te salutants has become so celebrated. We are reminded of Sempach and Mor-garten, St. Gotthard and Granson, and we are told that it may be ~~not~~ <sup>enough</sup> ~~so difficult~~ for a foreign army to get into Switzerland, but that it will be found <sup>very difficult, indeed</sup> quite a ~~difficult~~ thing to get out again. Even military men will recite the names of a dozen mountain passes, defiles ~~which are~~, by aspects of tradition, perfectly impregnable, and where a handful of men may with ease, if forcibly opposed a couple of thousand of the bravest & best soldiers. And to complete your conviction, they will put a map of Switzerland before you, black with mountain-ridges & slopes, and you know how an army is to find its road & to act in concert in this labyrinth of rocks, ravines, glaciers, torrents & impassable mountain crests.

This traditional impregnability of the so-called mountain-fortress of Switzerland date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Swiss with Austria and Burgundy, in the 14<sup>th</sup> & 15<sup>th</sup> centuries. At ~~the~~ <sup>the</sup> ~~former~~ <sup>former</sup> ~~Swiss~~ <sup>Swiss</sup> ~~defence~~, ~~Swiss~~ <sup>Swiss</sup> the armour-clad cavalry of the knight-hood was the chief arm of the invaders, its ~~force~~ <sup>force</sup> ~~was~~ <sup>was</sup> ~~strength~~ <sup>strength</sup> lay in the inviolability of the charge against arms undefended by fire arms; <sup>(this charge was impossible)</sup> that in a country like Switzerland <sup>where</sup> ~~cavalry~~ <sup>cavalry</sup>, ~~except~~ <sup>except</sup> of the lightest kind, <sup>(is even now useless; how much more so were the knights of the 14<sup>th</sup> century, armed with nearly a hundred-weights of iron? they had to dismount & fight on foot; thereby their last remnant of mobility was lost; they, the invaders, were reduced to an almost absolute defensive, & caught in a defile, <sup>one of equal or even against clubs by big shields.</sup> ~~confronted with~~ <sup>confronted with</sup> ~~Swiss~~ <sup>Swiss</sup> ~~infantry~~ <sup>infantry</sup> armed with pikes, had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portion of an army & <sup>if</sup> ~~if~~ <sup>if</sup> ~~fire-arms~~ <sup>fire-arms</sup> had been introduced, but the infantry was still cramped by the weight of defensive armour, the cannons were heavy, & small arms <sup>very</sup> ~~in their infancy.~~ <sup>in their infancy.</sup> The whole equipment of the troops was still so heavy & cumbersome.</sup>



他們只得下馬徒步作战；这样，他們就連最后一点运动能力也丧失无遺，进攻者便变成了防御者，而一旦遇到狹谷，甚至連棍棒也抵御不了。在勃艮第战争时期，手持长矛的步兵在军队里已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并且采用了火器，但是步兵仍然受到沉重的盔甲的束縛，火炮很重，而輕火器既不方便，用处也不大。部队的各种装备仍然非常笨重，使得他們根本不适于进行山地战，尤其是在那种可以說几乎还没有道路的时代里。因此，当这些行动迟緩的军队一陷入难以通行的地区，他們就寸步难移，而輕装的瑞士农民却能够采取进攻行动，更巧妙地机动和包圍，最后战胜敌人。

在勃艮第战争以后的三百年間，瑞士沒有遭到过一次严重的入侵。关于瑞士人不可战胜的傳統观念变得非常神圣，一直保持到法国革命，这个粉碎了許多神圣傳統的事变也把这一傳統观念打破了，至少在熟悉軍事史的人們的心目中是如此。时代变了。身披铁甲的騎兵和行动不便的长矛手絕迹了；战术經過了多次的革命化；运动性成为军队的主要素质；馬尔波罗、奥伊根<sup>①</sup>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綫式战术不断被革命軍的纵队和散兵綫所推翻；自从波拿巴將軍在1796年越过了卡迪博納山口，楔入奧軍和撒丁軍分散配置的纵队中間，从正面击潰了他們，同时又在濱海阿尔卑斯山脉的狹谷里切断了他們的退路，并俘擄了大部分敵軍——自从这个时候起，就創立了山地战的新方法，瑞士不可攻破的看法也就随之告終了。

在采用現代战法以前的綫式战术时期，作战双方往往都竭力避开难以通行的地形。地形愈平坦，就愈认为是好戰場，只求那里

---

① 薩瓦亲王。——編者注

有一些能保障一翼或两翼安全的天然障碍就行了。可是从法国革命軍开始，采用了另一种战法。無論在任何情况下进行防御，他們都力求找到正面前有天然障碍的陣地，因为这种障碍既可掩护散兵綫，又可掩护預备队。总的說来，他們更喜欢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作战；他們的部队机动灵活得多；他們的战斗队形——散开队形和纵队——不仅可以<sup>①</sup>向任何方向迅速前进，而且甚至能有效地利用起伏地上的各种掩蔽地，而他們的敌人在这种地形上却一筹莫展。实际上，“不能通行的地形”这一术语差不多已从軍語中删去了。

瑞士人在1798年对此深有体会。当时，法軍四个师尽管遇到当地居民的頑强抵抗和旧森林州的三次起义，仍然攻占了这个国家，使它在以后三年内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和反法同盟間最重要的戰場之一<sup>109</sup>。法国人是多么不在乎瑞士那些难以攀登的高山和峡谷，他們早在1798年3月間，当馬森納首先向奧軍占領的最險峻多山的格劳宾登州进攻的时候就已证明了。奧軍当时占領着上萊茵河谷。馬森納的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越过了一些几乎不能通过馬匹的山口，突入河谷，占領了所有的出口，使奧軍在短時間的抵抗以后被迫放下了武器。奧軍很快接受了这一教訓；他們在对山地战素有研究的霍策將軍的指揮下轉入进攻，以同样的战法赶走了法軍。以后，馬森納退到苏黎世附近的防御陣地，并在那里击败了科尔薩科夫率領的俄軍；接着苏沃洛夫越过圣哥达侵入瑞士，不久潰退；最后，法軍又經格劳宾登州进軍提罗耳，麦克唐納在严冬从这里越过了三座在当时认为即使队伍成一路纵队行进也难

---

① 手稿的片断到此为止。——編者注

以通过的山岭。在这以后，拿破仑的几次大规模战局都是在辽阔的多瑙河与波河流域进行的，因为这几战局具有远大的战略企图，即切断敌军与他们补给中心的联系，击溃敌军，然后夺取补给中心，这就需要起伏较小的地形和集中大量的兵力来进行决战，但这在阿尔卑斯山区是无法达到的。然而，从拿破仑在 1796 年进行第一次阿尔卑斯战局和他在 1797 年越过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向维也纳进军直到 1801 年为止，整个战争历史证明：阿尔卑斯山的山岭和深谷已再不能使现代军队望而生畏了；并且，从那时起直到 1815 年止，阿尔卑斯山也从来没有给法军或反法大同盟的联军提供过任何值得一提的防御阵地。

当你通过任何一个有山道从阿尔卑斯山北坡蜿蜒曲折地伸向南坡的深谷时，你在山道的每一个转弯处都会看到极其险要的防御阵地。以大家熟悉的维阿马拉山口为例。没有一个军官不向你保证，他能以一营兵力守住这个狭谷，只要他确信不会被敌人从后方迂回。可是问题就在这里。甚至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脊上也没有一个山口是不能迂回的。拿破仑进行山地战的准则是：“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全军就能通过。”苏沃洛夫也曾这样做过，当他被严密地堵在莱斯河谷时，他曾不得不率领军队沿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羊肠小道行军，而且还有法国最善于进行山地战的将军勒库尔布紧跟在他背后追击。

有些防御阵地，从正面进攻往往等于完全丧失理智，而这种从后方迂回敌人的可能性能够绰绰有余地抵销这种防御阵地的力量。防御者要防守敌人可能借以对阵地进行迂回运动的所有道路，就会分散兵力，以致必败无疑。对这些道路至多只能加以监



視，而击退迂迴部队的攻击，則应取决于預备队的合理使用和各部队指揮官的机智灵活和行动迅速；然而，即使三四路迂迴纵队中只有一路获得成功，防御者就会陷入那种似乎所有迂迴纵队都获得胜利的困境。因此，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在山地战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从純粹战术的观点研究这一問題，也会得出相同的結論。防御陣地通常都是狹谷，在谷地配置强大的纵队，而在高地上配置散兵綫作掩护。这种陣地可以从正面迂迴，这时散兵群可沿谷地斜坡攀登，包圍防御者的优秀散兵的两翼；只要情况允許也可以派出小部队沿山脊或与狹谷平行的谷地进行迂迴，而迂迴的大部队則可以利用某一山道从翼側或后方襲击防御部队。在所有这些場合，迂迴部队都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他們占領着較高的地勢，能够俯視敌方所占的谷地。他們可以使用滾木礮石打击敌人，因为現在沒有一个纵队会那样輕率，事先不肃清兩側山坡上的守軍就进入深谷的。所以，这种不久前还是人們慣用的防御方法，現在却反而被用来对付防御者了。山地防御的另一个不利条件，是构成防御的基础的火力，因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而大为减弱。火炮几乎毫无用处，如果真正使用了火炮，退却时往往还是被扔掉。那些由輕榴彈炮組成的、用騾子馱炮的所謂山地炮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已为法軍在阿尔及利亚的經驗所充分证明了<sup>110</sup>。至于談到火枪和步枪的使用，那末由于在山地到处可以找到掩蔽地，防御便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优点，也就是說在防御陣地前面沒有敌人必須在火力下通过的開闊地。由此可見，無論从战术观点或战略观点来看，我們都会得出奧地利卡尔大公——山地战的最优秀將領之一和論述这个問題的最权威著作家之一——所做的結論：在这种战

爭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巨大的优势。

那末，这是不是說防御一个山国就毫无用处了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說，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在阿尔卑斯山区，几乎很难进行大規模的战斗；整个战争就是一連串的小战斗，就是进攻者不断试图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楔入敌方陣地，然后向前推进。双方军队根据需要分散行动；无论哪一方都可能随时遭到对方有效的攻击；双方都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能預見的情况上。因此，防御者可以利用的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找出敌人的这些弱点，急速地插到分隔开的各敌军纵队之間去。在这种場合，单纯消极防御所仅仅依靠的那些坚固的防御陣地，就变成了可能誘使敌人在那里进行主攻的許多陷阱，而这时防御的主力却指向了敌人的迂迴纵队，使每一支迂迴的纵队都可能被迂迴，而陷入它原来想使防御者陷入的那种絕境。然而很明显，这种积极防御需要有机敏灵活、經驗丰富和指揮熟练的将領，需要有訓練有素和行动敏捷的部队，而且首先需要有指揮熟练而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至連长，因为在这些場合，一切全靠各独立部队行动的迅速和机警。

还有一种現在大家已很熟悉的山地防御战，那就是民族起义和游击战；游击战是絕對需要山地的，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这类战争，我們可以举出四个战例：提罗耳起义，西班牙反对拿破侖的游击战，巴斯克的卡洛斯派暴动和高加索部落反对俄国的战争<sup>111</sup>。虽然这些战争給征服者带来不少麻煩，但其本身都沒有获得成功。提罗耳起义只是在1809年还受到奥地利正規軍支持时才有威势。西班牙的游击队虽然拥有国土极其辽阔的优越条件，但所以能够

长期进行抵抗，主要还是由于法軍不得不經常以主力对付英葡联軍。卡洛斯派战争所以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正規軍已經衰落，同时，卡洛斯派与克里斯蒂娜的將軍們又在进行无休止的談判；因此，这次战争也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最后，高加索的斗争是給山地居民带来最大荣誉的一次山地战；在这一斗争中高加索人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是由于他們在保卫自己的疆土时主要采用了进攻战术。无论俄軍（他們和英軍一样是最不适于山地战的）在哪里进攻高加索人，高加索人通常总是被击败，他們的山村被破坏，他們的山道被俄軍凭借据点加以控制。但高加索人抵抗的力量却在于：他們經常离开山区向平原出击，經常突然襲击俄軍的警备部队和前哨，奔襲俄軍第一綫部队的深远后方，并不时在俄軍运动道路上进行伏击。換句話說，高加索人比俄軍輕便灵活得多，并且發揮了这一长处。事实上，在一切場合，甚至在山地居民的暫時获胜的起义中，胜利的取得都是进攻行动的结果。在这方面，这几次起义与1798年和1799年瑞士的起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最后一場合，起义者往往占領初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固的防御陣地，在那里靜候法軍到来，結果总是被法軍击潰。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月10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1857年1月27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9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并根据手稿的片断校对过

## 卡·馬克思 对波斯的战争<sup>112</sup>

英国不久前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根据最近的报告，他们打得很猛烈，以致波斯的沙赫被迫投降。要了解这场战争的政治原因和目的，必须回溯一下波斯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由自称是古代波斯皇帝的后裔的伊斯馬伊耳于 1502 年创建的、保持大国的强盛和威望达两百多年之久的波斯王朝，1720 年左右，在波斯东部各省的阿富汗人起义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阿富汗人侵入了波斯西部，有两个阿富汗王公还高踞了几年的波斯王位。可是不久，他们便被著名的納迪尔赶走了。起初，他是波斯王位的一位覬覦者手下的统帅。后来，他自己据有了王位，不仅制服了起义的阿富汗人，而且以他对印度的四海闻名的入侵大大促进了已经开始衰落的莫臥儿帝国的瓦解，从而为英国在印度建立统治打下了基础。

在 1747 年納迪尔-沙赫死后波斯处于一片混乱时，产生了阿罕默德·杜兰尼领导的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王国合并了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后来为錫克教徒<sup>113</sup> 占领的所有土地。这个拼凑得极不牢固的王国在它的创建人死后就瓦解了；它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独立的、各有其自己首領的、互相之間干戈不息的阿富汗部落，这些部落只有在必须共同对付波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联合起来。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間

的这种由于种族不同而产生的、被历史傳統加深了的、并且經常被边境糾紛和相互責难保持着的政治对立，似乎同时又被宗教对立合法化了，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即正統的伊斯兰教徒，而波斯則是異端的什叶派的堡垒。

尽管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之間存在着这种尖銳和普遍的对立，他們毕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們都以俄国为敌。俄国最初入侵波斯是在彼得大帝时代，但是这次入侵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在这方面取得更多成功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他通过古利斯坦条約<sup>114</sup>夺去了波斯的十二个省，这些省大部分位于高加索山脉南面。以土庫曼彻条約<sup>115</sup>告終的1826—1827年的战争，使尼古拉又从波斯夺去了若干地区，而且禁止波斯船只在波斯自己的靠近里海岸边的領水內航行。过去領土被占所留下的記憶、現在波斯所忍受的压迫以及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誓不两立的仇恨。至于阿富汗人，虽然他們同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冲突，可是他們一向认为俄国是他們宗教的夙敌，是要把亚洲一口吞下的巨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都把俄国当做天然的敌人，就使得这两个民族都把英国看做自己的天然的盟友。因此，英国为要保持自己的統治势力，只需扮成波斯和阿富汗之間的善意的調停者，坚决反对俄国人的入侵。假友好加上真抵抗，別的就什么也不需要了。

然而不能說这种优越的地位被利用得很成功。1834年挑选波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英国人不得不支持俄国所提議的一位王子，次年，当这位王子同他的竞争者进行武装斗争时，又不得不給以資財上的支持并派英国軍官去积极援助<sup>116</sup>。被派到波斯去的英国使臣都受命警告波斯政府不要受人挑唆，不要发动对阿富汗人的战





爭，說这种战争除去浪費資財外，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可是当这些使臣坚决要求上級授权来防止对阿富汗人一触即发的战争时，英国政府却提醒他們注意 1814 年的旧条約中的一项条款，根据这项条款的規定，如遇波斯与阿富汗发生战事时，英国人在未得到进行調解的邀請之前不得加以干預。英国外交代表和印度英国当局认为俄国在策划这场战争，因为这个大国想借波斯政治势力的向东擴張而为俄軍迟早侵入印度开辟道路。但是这些理由对当时领导外交部的帕麦斯顿勋爵似乎沒有起任何作用，至少是作用很小，于是在 1837 年 9 月波斯軍隊侵入了阿富汗。波斯軍隊在打了一些小胜仗以后，直抵赫拉特城，他們在城下扎下营寨，并在俄国駐波斯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揮下展开了圍攻战。在这些軍事活动进行的全部期間，英国大使麦克尼耳却被相互矛盾的訓令縛住了手脚。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命令他“避免討論波斯与赫拉特的关系問題”，說这些关系似乎与英国无关；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又希望大使劝阻沙赫不要繼續軍事行动。在这次出征的最初时刻，爱里斯先生召回了在波斯軍隊中服役的英国軍官，但帕麦斯顿又把他們派回去了。当印度总督再次命令麦克尼耳召回英国軍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銷了这道命令。1838 年 3 月 8 日，麦克尼耳前往波斯軍营自荐居間調处，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的名义。

1838 年 5 月底，从开始攻城已經过了将近九个月，帕麦斯顿才向波斯宫廷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会，第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示抗議，第一次全力痛斥“波斯同俄国的联系”。同时，印度政府派兵从海路开赴波斯灣，下令夺取不久前为英国人占据着的哈腊克島。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轉到埃尔斯倫，而前往英国的波斯大



使則不准入境。在此期間，赫拉特虽遭长期封鎖，但未屈服，波斯人的每次进攻都被打退，1838年8月15日沙赫被迫撤圍，匆忙地把軍隊撤出阿富汗。英国人的活动本来可以就此結束，但是事情的演变却奇怪之至。英国人不满足于制止了波斯想侵占一部分阿富汗領土的企图，——他們认为这一企图是在俄国的示意下和为了俄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决定把整个阿富汗攬为己有。著名的阿富汗战争<sup>117</sup>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人的惨败，而誰該对这次战争負实际責任，迄今也还是一个大秘密。

成为目前同波斯开战的理由的事件，同阿富汗战争之前的情况很相似，即波斯人向赫拉特进军，而这次进军的结果是占领了該城。但是說来令人奇怪，英国人这次以盟友和保护者的姿态支持的恰恰是在阿富汗战争时他們极想推翻而未能推翻的多斯特-穆罕默德。这次战争是否包含着同前次战争同样異乎寻常和出人意料的后果，尙待分曉。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1月27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1857年2月14日  
“紐約每日論坛报”第493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坛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

英軍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波斯灣占領了波斯最重要的港口布什尔，其借口无非是赫拉特这个不久前被波斯軍隊占領的阿富汗的公国<sup>118</sup>应当归誰所有的問題。赫拉特現在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它是西面和北面的波斯灣、里海和亚克薩尔特河同东面的印度河之間整个地区的战略中心；因此，一旦英国和俄国为了爭夺亚洲的霸权而发生严重冲突（英国侵入波斯可能加速这一冲突），赫拉特就将成为双方爭执的主要目标，而且可能成为双方最先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动的战区。

赫拉特被賦予这样重要的意义，并不是沒有根据的，凡是了解它的地理位置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波斯的內陆是四面环山的高原，水流不能外溢。这些水流不足以形成一个或几个中央湖泊；它們不是被广闊的沼澤地化为烏有，就是逐漸消失在干燥的大沙漠中。这个大沙漠占着波斯高原的絕大部分，形成了波斯西部和东北部之間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沙漠北面的边界是霍拉桑山脉，它由里海的东南角几乎向正东延伸，形成厄尔布尔士山脉和兴都庫什山脉之間的連接綫；霍拉桑山脉分出一道支脉向南延伸，将波斯沙漠跟灌溉較好的阿富汗地区分隔开来，而赫拉特正是位于这个分隔开来的地方。赫拉特周圍是相当广闊而且特

別肥沃的谷地，为它提供生存資料。在霍拉桑山脉的北面，有与其南麓的沙漠相似的沙漠。几条像木尔加布河那样的大河，在这里也被沙漠化为烏有。但是奥克苏斯河与亚克薩尔特河，由于水勢十分强大，冲过了沙漠，在下游形成了适于耕作的广阔谷地。在亚克薩尔特河的那边，沙漠便逐渐带有南俄罗斯草原的性质，并且最后完全与它融合在一起。因此，在里海和英屬印度之間有三个文化比較发达的不同地区：第一，波斯西部的几个城市：設刺子、休斯特尔、德黑兰、伊斯法罕；第二，阿富汗的几个城市：喀布尔、加兹尼、坎大哈；第三，土尔克斯坦的几个城市：希瓦、布哈拉、巴耳赫、薩馬尔汗。在所有这些城市之間保持有相当頻繁的联系，而这些联系的中心，自然是赫拉特。所有从里海到印度河以及从波斯灣到奥克苏斯河的道路，都在这个城市会合。赫拉特是喀布尔到德黑兰以及設刺子到巴耳赫途中的一个商队旅舍。經耶茲德和庫希斯坦穿过波斯沙漠的那条沿途有綠洲的大驛路，直通向赫拉特；另一方面，从西亚細亚通往东亚細亚和中亚細亚的唯一的一条繞过沙漠的道路，得經過霍拉桑山脉和赫拉特。

因此，赫拉特在强国的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土尔克斯坦，即波斯和奥克苏斯河北面地区的一个据点。誰占有赫拉特，誰就充分握有中央陣地的全部优势，因为以这一陣地为中心向任何方向进攻，比从伊朗或土尔克斯坦的其他任何城市进攻，都更加容易，更有把握获得胜利。同时，阿斯特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巴耳赫、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城市彼此之間交通非常困难，即使从所有这些城市向赫拉特发起共同进攻，也很少有可能获得胜利。向赫拉特进攻的各纵队，几乎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而赫拉特如果有一位果敢的將軍，却可以襲击它們并将它們各个击破。尽管如此，在这

种情况下，从坎大哈、喀布尔和巴耳赫推进的各纵队，一定要比从阿斯特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分进合击的各纵队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从阿富汗方面进攻时，是从山地到平原，而且可以完全不经过沙漠，然而从里海和阿腊克斯河方面进攻时，只有一个纵队（从阿斯特拉巴德出发的）可以不经过沙漠，而其他各纵队则必须经过沙漠，以致完全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

以赫拉特为共同中心的三个文化中心，形成了三类不同的国家。在西边是波斯，土庫曼彻条约已将它变成俄国的附属国。在东边是阿富汗和俾路支诸国，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喀布尔和坎大哈现在可以列为英印帝国的附属国。在北边是土尔克斯坦的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这两个汗国虽然名义上中立，但当发生冲突时，它们几乎一定会倒向获胜可能性较大的一方。波斯实际上从属俄国，而阿富汗实际上从属英国，这种情况可由俄国已派兵去波斯，而英国已派兵去喀布尔的事实来证明。

俄国占有里海西岸和北岸的全部地区。巴庫（距阿斯特拉巴德 350 英里）和阿斯特拉罕（距阿斯特拉巴德 750 英里），是两个可供设置军用仓库和集结预备队的上好地方。当俄国里海舰队控制着这个内海时，俄国可以很容易地向阿斯特拉巴德输送必需的物资和援军。在里海东岸通往咸海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有俄国的堡垒。由此向北方和东方，伸展出一道俄国的堡垒线，沿线散布有乌拉尔河流域哥萨克人的村庄，这道堡垒线早在 1847 年就已经由乌拉尔河推进到了恩巴河和土尔盖河，即向俄国统治下的吉尔吉斯诸汗国境内和咸海方向推进了 150—200 英里。此后，实际上已在咸海沿岸修筑了堡垒，现在在咸海和亚克萨尔特河上都有俄国的轮船航行。甚至有消息说，俄军已占领希瓦，不过这种说法至

少还为时过早。

俄国人向中亚細亚或南亚細亚发动任何大規模进攻时所必須遵循的作战路綫,是自然条件規定了的。如果从陆路由高加索沿里海西南岸前进,就会遇到巨大的天然障碍——波斯北部的山脉,并且会使进攻的軍队在到达主要目的地赫拉特之前必須通过 1 100 英里以上的路程。如果从陆路由奥連堡向赫拉特进攻,則进攻的軍队不仅要經過那个使彼罗夫斯基的軍队在征討希瓦时遭到复灭<sup>119</sup> 的沙漠,而且还要經過两个同样不好客的沙漠。从奥連堡到赫拉特的距离,按直綫計算有 1 500 英里,但是如果俄国人从这一方向进攻,則奥連堡将是俄軍能够选来作为作战基地的最近地点。此外,俄屬阿尔明尼亚同奥連堡都几乎完全与俄国的中心隔絕,前者被高加索山脉所隔絕,后者被大草原所隔絕。要在这两个地方把夺取中亚細亚所必需的物資和軍队集中起来,是根本談不上的。因此,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横渡里海,以阿斯特拉罕和巴庫作为基地,以里海东南岸的阿斯特拉巴德作为監視站,而且这条路到赫拉特总共只有 500 英里。这条路綫具有俄国所能期望的一切优越性。阿斯特拉罕在伏尔加河上的位置,正如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位置一样。它位于俄国最大的一条河流的河口,而这条河流的上游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中心——大俄罗斯,所以它具有一切方便条件可被用来轉运人員和彈药,以組成强大的远征軍。由阿斯特拉罕乘輪船走四天,乘帆船則走八天,便能到达里海对岸的阿斯特拉巴德。里海本身无疑地是俄国的內海,而阿斯特拉巴德(現已被波斯沙赫献給俄国),則位于由西面到赫拉特这条唯一的道路上的起点。这条道路通过霍拉桑山脉,完全不經過沙漠。

俄国政府就是根据上述情况采取行动的。俄军准备在事态更加复杂时用来向赫拉特进攻的主力，现正向阿斯特拉巴德集中。此外，还有两个侧路纵队，不过它们与主力的协同至少是很成问题的，因而每个纵队都有独立的任务。集中在塔夫利兹的右路纵队，任务是掩护波斯西部边境，防止土耳其人向那里采取任何敌意行动，并在必要时开往哈马丹和休斯特尔，以掩护首都德黑兰，使它免受土军和在波斯湾布什尔港登陆的英军的进攻。左路纵队由奥连堡进攻，很可能得到由阿斯特拉罕开往里海东岸的援军。它应当保证占有咸海周围的地区，并向希瓦、布哈拉和萨马尔汗进发，争取这些国家保持中立或协助俄军作战；此外，还要尽量沿奥克苏斯河而上，向巴耳赫推进，以威胁英军在喀布尔附近的或靠近赫拉特的翼侧和后方。据我们所知，俄军各支队伍已在途中，而且中路纵队已抵阿斯特拉巴德，右路纵队已抵塔夫利兹。至于左路纵队的推进情况，大概在若干时间内我们还不会得到消息。

在英军方面，作战基地是印度河的上游地区；他们的仓库一定是设置在白沙瓦。他们已从那里向喀布尔派出了一个纵队，喀布尔距赫拉特按直线计算为400英里。但当发生严重的战争时，英军除应占领喀布尔外，还应占领加兹尼、坎大哈，以及可用来防守阿富汗通路的各个山中堡垒。他们在这方面所要遇到的困难，未必比俄军占领阿斯特拉巴德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帮助阿富汗人反对波斯的侵犯。

英军从喀布尔至赫拉特的进军，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不需要向翼侧派出纵队，因为俄军的任何一支侧路纵队都不可能接近这个地区；而如果奥连堡纵队经过几天行军后由布哈拉进抵巴耳赫，那末喀布尔的强大预备队会立即予以迎头痛击。英军占

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們的作战綫比較短；因为，虽然赫拉特恰恰位于加尔各答和莫斯科的正中間，但是英国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汇合处附近的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只有 600 英里，而俄国在阿斯特拉罕的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則为 1 250 英里。喀布尔的英軍距离赫拉特比阿斯特拉巴德的俄軍距离赫拉特近 100 英里，而且据我們所知道的地形条件，英軍所經過的地区，耕作較好，居民較多，道路也比俄軍在霍拉桑可能遇到的要好。至于談到两国的軍队，那末英軍无疑在适应气候方面胜过俄軍。英軍的欧洲团队无疑將和他們在因克尔芒的伙伴們一样具有坚韧不拔的剛毅精神，而对西帕依步兵<sup>120</sup>也絲毫不能輕視。查理·納皮尔爵士——而他从头到脚是統帅也是兵士——曾在多次战斗中亲自看到过西帕依作战的情况，對他們极为推崇。正规的印度騎兵价值不大，可是非正规的印度騎兵却很出色，他們在欧洲軍官的指揮下，无疑地将胜过哥薩克騎兵。

当然，再繼續議論这样一次战争的前景，是完全无益的。沒有可能猜出双方会派出多少軍队。无法預見現在看来正在临近的这种重要事变一旦到来时所要发生的全部情况。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由于双方到赫拉特都需要通过很远的路程，所以双方在赫拉特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地区用来决定斗争結局的軍队，都不会太多。这次斗争的結局，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决定于赫拉特周圍各国宫廷中的外交阴谋活动和贿赂活动。在这些活动方面，俄国人几乎一定会占上风。他們的外交办得較好，而且带有更多的东方特色：他們知道如何在必要时不吝惜金錢，而最主要的是他們在敌人内部有自己的朋友。英国向波斯灣的远征，只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行动。这一行动虽能吸引住很大一部分波斯軍队，但不能取得很

多的直接战果。即使把现在驻在布什尔的 5 000 人增加两倍,英军顶多也只能进到设刺子为止。但是这次远征本来也并不指望更多的东西。如果它能让波斯政府看到,这个国家可能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那末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如果对英军的这次远征抱有更大的期望,那是荒谬的。因为真正决定整个伊朗和土尔克斯坦命运的路綫,是从阿斯特拉巴德到白沙瓦这条路綫,而在这条路綫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是赫拉特。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2 月 1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4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馬克思 英国的新預算<sup>121</sup>

1857年2月20日于倫敦

預算的喜劇遭到了現任財政大臣喬治·路易斯爵士的沉重打擊。在羅伯特·皮爾執政時期，向議會作預算報告成了一種必須按照極莊嚴的國家禮儀來進行並且用一切華麗辭藻來謳歌的宗教儀式。此外還要求這個儀式至少延續五個小時。迪斯累里先生模仿了羅伯特爵士對待國家錢包的這套禮節，而格萊斯頓先生在這方面比他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喬治·路易斯爵士也不敢違背這個傳統。因此他的演說長達四小時，他慢條斯理地、拖拖拉拉地、翻來復去地說個沒完，直到可尊敬的議員開始抓起帽子紛紛向外跑，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這才突然打斷了他的演說。

這位可憐的演員大聲說道：“非常抱歉，我得向漸漸減少了的聽眾繼續我的演說；可是我必須對留下來的人說明，打算實行的改變究竟會產生什麼作用。”

當喬治·路易斯爵士還是“愛丁堡評論”<sup>122</sup>的才子的時候，他就已經以論證累贅難懂聞名，而不是以說理充分透徹或者語言生動活潑聞名了。他個人的缺點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議會受到挫敗的原因。但是還有一些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情況，甚至最老練的議會演說家也會因而弄得狼狽不堪的。像威廉·克萊爵士在赫爾向他的選民無意中泄露的那樣，起初帕麥斯頓勳爵本來決定要

在和平时期还保持战时稅，可是，由于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所說的并且得到格萊斯頓先生支持的关于所得稅的提案有被提出的危險，他不得不立刻一反初衷，完全改变他的財政策略。因此，可怜的乔治·路易斯爵士得在最短促的期限內改变他的全部計算、一切数字和整个方案，而他那篇为捍卫軍事預算而准备的演說，現在必須用来捍卫假冒的和平預算了——这种 *quid pro quo* [代替]，如果不是讲得像催眠曲那样，可能是很有趣的。然而还不止于此。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历次預算，在他 1841 年至 1846 年执政时期，由于当时自由貿易派<sup>123</sup>与保护關稅派<sup>①</sup>、利潤与地租、城市与乡村之間的激烈斗争，曾引起人們极大的兴趣。迪斯累里先生的預算曾被看做是怪誕可笑的东西，因为它的内容令人摸不清究竟是要恢复保护關稅主义还是要彻底擯棄它；格萊斯頓先生的預算則曾被人們过分渲染，說它是用財政手段使胜利的自由貿易至少稳定七年的办法。这些預算所反映的社会矛盾，使这些預算得到人們积极的对待，但是乔治·路易斯爵士的預算，从一开始就只能作为內閣反对者的共同攻击对象而引起人們的反感。

乔治·路易斯爵士的預算，就其收入部分的最初方案而言，用很少的几句话就能說明。它里面已沒有战时規定的 9 辨士附加所得稅，因而所得稅就从每一英鎊收入征收 1 先令 4 辨士减少到征收 7 辨士；这个稅率一直要实行到 1860 年。另一方面，对酒精飲料仍然要征收全部战时稅，对糖和茶仍然要征收部分战时稅。仅此而已。

本財政年度的所得稅，包括附加的 9 辨士战时稅在內，提供

① 手稿中在“保护關稅派”的后面，插入了以下这几个字：“工业資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編者注

1 600 万英鎊以上的收入，这笔收入来自社会各階級，其分攤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类——不动产.....	8 000 000 英鎊
第二类——农場主.....	1 000 000 英鎊
第三类——公債.....	2 000 000 英鎊
第四类——商界和自由职业界.....	4 000 000 英鎊
第五类——薪餉.....	1 000 000 英鎊
共 計.....	16 000 000 英鎊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所得稅的負擔完全落在社会上層階級和中層階級的身上；的确，这部分稅收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收入。但是，英国的小資產階級，由于有其他的战時稅、昂貴的物价和高漲的貼現率，受所得稅的折磨也是很厉害的，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摆脱掉。然而，要不是貴族和大資產階級想抓住这个机会給自己的狹隘的私心戴上博愛的假面具并摆脱他們无法轉嫁給人民大众的捐稅負擔，因而带头鼓动，那末小資產階級的呼声未必能在报刊上反映出来，当然更談不上在議會中反映出来了。法国在 *république honnête et modérée* [誠实而温和的共和国] 时期曾把所得稅斥为走私的社会主义而防止了采取这种稅收的措施，而如今英国企图在同情人民疾苦的借口下来廢除这同一种稅收。这套把戏玩得真是非常嫻熟。在剛确立和平<sup>124</sup>之后，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是先攻击所得稅本身，而是只攻击它的战時附加部分，以及它的不平等的分攤办法。上层階級也假装和大家一样感到不滿，但是其目的只是歪曲这种不滿的真正意义，把要求降低对小額收益的課稅变成要求免去对大量收益的課稅。小資產階級在斗争激烈时，由于急于求得早日減輕負擔，沒有发觉这种偷天換日的做法，同时也沒有顧到可以保证自己得到强大同盟者

支持的條件。至于工人階級，他們既沒有自己的機關刊物，也沒有代表參加選舉機構，他們的要求更談不上了。

大家知道，羅伯特·皮爾爵士的自由貿易的措施是以所得稅作為基礎的。不難理解，直接課稅是自由貿易在財政上的表現。如果說自由貿易還有一些意義，那末它就是意味着取消關稅、消費稅、以及直接妨礙生產和交換的一切捐稅。

如果捐稅不能通過關稅和消費稅來征收，那末只好直接按照財產和收入來征收了。但是在稅收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一種捐稅減少，必然會引起另一種捐稅相應地增加。這種減少和增加必定成反比例。因此，如果英國公眾想取消大部分直接稅，那末就得準備讓商品和工業原料納更高的稅，總之，就得準備放棄自由貿易制度。在歐洲大陸上正是這樣來解釋目前的運動的。比利時的一家報紙寫道：

“在根特舉行的一次討論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政策的會議上，有一位發言人舉出英國又在反對征收所得稅的情況，作為英國輿論在轉向保護關稅主義的證明。”

同樣，利物浦的財政改革派在他們最近一次呼喚書中，就表示擔心大不列顛會重新回到限制的原則上去。

他們說：“很難相信會出現這種全國性的盲目現象，但是任何一個稍微有點頭腦的人，不能不看到，目前這種宣傳所針對的正是這個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目的。”

因為自由貿易，從而直接課稅，在大不列顛是工業資本家所使用的對付土地貴族的進攻武器，所以工業資本家和土地貴族對所得稅的共同征討，就在經濟方面證明了成立聯合內閣<sup>125</sup>在政治方面所證明了的東西，也就是說，證明了英國資產階級軟弱無力，他們

为了避免向无产阶级让步而力图与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妥协。

乔治·路易斯爵士在向反对所得税同盟的要求投降时，立刻把事情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来了。丝毫没有取消证券税，丝毫没有放棄火災保險单的印花税，丝毫没有降低酒税，相反地，却提高了茶和糖的进口税。按照格萊斯頓先生的<sup>①</sup> 財政方案，茶税应该<sup>②</sup> 先从每磅 1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再降低到 1 先令；糖税应该先从每公担 1 英鎊降低到 15 先令，然后<sup>③</sup> 再降低到 13 先令 4 辨士。这只是指精制糖而言。白砂糖税应该从 17 先令 6 辨士逐漸降低到 13 先令 2 辨士和 11 先令 8 辨士；黃砂糖税应该从 15 先令降低到 11 先令 8 辨士和 10 先令 6 辨士；褐砂糖税应该从 13 先令 9 辨士降低到 10 先令 7 辨士和 9 先令 6 辨士；糖浆税应该从 5 先令 4 辨士降低到 3 先令 9 辨士。战争阻碍了这个方案的实现；但是按照 1855 年通过的法律，这个方案应该在 1857 年和 1858 年逐渐实现。在 1855 年 4 月 19 日把茶税从每磅 1 先令 6 辨士提高到 1 先令 9 辨士的乔治·路易斯爵士，建議把这种税在四年內降低到 1 先令，即在 1857—1858 年降低到 1 先令 7 辨士，在 1858—1859 年降低到 1 先令 5 辨士，在 1859—1860 年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最后降低到 1 先令。对于糖税，他也建議采取这种办法。我們知道，对糖的需求超过了供应，世界市場上糖的存貨减少了，例如目前在倫敦只有 43 700 吨，而两年以前还有 73 400 吨。自然，糖价也就提高。至于茶，帕麦斯頓对中国的进軍使供应受到人为的限制，因而也造成了价格的提高。任何一位經濟学家都会

① 手稿中在“格萊斯頓先生的”后面写着“1855 年的”。——編者注

② 手稿中有“在 1857 年”等字。——編者注

③ 手稿中有“在 1858 年”等字。——編者注

告訴你，在商品不足和價格上漲時期，要想使關稅的任何降低不僅有利於進口商，而且也有利於廣大的消費者，就必須使這種降低進行得很迅速，而且數量極其可觀。但是喬治·路易斯爵士却反而斷定說，在價格上漲的情況下，關稅降低得越少，就越有利於消費者。這種說法只能與他的所謂郵政收費是直接稅以及所謂混亂是任何課稅的特點這種奇談相提並論。

以提高英國人民的日常消費品茶和糖的關稅來彌補所得稅的減少，這就是公然減輕對富人的課稅，增加對窮人的課稅。但是這項理由未必能阻止下院通過這種措施。然而有些茶商，他們之所以締結了大宗的合同和協定，據他們說，完全是由於信賴喬治·路易斯爵士於1856年4月19日在下院所做的聲明（海關總署於1856年11月11日向茶商傳達過這項聲明），即“1857年4月6日茶稅將降低到1先令3辨士”。因此，茶商堅持要讓他們能夠履行自己的義務，要使預算的道義上的義務得到遵守。同時，格萊斯頓先生也很樂意報復一下帕麥斯頓，因為帕麥斯頓在利用皮爾分子先推翻得比內閣，然後推翻羅素內閣，最後推翻他們自己的長老——年邁的阿伯丁的內閣之後，忘恩負義地把皮爾分子丟開了<sup>126</sup>。此外，格萊斯頓，作為1853年財政方案的起草人，自然要保護他自己那份模範的預算，使它不受喬治·路易斯爵士的無禮侵犯。因此，他宣稱，他打算<sup>①</sup>提出以下這個提案：

“根據1855年的關稅法，本議院不同意對茶稅和糖稅作任何增加。”

一直到現在，我只談到預算的一個方面，即它的收入部分。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它的另一個方面，即預計的開支。如果說計劃中

<sup>①</sup> 手稿中在“他宣稱，他打算”這個地方是這樣一段話：“他在2月19日星期四宣稱，在星期五，由於下院決定召開經費調查委員會，他打算”。——編者注

的收入部分是英国官方社会目前状况的写照，那末，預計的开支更是英国本届政府状况的写照了。帕麦斯顿需要錢，而且需要一大笔錢，不仅是为了牢固地确立他的独裁，而且也为了滿足他的轰击广州、对波斯作战、向那不勒斯进军等等的貪欲。所以他才提出这种比 1815 年媾和以来的最高支出还超过大約 800 万英鎊的和平时期的預算。他要求 65 474 000 英鎊，而过去迪斯累里先生只要有 55 613 379 英鎊，格萊斯顿先生只要有 56 683 000 英鎊就心滿意足了。当然，約翰牛應該預見到，关于在东方取得軍事荣誉的幻想，将来一定会体现为税务檢查官手中的沉甸甸的賬单。

但是，由于战争关系而額外加征的年度稅額不能超过 360 万英鎊，即：200 万英鎊来自 1857 年 5 月到期的国庫債券；120 万英鎊来自 2 600 万英鎊新长期国債和 800 万英鎊短期国債的利息；最后，大約 40 万英鎊来自新債的还本基金。这样，加征的战时稅实际上还够不上帕麦斯顿勋爵所要求的額外支出的一半。但是他的軍事預算完全可以說明这些額外支出的增长。陆軍和海軍的全部預算从 1830 年到 1840 年平均甚至还不到 1 300 万英鎊，但是在路易斯的預算中竟达到 20 699 000 英鎊。如果我們把这个数字与战前最后五年的各个軍事預算对比一下，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1849 年的預算是 15 823 537 英鎊，1850 年的是 15 320 944 英鎊，1851 年的是 15 555 171 英鎊，1852 年的是 15 771 893 英鎊，1853—1854 年的是 17 802 000 英鎊，并且 1853—1854 年的預算在批准时已經考虑到即将爆发战争。

乔治·路易斯爵士遵照輝格党人的所謂树液生来就是喂养蠕虫的这种正統理論，举出 1856 年关于进出口的材料中所反映的国民財富的增长作为增加政府支出的理由。即使結論是正确的，前

提毕竟还是錯誤的。关于这一点，只須看一看現在在倫敦流浪街头和向习艺所<sup>127</sup>求援的成千上万一貧如洗的工人；只須看一看关于官方收入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1856年英国的茶、糖和咖啡的消費量减少了許多，只有酒精飲料的消費量略有增加。最后，只須看一看去年的貿易报告，正像現任財政部秘书长威尔逊先生本人所承认的，这份报告清楚地证明了1856年英国貿易的利潤与貿易的增长成反比例。看来，反对派領袖自然而然的策略应当是集中主要火力攻击这些过度的支出。但是，迪斯累里先生如果这样直接起来反对这种貴族式的揮霍，很可能受到自己那些同僚的暗算<sup>①</sup>。因此他只好采取极其微妙的手腕<sup>②</sup>——在論证他的反对帕麦斯頓預算的提案时，不說这个預算为1857年和1858年規定了过度的支出，而是說这个預算沒有保证国家在1858—1859年和1859—1860年得到必要数量的收入。

不論怎样，下院关于預算的辯論将是极其有趣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场辯論要决定本届政府的命运，因为这场辯論是迪斯累里—格莱斯頓—罗素联盟反对帕麦斯頓的一出好戏，而且还因为財政反对派的矛盾——他們坚持取消所得稅，禁止增加糖稅和茶稅，但又不敢公然反对过分龐大的支出——就其本身而言，无疑将是我們實踐中嶄新的东西。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2月20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7年3月9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4956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① 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迪斯累里先生认真地反对那些貴族食稅人，很可能受到他自己那帮人的背后攻击。”——編者注

② 手稿中用的不是“极其微妙的手腕”，而是“最可怜的詭計”。——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議會关于对华軍事行动的辯論

1857年2月27日于倫敦

得比伯爵和科布頓先生譴責对华軍事行动的两个議案，都按照早先所作的声明被提出了，一个是2月24日在上院提出的，另一个是2月27日<sup>①</sup>在下院提出的。上院的辯論是在下院开始辯論的那一天結束的。上院的辯論給帕麦斯頓內閣以沉重的打击，使它只得到36票比較微弱的多数。下院的辯論也許会以內閣的失敗而結束。但是不管下院的討論将引起多么大的兴趣，上院的爭論已經把論战双方的理由讲尽了，而得比和林德赫斯特两位勋爵的精彩演說已經預先說出了能言善辯的科布頓先生、爱·布尔韦尔爵士、約翰·罗素勋爵以及 *tutti quanti* [諸如此类的人] 所要說的話。

政府方面唯一的法学权威——大法官<sup>②</sup>說过：“如果英国在‘亚罗号’事件上沒有充分的根据，那末英国的一切行动自始至終都是錯誤的。”得比和林德赫斯特无疑地都证明了英国在这划艇事件上沒有任何法律根据。他們的論据同英国发表最初报道后“論壇报”专栏文章所援引的論据十分符合<sup>③</sup>，所以我在这里只須把他們的論据簡略地叙述一下。

① “馬克思論中国” 劳倫斯和韦斯哈特出版公司 1951年倫敦版所載日期为2月26日。——譯者注

② 克兰沃斯。——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112—117頁。——編者注

英方為推卸廣州屠殺<sup>128</sup>的罪責而硬加在中國政府身上的罪名是什麼呢？那就是：違背了1843年的善後補充條約第九款。該款規定，凡逃抵香港殖民地或潛藏於英國軍艦或商船上的中國罪犯，中國當局不得自行逮捕，而應通過英國領事提取，由英國領事將罪犯引渡給地方當局。現在中國官員却撇開英國領事，逮捕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划艇“亞羅號”上的中國海盜。所以也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亞羅號”是不是英國船？據得比勛爵說：

“該船是由中國人建造、中國人俘獲、中國人出售、中國人購買的，船員是中國人，船歸中國人所有。”

既然如此，這只中國船是怎樣變成英國商船的呢？是靠在香港買到了英國船籍登記證或航行執照。這種登記證的法律根據是1855年3月香港地方立法機關所頒布的命令。但是，這個命令不僅違背了中英之間的現有条約，並且還取消了英國自己的法律。因此，它是無效的。這個命令只有依據商船條例才能在英國人眼中取得一點合法的外貌，但商船條例是在香港的命令頒布了兩個月後才通過的。況且這個命令與商船條例的條款根本就不一致。因此，划艇“亞羅號”所借以取得船籍登記證的那個命令，不過是一張廢紙。然而即使依照這張不值一文的廢紙，“亞羅號”也得不到它的保護，因為這只船已違背它所規定的條件，船的執照已經滿期。這一點，連約翰·包令爵士<sup>①</sup>自己也承認。可是，有人說，不管“亞羅號”是不是英國船，總之，船上掛的是英國國旗，而這面旗子受到了侮辱。首先<sup>②</sup>，如果掛了旗子，那末這面旗子是掛得不合

① 在手稿中是這樣寫的：“曾寫信給巴夏禮領事，說‘亞羅號’無權得到英國的庇護的約翰·包令爵士”。——編者注

② 在手稿中是這樣寫的：“但是，首先，‘亞羅號’沒有權利掛英國國旗，約翰·包

法的。然而究竟是不是挂了旗子呢？关于这一点，在英国和中国的声明中是有分歧的。但是，中国的声明已經为領事們所轉交的、葡萄牙第 83 号划艇的船长和船員的证詞证实了。11 月 13 日的一期“中华之友”<sup>129</sup> 援用这些证詞說道：“現在广州尽人皆知，該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沒有挂英国国旗。”可見，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拘泥于国家荣誉的形式問題也不能成立<sup>③</sup>。

得比勋爵在这次演說中很知趣地完全克制了爱讲俏皮話的习惯，从而使自己的論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性质。可是，他不費什么力气就使自己的演說充滿了极深刻的諷刺。实际上，身为英国世襲貴族首領的得比伯爵是在反駁边沁的得意門生、以前的博士、現在的爵士約翰·包令；他是在維護人道，駁斥那位選擇人道为职业的人；他是在捍卫各国的真正利益，反对那位坚持外交礼节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他訴諸 *«vox populi—vox dei»* [“民声即天声”] 的公式，反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sup>130</sup> 这一公式的拥护者。征服者的后裔宣揚和平，而和平协会<sup>131</sup> 的一个會員却鼓吹开炮；得比痛斥英国舰队的行动，說那是“卑鄙的行徑”和“可耻的軍事行动”，而包令却因为这种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怯懦的橫暴行为而祝賀舰队的“輝煌成就，无比勇敢，以及軍事技巧和英勇气概的卓越結合”。得比伯爵越是好像不大意識到这些对比，这些对比的諷刺性就越是尖刻。他在一次历史的大諷刺中占了上風，这次历史的大諷刺不是由个别人物的机智灵敏造成的，而是由客观情勢的滑稽可笑造成的。在全部英国議會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次

---

令爵士本人在 10 月 11 日自香港寄給巴夏礼領事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因此”。——編者注

③ 手稿的片断到此为止。——編者注

貴族对暴发戶的精神上的胜利。

得比勋爵一开始就声明：他“只能依据他打算批判其行为的那些人所提供的声明和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完全足以“論证他的論点”。可是已經公正地指出过，政府这样公布的这些文件使政府有可能将全部責任推卸給自己的部屬。这一点也不假：議會中政府反对派的攻击完全指向包令及其同伙，政府可以同意这种攻击而絲毫不損害本身的地位。我現在引用勋爵本人的話：

“我不願意說任何不尊敬包令博士的話。他也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据我看来，在准許他进入广州的問題上，他簡直是害了偏执狂。（贊同声和笑声）我相信，他真的梦见自己进入广州了。我相信，这是他清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他入睡以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他要是半夜醒来，这个念头也会出現。（笑声）我相信，約翰·包令爵士只要能在广州衙門受到正式的接待，他会认为，同这件事所得到的巨大利益相比，任何牺牲都不为大，任何通商中断都不足惜，任何流血都不足悔。（笑声）”

接着是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言：

“約翰·包令爵士不仅是全权代表，而且是著名的人道宣揚者（笑声），他自己承认船籍登記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艇沒有权利挂英国国旗。可是請注意他所說的話：‘船不在我們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給他們。’他甚至重复強調这一点，因为实质上他就是說，我們知道中国人并没有犯下任何違背条約的罪过，但是我們不告訴他們这件事；我們坚持要求賠償損失并且要求在送回被捕者时举行特別仪式。要是不按照这种仪式送回水手，那末采取什么补救办法呢？很简单，攫夺一只中国帆船，即中国兵船。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再攫夺几只，直到我們强迫中国人屈服为止，虽然我們明知他們有理，而我們沒有理。（贊同声）以往有过比这更恶劣更可耻的行为嗎？还有过比这位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的人提出的口实更虚伪的嗎？——且不說更欺詐的，但是在我国虚伪就等于欺詐。（贊同声）令人惊異的是，这位約翰·包令爵士竟会认为他有宣战的权利。一个处在这种地位的人在必要时有权进行自卫，对于这一点，我是能够

理解的；可是竟因此而以那样一种理由，那样一种口实来采取进攻行动，这却是世界史上难以找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从提交給議院的文件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自从約翰·包令爵士一开始就任現职以来，他的野心就是要达到他的許多前任根本没有达到的目的，那就是进入广州城。他一心一意地要达到进入广州城的目的，而毫无必要地使国家卷入了战争。結果又怎样呢？属于英国臣民的、价值 150 万英镑的巨額财产，現在在广州被沒收了；此外，我們的商館被燒光了；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出于一个最有害的人的有害政策造成的。

‘驕傲的世人  
掌握到暫时的权力，  
却会忘記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們也都流泪心伤。’<sup>①</sup>”

最后，格雷勋爵发言：

“如果諸位看一看文件，便会相信，当約翰·包令爵士請求会見叶总督时，总督表示自己准备会見他，不过指定商人伍浩官座落城外的房子作为会面地点。然而約翰·包令爵士却觉得，除了总督官邸以外，到任何地方去都有失尊严。在通过議案时，如果期待不到什么別的结果，我希望至少得出这样一个有益的结果，即立刻召回約翰·包令爵士。”

約翰·包令爵士在下院也遭到同样的斥責，而科布頓先生甚至在一开始演說时就郑重宣布同这位“有着二十年交情的人”絕交。

从得比、林德赫斯特和格雷三位勋爵的演說中摘引的原話证明，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只要撇开約翰·包令爵士，不让自己同这位“著名的人道宣揚者”混在一起，就可以擋开攻击。政府所以能这样輕易地摆脱窘境，既不是由于政府反对派的寬容，也不是由于

<sup>①</sup> 莎士比亚“量罪記”第二幕第二場。——編者注

政府反对派的策略，而完全是由于提交議會的那些文件；只要稍微看一看这些文件以及根据这些文件所进行的辯論，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約翰·包令爵士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正如倫敦“泰晤士报”所說，这个人“完全自行其是，既不和他国内的上司商量，也不考虑上司的政策”，这难道还没有证实嗎？既然如此，为什么帕麦斯頓勋爵要在他的政府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他遇到財政、对波斯战争、秘密条約、选举改革<sup>132</sup>、联合內閣等种种困难的时候，在他感觉到两院注視他的目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肃而較少贊揚”的时候，——为什么他恰好要选定这个时候，冒着不仅使自己的地位更加恶化而且使自己彻底垮台的危險，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向另外一个人，而且是向他的一个屬下表现出始終不渝的忠忱呢？为什么他要把自己新生的热情弄到这种地步，以致使自己成为一位包令博士的替罪者呢？当然，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认为这位高貴的子爵能陷入这种浪漫主义的迷誤。他在这次同中国发生的糾葛中所持的政策确切证明了他提交議會的文件是不完全的。除了已經公布的文件，必定还有秘密文件和秘密訓令，这些文件和訓令会证明：如果包令博士真的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是由于在他背后有一位头脑冷靜的白厅首脑<sup>①</sup>鼓励了这种偏执狂，并且为了自己的目的把这种偏执狂从潜热状态煽成了吞噬一切的火焰。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2 月 27 日

載于 1857 年 3 月 16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96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并根据手稿的片断校对过

① 帕麦斯頓。——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帕麥斯頓內閣的失敗

1857年3月6日于倫敦

下院关于中国問題的辯論，經過四个夜晚的激烈爭吵以后，終于以通过对帕麥斯頓內閣不信任案而平靜下来。帕麥斯頓用“懲罰解散”来回敬不信任<sup>①</sup>。他把下院議員罰回老家去。

辯論的最后一个晚上，下院會場內部和聚在附近街道上的群众中間籠罩着极强烈的激动情緒，这不单是由于涉及到的利害关系重大，而且更多地是由于受审判的这个人的特点。帕麥斯頓的統治，不是一个普通內閣的統治。这是一种独裁。自从对俄战争一开始，議會就已几乎放棄了它的宪法职权；甚至在締和以后，它也不敢重新行使这种职权。它經過一种逐漸的、几乎是觉察不到的衰退过程，已經降到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的地位，它不同于真正的波拿巴御用机构的地方，只在于它那虛飾的門面和高傲的調子。单是組成联合內閣这一点就已表明，各旧政党（議會机器靠它們彼此的摩擦来保持運轉）已經化为烏有。起初通过联合內閣反映出来的各政党的这种軟弱无力，后来由于战争而体现成为

---

<sup>①</sup> 下院在1857年2月26、27日、3月2、3日进行辯論，最后以263票对247票通过对帕麥斯頓內閣不信任案，帕麥斯頓隨即解散了議會。——譯者注

一个人的至高无上，这个人在他半世紀的政治生涯中，从来不曾属于任何政党，但却一直利用了一切政党。如果不发生对俄战争，那末这些旧的正牌政党的沒落本身就会引起转变。議會將由于給它的机体中注入新鮮血液、給至今在議會中还没有表决权 and 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至少某一部分以政治权利，而获得新的生命。然而战争中断了这一自然的发展过程。战争沒有使旧的議會矛盾的中和化有利于群众，而是使这一过程唯独对一个人有利。結果我們得到的不是英国人民的政治解放，而是帕麥斯頓的独裁。战争是形成这种結果的有力的动力，战争也是巩固这种結果的唯一手段。所以战争已变成帕麥斯頓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在英国人民中間，对俄战争比巴黎和平还要更受欢迎。那末为什么英国的阿基里斯(凸角堡的耻辱和卡尔斯的陷落<sup>133</sup> 就是在他的蔭底下发生的)沒有利用这种有利的情况呢？很明显，这是因为选择权并不操在他的手中。于是就有他的由于他与美国的誤解而簽訂的巴黎条約，于是就有他的远征那不勒斯，他和波拿巴的表面爭吵，他对波斯的侵犯以及他在中国的大屠杀<sup>134</sup>。

下院就这最后一个事件通过不信任案，便是消灭帕麥斯頓所篡夺的权力的手段。所以这次投票不是單純的議會表决，而是反叛——一种强制恢复議會宪法职权的企图。議會里普遍的感觉是如此，而且不管形成这种杂牌多数的各个派系(包括得比派、皮尔派、曼彻斯特派、罗素派以及所謂独立派)抱有什么特別的动机，它們說决不是一般的反政府陰謀使它們投票一致，倒都是誠懇的。然而，指責它們搞陰謀正是帕麥斯頓用以自卫的武器。他以 *argumentum ad misericordiam* [号召仁慈为怀]，把自己装扮成无原則的陰謀的牺牲品，来掩盖自己地位的虛弱。对于这种像老貝利<sup>135</sup>



的罪犯們所慣用的辯詞，再沒有比迪斯累里先生的斥責更加中肯的了。迪斯累里說：

“首相是世界上唯一不能容忍联合的一个人。然而，他却正是毫无原則的政治联合的典型。請看，他的政府是怎样組成的吧。就在去年，他的內閣的全体閣員都在本院支持一个法案，据我看，那个法案是前届內閣的一位閣員提出的。但是在上院，这个法案却遭到他的一位閣員的反对，并且这位閣員为了給自己那显然与現內閣不一致的行为辯解，竟大胆地宣布說，当他就任閣員的时候，首相并不要他对于任何問題承担义务。（笑声）然而，高貴的勳爵却对目前所形成的这种无原則的联合感到大为震惊！高貴的勳爵不能容忍联合！高貴的勳爵只和那些在政治上同他一起投生和长大的人們在一起活动。（掌声与笑声）这个海格立斯（指着帕麦斯頓勳爵）是从小在輝格党的搖籃里长大的，他的政治生活是多么首尾一貫啊！（笑声再起）在过去的半个世紀中，高貴的勳爵几乎信奉一切原則，几乎和每个政党結成联盟，而在今天晚上，他高声地发出了反对联合的警告，因为他害怕下院的多數——其中包括若干最杰出的、曾做过高貴勳爵的同僚的議員——会不贊同他的对华政策，这个政策以暴行作为开端，如果这样繼續下去，将以毀灭告終。先生，这就是高貴的勳爵現在所处的地位。我們曾听到高貴的勳爵对于这样的政策作过什么辯护嗎？他有没有提出哪怕一条我們的对华关系所应当遵守的原則呢？他有没有規定哪怕一条我們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能够遵循的政治准則呢？相反，他借詞掩盖他那虛弱而搖摆的地位，而說——說什么呢？——說他是陰謀的牺牲品。他不是像一个大丈夫或者政治家那样出来为自己的行为辯护。他把辯論中提出的一些在我看来实际上已經了結和遺忘了的瑣細意見顛三倒四地重复一遍，然后轉回來說这一切都是陰謀！高貴的勳爵习惯于不提出一条原則而获得多數——这种多數实际上是偶然情况的結果，事实上它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高貴的勳爵坐在議席上，不必就任何一个能触动国人心灵或影响全国輿論的國內外問題发表意見，現在他終于会发现，如果他要做一个政治家，他必須持有一定的政治路綫的时候已經到了；他也会懂得，当他的內閣的粗暴錯誤被发现、并且所有那些通常影响本院意見的人都一致加以斥責的时候，他不應該向国人申訴他是陰謀的牺牲品。”

然而，要說这次辯論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辯論触及了动人心弦

的問題，那也是十分錯誤的。辯論一晚又一晚地進行，而總不舉行表決。在大部分搏鬥中，鬥士們的聲音都淹沒在私人交談的嘈雜聲浪中。一晚復一晚，政府派故意用演說拖時間，以便贏得另一個晝夜去進行陰謀和幕後活動。第一天晚上，科布頓先生發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說。布尔韦尔和罗素勳爵的演說也不壞；可是首席檢察官<sup>①</sup>對他們說，“他無論如何不能拿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與論證去和在另一院發表的論證作比較”，這話無疑是正確的。第二個夜晚被雙方的代理人——檢察長<sup>②</sup>，懷特塞德先生和首席檢察官——冗長的專門關於法律方面的爭論占去了。詹姆士·格萊安爵士確曾試圖使辯論更加生動，但是沒有成功。當這個邦迪埃拉兄弟的實際謀殺者<sup>136</sup>偽善地高聲說，他“要洗清他與這無辜流血案件的关系”的時候，會場上對他的悲憤激情的回答是抑制不住的譏笑。第三天晚上更是無聊。先是 *in spe* [未來的] 首席檢察官弗·塞西杰爾爵士答辯 *in re* [現任的] 首席檢察官，其次是法學家施博士想方設法答辯弗·塞西杰爾爵士。約翰·帕金頓爵士大力施展他那俚俗的辯才。卡爾斯的威廉斯將軍的發言，下院只靜聽了幾分鐘，就不約而同地置之不理了，因為看出了他並不是他們原來想像中的那個人。最後，悉尼·赫伯特爵士發了言。這位皮爾政治學派的文雅後生所發表的演說，的確簡潔有力、尖銳、與眾不同，不過它多半是譏諷政府派的論點，而沒有提出他自己的新論點。但是最後一個晚上，辯論卻達到了下院所應有的水平。羅巴克、格萊斯頓、帕麥斯頓和迪斯累里都各有千秋。

困難在於撇開在辯論中被用做擋箭牌的約翰·包令爵士，而

① 貝瑟耳。——編者注

② 蒙克里夫。——編者注

直接揭露帕麦斯頓勋爵本人，要他个人对“屠杀无辜者”負責。这点终于做到了。由于即将举行的英国大选，主要将圍繞着这个问题进行，我們不妨尽可能簡要地介紹一下这次討論的結果。在內閣垮台的第二天和內閣宣布解散下院的前一天，倫敦“泰晤士报”曾大胆地这样断言：

“国民对于究竟應該回答什么問題，将感到为难。在这里得到消息六个星期以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干出的，并且是前任內閣所委派的官員干出的那一系列行动，是否使帕麦斯頓勋爵的內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了呢？大臣們在圣诞节才初次听到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在那以前他們也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地一无所知。事实上，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月球上或者是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現任內閣对它的关系也不可能更少些……难道帕麦斯頓勋爵的內閣應該为了它过去从未做过并且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为了它只是与大家同时听到的事情，为了那些不是由它委派的并且它至今未能与之保持任何联系的人們所做的事情，而被譴責和推翻嗎？”

对于这家一直把广州屠杀說成是帕麦斯頓外交杰作的报纸所发表的这篇无耻謾言，我們可以举出几件在冗长辯論中很費勁地确定下来并且从来沒有遭到帕麦斯頓或其屬下辯駁过的事实来反駁。1847年，帕麦斯頓勋爵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那要求准許香港英国当局进入广州城的第一道訓令，就是用恫吓的詞句写成的。不过，他的火气被他的同僚，当时的殖民大臣格雷伯爵澆了一盆冷水，格雷伯爵給不仅駐在香港的、而且駐在錫兰的海軍部队的指揮官們发出了一道最严格的命令，禁止在未得到来自英国的特別許可时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侵犯行动。然而，帕麦斯頓勋爵在1849年8月18日，即在他退出罗素內閣之前不久，給駐在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出了如下的訓令：

“不要让广州的高級官員或北京政府自我陶醉。英国政府迄今表現寬

容，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软弱，而是由于它意识到自己具有优势力量。英国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

因此，1856年帕麦斯顿勋爵任首相时所发生的炮轰广州的事情，早在1849年帕麦斯顿勋爵任罗素内阁外交大臣时，就已在最后一次发到香港去的训令里有了先兆了。那时以来的历届内阁都不会稍微放松那项严格禁止香港英国代表迫使中国当局准许他们进入广州城的命令。罗素内阁的格兰维耳伯爵，得比内阁的馬姆茲伯里伯爵和阿伯丁内阁的紐卡斯尔公爵都是如此。最后，到1852年，一直做广州领事的包令博士被任命为全权代表。据格萊斯顿先生說，包令的任命是帕麦斯顿的盲目工具克拉倫登伯爵一手包办的，事先并未告知阿伯丁内阁或征得他的同意。当包令第一次提出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时，克拉倫登在1854年7月5日的训令里对他說，他是对的，但是他应该等到为实现他的目的所必需的海军力量已经具备时才动手。当时英国正和俄国作战。当“亚罗号”事件发生的时候，包令正好得悉已经媾和，并且的确给他派去了海军。于是就找借口与叶总督发生了纠纷。1月10日，克拉倫登得到全部情况的报告后告诉包令說，“女王陛下政府完全同意西馬廐各厘爵士和您所采取的做法。”这个措词如此简单的赞同意见并未附有任何进一步的指示。正相反，哈蒙德先生在給海军大臣的信中，以克拉倫登勋爵的名义向西馬廐各厘海军上将表示了政府赞扬“他行动的温和，以及他尊重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态度”。

由此可知，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由帕麦斯顿勋爵亲自策划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今他希望打出什么旗号去愚弄联合

---

王国的选民,这个问题我希望留到下一篇通讯里去回答,因为这篇通讯已经超过它的限度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6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3 月 2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97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sup>137</sup>

1857年3月13日于倫敦

“站在两个教士中間，好大人，  
好让我借此高唱贊美圣曲。”<sup>①</sup>

帕麦斯頓并没有完全按照白金汉給理查三世出的主意行事。他站在教士和鴉片走私商中間。这个老练的騙子让他的亲戚舍夫茨別利伯爵推荐的那些低教会派主教，证明他“正直无邪”，而贩卖“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sup>②</sup>的鴉片走私商，則证明他忠心耿耿地为“私利，这顛倒乾坤的势力”<sup>③</sup>服务。苏格兰人伯克以倫敦的“尸首販子”<sup>138</sup>自豪。同样，帕麦斯頓以利物浦的“毒品販子”自豪。这些仪表堂堂的先生都是那个追本溯源以奴隶貿易揚名天下的城市的尊貴代表。別无什么詩作聞名的利物浦，至少有資格要求給它記上一笔独特的功劳，即它曾以贊美奴隶貿易的頌歌丰富了詩坛。所以，如果說品得曾以“万物莫好过于水”（«Ariston men hudor»）<sup>④</sup>的名句开始他那篇贊美奥林匹克競技会优胜者的頌歌，現代利物

①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三幕第七場。——編者注

② 莎士比亚“約翰王”第一幕第一場。——編者注

③ 同上，第二幕第一場。——編者注

④ 引自品得“第一首奥林匹克頌歌”。——編者注

浦的品得在他贊美唐宁街<sup>139</sup>空談家的頌歌里就很可能用上一个更巧妙的首句：“万物莫好过于鴉片”。

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鴉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們大部分都直接或間接从事鴉片貿易，因此热中于取消与中国簽訂的現行条約。此外他們还有自己的打算。去年他們冒險进行了大宗茶叶投机生意，战事拖延下去，会同时既使他們的大量存貨漲价，又使他們能延期偿付广州債主的巨額債款。这样，战争会使他們能够同时既欺騙英国买主又欺騙中国卖主，因而实现他們所謂的“民族光荣”和“貿易利益”。一般地說，英国工厂主并不贊同这种利物浦教义問答的教条，所根据的也是那个把希望棉价低廉的曼彻斯特人跟希望棉价高昂的利物浦人对立起来的高尚原則。在1839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期間，英国工厂主曾陶醉于出口貿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們曾一碼一碼地量出了准备給天朝人穿著的棉織品。然而，实际經驗砸碎了帕麦斯頓这类政客鎖住天朝人心窍的那把大鎖。从1854年到1857年，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出口平均一年不超过125万英鎊，而这是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的年份里常常达到的数目字。

英国工厂主发言人科布頓先生在下院說道：“实际上，从1842年以来，我們〈即联合王国〉絲毫也沒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至少在我們的工业品方面是如此。我們增加了茶的消費量；仅此而已。”

因此，在对华政策方面，英国工厂主能够比英国主教、鴉片走私商和茶商看得更广闊些。如果除去那些抓着每届政府的衣裙不放的寄生虫和钻营家，除去那些相信在帕麦<sup>①</sup>的蔭庇下“民族将振

① 帕麦斯頓。——編者注

奋起来”的糊涂的清谈爱国者，我們实际上已把帕麦斯顿所有的 bona fide〔真正的〕党羽都列举出来了。不过，我們还不应该忘記倫敦“泰晤士报”和“笨拙”杂志——英国新聞界的大科夫塔和小丑<sup>140</sup>；它們二者都被黃金的鏈条和官方的鏈条跟現政府連在一起，因此也就以装模作样的热情来頌揚这位广州大屠杀的英雄。既然如此，就应该认为下院的表决不仅意味着对帕麦斯顿的反叛，而且意味着对“泰晤士报”的反叛。所以，即将来临的选举不仅要决定帕麦斯顿是否能独攬国家的全部权力，而且还要决定“泰晤士报”是否能完全壟断輿論的制造。

帕麦斯顿到底会用什么口号来爭取大选的选票呢？扩大对华貿易嗎？但是他已經破坏了这种貿易賴以进行的口岸。他已經使这种貿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內从海上轉向了大陆，从五个通商口岸轉向了西伯利亚，从英国轉向了俄国。他提高了联合王国的茶叶进口稅，这是扩大对华貿易的最大障碍。保障英国商人冒險家的安全嗎？但是政府本身給下院提出的藍皮书“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侮辱事件的函件”<sup>141</sup>证明，最近七年来那里只发生了六起侮辱事件，其中两起的肇事者是英国人，而在其余四起中，中国当局尽力惩办了罪犯，使英国当局感到完全滿意。所以，如果目前香港、新加坡等地英国商人的生命財產有危險，他們的危險也是帕麦斯顿自己招来的。那末，維護英国国旗的荣誉！帕麦斯顿已經把它按每面 50 英鎊的价格出卖給香港的走私商，并且以“大批屠杀手无寸铁的英国貨买主”玷污了它。然而，扩大貿易、保障英国商人冒險家的安全和維護英国国旗的荣誉这些口号，是那些現在已向选民发表演說的政府先知們提出的全部口号。他們聪明地避而不談任何国内政策問題，因为“不要改革”和“增加捐稅”的口号是得不



到支持的。帕麦斯顿内阁的一位阁员，皇室司库马尔格累夫勋爵对选民说，他“不想提出任何政治理论”。另一位阁员，鲍勃·娄，在基台尔明斯特发表演说时嘲笑不记名投票、扩大选举权以及诸如此类的“欺人之谈”。还有一位阁员，拉布谢尔先生，就是那个以这样一种借口来为炮轰广州辩护的聪明人，他说，如果下院认为这一行动不正当，那末英国人民就得准备给那些财产在广州遭到毁灭的外国商人赔偿大约 500 万英镑，——就是那个拉布谢尔，在向汤顿的选民发表演说时根本抛开政治，只拿包令、巴夏礼、西马糜各厘的丰功伟绩来作为他竞选的论据。

所以，一家英国地方报纸认为帕麦斯顿不仅没有“成功的竞选口号，而且没有任何口号”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事情决不是绝望了。从下院表决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对广州采取的地方性暴力行动已导致对中国的全面战争。现在的问题只是由谁来继续进行这场战争？难道断言这场战争正当的人，不是比那些靠谴责这场战争而当选的对手更能有力地进行战争吗？

难道帕麦斯顿不会在两届内阁交替期间把事情搞得一团混乱，以致没有他就万万不行吗？

其次，单是发生选举斗争这件事，难道不会使问题得到有利于他的解决吗？按英国选民目前的成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选举斗争就意味着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斗争。既然帕麦斯顿是辉格党的实际领袖，既然他的失败必然造成托利党的上台，那末大多数的所谓自由派难道不会为了打垮得比而投票支持帕麦斯顿吗？这些就是政府派实际所指望的。如果他们的估计正确，那末人们迄今默然忍受的帕麦斯顿的专制独裁就会公开宣告实行。新的议会多数只有毫不含糊地宣布对首相俯首听命才能存在。可能，随着

帕麦斯顿撇开议会而诉诸人民，将来会发生 coup d'état [政变]，正如随着波拿巴撇开 Assemblée Nationale [国民议会] 而诉诸全国，发生过 coup d'état<sup>142</sup> 一样。那时，正是这些人民会由于吃了苦头而认识到，帕麦斯顿原来是卡斯尔里—西德默思内阁的旧僚，这个内阁曾经压制出版，禁止集会，停止实行 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使政府的任意监禁和放逐合法化，最后还在曼彻斯特屠杀了反对谷物法的人民<sup>143</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13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7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馬克思

### \*俄国的对华貿易

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侖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貿易和往来方面，俄国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羡慕。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費一文錢、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和我們連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至于法国人，他們之参加目前的軍事行动，完全是客串性质的，因为他們实际上沒有同中国进行貿易，——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駐使节的优先权。固然，据說这种优先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它只有算作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貢藩屬才得側身于天朝的朝廷。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有可能产生一种絕不仅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

既然俄国人沒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貿易，他們从来就和有关这个问题的糾紛沒有利害关系，过去和現在都从来沒有卷入这种糾紛里去；因此，中国人的反感也就沒有扩展到俄国人身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們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而且不是毫无根据地把他們同那些大概經常出沒中国沿海的海盜或冒險家相提并論。不过，俄国人自己独享內地陆路貿易，成了他們沒

有可能参加海上貿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貿易中，他們是不会有竞争者的。这种由 1768 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統治时期訂立的条約規定下来的貿易，是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韃靼<sup>①</sup>交界处、在流入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在伊尔庫茨克城以南离城約 100 英里。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貿易，由十二个中間人經營，其中六个是俄国人，六个是中国人；他們在恰克图会商，由于貿易完全是以貨易貨，还要决定双方所应提供交換的商品比例。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織品和毛織品。近几年来，这种貿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 4 万箱；但在 1852 年却达 175 000 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貨，即在大陆消費者中間享有盛誉的所謂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貨。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有限。俄国人則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屬制品，毛皮以至鴉片。买卖貨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賬目来看，貨物定价都不高）竟达 1 500 万美元以上的巨額。1853 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sup>144</sup>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領，起义者搶劫敌人的商队，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 5 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貿易額只有 600 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內，这种貿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 1855 年集市的茶叶不下 112 000 箱。

由于这种貿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

<sup>①</sup> 蒙古。——編者注

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駐上了一位軍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約 900 英里的北京之間，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傳遞公文。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貿易由于現在发生的軍事行动而停止了，欧洲就只能从这条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海上貿易将重新开放，俄国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設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場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里巴瓦两港同位于俄国中部的古城——下新城（在恰克图經商的商人居住地）之間的交通。欧洲將經由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这要比利用我們所設計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有远为更大的可能。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絲，由于它的体积远远小于它的价值，由陆路运输也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貿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別处找不到的銷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貿易。它占領当今中国統治王朝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sup>①</sup>期間曾經一度中断，但是，无疑地，它将来会大力恢复这种努力的。俄国占領了千島群島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經拥有一个舰队，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設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貿易。不过，这与擴張已經为它壟断的陆路貿易比較起来，还是次要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18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4 月 7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981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sup>①</sup> 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选举

1857年3月20日于倫敦

編写 1848 年到 1858 年这段时期的欧洲历史的未来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波拿巴于 1851 年对法国所采用的手段同帕麦斯頓于 1857 年对联合王国所采用的手段竟如此相似而惊愕不已。这两个人都假装不求助于議会而求助于国民，不求助于狡猾的政党联合，而求助于老实的輿論。这两个人都提出同样的借口。如果說波拿巴曾經准备使法国免遭社会危机，那末如今帕麦斯頓就正在准备使英国免遭国际危机。和波拿巴一样，帕麦斯頓必須抓住强有力的执行权来对付立法权的空洞談論和煩瀆干涉。波拿巴同时既訴諸保守派<sup>145</sup>，又訴諸革命派，把前者当做貴族的敌人，把后者当做資产階級篡位夺权的敌人。而帕麦斯頓——难道他沒有侮辱一切专制政府嗎？那末他会引起任何自由派的不滿嗎？另一方面，难道他沒有出卖一切革命嗎？那末他不是應該成为保守派挑中的人物嗎？他反对任何改革，保守派难道会不支持他嗎？他不让托利党人担任官职，那末自由派的钻营之徒难道会拋棄他嗎？波拿巴是一个使外国人害怕和代表法国光荣的名字。帕麦斯頓对于联合王国說来不也正是如此嗎？不管怎样，他从 1830 年实行选举改革<sup>146</sup>以来，即从英国近代史开始以来，除了几次短暫的間隔以外，

一直是执掌外交部的。因此，英国的国际地位，不管在外国人看来是多么“可怕”或多么“光荣”，是与帕麦斯顿勋爵个人有关的。波拿巴一拳就把法国所有公认的大人物打倒了，但是帕麦斯顿难道不会把罗素分子、格莱安分子、格莱斯顿分子、罗巴克分子、科布顿分子、迪斯累里分子 *tutti quanti* [等等]“碎为齏粉”吗？波拿巴不曾有任何原则、任何准则，但是他曾答应给法国提供它所希望的东西——一个人。帕麦斯顿现在也是这样做的。他，也是一个人。甚至他的最凶恶的敌人都不敢说他代表什么原则。

难道 *Assemblée Législative* [立法议会] 制度不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sup>147</sup> 组成并掺杂了少许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联合的制度吗？这个联合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中所代表的那些政党是分散的，因为旧的党派传统只允许它们结成消极的统一体。这种消极的统一体不能采取行动；它的行动只能是消极的；它只能是一种障碍；波拿巴的权力即由此而来。但是，帕麦斯顿的情况现在不也正是如此吗？难道从 1852 年起召开的议会不是联合议会，难道它因此不是一开始便体现为联合内阁了吗？*Assemblée Nationale* [国民议会] 等到被波拿巴强迫驱散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有行为能力的多数。下院在终于被帕麦斯顿宣布解散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波拿巴在诉诸国民以前就宣布了 *coup d'état* [政变]。受宪法约束的帕麦斯顿在试图宣布 *coup d'état* 之前，必须先诉诸国民。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一切优点都在波拿巴方面。巴黎的大屠杀，各省的侦缉队，到处戒严，宣布人们不受法律保护，大规模的放逐，投票箱前后的刺刀和大炮，——所有这一切都使波拿巴派报纸（唯一未被十二月洪水冲走的报纸）的论据具有不祥的雄辩能力，无论这家报纸所固有的毫不新奇的

詭辯、令人极端厌恶的邏輯以及辞藻堆砌得令人作嘔的阿諛奉承都不能使它的說服力有所减少。相反，帕麦斯頓的姿罗喊得越高，他的地位就越不穩固。尽管他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可是他忘記吩咐自己的奴才記住人們給那想为瞎子領路的跛子所提出的忠告，——他忘記叮囑他們記住达来朗所說的 «pas de zèle» [“不要太殷勤”]。的确，他們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太过火了。就拿首都一份报纸上所刊登的这样一篇頌詞作例子吧：

“帕麦斯頓万岁！——这就是我們期望将要在每一个选民会上喊出的口号…… 对帕麦斯頓勋爵无限忠誠——这就是應該列入每一个候选人的信条中的第一条教义…… 必須要自由派的候选人承认：帕麦斯頓勋爵担任首相——这是当今的政治必然性。无论如何必須承认他是当代的英雄，不仅是未来的英雄，而且是我們眼前的英雄；不仅是紧要时期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是我們同时代人中唯一的、生来应付我国显然即将面临的情况的人物…… 他是現代的偶像，是万民爱戴的人，是一輪冉冉东升的旭日。”<sup>148</sup>

难怪約翰牛不能忍受这些，并且对頌揚帕麦斯頓的热狂产生了反感。

由于帕麦斯頓本人被宣布为政治原則，所以毫不奇怪，他的对手們也就把对他本人的批判研究当做了自己的政治原則。的确，我們看到，帕麦斯頓仿佛有魔法似的，使議會制英国的所有昔日巨擘都死而复生了。可以证明这种說法的，是約翰·罗素勋爵（輝格党人）在倫敦飯店一次首都选民會議上出現的場面，以及皮尔分子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在卡賴尔选民面前演出的戏，最后，还有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理查·科布頓在曼彻斯特自由貿易大厅的群众大会上的戏剧性表演。帕麦斯頓的做法完全不像海格立斯那样。他不是把巨人举到空中去杀死<sup>149</sup>，而是把侏儒們推回到地面上，賦予新的力量。如果有人在世入眼目中貶低了自己，那末这无疑



約翰·羅素勛爵，一位所有法律早产儿的生父，随波逐流的英雄，維也納的外交調停人<sup>150</sup>，能使一切都无可挽救地化为烏有的人物。但是現在請看一看他昂首闊步地出現在倫敦选民面前的場面吧。何以会有这种变化呢？这純粹是帕麦斯頓給他安排的环境造成的。羅素說，我是廢除宣誓法和市鎮机关法的法律的起草者，是議會改革法案、市政机关改革法案、調整教会什一稅問題法案、某些关于非国教徒的自由派法律<sup>151</sup>以及若干有关爱尔兰的法律的起草者。总而言之，我体现了輝格党人政策中一切进步事物的实质。难道你們为了一个代表着并无人民成分的輝格主义（不是作为政党而只是作为一群钻营之徒的輝格主义）的人而把我牺牲掉嗎？然后，羅素把自己的缺点用来吹嘘自己。我一向是反对不記名投票的。难道你們以为帕麦斯頓奚落我，我現在就会屈辱自己而放棄信念，就会承担支持急进改革的义务嗎？他的听众叫道，不，不要让羅素勛爵現在承担支持不記名投票的义务。这位小人物的偉大之处，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自己是微小改革的拥护者。为不贊成不記名投票的羅素勛爵三呼万岁，再呼万岁！然后，羅素勛爵使天平完全傾向于他那一方面，他向到会的人問道：他們能否允許一个小小的鴉片商集团按照帕麦斯頓的命令組成竞选团体来把政府所示意的决定强加在首都的自由选民身上，并且按照同一位帕麦斯頓的命令，使他，即十六年以来一直是他們的朋友的約翰·羅素勛爵本人遭到奚落！不！不！听众高声喊道，打倒这个集团！約翰·羅素勛爵万岁！很可能，現在羅素不仅将在倫敦重新当选为議員，而且可能得票最多。

詹姆士·格萊安爵士的故事則更有趣。如果說約翰·羅素勛爵变得很可笑，那末格萊安就变得很可怜了。他对他的卡賴尔选

民說，难道只是因为我生平有一次凭良心办了事、宁可冒着丧失政治地位的危險而不願屈从于一个人的专权，我就應該被人当做一支点完了的蜡烛一样吹灭，或者應該像一只被赶出賽狗場的狗一样溜走嗎？你們不管我干了多少可耻的事情，还是选举我作为你們的代表。难道你們会因为我做了唯一的一件好事而要我退职嗎？卡賴尔的选民回答道，当然不会。

与罗素和格萊安不同，曼彻斯特的科布頓先生所要应付的不是自己的选民，而是布萊特和基卜生的选民。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整个曼彻斯特学派的名义說話。这就加强了他的地位。在曼彻斯特，拥护帕麦斯頓的口号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还要更不自然。工业資本家的利益在本质上不同于倫敦和利物浦的鴉片走私商的利益。在曼彻斯特产生的抵制布萊特和基卜生的反对派不是依据当地社会的物质利益，而号召选举帕麦斯頓則和这个社会的全部傳統直接抵触。这个号召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高价刊物，它們想为廢除報紙印花稅和降低广告稅<sup>152</sup> 报仇；另一方面是有錢有勢的工厂主，他們对布萊特的优越的政治地位很眼紅，企图扮演 bourgeois gentilhommes [醉心貴族的小市民]，以为糾集在帕麦斯頓的貴族旗帜下比支持布萊特的穩健綱領还要更时髦，更为 bon ton [优雅]。曼彻斯特的帕麦斯頓集团的这个特点，使科布頓能够从反谷物法同盟<sup>153</sup> 运动以来第一次重新摆出平民領袖的姿态，重新号召劳动階級聚集到他的旗帜下面来。他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他选来攻击帕麦斯頓的調子是多么高，可从下面这段引文中看出来：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与我认为我国人民應該密切关心的重大問題有联系。你們是否希望下院議員維護你們的利益，監督支出(是的，是的!)并且不

让你们卷入无益的、花钱的战争呢？（是的！）好极了，但是你们准备采取的行动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从你们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东西在选举过程中得到证实的话，因为我听说，你们打算把那些为了密切关怀你们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并且根据现有的事实对这次战争问题进行了表决的议员全都抛开，不让他们当选，而准备另选别人（不，不！）——另选别人出来干什么呢？——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吗？不，是让他们到议会里专按照现任大臣的指示驯服地干一些肮脏下流的勾当。（一片叫好声）的确，我听说，你们准备让帕麦斯顿勋爵来做我国的专制统治者。（不，不！）很好，可是如果议会不制止他，如果他在受到议会抑制的时候解散议会，如果你们不把那些不偏不倚的、有足够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你们的权利的人送进议会，而把纯粹执行帕麦斯顿意志的人送进议会，那末这岂不是使他有了专制权力吗？让我告诉你们吧，这是世界上最粗暴的、代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最不负责的专制，因为你们在这位大臣周围造成了代议制形式的骗人假象；当他有议会作为倚仗的时候，你们就碰不着他；要是你们在选举中不执行自己的职责，不把那些将要警惕地监视现任大臣的人选入下院，我敢说你们的景况就会很糟糕，因为你们将要比普鲁士国王和法国皇帝的臣民受到更不负责的统治。（大声欢呼）”

现在大家知道帕麦斯顿为什么要急忙地进行选举了。他只有用奇袭的手段才能获胜，而时间却是奇袭的敌人。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4 月 6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98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馬克思

### \*英人在华的殘暴行动

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罰制度在議會中被揭露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顏无耻地說，这种說法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調查证明，这种說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們来說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只好对于向东印度公司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或者承认是“故作不知”，或者承认是“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現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倫登伯爵現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說中，企图对施于中国人的殘暴行为进行辯护，他說道：

“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贊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問，政府便走上了应受議會和全国斥責的道路。但是相反地，我們深信这些行动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认为，我国备受欺凌。我們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遙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虐待，对此我們不能置之不理。（鼓掌）我們认为，我国根据条約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有責任保护我国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地区内的利益的人員，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們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暴力行为。我們认为，如果我們不贊同采取那些在我們看来是正确的行动，不贊同采取那些当我們自己身历其境时也会义不容辞地采取的行动，那末，我們就会辜負我国同胞所寄予的信任。（鼓掌）”

但是，無論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

釋所迷惑，勛爵大人自己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解釋的真实性，要是他信以为真，那就表示他故作不知，这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諒的。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軍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傳來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誣蔑中国人——不分青紅皂白地非难中国人違背条約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們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誣蔑。而且就連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議會中的花言巧語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問題真相的人大惑不解。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員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經一时获得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現在用作借口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已經滿期了。据說，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員中有几个歹徒——中国的海盜和走私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們是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时，水师听說这些罪犯藏匿船中，便逮捕了他們；我們的港口警察要是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藏有水賊和走私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貨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領事控告。这位領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輕人，据說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当时他 *in propria persona*〔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的公职的水师大吵大鬧，結果一无所得。于是他急忙返回領事館，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約翰·包令爵士和海軍上将西馬廐各厘，硬說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說，期待已久的向广州举行示威的良机来到了。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輕英国領事的蛮横要求。他說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誤会表示遺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答应放回水手，因为尽管逮捕这些人是合法的，他却不願意以这样严重的誤会作为逮捕他們的代价。但是这一切沒有使領事巴夏礼先生感到滿意，他要求正式道歉，并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則叶总督应对一切后果負責。接着海軍上将西馬糜各厘率領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套公函往来：海軍上将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則心平气和、冷靜沉着、彬彬有礼。海軍上将西馬糜各厘要求在广州城內当面会商。叶总督說，这違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这样做，他願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面，或者采取其他不違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滿足海軍上将的願望。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英国在东方的这位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簡單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現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願意弄清这个問題的人們——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虛伪和空洞。有些人企图迴避对主要問題的追究，硬要大家相信，似乎在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侮辱行为本身已足以构成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說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針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訴，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訴。

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有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精明和谨慎的原则是不去涉及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眼光不超出常去购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就完全可以吧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同时，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sup>154</sup>。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22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4 月 1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8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馬克思

###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

下面这封信是从“佩斯劳埃德氏报”<sup>155</sup> 摘录下来的。

2月26日于切尔克西亚土阿普謝司令部

“您将由英国輪船‘袋鼠号’接到这封信，这封信也許将使欧洲首次得悉一个可能对切尔克西亚各民族的未來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您知道，我所服侍的穆罕默德-貝伊（班迪亚），已經同意切尔克西亚各部落領袖和代表的建議，接受总司令的职务。星期一，即2月23日，我們在我們的司令部所在地土阿普謝上岸。在动身前，穆罕默德-貝伊給各兵种聘請了約两百名优秀的軍事教官，他們随同我們来到此地。穆罕默德-貝伊已經被郑重地宣布为切尔克西亚部队的总司令。王公、貴族以及民众代表都手按可兰經宣誓要服从他，而今天，切尔克西亚的国会代表团送来了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先知的旗帜。当这位新司令宣誓效忠这面神圣的旗帜时，場面极为热烈。（旗帜本身是綠色的，上面有一把白劍、一弯新月和一颗星。）情緒非常激动；切尔克斯人决心要爭取到完全的独立，否則就为它战死沙場。預期到5月可能将有15万（？）人参加战斗。穆罕默德-貝伊剛才告訴我說：‘俄国很快就可能看到，一种**新的情緒**正在占上風。’我研究了我所掌握的材料（穆罕默德-貝伊在上次戰爭中是站在切尔克斯人一边的），并且认为，一个在沒有軍事組織的情況下都能够抵禦敌人三十年的民族，一旦有了适当的組織，就一定能**爭取到**完全的独立。随着春天的来临，您可以期望从这个山国得到一系列重要的消息。只要我們的通訊工具允許，您将从我这里得到关于事变进程的报道。”

班迪亚是匈牙利的領導人之一，最初在科苏特手下工作，后来



在瑟美列手下工作；1851年和1852年流亡英国；他被普魯士政府和法国政府雇佣为密探，当然，必須和它們的共同主子一致行动；現在他在英国的庇护下前往仿佛正有一种新的情緒占上風的切尔克西亚。那里过去的情緒是反对俄国的，新的情緒一定是倾向于俄国——切尔克西亚据說應該爭取到它从未丧失过的独立，除此以外，还臆想出来一个應該立即建立的議會。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3月25日  
左右

載于1857年4月1日“自由新聞”  
第34号(第4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自由新聞”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科布頓、布萊特和基卜生的失敗

1857年3月31日于倫敦

“大多数候选人都表示他們打算广泛支持帕麦斯顿勋爵，以此来作为爭取重新选入新議會去当輿論代表者的最好理由…… 帕麦斯顿将不是作为保守党、或者輝格党、或者皮尔派、或者急进党的首脑，而是作为英国人民的領袖，作为全民政党的偉大发起人和締造者进入議院。”

以上是帕麦斯顿勋爵的私人机关报“晨邮报”<sup>156</sup>上的一段話。帕麦斯顿作为独裁者，新議會作为他的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这段話的意思就是如此，这也許还可以从选票中得到证实。至于“晨邮报”上所說的“輿論”，那末正像人們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其中有一半是帕麦斯顿本人制造的，而对另一半，他則付之一笑。

这场选举斗争中的最大事件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彻底失敗：布萊特和米尔納·基卜生失去了曼彻斯特的議席，科布頓失去了哈得茲菲尔德的議席，埃·阿米塔季爵士失去了索尔福的議席，福克斯失去了奥尔丹的議席，迈奥尔失去了罗契得尔的議席。特別使所有的人，甚至使帕麦斯顿政府驚訝不已的，是曼彻斯特的选举結果<sup>157</sup>。政府原来对这里的胜利是如何不抱希望，可从它的行动是多么犹疑不决看出来。最初，帕麦斯顿在收到几份曼彻斯特的告选民书之后，曾威胁說要亲自到这个紡織工业的中心去，在“敌

人自己的糞堆上”向敵人挑戰。但是他再一考慮，就退縮了。然後是內閣的下屬鮑勃·蒯出場。一伙大工廠主邀請他做曼徹斯特的候選人，並且保證在他失敗時付給他 2 000 英鎊，使他可以在郡里買到一個腐朽的市鎮，他公開接受了這個建議，並允許選舉委員會開始為他進行競選活動。後來科布頓在曼徹斯特發表了著名的演說<sup>158</sup>。在這以後，帕麥斯頓就吩咐蒯撤銷自己的候選人資格，蒯依命照辦了。甚至在進一步考慮之後，企圖在曼徹斯特獲勝還是顯得毫無希望，於是“泰晤士報”便奉令來扮演寓言中的狐狸<sup>159</sup>。鮑勃·蒯必須寫一篇社論，堅持重新選舉布萊特這一幫人，並且規勸曼徹斯特人不要以拋棄自己的舊代表來玷辱自己。在經過這一切擔憂之後，電報給唐寧街傳去的消息卻說科布頓垮了台，布萊特和基卜生被擊敗了，並且是被絕大多數票擊敗的，這時內閣陣營里那種歡欣若狂和高呼勝利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至於帕麥斯頓本人，在他看來這個勝利是超出他個人利益所許可的限度的，因為這個老滑頭知道得很清楚，即使是一個巨人，要制服他，只消把他引入下院就行了，而要加速這個議院本身（它的基础，即有特權的選民團，它的上層建築，即對內閣的篡奪）的毀滅，也只須把那些最有名的議員驅逐出去，把他們攆上街頭，從而給那站在“英國憲法”大門外面的苦命的群眾提供一批有聲望的首領。

曼徹斯特學派在自己的基地上被它自己的大多數部隊所擊敗，看去好像是帕麥斯頓個人的勝利，這決不是僅僅因為那旨在把他逐出內閣並且成為解散議會的借口的不信任投票，是由科布頓和基卜生提議舉行的。在帕麥斯頓和布萊特、科布頓等人身上，似乎體現了不同原則和不同地位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帕麥斯頓是鼓吹民族榮譽的號筒，他們是維護工業利益的喉舌；他是集英國

寡头政治一切篡夺行为于一身的讲求外交手腕的公爵，他們是体现英国资产阶级生命力的煽动家、parvenu〔暴发户〕；他从政党的瓦解中吸取力量，他們的力量应归之于阶级斗争。他是旧的托利主义的最后一个无原则的化身，是反对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反谷物法同盟的领袖們的。因此，科布頓、布萊特等人的失敗看上去就好像是帕麦斯頓个人的胜利，更何况与他們竞选的那些幸运对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例如，布萊特的对手約翰·波特尔爵士，只由于是曼彻斯特的头号大胖子而聞名。他很可能被人看做是曼彻斯特的約翰·福斯泰夫爵士<sup>160</sup>，要不是他的渺小的智慧和巨大的錢包使他免于跟这位不朽的騎士相提并論的話。米尔納·基卜生的对手阿·特納为他的个人要求提出这样的論据，即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决不会以炫耀才能或摆闊气的恶劣作风来刺痛自己同胞的感情。科布頓的对手艾克罗伊德先生責难前者是一个全国規模的人物，而他（艾克罗伊德）从来就是，当然将来也只会是一个普通的哈德茲菲尔德人。他們全都以沒有才能但是有性格而自豪，而这份天賦必定使他們不会像他們的前輩那样犯下“反对一切政府”的錯誤，不会像米尔納·基卜生那样为了某些理論上的奇怪念头而牺牲有利可图的职位。

但是，尽管表面上是这样，帕麦斯頓那份反对科布頓等人的告选民书，并不是使早已在曼彻斯特学派周圍堆积起来的可燃物质爆炸的原因，而只是使它們爆炸的借口。由于曼彻斯特是政党的核心，而布萊特又被公认为这个政党的真正英雄，所以只要仔細地了解一下他的失敗，就可以說明他的战友們在其他工业地区同时遭到的失利。这里首先是老的輝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起了作用，他們曾經一心渴望为他們在反谷物法同盟出現以来所遭到的政治上

的冷遇报仇雪恨。在1852年的选举中，布莱特仅以100票的多数战胜他们，这就表明他们在数量方面的力量决不能轻视了。他们当然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取得胜利，可是他们是支持布莱特大军任何一个临阵脱逃的兵团的强大援军。其次，站在第二排的是高价报刊的首领，他们对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sup>161</sup>怀有深仇宿怨。“曼彻斯特卫报”<sup>162</sup>的编辑加内特先生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反对布莱特，竭力给反布莱特联盟的那些相当破烂的论据蒙上体面的服装；使他的这种企图比较容易实现的，是布莱特和科布顿在对俄战争时期弄得不孚众望<sup>163</sup>。在那个时期他们确不敢在曼彻斯特的公开的群众集会上露面，不得不躲在纽奥尔大厦（反谷物法同盟的旧盟址）同知心朋友饮茶谈心。自由资产阶级、工场主以及大商号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投票反对布莱特，在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中，一致拥护他的，只有教友会信徒和爱尔兰人，即那个在联合王国到处都跟着自己的“自然主宰”走的人数众多的少数派。如何解释自由资产阶级行列中的这种分裂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有的“曼彻斯特的大亨”迫不及待地想要像他们的利物浦对手那样成为“绅士”。如果说他们在布莱特还是他们阶级利益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时，曾经容忍像他这种有才能者的优势，那末现在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可以采取一般庸人在飞黄腾达时将自己所妒嫉的人一脚踢开的做法了。不过，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布莱特的个人优势，更多的是反对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的陈腐要求；这些余党有点像长期议会的余党<sup>164</sup>之于英国共和政治一样，是曼彻斯特的累赘；这些余党定期地在威尔逊先生这个“体面人物”和昔日的淀粉商人主持下集会（威尔逊先生在这些会议上受到同盟的名誉书记罗宾逊先生以及其他没有社会地位的小人物的支持）。这些人是在大风暴时

期被浪濤卷到表面上來的，他們現在執拗地不肯再沉到底下去，雖然在實質上，他們除了擁有過去的破舊不堪的傳統和現在的照例的謊言，每當布萊特需要時出來假裝代表曼徹斯特講話以外，再舉不出任何理由賴在政治舞台上不走了。這次反叛的首領之一恩特威斯爾先生在一次選民大會上坦白地說道：

“問題不在於對華戰爭或對俄戰爭或任何戰爭。問題在於曼徹斯特是否今後也聽命於在紐奧爾大廈集會的余黨。”

曼徹斯特的工廠主在終於埋葬那曾經像夢魘一樣窒息過他們的反谷物法同盟的余黨時，自以為堵塞了他們的雅各賓俱樂部的大門，當然沒有想到他們從而為新的革命運動掃除了主要的障礙。

然而，曼徹斯特選舉的真正意義，由一個喝醉了酒的反布萊特的選民透露出來了，他在投票時大喊大叫道：“我們不需要對內政策，我們需要對外政策！”換句話說：打倒改良和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終於占了選民的多數，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反貴族的叫囂，我們聽厭了，它們毫無什麼意義，它們只能激起工人的情緒。我們已經爭到了自由貿易，心情非常舒暢，尤其是因為又降低了戰時所得稅。不管怎樣，我們很愛勛爵。“我們不需要對內政策，我們需要對外政策”。讓我們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即在全民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吧。讓我們大家都做真正英國大臣<sup>165</sup> 帕麥斯頓勳爵領導下的英國人，真正的約翰牛吧。

因此，曼徹斯特選舉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工廠主放棄了他們在反谷物法同盟運動中所篡奪的革命領導。

卡·馬克思寫於 1857 年 3 月 3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7 年 4 月 17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990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弗·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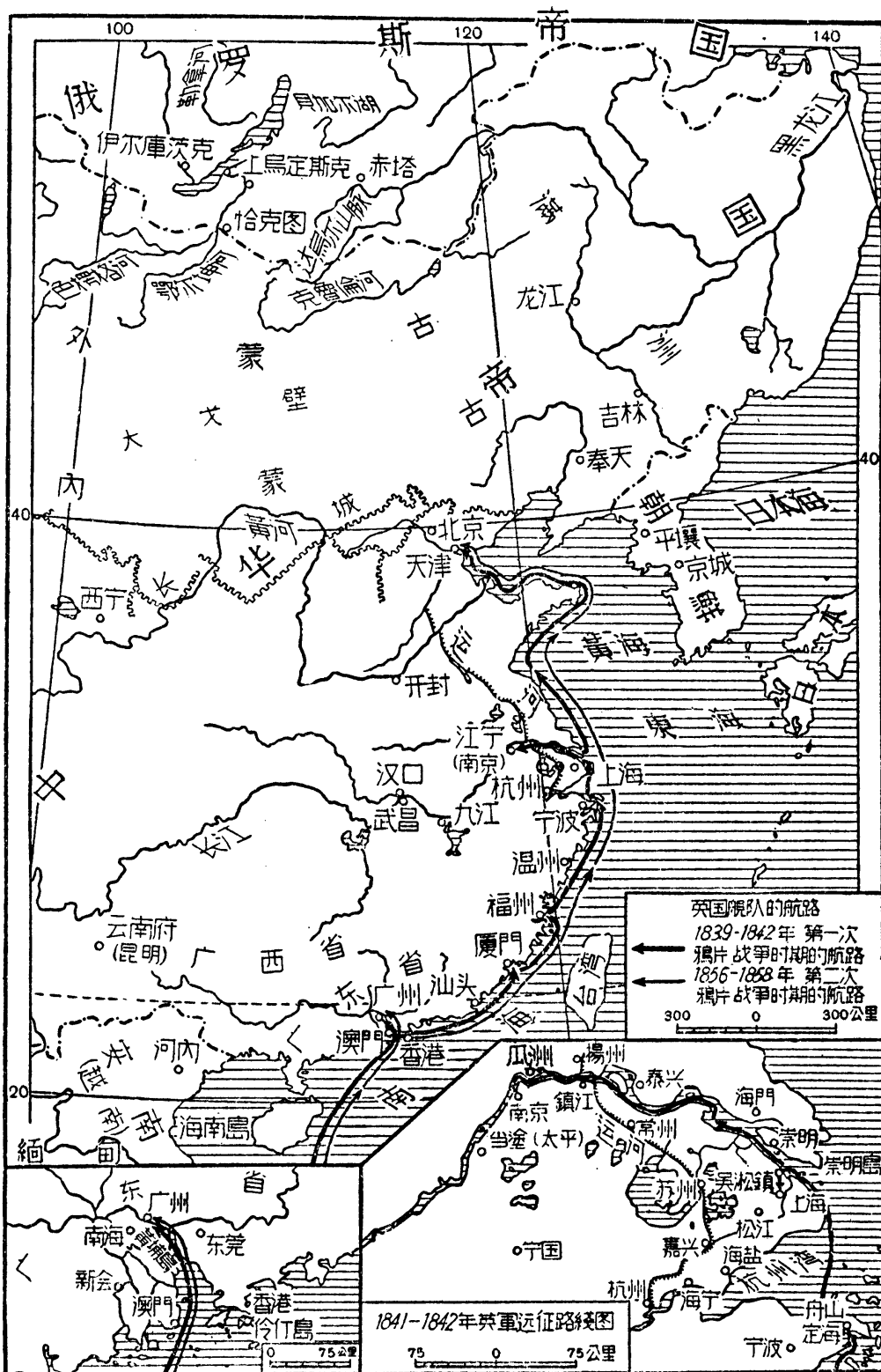
##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如果英国人借端向中国人挑起的这场争执达到顶点，那末可以预料，其结果将是一次新的陆海军远征，与1841—1842年因鸦片争端而引起的远征<sup>166</sup>一样。当时英国人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那里抢走了大宗银两，这很可能引诱英国人再进行一次同样的尝试；英国人虽然非常厌恶我们的海盗本性，然而他们自己却保留了大量的为我们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共同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但是自从英国人为贩卖鸦片而进行了那头一次顺利的掠夺以来，中国的局势已有重大的变化，因此令人十分怀疑的是：在今天进行同样的远征能否得到多少相同的结果。毫无疑问，新的远征同1841—1842年那次一样，将从香港出发。参加那次远征的舰队有：两艘装有74门炮的军舰，8艘巡航舰，许多轻巡航舰和二桅横帆舰，12艘蒸汽舰和40艘运输船；全部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共计15000人。这次新的远征使用的兵力大概不会比这更少；的确，我们下面叙述的许多理由将说明，他们会使用比这多得多的兵力。

1841—1842年的远征军在1841年8月21日由香港出发，首先占领厦门，随后在10月1日占领了舟山岛，把这个岛作为他们以后的军事行动的基地。这种行动的目的，在于侵入横贯中国中

# 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华鴉片战争图

(1839—1842 年和 1856—1858 年)







部的大河长江，并溯江而上，直达离江口約 200 英里的南京城。长江把中国分为截然不同的南北两部分。在南京下游約 40 英里的地方，有一条大运河流入并穿过长江，它是南北各省之間的通商要道。采取这种进攻步驟的用意，是夺取这条重要水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1842 年 6 月 13 日，英軍在亨利·璞鼎查爵士率領下到了吳淞江口，逼近吳淞。吳淞江由南流来，在紧靠长江注入黃海的地方流入寬闊的长江口。吳淞江口是位于它南面不远的上海的港口。吳淞口两岸筑有許多炮台，可是它們全被毫不費力地攻下了。接着一支入侵的軍队向上海进发，上海未經任何抵抗就失守了。长江两岸和平怕事的居民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和平生活，現在才第一次經歷战争。虽然英軍当时沒有遇到居民的什么抵抗，可是江口本身和接近江口的海道却造成极大困难。长江口非常广闊，它的两岸在入海处半为泥滩，而由于海面在离岸許多哩內是一片黃浊色（黃海即由此得名），几乎很难辨认出来。打算駛入长江的船只不得不謹慎地沿南岸前进，不断地用水砵測量深度，以免碰上由流沙冲积而成的堵塞江道的淺滩。由江口直到巨大的崇明島末端，到处都有这种沙洲；崇明島位于江口中心，把江口分为两条水道。过了这个長約 30 英里的崇明島以后，长江两岸即开始高出水面，可是水道却十分曲折。海潮可漲到約在去南京中途的鎮江，实际上，对沿江上駛的船只來說，在未到鎮江以前所看到的只是一种江口或海灣，到这里才开始現出河流的輪廓。英国舰队在到达这个地点以前，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障碍。从舟山停泊处开始的这段 80 英里的航程，費了它十五天功夫。在崇明島附近，有几艘較大的船只擱淺了，不过漲潮后就駛开了。英国人克服了这些困难，逼近鎮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認識到：駐防旗兵虽

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銳气。这些駐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們在应战以前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結局，他們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絞死或者淹死；后来从井中曾打捞出許多尸体。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燒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在这次战斗中，英軍損失了185人，他們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軍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殘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們絕對到不了南京。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对岸的瓜州城投降了，并交出了300万元的贖金，英国海盜自然极滿意地将这笔款項放进腰包里去了。

过了鎮江，航道深达30潄<sup>①</sup>，因此，就深度來說航行已很便利，可是某些地方的水流非常湍急，每小时达六七湍以上。但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止这些軍舰开往南京。8月9日，英軍终于在南京城下抛錨了。結果不出英軍所料。清帝<sup>②</sup>恐惧万分，只得于8月29日簽訂条約<sup>167</sup>；而現在英国人就是借口中国人似乎破坏了这个条約而提出了以新的战争相威胁的新要求。

如果这次新的战争真正开始的話，它大概还会按前一次战争的样子来进行。可是，現在有許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样輕易的成功。那一次战争的經驗，中国人是不会白白放过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軍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軍隊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地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

① 一潄等于1.83米。——編者注

② 指道光皇帝。——編者注

东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其次,如果英军这次又企图溯长江而上,他们很可能遇到人为的障碍,而这好像是他们在上次战争中所没有遇到的。再者,而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再度占领南京,未必会在北京朝廷中引起像上次那样的惶恐不安。长期以来,南京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起义者的手里,而且起义者的一个或几个领袖都以南京为自己的大本营<sup>168</sup>。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占领南京,对于清帝来说将是求之不得的。将起义者赶出南京,这倒是替清帝效劳,但英军占领这个城市后,要守住它,将是一件相当困难、麻烦和危险的事情,而且近来的经验已经证明,纵使敌军盘踞南京,这对于北京或者清廷的政权也不会马上造成致命的后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4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4 月 17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90 号

## 卡·馬克思 选举的結果

1857年4月7日于倫敦

选举程序已經結束。显著的結果就是：帕麦斯頓胜利了；議院的 personnel [班底] 有很大的改变，更換了大約四分之一旧議員；議院的智力水平空前地降低了。但是，英国各家报纸对內閣多数派力量紛紛加以推測，并且由于这些推測而爭論不休，它們还企图按照早已失去意义的派別来划分新当选的議員，——这一切都是极其愚蠢的事情。例如，“晨邮报”为政府有八十票的多数而欢欣鼓舞，而迪斯累里的“新聞报”<sup>169</sup> 則計算自己的党在城市中失去了四个議席，在郡里失去了約二十个議席。倫敦“泰晤士报”认为，皮尔分子、曼彻斯特派以及公开的保护关税主义者的被逐，使議會恢复了 status quo ante [旧日面貌]，并使它回到了它的合法主人即古老的輝格党和托利党的手中。“泰晤士报”很乐意让世人相信，“英国人民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状况”。迪斯累里的“新聞报”也几乎准备完全贊同“泰晤士报”的这种看法。但是寡头政治企图借以自慰的这种乐观結論是荒謬的，就同“观察家”<sup>170</sup> 之类的假激进派报纸的乐观結論是荒謬的一样。这家报纸写道：“改革后的議會正符合帕麦斯頓勋爵的号召。”可是要知道，帕麦斯頓曾要求多来一些奴才，而开明的国民，即占居民极少数的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对他的

好意的报答，却是给他往議院里送去一帮具有全国规模的饒舌家！他們高呼“帕麦斯頓万岁！”只是为了欺騙这位狡猾的子爵！如果說新議會能发起一个大运动，那末这自然不会是它自己的功劳；大不列顛会像航海家辛伯达那样，发现把老头儿甩掉要比把他背起来困难得多<sup>①</sup>。

要把新議院同以前各届議院加以比較，也許最好先从那些在选举斗争中完全消失的老的議會党派开始，即从皮尔派和曼彻斯特学派开始。

与輝格党人、托利党人、曼彻斯特学派不同，皮尔派并不代表某个阶级，也不代表某个阶级的一部分。他們只是議會中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在两院的墙外可能有朋友，但是决不能招兵买馬。他們是以往的一届政府的殘骸，由于自己的已故領袖与谷物法有关的背叛行为而离开了托利党；他們由于还没有忘記对輝格党人的旧恨，同时自以为——并且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也这样认为，——他們集中了全国所有的經世治国之才，而不願意融化在輝格党的行列中；他們因为有貴族联系而没有与曼彻斯特学派合而为一；他們自恃有几名辯才就能影响議會辯論。自封的国家活动家們的这个自命不凡的核心并不稳固，也没有定形，表面上是个特殊的議会政党，实际上是因皮尔的自由貿易立法而引起的一切議会政党瓦解的产物。他們全靠有这种瓦解才出現在世界上，他們又以促使得比內閣垮台并提出自己的名义領袖<sup>②</sup>来主持各政党的联合，即所謂联合內閣或群賢內閣<sup>171</sup>而加深了这种瓦解。当議會瓦解过程显然加快的时候，他們的集团得到了举起旗帜来庇护各旧政党

① “一千零一夜”，航海家辛伯达的第五次航行。——編者注

② 阿伯丁。——編者注

同时自杀的荣誉。皮尔分子这样为自己保证了短期間的統治地位，同时也就取消了他們作为特殊集团存在的唯一理由。联合起来的各政党把力量結合在一起的必然后果，是它們都軟弱无力，都跪倒在一个人面前。皮尔分子扶着梯子，而帕麦斯頓沿着梯子爬了上去。

早在 1852 年，皮尔分子就在竞选斗争中折損了一半兵力；1857 年的选举使他們全軍复沒了。菲利莫尔两兄弟、哈維勛爵、乔·克拉克爵士、斯泰福·諾思科特爵士、威·波立特勛爵、阿·戈登、薩頓、哈尔科特、拉欣頓、斯迈思、在东印度公司中有过功績的詹·威·霍格爵士、朗德尔·帕麦尔以及卡德威尔先生，都下台了。以上列举的最后一位紳士曾接到当了首相的帕麦斯頓請他出任財政大臣的建議，但是他根据格萊斯頓、格萊安这帮人的劝告，謝絕了这个建議。尽管如此，卡德威尔在如今已經埋葬了的下院臨終前的一次會議上，因为想超越格萊斯頓，还是与自己的朋友們分道揚鑣，在預算問題上投票支持帕麦斯頓。最后，在就广州問題进行辯論时，他唯恐事态会发生变化，又改变战綫，回到皮尔分子这一边，贊成科布頓的关于对內閣投不信任票的提案。因此，这位紳士是皮尔分子所特有的将道貌岸然与无耻追求名利有趣地結合在一起的真正典型。皮尔分子全軍复灭以后，只剩下了三位將軍——格萊斯頓先生、詹姆斯·格萊安爵士、赫伯特先生，这三个人不能形成三位一体，因为他們在出身和志趣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詹姆斯·格萊安爵士是作为激进派发迹的，格萊斯頓先生是作为极端的托利党人起家的，而赫伯特先生則什么也不是。

赫伯特先生在南威尔特郡的选民会上所做的揭露，清楚地描繪了帕麦斯頓用以对付皮尔分子的方法。最使皮尔分子威信扫地

的就是他們在对俄战争时的行为，特别是他們放过了敖德薩<sup>172</sup>；人們說所以出現这后一种情况，是因为赫伯特先生是沃龙佐夫公爵的外甥。像“晨邮报”、“太阳报”和“晨报”<sup>173</sup>这类帕麦斯頓的娄罗，曾特別卖力来散布这些恶毒的誹謗。可是赫伯特先生告訴选民說，他倒是签署了炮击敖德薩的命令，但是在他辞职以后，帕麦斯頓勋爵亲自发布了放过該城市的反命令。这一揭露丝毫不亚于約翰·罗素勋爵在倫敦西蒂区选民会上所做的揭露。大家知道，罗素是由于他那維也納的外交使命而垮台的<sup>174</sup>。当选举吵吵鬧鬧的时候，啤酒气味很濃的“晨报”（这是領有营业执照的酒館老板們自己的报纸，即帕麦斯頓为一般人办的机关报——而他办的报纸种类繁多，适合各种趣味，上起高級沙龙，下至小酒鋪），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大叫罗素在維也納严重变节。被該报这种无耻行为激怒了罗素，终于鼓起勇气告訴世人說，克拉倫登勋爵不准他公布帕麦斯頓本人亲笔签署的訓令，他（罗素）曾經为之丧失威信的維也納政策就是由这个訓令規定的。有一位希腊哲学家說过，他的同胞們、詩人們給希腊諸神編造了一些任何人都不敢用来描述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的可怕故事。現代的法国和英国則把无須乎由什么詩人来誹謗的波拿巴和帕麦斯頓之流捧为自己的天神。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皮尔派的那些在全軍复沒后幸存的少数將軍，将不是作为組織的代表，而只是作为个人再度出現在議會中了。作为个人，格萊斯頓先生現在摆脱了集团的妨碍，义憤填膺，无疑是新議院中最大的演說家，他也許将在議院中起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杰出的作用。格萊斯頓和迪斯累里在进行长久的議會决斗时，也像有时在激烈的搏斗中那样，时而抛出自己的武器以便抓住敌人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格萊斯頓已經掌握了迪斯累里



的挖苦手法，而迪斯累里也学会了格萊斯頓的甜言蜜語，然而这种交換对双方未必有多大好处。

在和皮尔分子分手的时候，我們还要指出历史的这一恶作剧：它把这个派別的誕生安排在旧的議會政党在反谷物法同盟影响下崩潰的时候，現在又让这个派別随着曼彻斯特学派从議會中的消逝而同时死亡。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4 月 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4 月 2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994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工厂工人状况

1857年4月7日于倫敦

最近发表的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期間的工厂視察員报告<sup>175</sup>，是供剖視联合王国社会組織的珍貴材料。这些报告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帮助說明工厂主在目前这次大选中所采取的反动立場。

在1856年會議期間，以不正当手段在議會中通过了一項工厂法，“激进的”工厂主利用它首先修改了現行法律中关于在机械傳动和机器上装置防护設備的規定，其次是在雇主和工人的糾紛中采取了仲裁原則。一項法律的目的似乎是要更好地保护工厂工人的生命和安全；另一項法律的目的却是使这种保护从屬于廉价的正义法院<sup>176</sup>。其实，后一項法律是要把工厂工人置于法律之外，而前一項法律是要使工人丧失安全。茲摘引視察員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話：

“按照新的工厂法，由于**日常工作**接近机械傳动因而对工作中容易发生的危險非常熟悉并知道必須謹慎从事的人，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那些为了执行特殊委托而被迫中断日常工作并使自己遭受他們无法觉察的或者由于无知而无法預防的危險的人，也就是說，正是那些看来需要法律予以特殊保护的人，却**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仲裁條款則規定：必須挑選那些對於造成身體殘廢的“機器的結構非常熟悉”的人擔任仲裁人。一句話，仲裁大權完全由工程師和設計師獨攬。

視察員寫道：“我們覺得，工程師和設計師應該**沒有資格**擔任工廠仲裁人，因為他們與工廠主有業務上的聯繫，工廠主就是他們的主顧。”

在這樣的條件下，機器造成的不幸事故，例如死亡、手臂腿足的切除、四肢骨折、頭骨和顏骨的挫傷、削破碰傷等等，在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為止的半年當中，竟達到 1 919 起的驚人數目，就絲毫不足為奇了。在半年的實業通報中，登載了 20 件因機器造成的死亡事故，這幾乎比英國海軍在“光榮的”廣州大屠殺中所損失的人數還要多九倍<sup>177</sup>。既然工廠主根本不想保護工人的生命與安全，而只是想方設法逃避賠償工人在工作中所損失的胳膊和腿足，不願擔負他們的活機器的損耗費，那末對於官方報告中所說的“違反工廠法的延長工作時間現象日有**增長**”，就不必驚奇了。按照工廠法的定義，延長工作時間就是迫使未成年者每天工作的時數超過法律所允許的時數。這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或者在早晨 6 點鐘以前開工，或者在下午 6 點鐘還不收工，或者縮短工人法定的用餐時間。在一天之中，蒸汽機開動 3 次，即在早晨開工時，以及在早飯和午飯後復工時；它也停止 3 次，即在每頓飯開始時和下午收工時。這樣，就有 6 次可以偷去 5 分鐘的機會，一天總共可以偷去半個小時。每天延長 5 分鐘的工作，一周一周積累起來，一年就是兩天半；但是延長工作時間的騙人伎倆遠遠地超過了這個範圍。茲摘錄郎卡郡工廠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先生的一段話：

“用這種非法的延長工作時間的方法所獲得的利潤，似乎是工廠主不能

抗拒的巨大誘惑。他們指望不被发现，可是当他們看到被發現的人所繳納的罰款和訟費的數目并不大，他們就认为，即使被查出来，他們还是能得到很多好处。”

除了工厂法規定的罰金數額微不足道以外，工厂主还千方百計地使得工厂法的措辞极其便于迴避其中的各項規定，正像視察員們所一致声明的那樣，“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使他們不能真正結束这种非法的延长工作時間的現象”。他們还一致譴責大业主故意进行欺騙，采取卑鄙詭計来避免揭露，施展下流的陰謀来对付負責保护工厂奴隶的視察員和副視察員。在指責工厂主延长工作時間时，視察員、副視察員或者他們的警察就必須准备以发誓来证明工人是被迫在法律所不允許的時間內进行了工作。現在假設視察員在下午6点钟以后来到工厂里。工厂的机器立刻停了下来，虽然工人只是为了照管机器才可能留在那里，但是由于工厂法的措辞，这种指責还是不能成立。然后工人被迅速地送出工厂，往往是通过好几个門，使他們很快就不見了。有时副視察員一跨進門，煤气灯就熄灭了，于是他們突然在黑暗里置身于复杂的机器中間。在那些因实行非法延长工作時間而恶名狼籍的地方，还有一套向工厂报告視察員行踪的專門信号系統，为此雇用了火車站上的职工和旅店里的侍者。

这群靠吸吮本国年輕一代工人的膏血而自肥的吸血鬼，难道不正是与英国鴉片走私商相配的同行和“真正英国大臣們”的天然支柱嗎？

工厂視察員的报告无庸爭辯地证明了：英国工厂制度中的卑劣現象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殘酷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騙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

們本身的規定完全归于无效，并且使負責执行它們的人无能为力；工厂主与工人之間的对立在迅速接近那种爆发真正社会战争的限度；被这种制度吸收的 13 岁以下的童工数目在一些部門里正在增加，而女工数目則在一切部門里均有增长；虽然現在工人数目对馬力数量的比例还和过去几个时期一样，但是工人数目对机器数量的比例却减少了；由于更經濟地使用动力，一台蒸汽机能够比十年以前带动更多的机器；現在由于增快机器的轉速以及采取其他的方法，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工厂主在迅速地填滿自己的腰包。

报告中所列举的这些有趣的統計材料，非常值得予以进一步研究。但是从上述情况就已經能够立刻看出，郎卡郡的工业奴隶主需要有一个能够分散对国内問題注意力的对外政策。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4 月 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4 月 2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994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英国工厂制度

1857年4月10日于倫敦

联合王国工厂視察員 1856 年的报告中包含着許多詳細的工厂統計資料，例如工厂的数目、使用馬力的总数、机器的数量和从事生产的人数。这样的报告在 1835 年、1838 年和 1850 年也曾按照下院的指示編制过，并且其中的材料都是取自工厂主所填的表格。因此，現在有丰富的資料来对工厂制度发展中的各个时期进行比较；按照法律，工厂制度中只包括那些使用蒸汽和水力的紡織企业。

这种制度的迅速扩大，无疑是联合王国最近六年以来社会史上的最大特点。

下列数字表明在最近三个报告的編制年份內的工厂数目：

	1838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紡織厂.....	1 819	1 932	2 210
毛紡織厂.....	1 322	1 497	1 505
精梳毛紡織厂.....	416	501	525
亚麻紡織厂.....	392	393	417
絲織厂.....	268	277	460
共 計.....	4 217	4 600	5 117

可見，工厂数目的平均增长額，在 1838 年至 1850 年間是每年 32 个，而在 1850 年至 1856 年間几乎扩大了三倍，达到每年 86 个。下表是对每个时期中工厂数目总增长額的分析：

1838—1850 年的总增长額	1850—1856 年的总增长額
百分比	百分比
棉紡織厂..... 6	棉紡織厂..... 14.2
毛紡織厂.....13	毛紡織厂..... 0.5
精梳毛紡織厂.....20	精梳毛紡織厂..... 4.7
	亚麻紡織厂..... 6.1
	絲織厂..... 66.0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在前一个时期中，这种增长只限于棉紡織厂、毛紡織厂和精梳毛紡織厂，而在后一个时期中，它也包括了亚麻紡織厂和絲織厂。在这两个时期中，各部門在总增长額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不同的。在 1838—1850 年間，主要是精梳毛紡織业和毛紡織业有所增长，而在 1850—1856 年間，毛紡織业几乎毫无变化，精梳毛紡織业的增长速度則减少了四分之三。另一方面，在后一个时期中，棉紡織厂和絲織厂发展最快，絲織厂在增长总額的百分比方面占第一位，棉紡織厂在绝对增长数方面占第一位。

工业发生这种增长的地区随时都有变化，好像在把工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轉移。在工业一般增长的同时，在个别地区发生衰落現象，在許多州郡和城鎮里原有的工厂甚至完全消失。决定这些变化（包括衰落和增长）的一般規律，就是那个遍及現代工业所有一切部門的規律，即集中的規律。例如，郎卡郡同它毗邻的約克郡的部分地区形成棉紡織业的主要中心，就把王国其他地区的这种企业吸引到它那里去。郎卡郡和約克郡的棉紡織厂在 1838 年至 1856 年期间增长了 411 个，而在拉納克（格拉斯哥）、倫弗魯

(佩斯里)和安特林三郡,这种企业的数目却减少了52个。毛紡織业則集中在約克郡;这里增加了200个毛紡織厂,而在康瓦尔、戴文、格罗斯特、蒙默思、索美塞特、威尔特、威尔士和克拉克曼楠,却相应地减少了82个厂。精梳毛紡織业几乎完全集中在約克郡,那里增添了107个新工厂。亚麻紡織业目前在爱尔兰的发展大大超过联合王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但是在安特林、阿馬、达翁、提朗增加59个亚麻紡織厂的同时,在約克郡却减少了31个厂,在戴文郡、多尔塞特郡、格罗斯特郡减少了9个厂,在法夫郡减少了18个厂。在柴郡、得比郡、諾定昂郡和格罗斯特郡增加了76个絲織厂,在索美塞特郡相应地减少了13个厂。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工业部門的衰落以另一个工业部門的增长来补偿,所以工业的轉移可能看起来只是大規模分工原則的更明确的表现。但是,总的說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工厂制度发展的結果倒是在使工业郡和农业郡之間建立分工。例如,英国南方的威尔特、多尔塞特、索美塞特、格罗斯特等郡在迅速地失去自己的工业,而北方的郎卡郡、約克郡、瓦瑞克郡、諾定昂郡却在加强工业壟断。联合王国在1838年至1856年这段时期工厂增长的总数为900个,其中郎卡郡一地就占360个,約克郡占344个,瓦瑞克郡占71个,諾定昂郡占46个,并且最后两个郡之所以增加工厂,是由于在两种專門的生产中采用了改良的机器,即在諾定昂的織袜机和考文垂的織带机上应用了机械动力。

必須把工厂数目的增长同发动机馬力总数的增长区别开来,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新工厂的增加,而且还取决于在旧工厂中装备更强大的发动机、以蒸汽代替水力、在水車上安装蒸汽动力以及其他类似的改进办法。以下是1838年、1850年和1856年各工厂額定功率的对照表:



### 联合王国工厂中使用的发动机的总功率

(单位:馬力)

1838 年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共 計
棉紡織厂.....	46 826	12 977	59 803
毛紡織厂.....	11 525	9 092	20 617
精梳毛紡織厂.....	5 863	1 313	7 176
亚麻紡織厂.....	7 412	3 677	11 089
絲織厂.....	2 457	927	3 384
共 計.....	75 083	27 986	102 069
1850 年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共 計
棉紡織厂.....	71 005	11 550	82 555
毛紡織厂.....	13 455	8 689	22 144
精梳毛紡織厂.....	9 890	1 625	11 515
亚麻紡織厂.....	10 905	3 387	14 292
絲織厂.....	2 858	853	3 711
共 計.....	108 113	26 104	134 217
1856 年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共 計
棉紡織厂.....	88 001	9 131	97 132
毛紡織厂.....	17 490	8 411	25 901
精梳毛紡織厂.....	13 473	1 431	14 904
亚麻紡織厂.....	14 387	3 935	18 322
絲織厂.....	4 360	816	5 176
共 計.....	137 711	23 724	161 435

虽然这些数字中所反映的动力的增长——1838年至1856年增加59 366馬力——无疑是很大的,但是它还是大大低于工业上

可以采用和实际上正在采用的补充动力的实际数量。报告中的一切数字都只是指蒸汽发动机和水车的額定功率，而不是指实际上已經利用或者可能利用的功率。100馬力的現代蒸汽机，由于改进装备、改善結構和加大汽鍋容量等等，能够比过去發揮大得多的威力；所以，它的額定功率頂多只能看做是据以計算它的实际可能性的指数而已。土木工程师奈斯密斯先生在解釋对蒸汽机的最新改进（由于这种改进，同样一部蒸汽机能够以最少的燃料消耗来做更多的功）的性质以后，这样总结說：

“現在我們从蒸汽机的单位重量平均至少可以多得50%的功，而在許多場合，在每分钟速度不超过220呎时只供給50馬力的蒸汽机，現在可以供給100馬力以上。” 178

根据对发动机馬力的增长和工厂数目的增长的比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紡織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虽然1856年毛紡織厂的数目只比1850年增加了8个，但是其中所使用的发动机的功率在同一个时期內却增长了3757馬力。显然，在棉紡織厂、精梳毛紡織厂、亚麻紡織厂方面也有这种集中的傾向。联合王国的紗錠总数，在1850年和1856年分別为25 638 716个和33 503 580个。每一种工厂的紗錠平均数如下：

	1850年	1856年
棉紡織厂.....	14 000	17 000
精梳毛紡織厂.....	2 200	3 400
亚麻紡織厂.....	2 700	3 700

誠然，織布厂方面的傾向，与其說是生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不如說是分散于許多工厂主之間。織机的总数在1856年为369 205台，而1850年是301 445台，但是每个工厂使用的平均台

数，在 1856 年却少于 1850 年。然而这种似乎离开英国工厂制度一般发展倾向的情况，很容易用下述事实来解释，即在织布这一部门中不久以前才有了工厂制度，还没有把手摇织布机制度完全排挤掉。在 1836 年，几乎只有在棉布织机或者在生产混纺棉线织物方面才采用蒸汽动力；但是几年以后，生产各种织物——毛纺织物、精梳毛织物、麻织物、丝织物——的机动纺织机的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至今仍在继续。下表说明 1836 年以来机动织机的增长情况：

	1836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108 751	249 627	298 847
毛纺织厂.....	2 150	9 439	14 453
精梳毛纺织厂.....	2 969	32 617	38 956
丝织厂.....	1 714	6 092	9 260
亚麻纺织厂.....	209	3 670	7 689
共 計.....	115 793	301 445	369 205

棉布织机数量的增长是由于扩大了生产，而不是由于采用了机械动力来生产以前只用手工织的布匹；但是在其他那些一直很少采用机械动力的工厂里，现在采用机械动力来开动生产地毯、带子和亚麻布的机器。利用机械动力梳理羊毛（随着梳毛机、特别是李斯特尔氏机器的推行，已广泛采用机械动力梳理羊毛），使得在这方面也有大批的人失业。

纺织厂生产能力的增长程度，可以从对出口数字的比较研究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在 1850 年有 1 932 个棉纺织厂，在截至 1850 年 1 月 5 日为止的三年内，出口的棉布和棉纱的平均价值大约为 2 460 万英镑。如果 1856 年的 2 210 个棉纺织厂都只按照 1850 年

各厂的生产数量来生产棉布和棉紗，那末出口的价值就应当是 2 800 万英镑。可是，在截至 185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的三年内，这项出口的平均价值大约是 3 100 万英镑。在毛紡織厂和精梳毛紡織厂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我們看到，虽然每一馬力所运轉的織机数量大大增加了，每一馬力所占用的工人数目却固定未变，即平均 4 个人。这可由下表看出：

	从业工人总数		
	1838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紡織厂.....	259 104	330 924	379 213
毛紡織厂.....	54 808	74 443	79 091
精梳毛紡織厂.....	31 628	79 737	87 794
亚麻紡織厂.....	43 557	68 434	80 262
絲織厂.....	34 303	42 544	56 137
共 計.....	423 400	596 082	682 497

工人总数为 682 497 人，这看来的确是不多的，因为单是使用手搖織布机的織工及其家屬在 1838 年就已达到大約 80 万人了。下表說明各种工人的百分比：

	13岁以下的童工	13—18岁的男性未成年者	13岁以上的女性未成年者	18岁以上的男工
1838 年.....	5.9	16.1	55.2	22.8
1850 年.....	6.1	11.5	55.9	26.5
1856 年.....	6.6	10.6	57.0	25.8

在 1838 年至 1850 年期间，童工数目有所增长，但是并不是与工人的总增长数按比例地增长。自 1850 年至 1856 年期间，童工

---

数目增长很大，共計有 10 761 名，其中有 9 655 名在棉紡織业部門。必須再提一下，1844 年的“人道的”法律允許工厂雇用 8 岁的儿童，而以前法律是禁止雇用 9 岁以下的儿童的<sup>179</sup>。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4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4 月 2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999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 俄国军队的改革<sup>180</sup>

当上次战争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很多军人谈起俄国军队的完善组织，总带一点敬畏的心情。在法国和英国，旅、师、军是由一些彼此之间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组成的，指挥官所指挥的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部队和兵团，司令部则由来自全国各个角落的军官组成，——在俄国，整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的各个部件，在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达到完善的地步。每一个团在总的组织中有自己固定的地位；从连到军，每一个军事单位都有自己固定的指挥官，每一个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自己固定的司令部。曾有人说，这架机器实际上已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它只等一声令下，一放蒸汽，就能极其灵活地运转起来；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轮子、每一颗螺丝钉、每一个滑车、每一条引带、每一个活门和每一个杠杆，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就是据说我们应当看到的情况，可惜我们所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军几乎从来没有满额，因为常有整个的师，更经常的是整个的旅被调往远方战区，因此各军就要由其他部队和兵团来补充。力图使每一个军、每一个师、每一个旅的各组成部分尽可能地一起行动的做法，原来同那些确定作战方法的严格规则一样，使军队在行军中的运动受到束缚；最后，分支繁多的指挥机构，所有这些指挥军、师、旅及其相应的司令部的将军，这些为

自己的下屬所熟悉、彼此十分了解、悠然安于自己的职位并在执行任务时能应付自如的將軍，——所有这一切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勾結，串通起来侵吞公款，克扣士兵口粮、制服，盗用安排士兵生活的款項。

如果这些事实还需要官方的证实，那末俄国政府刚好做到了这一点。軍隊的新編制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消除普遍侵吞公款的根源——下級司令部和指揮机构。軍司令部和旅司令部都被撤銷。甚至“旅”这个名詞也从俄国軍隊中消失了。現在，6个步兵軍都从屬於一个人，从屬於前克里木軍隊的司令官，公爵米·德·哥尔查科夫第一。誠然，每一个軍都有一个軍长，但是由于他沒有自己的司令部，也就是說，实际上不可能过細地履行自己的职能，他至多也只不过是本軍的檢查者，是他所轄屬的5个师的师长的監督者。实际上，組成所謂“王牌軍”的30个师（18个步兵师、6个騎兵师、6个炮兵师）的师长，直接服从总司令；而在每一个师中，4个步兵团或騎兵团的团长和連长又直接服从师长。被这一新編制完全取消了职位的旅长則被派到师长的司令部，担任副师长和师长助手。所有这些做法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

俄皇可以信賴哥尔查科夫公爵，而哥尔查科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信賴自己司令部的軍官。在旧編制所具有的那种官僚制度的繁雜性和等級次第的情况下，总司令的直接影响不超出軍长以外。这些軍长及其司令部应当把命令下达到师，师的司令部又把命令下达到旅，而旅的司令部又把命令下达到团长，由团长在实际把命令付諸实行。这无非是一种組織得很妙的从事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和盜窃的制度；軍隊組織得愈完善，侵吞公款的活动就愈有組織，愈能得逞。这一点当第一、第二、第三軍在战争时期由波

兰开往南方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俄国政府只在名义上保留军长的职位并且完全取消旅长的职位，正是由于它想根除这种弊端。现在，在总司令和连长之间，只相隔两级，即师长和团长，只有一个司令部——师司令部，它仍有可能被利用来侵吞公款。如果政府能够根绝师司令部的盗窃之风，那末它也完全可以指望逐渐地把这种风气从团中驱除出去。

这样，军队的整个编制，由于从链条中取消了两个环节而被打乱了，而这两个环节在战争时期无疑是必要的。俄国政府自己也承认，无论是军长或旅长，都不能完全从军队等级中勾销掉。在军队等级中仍保有军长，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旅长则被完全免除指挥职务并被变成只不过是师长的附庸。这只是表明，这些将军在和平时期没有指挥的职务，但是他们是准备着在发生战争时派用场的。事实上，在唯一尚有敌军当前的军队，即高加索军队中，还保持着旅。因此，取消其余军队中的旅，只不过是使旅长及其司令部在和平时期不能为害，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另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解散庞大的龙骑兵军，这个军由10个团组成，每个团有8个连，它既受过步兵训练，又受过骑兵训练。本来，这个军应该在一切大战役中起出色的作用。在战斗的决定性关头，它应该以骑兵特有的速度猛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任何一个重要据点，然后下马，分成16个步兵营，在自己的重骑炮兵的支援下，坚守这一据点。可是，在上次战争期间，这个军丝毫没有发挥作用，现在看来大家都承认，这种混合部队是完全不适合于积极的战斗行动的。结果，这些步骑两用兵被变成普通的骑兵，分为12个各有8个连的团，分别编入“王牌军”的6个军中。这样，俄皇尼古拉想借以保持自己在当代最伟大的军事组织家中的地位的两大



創造，在他死后几年就烟消云散了。

在其他的变革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一个軍中加建一个营以及在高加索軍隊中建立两个新的步兵团。第一个革新在某种程度上緩和了严重缺乏輕騎兵的情况。第二个革新表明，俄国已决定尽快地結束高加索的战斗。由于同样的原因，高加索各个軍的預备旅还没有解散。因此，很可能目前在那里已經展开了重大的軍事行动。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4 月 16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5 月 6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006 号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金融舞弊

1857年5月1日于倫敦

破产法庭对英国皇家銀行内幕的調查已經接近尾声；自从铁路大王哈德逊破产以来，似乎还没有这样充分揭露过掩藏在体面社会的鍍金表面下的冒險投机、假仁假义、营私舞弊和卑鄙下流。最近受到輿論譴責的人們当中，有一个是丘克斯貝里的前屆議員汉弗利·布朗先生，按照多德写的1855年“議員手冊”的介紹，此人是一个“商人”，“铁路公司的积极創办人”、“铁路統計和铁路运输方面的著名权威”，“彻底的自由貿易論者”，“并且还是自由主义者”。英国皇家銀行这个外强中干的企业倒閉以后，大家立刻得悉，这个权威人士利用他的銀行董事的地位盜窃了大約7万英鎊，但是这件事实的揭露絲毫沒有影响他执行通常的国家职责。汉弗利·布朗泰然自若地繼續出現在下院中，出現在无俸法官<sup>181</sup>的席位上。他甚至还以下面这样一件事向公众表示他极其理解自己对社会所負的責任：他以郡的調解法官的資格，依法严办了一个偷了少量馬鈴薯的穷車夫，并且向犯人作了令人作嘔的說教，說什么最糟糕的就是辜負信任。丘克斯貝里的一家報紙认为自己有权利借这个适当的机会，批評一下英国制度的那种使大賊成为小賊的审判官的特点。于是布朗先生揚言不仅要控告那个不幸的新聞記

者，而且还要跟丘克斯貝里这个善良的城市永远断絕往来，除非該城居民以某种方式郑重地悔过，来为他們那种凌辱无辜者的罪恶行为贖罪。在这以后，举行了向“无耻阴谋的受害者”呈献祝詞的隆重仪式，按当时报纸的报道来看，这篇祝詞缺乏艺术修飾，讀起来像铁一样沉重累贅。布朗先生把祝詞放入口袋以后，就从他家的阳台上向人群发表演說，他說，要不是由于公职誓詞使他不能泄露英国銀行的秘密，他的清白无辜对于每一个人都会如同白昼一样清楚，他在結束他的高談闊論时，又說什么別人有負于他的事情比他自己有負于別人的要多。在最近举行的普选中，他又当了他那个安靜的小城的議員候选人，但是他一向坚决拥护的内閣，竟忘恩負义地沒有支持他。

4月29日，这位徒驚虛名的紳士终于摆脱了那一直封住他的口、使他默默忍受下流誹謗的誓詞的約束；听他懺悔的牧师就是破产法庭的官員。按照慣例，要成为任何一个股份公司的董事，必須拥有該公司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布朗先生把常規翻轉来，先当了董事，然后才当股东；并且他在取得股票时，并未劳神給股票付款。他弄到这些股票的方法极为簡單：后来潜逃了的英国銀行經理凱麦隆先生把共值1000英鎊的20張股票交給布朗先生，他（布朗）則給凱麦隆先生一張同样数目的期票，而設法不支付一个先令。布朗在1853年2月当了董事，在3月就在銀行里开了賬戶。他往銀行存入很少一笔錢，即18英鎊14先令，并且在当天就用期票作抵押向銀行借去了2000英鎊，使人立刻可以看出他在管理股份公司方面并不是一个新手。的确，布朗先生在与英国皇家銀行建立业务联系以前和以后，曾經领导过澳大利亚食糖进口和提炼特許公司，防水磚瓦和普通磚瓦专利公司，华德自来水公司，地产公

司，船塢公司，——总之，一系列五花八門的公司。当債权人的律師林克雷特先生問他，所有这些公司后来的結局怎么样的时候，布朗相当确切地回答道：“也許應該认为它們已經嗚呼哀哉了。”他在英国銀行开的賬戶以 18 英鎊 14 先令的貸方开始，最后以 77 000 英鎊的借方告終。所有这些債款都是根据凱麦隆先生的指示付給他的，并且“从未征得其他董事”的同意。

布朗先生說：“該公司的經理是經手一切业务的人。这家銀行的做法就是如此，而且”——他以教訓的口吻补充道，——“这种做法是十分健全的。”

大概，这家銀行的真实情况是：它的全部上层领导人——經理、董事、主任、法律顧問和會計師——都按照事先規定的計劃，相互之間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自己的伙伴弄到了多少錢。而布朗先生本人甚至准备暗示：他作为銀行董事，几乎絲毫也不知道他作为銀行主顧所做的事情。至于那些不屬於行政人員的主顧，則布朗先生在受审时似乎还对其中有些人竟敢侵夺董事的特权而感到痛心。例如，他这样說到某位奧利弗先生：

“我可以肯定地說，奧利弗从銀行騙取了两万英鎊。我用的字眼很尖銳，但是我并不怀疑，这样說是正确的：奧利弗是一个騙子。”

当林克拉特先生問他“而你是个什么人？”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地回答道：“很倒霉，是一个蒙在鼓里的董事。”他对一切問題的回答都是那样絲毫不动声色。例如，他的存款数目与他在銀行貼現自己期票的数目之間存在的那种令人发笑的悬殊，引起了他和林克雷特先生之間这样一段有趣的對話：

林克雷特先生：“难道銀行业务沒有这样一个通常的規定：如果在活期存款賬戶上沒有一笔相当于貼現賬戶上期票总数四分之一的存款，任何人都不得开貼現賬戶？”

布朗先生：“这种規定是有的，我听說这是苏格兰的制度。”

林克雷特先生：“你没有采用这个制度嗎？”

布朗先生：“没有采用，因为这是个不健全的制度。”

每当布朗先生发善心要給銀行提供保证时，这总是一些他已在同一个时候审慎地抵押給別人的期票或提貨单，因为他利用法庭官員居然胆敢称作极度“狡詐”的方法，随心所欲地支配他的抵押品。1856年3月1日，布朗先生事实上已經停止了他在銀行的賬戶，換句話說，董事会已經决定不让他再扩大他的債務了。然而他在6月7日居然又从銀行方面得到了1020英鎊。林克雷特先生問道：“他是用什么狡計干出这件事的？”布朗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这并不困难。”

下面是他写給他的摯友凱麦隆先生的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这次因揭露英国皇家銀行内幕而在报刊上引起的怒潮所持的一般态度：

1855年10月5日于韦斯明斯特小斯密斯街

“凱麦隆先生閣下：不知尊駕現在何处，茲托令亲轉致此函。令人伤心的消息傳播甚快，閣下諒已得悉大小各家報紙如何辱罵我們，而你我二人受到的攻击最多。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报’上的刻薄文章都是我們的某位同事通过會計师挑唆起来的。对現在发生的一切，我全然不知，我所知道的只是公开报道的內容，我讀了这些东西之后，几乎以为，过去誰也不曾欠过銀行的債，以前的一切报道全是錯的。‘泰晤士报’是为了侮辱我們才积存了全部憤怒…… 自从銀行糊里糊塗地停止支付以后，我尚未見到其他董事。

您的忠实的

汉弗利·布朗”

好像“过去誰也不曾欠过銀行的債”似的！显然，布朗先生认为，人們对他和他的同伙充滿义憤，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全都是

---

盜賊!”提蒙这样說<sup>①</sup>，布朗先生也这样說，也許他在灵魂深处还确信所謂体面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說哩！重要的只是不要做小偷。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5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5 月 16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01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① 莎士比亚“雅典的提蒙”第四幕第三場。——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CRÉDIT MOBILIER<sup>182</sup>

#### (一)

在現今的法兰西帝国里，大軍<sup>①</sup>的战报已經为 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的报告书所代替了。4月28日，伊薩克·貝列拉先生在最近一次股东大会上，代表董事会作了一个决算报告，来概述这个出色的波拿巴机关 1856 年的活动。起草人在文件中以他慣用的手法，把财务上的計算同理論原理、把数字同感情、把证券投机同思辨哲学混在一起；只要仔細研究这份很讲究辞藻的文件，就会发现无庸置疑的衰落征兆。这种辯护士的粉飾，与其說是掩盖了这些征兆，倒不如說是暴露了它們。

Crédit Mobilier 的利潤确实还是很迷人。股票价格最初規定为 500 法郎，1856 年每股付利息 25 法郎，股息 90 法郎，合計 115 法郎，恰好为該公司資本的 23%。但是，要做出正确的結論，就不应当拿 Crédit Mobilier 同一般商业企业比較，而应当同它本身比較，这样，我們就会看到，不过一年，它的收入就大約减少了一半。对于这家公司每年的純收入，应当区别以下两种因素：一种是固定

---

① 拿破侖第一的軍隊。——編者注

的，另一种是变动的，一种是章程规定的，另一种是取决于该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的，一种列入利息项，另一种列入股息项。所以，每股 25 法郎，即 5% 的利息收入是该公司报告中固定不变的项，而公布的股息才是该公司有无进展的真正标准。所以，我们从报告中看到，1855 年为 178 法郎 70 生丁的股息，1856 年减少到 90 法郎，这种变动绝不能说是上升。如果考虑到小股东们是平均按每股 1 500 法郎的价格购进股票，那他们在 1856 年所得的实际股息，恐怕还不超过 7%。

伊薩克·貝列拉先生认为，“试图去指出 1855 年和 1856 年两年的股息不一样的原因，是无此必要的”。但他还是约略地说了一下 1855 年的利润有其“特殊的性质”。这一论断是不无根据的；但是，这就显而易见，只有保持住自己利润的特殊性质，Crédit Mobilier 才能企求一般地具有某种性质。这个公司的利润的特殊性质是由于它的资本同它的业务相差悬殊而产生的。这种悬殊——绝不是暂时性的——实质上是该公司生存的有机规律。Crédit Mobilier 既不是要求成为银行公司，也不是要求成为工业公司，它倒是要求成为别的银行公司和工业公司的（如果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代表。创办这个公司的意思的奇特之点，就是要它起代表机关的作用。所以 Crédit Mobilier 的业务表明，这些业务并不决定于该公司本身的资本和通常由资本派生的信用，而完全决定于 Crédit Mobilier 实际代表的或者企图代表的资本额。要是该公司的资本同该公司的业务之间的悬殊状况消失了，因而该公司的“特殊”利润也消失了，那末 Crédit Mobilier 就不是单单下降为一家普通银行，它会极可怜地破产。由于 Crédit Mobilier 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去完成由于自己这个组织的性质本身而被卷



进去的那些巨大业务，因此，它就必須依靠那些規模越来越大的新计划能順利完成。由于这个机关具有这种性质，业务上的任何停滯，而尤其是任何倒退，都是将来倒閉的恶兆。就拿 1856 年的报告书來說。一方面，我們看到 6 000 万法郎的微不足的資本，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数达 60 多亿法郎之巨的业务。貝列拉先生自己略举这些业务如下：

“本公司对最近一次債券的认购数不仅絲毫未动，而且由于有了便利认购者的分期繳款办法，本公司的认购数增加到 4 000 万法郎。

本公司的庫存現金……………3 085 195 176 法郎 39 生丁

本公司同銀行的往来賬……………1 216 686 271 法郎 33 生丁

本公司的其他往来賬……………2 739 111 029 法郎 98 生丁

本公司收到 1 455 264 張股票和本票

的分期繳款数…………… 160 976 590 法郎 98 生丁

本公司用本公司的款項支付的或用以

本公司起銀行家作用的那些公司的

款項支付的 3 754 921 張息票 ……… 64 259 723 法郎 68 生丁

本公司的有价証券总存量为 4 986 304 張股票或本票。”

貝列拉先生并不否认，Crédit Mobilier 在 1856 年所起的作用和它从前所起的作用有些不同。該公司在創辦以后的头三年中，应当“在法国創立重要企业”，“为大企业的創立提供一套制度”，并因而不断地以新的有价証券来充斥証券交易所。但是，1856 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由于和約的締結开始了社会活动的新时代”，因而投机活动有大肆泛濫之势。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Crédit Mobilier 的有良心的紳士們，那些抱有促进国家繁荣的非凡志向的貝列拉之流、富尔德之流、莫尔尼之流，突然感到，他們的“不可推卸的職責”是在他們过去鞭策的地方勒住，在他們曾經推动过的

地方加以抑制,在过去缺乏“明智的慎重”而表现出“勇敢大胆”的地方,“小心谨慎”。因为整个法国都动起来了, Crédit Mobilier 为了宽慰自己的良心, 决定反而要抑制自己的热情。但是, 如果说这一善心的决定的作出,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 1856 年 3 月 9 日“通报”上的一篇评论“指出政府想限制新的有价证券发行而规定了一些范围”, 这也是正确的。貝列拉先生說, 甚至“即使” Crédit Mobilier 有截然不同的打算, 那“这篇评论也会是一项命令, 尤其是对我们来说; 这是被迫的停住, 由于这一停住, 新企业的建立就将停止”。看来, 这一被迫的停住就是该公司答应抑制自己的充分根据。

正当 Crédit Mobilier 的迅速奔驰被政府的籠头这样遏止住了的时候, 偏巧又遇到不讲道义的竞争千方百计地力图限制该公司的活动范围, 减少它的财源。在法国, 根据法律规定, 匿名公司<sup>①</sup>的建立及其活动只有政府才能批准和加以监督, 而 Crédit Mobilier 根据自己的章程是无权建立这种公司的, 当 1856 年 3 月 9 日“通报”上的评论直接反对所谓匿名公司的时候, 法国的投机活动找到了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两合公司] 这种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 这种公司不必经过政府批准并且几乎是完全不受监督的。因此, 投机活动只不过改变了自己的途径; 在匿名公司的发展上所受的阻碍完完全全由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的丰收所补偿了。具有貝列拉先生所谓的“崇高的智慧”的拿破侖第三, 并没有去阻止投机活动, 他只不过是使投机活动大大脱离了自己的心爱机关的控制。1856 年头九个月中, 整个法国都沉醉于投机活动, Crédit

<sup>①</sup> 見本卷第 26 頁。——編者注

---

Mobilier 本来可以从投机中得到甜头，但这个忠诚的公司仅仅由于“崇高的智慧”考虑不周因而只得这样地“在有限范围内”活动，服服贴贴地“等待官方发出叫它恢复活动的信号”。当一个甚至完全越出拿破仑本人“崇高的智慧”的权力范围之外的事件已经发生的时候，它还在等待官方的信号和“良机的到来”。

让我们下次再来分析这一事件吧。

## (二)

1856年9月，欧洲大陆和英国同时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Crédit Mobilier 正在——用貝列拉先生的話來說——充当“金融和信貸方面的明智的哨兵”，这个哨兵比其他“站在各級阶梯上的”人“眼界更为广闊”，“能够防止惊慌和不必要的紧张”，一心一意地关怀“扶持国民劳动和国民信貸”这个崇高的目的，漠視“不公正的或嫉妒性的批評”，对“激烈的或蓄意的攻击”一笑置之，对“誣蔑者”的庸俗“誹謗”傲然不理。在这个紧急关头，法兰西銀行对于Crédit Mobilier 純粹出于追求社会幸福的热望而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法兰西銀行提出的那些要求，看来是很不肯通融。所以，人家告訴我們說，“危机之所以发展得如此猛烈迅速，是法兰西銀行根据自己所遵循的章程而采取的措施造成的”，并且說，“这个机关还很不完善，因为它沒有承担任何义务和拟定任何实行和諧合作的措施”。法兰西銀行拒絕帮助Crédit Mobilier，而同时也不要它的帮助。原来，Crédit Mobilier 本着它固有的敢想精神，认定金融危机是施展大規模的金融騙术的最适当的时机。因为在普遍惊慌失措的时候，实行一次冲击就可以攻克好几年用正規包圍攻不下来的堡垒。Crédit Mobilier 建議同若干家外国銀行一起，购买法兰西銀行所握有的无期证券或国家債券，以便使法兰西銀行能够“有效地增加自己的金屬儲备和繼續发放以无期证券和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貸款”，这是并不奇怪的。当Crédit Mobilier 提出这个

无私的和仁慈的建議的时候，它的庫里已經放滿了将近 5 475 000 法郎的无期证券和 11 500 万法郎的铁路股票，而法兰西銀行此时所握有的无期证券約为 5 000 万法郎。換句話說，Crédit Mobilier 所握有的铁路股票数額比法兰西銀行所握有的无期证券数額多一倍以上。如果法兰西銀行把自己的无期证券投进市場，以加强自己的金屬儲备，那就不仅会使无期证券跌价，而且会使其他一切的有价证券，尤其是铁路股票跌得更加厉害。因此，Crédit Mobilier 的建議实际上就是要法兰西銀行不把自己的无期证券投进市場，而給 Crédit Mobilier 所握有的铁路股票在市場上多留一些地方。而且，正像貝列拉先生所断言的，法兰西銀行就会有停止发放以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貸款的口实。这样一来，法兰西銀行就是暗中解救了 Crédit Mobilier，而人們却觉得法兰西銀行从屬于这一慷慨豪爽的机关，并且是由于 Crédit Mobilier 的帮助而得救的。但是，法兰西銀行識破了詭計，认为还是和这个“明智的哨兵”离得远一点为妙。

Crédit Mobilier 像它的保护人过去应当保卫法国免于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十分坚决地要保卫法国免于財政危机，它提出了一个新建議，这次不是向法兰西銀行提出的，而是向巴黎的私人銀行提出的。它大公无私地建議

“滿足法国各铁路公司的願望，认购它們要在 1857 年发行的 3 亿法郎的債券。同时 Crédit Mobilier 自己表示准备认购 2 亿法郎，如果其他銀行认购其余 1 亿法郎的話”。

这样的认购必然会迅速提高铁路股票和本票即主要为 Crédit Mobilier 所持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不仅如此，Crédit Mobilier 走了这一大胆的一着，就将成为法国所有铁路的大股东并且使巴

黎一切大銀行家都会成为它的某种不由自主的合伙人。但是这个計劃也落空了。不得不“打消采取任何共同措施的念头的”Crédit Mobilier 发觉,它只好自己去冒風險了。Crédit Mobilier 深信,“它的这类提議的本身,就无疑非常有助于安定人心”,因此,虽然危机具有“大大减少它觉得可以指望的利潤”的趋势,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处之泰然了。

除了所有这些倒霉事情以外,Crédit Mobilier 还抱怨人家直到现在还在阻止它使用自己的王牌,即发行 6 亿法郎的債券,也就是发行它自己发明的紙币,这种紙币的偿付期限很长,用来作保证的不是該公司的資本,而是可以拿这种紙币来交换的有价证券。

貝列拉先生說:“我們本来該从发行本公司債券中得到的資金,会使我們能够购买直到现在还没得到一定运用的有价证券,并且极大地扩大我們对工业的扶持。”

1855 年,Crédit Mobilier 本来已經完全准备好了发行 24 000 万法郎的这种債券,——这是該公司的章程所許可的,——但是土伊勒里宮的“崇高的智慧”制止了这种打算。Crédit Mobilier 把紙币的这种发行叫做增加自己的資本;而普通人却宁肯把它叫做增加 Crédit Mobilier 的債務。总之,1856 年 3 月,Crédit Mobilier 为政府所逼迫而不得不停住,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的競争,金融危机和 Crédit Mobilier 自己的紙币的未能发行,所有这些情况充分說明为什么該公司的股息会减少。

在这家規模巨大的騙人的康采恩以往所有的报告书中,都是把以股份工业公司代替个人的工业企业吹嘘成这个康采恩的特点和革新。但是在我們所分析的最近这份报告书中,就是去寻找这方面的最細微的迹象,也会是白費气力。該公司 6 000 万法郎的資

本中, 1856 年有 4 000 万投入国家证券。而它由于信贷而握有的款子, 相当大的一大部分用于在交易所的結算日对无期证券和铁路股票进行“展期”。在 1856 年进行的这种业务中, 法国无期证券为 42 150 万法郎, 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为 28 100 万法郎。在目前, 这种展期不过就是給证券投机商人以货币贷款, 使他們得以继续自己的业务, 并使交易所的空头证券看来可靠而已。Crédit Mobilier 用来企求得到法国人民感激的, 主要就是經營这种吸引很大一笔国民資本脱离生产活动而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有价证券买卖的业务。路易-拿破侖的确从貝列拉先生們的公司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他們不仅使皇家证券具有虚拟的价值, 而且不断地鼓励、灌輸、支持和傳播成了現今帝国根本原則的投机精神。只要草草地浏览一下貝列拉先生那么得意地加以描述的业务, 便会明白, Crédit Mobilier 的投机手腕是必然同它的騙人的生意相联系的。一方面, Crédit Mobilier 执行交易所的保护人这种社会职能, 它从居民那里把錢借来貸給从事投机活动的公司和个人, 以維持法国股票和有价证券的价格。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私人企业, Crédit Mobilier 又經常利用这些股票和有价证券行情的漲落, 既利用它們的上涨, 也利用它們的下跌, 来謀自己的利益。为了从表面上調和这种矛盾, Crédit Mobilier 就不能不欺詐騙人。

像一切职业投机分子一样, 路易-拿破侖十分大胆地思考了自己的 coups [步驟], 又十分緩慢而謹慎地执行这些步驟。例如, 他曾經两次制止 Crédit Mobilier 的肆无忌惮的活动, ——先是 1855 年他禁止該公司发行債券, 后来是 1856 年他在“通报”上的警告迫使 Crédit Mobilier 抑制自己的热情。但是, 尽管有路易-拿破侖的阻碍, 这个公司仍然在尽力活动。显然, 如果給它以充分的自

由,那它是会招致灭亡的。如果波拿巴还要继续去打搅它,叫它抑制自己,那它就会不成其为这样的企业了。但是,从貝列拉先生的报告书中显然可见,“崇高的智慧”和“明智的谨慎”终于谈妥了。如果已经信誉扫地的 Crédit Mobilier 得不到发行自己本身的纸币这一危险的权利,那就应当把 Crédit Mobilier 的继续存在所不可缺少的资金,在法兰西银行这块更硬的招牌下给予 Crédit Mobilier。这就是现在提交给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的“有学問的狗和猴子們”审查的新的法兰西银行法的秘密目的之一。貝列拉先生說:“我們不怕声明,要是我們除了法兰西銀行以外,还要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寻找資金,以便通过貸款来給社会信貸、大企业、工商业”,換句話說,即給 Crédit Mobilier 本身,“以必要的协助,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5 月 12 日  
和 15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5 月 30 日  
和 6 月 1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027 号 and 第 502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sup>183</sup>

1857年5月22日于倫敦

英国人在亚洲剛結束了一場战争，現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場战争了<sup>184</sup>。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到現在为止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們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軍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敗塗地，而被弄到絕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軍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

波斯的状况与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sup>185</sup> 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軍官曾輪流试图建立一支波斯軍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由于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軍官和士兵的东方人所具有的嫉妒、阴險、愚昧、貪婪和腐敗，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新式的正規軍从来沒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驗一下自己的組織和战斗能力。它的一切功劳只限于对庫尔德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討，而在这些征討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数量众多的非正規騎兵的核心或預备队。当时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規騎兵，而正規部队通常只利用它那表面

威武的战斗队形向敌人摆威风来欺騙敌人。最后，终于爆发了波斯同英国的战争。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由新招募的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 60 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炮兵，并按照一切规定列成了方队，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攻击，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近卫军或者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支印度正规骑兵在他们自己军队中所得的评价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书<sup>186</sup>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印度的正规骑兵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举不出一个能说明正规骑兵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 600 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一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英军作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腊附近，波斯正规军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一当炮台被压制，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 300 名步兵和 50 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粮食、火炮都送给了侵略者（要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是不可能的）。

但是并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懦的民族，也不能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1806—1812 年<sup>187</sup>和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中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无论在设防的城市中或山区省份里，对俄军进行主要抵抗的都是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只要在战场上露一面，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一听到

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纳乌特人<sup>188</sup>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那附近的狭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不过，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土耳其的正规军却在从沃耳特尼察和切塔特到卡尔斯和印古耳河的各次会战中都击败了俄军<sup>189</sup>。

问题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军队的操典，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操典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欧洲式的教练规则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幸无常习气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只要士兵在检阅时步法整齐，会操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末土耳其苏丹或波斯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应付一切事变。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形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很多背教者<sup>190</sup>和欧洲军官，那末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就不能有任何作为。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简直太无能为力了，他们不能不把领导炮兵的事务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无论在土耳其或者波斯，炮兵都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所有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

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有英国部队和强大舰队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規軍击潰的。挫折愈严重，这种挫折给予波斯人的益处也愈大。正如土耳其人已经看到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会看到：欧洲式的服装和检閱式的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而经过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也会令人肃然起敬，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德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与他们作战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变换队形的部队，而是亚洲人数众多的非正规队伍。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

或者在船上燒死，也不願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們向來是最听命和最馴順的國民——現在也密謀起事，突然在夜間起義，如在沙撈越就發生過這種情形；又如在新加坡，當局只有使用武力和嚴加戒備，才能壓制他們。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國人反對一切外國人的普遍起義，并使這一起義帶有絕滅戰的性質。

軍隊對於採取這種作戰方法的人民有什麼辦法呢？軍隊应当在什麼地方侵入敵國，侵入到什麼地方為止和怎樣在那裡堅守下去呢？這些向毫無防禦的城市開火、殺人之外又強姦婦女的文明販子們，自然會把中國人的這種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蠻的、殘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這種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國人管得着這些嗎？既然英國人把中國人當做野蠻人看待，那末英國人就不能反對中國人利用他們的野蠻所具有的全部長處。如果中國人的綁架、偷襲和夜間殺人就是我們所說的卑怯行為，那末這些文明販子們就不應當忘記：他們自己也承認過，中國人採取他們一般的作戰方法，是不能抵禦歐洲式的破壞手段的。

簡單地說，我們不要像騎士般的英國報紙那樣去斥責中國人可怕的殘暴行為，最好承認這是 *pro aris et focis* [為了保卫社稷和家園] 的戰爭，這是為了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雖然你可以說，這個戰爭帶有這個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見、蠢笨的行動、飽學的愚昧和迂腐的蠻氣，可是它終究是人民戰爭。而對於起義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採取的手段，不應當根據公認的正規作戰方法或者任何別的抽象標準來衡量，而應當根據這個起義民族所已達到的文明程度來衡量。

這一次，英國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現在，中國的民族狂熱情緒

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sup>191</sup>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英国人能把广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可是从什么地方调集军队，来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来克服途中的每个障碍，来用部队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 100 英里远的城市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使人简直不能预料它将有什么样的转变。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使得英军除了或许向某一个不重要的地点（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点）作一些进攻而外，将完全无所行动。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

的哥薩克部队却緩慢地、然而繼續不断地把自己的駐屯地由达烏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軍陆战队則在滿洲的良好的港灣周圍設立堡壘。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現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們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險；过不了多少年，我們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掙扎，同时我們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紀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5 月 20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載于 1857 年 6 月 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032 号

## 卡·馬克思 有趣的揭露

1857年5月26日于倫敦

奥当奈尔5月18日在西班牙参議院发表的演說，包含着对現代西班牙秘密历史的极其有趣的揭露。由于他对埃斯帕特罗的背叛和他的 coup d'état [政变] 为納尔瓦艾斯的上台扫清了道路，polacos<sup>192</sup> 現在便設法来摆脱后者。为了这个目的，卡龙赫將軍（他本人曾經是1843年克里斯蒂娜派暴动的参加者，1854年革命爆发时潘普洛納的鎮守司令）被慫恿在5月18日当参議院对向女王呈递奏章一事进行辯論时，针对有关建議大赦的一节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他猛烈地攻击一切軍隊起义，特别是1854年的軍隊起义，并且坚决要求“不应当让保证絕對不受懲罰的安撫政策导致对无可救药的暴徒的鼓励”。薩尔托里烏斯的朋友們預先策划的这次打击，既针对瓦倫西亚公爵（納尔瓦艾斯），也针对奥当奈尔。实际上，polacos 曾經认定，奥当奈尔一有机会就会出来揭露納尔瓦艾斯是他在近卫軍卫戍部队中策动起义时的秘密同謀者。卡龙赫將軍正是給了奥当奈尔这样一个机会。納尔瓦艾斯为了防止爆发的危險，貿然采取了一个絕望的步驟。他，一个卫护秩序的人，为1854年的革命进行了辯护，他說，这次革命“受到了最崇高的爱国精神的鼓舞，它是由以前几届內閣的过火行为挑起的”。这样，



正当內政大臣諾塞达尔先生向議會建議通过残酷的出版法的时候，政府首脑納尔瓦艾斯却在参議院中扮演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保护人]，即革命和軍隊起义的捍卫者。但这是徒劳的。在5月18日参議院的會議上，納尔瓦艾斯被 *polacos* 逼着收回了自己对“以前几届內閣”的譴責，同时还不得不痛心地听着奥当奈尔那些使他名誉扫地的揭露。納尔瓦艾斯对“奥当奈尔揭露私人的和机密的談話”表示了不滿，并对“今后是否还能信賴友誼”提出了疑問，这样他就亲自承认了奥当奈尔的揭露是真实可信的。現在在宮廷看来，納尔瓦艾斯已成了被揭露的反叛者，不久他就会被迫为布腊沃·穆里洛和薩尔托里烏斯让路，而这两个人无疑将是发生新的革命的先声。

下面是奥当奈尔的演說的逐字逐句的譯文：

“奥当奈尔：自从参議院上次开会以来，发生了許多极重大的事件，这使我不能在这场有声有色的政治討論中保持緘默。我在这些事件中所起过的作用，使我有义务出来讲话。我曾經是近卫軍卫戍部队起义的首領，发表过曼薩那累斯綱領；又担任过維多利亞公爵內閣的陸軍大臣，两年后王国曾經庄严地号召我去拯救这个王国和岌岌可危的社会；我幸运地无須經過流血战斗或者下令放逐任何人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在这一切之后，我應該觉得自己有义务参加正在进行的討論。况且，卡龙赫將軍已經对我以及两年来与我有联系的、在危机期間出力拯救社会和王国的尊貴將軍們提出指責，再保持緘默便是一种罪过。卡龙赫將軍把起义描繪成只不过是近卫軍卫戍部队里的騷动。这是为什么？难道他这么快就忘記了起义前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而那些事件如果繼續发展下去，是会将国家卷入不可收拾的革命中去的。內閣首相那样坚决地擯棄了卡龙赫將軍的指責，我向他表示感謝。的确，他这样做，是表現了一个捍卫自己事业的人的毅力。（普遍的强烈反应）我不得不从詳叙述为证实这一事实所必需的情况；为了首先把所有可能带有私人性质的东西从这次辯論中剔除出去，如果內閣首相願意回答如下几个問題，我将

不胜感激：瓦倫西亚公爵自从 1852 年以来与維卡耳瓦罗的將軍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真的嗎？自从參議院由于 105 人的表决而被封閉以来，他对他們的一切行动都有情报，是真的嗎？他打算等他們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加入他們一边，是真的嗎？他由于一些我所尊敬的理由而没有可能这样做，可是后来派了他的一个副官去祝賀我們的胜利，是真的嗎？

**納尔瓦艾斯：**在听了呂遜納伯爵对我說的話以后，我应当声明，不論我們过去的关系如何，我絲毫沒有参与他所策划的以及后来付諸实施的一切，也絲毫沒有按照他所策划的以及实施自己陰謀的方式办事。

**奥当奈尔：**內閣首相以他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做了回答。我本来不願意做进一步的解釋，但是，既然非这样做不可，我就做吧。任何人都知道，1852 年政治界的情况是絕對平靜的。对于政府和國家來說，不幸的是，过一段时期以后，开始有人談論‘立宪改革’，不过起初是窃窃私議罢了。議員先生們一定还記得由于担心 *coup d'état* 而产生的惶恐不安。他們大概沒有忘記，当时在政治家当中产生了許多联盟，在这些联盟中酝酿成熟了一項向女王呈遞奏章的決定。許多人都在这份奏章上签了名，但是它并没有呈遞給女王。召开了議會，几天以后，‘日报’公布了奏章的几种方案，它們在这个議院中产生了这样大的效果，以致政府在議長选举中遭到了严重的失敗。在这以后，議会被解散了。当时，温和党最有影响的人物为了对此表示抗議而联合起来了；瓦倫西亚公爵被任命为这个联盟的主席。由于害怕政府会阻碍这些联盟，建立了一个委員會，瓦倫西亚公爵又被选为这个委員會的主席，芒先生、皮达尔先生和其他显要人物都是这个委員會的最积极的成員。除了抗議以外，这个委員會还提請討論新选举的合法性問題。在瓦倫西亚公爵到貝云去以后两三天，布腊沃·穆里洛內閣提出辞职。布腊沃·穆里洛被达尔卡伯爵所代替。反对派还是原班人馬，当召集議會时，一份由瓦倫西亚公爵起草的宣言被提交給參議院。參議院否决了它，可是后来看得很清楚，反对派的声势非常浩大。亚尔科伯爵的內閣被勒尔松迪將軍的內閣所代替，然后又建立了圣路易斯伯爵的政府。我很抱歉不得不說一些詳細情况，但是現在該談談我自己同那些在近卫軍卫戍部队里与我站在一起的人們的政治联系了。在瓦倫西亚公爵回到西班牙以前，正像我們当中的每一个人所做的那样，我接見了他的一个代理人，他在这以前曾和这个代理人有过一次长談；在这次談話中，公爵对國家所陷入的处境表示遺憾，对威胁着王权和宪法的危險表示

不安，最后他說，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使用武力。（强烈反应）薩尔托里烏斯政府准許瓦倫西亚公爵返回西班牙。他先前往馬德里，然后来到阿兰惠斯。在那里我們和他进行了磋商。他向我們表示了他的爱国心情，这种爱国心情是我所欽佩的，尽管我并不能支持他在目前所领导的內閣。他向我們声明說，既成形势已使得动用武力成为不可避免；由于某些原因，他不能第一个出面，但一定是第二个拔出劍来；他补充說：在那时的情况下，只要有两个騎兵团发动起义就可以进行革命。他这一番話是以斬釘截铁的方式对我們說的。議會开会了。瓦倫西亚公爵由于深信一切合法手段都徒劳无益，沒有出席參議院担任反对派的领导，而到洛哈去了。大家都知道，后来在議會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記得著名的 105 人表决。可是政府并不认为必須辞职。議会被解散了，然后采取了前所未聞的迫害措施。曾投票反对內閣的將軍們、最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們、抱有反对情緒的新聞記者們都遭到驅逐；宣布在各方面进行根本改变；宣布发行强制性的公債；总之，政府将自己置于法律之外。現在我要問你們：你們敢不敢說，在这个所有反对党派一向陰謀傾軋的国度里，什么时候曾經有过比 1854 年革命更合法的革命嗎？至于我，我离开了曾經隱藏了六个月的住处，騎着馬，由几个將軍和几团人伴随着离开了那里，目的是要推翻政府，因为它这么无耻地蹂躪了我曾經宣誓要以將軍和參議員的身分来保卫的宪法。我們来到了維卡耳瓦罗，令我极为痛心的是，在那里开始了战斗。战斗沒有分勝負。双方的部队都表現得很英勇。卫戍部队不得不返回馬德里，而我們就留在維卡耳瓦罗。第二天，就像和瓦倫西亚公爵約定的那样，我們經過阿兰惠斯前往安达魯西亚。当时塞拉諾將軍駐在哈安省，他曾答应給我們援助。我們来到曼薩那累斯时，他在那里迎接了我們，并且說，那些答应跟随他的人都跑光了，他单身一人来和我們分担命运。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发表了宣言，因为我不喜欢做了事不认賬，我想說說那时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我通过密使了解了馬德里的一切动态。温和党里所有一切有影响的人物都被卷入了运动。只是发生了一定会发生的情况：当你計劃采取某項措施的时候，指望有大批人会参加，可是当行动的時刻一到，其中最热心的人却不見了。密使告訴我說，民众大概不会支持我們，因为政府企图使他們相信，仿佛运动的原因只是个人的糾紛，仿佛运动沒有任何确定的政治原則。这就是发表曼薩那累斯宣言的原因，这个宣言包含两点重要內容：

**立宪改革**，我后来担任内阁首相时会向女王陛下提出过这一点，还有**国民军**，但不是以前实际上组织过的那种国民军，而是我本人打算建立起来作为真正的秩序因素的国民军。

我们离开了曼萨那累斯并给瓦伦西亚公爵写了一封信，信末由我和其他四位将军署名，我们在信中声明，如果他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任命他为我们的总司令。公爵派了一个副官来通知我们，说他病了，正处在极严密的监视之下。曾有人说，我们仿佛决定逃往葡萄牙。这是不真实的。相反地，我们决定前往摩勒纳山，以便在巴里奥斯建立自己的骑兵，截住所有载运粮秣的车辆，一有机会就向马德里进发，而这时我们突然得到了萨尔特里乌斯内阁垮台和女王号召维多利亚公爵组阁的消息。从这时起，我的使命就结束了。*per interim*〔这时的〕大臣圣米格尔将军给我送来了返回马德里的指示。我顺从了，但是坚决不想加入内阁。国王撤免了维多利亚公爵，我与这位公爵从1840年起就已断绝一切关系。那些后来责备我加入他的内阁的人，在我抵达马德里的当天晚上，就曾到我那里去恳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务，说这是拯救秩序和社会的唯一办法。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温和党的。我见到了维多利亚公爵，在我当时与他保持的那种关系下面，要不是他自己的宣言帮助我摆脱了恶意的诽谤，我会感到相当为难的。埃斯帕特罗衷心地拥抱了我，并且说，结束西班牙人之间的一切纠纷的时间已到，以一党的力量来进行统治已不可能，因此他坚决要敦请一切贤达人士。我了解了马德里的情况。街垒还没有拆除，卫戍部队的人数极少，但是像任何时候一样明白事理的民众博得了我极大的信任。我和埃斯帕特罗的第二次见面显得冷淡得多了：他建议我当外交和殖民大臣。我通知他说，我如果入阁，只能同意当陆军大臣。于是他对我说，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担任古巴镇守司令这个职务的最适当的人选。我回答说，由于我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我不愿意重新回到哈瓦那去，而宁愿不再担任任何公职；但是我恳求他立即组成政府，不要再使国家受到临时统治的威胁。不久，原来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的萨朗萨将军，以埃斯帕特罗的名义请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位，我在当天夜晚就和我的同僚们一起宣誓就职。对我来说，当时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听任革命发展下去，直到它的过分做法引起反应，或者阻止它的发展。第一条道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迫使我走第二条道路。我对这一点并不后悔。我们的第一次讨论涉及制宪议会。在座的科耳亚多先生知道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争

論。我們的努力沒有成功。簽署了关于召开議会的法令。举行了普选——不是像皮达尔先生說的那樣是在政府的压力下举行的,而是在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情况下举行的。大部分代表都是衷心希望国家幸福的人。如果政府坚定的話,宪法是可以在四个月内制定的。但是埃斯帕特罗(不是作为軍人,而是作为政治家)的出了名的軟弱性格,使政府方面的任何行动都陷于瘫痪。我繼續留在內閣里,并不是像維多利亞公爵所錯認的那樣,为了出卖自己的同僚。使我繼續守在这个职位上的原因,也就是那曾經迫使我爭取这个职位的原因。我繼續留下来,是为了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奥当奈尔在为自己的 coup d'état 作了极不高明的辯护以后,以这样的話結束了他的演說,即他不能支持納尔瓦艾斯元帅的內閣,“因为納尔瓦艾斯已經宣称他打算遵循那种与代議制不符的政治路綫”。

对奥当奈尔演說的評論由卡·馬克思  
于 1857 年 5 月 26 日写成  
載于 1857 年 6 月 1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03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新的法兰西銀行法

新的法兰西銀行法<sup>193</sup>和法兰西銀行總裁阿尔古伯爵的辞职，是目前帝国金融史上相当重大的事件。阿尔古先生自1834年被路易-菲力浦提升为法国銀行巨擘的首脑以来，他的特色就是牢牢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一职位达二十三年，并且依靠自己的謹慎和明智，安全地度过了1848年和1851年的風暴。1848年革命不仅是反对路易-菲力浦的，而且是更猛烈地反对以法兰西銀行为中心的 *haute finance*〔金融貴族〕的。所以可以意料到，这个机关及其不受欢迎的领导人自然要成为革命的第一批打击对象。阿尔古伯爵对于当时的形势沒有完全認識清楚，而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通过人为地加剧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恐吓資产階級，促使它走上反革命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突然中断了发放巴黎商界一向所依靠的信貸；可是，他有意制造出来的极大危局沒有动搖临时政府的地位，反而把鋒芒指向了这家銀行自己。阿尔古伯爵确信会发生的反革命事件，並沒有发生，却发生了向法兰西銀行大量提前支取存款的事件。但是，如果說阿尔古伯爵錯誤地估計了人民的力量，那末他却十分敏銳地估計了政府所可能采取的行动。他不仅說服政府給該行的銀行券規定了强制性的行市，并要政府乖乖地在最

不利的条件下向那家刚刚被它从彻底破产中拯救出来的銀行取得借款，而且乘机謀取了发行票面額較小的銀行券的特許权，剝夺了外省銀行的发行权，扩大了自己的壟断，来增加該行的收入来源。1847年以前，法兰西銀行发行的銀行券的最小票面額是500法郎，1848年准許它发行200和100法郎的銀行券。外省的銀行失掉了从前的发行銀行券的权利，法兰西銀行新設的分行占据了它們的地位。这种变换的結果是：該行发行的投入流通的銀行券总額，在1847年年終时只有4800万美元，而1855年年終时达到了122455000美元；該行的周轉額在1847年还不及37500万美元，而1855年达到94060万美元，其中有54900万美元是各分支行的业务。而它的股票价格在革命前通常为2000法郎左右，現在市价为4500法郎。1848年以前，与其說法兰西銀行是法国的机关，倒不如說是巴黎的机关。革命政府賦予它以新的特許权，使它变成了全国規模的私人企业。这样一来，二月革命所要消灭的金融貴族的壟断，却在阿尔古伯爵巧妙的管理之下，經過这次革命得到了扩大、加强和改組。

阿尔古伯爵必然要遇到的第二大災难就是 *coup d'état* [政变]，因为它的成功主要依靠以强制手段侵入委托阿尔古伯爵看管的法兰西銀行的金庫。这位好商量的总裁不仅装作沒有看見波拿巴破門入盜的行为，而且还在所有正派人士或假裝的正派人士紛紛辞去行政职位，大有敗坏这个篡位者的声誉的时候留在自己的职位上，因而大大地帮助了消除商界的阴暗的預感。为了嘉奖这种难能可貴的效劳，波拿巴同意不在1855年修改法兰西銀行的章程，这本来是1840年最后一次恢复法兰西銀行的特許权时規定了可以修改的。阿尔古伯爵和他的亡友苏尔特元帅一样，是只矢志

忠于自己的职位和自己的薪俸的。目前他辞去法兰西銀行的总裁的职位,只能用民間故事中說的,老鼠被迫从正在沉沒的船上逃走的原因来解釋。

新的法兰西銀行法的經過始末,是一个非常能說明目前帝国时代的黑暗勾当。在 1856 年底欧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的时候,关于修改現行的法兰西銀行法的問題是在这样一个好听的借口下第一次提出来进行討論的,即这家銀行的龐大业务建立在資本过于微小的基础上。在六个多月的時間中,在拿破侖第三的出席下,以法兰西銀行代表的这一方,同巴黎的大金融家、大臣們和国务會議的另一方,举行了多次秘密的談判。虽然这样,上面所說的这个法案却直到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 最后解散的前夕才提交这个机构。在 bureaux<sup>194</sup> 里初步討論时,法案遭到猛烈地抨击;被指定来对这个法案提出报告的委员会簡直把这个法案說得一塌糊涂,甚至有人威胁要完全否决这个草案。但是波拿巴很了解自己的傀儡。他要人使他們明白,政府的决定是坚决的,因此他們应当選擇:或者是批准法案,或者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丢掉自己薪高而清閑的职位。为了帮助他們把最后一点点良心抹掉,討論法案的时间恰恰安排在會議最后一天。不言而喻,这一来,法案只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就通过了。这个甚至在 Corps Législatif 这种机关里也要施尽詭計才得以通过的法令該具有何种性质呢?

的确,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的年代,当法兰西銀行和路特希尔德家族被正式授权可以禁止一切不合他們心意的法案的时候,也沒有哪一个大臣敢于建議国家这样地完全向他們投降。現在政府放棄了还是 1846 年銀行特許状就保证了的在新的法兰西銀行法



有效期滿以前修改这个法令的权利。有效期还有十年的法兰西銀行的特許权，現在又被垂青延长到三十年这个新的期限。銀行被准許把自己的銀行券的票面額降低到 50 法郎；只要指出 1848 年发行票面額 200 和 100 法郎的銀行券會使得这家銀行以自己的紙币代替了 3 000 万美国的黄金和白銀，这一措施的重要性就十分清楚了。这次新的发行无疑會給法兰西銀行带来巨額利潤，但是国家从中却什么也得不到。相反，国家由于代表了法国給予該銀行以信任还要付錢給銀行。法兰西銀行取得在还没有設立分支行的各省設立分支行的特許权，这并不是作为国家向銀行的让步，而相反地是銀行向国家让步。准許銀行向它的主顾收超过 6% 的法定利息，条件是只要承担一个义务，即把由此得来的利潤并入銀行的資本中，而不归入銀行全年的股息中。国庫的往来賬的利率由 4 厘降低到 3 厘，这一点由于廢除 1840 年法令的下述条款而得到了充分的补偿，这一条規定在国庫的債款下降到了 8 000 万法郎以下的时候，銀行根本不收利息，而这种債款額通常平均是 8 200 万法郎。法兰西銀行所得到的最后一个但也是同样重要的优待，即該行新发行的票面价值为 1 000 法郎的 91 250 張股票，只有已有的 91 250 張股票的持有人才能购买，并且目前該銀行股票在交易所的价格为 4 500 法郎，但这些新股票却应当以 1 100 法郎的价格出售給旧股东。这一牺牲国家利益而完全对銀行巨擘有利的法令，是波拿巴政府財政上陷入了怎样一种困难的局面的最有力的证明。作为所有这些让步的等价物，政府得到了 2 000 万美元，也就是說这家銀行必須购买 2 000 万美元专门为此发行的三厘无期公債，这种公債的最低价格为 75 法郎。这笔交易显然完全证实了欧洲的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波拿巴已經从法兰西銀行的金庫中

---

借到了一笔巨款，現在他正在設法使自己的詐騙勾当表現得比較体面一点。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6 月 2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6 月 20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045 号

## 卡·馬克思 与波斯簽訂的条約

1857年6月12日于倫敦

不久以前，帕麦斯顿勋爵在他把持的下院中受到有关波斯战争問題的质詢时，他譏諷地回答道：“只要和約一經批准，下院就可以发表自己关于战争的意見。”1857年3月4日在巴黎簽訂并于1857年5月2日在巴格达批准的和約，現在已提交下院。和約共分十五条，其中八条都是和約中常見的具文。第五条規定，自互換和約批准书之日起三个月內，必須將波斯軍隊从赫拉特公国和赫拉特城以及从阿富汗的一切其他地区撤走。按照第十四条，英国政府方面則答应——俟上述条款得到履行，就“立即將英国軍隊撤出隸屬於波斯的一切港口、地区和島屿”。

但是應該提醒一下，早在布什尔被占領以前，波斯使节費魯赫汗在君士坦丁堡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进行長時間的談判时，就曾主动提出把波斯軍隊从赫拉特撤走。因此，英国从这个条款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新利益，只不过是特权在一年中最有碍健康的季节把自己的軍隊困在波斯帝国的最容易感染疾病的地方。夏季的烈日、沼澤和海洋甚至在布什尔和穆罕默德的当地居民中間也会造成种种可怕的災害，这些都曾被古代作家及近代作家們載入史册；可是，既然仅在几个星期以前，在这个問題

上很有权威并且追随着帕麦斯顿的亨利·罗林森爵士已经公开说过，英印军队必然会死于恶劣的气候，何必再引证这些记载呢？伦敦“泰晤士报”收到在穆罕默腊附近获胜的消息后，立刻就声言，虽然和约的谈判在进行，为了拯救军队，必须向设刺子推进。统帅这次远征的英国海陆军将领之所以自杀，也正是因为他们非常担忧军队可能遭到的命运，按照政府的指令，他们是不应当率领军队由穆罕默腊向前推进的。因此，完全可能看到克里木惨剧小规模地重演；然而这次惨剧的发生，不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和政府犯了重大的错误，而是由于用胜利者的宝剑写成的和约的条款。在上述和约的条款中有一句话，只要帕麦斯顿愿意，这句话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引起纠纷的苹果”。

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军队撤出隶属于波斯的一切港口、地区和岛屿”。但正是在这句话上产生了问题：穆罕默腊城是否隶属于波斯？土耳其人对于这个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三角洲、土耳其人在幼发拉底河上唯一可以经常通航的海港（因为巴斯拉港口在一年中的某些时间内，对于载重量大的船只来说是太小了），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要求。因此，如果帕麦斯顿认为适当的话，他就可以借口穆罕默腊不“隶属于”波斯、借口应该等待彻底解决土耳其和波斯之间的这个边境问题，而把穆罕默腊据为己有。

#### 第六条载明，波斯同意

“放弃对赫拉特公国和赫拉特城的领土主权以及对阿富汗各地区的主权的一切要求”；“对阿富汗的内政不予以任何干涉”；“承认赫拉特和整个阿富汗的独立，并永远放弃破坏这些国家的独立的企图”，在同赫拉特和阿富汗发生争端时，须请“英国政府从中进行友好的调处，以求消弭这些争端；只有当这种友好的调处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才能诉诸武力”。

### 英国政府方面則答应

“随时影响阿富汗各邦，以便預先杜絕从它們这方面产生的一切重大禍根”，并“竭尽全力用公正的和无损波斯尊严的方法調解爭端”。

如果把这一条的官样文章去掉，那末它所表明的无非就是波斯承认赫拉特的独立，也就是費魯赫汗自称他在君士坦丁堡會議时就准备要做的让步。誠然，按照这一条，英国政府被規定为波斯和阿富汗之間的正式調停人，但是从本世紀一开始，它就一直就扮演这个角色。至于它能否繼續担任这个角色，这就不是权限問題，而是实力問題。此外，如果有那么一位胡果·格劳修斯在德黑兰朝廷中找到了栖身的地方，那他就会向朝廷指出，按照 *jus gentium* [国际法]，凡独立国家据以授权外国政府干預本国国际关系的任何条款，均屬无效，因此同英国簽訂的条款更屬无效，因为它把阿富汗这个仅仅用来标明各部落与各邦的带有詩意的名詞，解釋为真正的国家了。从外交的意义上來說，阿富汗国家就同泛斯拉夫国家一样，是并不存在的。

第七条規定，阿富汗各邦对波斯国境有任何侵犯行为时，“波斯政府有权采取軍事行动鎮压和懲罰进犯者”，但是“任务一經完成，必須把自己的軍隊調回本国境內”，——这一条实质上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 1852 年条約中那一項曾給远征布什尔以直接借口的条款。

由于第九条的規定，波斯同意英国派駐总領事、領事、副領事和領事館办事人員，这些人享有最优惠国家的特权；但是由于第十二条的規定，英国政府放棄

“对于今后实际上不为英国使节或英国总領事、領事、副領事和領事館办事人員做事的任何波斯臣民的保护权”。

由于費魯赫汗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同意英国在波斯設立領事館，所以目前的条约所增加的只是英国放棄对波斯臣民的保护权，即放棄那个曾成为战争的正式原因之一的保护权<sup>195</sup>。奥地利、法国和其他国家沒有进行任何海盜式的远征，也在波斯設立了領事館。

最后，条约又强使德黑兰朝廷接納默里先生，并指出要向这位紳士道歉，因为在沙赫給薩德拉薩姆<sup>①</sup>的一封信中，默里先生被描述成一个“愚蠢、无知和蛮橫的人”，“蠢材”和“拙劣、荒謬与討厌透頂的文件”的起草人。費魯赫汗当时也曾提出要向默里先生道歉，但那时英国政府拒絕了这个建議，坚持要免去薩德拉薩姆的职务，并且要让默里先生“在号角声，在橫笛、豎琴、風笛、古琴、箏和其他乐器的乐声中”隆重地进入德黑兰。由于默里先生在任駐埃及总領事时，曾接受过巴罗先生私人贈送的礼物；由于他第一次到达布什尔时就把当时用沙赫名义送給他的烟草运往市場公开出售；由于他曾像流浪的騎士那样由一个声誉可疑的波斯女人伴随着出入各处，因此，他不能使东方公众对英国人的廉洁和品格有过分的好感。所以，应当把迫使波斯再一次容許他进入波斯朝廷这件事看做是大有問題的成就。除了費魯赫汗在战争开始前所提出的建議以外，整个条约沒有包含任何一項值得为它浪費紙張，尤其是为它消耗金錢和拋洒鮮血的条款。英国由于远征波斯而获得的純利潤，总計起来可以认为有以下几項：大不列顛在整个中亚細亚激起了对它的仇恨；印度的不滿情緒由于調走印度軍隊和加于印度國庫的新負擔而加剧了；几乎免不了重演克里木慘剧；承认了波拿巴

---

① 首相。——編者注

---

在英国和亚洲各国之間起正式的調解作用；最后，使俄国获得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区：一个在里海附近，另一个在波斯北部沿海边境上。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6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6 月 2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04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印度軍队的起义<sup>196</sup>

羅馬的 *divide et impera* [分而治之] 是大不列顛大約一百五十年來用以保有它的印度帝國的重要準則。總合起來構成那個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統一體的不同種族、部落、種姓、教派和國家彼此之間互相仇視——這種仇視一直是英國賴以維持其統治的基礎。然而最近，這一統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在征服信德和旁遮普<sup>197</sup> 以後，英印帝國不僅達到了它的自然界限，而且還抹去了印度各獨立國家的最後痕跡。所有好戰的土著部落都被制服了，所有嚴重的內部沖突都結束了，而最近奧德的被兼併<sup>198</sup> 則清楚地表明，殘余的一些所謂獨立的印度公國也只是在獲得默許的條件下存在的。這樣，東印度公司的地位就有了很大的改變。它已不再借助印度一部分地區去進攻另一部分地區，而是自己高高在上，整個印度都伏在它的腳下。它已成為唯一的征服者，而不必再從事征戰。它手下的軍隊不需要再去擴展它的領地，而只要保持這些領地就行了。士兵變成了警察，兩億當地居民被英國軍官指揮的 20 萬土著軍隊所控制，而土著軍隊則又控制在僅有 4 萬人的英國軍隊的手里。一眼即可看出，印度人民的順從依賴於土著軍隊的忠誠，而英國當局建立土著軍隊，同時也就組織起了印度人民過去從未有過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土著軍隊可靠到什麼程度，



从他們最近的起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英国对波斯的战争几乎把孟加拉管区内的欧洲兵全部抽光了的时候，这些起义就立刻爆发了。在这以前，印度军队里面就有过起义，但是这次的起义<sup>199</sup>则带有特殊而严重的性质。西帕依团杀死了他們的欧洲军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們相互間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們共同的統治者；“騷动由印度教徒开始，而实际上其結果是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經不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統治的普遍不滿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軍內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

四个月前不滿情緒在孟加拉軍內开始蔓延的原因，据說是土著士兵担心政府要干涉他們的宗教信仰。当时曾发下了一种子彈，据說包裹子彈的紙被塗抹了牛油和猪油，而由于子彈必須要用嘴咬，土著士兵认为这是破坏他們教規的行为，因此这件事就成为地方性騷动的信号。1月22日，在离加尔各答不远的兵营里发生了纵火事件。2月25日，第十九土著团在貝汉普尔举行了起义，抗議給他們发下那种子彈。3月31日，該团被解散。3月底，駐巴腊克普尔的第三十四西帕依团的士兵們听任他們的一个伙伴在操場上拿着实彈的枪走出队列，号召他們起义，然后又开枪射击該团的副官和軍曹长，并打伤了他們。在随后发生的一場格斗中，几百名西帕依袖手旁观，其余的則参加了格斗，用枪托毆打他們的軍官。由于这件事，这个团也被解散了。4月发生的突出事件是阿拉哈巴德、阿格拉和安巴拉等地的孟加拉軍的兵营被纵火烧毀，駐米拉特的輕騎兵第三团发生了起义，在馬德拉斯軍和孟买軍內出現了类似的不滿情緒。5月初，在奧德首府勒克瑙有人策划起义，但是被

亨·劳倫斯爵士的果断措施防止了。5月9日，米拉特輕騎兵第三团的起义士兵被押赴監獄去服刑，他們都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徒刑。次日傍晚，騎兵第三团的兵士和两个土著团（第十一团和第二十团）一起在操場上集合，杀死了企图要他們鎮定下来的軍官，放火燒毀了兵营，杀死了他們所能碰上的一切英国人。虽然这个旅的英軍部分包括有一团步兵、一团騎兵和大量的騎炮兵和步炮兵，但是他們直到天黑才能行动。他們仅仅使起义者受到輕微的損失，就让起义者逃到郊外，奔往距米拉特約40英里的德里。在德里，由步兵第三十八团、第五十四团和第七十四团以及土著炮兵一个連組成的土著警备部队与起义者会合了。英国軍官遭到襲击，起义者所遇到的一切英国人都被杀死，已故的德里莫臥儿<sup>200</sup>的继承人被宣布为印度皇帝。在派去援救米拉特——那里的秩序已經恢复——的部队中，5月15日到达的六个土著工兵-地道爆破兵連，杀死了指揮官弗雷澤少校，立刻逃出城，受到在騎炮兵部队和近卫龙騎兵第六团的几个連的追击。有五六十名起义者被打死，但其余的人都逃到了德里。在旁遮普的菲罗茲普尔，第五十七和第四十五土著步兵团起义，但是被鎮压下去了。从拉合尔来的私人信件說，整个土著軍队都处于准备公开起义的状态。5月19日，駐在加尔各答的西帕依企图夺取圣威廉堡<sup>201</sup>，但未获成功。从布什尔調到孟买的三个团立刻被派往加尔各答。

在回顾这些事件时，你会对米拉特英軍司令的行为感到惊奇：他迟迟才在戰場上出現，而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对起义者的追击那样松懈无力。因为德里位于朱木拿河右岸，而米拉特位于左岸，两岸之間仅在德里有一座桥相連，要切断逃亡者的退路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这时，所有籠罩着不滿情緒的地区都已經宣布戒严；主要由土著士兵組成的部队正从北面、东面和南面集中去对付德里；邻近地区的王公，据說都宣布效忠英国；已有信件送往錫兰，命令正在前往中国途中的額尔金勋爵和阿希伯納姆將軍的部队停止前进；最后，一支 14 000 人的英国部队大約在两星期后即将从英国派往印度。无论印度現时的天气以及运输工具的极度缺乏对英軍的調动可能造成多大的阻碍，德里的起义者大概不会进行什么長时间的抵抗就要投降的。然而，即使这样，这也仅仅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最可怕的悲劇的序幕而已。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6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7 月 15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065 号

## 卡·馬克思

### 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sup>202</sup>

昏睡似的沉寂，这是东方战争结束以后欧洲状况的特征，但这种沉寂正在很快地为活跃，甚至狂热所代替。就拿将有改革斗争的以及在印度遇到困难的大不列颠来说吧。诚然，伦敦“泰晤士报”向全世界说过，除了那些在印度有朋友的人之外，

“整个英国公众期待印度当前的消息的兴趣，并不比我們等待从澳大利亚来迟的輪船和馬德里起义的结果的兴趣大”。

但是，同一天，同一份“泰晤士报”，在它的一篇金融论文中却摘下了那副傲慢的无所谓的假面具，暴露了約翰牛这样的真实的感情：

“在銀行的金屬儲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一片丰收的景象下，像目前我們在证券交易所所看到的这种长期萧条几乎是前所未聞的。印度的情况所引起的惶恐不安，使得其他一切想法都退居次要地位，假如明天得到任何严重的消息，那末大概就会要惊慌失措。”

現在，当通过每一信件都能得到可靠的消息的时候，来推测在印度发生的事件的进程是徒劳无益的。但是，非常明显，假如在欧洲大陆爆发重大的革命，那末，把军队和舰队都調去对中国作战和镇压印度起义的英国就不能重新占据它在1848年和1849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的地位。同时英国也不能让自己袖手旁观，因为东

方战争和与拿破侖結盟最近把英国鎖在大陆政策上了，因为英国傳統的政党的彻底崩潰和英国創造財富的各階級之間的日益增长的对抗性，使英国的社会結構比任何时候更厉害地遭受痙攣性的震蕩。1848—1849年，英国的威力像个恶梦似的压在欧洲革命上，开始时，英国稍許有些害怕这个革命，后来，为了排遣对于英国來說是一种平常的沉寂，开始将革命当做一場戏来消遣，后来就有点背叛革命，后来又向革命卖弄風情，最后，靠革命大发其財。甚至可以說，在1846—1847年商业危机中遭到相当猛烈震蕩的英国工业，由于1848年的革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欧洲大陆的新的革命，对英国來說，既不再是一場可以消遣的愉快的戏，也不再是建筑在別人的不幸上的投机机会，却将是它必須經過的一場严重的考驗。

越过拉芒什海峡，我們会看到，彼岸的社会表层由于地下火的影响在徐徐波动并向上隆起。巴黎选举，与其說是新的革命的預兆，还不如說是新的革命的真正开端。卡芬雅克的名字被反对波拿巴的势力作为口号，这完全符合于法国过去的历史，正像当时奥迪隆·巴罗曾經領導反对路易-菲力浦的势力一样。对于人民來說，卡芬雅克像以前的奥迪隆·巴罗一样，只是一种借口而已，然而对于資產階級來說他們两个都体现出一个严肃的思想。革命开端时所借用的名字，从来不会在革命胜利之日被写在革命的旗帜上。在現代社会里，革命运动为了获得某些成功的机会，开始时就必須借用那些虽然有反对現行政府的情緒，但是对現行社会制度却全部接受下来的人們的旗帜。总之，革命应当正是从执政階級的手里获得进到官方舞台的入場券。

只有注意巴黎交易所的状况：巴黎交易所的波动是发生在竞

选鼓动之前，并且比竞选鼓动延續得久，才能真正了解巴黎的选举以及巴黎的逮捕和巴黎的迫害。甚至在 1856 年最后三个月，整个欧洲遭受金融危机的时候，巴黎交易所也没有經受过像这一年的整个 6 月份和 7 月初所发生的全部有价证券那样惊人和不断跌价的事情。此外，这次没有出現下跌和上漲的突变过程，恰恰相反，一切都按着通常跌落的規律十分有条理地下降，也是按照这种規律仅仅在最后阶段跌落才变得急剧起来。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的股票，在 6 月初約值 1 300 法郎，到 6 月 26 日下跌为 1 162 法郎，7 月 3 日为 1 095 法郎，7 月 4 日为 975 法郎，而到 7 月 7 日就已經跌到 890 法郎了。法兰西銀行股票 6 月初市价为 4 000 法郎以上，到 6 月 26 日，尽管賜予了該銀行新的壟断权和特許权，但是股票仍然下跌到 3 065 法郎，到 7 月 3 日又下跌为 2 890 法郎，一直到 7 月 9 日股票的价格未曾超过 2 900 法郎。在这种程度內長時間跌价的，还有三厘无期公債和下列主要铁路的股票，如北部铁路、里昂铁路、地中海铁路、铁路大联合公司以及其他所有股份公司的股票。

新的法兰西銀行法<sup>①</sup>，暴露了波拿巴的国庫絕望的处境，同时也动搖了法兰西銀行行政本身的社会信任。Crédit Mobilier 的最近一份报告书非常明显地表現了这个机关的空虛性，暴露了与它有利害关系的广闊范围，同时告訴了公众在公司董事們和皇帝之間发生了斗争，以及在准备某种財政 coup d'état<sup>②</sup>。事实上，Crédit Mobilier 为了履行自己的最急迫的义务，不得不将自己拥有的約 2 000 万法郎的有价证券抛向市場。就在这个时候，铁路股份公司和其他股份公司为了支付自己的股息和为了获得資金来繼續已进

① 見本卷第 241—245 頁。——編者注

② 直譯是：政变；这里是：改革。——編者注

行的工作,或者来开始工作,同样也必須出卖自己的有价证券,向自己旧的股票索取新的股金或发行新股票获得資本。由此可見,法国证券交易所的持久的蕭条絕不是由于純粹偶然情况造成的;它将随着每次紧接着的付款期限的来到,以更尖銳的形式重复着。

現在这种病症使人惊慌的程度,从下列这个事实就可看出:第二帝国偉大的財政巫医艾米尔·貝列拉已經登場,并且向路易-拿破侖呈递了一份报告,其中他引用了路易-拿破侖于1850年向农商总会演說中的一段話:

“信任——我們將不会忘記这点——是物质利益的心理上的一面,是使肉体复苏的灵魂。它能唤起坚定的信心,因而能成十倍地增加所生产的一切东西的价值。”

然后,貝列拉先生借助我們的讀者都已知道的手法來說明在最近五个月內全国减少了98 000万法郎的证券。他以这样不祥的話結束了自己的牢騷:“害怕的預算几乎等于法国的預算。”如果像貝列拉先生所說的那樣,除了法国为維持住帝国而繳納的2亿美元的税金以外,由于害怕失掉帝国,法国还应当付出的就更要多得多,那末,这个当时只是为了節約錢而建立的这么寶貴的机关的末日,实际上是屈指可数了。既然帝国財政上的混乱造成帝国政治上的困难,那末后者又必定会影响前者。正是从法兰西帝国的这种情况来看不久前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发生的風潮<sup>203</sup>,以及斯堪的那維亞所面临着的困难<sup>①</sup>才具有其正确的意义。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7月10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7年7月27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075号

① 見本卷第289—290頁。——編者注

## 卡·馬克思 印度起义

1857年7月17日于倫敦

自从德里落到起义的西帕依手中和他們拥立了莫臥儿皇帝以后，到6月8日正好一个月了。但是，认为起义者能够对抗英軍、守住这个印度古都的任何想法，都是荒謬的。德里的工事只有城墙和簡陋的护城壕，而周圍瞰制城市的高地已經为英国人所掌握。他們甚至不必轰毀城墙，也可以采用切断城内水源的簡單办法，在很短时期內迫使德里守軍投降。并且，那些杀死了自己的軍官、掙脫了紀律的束縛、連一个可以赋予最高指揮权的人都推选不出的形形色色的起义士兵，当然很少有可能組織認真而持久的抵抗。使混乱局势更加混乱的，是德里的这支龐杂的队伍天天都有孟加拉管区各地的新的起义部队絡繹不絕地前来加入，这些起义部队好像都按照一个預定的計劃投身到这个命运已經注定的城市里来。5月30日和31日，起义者冒險出击两次，但均被击退，受到重大損失。这两次出击看来都是在絕望之下进行的，而不是由于有任何自信或者自认为有力量。唯一令人奇怪的倒是英軍行动的迟緩，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許是由于天气酷热和缺乏运输工具的緣故。据法国人的报道，除总司令安森將軍外，还有約4000名欧洲兵已死于致命的酷暑。就連英国报纸也承认，在德里城下的战



斗中，烈日对士兵的危害甚于敌人的枪彈。由于缺乏交通工具，駐在安巴拉的英軍主力在向德里的行进中用了差不多二十七天的工夫，这样每天平均只运动一个半小时左右。造成进一步迟延的原因，是安巴拉沒有重炮，因而必需从最近的軍械庫調去攻城炮兵纵列，而最近的軍械庫却远在薩特里日河彼岸的皮劳尔城。

尽管如此，德里陷落的消息仍然指日可待；但以后又将怎样呢？虽然印度帝国的傳統中心被起义者充分掌握达一个月之久这一事实可能成了最强烈的酵素，使孟加拉軍全部瓦解，使起义和逃亡現象从加尔各答向北扩展到旁遮普，向西扩展到拉吉普坦納，并且使英国的統治从印度的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动摇，但是认为德里的陷落（尽管它可能在西帕依队伍中引起惊慌）会足以扑灭起义的火焰，阻止它的进展，或者恢复英国的統治，仍然是极大的錯誤。拥有将近 8 万人的整个土著孟加拉軍队（其中大約有拉吉普特人 28 000 名，婆罗門教徒 23 000 名<sup>204</sup>，伊斯兰教徒 13 000 名，較低种姓的印度教徒 5 000 名，其余是欧洲人），已有 3 万人起义、逃亡或被开除。至于这支軍队中其余的士兵，有几个团已公开宣称他們将是忠于宣誓的，仍将支持英国当局，但土著部队目前正在从事的事情不在此限：他們将不协助当局反对土著团的起义者，而是相反地，将援助自己的“巴依”（兄弟）。从加尔各答起，他們几乎在每一个警备区都是这样做的。土著团曾消极了一个时期，但是一当他們相信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他們就举行起义。倫敦“泰晤士报”一位駐印度的記者对于还没有公开表示态度的团和还没有与起义者一致行动的土著居民的“忠誠”說得非常透彻。

他写道：“如果你讀到一切平安无事，你就應該了解为：土著部队还没有公开起来叛变；不滿的居民还没有公开造反，他們不是力量还太弱，就是自己

感到力量不强，要不然就是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当你读到某个孟加拉土著騎兵团或步兵团‘表示忠诚’时，你就应该了解为：在说得这样动听的各团中只有一半是真正忠于宣誓的，另外一半只是在装样子，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到来时使欧洲人措手不及，或者借此避免嫌疑，从而更便于帮助他们那些参加叛乱的伙伴。”

在旁遮普，只是用解散土著部队的方法才防止了公开的起义。在奥德，可以说英国人只保有勒克瑙的駐劄官官邸<sup>205</sup>，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土著团都起义了，他们携带枪支弹药逃跑，把英国人的房子全部烧光，并且跟已经起义的居民联合起来。现在，英军的真正处境由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得最清楚：英国人不得不在旁遮普和拉吉普坦納建立流动部队。这说明，英国人既不能依靠他们的西帕依部队，也不能依靠土著居民来维持他们分散的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正像法国人在比利牛斯半島战争<sup>206</sup>时期一样，他们只是控制住自己军队所占領的据点以及这些据点所瞰制的周圍地区，而被分隔开的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则依靠流动部队来维持；但流动部队的活动本身就是极不可靠的，他们活动的地区愈广，自然效果便愈差。英军兵力确实不足，还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英军为了把財物从受起义威胁的警备区运出来，不得不利用西帕依来担任护送，而西帕依毫无例外地在半途起义，带着托付他们护送的財物逃跑了。由于从英国派去的部队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于11月以前到达，同时从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抽調欧洲部队将更加危险（因为馬德拉斯的西帕依第十团已经显露出不滿的征兆），所以，在整个孟加拉管区征收普通稅的一切念头都必须打消，而瓦解的过程也只好听任它继续下去。即使我们假定，緬甸人不会乘机行动，瓜廖尔的摩訶拉扎将继续支持英

国人，控制着印度最精銳部队的尼泊尔統治者將繼續保持平靜，懷有不滿情緒的白沙瓦不至于同不安分的山区部落联合起来，波斯的沙赫不会傻到从赫拉特撤退，——即使这样，整个孟加拉管区仍然需要重新征服，整个英印軍隊仍然需要重新建立。这件大事所需的費用將全部落在英国人民的肩上。至于格兰維耳勋爵在上院提出的意見，說东印度公司能够依靠发行印度公債来筹措必要的款項，它的可靠性可以从西北各省的騷乱局势对孟买金融市場的影响来判断。当时，印度本地的資本家立即感到恐慌，从銀行提出大量款項，政府的有价证券几乎再也找不到买主，而大規模的囤积不仅在孟买，而且在它的郊区都开始出現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7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8 月 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08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印度問題

1857年7月28日于倫敦

迪斯累里先生昨天晚間在“死寂的下院”<sup>207</sup>所发表的三小时的演說，如果不是去听它，而是去讀它，只会显得好些，而不会显得坏些。一个时期以来，迪斯累里先生喜欢作絕頂庄严肃穆的演說，他故意慢条斯理地吐字，一五一十地平鋪直叙而毫不动声色。不管这种品质如何符合他关于一个即将做大臣的人所应有的尊严的特殊概念，但对他的不幸的听众來說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过去他甚至能把陈詞濫調变得像諷刺詩那样的鋒利。而今他竟能把諷刺詩埋葬在枯燥无聊的尊严的俗套下面。像迪斯累里先生这样一个操匕首比操长剑更熟练得多的演說家，不應該忘記伏尔泰的一个警告：«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excepté le genre ennuyeux»<sup>①</sup>。

迪斯累里先生除了他目前的詞令所具有的这种形式上的特点以外，从帕麦斯顿当政以来，在自己的議會演說里小心地避免任何哪怕稍微具有现实意义的問題。他不是为了使他的提案获得通过而发表演說，而是为了让听众听他的演說而提出这些提案。他

① “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伏尔泰喜剧“流浪子”的序言）——編者注

的提案可以叫做自相辯駁的提案，因為就它們的內容來說，如果它們被通過了，對提案的反對者並無損失，如果它們被否決了，對提案的起草人也無害處。實際上，提案所要的不是被通過或被否決，而只不過要人對它們置之不理。它們既不是酸，也不是鹼；它們是天生的中性物。不是發表演說來促進行動，而是行動的假象為發表演說提供借口。實在，也許這就是議會演說的典范的和完美的形式；但是即使這種議會演說的完美形式也無論如何擺脫不了議會制的一切完美形式的命運，也就是：列入令人討厭的東西之類。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動作是支配戲劇的法律<sup>①</sup>。政治演說也是這樣。迪斯累里先生關於印度起義的演說可以作為有用知識普及協會的小冊子出版，或者可以在工人學校發表，或者可以作為懸獎征文送到柏林科學院去。他的演說對地點、時間和發表演說的理由所持的無所謂態度，證明他的演說既不适合地點、時間，也不符合理由。關於羅馬帝國衰落的一章在孟德斯鳩或吉本的书<sup>208</sup>中是可以令人讀得津津有味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個羅馬元老的口上，那它就成為了非常荒謬的東西，因為羅馬元老的專門職責剛好是要防止羅馬帝國的衰落。的確，可以設想某一個獨立的演說家，由於認識到自己不可能對事件的實際進展施加影響，而只限於採取一種冷嘲熱諷的不關痛癢的態度，在我們現代的議會里能夠扮演一個既不失尊嚴，也不乏風趣的角色。已故的加爾涅-帕熱斯先生——不是臨時政府的加爾涅-帕熱斯，而是路易-菲力浦時代有名的眾議院議員——就曾經多少成功地扮演過這樣的角色；但是迪斯累里先生，這個已失去作用的黨<sup>209</sup>的公認領袖，甚至會把這

① 亞里士多德“詩學”第6章。——編者注

方面的成功也认为是极大的失败。印度军队的起义无疑地提供了一个练习演说艺术的大好机会。然而如果撇开迪斯累里先生发挥这个题目所用的非常枯燥的方式不谈，那末他选来作为发表演说的借口的提案的实质究竟何在呢？恰好就是没有提案。他装做渴望读到两个官方文件，但是对其中一个文件是否存在他不完全相信，至于另一个文件，则他认为与他所谈的对象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的演说同他的提案，除了提案是一篇无对象的演说的先声，而对象又不值得发表一篇演说以外，就没有任何接触之点，可是，作为一个未参加政府的英国最杰出的国家活动家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迪斯累里先生的演说应该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我满足于用他 *ipsissima verba* [本人的话] 来对他的“关于英印帝国没落的见解”作出简短的分析：

“印度的骚乱是军事叛乱呢，还是民族起义？军队的行为是某种突然冲动的后果呢，还是有组织的阴谋的结果？”

迪斯累里先生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所在。他肯定说，直到最近十年间，不列颠帝国在印度都是采用 *divide et impera* [分而治之] 的老原则，但是据说在实际实行这一原则时，政府对组成印度的各种民族曾采取爱护的态度，设法不干涉它们的宗教事务，并保护它们的土地所有权。西帕依军队曾作为吸收国内不稳定分子的安全阀。但是近几年来，在管理印度方面采取了一种新的原则——破坏民族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靠强力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破坏既定的所有制关系和干涉人民的宗教事务的方法来实现的。1848年，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困难达到了必须不择手段增加收入的地步。这时公布了参事会<sup>210</sup>的一份报告，其中几乎完全公开宣布了一项原则，按照这项原则，增加收入的唯一方法是靠兼并土

著王公的領地來擴大英國的領土。因此，薩塔腊公國的拉扎<sup>①</sup>死後，東印度公司不承認他的養子和繼承人，而把該公國併入公司的領地。從此，每當土著王公死去而未留下直接繼承人時，就採用兼併制度。過繼原則這一印度社會的基石經常遭到政府的忽視。因此，從1848年至1854年有十幾個獨立王公的領地被強制併入不列顛帝國。1854年貝腊爾公國被強力侵奪，其領土有8萬平方英里，人口400萬至500萬人，並擁有大量寶藏。迪斯累里先生最後提到對奧德的強行兼併，這一兼併使東印度政府不僅與印度教徒發生衝突，而且與伊斯蘭教徒發生衝突。然後迪斯累里先生說明了，在最近十年間，新的管理制度如何破壞了印度的既定所有制關係。

他說道：“過繼法的原則不是印度的王公和公國的特權，它在印度斯坦對每一個握有土地所有權和信仰印度教的人都有關係。”

我來引用演說里的一段話：

“由於為王公服公務而持有土地的大領主（或稱札吉達爾）和不納任何土地稅的伊納達爾（這種人如果說不是完全確切地，那末至少在一般意義上相當於我們的自由農）<sup>211</sup>——印度人數最多的這兩類人，在沒有直接繼承人時，總是利用這種過繼原則得到他們遺交其地產的繼承人的。這兩類人的利益由於薩塔腊的被兼併而受到觸犯，也由於我已經提到的那十個不大的，然而獨立的王公的領土的被兼併而受到觸犯，但是當貝腊爾被兼併時，則不僅觸犯了這兩類人的利益，而且把他們吓慌了。誰能感到自己是不可侵犯的呢？哪個領主，哪個沒有親生孩子的自由農能感到自己在印度是不可侵犯的呢？（贊同的呼聲）所以害怕不是沒有道理的；行動方式和廣泛採取的辦法完全可以引起人的害怕。在印度開始收回札吉和伊納是第一次。毫無疑義，以前也有過調查占有權的無禮嘗試，但是誰從來也沒有想到過會廢除過繼法；所

<sup>①</sup> 印度王公的稱號。——譯者注

以任何政权，任何政府从来也未能取走沒有留下直接继承人的所有者的札吉和伊納。这里新辟了一个收入来源；但是就在这一切影响到上述两类印度教徒的思想趋向的时候，政府又采取了另一破坏既定所有制关系的步骤，我现在应该提请下院注意这个步骤。議員們一定讀过在 1853 年委员会上所做的证詞，因此該知道印度存在着很大一部分不納土地稅的土地。”在印度免除土地稅比在我国免除土地稅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整个說来在印度土地稅是国家征收的唯一的一种稅。

很难查出这些土地賞賜的起源，但是毫无疑义，土地賞賜是远古以来就有的。土地賞賜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除了极为流行的私人免稅領地之外，还有属于寺院和教堂的免納土地稅的大量土地賞賜。”

英国总督以存在有非法要求免稅的事实作为借口，着手对印度地产占有权进行調查。根据 1848 年規定的新办法，

“这一占有权調查計劃曾經立即执行，以证明政府的威力、当局的魄力并找出国家收入的最丰富的源泉。为此目的在孟加拉管区和邻近地区成立了土地占有权調查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在孟买管区也成立了，此外，还命令在新設省份內进行土地整理，以便在这种土地整理结束后，委员会的工作能够得到充分的成果。現在无疑，最近十年来，这些調查印度的不納稅地产的委员会的活动一定規模很大，成效卓著。”

迪斯累里先生估計，每年从土地所有者手里收回的地产在孟加拉管区不少于 50 万英鎊，在孟买管区不少于 37 万英鎊，在旁遮普不少于 20 万英鎊等等。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掠夺当地人财产的方法，它还停发了当地达官貴人的退休金，而根据条約这是应该发給的。

迪斯累里先生說道：“这是一种新的沒收方法，并且規模最大，最惊人和最可耻。”

接着，迪斯累里先生叙述干涉当地人的宗教事务的情况——



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必要談。根據所有這些前提，他得出結論說，印度目前的騷動不是軍事叛亂，而是民族起義，西帕依在起義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他在結束演說時，勸告政府放棄它目前的侵略政策，而注意改善印度的國內情況。

卡·馬克思寫於 1857 年 7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7 年 8 月 14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5091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卡·馬克思 来自印度的消息<sup>212</sup>

1857年7月31日于倫敦

最近一班印度邮件带来了6月17日以前来自德里的消息以及截至7月1日由孟买发出的消息，证实了最阴暗的预测。当督察委员会<sup>213</sup>主席維农·斯密斯先生最初把印度起义的消息通知下院的时候，他滿有把握地宣称，下一班邮件必将带来德里已被彻底消灭的消息。邮件来了，可是德里依然沒有“从历史上被勾銷掉”。于是人們就說，炮兵纵列最早要在6月9日才能开到，因此对这座注定要毁灭的城市的轰击必須推迟到这个日子。但是6月9日过去了，什么特別的事情也沒有发生。12日和15日倒是发生了一些事件，不过不如說它們帶有相反的性质，因为不是德里遭到英国人的轰击，而是英国人遭到了起义者的进攻，然而起义者的屢次出击都被打退了。这样，德里的陷落又再度延期，不过現在人們已不仅仅說这是由于缺乏攻城炮，而且还說是由于巴納德將軍决定等待援軍，因为他的兵力——約3 000人——完全不足以攻占这座由3万名拥有各种軍需品的西帕依守卫着的古都。起义者甚至在阿季米尔門外建立了营地。在此以前，所有的軍事著作家一致认为，一支3 000人的英国部队，完全足以击潰拥有3万或4万人的西帕依軍隊；否則，用倫敦“泰晤士报”的話來說，英国什么时

候才能“再度征服”印度呢？

目前，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共有 3 万人。在最近半年内从英国最多能派出 20 000 或 25 000 人，其中 6 000 人要补充在印度的欧洲军队，而其余的 18 000 或 19 000 人，由于在途中遭到的损失，由于气候条件而遭到的损失以及其他原因，剩下来能够上战场的也就减少到将近 14 000 人。英国军队必须下决心在力量对比极悬殊的情况下同起义者作战，要不然就根本不同他们作战。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英国军队在德里周围集中得这么慢。如果在目前这个季节，炎热竟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在查理·纳皮尔爵士那个时候并不是如此，那末过几个月等到欧洲军队抵达后，雨季将更有理由成为按兵不动的借口了。不应当忘记，现在的起义实际上在 1 月就已经开始，因此英国政府老早就已得到必须时刻准备作战的警告了。

尽管英国军队包围了德里，但西帕依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把德里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当然就产生了很自然的后果。起义蔓延到加尔各答的大门，50 个孟加拉团已不复存在，孟加拉军全军复没，而分布在广大地区的、被围困在孤立据点上的欧洲军队，不是被起义者消灭，就是被迫拚命死守。在加尔各答，当据说经过周密策划的准备突然占领政府机关所在地的阴谋被揭露以后，当驻扎当地的土著团被解散以后，基督教居民组织了志愿队。在贝拿勒斯，企图解散土著团的做法，遭到了锡克教徒<sup>214</sup> 部队和非正规骑兵第十三团的反对。这件事有着极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一样，是同婆罗门教徒一致的，这样，各阶层的居民迅速地结成了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英国人曾坚信，西帕依军队是他们在印度的主力。现在他们突然完全确信，这

支軍隊對他們具有莫大的危險。還在不久以前就印度問題進行辯論時，督察委員會主席維農·斯密斯先生曾說道，“完全可以斷言，土著王公和起義之間沒有絲毫的聯繫”。事隔兩天，同一個維農·斯密斯却不得不公布一份緊急報告，其中有這樣一段不祥的話：

“據截獲的文件證明，前奧德國王與陰謀活動有牽連，已於6月14日被押入威廉堡，其隨從被解除武裝。”

以後還會出現另外一些事實，這些事實甚至能使約翰牛也相信，他認為是軍事叛亂的運動，實際上是民族起義。

英國報刊裝出十分滿意的樣子，表示它們相信起義還沒有蔓延到孟加拉管區以外，並且孟買軍和馬德拉斯軍的忠誠絲毫不容置疑。但是，這種對局勢的樂觀看法似乎同最近一班郵件帶來的關於奧郎加巴德爆發了尼贊<sup>①</sup>的騎兵起義的消息正相矛盾。由於奧郎加巴德是孟買管區轄屬的奧郎加巴德區的中心，實際上，最近一班郵件是宣告孟買軍隊中已開始起義。誠然，據說奧郎加巴德的起義已被伍德伯恩將軍立即鎮壓下去了。但是，難道不是曾經有人說過，米拉特的起義也是被立即鎮壓下去的嗎？勒克瑙的起義不正是在被亨·勞倫斯爵士鎮壓下去後，過了兩個星期，又以威脅性更大的形式重新爆發了嗎？難道記不得，印度軍隊中爆發起義的最初消息是與治安已經恢復的消息同時傳來的嗎？儘管孟買軍和馬德拉斯軍主要是由屬於下等種姓的人組成的，但各個團都有近百個拉吉普特人——這個數目完全足以構成與屬於上等種姓的孟加拉軍起義者相聯繫的環節。人們斷言，旁遮普平靜無事，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卻获悉，“6月13日在菲羅茲普爾執行了軍事法

---

① 海德拉巴公國的統治者。——編者注

---

庭的判決”，而伏恩的部隊——旁遮普第五步兵团——“因追擊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出色行動”而受到褒獎。應當承認，這是一種十分奇怪的“平靜”。

卡·馬克思寫於 1857 年 7 月 3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7 年 8 月 14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5091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卡·馬克思

# 印度起义的現狀

1857年8月4日于倫敦

当最近一班印度邮件把大量报道（它們的极簡略的內容早先已在电訊中报道过了）带到倫敦以后，德里被攻占的謠言就迅速傳开，而且博得这样普遍的信任，以致倫敦証券交易所的行情都受到了影响。这是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騙局<sup>215</sup>的翻版，只是規模小一些而已。只要对据說是直接提供了这种愉快消息的馬德拉斯報紙的日期和內容略加考察，真相即可大白。馬德拉斯的报道自称是根据6月17日来自阿格拉的私人通訊写成的，但是6月17日拉合尔的官方战报却宣称，截至16日午后4时，德里城下一切还是平靜的；同时7月1日的“孟买时报”<sup>216</sup>写道：“巴納德將軍在击退敌人若干次出击后，于17日晨尙在等待援軍。”关于馬德拉斯报道的日期，可以說的就是这些。至于它的內容，則显然是根据6月8日巴納德將軍关于攻占德里附近高地的战报以及关于被圍攻者在6月12、14日出击的一些私人报道写成的。

德里市区和兵營的軍用平面图，終于由勞倫斯上尉根据东印度公司未公布过的平面图繪制出来了。由該图可以看出，德里的防御工事既不完全像人們最初断言的那样差，也不完全像人們現在力图证明的那样坚固。德里有一座無論用强攻或正規圍攻都可

以攻下来的城砦。城墙长 7 英里多，有坚固的石砌部分，但不很高。护城壕狭窄，也不很深，侧防工事不能以纵射火力有效地掩护中堤。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炮塔。它们呈半圆形，并开有枪眼。塔内有螺旋梯由墙顶往下通到与护城壕相齐的弹药室，弹药室的墙上开有供步兵射击的射孔，这在强攻队通过护城壕时，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保护中堤的棱堡内设有供步枪射手用的踏垛，但它们可能被炮火压制。当起义爆发时，城内的军械库尚有 90 万发枪弹，两个配备齐全的攻城炮兵纵列，大量的野炮和 1 万枝步枪。火药库在很久前已根据居民的要求迁至德里城外的兵营内，还存有不下 1 万桶火药。巴纳德将军于 6 月 8 日攻占的制高点位于德里的西北面，那里在城墙外面也设有兵营。

从这一根据可靠的平面图所做的说明可以看出，假如目前在德里城下的英军在 5 月 26 日就已经到达，——而它们如果配备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本来是可以在那时到达的，——那末，这个起义的中心只要经过一次 *coup de main* [坚决的攻击] 就一定会被摧毁。考察一下那张先在“孟买时报”上发表、然后由伦敦各报转载的列有 6 月底以前起义的各团兵力和起义日期的一览表，就能无可置疑地证明，5 月 26 日占领着德里的起义者还只有四五千人，也就是说，只有一支根本不能设想可以防守 7 英里长的城墙的兵力。同时，米拉特距德里仅仅 40 英里，自 1853 年初起，该地一直是孟加拉炮兵总部的所在地，有供科学研究用的重要的弹药厂以及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的教练场；这就更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军司令官竟连进行一次 *coup de main* 所必需的兵器都没有，而英军在印度向来是惯于以这种攻击压倒土著军队的。起初听说他们是在等待攻城炮兵纵列<sup>①</sup>，后来又听说他们需要援军，而现在，消

息最灵通的倫敦报纸之一“新聞报”告訴我們說：

“我国政府确实知道，巴納德將軍缺乏給养和彈药，而枪彈每人已只剩24发。”

根据巴納德將軍6月8日关于占領德里附近高地的战报，我們看出，他本来打算在次日攻击德里。然而他不仅沒有实现这一計劃，反而由于某种意外情况，只得对被圍攻者采取守勢了。

目前很难計算双方的兵力。印度报纸的报道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我們认为，波拿巴派的“国家报”<sup>217</sup> 刊載的一篇印度通訊，可能有某些可信之处，这篇通訊似乎是由加尔各答的法国領事发出的。根据他的报道，6月14日巴納德將軍的兵力約为5700人，如果加上該月20日应当开到的援軍，其数量預計可增加一倍(?)。他共有30門重攻城炮；同时起义者的兵力估計为4万人，他們組織很差，但有充足的攻防器材。

我們 en passant [順便] 說一下，在阿季米爾門外(大概在加济汗陵墓附近)設营防守的3000名起义者，并不像倫敦某些报纸所想像的那样与英軍直接对峙，而是恰恰相反，在他們与英軍之間还隔着整个德里城，因为阿季米爾門在德里新城的西南角，在古德里廢墟以北。在城市的这一边，沒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起义者再設立几个这样的兵营。在城市的东北面，即靠河的一面，起义者控制着舟桥，并且仍与他們的同胞們保持着經常联系，能够不断地获得人員和給养的补充。德里形成了一个与本国后方不断保持联系的要塞，就像塞瓦斯托波尔一样，只是小一些罢了。

英軍的行动迟緩，不仅使被圍攻者能集中大量兵力进行防御，

① 見本卷第269頁。——編者注



而且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已守住德里达数星期之久，并多次以出击襲扰欧洲軍隊，再加上他們每天都得到整个軍隊紛紛起义的消息，这无疑就增强了西帕依的士气。英軍兵力不多，想圍困城市自然是不行的，而必須采用强攻的方法。但是，如果下一班邮件还不带来攻占德里的消息，那末，我們几乎可以确信，在最近数月內英軍的任何重大的行动都得停止。这时雨季将已来临，“朱木拿河的深而急的流水”将灌滿护城壕而使城市的东北面得到保护，同时75—102度<sup>①</sup>的气温加上每天平均9吋的降雨量，将使欧洲人受到道地的亚洲霍乱的折磨。那时，埃倫伯勒勋爵所說的这段話就会得到证实了：

“我认为，亨·巴納德爵士是不能停留在他現在的地点的，因为气候不允許。当雨季开始时，他将失去与米拉特、安巴拉和旁遮普的联系；他将被困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地帶內，那时他的处境——我不想說这是險境，——只能使他遭到瓦解和复灭的后果。我相信他是会及时撤离該地的。”

因此，德里的問題就完全决定于巴納德將軍是否得到足够的兵力和彈药，以便在6月的最后一两个星期內对德里发动强攻。从另一方面看，巴納德將軍的撤退会大大增强起义者的士气，并可能促使孟买軍和馬德拉斯軍公开参加起义。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8月4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7年8月18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094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sup>①</sup> 指华氏而言。——編者注

## 卡·馬克思 東方問題

1857年8月11日于倫敦

會有人要我們相信，東方問題大約在十四個月前已經由于簽訂巴黎和約而獲得解決，但是現在，由于君士坦丁堡外交活動停頓，它又成為懸案了。法國、俄國、普魯士和撒丁的大使館在這裡降下了它們的國旗，同土耳其政府斷絕了關係。英國和奧地利的大使，支持御前會議反對這四國的要求，同時宣稱他們不怕對這一衝突所引起的後果負任何責任。

這些事件發生在本月6日。戲本身的情節相當陳舊，但是 *dramatis personae* [劇中人物] 交換了所扮演的角色，加上又是首次 *mise en scène* [演出]，因此這情節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新穎的外觀。這一次打先鋒的已不是俄國，而是法國。法國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圖溫奈爾先生，用有點裝腔作勢的、緬施科夫式的語氣，強硬地要求土耳其政府撤銷在莫爾達維亞的選舉，他說這是因為莫爾達維亞的卡馬康<sup>①</sup>沃戈里德斯違反巴黎和約，通過不能容忍的干涉使反對合併的人獲得了多数的代表名額<sup>218</sup>。土耳其政府拒絕接受這個要求，但表示同意把卡馬康召到君士坦丁堡，由他

① 代理國君。——譯者注

答复对他的行动提出的指責。图温奈尔先生傲慢地否决了这个建議，坚持要委托設在布加勒斯特的欧洲改組委员会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調查。由于在这个委员会中法国、俄国、普魯士和撒丁的代表占多数，也就是說，恰好是那些贊成多瑙河流域諸省合并、指控沃戈里德斯进行非法干涉的国家的代表占多数，因此受大不列顛和奥地利大使挑撥的土耳其政府，自然拒絕让自己的死对头来裁决自己的事务。不幸也就从此产生。

显然，現在爭执的真正問題，仍然是那个曾經引起对俄战争的問題，这就是：多瑙河流域諸省与土耳其的实际脫离；这次是企图不以“物质保障”的形式，而以各公国合并起来由一个欧洲傀儡王公統治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脫离。俄国以它特有的沉着、謹慎和耐心，从不离开它既定的目标。在只对它一国有利害关系的問題上，它已經能够把一部分敌人团結起来反对其余的敌人，因此現在可能指望依靠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服从它。至于波拿巴，則他抱着各式各样的动机。他指望在国际糾紛中为国内不滿情緒找到出路。他以俄国肯賞光戴上法国的面具出場并且让他来主持舞会，而感到无限荣幸。他那虛构的帝国不得不满足于戏剧性的胜利，而且在內心深处，波拿巴可能希望借助俄国把一个屬於波拿巴王朝的人扶上通过外交談判而人为地建立起来的羅馬尼亚傀儡王座。自从聞名的 1850 年华沙會議<sup>219</sup> 以及奥地利軍队进入德意志北部边境以来，普魯士只要有可能自己不吃亏，总是想方設法要对奥地利进行报复。撒丁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場同奥地利的冲突上，但这种冲突已不是靠着同意大利革命結成危險的同盟来挑起，而是背着大陆的专制强国来挑起。

正如同俄国极力要实现多瑙河各公国的合并一样，奥地利极

力反对这种合并。奥地利很了解这个方案的主要动机，它的鋒芒更直接地是指向奥地利自己的威力，而不是指向土耳其政府的威力。最后，主要靠故意做作的反俄情緒来博得声誉的帕麦斯顿，自然必須假装和弗兰茨-約瑟夫一样真正感到恐惧。他无论如何必須假装他是同奥地利、土耳其政府一致的，他只有在受到法国的逼迫时才会对俄国的压力让步。这就是各有关方面的立場。在这里，羅馬尼亚人民只是一个借口，他們根本不被人放在眼里。甚至极端狂热的人也未必会这样輕信，以为路易-拿破侖真心拥护真正的人民选举，而俄国真的热切希望加强羅馬尼亚民族，——从彼得大帝以来，消灭羅馬尼亚民族始終是俄国进行阴谋和战争的目的。

几个自封的羅馬尼亚爱国者在布魯塞尔创办的一家名为“多瑙河之星”<sup>220</sup>的报纸，不久前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莫尔达維亚选举的文件；我想在这里把其中最重要的几件給“論壇报”翻譯出来。这些文件就是莫尔达維亚的卡馬康尼古拉·沃戈里德斯从他的父亲斯蒂凡·沃戈里德斯，他的姻兄弟、土耳其駐倫敦大使穆苏卢斯，他的弟弟、土耳其駐倫敦大使館秘书亚·沃戈里德斯，他的另一个姻兄弟、莫尔达維亚政府駐君士坦丁堡的 *chargé d'affaires* [代办] 穆·弗提阿德斯，以及奥地利派駐土耳其帝国的使节普罗克希男爵等人那里收到的信件。这些信是前些时候从雅西的卡馬康宮中盗窃出来的，現在“多瑙河之星”就以它掌握着这些信的原稿而大肆吹嘘。“多瑙河之星”显然认为，撬鎖盗窃是搜集外交情报的十分体面的方式；看来，欧洲的一切官方报刊也都贊同它的这种观点。

“多瑙河之星”发表的关于莫尔达維亞  
选举的秘密信件

摘自土耳其駐倫敦大使穆·康·穆苏卢斯  
給卡馬康沃戈里德斯的信

1857年4月23日于倫敦

“我秘密地告訴您，克拉倫登勳爵贊同您就出版問題給法俄兩國領事的答复。他认为这一答复是恰如其份、公平合理的。我在勳爵閣下面前稱贊了您在当前形勢下的明智做法。我写信給土耳其政府，設法保证您能够得到您理所应得的高升。您一定会使这个美好的国家摆脱那些不配称为莫尔达維亞人的卖国贼力图使它陷入的危險境地。他們由于追求物质利益和奖賞，竟墮落到促使自己的祖国莫尔达維亞变成瓦拉几亞的附庸，想把莫尔达維亞从自治的民族中一笔勾銷。他們不顾当代人和后代的咒罵，竟想借口建立一个幻想的羅馬尼亞，而把莫尔达維亞和莫尔达維亞人貶低到爱尔兰和爱尔兰人的地位。您蔑視这伙厚顏无耻地自称民族派的敗类，是履行一个忠誠、英勇的爱国者的責任。在极力擴張国土的瓦拉几亞，主張合并的人可以稱自己为民族派；但是在莫尔达維亞，持这种主張的人只能称为反民族派。在这里，唯有反对合并的才是民族派…… 英国政府极端反对合并。这一点不必怀疑。我秘密地告訴您，有关这一点的指示，不久前已發給英国駐布加勒斯特的代办（他是我的朋友），閣下很快就可看到这个指示的結果。您在出版問題上給了法俄兩國領事适当的答复…… 您作为一个自治公国的首領的責任，就是回击外国人对內政的可耻的和无法无天的干涉行为。这两國的領事处境狼狽，他們的政府只有用召回他們的办法去帮助他們，这不能归咎于您…… 我还担心，在外国干涉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在对您的态度上会处于为难的境地，在同您的通信中会不由自主地不充分表示它对您的嘉許，以及您的温和而明智的做法使它感到的滿意。当然，作为莫尔达維亞的卡馬康，您必須服从最高政府；但作为这个独立公国的首領和作为莫尔达維亞的貴族，您又必須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責任，在必要时，应向土耳其政府指出，莫尔达維亞作为一个特殊的自治公国存在，是公国的第一个 *ab antiquo*〔自古就有的〕特权。”

### 土耳其駐倫敦大使館秘書亞·沃戈里德斯 給卡馬康沃戈里德斯的信

“我緊急通知您，您的姻兄弟剛才拜會了帕麥斯頓勳爵。他報告了關於勳爵閣下對公國合併的態度的主要消息。帕麥斯頓勳爵堅決反對合併；他認為合併是侵犯我國的權利，因此將對大不列顛駐公國代辦亨利·布爾韋爾爵士發出相應的指示。因此，正如我以前告訴您那樣，您必須盡力禁止莫爾達維亞人這樣或那樣地表示擁護合併的願望，盡力表現得能博得土耳其帝國的好感或英奧兩國的 support。既然這三個國家決定反對合併，您就不必對法國的意圖或威脅感到不安，法國報刊對您的態度，如同它們對希臘人的態度一樣。”

#### 同一個人給他的信

1857年4月15日於倫敦

“我勸您完全按照奧地利領事的意見行事，不管他有多少缺點，甚至不管他的態度變得更加傲慢。您必須注意到，這個人只是按照本國政府的指示辦事。奧地利同土耳其帝國與大不列顛的觀點完全一致，因此，如果奧地利表示滿意，土耳其和英國也必然表示滿意。所以我再重復一遍，您必須聽從奧地利領事的意見和願望，毫不反對地使用他向您推薦的一切人，而不必追究這些人是否道德敗壞或聲名狼籍。只要這些人真心反對合併就夠了。這是因為，如果莫爾達維亞的御前會議宣布要合併，奧地利就會要您對不聽從它那積極反對合併的領事的意見擔負責任。至於英國，即使兩國的御前會議都主張合併，它也絕不會讓這種合併實現的。然而您最好還是能阻止莫爾達維亞的御前會議發表主張合併的意見，因為這樣三國就比較容易對付法國和俄國，從而您就會得到它們的感謝…… 您禁止出版自由，是完全正確的，因為莫爾達維亞的狂妄之徒，俄國的那些戴着法國面具的朋友，會濫用這種出版自由來煽起要求合併的民眾運動…… 絕不能容許這種陰謀得逞。我相信，如果在法國發行了‘多瑙河之星’以及其他同樣下流的刊物，政府馬上會把它們的創辦人放逐到凱恩去的。法國既然熱切希望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几亞准許成立自由俱樂部和舉行政治性集會，它就應該先在自己國內准許這樣做，不要放逐和迫害所有敢于稍微自由地說話的記者。法國有一句諺語：«Charité

bien ordonnée commence par soi-même〔“先己后人”〕。巴黎条約沒有提到公国的合并；它只是說，御前會議必須对国家的內部改組发表意見；可是把合并当做自己口号的狂妄之徒，完全忘記了条約的这一条款，不顾內部改革，而只追求新的国际組織，幻想着外国君主統治下的独立…… 英国采取同奥地利完全一致的行动，坚决反对合并，并且同土耳其帝国一致，决不让合并实现。如果法国領事对您說一些相反的話，請不要相信他，因为他滿口謊言。”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8 月 27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10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印度起義

1857年8月14日于倫敦

当7月30日的的里雅斯特電訊和8月1日的印度邮件所带来的印度消息<sup>①</sup>最初傳來时,我們曾立即指出,从这些消息的内容和日期来看,攻占德里的說法是一个卑鄙的騙局,是对于人們难以忘却的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事件的极其拙劣的仿制品。但是約翰牛却輕信到如此难以理解的地步,以致他的大臣、股票經紀人和報紙竟能使他确信,在那些只能說明巴納德將軍采取純守勢的报道中,包含着全歼敌人的证据。这种幻觉愈来愈强,最后发展到甚至使得在这类事情上是老手的將軍德·雷希·伊文思爵士也于8月12日晚間在下院的欢呼声中宣称,他认为攻占德里的傳聞是可靠的。然而這場令人发笑的戏毫无成果,因为肥皂泡馬上就要破灭了。第二天,即8月13日,就接二連三地收到了比印度邮件先到达的、发自的里雅斯特和馬賽的電訊,它們明确地指出,6月27日德里的状况仍无变化,而那位仍然只能进行防御并苦于应付被圍攻者頻繁而猛烈的出击的巴納德將軍,对于自己能把陣地守到那个时候,已經感到十分滿意了。

<sup>①</sup> 指攻占德里的虛假报道(見本卷第273頁)。——編者注



我們估計，下一班郵件大概將帶來英軍撤退的消息，或者至少將報道一些預示這種撤退行動的事實。肯定地說，德里城牆那樣長，使人不能想像防禦者能夠處處有效地加以防守；相反地，這為敵人以集中的兵力進行 *coups de main*〔堅決的攻擊〕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是巴納德將軍似乎深受歐洲人關於築壘城市、圍攻和轟擊等觀念的影響，不願意採取查理·納皮爾爵士所擅長的那種使亞洲人膽寒的出奇制勝的行動。據說，巴納德將軍的兵力確已增加到 12 000 人左右，其中歐洲兵 7 000 人，“可靠的土著兵” 5 000 人；但另一方面，也沒有人否認，起義者每天都得到新的援軍，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圍攻者和被圍攻者兵力不平衡的情況依然如故。此外，巴納德將軍能夠依靠突然襲擊獲得一定勝利的唯一地點，就是位於制高點的莫臥兒宮，但是在可能已經到來的雨季，要從朱木拿河岸向莫臥兒宮接近顯然是不可能的，而從克什米爾門和朱木拿河之間攻打莫臥兒宮，又將使進攻者在一旦失利時遭到極大的危險。最後，雨季的到來，必將使巴納德將軍以保障交通綫和退路作為他行動的主要目的。總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巴納德將軍會以他那還不充裕的兵力在最不利的季節冒險去干他在比較有利的季節都不敢做的事。儘管倫敦的報紙閉眼不看事實，竭力欺騙自己，但上層人物已極為不安，這一點從帕麥斯頓勳爵的機關報“晨郵報”就可以看出。該報貪財的紳士們向我們報道說：

“我們懷疑，甚至下一班郵件能否給我們帶來攻占德里的消息；但是我們確實希望，一旦目前馳援圍城軍隊的隊伍開到並帶去**足夠數量的**、在德里城下至今仍感不足的重炮時，我們就會得到叛亂者的堡壘陷落的消息。”

顯然，英國的將軍們由於軟弱、猶豫和失策，竟把德里提升到

印度起义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英军在长期围攻以后退却，或者老是采取守势，就会被看做是一种肯定的失败，并且是引起全面起义的信号。此外，这还会使英军遭到可怕的死亡的命运，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由于进行着充满出击和搏斗的围攻战并抱有很快能对敌人进行血腥报复的希望而处于极端激昂的状态，才得以避免这种命运。至于说印度教徒对起义漠不关心，甚至说他们同情英国的统治，那完全是无稽之谈。王公们，像真正的亚洲人一样，正在等待着有利的时机。在不受一小撮欧洲人控制的整个孟加拉管区，人们安于自由自在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那里也没有他们要起来反抗的人。如果指望印度起义具有欧洲革命的特征，那将是可笑的 *quid pro quo* [误解]。

在馬德拉斯和孟买管区，由于军队还没有表示态度，人民当然也就没有行动起来。至于旁遮普，直到目前都是欧洲部队的主要配置中心，而当地的土著部队已被解除武装。要想在旁遮普发动起义，附近的半独立的王公们还必须大力施加影响才行。然而，像孟加拉军内部所发生的那种广泛的密谋，没有当地居民的暗中同情和支持，是不可能那样大规模地实现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同英国人在筹措军队给养品和运输工具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这正是军队集中缓慢的主要原因）说明农民对他们没有好感一样。

电讯中的其他消息之具有重要性，也只是在于它们说明：在旁遮普最远的边境，即白沙瓦地区已爆发起义；另一方面，起义正由德里往南向孟买管区迅速推进，遍及詹西、萨加尔、印多尔、默豪等地，最后达到孟买东北相距仅 180 英里的奥郎加巴德。关于班得尔汗的詹西，我们可以指出，这是一个筑垒地点，因而可能成为武

装起义的另一个中心。另一方面,据报道,范科特兰特將軍在为了与德里城下的巴納德將軍会师而由西北向那里进发的途中,打败了錫尔薩地区的起义者;他那时距离德里还有 170 英里。他还需要經過詹西地区,在那里他会重新与起义者遭遇。至于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准备措施,帕麦斯頓勳爵似乎认为最曲折的路綫就是最捷近的路綫,所以他命令軍隊繞道好望角前往印度,而不經過埃及。另外,原定派往中国的数千人到錫兰后便被截住,轉派往加尔各答,而 7 月 2 日火枪兵第五团确已到达該地,这一事实使帕麦斯頓勳爵有机会对他的馴順的下院議員中直到現在还敢不相信他的侵华战争完全是“橫財”的那些人,开一个恶作剧的玩笑。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14 日

載于 1857 年 8 月 2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10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 1957 年  
“苏联东方学”杂志第 5 期

## 卡·馬克思

### \*歐洲的政治形勢

在下院閉會前夕，帕麥斯頓勳爵利用最後一次會議以前的一次會議<sup>221</sup>，讓下院略微看一看他準備在已經結束的這屆會期和下屆會期之間款待英國公眾的好戲。他的節目單上的第一項就是宣布恢復對波斯的戰爭，而按照他在幾個月之前所做的聲明，這場戰爭已由3月4日簽訂的和約<sup>①</sup>宣告最後結束。當將軍德·雷希·伊文思爵士表示，他希望杰科布上校已經得到要他率領他目前駐扎波斯灣的部隊返回印度的命令的時候，帕麥斯頓勳爵直截了當地聲明，只要波斯沒有履行條約所規定的義務，杰科布上校的部隊就不能撤走。然而，赫拉特的駐軍還沒有撤走。相反地，盛傳波斯又向赫拉特增派了軍隊。固然波斯駐巴黎大使予以否認，但是波斯方面的誠意引起人們正當的嚴重懷疑，所以杰科布上校所率領的英軍仍舊要占領布什爾。就在帕麥斯頓勳爵講這些話的第二天，有電訊傳來消息說，默里先生向波斯政府提出從赫拉特撤兵的強硬要求；這個要求很可能被認為是重新宣戰的先兆。這就是印度起義的第一個國際影響。

帕麥斯頓勳爵的節目單上的第二項雖然缺乏具體細節，但是

---

① 見本卷第246—250頁。——編者注

却展示了一幅廣闊的遠景。當他最初宣布從英國抽調大批軍隊派往印度時，他的反對者會指責他使大不列顛喪失防禦能力，從而給外國造成乘虛而入的機會，他的回答是：

“大不列顛人民永遠也不會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隨時都可以立即迅速動員起足夠的人力去應付任何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

可是現在，在議會閉會前夕，他却完全改變了腔調。在回答德·雷希·伊文思將軍關於用螺旋槳戰列艦運送軍隊去印度的建議時，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硬說什麼帆船比裝有螺旋槳的輪船優越，相反地，他承認將軍的計劃初看起來似乎非常可取。但是又要下院記住：

“關於是否需要在本國保持足夠數量的海軍，還有其他的情況必須加以考慮……有些情況說明，向國外派出的海軍超出絕對必需的数量，是不適當的。當然，汽輪戰列艦是處於常備狀態，目前沒有大用場；但是，一旦發生任何前面所指的那種事件，就需要派海軍出海作戰，如果讓戰列艦去執行向印度運兵的任务，那怎麼能夠應付迫在眉睫的危險？歐洲目前的局勢可能需要使艦隊在最短期間投入戰鬥準備以進行自衛，如果把艦隊派往印度，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不可否認，帕麥斯頓勳爵使約翰牛實在左右為難。如果採取有效的手段堅決鎮壓印度起義，本國就會遭到襲擊；如果讓印度起義的力量壯大起來，那就會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說，“在舞台上，除去印度的王公之外，將碰到新的人物需要進行較量”。

在談到被暗示得那麼神秘的“歐洲局勢”之前，不妨先綜述一下同一次下院會議上所說出的關於英軍在印度的現狀的真實情況。首先，一舉攻占德里的一切美妙希望，彷彿不約而同地被放棄了，以前那種狂妄估計已經讓位於比較清醒的看法：如果英軍能把他們的據點守到11月本國援軍預定開到的時候，那就得慶幸不已

了。其次，人們隱隱地担心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康波尔很可能失守。正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說，一切都要决定于康波尔的命运；他认为解救康波尔甚至比攻占德里还重要。康波尔位于恒河流域中心，牵制着奥德、罗希尔汗、瓜廖尔、班得尔汗，而且还是德里的前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康波尔实在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地方。最后，下院中的一位軍职議員弗·斯密斯爵士，提請下院注意下面的事实：在英国人拥有的印度軍隊中，实际上沒有技術人員和工兵，因為他們都开了小差，很可能“德里会成为第二个薩拉哥沙”。另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也沒有注意从英国派出任何工兵部队官兵。

現在我們回过头来看看所謂“隱現于未来”的欧洲事件，我們首先感到倫敦“泰晤士报”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暗示所做的評論是令人惊異的。該报說，法国的現行政体可能被推翻，或者拿破侖可能与世长辞，那时，目前安危所系的英法联盟就要告終。換句話說，“泰晤士报”这家代表英国內閣的大报，认为法国随时可能爆发革命，同时宣称，目前的联盟不是建立在法国人民的同情的基础上，而只是建立在同这个法国篡夺者的秘密勾結的基础上。除去法国可能发生革命以外，还有多瑙河地区的糾紛問題<sup>222</sup>。这个糾紛並沒有因为莫尔达維亚的选举結果被作廢而平息下来，而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北欧的斯堪的那維亚，这个地方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要成为一場大动乱的舞台，而且也許会发出欧洲国际冲突的信号。北欧之所以还能保持和平，是因为那里在急切地等待着两件事情的发生：瑞典国王的逝世和丹麦当今国王的逊位。在克利斯提阿納最近举行的一次自然科学家大会上，瑞典皇太子坚决主張建立斯堪的那維亚联盟。皇太子是一个正当壮年、坚毅果敢的人；吸收瑞典、挪威、丹麦的热情青年参加自己队伍

的斯堪的那維亞黨將把他的登基看做是拿起武器來的好時機。另一方面，孱弱而愚鈍的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據說已終於得到他那位門戶懸殊的配偶丹納爾女伯爵的准許，引退了，在此以前她一直不准他這樣做。就是由於她的緣故，國王的叔父斐迪南親王——丹麥王位的假定繼承人，曾被迫不過問國事，後來經過皇族其他成員的協商，他才再次入朝秉政。現在，據說丹納爾女伯爵有意從哥本哈根遷居巴黎，甚至想慫恿國王永遠退出充滿風浪的政治生活，而讓位給斐迪南親王。這位六十五歲左右的斐迪南親王，對哥本哈根宮廷的關係一向同阿爾圖阿伯爵——後來的查理十世——對土伊勒里宮廷的關係一樣。他性格倔強、苛刻，守舊觀念非常強烈，從來就不屑於掛上擁護立憲制度的招牌。然而他登上王位的首要條件將是宣誓接受他公開表示憎惡的憲法。由此可見，國際糾紛是很可能要發生的，瑞典和丹麥的斯堪的那維亞黨都打定主意要利用這些國際糾紛而有所收獲。另一方面，丹麥同以普魯士和奧地利為後盾的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維希這兩個德意志公國的衝突<sup>223</sup>，將使事情更加複雜化，將把德國卷入北歐的動亂之中；而保證斐迪南親王取得丹麥王位的1852年倫敦條約<sup>224</sup>則將把俄國、法國和英國牽涉進去。

卡·馬克思寫於1857年8月21日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於1857年9月5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110號

## 卡·馬克思

### \*印度刑罰的調查

我們昨天刊載了本報駐倫敦通訊員关于印度起义的通訊<sup>225</sup>，我們的通訊員十分正确地指出了造成这次猛烈爆发的許多前因。今天我們准备花点時間，略深一步談談我們对此事的看法，同时让大家明白，印度的英国統治者，决不像他們想在世人面前装扮的那样，是印度人民的非常温和的和无可責难的恩人。为此目的，我們要援引在 1856 年和 1857 年下院會議期間提交給下院的关于东印度的刑罰問題的官方藍皮书<sup>226</sup>。我們會看到，这些藍皮书的材料是无可辯駁的。

首先，我們有馬德拉斯用刑事实調查委員會的报告<sup>227</sup>。該委員會宣称，它“深信到处都在为了征收稅款而使用刑罰”。委員會怀疑

“每年因刑事罪而受严刑拷打的人是否有因不納稅罪而受严刑拷打的人那样多”。

委員會強調指出，

“有一种情形，它給委員會留下的印象，甚至比确信有刑罰存在这一点更加沉重，——这就是受害一方很难获得补偿。”

委員會的委員們认为，这种困难的原因如下：（1）想亲自向收稅官<sup>228</sup> 提出控訴的人必須走很远的路，而这样长途跋涉就会引起



金錢的开支和耗費時間于进出官府；(2)害怕呈文“將照例批上要控訴者去見特西达尔的批語而被退回来”，因为特西达尔就是掌管該地区警察和稅收事務的官員，也就是那个亲自或者通过其下屬警官欺侮过控訴者的人；(3)即使政府官員已被正式控告并已被揭露犯有这类濫用職权的罪行，也难將他們交法庭审判，而且法律為他們規定的懲罰也过分寬厚。据查明，如果这类控告在法官面前得到证实，法官只能判处犯人 50 卢比罰款或为期限一月的徒刑。誠然，他还可以把被告解交“刑事法官，由刑事法官判刑或將其案件提交巡迴法院审理”。

报告中补充說：

“看来这是一个冗长的审判程序，而且只适用于一类过失，即警察的濫用職权，而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审判程序是不会有任​​何結果的。”

警官或稅吏（这是一个人，因为稅款是由警察征收的）在被控詐取錢財时，先由收稅官助手审判；以后被告可以向收稅官提出上訴，最后可向稅务局提出上訴。稅务局可以把被告送到政府法院或民事法院。

“在这种审判情况下，没有一个貧穷的萊特能斗得过任何一个富裕的稅吏，同时我們也不知道有农民根据这两个条例（1822 年和 1828 年的条例）提出过控訴的任何事实。”

此外，只有在警官侵吞公款或强迫萊特<sup>229</sup>繳納額外稅款以飽私囊时，这种詐取錢財的控告才能成立。由此可見，在征收国家稅款时使用暴力，法律对此并未規定任何懲罰。

这里援引的这个报告，只涉及馬德拉斯管区，但是达尔豪西勛爵本人，在 1855 年 9 月写信給董事們<sup>①</sup>說：

① 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們。——編者注

“他早已不再懷疑，所有英屬各省的下級官吏都採用了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刑罰。”

這樣，官方就承認了普遍施用刑罰是英屬印度財政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這種承認是以替英國政府本身開脫的形式作出的。事實上，馬德拉斯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犯有施用刑罰罪的全是印度籍的低級官員，而歐籍的政府官員却似乎總是在盡力阻止發生這類事情，不過沒有成效。針對這種說法，馬德拉斯土著居民協會於1856年1月向議會呈遞過一封請願書，對刑罰問題的調查提出如下的控訴：（1）調查幾乎根本沒有進行，因為委員會只呆在馬德拉斯城內開會，而且只有三個月，而想提出控訴的土著居民，除極少數例外，都沒有離家的可能；（2）委員會的委員們並未試圖追究禍根；如果追究，他們就會發現，禍根就在稅收制度本身；（3）沒有審問被控告的土著官員，弄清他們的上級對用刑情況了解的程度如何。

呈遞請願書的人寫道：“犯有這種暴行罪的，不是暴行的實際執行人，而是下令要他們執行的官員，即他們的頂頭上司，後者向他們的歐籍長官對一定數額的稅款負責，而歐籍長官在這方面又向最高政府當局負責。”

的確，只要援引幾段委員會所宣稱的作為馬德拉斯報告依據的證詞，就足以推翻報告中的“英國人毫無過失”的論斷。例如，商人科耳霍甫先生說：

“所施用的刑罰的特點，是方式很多，而這又是由特西達爾或他的下屬隨意決定的。但是我很難說，最高當局是否給過受害者任何補償，因為一切控訴通常都被他們轉給特西達爾去進行調查和呈報。”

在當地居民的控訴書中，我們看到如下的一份：

“去年，我們的佩贊穠（稻的主要收成或青禾）由於雨水欠缺而收成不好，

因此我們不能像往常那樣繳稅。在賈馬班迪<sup>①</sup>確定之後，我們由於遭受損失，就要求根據 1837 年伊登先生任我們的收稅官時我們所簽訂的協議條件減少捐稅。由於沒有減稅，我們就拒絕接受我們的普塔<sup>②</sup>。這時特西達爾就開始用極殘酷的办法強迫我們繳稅，這樣從 6 月一直繼續到 8 月。我，還有其他的人，被交給一些人看管。這些人把我們趕到太陽下面曝曬。強迫我們在太陽下彎着腰，背上放上石頭，站在灼熱的沙地上。8 點鐘以後才放我們到稻田去。這種殘酷的虐待延續了三個月，這個期間，我們有時步行去向收稅官遞呈文，但收稅官拒絕接受。後來我們把呈子收集攏來，交給巡迴法庭，巡迴法庭把它們轉給了收稅官。這樣，我們還是沒有得到公正的裁判。9 月我們接到官方的通知，過了二十五天我們的財產就被查封，接着就被拍賣了。除了我列舉的事實以外，我們的女人也受到了虐待；人們用夾具箝夾她們的胸部。’

一個土著基督教徒在回答委員會委員向他提出的問題時說：

“每當歐籍或土著部隊過村時，總是強迫所有的萊特無償地拿出糧食等東西，如果誰想要收費，就要遭到嚴刑拷打。”

接着是一個婆羅門所經受的情況。這個婆羅門和自己的同村人及鄰近村落的居民同時接到特西達爾的命令，要他們無償地供給木板、木炭、木柴等物，使特西達爾能夠繼續在科列龍河上修築橋梁；當這個婆羅門不肯的時候，就有 12 個人把他抓去，百般折磨他。他補充說：

“我向收稅官助手卡德耳先生提出控訴，但是他沒有進行任何調查，並且把我的控訴書也撕了。由於他想犧牲窮人的利益來廉價地完成科列龍橋的修築，從而博得政府的好評，因此不論特西達爾干出什麼壞事，收稅官助手都毫不過問。”

1855 年管轄旁遮普盧迪阿納州的專員布里爾頓先生的案件，

① 稅額分攤。——編者注

② 稅額通知單。——編者注

最清楚地表明了最高当局对这种极尽敲詐暴虐之能事的非法行为的看法。根据旁遮普首席專員的报告，已經证实

“往往在代理首席專員布里尔頓先生的同意或直接命令下，富裕公民的住宅无故遭到搜查；搜查时被沒收的财产长期扣押；許多人被投入監獄，好几个星期也不提出受押的罪名，籠統地和同等严厉地对一切人采用对付嫌疑犯的預防措施法；代理首席專員到各个区巡行，都有一些警官和密探相随，他到处使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一切災害的禍首”。

达尔豪西勋爵在他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中說道：

“我們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布里尔頓先生本人也不否认这些证据，证明这个官員确实犯有首席專員所列举的每一项令人不快的、不正当的和非法的行为，这种行为使不列顛行政机关的部分代表蒙受了耻辱，使众多的不列顛臣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任意剝夺自由，并遭受严刑拷打。”

达尔豪西勋爵主張“严惩布里尔頓先生，以儆效尤”，因此他认为：

“暫且不能让布里尔頓先生担任代理首席專員的职务，而应把他調任第一助理。”

可用馬拉巴尔海岸坎納腊的塔魯克<sup>①</sup>的居民請願书来結束摘自藍皮书的这些引文。这些居民說他們白白向政府提出了几次請願书，然后把他們过去的情况和目前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比較：

“在‘腊尼’<sup>②</sup>、巴哈杜尔和提普治理时期，我們耕作水地和旱地、丘陵地、低洼地和森林地，繳納定得很低的稅款，因此我們过着安定和幸福的日子。西尔卡尔<sup>③</sup>官員当时要我們繳納額外的稅款，但是我們从来没有繳过。收稅时我們没有吃过苦头、没有受过压迫或虐待。但是当这个国家交給尊貴的公

① 区。——編者注

② 女王。——編者注

③ 政府。——編者注

司<sup>①</sup>以后,这个公司就千方百計地設法榨取我們的錢財。抱着这个恶毒的目的,公司就弄条例,发命令,并派来收稅官和民事法官执行这些条例和命令。不过,那时的收稅官及其下屬当地官員,有一个时期对我們的控訴还給予应有的注意,还按照我們的願望办事。相反,現在的收稅官及其下屬官員,不擇手段地想达到升官目的,对人民的福利和利益漠不关心,对我們的控訴充耳不聞,使我們遭到各种压迫。”

在这里,我們只是对英国在印度統治的真实历史做了一番簡短而又温和的概述。看到这样的事实,公正而严肃的人們也許会問:人民企图赶走竟敢对自己的臣民这样濫用职权的外国征服者,难道不对嗎?如果英国人能够冷酷无情地干出这种事情,那末就算起义的印度人在起义和斗争的狂怒中犯下了硬說是他們犯下的那些罪行和暴虐,又有什么奇怪呢?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8月28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7年9月17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120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① 东印度公司。——編者注

## 卡·馬克思 \*印度起义

“波罗的海号”輪船带来的邮件，絲毫沒有报道在印度曾发生什么新事件，但却包含有大量极其有趣的細节，我們現在把这些細节扼要地介紹給讀者。首先必須指出一点，就是迟至7月15日英国人仍然未能进入德里。同时，英軍兵营內发生了霍乱，雨季也已开始，因此圍攻軍队的撤圍和退却，看来只是時間問題。英国的报纸企图要我們相信，恶疫只夺去了將軍亨·巴納德爵士的生命，而他手下那些飲食更坏、操劳更重的兵士却幸免于难。因此，我們不能根据公諸于世的正式材料，而只能通过按公认的事实进行推断的办法，来大致了解这种可怕的傳染病在圍攻軍队中間猖獗的情形。德里城下兵营里的一名軍官在7月14日的信中写道：

“我們沒有采取任何攻夺德里的行动，而只是应付敌人的出击。我們有5个欧洲团的部分兵力，但能够集中用来进行任何有效攻击的，只有2000名欧洲兵，因为每个团都留下了大量兵力防守賈郎达尔、卢迪阿納、薩巴图、达格夏伊、卡薩烏利、安巴拉、米拉特和皮劳尔等地。事实上各团只派来了少量兵力。敌人在炮兵方面远比我們占优势。”

这就证明了，由旁遮普派来的部队发觉从賈郎达尔到米拉特这一条重要的北方交通綫处于起义状态，因此不得不在最重要的地点留下队伍而减少自己的兵力。这一点可以說明，为什么由旁

遮普到达德里的兵力比預期的少，但是这还不能夠解釋为什么欧洲兵减少到只有 2 000 人。倫敦“泰晤士报”駐孟买的記者在 7 月 30 日写的通訊中，企图从另一角度來解釋圍攻者行动消极的原因。他写道：

“援軍确实已到达我們的兵营，其中包括：皇家第八团的一部分，第六十一团的一部分，步炮連一个，土著部队的火炮兩門，非正規騎兵第十四团（护送載运大量彈药的輜重队），旁遮普騎兵第二团，旁遮普步兵第一团和錫克步兵第四团；但是这样归并給圍攻軍队的土著部队并不是完全地和同样地可靠，尽管已使他們与欧洲兵一起分別編入各旅。在旁遮普部队的各个騎兵团內，有許多来自印度斯坦本部和罗希尔汗的伊斯兰教徒和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而孟加拉的非正規騎兵則主要是由这些人組成的。这些人大都是极不忠实的，他們在部队中出現，不論数量的多少，都必将带来許多麻煩，——事实已证明是如此。在旁遮普騎兵第二团內，曾不得不解除約 70 名印度斯坦人的武装，并处 3 人以絞刑，其中有一名高级土著軍官。已調来一个时期的非正規騎兵第九团，有几名騎兵逃亡，而非正規的第四团，据我所知，曾在单独執勤时杀死了本团的副官。”

这里就暴露了另一个秘密。德里城下的兵营看来与阿格拉曼特<sup>230</sup> 的兵营有某些相似之处，这里的英国人不仅要和面对着的敌人作斗争，还要与內部的同盟者作斗争。但这一事实仍不足以說明，为什么英国人只能用 2 000 名欧洲兵來进攻。第三个报道者，“每日新聞”駐孟买的記者，提出了巴納德的继任者里德將軍所指揮的部队的精确的一覽表，它看来是可信的，因为他把部队的各个組成部分都一一列举出来了。根据这位記者的报道，从 6 月 23 日至 7 月 3 日，由旁遮普到达德里城下兵营的約有 1 200 名欧洲兵和 1 600 名錫克兵，还有非正規騎兵及其他等等，总共約 3 000 人，由張伯倫將軍率領。而現在由里德將軍指揮的全部兵力，他估計为 7 000 人，其中包括炮兵和攻城炮兵纵列，因此，在旁遮普援軍开

来以前，德里城下的军队不可能超过 4 000 人。8 月 13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曾指出，亨·巴纳德爵士的兵力有 7 000 名英国兵和 5 000 名土著兵。虽然这个数字是过分夸大的了，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时欧洲兵约有 4 000 名，还有略少于此数的土著兵。这样，巴纳德将军当时的兵力，与目前里德将军的兵力是相等的。由此可见，从旁遮普调来的援军仅仅补充了几乎达围攻军队半数的损失，这是极大的损失，它部分地是由于起义者不断出击，部分地是由于霍乱猖獗而造成的。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英国人能够集中用来进行“任何有效攻击”的欧洲兵只有 2 000 人。

德里城下的英军兵力就是如此。现在来看看他们的战斗行动。他们的行动并不十分出色，这一点根据以下的简单事实就完全可以看出来：自从 6 月 8 日巴纳德将军报告说攻占德里对面的高地以来，大本营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战报。当时的战斗都是围攻者抗击被围者的出击，只有一次是例外。围攻者有时在正面，有时在两翼受到攻击，但最多的是在右翼后方受到攻击。6 月 27 日和 30 日，7 月 3 日、4 日、9 日和 14 日被围者均曾出击。6 月 27 日的战斗仅仅是前哨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因为雨季的第一场倾盆大雨而中止了。6 月 30 日，起义者一支较大的兵力出现在围攻者右侧的障碍物中，袭击了围攻者的步哨和小哨。7 月 3 日清晨，被围者先在英军阵地的右翼后方进行佯攻，然后沿卡尔纳耳大道向这一翼后方推进数英里，直达阿利普尔，目的是拦截送往兵营的弹药和钱款。在前进途中，他们同旁遮普非正规骑兵第二团的一个前哨遭遇，后者立刻让开了道路。当他们于 4 日回城时，英军兵营派出 1 000 名步兵和两个连的骑兵向他们攻击，企图截住他们。但是起义者竟顺利退入德里城，损失很小，



甚至毫无損失，并且把所有的火炮也都保全下来了。7月8日，英軍兵营派出一支队伍去破坏距德里約6英里的巴希村附近的运河桥；在前几次出击中，起义者就是通过这座桥攻击英軍的深远后方和襲扰通往卡尔納耳和米拉特的交通綫的。桥被破坏了。7月9日起义者再次出动很大的兵力，攻击英軍陣地的右翼后方。据該日用电报拍往拉合尔的官方报道称，出击者約有1000人被击毙；但是这个报道看来是过分夸大了，因为7月13日自兵营发出的一篇通訊中是这样写的：

“我方埋葬和焚燒了250具敌兵尸体，还有大量尸体被他們拖回城內。”

就在这篇刊登在“每日新聞”的通訊里，根本沒有吹嘘說英軍迫使西帕依退却，而是相反地說：“西帕依打退我方所有正在作业的部队，然后才退走。”圍攻者的損失很大，計伤亡212人。7月14日，由于起义者又一次出击，发生了又一場激烈的战斗，但詳細的报道尙未收到。

在此期間，被圍者获得了大量援兵。来自罗希尔汗的巴雷利、謨拉达巴德和夏賈汉普尔等地的起义者，包括四个步兵团，一个非正規騎兵团和一个炮兵連，已于7月1日順利地同他們在德里的伙伴們会合。倫敦“泰晤士报”駐孟买的記者写道：

“本来估計他們不可能渡过恒河，然而預期的河水泛滥沒有发生，他們在加尔穆克特薩尔渡过恒河，穿过达普，到达德里。在两天內，我軍痛心地眼看着他們的人員、火炮、馬匹和馱畜（因为叛乱者有大約值5万英鎊的財宝）排成长长的行列通过舟桥开进城內，但是既无法阻拦，也无法进行任何騷扰。”

起义者这次通过整个罗希尔汗地区的順利行軍证明，自朱木拿河以东直到罗希尔汗山脉这一大片地区对英軍來說都是无法通行的；而起义者毫无阻碍地由尼馬奇到阿格拉的行軍，如果同印多

尔和默豪爆发的起义联系起来看，则证明，从朱木拿河西南直到文迪亚山脉的整个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英国人在德里地区唯一成功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行动，就是他们靠范科特兰特将军的旁遮普锡克部队平定了德里以北和西北的地区。在卢迪阿纳与锡尔萨之间的整个地区内，范科特兰特将军所要对付的，主要是居住在荒凉沙漠上一些稀疏散布的村落里的专事抢劫的部落。据说他已于7月11日离开锡尔萨，前往法提哈巴德，由那里再去喜萨尔，以巩固围攻部队的后方。

除德里外，在西北各省还有三个地点成为土著居民与英国人斗争的中心，这就是阿格拉、康波尔和勒克瑙。阿格拉方面的情况的特点是，当地的起义者为了攻打英军一个遥远的据点，首次进行了行程约300英里的计划周到的远征。据阿格拉出版的报纸“乡下佬”<sup>231</sup>报道，纳西腊巴德和尼马奇的西帕依团，为数约1万人（步兵约7000人，骑兵约1500人，火炮8门），于6月底到达阿格拉附近，7月初即在距阿格拉约20英里的萨西亚村后的旷野里设营驻扎，7月4日似乎在进行攻城准备。阿格拉城外兵营中的欧洲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便躲进了堡垒。阿格拉警备司令起初派出一支由科塔的骑兵、步兵和炮兵组成的部队作为前哨抵挡敌人，但他们在到达指定地点后就全部投到起义队伍里去了。7月5日，由孟加拉欧洲兵第三团、一个炮兵连和一队欧洲志愿兵组成的阿格拉警备部队出动去攻击起义者；据说，他们把起义者由村里赶到村后的旷野上，但后来显然自己又被打退了，在总数500人中死49人、伤92人以后，不得不在敌人骑兵的袭击和威胁之下匆忙地撤退，以致据“乡下佬”报道，“甚至来不及朝他们放一枪就不见踪影了”。换句话说，英国人简直是逃之夭夭，赶紧躲进了堡垒，而西帕

依則來到阿格拉城下，破壞了兵營里几乎所有的房屋。次日，即7月6日，他們開到通往德里途中的巴腊特普尔。這一事件的重要結果，就是起義者切斷了英國人在阿格拉與德里之間的交通綫，并且他們還可能出現在莫臥兒的古都之前。

在康波爾，根據最近的郵件得悉，威勒爾將軍率領下的一支約有200名歐洲兵的部隊，連同步兵第三十二團人員的妻子兒女，被數量占壓倒優勢的起義者圍困在一座堡壘里面，起義者的首領是比都爾的納那·薩希布。6月17日和6月24日至28日，堡壘遭到數次攻擊，在最後一次攻擊中，威勒爾將軍腿部中彈，因傷致死。6月28日，納那·薩希布建議英國人投降，條件是答應讓他們乘船沿恒河順流而下到阿拉哈巴德。英國人接受了投降條件，但當他們剛剛乘船到達河中央時，恒河右岸的火炮立即向他們開火。船上那些企圖往對岸逃命的人，被騎兵捉住殺死。婦女和兒童都做了俘虜。由於康波爾曾多次派人到阿拉哈巴德緊急求援，7月1日，由勒諾少校率領的一隊馬德拉斯火槍兵和錫克兵出發，向康波爾前進。7月13日拂曉，在距法特普爾4英里的地方，這一隊人和哈弗洛克准將會合了。哈弗洛克指揮的是第八十四團和第六十四團的約1300名歐洲兵、非正規騎兵第十三團以及奧德的殘余的非正規部隊，他在7月3日由貝拿勒斯到達阿拉哈巴德，然後以急行軍趕上勒諾少校。就在與勒諾會合的當天，他被迫在法特普爾城下與納那·薩希布率領前來的土著部隊交戰。經過激烈的戰鬥，哈弗洛克將軍以側擊的方法把敵人趕出法特普爾，迫使他們退往康波爾。7月15日和16日，哈弗洛克又兩次與納那·薩希布在康波爾交鋒。7月16日，康波爾重新被英軍攻占，納那·薩希布退往恒河岸边距康波爾12英里的比都爾，據說那里已築有堅

固的工事。納那·薩希布在向法特普尔进军以前，杀死了所有俘获的英国妇女和儿童。夺回康波尔对英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就保住了恒河的交通綫。

在奥德的首府勒克瑙，英軍警备部队几乎处于和康波尔的情形一样致命的困境——被敌人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圍困在堡垒内，缺乏給养，并且丧失了指揮官。这位指揮官，亨·劳倫斯爵士，在7月2日的出击中腿部負伤，7月4日即死于破伤風。7月18日和19日，勒克瑙仍在坚守中。它唯一的获得解救的希望就寄托在由康波尔带兵前来的哈弗洛克將軍的身上。但问题是，哈弗洛克在后方有納那·薩希布威胁的情况下是否敢于这样做。然而任何拖延都将給勒克瑙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雨季很快就会使野战成为不可能了。

考察了这些情况之后，我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結論，即孟加拉西北各省的英軍已逐漸陷在一些好像是分散在革命大海中的孤立礁石似的小据点上。在下孟加拉，除了在貝拿勒斯四郊游蕩的婆罗門曾企图再次攻夺这个圣城而未获成功以外，只在米尔扎普尔、第納普尔和巴特那发生过个别的違抗現象。在旁遮普，由于錫亚耳科特和杰卢姆两地的起义被鎮压下去，白沙瓦的風潮也被制止，人們的反抗情緒受到了强力的压抑。在古扎拉特、龐达普尔、薩塔腊、在那格普尔地区的那格普尔和薩加尔、在尼贊轄区的海德拉巴，最后，还有远处南方的迈索尔，都曾试图举行起义，所以，孟买和馬德拉斯管区的平靜决不能认为是十分可靠的。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9月1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7年9月15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118号

## 卡·馬克思

### \*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

在考察亚洲当前的情况时，会产生一个问题：对于不列颠国家和不列颠人民来说，他们在印度的领地究竟具有什么价值？直接收入，即贡赋形式的收入，亦即在印度的收入抵偿在印度的支出以外的余额，不列颠国库根本没有得到。相反，它每年的支出非常庞大。自从东印度公司踏上大规模征服的道路之后，——而这是距今将近一百年以前的事情，——它的财政就陷于枯竭状态，因而不得不屡次向议会不仅请求军事援助来维持它所征服的领土，而且请求财政援助来使它不致遭到破产。情况就这样一直继续到现在。目前它向不列颠国家要求派出大批军队，在这以后无疑将要求拿出大批的钱。为了进行征服和建立自己的机构网，东印度公司到目前为止已向国家借债 5 000 万英镑以上；同时许多年来英国政府还负担了在属于公司本身的土著军和欧洲军之外的 3 万正规军的来往运输费和在印度的维持费。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大不列颠从其印度帝国所得到的利益只限于个别不列颠臣民所获得的利润和利益。这些利润和利益应该说是很庞大的。

首先，东印度公司有为数 3 000 人左右的股东，按照最近的特许状<sup>232</sup>，要保证他们每 600 万英镑实付资本获得  $10\frac{1}{2}\%$  的年利，即每年 63 万英镑。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资本是由可以转让的股票构成的，因此每一个有钱购买股票的人都可以成为股东。由于实行现

行特許狀，目前股票行市高于票面 125—150%。金額 500 英鎊、即約值 6 000 美元的股票的持有者，在股東大會上享有發言權，但是要具有表決權，他應持有 1 000 英鎊的股票。3 000 英鎊股票的持有者有兩票表決權，6 000 英鎊的有三票，1 萬英鎊以上的有四票。然而，如果不算董事會改選，股東的作用是極小的。股東選舉 12 個董事，同時國王自己任命 6 個；可是國王只能從在印度居住過十年以上的人當中任命這些董事。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董事退出董事會，但是他們可以重新當選或者被任命。要成為董事，應持有 2 000 英鎊的股票。董事的薪俸收入每人为 500 英鎊，而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的薪俸則多一倍；但是使人願意擔任董事职位的，主要是隨之而來的任命印度一切文職和軍職官員的廣泛權利。不過，督察委員會在很大程度上也享有這一權利，最重要职位的任命幾乎完全取決於它。這一委員會由六人組成，他們都是樞密官，通常其中有三兩個是內閣閣員。委員會主席因為必定是閣員，實際上就是印度事務大臣。

其次是通过董事和督察委員會而取得职位任命的人。这些职位分为五类：文職，宗教职务，医職，陸軍職和海軍職。要在印度任职，至少在文職系統，必須知道一些当地語言，并且为了給文職部門培养年輕人，东印度公司在海利貝里設有專門学校。相应的培养軍事部門人員的專門学校則設在倫敦附近的阿迪斯康，但是这个学校主要是教授軍事科学原理。以前进入这些学校是靠董事的情面，但是現在，新的特許狀作出修改之后，入学則經過公开的考試。初到印度的文職官員每月的收入通常約为 150 美元；以后，在他通过一种或数种当地語言的必要考試（这种考試在他到达印度后的十二個月內一定要进行）之后，他即获得領取薪金的职务，薪金數額每年約在 2 500 至 50 000 美元之間。后一数字是孟加拉參

事會成員的薪俸；孟買和馬德拉斯參事會<sup>233</sup>的成員的收入每年約為3萬美元。除了參事會的成員之外，誰也不能領取約25 000美元以上的年俸，並且要領取2萬美元以上的年俸，需要在印度居留十二年。在印度居留九年者，有資格領取15 000至20 000美元的年俸，而居留三年者，有資格領取7 000至15 000美元的年俸。表面上，文職的任命所根據的是年齡和功績，但是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情面。因為文職待遇優厚，所以在想獲得這種職位的人中間競爭很厲害，許多軍官一有可能就為此而脫離軍隊。文職部門的平均薪俸大約為8 000美元，但是其中並不包括各種補貼，而補貼經常是很多的。文職官員可擔任省督、參事、審判官、使節、秘書、收稅官等等；其總人數一般約為800人。印度總督的薪俸為125 000美元，但是補貼往往達到還要更大的數目。擔任教會職務的有3個主教和大約160個牧師。加爾各答的主教每年收入25 000美元；馬德拉斯和孟買的主教每年收入為其二分之一；牧師除了收取儀式費外，每年收入2 500至7 000美元。從事醫職的約有800名內外科醫生，他們每年收入1 500至10 000美元。

在印度服役的歐洲軍官人數，包括應由附屬王公提供的軍隊的軍官，約有8 000人。步兵的薪餉規定為：少尉1 080美元，中尉1 344美元，上尉2 226美元，少校3 810美元，中校5 520美元，上校7 680美元。這是軍隊駐防時的薪餉，在軍事行動時期有所增加。騎兵、炮兵和工程部队的薪餉要高一些。許多軍官進入參謀部或擔任文職系統的工作，其薪餉即增加一倍。

因此，大約有一萬個不列顛臣民在印度占有各種賺錢的職位，並因在這一國家任職而領取薪俸。這裡還應加上一大批在印度工作後回到英國領取退休金的人，退休金是一切部門在一定任職年

限期滿后都应付給的。这些退休金，加上紅利和应在英国偿付的債務的利息，每年要耗費掉来自印度的 1 500 万到 2 000 万美元，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印度臣民向英国政府間接繳納的貢賦。每年离去各种职务的人都要往英国带回极大一笔自己薪俸的存款，这些存款也应加在每年来自印度的总款額之內。

除了在政府任职的欧洲人以外，在印度还住有至少 6 000 个从事貿易和私人投机欧洲人。如果不算农业地区那些为数不多的靛藍、甘蔗和咖啡等的种植园主，那末基本上都是些住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馬德拉斯等城市或这些城市附近地区的商人，經紀人和工厂主。印度的对外貿易（其貿易額进出口約各为 5 000 万美元）几乎完全操在这些人的手里，其利潤无疑是很大的。

因此很显然，个别的人在从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中牟取巨利，他們的利潤当然会增加英国国民財富的总額。但是，应该拿另一笔巨款来与这一切对比一下。由英国人民口袋里支出的花在印度身上的陆軍和海軍費用，随着印度領地的扩展在不断增加。此外，还应该加上緬甸战争<sup>234</sup>、阿富汗战争、中国战争和波斯战争的費用。其实，最近对俄国的战争的一切費用也可以完全算在印度的賬上，因为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是对俄国的恐惧和害怕，而这种恐惧和害怕又完全是由于对俄国在印度方面的計劃的猜疑而产生的。如果再考虑到英国人由于占領印度而被卷入的无止境的征服和連續不断的侵略行动，那末与这一占領有关的开支，总的說来，就有可能达到它無論什么时候也难以补偿的数目。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初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9 月 21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12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印度起義

1857年9月4日于倫敦

起義的西帕依在印度的暴力行為的確是惊心动魄的、可怕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人們通常只有在國內戰爭、民族戰爭、種族戰爭、特別是宗教戰爭中才能見到這種暴力行為；一句話，這是當萬第派用來對付“藍制服”、西班牙游擊隊用來對付不信教的法國人、塞爾維亞人用來對付他們的鄰居德國人和匈牙利人、克羅地亞人用來對付維也納起義者、卡芬雅克的別動隊或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會的會員們用來對付法國無產階級兒女<sup>235</sup>時，曾經一貫為體面的英國所贊賞的暴力行為。不論西帕依的行為多麼不好，它只不過是英國自己在建立其東方帝國時期以及在其長期統治的最近幾十年當中在印度所作所為的集中反映。為了說明這種統治的特點，只需說刑罰是英國財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夠了<sup>①</sup>。人類歷史上存在着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製造報應的工具的，並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

第一次打擊法蘭西君主政體的是貴族而不是農民。印度起義不是由受盡英國人的折磨與屈辱并被劫掠得精光的萊特<sup>229</sup>發動

---

① 見本卷第291—296頁。——編者注

的，而是由那些靠英国人供给吃穿、被英国人一手培育、受到英国人宠幸的西帕依发动的。为了要找一些类似西帕依的暴力行为的例子，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伦敦某些报纸所做的那样，远溯中世纪的历史，或者到现代英国历史范围以外去找寻。我们只要熟悉一下英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的战争，也就是熟悉一下昨天发生的事件就够了。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

即使就目前这次灾难来说，如果认为一切暴行都是西帕依干的，而英国人是至仁至善的体现者，那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英国军官们的来信中充满了恶意。有一个军官从白沙瓦来信，描述了第十非正规军骑兵团由于拒绝执行攻击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命令而被解除武装。他感到欢欣若狂的是这些士兵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剥去衣服和靴子，在每人分得12个辨士后，就被赶往河岸，在那里被装上小船，顺着印度河的下游漂去，并且这位军官喜不自胜地预言道，他们全都将在急流中被淹死。另一个军官告诉我们，一天夜晚，白沙瓦的几个居民为了祝贺一对新婚夫妇而燃放了一些小火药弹（这是当地的民族风俗），结果引起了一场虚惊，第二天早上，和这件事有关的人就被捆了起来，并且“遭到了一顿使他们难忘的毒打”。从品迪来的消息说，有三个土著领袖在组织一个阴谋。约翰·劳伦斯爵士就写了一封回信，命令派一个间谍前去监视他们的会面。约翰爵士接到间谍的汇报后，就发出第二道命令：“处以绞刑。”这几个土著领袖就这样被绞死了。有一个

文官从阿拉哈巴德来信說：“我們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我們敢向您保证，我們絕不饒他們。”另一个文官从同一个地方来信說：“我們沒有一天不吊死 10 个到 15 个人（和平居民）。”一个軍官怀着不可一世的心情写道：“霍姆斯真是好汉，他把他們一批一批地絞死！”另一个軍官在談到把一大批土著居民不經审讯偵察而立即处以絞刑时說道：“于是我們的娱乐开始了。”又有一个軍官写道：“我們騎在馬上进行軍事审判，凡是被我們遇到的黑鬼，我們不是吊死他，就是枪毙他。”从貝拿勒斯来的消息說，有 30 个柴明达尔<sup>236</sup>被絞死，只因为他們有同情自己同胞的嫌疑，由于同样的理由，整个整个的村庄被燒成了灰烬。倫敦“泰晤士报”登載的一个軍官从貝拿勒斯的来信中說：“欧洲士兵在和土人发生冲突时，便成了恶魔。”

我們同样不应当忘記，英国人的殘暴被說成是軍人的英勇行动，并且描述得很簡單，沒有令人作嘔的細节，而本身已經够可怕的土著居民的暴力行为，却还被故意渲染夸大。例如，最初在“泰晤士报”发表、以后又在倫敦所有的报章杂志上轉載过的那篇詳細叙述德里和米拉特的暴力行为的报道，它的作者是谁呢？原来是一个住在离出事地点直綫距离一千多英里的班加罗尔（迈索尔）的胆小的牧师！关于德里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报道证明，一个英国牧师的想像能够比一个印度起义者的狂想造成更大的恐怖。割鼻子，割乳房等等，总之，西帕依的可怕的体刑，比起英軍按照曼彻斯特和平协会会长<sup>①</sup>的指令用燃燒的炮彈轰击广州居民住宅、比起一位法国元帅火燒被困在山洞中的阿拉伯人<sup>237</sup>、比起根据軍事法

① 包令。——編者注

庭的决定用九尾鞭活剥英国士兵的皮或在英国的感化营里采用任何一种“人道的”手段，当然更会引起欧洲人的反感。暴行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也有它的因时因地而异的时尚。学识渊博的凯撒坦率地叙述了他怎样命令部下砍去了几千个高卢军人的右手<sup>238</sup>。拿破仑会认为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他宁愿把他那些有共和主义思想嫌疑的法国团队放逐到圣多明哥岛上去，让他们死于黑人手中或死于流行性病疫。

西帕依的可怕的体刑，使人想起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风俗，或者皇帝查理五世的刑法法规，或者布莱克斯顿法官还描述过的英国对叛国罪犯的惩罚<sup>239</sup>。宗教已使印度人成为自我折磨的能手，因此，在印度人看来，折磨他们民族的和宗教的敌人是十分自然的，对英国人来说，则应该是更自然的，因为就在几年以前，英国人还一直庇护和鼓励札格纳特节日这种残忍宗教的流血仪式，并从中得到收入<sup>240</sup>。

“嗜血的老‘泰晤士报’”（科貝特通常这样称呼它）猖狂地咆哮；它扮演莫扎特歌剧中这样一个残暴人物，他在一段旋律极其优美的独唱中幻想着如何先把敌人绞死，然后把他放在火上烤，然后把他砍成四块，然后再把他穿在铁叉上，最后生剥他的皮<sup>241</sup>；它竭力想煽起复仇的情绪，使之达到疯狂的地步，——要是在悲剧的激情后面没有明显地露出喜剧的把戏，所有这一切可能显得只是很愚蠢罢了。伦敦“泰晤士报”不仅仅是由于恐慌而把角色演得过火。它给喜剧提供了甚至连莫里哀都错过了的新题材，那就是复仇的答尔乔夫。而在实际上，它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颂扬国家公债和庇护政府。既然德里的城墙没有像耶利哥的城市那样仅仅由于空气的震荡而倒塌，那就必须用复仇的号叫来震聩约翰牛的耳朵，

---

使他忘掉他的政府應該對所發生的災難以及使這次災難達到如此巨大的規模負責。

卡·馬克思寫於 1857 年 9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7 年 9 月 16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119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卡·馬克思

### \*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正如我們在几个月以前分析其 1856 年的冠冕堂皇的报告书<sup>①</sup> 时所預見到的那样, 又在走下坡路了。这一次下跌引起了欧洲金融界的严重恐慌。几天之間, 这家康采恩的股票从 950 法郎跌到 850 法郎左右, 而且后面这个数字, 看来还远远不是极限。对于一个政治家來說, 他对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漲跌的兴趣, 并不下于一个地质学家对原生水漲落的兴趣。这个公司股票行情的漲落, 应该划分为几个时期。它第一次发行股票是在 1852 年, 这一次組織得很巧妙。股票分成三組, 而第一組的持有者有权按照票面价值获得第二組和第三組股票。結果, 在证券市场緊張的时期, 由于股票的发行額有限, 而人們又对这家公司的证券抱有很很快就会大大超过票面价值的奢望, 所以第一組股票的幸运持有者便从中得到了全部好处。股票市价馬上就从第一次发行时的每股 250 法郎上漲到 1 775 法郎。在 1852 年、1853 年和 1854 年, 股票行情漲落的政治意义只是次要的, 因为这种漲落所反映的, 与其說是对完全形成了的康采恩的考驗, 还不如說是剛成立的企业所必經的不同阶段。1855 年, Crédit Mobilier 达到了

① 見本卷第 218—227 頁。——編者注

它的极盛时期，它的股票在短时期內就飞漲到 1 900 法郎，这是它同尘世营业相隔的最远距离。此后更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价格的漲落，如果以四个月为平均間隔时期，是在逐渐下降的，这种下降服从于一个固定不变的規律，尽管偶尔有些偏差。这个規律就是，价格从这些时期中的每个时期所达到的最高点下降到平均的最低点，而这个最低点又成了下一个时期的最高的起点。例如，1 400 法郎、1 300 法郎、1 100 法郎这些数字，依次成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最低点和另一个时期的平均最高点。在今年整个夏天，股票已經不能保持在一个較长時間內上漲到 1 000 法郎，而現在的危机，如果不导致更坏的后果，将使股票的平均最高价格，大約降到 800 法郎，然后从这一点下降，經過一些時間，降到更低的平均水平。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 ad infinitum [无止境地] 繼續下去，而且，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降到其票面价額 500 法郎，这同 Crédit Mobilier 的性质本身是不相容的。Crédit Mobilier 的資本額同它的业务規模之間的那种使它得到巨額利潤的相差十分悬殊的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股票市价異乎尋常地高于其原价，——这对 Crédit Mobilier 來說，不是它繁荣的条件，而是它本身存在的条件。我們沒有必要来詳談这一点，因为我們在研究 Crédit Mobilier 的利潤从 1855 年的 40% 减少到 1856 年的 23% 的时候，已經充分說明了①。

目前 Crédit Mobilier 股票的跌价，是和那些会被誤认为是原因而其实只是結果的种种情况有关。在 Crédit Mobilier 最“受人敬重的”董事当中，有一位奧·图尔內桑先生被宣布为破产人，

---

① 見本卷第 218 頁。——編者注

原因是法院认为他应当負責偿还本年 5 月偷偷逃出法国的他的侄子沙尔·图尔内桑先生所欠 1 500 万法郎的債務。个别董事的破产决不能說明 Crédit Mobilier 业务的現狀，这一点，凡是記起普拉斯先生的破产当时絲毫也沒有明显地动摇波拿巴政体的这个支柱的人，都應該是清楚的。但是，社会輿論易于受个别人物突然垮台的影响，却不大去細心观察整个机关的逐漸衰落。群众只有在危險相当大了并且已經感触得到的时候，才会慌張起来。例如，罗的股票和銀行券，只要摄政王<sup>①</sup>和他的顧問們还滿足于銀行券所应当代表的硬币的貶值，它們就繼續在法国得到无限的信任。公众不了解，当造币厂把一个銀馬克<sup>②</sup>鑄造成数目比过去多一倍的利維尔的时候，代表一定数目的銀利維尔的銀行券，就貶值了一半。但是，根据樞密院的命令，这些銀行券的正式票面价值降低了，100 利維尔的銀行券应当兌換 50 利維尔的銀行券，公众这才一下子搞清楚了这个过程，于是肥皂泡就破了。同样，Crédit Mobilier 的利潤差不多下跌了 50%，也是絲毫沒有引起甚至英国金融論文作者的注意，而現在关于奥·图尔内桑先生的破产，整个欧洲的报刊都在大叫大嚷。的确，这一事件使情况愈来愈糟。当今年 5 月，沙尔·图尔内桑先生无力偿还債務的时候，伊薩克·貝列拉先生表現了比他平时更大的高尚的憤懣，在倫敦报刊上郑重否认奥·图尔内桑先生和 Crédit Mobilier 同卑鄙的破产人有任何联系。但是，現在法国法院公布的决定，却彻底駁倒了这位能言善辯的先生的声明。

不仅如此，看来 Crédit Mobilier 本身也是惊慌不安的。它的

① 奥尔良的非力浦。——編者注

② 馬克是銀币的重量单位，等于 8 盎斯(約 240 克)。——編者注



一个董事厄內斯特·安得列先生认为必須公开摆脱自己对将来的任何責任，并且要通过法律手續同这个机关断絕一切关系。別的人（包括奥坦格銀号）也像俗話所說的那樣，在鳴金收兵了。当舵手本人都在急忙上救生艇的时候，乘客有一切根据认为船免不了要沉了。最后，两位图尔內桑先生同圣彼得堡施提格里茨銀号和龐大的俄国铁路計劃之間的密切联系，也会給欧洲金融界提供丰富的思考資料。

如果以为 *Crédit Mobilier* 的董事們肯去“建立法国的信貸制度”，“促进国家的生产力”和支持全世界的有价证券买卖，以为他們去做这一切都是不要代价的，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除去收入（每年平均約为他們的股票所代表的資本額的 25%）以外，他們每一个人在这个机关存在的头五年当中，还定期地从总利潤中分到 5% 的紅利——每人大約 275 000 法郎，等于 55 000 美元。另外，那些享有 *Crédit Mobilier* 的特惠的铁路公司和其他从事公共工程的企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董事們私人的事业有联系。例如，貝列拉兄弟曾經同法国南部铁路的新股票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对誰也不是秘密。現在，我們翻閱公布的报告书时看出，公司总共认购的这些铁路的股票，为数不下 62 300 万法郎。但是，不仅所有这 15 名董事都是按照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办理公司的业务，他們还能够根据他們掌握的关于公司准备进行的大規模 *coups de bourse*〔证券投机〕的材料，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投机买卖，最后，他們还能够按他們正式經手的巨款的比例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信貸。所以，这些董事們发财之快才簡直惊人。所以，欧洲的公众見到这些董事們碰到金融方面的倒霉事情，就十分惊慌。所以，董事們的私人财产和公司的公共信貸才有密切的联系。其实，其中有

---

些人的財產，由它們的占有者保障得非常地好，其寿命无疑会比公司本身还要长。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9 月 26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128 号

## 卡·馬克思

### \*印度起义

昨天从印度收到的消息，描繪了一幅对英国人來說是非常悲慘和險惡的情景，虽然从本报的其他栏里可以看出，我們消息灵通的倫敦記者另有他的看法<sup>242</sup>。关于德里的情况，我們得到截至7月29日为止的詳細消息，并且还得到更新的消息，据說，由于霍乱猖獗，圍攻軍队被迫从德里城下撤退，而在阿格拉駐扎下来。固然，倫敦沒有一家報紙肯证实这个报道，但我們认为，这个报道至多也不过是发表得稍微早一点而已。如同我們从印度的所有通訊中知道的那樣，圍攻軍队由于被圍者在7月14日、18日和23日的出击而遭受到严重的損失。在这几次出击中，起义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奋不顾身，并且由于炮兵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位英国軍官来信写道：“我們用十八磅炮和八吋榴彈炮射击，而叛乱者以二十四磅炮和三十二磅炮还击。”在另一封信里又說：“我們遭到18次出击，伤亡人員达三分之一。”

可望到来的援軍只有范科特兰特將軍率領的一支錫克部队。哈弗洛克將軍在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已被迫退回康波尔而暫時放棄解救勒克瑙的念头。同时，“在德里地区又开始了霪雨季节”，这当然更加强了霍乱的威焰。关于向阿格拉退却以及至少暫時放棄

占领大莫卧儿首都的企图的消息，如果不是已经被证实，那末也一定很快就被证实的。

在恒河綫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哈弗洛克將軍的行动，他在法特普尔、康波尔和比都尔的功績，不出所料地受到了我們倫敦同行們的过分贊揚。像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哈弗洛克由康波尔前进 25 英里后，就不得不又退回該地，不仅是为了把病員留在那里，而且也是为了等待援軍。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遺憾的事实，因为它表明，解救勒克瑙的企图失敗了。这个城市的英国守軍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章格·巴哈杜尔由尼泊尔派去解圍的 3 000 廓尔喀<sup>243</sup> 部队。如果他們不能解圍，那末康波尔的屠杀就会在勒克瑙重演。但是問題还不仅仅如此。起义者一占领勒克瑙要塞并随之巩固他們在奥德的政权，就会从翼側威胁英軍攻打德里的全部行动，并将在貝拿勒斯和整个比哈尔州占优势。如果起义者掌握住勒克瑙要塞，康波尔的重要性就失去了一半，而它同德里以及貝拿勒斯的交通将要受到威胁。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更加深了渴望从这个地方得到消息的焦急心情。勒克瑙守軍在 6 月 16 日认为，他們在餓肚子的情况下可以支持六个星期。到最近一次报告发出的时候为止，六个星期中已經过去五个星期了。現在那里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些据說要去但还不一定去的尼泊尔援軍身上。

如果我們从康波尔沿恒河而下，看一看貝拿勒斯和比哈尔州，那末在这里英国人的前途就更加黯淡了。8 月 3 日从貝拿勒斯寄給“孟加拉日报”<sup>244</sup> 的一封信里說：

“第納普尔的叛乱者越过生河以后，向阿腊前进。欧籍居民自然担心自己的安全，写信請求从第納普尔派遣援軍。結果，派出两艘汽船載运皇家第五、第十和第三十七团的部队前往。深夜，有一艘汽船擱淺，牢牢地陷入泥

中。船上人員匆匆登岸，徒步前進，但卻沒有作應有的戒備。突然他們陷於近距離發射的猛烈的交叉火力之下，在這個不大的隊伍里有 150 人 *hors de combat*（傷亡），其中還有幾名軍官。據估計，阿腊警備區所有的歐洲人，約 47 人，全部被殺。”

阿腊城位於孟加拉管區英屬夏哈巴德州，是從第納普爾到加濟普爾路的一個城市，在第納普爾以西 25 英里，加濟普爾以東 75 英里。甚至貝拿勒斯也受到威脅。這個城市有一個按歐洲式樣構築的堡壘；如果這個城市落到起義者手中，它就會成為第二個德里。在位於貝拿勒斯以南恒河對岸的米爾扎普爾，發現了一起由伊斯蘭教徒組織的密謀；同時在距離加爾各答約 18 英里的恒河上的貝漢普爾，第六十三土著步兵团被解除了武裝。一句話，一面是不滿情緒，一面是驚慌，二者籠罩着整個孟加拉管區，甚至蔓延到加爾各答門。在那裡，人們非常擔心穆哈萊姆<sup>245</sup> 大齋期（在這期間，伊斯蘭教徒狂怒地在街上持刀巡遊，隨時尋衅械鬥）會以對英國人的全面襲擊而告終，並且總督已不得不把自己的親衛隊解除武裝。因此，讀者立刻會明白，英國人沿恒河的主要交通綫現在有受襲擊、被破壞和被切斷的危險。而這就會影響預定在 11 月到來的援軍的運動，孤立英國人在朱木拿河上的作戰綫。

在孟買管區，也出現了很嚴重的局面。孟買第二十七土著步兵团在科拉普爾的起義是事實，而關於起義被英軍鎮壓的消息，只不過是傳聞。孟買土著部隊在那格普爾、奧郎加巴德、海德拉巴，最後在科拉普爾相繼舉行起義。孟買土著部隊人數現有 43 048 人，而在該管區的歐洲部隊實際上只有兩個團。英國人不僅依靠土著部隊來維持孟買管區內的秩序，而且要用他們來增援旁遮普的信德，來編成縱隊向默豪和印多爾進發，以便重新占領這兩個地

方并加以固守，还要利用他们来恢复通往阿格拉的交通线和解救该地的守军。负责这次行动的斯图亚特准将的纵队，由孟买第三欧洲团 300 人、孟买第五土著步兵团 250 人、孟买第二十五土著步兵团 1 000 人、孟买第十九土著步兵团 200 人、海德拉巴部队第三骑兵团 800 人组成。在这支拥有 2 250 名土著兵士的部队中，约有 700 名欧洲兵，他们主要是属于皇家第十六步兵团和皇家第十四轻龙骑兵团的。此外，英国人还在奥郎加巴德编成一支土著兵士纵队，以便威慑坎德什和那格普尔两地有不满情绪的居民，同时支援在中印度行动的机动部队。

我们听说，印度的这一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治安”，但是我们对此种结局不能完全相信。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决定于默豪的占领，而决定于马拉提的两个王公——霍尔卡尔和辛迪亚<sup>246</sup> 采取什么路线。报道斯图亚特到达默豪的同一条快电补充说，虽然霍尔卡尔仍旧可靠，但他的部队已不服从指挥。关于辛迪亚的政治立场，则一字未提。他年纪很轻，颇得人心，富有热情，可以把他当做整个马拉提民族的自然的首脑和领袖。他自己有 1 万人的精锐部队。他脱离英国人，不仅会使英国人失去中印度，而且会给予革命的联盟以很大的力量，使它更加巩固。德里城下军队的退却以及不满者的威胁和要求，可能最后迫使他站到自己的同胞方面来。但是，对霍尔卡尔以及对辛迪亚发生主要影响的是德干高原的马拉提人；在那里，如我们已经报道的<sup>①</sup>，起义最后确实抬头了。也正是在那里，穆哈莱姆斋期特别危险。因此，有一定的理由期待孟买军会普遍起义。从海德拉巴、那格普尔、马尔瓦这些信奉伊斯兰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03 页。——编者注

教最狂热的各州的居民中招募来 60 555 人的馬德拉斯軍，也会立即起来效法。因此，如果考虑到 8、9 两月的雨季将使英軍的运动瘫痪并使他們的交通阻絕，我們就不是沒有理由来这样推断：由欧洲派去的援軍虽然看起来很强大，但将会到得太迟并且要分批到达，因此是很难应付他們当前的任务的。在行将到来的战局中，我們几乎可以期待阿富汗惨剧<sup>247</sup> 的重演。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10 月 3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134 号

## 卡·馬克思

### \*印度起义

昨天“大西洋号”輪船由印度带来的消息有两点很重要，即哈弗洛克將軍前往解救勒克瑙未获成功和英軍仍然坚持呆在德里城下。后一事实只有在英国历史上才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伐耳赫倫远征。到1809年8月中旬，这次远征败局已定，然而英軍还迟迟不肯登船撤退，一直拖延到11月。拿破侖知道英軍在这个地点登陆以后，就决定不去攻打他們，而讓他們死于疾病，因为疾病必定会比大炮使英軍遭受更大的損失，而且不費法国分文。目前大莫臥儿的处境甚至比拿破侖更有利，它既能够以出击加强疾病，而又能够以疾病加强出击。

9月27日由卡利亚里发出的英国政府的公报告訴我們：

“德里方面的最后消息到8月12日为止；这时該城仍在叛軍手中，但不久可望攻城，因为尼科尔森將軍率領的大量援軍距城仅有一日路程。”

如果在威尔逊和尼科尔森用他們現有的兵力进行攻击以前，英軍不能攻占德里，那末德里会坚守到它的城牆自行倒坍时为止<sup>248</sup>。尼科尔森的这支大軍总共約有4000錫克人，这支援軍用以攻击德里未免少得可怜，但是却完全足以造成不从城下撤兵的新的无異于自杀的借口。

当休伊特將軍让米拉特的起义者得以进至德里而犯了錯誤



(从軍事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說是犯了罪)以后,当白白放过最初两个星期而使起义者得以突然夺取該城以后,計劃圍攻德里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大錯。我們以为甚至比倫敦“泰晤士报”的軍事預言家还高明的一位权威,即拿破侖,曾制定了两条看来差不多是老生常談的作战原則: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做最有胜利把握的事情”;第二,“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在制訂圍攻德里的計劃时,就違反了这两条起碼的原則。英軍当局应当知道,印度政府自己不久以前曾整修过德里的防御工事,因此只有用正規圍攻才能夺取該城,而这就需要一支至少有 15 000 人至 20 000 人的圍攻部队,如果防御以通常应有的方式进行,所需兵力还要多得多。既然为了完成这一計劃需要 15 000 人到 20 000 人,那末凭着 6 000 人或 7 000 人就干起来,簡直是愚蠢的。此外,英国人也知道:由于英軍兵力薄弱,圍攻必然要拖延很久,而这就要使他們的軍隊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和这样的季节里受到一个不可伤害的而又无形的敌人的襲击,这个敌人将在他們的队伍里散播死亡的种子。因此,圍攻德里是毫无胜利希望的。

至于战争的目的,那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持英国在印度的統治。对于达到这个目的來說,德里根本沒有任何战略意义。固然历史的傳統使它在土著居民的心目中具有一种与其实际意义相左的迷信的意义,起义的西帕依单凭这点就要選擇它作为他們总的集合地。但是,如果英国人不从土著居民的偏見出发来制訂自己的軍事計劃,而置德里于不顾,并把它孤立起来,他們就能使德里失去那臆想出来的意义。現在英軍把营盘扎在德里城下,用自己的脑袋往城墙上撞,把自己的主要兵力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使自己甚至沒有撤退的可能,或者更正确地說,使这

样一种撤退带有大败的意义。这样，他们简直是给起义者帮了忙，因为起义者正是要使德里成为战局的中心。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英国人不必绞多少脑汁就能够看到：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积极行动的野战军，通过它的行动就可以扑灭不满情绪的火花，维持各地警备部队之间的交通，驱使敌人后退到少数的几个地点并孤立德里。但是，他们不按照这个既简单而又明了的计划行事，反而把他们手中仅有的作战部队集中在德里城下，胶着不动；他们把平原旷野留给起义者，而他们自己的警备部队却占领着一些分散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相隔很远的地点，并且这些地点被能够从容行动的、占压倒优势的敌军封锁着。

英国人让自己主要的机动部队胶着在德里城下，结果并没有箝制住起义者，而只是束缚住了自己驻在各地的警备部队的行动。但是，除了在德里的这一主要错误以外，这些警备部队部署军事行动的愚蠢，也是很难在军事史上找到任何先例的：它们独立行动，各不相顾，根本没有最高的指挥，它们不像是一支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像是属于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国家部队。就以康波尔和勒克瑙的例子来说吧。这是两个相邻的地方，有两支单独的部队驻守，数量都很少而且不足以应付局势，各有自己的指挥；虽然它们相距仅 40 英里，但是行动上却丝毫不相配合，简直像位于南北两极似的。按照最普通的战略原则的要求，康波尔驻军司令休·威勒尔爵士应该有权把奥德首席专员亨·劳伦斯爵士连同他的部队调回康波尔，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暂时放弃勒克瑙。这样做，两支警备部队就都能得救，接着哈弗洛克的部队与他们会合，这样就能够建立一支人数虽不多，但却足以控制奥德和解救阿格拉的部队。但是他们不这样做，由于两地各行其是，康波尔的警备

部队已被消灭，勒克瑙的警备部队也必将连同要塞一起落入起义者之手，甚至哈弗洛克做出惊人的努力，率领他的部队在八天内走完 126 英里，同时经受住了相当于行军日数那样多次数的战斗，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印度夏季盛暑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甚至像这样英勇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哈弗洛克由于徒劳无益地试图援救勒克瑙已使自己精疲力竭的部队更加疲惫，同时他还不得不由康波尔出兵，在不断缩短的半径上作反复的出征，从而遭受新的无谓的折损，这样一来，他很可能最后不得不带着所剩无几的部队退往阿拉哈巴德。这支部队的行动再好不过地表明了：甚至德里城下的一支小小的英国部队，若不是关在疫病流行的兵营里，而是集中起来用于野战，那它可以做出些什么来。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但英军在印度作战的计划却是分散兵力。他们应当做的是，尽量缩减警备部队的人数，使他们立刻摆脱妇孺的拖累，撤出所有没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从而集结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野战。而现在，甚至为数极少的、由加尔各答沿恒河而上的增援部队，也完全为许多孤立的警备部队所吸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到达阿拉哈巴德。

至于勒克瑙，上次邮件所引起的那种最黯淡的预测<sup>①</sup>，现在被证实了。哈弗洛克又被迫返回康波尔；靠尼泊尔盟军解救勒克瑙已不可能；因此我们现在只好等待这个城市由于饥饿而被攻陷以及它的英勇守军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杀戮的消息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0 月 1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42 号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19 页。——编者注

## 卡·馬克思 \*印度起義

倫敦的報紙在討論印度起義的目前形勢時，充滿了它們從最初就懷有的那種樂觀情緒<sup>249</sup>。它們不但告訴我們對德里的攻擊已獲勝利，而且告訴我們這是發生在8月20日。當然，首先必須明確的一件事就是圍攻軍隊的現有人數。一位炮兵軍官在8月13日由德里城下的兵營寄來一封信，說明到8月10日為止英國軍隊實有兵力的詳情如下：

	英國軍官人數	英國士兵人數	土著軍官人數	土著士兵人數	馬 匹
司令部.....	30	—	—	—	—
炮 兵.....	39	598	—	—	—
工 兵.....	26	39	—	—	—
騎 兵.....	18	570	—	—	520
<b>第 一 旅</b>					
皇家第七十五團.....	16	502	—	—	—
東印度公司火槍兵第一團.....	17	487	—	—	—
庫馬昂營.....	4	—	13	435	—
<b>第 二 旅</b>					
皇家獵兵第六十團.....	15	251	—	—	—
東印度公司火槍兵第二團.....	20	493	—	—	—
帖木兒營.....	4	—	9	319	—
<b>第 三 旅</b>					
皇家第八團.....	15	153	—	—	—
皇家第六十一團.....	12	249	—	—	—
錫克第四團.....	4	—	4	365	—
向导隊.....	4	—	4	196	—
庫克隊.....	5	—	16	709	—
共 計.....	229	3 342	46	2 024	520

由此看来，英軍在德里城下兵营内实有的全部兵力截至8月10日是5641人。我們还得从这个数目中减去120人（112名士兵和8名軍官），因为根据英国的报道，他們在8月12日攻打起义者在城外英軍左前方新設的炮台时已陣亡。因此，到尼科尔森准将率部与圍攻軍会合前，战斗人員只有5529<sup>①</sup>人。尼科尔森是从菲罗兹普尔率領下列部队护送一个二級攻城炮兵纵列前来的：輕步兵第五十二团（約900人），第六十一团一部（約4个連，360人），鮑切尔野炮連，旁遮普第六团一部（約540人）以及木尔坦的一些騎兵和步兵——共約2000人，其中有1200多名欧洲兵。这样，在尼科尔森部队到来时駐在营地的5529人再加上这些兵力，总数为7529人。据称，旁遮普省督約翰·勞倫斯爵士又派来了援軍，包括步兵第八团的余部，第二十四团的3个連，并携有自白沙瓦开来的佩頓上尉部队的騎炮兵的3門火炮，旁遮普步兵第二团和第四团以及旁遮普第六团的另一部。但是这支部队，估計人数最多有3000人，而且大部分都是錫克人，現在还没有到来。如果讀者还記得大約一个月以前曾在張伯倫指揮下由旁遮普开来了援軍<sup>②</sup>，你們就会明白，正像那支援軍当时只足以把里德將軍的部队补足到它在亨·巴納德爵士指揮时的原数一样，新的援軍也只能把威尔逊准将的部队补足到它在里德將軍指揮时的原数。对于英軍唯一现实的援助就是攻城炮兵纵列終於到来。但是即使所期待的3000人到达兵营，而且英軍总数达到1万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的忠誠都十分值得怀疑），那时又将怎样呢？据说，他們要把德里包圍起来。但是，姑且不論企图用1万人包圍这个設防坚固

① 馬克思的計算中有差誤，應該是5521人。——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298頁。——編者注

的、城墙长达7英里以上的城市是多么可笑，英軍只有先使朱木拿河改道，才能考虑包围德里的事情。不然英軍早上进入德里，起义者就能在晚間离开它，或者渡过朱木拿河向罗希尔汗和奥德进发，或者順朱木拿河而下，朝穆特拉和阿格拉方向前进。不管怎样，如果一个四边形地区有一边为圍攻軍所不能接近，但却給被圍者准备了一条交通綫和退路，那末如何包围这种地方，在目前还是一个尙未解决的問題。

給我們提供上面那張表格的那位軍官說：“大家一致认为，用强攻夺取德里是談不上的。”

同时他告訴我們，在兵营里真正指望的是“对城市連續炮击几天，在城牆上打出一个足够大的缺口来”。可是这个軍官又补充說：

“根据适中的估計，敌人現在已經集結了将近4万人，而且有无数門运用得很好的火炮；他們的步兵也是勇武善战的。”

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徒在据守城池时通常所表現的那种拚死頑抗的精神，那末，人数不多的英国軍隊通过“一个足够大的缺口”闖入城內以后，是否能再从这个缺口闖出来，就大成問題了。

事实上，英軍要以現有兵力攻打德里而获得成功，只有一綫希望，那就是起义者发生內訌，彈药耗尽，士气沮丧，对自己力量失掉信心。但是我們必須承认，他們自7月31日到8月12日連續不断地进行的战斗，看来很难证实这种假定。同时，加尔各答的一封信明白地告訴了我們，英国將軍为什么違反一切作战原則决心留在德里城下。

来信中这样写道：“几星期前曾发生过我們的部队是否应当从德里城下撤走的問題，因為他們每日战斗，弄得疲憊不堪，不能再支持难以忍受的疲

勞。但是這種想法遭到約翰·勞倫斯爵士的堅決反對。他明白地告訴那些將軍們，他們的退却將是使周圍的居民起來暴動的信號，而這一定會立即使他們陷於危急的處境。這個意見占了上風，約翰·勞倫斯爵士並答應把他所能搜羅的一切援軍派來。”

約翰·勞倫斯爵士既把旁遮普的部隊完全調空，旁遮普現在也可能爆發起義，而這時德里城下兵營中的士兵很可能由於雨季末期從地面散發出的瘴氣而病倒和成批地死亡。范科特蘭特將軍的部隊，據四個星期前的報道，已到達喜薩爾並繼續向德里推進<sup>①</sup>，但以後再也沒有聽到關於他們的消息。顯然，他們不是在途中遇到什麼嚴重的阻礙，便是半路上被解散了。

英國人在恒河上游的處境實際上是萬分危急的。哈弗洛克將軍受到奧德起義者的行動的威脅，他們從勒克瑙取道比都爾前進，並企圖在康波爾以南的法特普爾附近切斷哈弗洛克的退路；同時瓜廖爾的隊伍從朱木拿河右岸的一座城市卡耳皮向康波爾運動。這個分進合擊的運動可能是由據說掌握着勒克瑙的最高指揮權的納那·薩希布指揮的，這個運動第一次顯示出起義者具有某些戰略觀念，而英國人則似乎只是一味吹噓自己愚蠢的離心戰法。例如，我們聽說，從加爾各答派來增援哈弗洛克將軍的步兵第九十團和火槍兵第五團，在第納普爾被詹姆斯·烏特勒姆爵士截留，他打算把他們經由法扎巴德帶到勒克瑙去。倫敦“晨報”稱頌這個作戰計劃，認為這一着很高明，因為據說這樣勒克瑙就將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右面受康波爾的威脅，左面受法扎巴德的威脅。根據一般的作戰原則，兵力遠居劣勢的軍隊如果不設法集中自己分散的隊

<sup>①</sup> 見本卷第300—301頁。——編者注

伍，反而自行分为两部，中间为敌军整个隔开，那末这只能使敌人毫不费劲地就把他们消灭掉。实际上，就哈弗洛克将军来说，问题已不在于援救勒克瑙，而在于援救他自己和尼耳将军的少数部队的残部。很可能，他必须退到阿拉哈巴德。阿拉哈巴德位于恒河和朱木拿河汇合处，是这两河之间的达普<sup>250</sup>的锁钥，的确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阵地。

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企图收复西北各省的英军的主要作战线是沿着恒河下游流域的。因此，第纳普尔、贝拿勒斯、米尔扎普尔的阵地，尤其是必定成为真正作战行动起点的阿拉哈巴德阵地，应当予以加强，就是说应当把孟加拉省本部的所有较小而在战略上又无关紧要的地点的警备部队都集中到那些地方。目前这一主要作战线本身也处于严重威胁之下，这可以从一封由孟买寄给伦敦“每日新闻”的信里的如下一段话看出来：

“不久以前第纳普尔三个团哗变，截断了阿拉哈巴德与加尔各答之间的交通（河上的轮船来往除外）。这次哗变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中最为严重者，因为距加尔各答不到 200 英里的整个比哈尔州现已暴乱蜂起。今日消息称，桑塔尔人<sup>251</sup>又起暴乱，有 15 万嗜血和劫掠成性的野人在孟加拉横行，情况的确会骇人听闻。”

只要阿格拉还能坚守，对于孟买军来说，次要作战线就是通过印多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的道路，而对于马德拉斯军来说，次要作战线就是通过萨加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的道路，旁遮普军以及占领阿拉哈巴德的部队则必须恢复他们与阿格拉的交通。但是，如果动摇不定的中印度各王公公开起来反对英国，同时孟买军内部的起义变得严重起来，那末对目前军事行动的一切估计就都要落空了，那时除了从克什米尔到科摩林角整个国土上发生大规模的



屠杀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确切预言了。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把决定性的事件推延到 11 月，即欧洲军队开来的时候。甚至这一点是否能够办到，也还要看科林·坎伯尔爵士的才干。关于他，除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以外，我们迄今一无所知。如果他是一个称职的人，那末他就会不惜任何代价，不管德里攻陷与否，成立一支人数虽不多但却有战斗力的军队来进行野战。可是我们仍然必须再说一遍：问题最终取决于孟买军队。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10 月 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0 月 2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51 号

## 卡·馬克思 \*印度起义

“阿拉伯号”輪船的邮件給我們带来了关于德里陷落的重要消息。根据我們手中的貧乏材料所能判断的，这个事件看来是下述情况同时出現的結果：起义者中間发生了尖銳的內訌，交战双方軍隊数量对比起了变化，以及早在6月8日就期待到达的攻城炮兵纵列已于9月5日开到。

在尼科尔森指揮下的援軍到达之后，我們曾估計德里城下軍隊的总数为7 529人<sup>①</sup>。我們的計算現在完全证实了。后来，在克什米尔部队的3 000人由拉扎朗比尔·辛格轉交英軍指揮而并入英軍以后，据“印度之友”<sup>252</sup>称，英軍共达11 000人左右。另一方面，倫敦“軍事旁观者”<sup>253</sup>断言，起义者的軍隊約减少到17 000人，其中包括5 000名騎兵，而“印度之友”則把他們的兵力計算为13 000人左右，包括1 000名非正規騎兵。由于在城牆被打开缺口和城內战斗开始以后，騎兵便完全无用，所以一当英軍突入城中，騎兵就棄城而逃。因此，無論根据“軍事旁观者”的計算，或者根据“印度之友”的計算，西帕依全部兵力不可能超过11 000人或12 000人。由此看来，英軍兵力几乎与起义者的兵力相等，但这与

<sup>①</sup> 見本卷第327—328頁。——編者注

其說是由于前者增加了兵力，不如說是由于后者减少了兵力。英軍在数量上略居劣勢，但这却由于对城市的有效炮击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效果和进攻的有利条件，而得到綽綽有余的补偿，因为进攻者可以选择主攻地点，而防守者則不得不把他們不足的兵力分散在周圍所有受到威胁的地点。

起义者兵力的减少，与其說是由于大約十天以来不断出击所遭到的严重損失，远不如說是由于內訌使整批部队走散。不用說，幽灵似的莫臥儿本人同德里城的商人一样，都对于把他們积蓄的錢財搶劫一空的西帕依的統治感到十分不滿，就是西帕依內部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間的宗教分歧以及原守城部队和新增援部队之間的不和，已足以瓦解他們松弛的組織，使他們必然遭到失敗。尽管如此，英軍仍然不得不与只在数量上比他們稍占优势，但无統一指揮而又为內訌所削弱和沮丧的敌人作战，而这个敌人在受了八十四个小时的炮击后，仍然經受住了整整六天的轰击和城內的巷战，然后从容地由舟桥渡过朱木拿河。所以必須承认，起义者总算以他們的主力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做到了所能做到的一切。

攻占城市的經過看来是这样的：9月8日，英軍把他們的炮队配置在离部队原陣地前面很远、距城牆700碼的地方。在8日和11日之間，英軍的重炮和臼炮推进得更接近防御工事。考虑到德里守軍在10日和11日曾作了两次出击，再三企图配置新炮队，并由散兵壕內用步枪不断进行扰乱性的射击，那末英軍把他們的炮队配置在預先准备好的陣地上，所受的損失是很小的。12日英軍死伤約56人。13日晨，敌人的一个棱堡上的重要彈药室以及由郊区塔耳瓦腊纵射英軍炮台的一門輕炮的彈药箱被炸毀

了，同时英军炮台在克什米尔門附近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可以通行的缺口。14日攻城，军队未遇严重抵抗就由克什米尔門附近的缺口突入城中，占领了邻近的大建筑物，并沿城墙向摩里棱堡和喀布尔門前进。在这里，敌人的抵抗变得十分顽强，英军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失。英军准备利用已被占据的棱堡上的火炮轉而对付城市，并另运一批火炮和臼炮到制高点去。15日，英军开始用在摩里棱堡和喀布尔棱堡繳获的火炮轰击伯恩棱堡和拉合尔棱堡，同时还在軍械庫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且开始轰击王宮。軍械庫在9月16日拂曉被攻下，17日臼炮从軍械庫圍墙后面繼續轰击王宮。

从这一天起，关于攻城的官方消息就断絕了；据“孟买信使报”<sup>254</sup>說，这是由于旁遮普和拉合尔的邮件在信德边境被劫。在給孟买省督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說，星期日即20日整个德里城被占领，起义者的主力在該日早晨3时放棄城市，經舟桥过河，朝罗希尔汗方向退走。由于英军在占领位于河岸的塞林加尔以前是不可能进行追击的，所以起义者显然由城市的极北端向东南端慢慢地打开一条退路，把掩护退却所需要的陣地扼守到20日。

至于攻占德里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一家权威报纸即“印度之友”指出：

“英国人現在应当注意的不是德里的情况，而是孟加拉的形势。迟迟攻占德里已确实使我們完全丧失了如能早日成功即可取得的威信；而叛军的力量和人数，正如由于繼續圍困而减少一样，会由于城市被攻占而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据說，起义正由加尔各答向东北扩展，并且經過中印度向西北扩展。在阿薩姆边境上，有两个强大的普尔

比<sup>①</sup>团起义，公开提出要恢复前拉扎帕兰杜尔·辛格的王位。第納普尔和朗格普尔的起义者在庫埃爾·辛格的领导下經由班达和納哥德向賈巴耳普尔进发，并且雷瓦拉扎在自己军队的压力下也与他們会合了。就在賈巴耳普尔，孟加拉軍第五十二土著团离开了自己的駐地，并带走一名英国軍官作为他們留下未走的伙伴的人质。据报道，瓜廖尔起义者已渡过昌巴耳河，駐扎在該河和多耳普尔之間的某地。現在还得把所有的报道中最严重的几項指出来。原来，周德普尔軍团投到在貝阿伐尔西南 90 英里的阿瓦赫起义的拉扎那方面去了。这个軍团打败了周德普尔拉扎派来征討它的大批兵力，同时还打死了他們的一个將軍和蒙克·梅森上尉，并繳获了火炮三門。乔·圣帕·劳倫斯將軍率領了一部分納西腊巴德部队向他們进攻，逼使他們退入一座城中，但是劳倫斯想夺取这座城市的企图并没有成功。由于駐在該地的欧洲部队撤出信德，那里就发生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密謀，至少有五个地方，其中包括海德拉巴、卡拉奇和希卡普尔，曾經试图起义。在旁遮普也有不滿情緒的征兆，在那里木尔坦和拉合尔之間的交通曾中斷了八天。

在本报另一处，我們的讀者可以看到 6 月 18 日以来由英国派出的部队的統計表<sup>255</sup>；各有关船只开到的日期，是我們根据官方材料計算出来的，因而这种算法是对英国政府有利的。从这个統計表中可以看出：除經由陆路派去的少数炮兵和工兵部队外，乘船的部队共計 30 899 人，其中步兵 24 884 人，騎兵 3 826 人，炮兵 2 334 人。从表中还可看出：10 月底以前不会有大量援軍开到。

① 普尔比——原意是东部的，这里指的是东孟加拉的两个团。——編者注

## 派往印度的部队

下表所列为自 1857 年 6 月 18 日起从英国派赴印度的部队

到达日期	合 计	加尔各答	锡兰	孟买	卡拉奇	馬德拉斯
9 月 20 日 .....	214	214	—	—	—	—
10 月 1 日 .....	300	300	—	—	—	—
10 月 15 日 .....	1 906	124	1 782	—	—	—
10 月 17 日 .....	288	288	—	—	—	—
10 月 20 日 .....	4 235	3 845	390	—	—	—
10 月 30 日 .....	2 028	479	1 544	—	—	—
10 月份小計 ...	8 757	5 036	3 721	—	—	—
11 月 1 日 .....	3 495	1 234	1 629	—	632	—
11 月 5 日 .....	879	879	—	—	—	—
11 月 10 日 .....	2 700	904	340	400	1 056	—
11 月 12 日 .....	1 633	1 633	—	—	—	—
11 月 15 日 .....	2 610	2 132	478	—	—	—
11 月 19 日 .....	234	—	—	—	234	—
11 月 20 日 .....	1 216	—	278	938	—	—
11 月 24 日 .....	406	—	406	—	—	—
11 月 25 日 .....	1 276	—	—	—	—	1 276
11 月 30 日 .....	666	—	462	204	—	—
11 月份小計 ...	15 115	6 782	3 593	1 542	1 922	1 276
12 月 1 日 .....	354	—	—	354	—	—
12 月 5 日 .....	459	—	—	201	—	258
12 月 10 日 .....	1 758	—	607	—	1 151	—
12 月 14 日 .....	1 057	—	—	1 057	—	—
12 月 15 日 .....	948	—	—	647	301	—
12 月 20 日 .....	693	185	—	300	208	—
12 月 25 日 .....	624	—	—	—	624	—
12 月份小計 ...	5 893	1 851	607	2 359	2 284	258

(續)

到达日期	合 計	加尔各答	錫兰	孟买	卡拉奇	馬德拉斯
1月1日 .....	340	—	—	340	—	—
1月5日 .....	220	—	—	—	—	220
1月15日 .....	140	—	—	—	—	140
1月20日 .....	220	—	—	—	—	220
1月份小計 ...	920	—	—	340	—	580
9月至1月20日 ...	30 899	12 217	7 921	4 431	4 206	2 114
<b>由陆路派去的部队</b>						
10月2日 .....	工兵 235 名	117	—	—	118	—
10月12日 .....	炮兵 221 名	221	—	—	—	—
10月14日 .....	工兵 244 名	122	—	—	122	—
10月份小計 ...	700	460	—	—	240	—
合 計.....31 599						
繞道好望角前去的以及部分已經到达的部队..... 4 000						
总 計.....35 599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10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11 月 14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170 号

---

---

卡·馬克思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銀行法  
和英国的金融危机

本月5日，英格兰銀行把它的最低貼現率从10月19日确定的8%提高到了9%。我們想，英格兰銀行从恢复現金支付以来向无先例的这种提高，还没有达到极限。这是由于黄金和白銀的外流以及所謂銀行券后备的减少而引起的。黄金和白銀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外流：黄金流入本国<sup>①</sup>，因为我們这里倒閉了一些銀行；而白銀流往东方，因为减少了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貿易，并且政府需要直接給东印度公司汇款。英国为了换取这些用途所必需的白銀，不得不把黄金送往欧洲大陆。

至于談到銀行券后备以及它在倫敦金融市場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須簡短地提一提罗伯特·皮尔爵士于1844年实行的英格兰銀行法，這項法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市場都有影响。得到銀行家劳埃德（即如今的奧維尔斯頓勳爵）以及其他許多重要人物撑腰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打算通过他的銀行法来实现一个紙币流通的自动起作用的原則。按照这条原則，紙币流通今后應該完全循着純粹金屬貨幣流通的規律而增加和縮減；这样

---

<sup>①</sup> 美国。——編者注



一来,按照罗伯特·皮尔及其拥护者的說法,就永远消除了发生任何金融危机的可能。英格兰銀行分为两个部:发行部和銀行部,并且前者只是一个印制銀行券的工厂,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銀行。发行部依法有权发行銀行券 1 400 万英鎊;这个数目被认为是实际流通額永远不会低于它的极限,并且这个数目有英国政府对英格兰銀行的債務作为保证。对于在这 1 400 万以外发行的全部銀行券,发行部必須在金庫中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和白銀作为保证。受到这种限制的全部銀行券交由銀行部投入流通。因此,如果发行部的金庫里有 1 000 万英鎊的黄金和白銀儲备,它就可以发行并且交給銀行部 2 400 万銀行券。如果实际上在流通中只有 2 000 万,那末保存在銀行部錢柜里的其余 400 万就是它的銀行券后备,其实这也就是那些私人和国家交托給銀行部的存款的唯一保证。

現在假定說,黄金和白銀开始外流,从发行部几次提出了共值 400 万的一定数量的貴金屬,例如黄金。这时 400 万的銀行券就要作廢;这会使发行部发行的銀行券完全等于流通中的銀行券,而銀行部錢柜里的銀行券后备則化为烏有。換句話說,銀行部就沒有分文来滿足存戶的要求,因而只好宣布自己无力支付。这会严重影响公共团体和私人的存款,結果不得不停止支付国家有息証券持有人应得的季度紅利。这样一来,銀行部就可能弄到破产,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庫里还保存着 600 万貴金屬。这不仅仅是一个假定。在 1847 年 10 月 30 日,銀行部的后备减少到 160 万英鎊,而存款为 1 300 万英鎊。这种危急的情况只有靠政府实行財政 coup d'état<sup>①</sup>才緩和了下来,如果它再延續几天,英格兰銀行的后备就

<sup>①</sup> 直譯是:政变;这里是:改革、变革。——編者注

会告罄，銀行部就不得不停止支付，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庫里还存有600万英鎊以上的黄金。

因此，很显然，黄金外流和銀行券后备减少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从发行部的金庫里提出黄金会直接造成銀行部的后备减少，英格兰銀行的董事們惟恐銀行部弄得无支付能力，便压缩信用，提高貼現率。但是，貼現率的提高，引起一部分存戶从銀行部提走存款来按当时的高利放債，而后备的不断减少，又使另一部分存戶感到惴惴不安，使他們也从銀行部提走存款。这样，本来为了維持后备而采取的措施，使后备丧失无余。讀者在看到这种解釋之后一定会了解，在英国，人們怀着怎样的焦急心情注視英格兰銀行后备减少的情况，以及最近一期倫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金融論文犯了什么样的巨大錯誤。这篇文章中說道：

“那些一向反对銀行法的人又动起来了，而且現在对什么都不能穩有把握。他們制造恐慌的慣用手法之一，就是推說不处在流通中的銀行券后备减少了，似乎这种后备一旦耗尽，英格兰銀行就不得不完全停止貼現。”（按照現行法律，它在破产时事实上只有这样做。）“其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銀行也能够繼續貼現而不縮小規模，因为它每天收进的期票当然平均总是跟它通常該付出的数量一样的。要它扩大业务是不可能的，但是很难設想在目前到处紧縮业务的情况下，会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要政府采取弥补措施是毫无理由的。”

制造这个論据的手法，就是故意忽視存戶。不必多費脑筋就会明白，如果銀行部一旦对自己的債权人宣布破产，它就不能再以借貸或者期票貼現的方式向債務人支付貸款了。簡單地說，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备受推崇的銀行法在平时根本不起作用；在困难时期則使金融恐慌加剧（这种金融恐慌是由商业危机以及这个法律本身造成的金融恐慌所引起的）；而正当这项法律按照它所依据

的原則應該發生良好影響的時候，不得不通過政府的干預使它暫時停止生效。在平時，英格蘭銀行依法有權發行的最大數額的銀行券，從來沒有完全進入流通過程，——這是由銀行部的錢櫃在這種時期總是存有銀行券後備所充分證明了的事實。只要把英格蘭銀行從 1847 年至 1857 年的公報對比一下，或者甚至把 1819 年到 1847 年銀行券的實際流通量同法定的最高流通量比較一下，就能證實這種情況。在困難時期，例如在 1847 年和今年，由於英格蘭銀行被任意地截然劃分為兩個部，金銀外流的後果就人為地加劇，利率的提高就人為地加快，英格蘭銀行也就由於它的一個部表面上無支付能力（不是由於銀行真的無支付能力）而有破產的危險。

當真正的金融困難這樣被人為的恐慌加劇以及當它造成大量犧牲的時候，政府往往受不住輿論的壓力，而使這項法律恰好在本來需要它來應付局面、而且它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起某些作用的時期停止生效。例如，1847 年 10 月 23 日，倫敦的大銀行家曾前往唐寧街求援，即要求停止實行皮爾的銀行法。由於他們的要求，約翰·羅素勛爵和查理·伍德爵士給英格蘭銀行經理和副經理去了一封信，建議他們增加銀行券的發行，從而提高法定的貨幣最大流通量；同時他們承擔起破壞 1844 年銀行法的責任，並且聲明他們準備在議會一召開會議時就提出一項保證這次違法行為免受懲罰的法案。現在，當事態發展到像 1847 年 10 月 23 日之前那個星期的樣子（當時似乎有完全停止全部業務和一切支付的危險），這出滑稽戲又將重演。可見，皮爾的銀行法的唯一優點就是：它使全國人民完全依賴於貴族政府——依賴於某一個亡命之徒（例如帕麥斯頓）的喜好。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閣員們那樣偏愛 1844 年的

法律，——它使他們得到了他們从未享有过的对私人資本的权威。

我們之所以这样詳細地論述皮尔的銀行法，是因为它現在对本国<sup>①</sup>发生影响，并且还因为它在英国可能要停止生效；但是，如果英国政府有力量把它亲自加在英国人民肩上的經濟困难的重担卸去，我們就以为，我們将在倫敦金融市場上看到的現象——金融恐慌的产生和終結——会成为衡量英国貿易界行将經受的危机的强度的真正寒暑表，那就是最大的錯誤。政府在这种危机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当美国发生危机的初步消息傳到英国的时候，英国的經濟学家就提出了一种即使不是很巧妙至少也是很新穎的理論。他們断言，英国的貿易很健康，只可惜它的买主，尤其是美国佬不健康。只有一方面是健康的健康貿易——真亏英国經濟学家想得出来！看一看英国貿易部最近发表的 1857 年上半年的报告书，你就会看到，在英国出口的全部原料和工业品当中，有 30% 运往美国，11% 运往东印度，10% 运往澳大利亚。如今，美国市場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不能接受英国貨，最近两年本来就已存貨过多的印度市場，由于爆发起义而大大縮小了，而澳大利亚市場存貨过剩到如此地步，以致各种英国貨在阿得雷德、悉尼、墨尔本比在倫敦、曼彻斯特或格拉斯哥还要卖得便宜。那些由于突然失去买主而宣告破产的英国工厂主的“健康”状况，可由两个例子来判断。在格拉斯哥一家花布印染厂厂主的債权人會議上，发现这个厂主負債达 116 000 英鎊，而資產尚不足 7 000 英鎊。同样，格拉斯哥的一个船主，全部資產不过 789 英鎊，而应当偿还的債務却达 11 800 英鎊。但是，

---

① 美国。——編者注

这还只是—些个别现象；重要的是：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而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全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震荡。美国 1837—1839 年的危机，使英国的出口额从 1836 年的 12 425 601 英镑缩减到 1837 年的 4 695 225 英镑，在 1838 年缩减到 7 585 760 英镑，在 1842 年缩减到 3 562 000 英镑。类似这样的瘫痪现象在英国也已经开始了。它无疑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1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7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英国貿易的震蕩<sup>256</sup>

英国貿易的大震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有三种明显的形式：倫敦和利物浦的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困窘，苏格兰的銀行業恐慌，工厂区的工业衰落。关于这方面的事实，在我們星期五的報紙上已經以大量英国報紙摘要的形式，作了詳細的叙述。但是它們的重要意义和可能发生的后果，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說明。

虽然，正像我們在以前一篇文章中所預料的那樣<sup>①</sup>，政府終於被迫停止了 1844 年銀行法的效力，然而政府在做出这种处理之前，英格兰銀行为了挽救自己已經大胆地使它的許多主顾吃尽了苦头。但是，終於在 11 月 11 日晚上，英格兰銀行的首脑人物举行了一次軍事會議，决定向政府求援；他們所得到的回答就是暫時停止上述法律各項条款的效力。政府的這項命令将立刻提交給应该在月底开会的議會去批准。如我們早已指出的，停止這項法律的效力，必然会使目前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緩和。这样做就消除了銀行法在金融市場于貿易動蕩时期自然产生的貨幣緊張現象之外所引起的人为的緊張現象<sup>257</sup>。

在目前这次危机中，英格兰銀行妄想挽狂瀾于既倒，曾五次

---

① 見本卷第 343 頁。——編者注

提高它的貼現率。10月8日，貼現率被提高到6%，12日提高到7%，22日提高到8%，11月5日提高到9%，9日提高到10%。这样迅速的变动，与1847年危机时的那种变动相比，真是一个惊人的对照。当时最低貼現率在4月提高到5%，在7月提高到5 $\frac{1}{2}$ %，在10月23日才提高到最高点即8%。此后它就一直下降，在11月20日降到7%，在12月4日降到6%，在12月25日降到5%。此后的五年是貼現率不断下降的时期，它下降得如此匀称，就仿佛是按照計算尺的指示进行的一样。这样，在1852年6月26日，它达到了最低点，即2%。从1852年到1857年这五年又出现了相反的变动。1853年1月8日的貼現率是2 $\frac{1}{2}$ %，1853年10月1日是5%，从此以后，經過連續多次的变化，它终于达到目前这样的高度。迄今为止，过去十年中利率的上下波动，只是現代貿易的各周期性阶段所常有的現象。簡單地說，这些阶段就是：在恐慌时期信貸完全收縮；然后逐漸扩大，在利率降到最低点的时候，这种扩大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那时又开始相反的变动，即逐漸收縮，在利率漲到最高点并且又开始恐慌时期的时候，这种收縮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但是，只要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就可以在目前这个时期的后半段中發現一些根本不同于以往各个时期的現象。在1844年到1847年的繁荣时期，倫敦的利率搖摆于3%和4%之間，所以整个这段时期是利息較低的信貸时期。当利率在1847年4月10日上升到5%的时候，危机已經开始了，只有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的措施，才使危机的普遍爆发推迟了几个月。另一方面，在1854年5月6日已經达到5 $\frac{1}{2}$ %的利率，后来又連續下降到5%、4 $\frac{1}{2}$ %、4%和3 $\frac{1}{2}$ %；从1855年6月16日到9月8日，利率一直是3 $\frac{1}{2}$ %。然后它又朝着相反的方面經過同样

的变化，上升到4%、4½%、5%，到1855年10月又达到了在1854年5月曾达到过的最高点，即5½%。两个星期以后，即1855年10月20日，短期期票的利率上升到6%，长期期票的利率上升到7%。但是接着又出现了倒退现象。在1856年，利率时而下降时而上升，到1856年10月，又达到了6%和7%，也就是说，达到了前一年10月的水平。1856年11月15日它曾上升到7%，但是并没有保持在这个数字上，而是上下跳动了好几次，有一次整整三个月保持在5½%的水平上。只是在今年10月12日，当美国的危机开始影响英国的时候，它才恢复到原来7%的高度。从此以后，利率就迅速地和不平地增长，其结果终于是几乎完全停止贴现。

换句话说，在1848年至1857年这个时期的后半段中，利率的波动更剧烈更频繁，而从1855年10月到1857年10月是货币奇缺的两年，利率在从5½%到7%这个范围内来回波动。同时，尽管利率很高，生产和交换仍然以从未想像过的速度不停地发展。一方面，这种例外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从澳大利亚和美国及时流入黄金，使英格兰银行能够间或放松它的硬性条件；而另一方面，十分明显，危机在1855年10月就已应该开始，它是由于一系列短暂的动荡而被推迟下去的，因此危机的最后爆发，无论就征候的强度或就蔓延的范围而言，都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贴现率在1855年10月20日、1856年10月4日和1857年10月12日周期性地回涨到7%这一有趣的事实，就完全可以证明刚才所说的这个论点，即使我们此外并不知道，英国在1854年已经发生预先的崩溃，欧洲大陆上在1855年10月和1856年10月就已反复出现过恐慌的一切征候。然而，总的说来，如果不谈这些使



事态恶化的情况，1848—1857年这一时期是与1826—1836年和1837—1847年这两个时期非常相似的。

的确，我們听說，实行英国貿易自由就可以改变这一切，但是如果别的什么还没有得到证明，那末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自由貿易派的医师只不过是些騙人的庸医而已。正像在以往各个时期一样，在一系列丰收之后接着是一系列歉收。尽管有自由貿易派的万应灵丹，英国小麦及其他一切农业原料的平均价格在1853—1857年甚至比在1820—1853年还要高；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工业不管谷价高昂，仍然达到了空前的規模，而現在，仿佛是为了使人根本无法詭辯，它在高度丰收的情况下遭到了前所未聞的崩潰。

我們的讀者当然会明白，英格兰銀行目前这种10%的貼現率只是名义上的，倫敦給第一流有价证券实际支付的利息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

“每日新聞”写道：“在自由市場上所索取的貼現率远远地超过了英格兰銀行的牌价。”

“紀事晨报”写道：“英格兰銀行本身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例外情况，而不是常規），并没有按照10%的利率办理貼現；而在自由市場上所要的利息則与官方的牌价根本不符。”

“先驅晨报”写道：“用第二流和第三流的有价证券不論以任何条件都弄不到錢，这已經造成了大量恶果。”

正像“地球报”<sup>258</sup>所写的，“由于这一切，事情就陷入僵局；资产超过負債的公司紛紛倒閉；似乎是发生了一場普遍的商业革命。”

金融市場的这种困难以及美国产品的大量涌現，使得商品市場上的各种商品都降低了价格。在几个星期之内，利物浦的棉花价格跌了20—25%，糖跌了25%，谷物跌了25%，随着咖啡、硝

石、牛油、皮革等也都跌了价。

“晨邮报”写道：“期票貼現和以实物为抵押取得貸款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旗帜报”写道：“在明辛街259，貿易十分紊乱，除了以貨換貨以外，不可能銷售任何商品；根本談不上支付現金。”

但是，如果在苏格兰不发生銀行业的恐慌，这一切灾难不能这样快地使英格兰銀行屈服。在格拉斯哥，西区銀行倒閉以后就是格拉斯哥市銀行的倒閉，于是資產階級中的存戶和劳动者階級中持有銀行券的人都来向銀行提款和挤兌，結果发生了一場大騷动，使格拉斯哥市的市长不得不向刺刀求援。很荣幸地有阿尔盖公爵这样一位尊貴人物任董事长的格拉斯哥市銀行，拥有实付資本100万英鎊，备付資本90 595英鎊，有96个分行分布全国各地。它可以发行72 921英鎊，而苏格兰西区銀行可以发行225 292英鎊，总共为298 213英鎊，即約占苏格兰全部合法流通手段的十分之一。这两家銀行的資本几乎都是农村居民的小額存款。

在苏格兰发生的恐慌自然影响到英格兰銀行；11月11日从它的金庫中提取了30万英鎊，11月12日又提取了60万到70万英鎊汇往苏格兰。此外，爱尔兰的銀行还提取了另一些款項，英国的一些地方銀行又收回了大量存款，所以英格兰銀行的銀行部处于破产的边緣。可能，普遍危机对于上述这两家苏格兰銀行說来，只是提供了一个体面地下台的口实，因为这两家銀行早已彻底腐烂了。然而事实仍然是：曾經在1825—1826年、1836—1837年和1847年頂住了将英国和爱尔兰各家銀行扫蕩一光的几場風暴的馳名的苏格兰銀行体系，自从1845年那迫使苏格兰接受的皮尔的銀行法生效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大規模的挤兌現象；在苏格兰的銀

行中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呼声：“要黄金，不要纸币！”甚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爱丁堡也第一次遭到拒绝。那些替皮尔的银行法辩护的人以为，如果这项法律不能根本防止金融危机，那末它至少能保证在流通中的银行券的兑换，——这种想法现在站不住脚了；银行券持有者分享了存款人的命运。

至于英国工业区的一般状况，下面这两段文字刻划得淋漓尽致——一段是摘自“经济学家”杂志上刊载的曼彻斯特贸易通报，另一段是摘自伦敦“自由新闻”<sup>260</sup>上发表的一封来自麦克尔士菲尔德的私人信件。曼彻斯特通报对最近五年来的棉花贸易作了一番比较，然后接着说道：

“本周内，价格逐日迅速下跌。许多种物品都不能标价，因为根本找不到买主；而且即使标了价，这种价格与其说取决于实际需求，还不如说取决于主人的状况和顾虑。根本谈不上什么当前的需求。国内市场上堆积的存货，今年冬天也难望销完。”（关于国外市场存货过多的情形，通报当然避而不谈。）“现在到处都迫于必要缩短了工作时间，估计目前在全部生产部门中已有五分之一以上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反对广泛实行这种办法的抗议，一天比一天减少，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把工厂完全关闭一个时期是否更好一些。”

麦克尔士菲尔德的来信者说道：

“现在至少有5000名熟练的手工业者及其家眷，清早起床后不知从哪儿可以弄到填肚子的吃食，而只好向济贫所请求帮助。可是由于他们是属于体力强壮的贫民，他们必须进行这样的选择：或者是去做每天可领4辨士的碎石工作，或者是到习艺所去接受那罪犯般的待遇，去吃那份从壁上一个小洞递送的有害身体而又少得可怜的食物。对于那些只习惯于操作最纤细的物质即纺织丝绸的人来说，建议他们去做碎石工作，就等于拒绝帮助他们。”

英国的作者们认为，英国的这次危机同1847年的危机相比，有一个优点，即这次危机并没有为大量吸收资本的投机，例如铁路

股票的投机，开辟广闊的場所。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因为英国人在国外，無論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都大量参与了投机活动；而在本国，他們的剩余資金主要是投在工厂企业中，所以目前这次震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因此它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

在欧洲大陆上，这种傳染病一方面从瑞典蔓延到意大利，另一方面从馬德里蔓延到布达佩斯。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关稅同盟<sup>261</sup>的最大进出口貿易中心、德意志北部的主要金融市場——汉堡。至于法国，法兰西銀行已經把它的貼現率抬高到英国的水平；禁止谷物出口的命令也作廢了<sup>262</sup>；所有的巴黎報紙都接到了秘密警告，不許表示悲观；金銀兌換商受到宪兵的威胁，路易·波拿巴本人在一封口气相当虚夸的信中告訴他的臣民說，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对財政 coup d'état<sup>①</sup>有所准备，因此，“邪恶只存在于想像之中”<sup>263</sup>。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1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7 年 11 月 30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183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① 直譯是：政变；这里是：改革、变革。——編者注

## 弗·恩格斯

### \*德里的攻占

我們不想参加目前在大不列顛举行的这场把攻克德里的军队的英勇行为吹捧上天的乱嘈嘈的大合唱。在自我吹嘘方面，特别是在吹嘘自己的英勇行为方面，没有一个民族，甚至法国人，能够同英国人相比。可是，如果对事实进行分析，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能很快地看出，这种勇敢精神原来是十分平淡无奇的；因此，每一个正常的人必定会厌恶英国人这种利用别人的勇敢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这些英国 *pater familias* [老爷] 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对于使他们冒最小的风险去取得战功的任何事情都非常反感，却企图把攻占德里时确实表现出来的、但决不是那么非凡的勇敢精神算上自己一份。

如果把德里同塞瓦斯托波尔比较一下，我们当然得承认：西帕依不能与俄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对英军兵营的任何一次出击都完全不能同因克尔芒<sup>264</sup> 相比；在德里没有托特列本；不管每一个西帕依和每一个连在大多数场合下作战如何英勇，但是几乎他们所有的营——更不用说旅和师——都没有任何指挥；因此他们的协同动作不超出连的范围；他们没有任何军事知识，可是在今天，任何军队没有军事知识就无法作战，就无法守住任何城市。虽然如此，在人数和装备方面的悬殊，西帕依比欧洲兵更服水土的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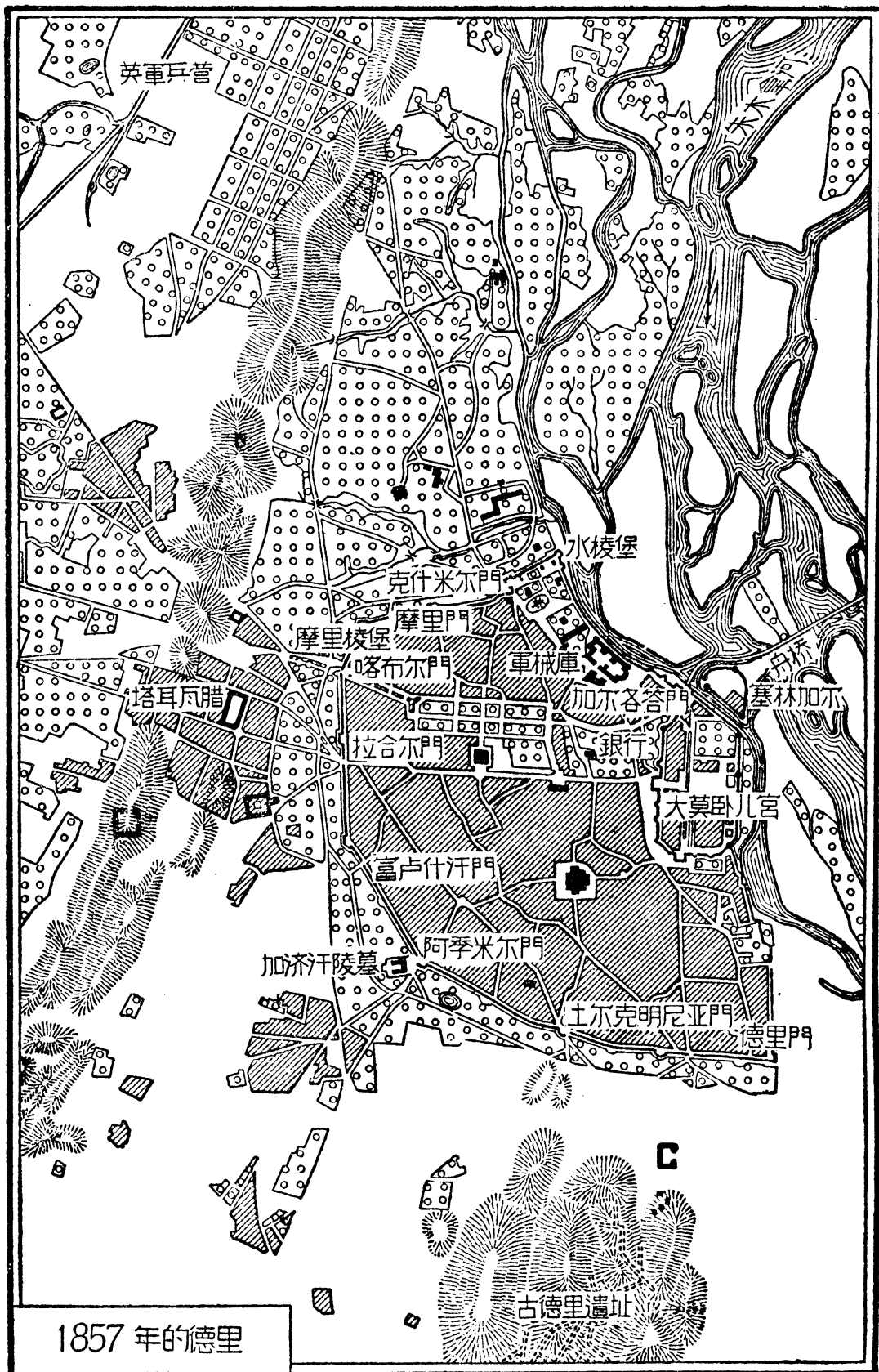
德里城下的军队有时在数量上出现的极端劣势，——所有这一切都抵销了许多差别，而使我們完全能够把这两次圍攻(姑且把这些行动称为圍攻)加以比較。再說一遍，我們并不认为强攻德里是什么不平凡的或特別壮烈的英勇事迹，虽然毫无疑问，这一次，和在所有的战斗中一样，双方都有过个别比較出色的行动。不过我們认为，德里城下的英印军队所表现的坚韧、剛毅、謹慎和技巧，要胜过英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sup>265</sup>一带的考驗中的表现。当时，英軍在因克尔芒战役之后已經完全准备退回船上，如果不是因为法軍的緣故，毫无疑问，他們真的会这样做。但是圍攻德里的军队却不然，季节和因季节而产生的疫病、交通的断絕、迅速获得援軍的无望以及上印度的总的形势，曾促使他們后退，誠然他們也考虑了采取这一步驟是否恰当，但他們終于还是留在自己的崗位上了。

当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人首先需要的是在上印度有一支机动部队。当时只有两支部队可以用于这一目的，一支是哈弗洛克的小部队，但它不久就显得力不胜任了；另一支是德里城下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兵德里城下，与不能攻破的敌人作无謂的战斗而消耗現有的力量，从軍事观点来看，是錯誤的；军队在运动中要比在停駐时有四倍的价值；这样它就可以肃清除德里以外的上印度各地，恢复交通，粉碎起义者集中兵力的一切企图，在这以后，德里的陷落就会是自然的、輕而易举的事了，——所有这些都是不容爭辯的。但是政治上的原因使英国人不能解除对德里的圍攻。应该受到責备的是大本营中那些下令圍攻德里的自作聪明的人物，而不是那些既已开始圍攻就坚守在那里的军队。同时还应当指出，雨季对这支军队的影响比預料的要輕微得多，而在这样的

季节由于积极的军事行动而发生的疫病只要达到与平时差不多的程度，军队就非撤退或瓦解不可。军队的危险处境一直持续到8月底。以后，援军开始到达；同时内訌继续削弱起义者的阵营。9月初，攻城炮兵纵列开到，英国人就由守势转为攻势。9月7日，第一个炮队开火了，13日晚在城墙上打开了两个可以通行的缺口。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

如果在这方面只能依靠威尔逊将军的官方报告，我们简直会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个报告混乱不清，如同克里木战争中英军大本营所发表的文件一样。世界上谁也不能根据这个报告确定上述两个缺口的位置或相互位置以及强攻纵队所采取的队形。至于私人的报道，当然更混乱不清了。幸好在应当获得几乎整个胜利荣誉的孟加拉工兵和炮兵中任职的那些有学识和教养的军官中间，有一位军官在“孟买日报”<sup>266</sup>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报道，这个报道既清楚又有条理，同时简单而且没有什么吹嘘的地方。在整个克里木战争期间，就没有一个英国军官能写出这样切实的叙述文。可惜，这位军官在攻城的第一天就负了伤，他的通讯也就从此结束。因此，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完全不清楚了。

英国人曾加固过德里的城防，但只求它能够抵御亚洲军队的围攻。就我们现代的概念来说，德里很难称得上是个要塞，因为它只能抵御野战部队的硬攻。它的石城墙高16呎，厚12呎，上面加有厚3呎高8呎的胸墙，除胸墙外，还有没有斜堤掩护的高6呎的石砌部分，进攻者在攻击时可以对它直接发射火力。这道石头城墙很狭窄，除了棱堡和炮塔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火炮。棱堡和炮塔不能充分地以侧射火力掩护中堤，同时因为攻城炮不难把3呎厚的胸墙摧毁（这甚至用野炮也可以做到），所以要想压制防



1857 年的德里





守者的炮兵，特别是压制对护城壕进行侧射的火炮，是非常容易的。在城墙和护城壕之间有一条很宽的崖路，或者说是一条平堤，便于造成可以通行的缺口；而在这种情况下，护城壕不但不能在任何部队进入其中时成为他们的 *coupe-gorge* [陷阱]，反而成为在进攻斜堤时乱了队形的队伍用以休息和整顿队形的场所。

利用正规的塹壕按照围攻的原则向这样一个地点进攻，即使具备最起码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有足够的兵力把这个地点团团围住，也是荒谬绝伦的。鉴于德里城防工事的一般情况，鉴于防守者组织涣散，士气低落，除了已经采取的这种攻城法以外，使用任何其他方法都会是绝对错误的。这个方法就是军人所熟知的硬攻法 (*attaque de vive force*)。既然城防工事只能抵御没有重炮的围攻者以暴露的兵力来进行的攻击，那当然要直截了当地用炮兵来破坏这些工事；同时，要塞的内部也不断遭到炮轰，一当城墙上的缺口大到能够通行的时候，部队就立刻攻上前去。

攻击的正面是正对着英军兵营的北城墙。这段城墙有两个中堤和三个棱堡，在中央棱堡（克什米尔棱堡）形成一个稍向里缩的凹角。东段（从克什米尔棱堡到水棱堡）比西段（克什米尔棱堡和摩里棱堡之间）短些，而且稍向前突出。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前面的地区有未被西帕依扫清的矮丛林、花园、房屋等等，因而为进攻者提供了掩蔽所。（这个情况说明为什么英军常常能够在要塞的炮口下追击西帕依，当时这一点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英勇，其实既然英国人有了这些掩蔽所，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此外，距要塞约四五百码的地方，沿城墙有一道很深的沟，成为供进攻用的一道天然的平行壕。再者，河流可以作为英军左翼的极好的依托，因而选择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之间稍向前突出的那一段城墙作

为主攻点,是非常合适的。对西段中堤和棱堡则同时进行佯攻,这一动作非常成功,使得西帕依派出主力来击退这一佯攻。西帕依在喀布尔门外编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来威胁英军右翼。如果摩里棱堡和克什米尔棱堡之间的西段中堤是最危险的地点,他们这一动作就是完全正确和非常有效的。西帕依的侧防阵地作为一种积极防御的手段是很好的,因为这一支兵力向前运动就能立即对每一个强攻纵队进行侧击。但是这个阵地对于东面位于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之间的那段中堤却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占领这个阵地,就使守军的精锐力量离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

炮队阵地的选择、构筑、装备以及使用方法,都值得大加赞扬。英军约有 50 门火炮和臼炮,都集中在强大的炮队里并隐蔽在很好的、坚固的胸墙后面。根据官方报道,西帕依在被攻击的地段有 55 门火炮,但是它们分散在小的棱堡和炮塔里面,不能集中使用,而且只有一道可怜的 3 呎高的胸墙勉强掩护着。毫无问题,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完全可以把防守者的火力压制下去,而此后要做的事也就不多了。

8 日,第一炮队(有 10 门炮)在离城墙 700 码的地方开火。当天夜间,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条沟已被加修成一道塹壕。9 日,这条沟前面的起伏地和房屋未经抵抗即被占领。10 日,第二炮队(有 8 门炮)投入战斗,这个炮队距城墙五六百码远。11 日,非常大胆而巧妙地配置在距水棱堡 200 码的一处起伏地上的第三炮队,用 6 门炮射击;同时有 10 门重臼炮轰击城市。13 日晚,据报告说,两个缺口——一个在与克什米尔棱堡右侧相邻的中堤上,另一个在水棱堡的左正面和左侧——已经可以用来进行攻击,于是即下令攻击。西帕依在 11 日已经在两个受威胁的棱堡之间的斜堤上

挖掘了一条反接近壕，并且在英軍炮队前面約 350 碼处挖掘了散兵壕。他們还从喀布尔門外的障地前进来进行側击。但是这些积极防御的企图沒有統一的計劃和相互的联系，沒有高昂的士气，因而也就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14 日拂曉，英軍五个纵队投入攻击。右翼上的一个纵队应与喀布尔門外的西帕依队伍接战，胜利时即向拉合尔門进攻。給每一个缺口派了一个纵队，一个纵队被派去爆破克什米尔門，还有一个纵队則作为后备。除第一队外，各队的行动都成功了。缺口处防守薄弱，但是城墙附近房屋內的抵抗却非常頑强。由于一个工兵軍官和三个軍士的英勇行动（这**确实**是英勇的行动），炸开了克什米尔門，所以在那里作战的纵队也突入城內。傍晚的时候，整个北段城墙都落入英軍手中。但是，威尔逊將軍在这里停下来，漫无秩序的冲杀停止了，火炮被調了上来并向城內每一个坚固的障地射击。除了攻打軍械庫外，看来很少有真正的战斗。起义者士气沮丧，开始成批地棄城而走。于是威尔逊謹慎地向城內推进，17 日以后已經几乎遇不到抵抗，20 日占領了全城。

我們已經說出了关于进攻者的行动的意見。至于防守者，那末采取攻势的对抗性运动的企图、喀布尔門附近的側防障勢、反接近壕、散兵壕，——这一切都說明：科学的作战方法的某些概念已經在西帕依中間存在；但是这些概念不是还不十分清楚，便是还不够有力，因此西帕依不能有效地予以运用。这些概念究竟出自印度人本身，还是出自和他們合作的一些欧洲人，当然很难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尽管这些企图在执行上还不完善，然而基本上和塞瓦斯托波尔的积极防御十分近似；同时这些企图的执行情况看来很像是**有某一个欧洲軍官給西帕依制定了正确的計劃**，可

---

是由于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够完全领会它的精神，或者是由于组织松懈和缺乏指挥，于是现实可行的计划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企图。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1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2 月 5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88 号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貿易危机

當我們在大洋这边演奏那部后来震耳欲聾地响彻全世界的宏偉的破产交响乐的前奏曲时，我們那位有点怪癖的同行，倫敦“泰晤士报”曾大奏其以英国貿易的“健康”为主题的庄严华丽的变奏曲。但是現在“泰晤士报”换上另一种比較低沉忧郁的調子了。在“欧罗巴号”輪船昨天运到我們这个幸福之岸的最近一期即11月26日这一期上，这家报纸宣称：“英国的商业阶级已經病入膏肓。”然后，这家报纸极端憤激地感叹道：

“正是在繁荣結束前的八年或十年当中那种使工商业越出正軌的競争活动，导致了最可怕的灾难。正是世上出現了一帮无所顾忌的投机者和空头期票开发者，并且这帮人被誉为英国人勇于进取的榜样，使人們不再相信通过誠实經營来逐渐致富的途徑，——正是这种情况成了万恶之源。每一个这样形成的腐化中心都在愈益扩大其影响的范围。”

我們現在不想追究英国新聞記者們十年来一直強調貿易震蕩的时代已随着貿易自由的实行而永远結束是否正确，也不想追究他們現在突然从現代賺錢方式的热情歌頌者变成責难它的羅馬監察官是否正确。下面这份提交給最近在苏格兰举行的債務人會議的材料，可以作为英国貿易“健康”的事实注解。

### 負債超过资产

(单位:英鎊)

約翰·蒙提思公司·····	430 000
麥克唐納兄弟公司·····	334 000
高弗萊、派蒂遜合股公司 ·····	240 000
威廉·斯密斯公司·····	104 000
特勒赫斯、羅賓遜合股公司 ·····	75 000
共 計·····	1 183 000

“根据这份材料可以看出”——正如“北不列颠邮报”<sup>267</sup>所說的，——“按照破产者本人的招供，这五家公司的債務人就損失了1 183 000 英鎊。”

但是，尽管有过去的一切教訓而危机仍然在經過一定时期后有規則地重复发生这一事实，使我們不能把个别人的輕率冒失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終极原因。如果在某一个貿易时期終結时，投机表现为直接預报崩潰即将来临的先兆，那末不要忘記，投机本身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几个阶段上产生的，因此它本身就是結果和表現，而不是終极原因和实质。那些企图用投机来解釋工商业之所以发生有規則的痙攣的政治經濟学家，就好像那个如今已經絕种了的把发寒热当做产生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的自然哲学家学派一样。

欧洲危机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国，但是在英国本国，正如我們所預見到的那样<sup>①</sup>，危机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如果大不列颠对美国发生危机的最初反应，主要表现为金融恐慌，而伴之以商品市場的普遍蕭条以及过一段时期以后才出現的工业上的困难，那末如今占第一位的是工业危机，其次才是金融困难。如果說火災的发生地曾經一度是倫敦，那末現在它已轉移到曼彻斯特。英国工业

① 見本卷第 350—351 頁。——編者注

过去所受到的最严重的震蕩，并且是唯一引起过巨大社会变革的震蕩——1838年至1843年的工业危机——只有在很短的时间里，即在1839年一度縮小；而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率是很低的，甚至下降到 $2\frac{1}{2}\%$ 和 $2\%$ 。我們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是因为我們认为倫敦金融市場业务情况的相当好轉是它彻底复元的征兆，而只是想指出，在英国这样一个工业国家里，金融市場的波动决不反映貿易危机的强度和規模。試把同一天的倫敦報紙和曼彻斯特報紙比較一下。当英格兰銀行以新收购一批黄金“巩固了它的地位”的时候，只注意黄金进出的倫敦報紙就喜不自胜。而曼彻斯特的報紙却愁云密布，因为它认为这种巩固是靠牺牲它的利益，即靠提高利率和压低它的产品价格而得到的。因此，甚至“价格史”<sup>268</sup>的作者图克先生，无论他多么善于分析倫敦金融市場和殖民地市場上的現象，可是对于在英国生产的心臟中所发生的痙攣，却不仅不能描述，而且不能理解。

至于談到英国的金融市場，那末它在11月27日前的那个星期的情况表明：一方面破产的日子和非破产的日子不断交替出現；另一方面英格兰銀行的处境有所改善，而諾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地方銀行却倒閉了。后者是二十一年以前建立的，有408个股东，拥有实付資本562 891英鎊，总行設于新堡，分行分設在阿耳尼克、伯里克、赫克謝姆、莫尔珀思、北希尔茲、南希尔茲、散德兰、德勒穆。目前它負債300万英鎊，——单是通过它支付的每周工資就达35 000英鎊。当然，德勒穆銀行倒閉的第一个后果将是靠这家銀行貸款的一些大煤坑和铁工厂的停工。因此，千万名工人将被解雇。

据說英格兰銀行已經把它的金屬儲备增加了大約70万英鎊。



黃金這樣劇增的原因，一部分是它不再流往蘇格蘭，一部分是從本國<sup>①</sup>和俄國運去了一些黃金，再就是澳大利亞的黃金運到了。這種流動並不奇怪，因為十分明顯，英格蘭銀行提高利率就會減少進口，增加出口，把一部分投在國外的英國資本吸收回來，從而改變貿易差額，使相當數量的金銀流入英國。但是可以同樣有把握地預言，如果稍微放寬貼現的條件，黃金又會開始外流。問題只在於英格蘭銀行能把這些條件保持多久。

貿易部 10 月份的官方報告書——在這一個月中，最低貼現率起初提高到 6%，然後又提高到 7% 和 8%——清楚地證明了，實行這種措施的第一個後果並不是工業生產的停止，而是英國貨向國外市場出口的增加和外國貨進口的減少。

儘管美國發生了危機，1857 年 10 月份向美國的出口比 1856 年 10 月份增加了 318 838 英鎊，但是在這同一份報告書中所反映出的各種食品和奢侈品消費量的大大縮減，證明了工業品出口的這種增加是不合算的，根本不是工業繁榮的自然結果。危機對英國工業的影響，在貿易部下一月份的報告書中將會變得更加明顯。如果我們把 1857 年 1 月到 10 月期間每月的報告書比較一下，就會看出英國的生產在 5 月份曾達到它發展的最高峰，當時的出口比 1856 年 5 月份超過了 2 648 904 英鎊。在 6 月份，隨着印度起義的頭一批消息傳來，整個生產下降到了 1856 年同月的水平以下，而出口也比那個月減少了 30 247 英鎊。在 7 月份，儘管印度市場縮小了，然而生產不僅恢復到 1856 年同月的水平，而且還比它多出 2 233 306 英鎊這樣大一個數目。因此，在 7 月份，其他市

<sup>①</sup> 美國。——編者注。

場除了它們通常消費的商品量以外，不仅必須吸收平时运往印度的那一部分商品，而且还必須吸收英国比平常多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所以，在这一个月里，外国市場大概都充滿了商品，以致出口价值連續下降，从7月份的大約230余万英鎊下降到8月份的885 513英鎊，再降到9月份的852 203英鎊，最后在10月份下降到318 838英鎊。只有研究英国的貿易报告书，才能很有把握地識破目前英国危机的秘密。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11月27日

作为社論載于1857年12月15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19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欧洲的金融危机

昨天早晨“加拿大号”和“亚得利亚海号”輪船运来的邮件，向我们再现了一周来欧洲金融危机的经过。这段经过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汉堡仍然是危机的中心，危机比较剧烈地影响了普魯士，并渐渐使英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本来英国金融市场似乎已开始摆脱不稳定状态。風暴的遥远回声已从西班牙和意大利傳來。工业活动的停滞和由此而引起的工人阶级的贫困，迅速地扩展到整个欧洲。另一方面，法国仍在继续对这种傳染病进行某种抵抗，这个事实就像一个比普遍危机問題本身还要难解的謎，难住了那些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

据推测，汉堡的危机在11月21日以后，已随着保证貼現公司的建立而经过了自己的最高点，这个公司的股票认购总数达到了1200万馬克。创办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盖有这个公司图章的期票和銀行券的流通。但是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些宣告破产以及像期票經紀人果瓦自杀之类的事件，預告新的灾难将要到来。11月26日，恐慌又达到极点；于是，先是貼現公司，后来政府自己也采取办法来阻止恐慌蔓延。11月27日，参議会提出了一项建議——并得到了城市土地所有者的許可——发行1500万馬克的有息有价证券（国庫券），用来发放以經久不坏的商品或以

国家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贷款数目应为抵押品的相当价值的50—66 $\frac{2}{3}$ %。这第二次想改变商业状况的试图，同第一次一样遭到了失败，两次都像船舶沉没时绝望的呼救一样。原来贴现公司本身的保证也需要另一种保证。此外，国家贷款不仅受数量限制，而且受作为抵押品的商品的种类限制，正因为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国家贷款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变得相对地没有用处了。为了维持价格，从而消除灾难的真正原因，国家必须按照商业恐慌爆发前的价格支付，并给仅仅是国外已破产的公司的债务的那种期票办理贴现。换句话说，私人资本家的损失应当用以政府为代表的整个社会的财富来补偿。这种只要求一方实行互利原则的共产主义，在欧洲资本家看来，是相当诱人的。

11月29日，汉堡的20家大商行破产了，阿尔托纳的大批商行还没有计算在内，期票贴现停止了，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价格跌得非常低，各种商业都陷于绝境。从破产名单中可以看出，其中五起破产是由于在银行业务上同瑞典和挪威有联系而发生的，而一家破产的乌尔贝格—克拉麦尔商行，债务达到1200万马克；五起发生在殖民地商品的贸易方面，四起发生在经营波罗的海沿岸商品的贸易方面，两起发生在工业品出口方面，两起发生在保险业方面，一起发生在证券交易所，一起发生在造船工业。瑞典对于汉堡这个自己的出口商、期票经纪人和银行家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致汉堡市场的历史也就是斯德哥尔摩市场的历史。所以，在倒闭发生两天以后，就有电报说，汉堡发生破产使斯德哥尔摩也发生了破产，国家的支持在那里也没有效果。瑞典在这方面是如此，丹麦在这方面更是如此，因为丹麦的商业中心阿尔托纳不过是汉堡的郊区而已。12月1日发生了大批的破产，其中包括两家很老的商

行，一家是經營殖民地商品、主要是做糖生意的康拉德·沃尼克商行，这家商行拥有資本 200 万馬克，同德意志、丹麦、瑞典有广泛的联系，一家是同瑞典和挪威有业务联系的劳倫特·安姆·恩德商行。有一个船主兼批发商因陷于困境而自杀了。

汉堡的貿易總額，根据下列事实可以推算出来：正好在这个时候，汉堡的倉庫和港口积存的各种屬於汉堡商人的商品約值 5 亿馬克。共和国現在采取的消除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免除本国公民支付債款的义务。可能会通过一項法律，規定各种期票延期一月支付。至于普魯士，報紙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萊茵河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业区的艰难状况，因为这种状况还没有引起大批的破产，只有施特廷和但澤的谷物出口商和柏林的 40 个左右工业家破了产。普魯士政府对这些事情の干預表现在它委托柏林銀行发放商品抵押貸款，并廢除了高利貸法。前一措施在柏林将同在斯德哥尔摩和汉堡一样地白費力气，后一措施只会使普魯士处于同其他商业国一样的境地。

汉堡发生倒閉的事对于那些以为目前的危机是用紙币人为地哄抬价格造成的富于想像力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至于貨币的流通，汉堡同这个国家完全相反。汉堡除了白銀以外，沒有別的貨币。那里根本沒有紙币流通，值得这个城市驕傲的是，在那里执行交換手段职能的完全是金屬。然而目前，那里是一片极端的恐慌；自从普遍商业危机（它的发现和彗星一样，还不太久）出現以来，汉堡总是这种危机喜爱的場所。在十八世紀最后三十多年間，那里曾两次发生現在这样的事件。如果說，汉堡有什么特点，使得它与世界上別的大商业中心不同，那就是利率經常而剧烈地波动。

現在撇开汉堡来看看英国，我們发现，倫敦金融市場的状况从

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逐漸好轉，但后来又开始了相反的变化。11月28日，白銀的价格的确下跌了，但12月1日以后又回升，而且大概会继续上漲，因为汉堡需要大量的白銀。換句話說，黄金又将从倫敦外流，去购买大陆的白銀，黄金重新外流的情况要求英格兰銀行再把螺絲擰紧。除了突然产生的汉堡对白銀的需求以外，預料不久将来要給印度一笔貸款，不管政府怎样力图推迟这个倒霉的日子，但是总免不了要拿出这笔貸款。本月1日以后发生的新的破产，也有助于消除关于金融市場已經經過了最坏时刻的錯觉。奧維尔斯頓勳爵(銀行家劳埃德)在上院會議開幕時指出：

“对英格兰銀行的下一次压力，大概在賬目調整之前就要产生，而且那时候，危机將比我們目前已經在它面前表示屈服的这次危机更加严重。严重的和危險的困难正在威胁着我国。”

汉堡的災难，在倫敦还没有感觉到。金融市場情况的好轉对商品市場有良好的影响；但是，不管货币量可能再次减少的情况如何，施特廷、但澤和汉堡的商品价格的猛跌，显然不能不使倫敦的价格下跌。法国的一个取消禁止谷物和面粉輸出的法令，立即使倫敦的磨坊主不得不把每280磅的价格降低3先令，以阻止法国面粉流入。有报道說，粮食貿易方面发生了几起破产，但这些破产只涉及較小的商行以及粮食交易所里一些签订了定期交貨合同的投机商。

在英国工业区里，专门為印度市場生产的棉織品，如咖啡色的衬衫料子、薄棉布、印度白棉布以及也是为这个市場制造的紗，1847年以后在印度第一次开始卖到了好價錢，除此以外，沒有发生任何新事情。从1847年起，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經營这种貿易所得的利潤，不是从在东印度出售他們的商品中得到的，而純粹是从

在英国出售他們自己从东印度运回的商品中得到的。从1857年6月起，由于发生起义，英国向印度的輸出几乎完全停止，这使得印度市場把积存的英国貨都吸收了，甚至还可能按照提高了的价格把新供应的貨物銷售出去。在通常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会使曼彻斯特的貿易異常活跃起来。但目前，正如我們从私人信件中知道的，这种情况仅仅使那些銷路最广的商品的价格稍微上升了一点，同时由于这种情况，有大量待雇的劳动力拥向这些商品的生产，如果把它們全部加以利用，那末，生产出的成品可以在最短期內充斥整整三个印度。英国工业区的生产力近十年来增加的总量很大，即使工作量比过去的規模縮減三分之一以上，工业也能支持，因为厂主在自己的倉庫里积存了大量商品。杜費公司的先生們在他們的曼彻斯特貿易月报中写道，“本月貿易曾經中斷；成交很少，价格一律都非常低。交易總額从来沒有11月这样少”。

在这里，注意一下英国谷物法的廢除在1858年将第一次經受严重考驗这个事实，也許是适当的。部分地由于澳大利亚的黄金和工业繁荣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歉收的自然結果，在1847—1857年期間小麦的平均价格比1826—1836年期間較高。現在，在國內銷路减少的同时，还要經受外国农产品的尖銳竞争，而且大概又要发生似乎已經被人遺忘的1815—1832年的不列顛史册上的农业危机。誠然，皇帝的詔书发出之后法国小麦和面粉价格的上漲，只是暫时的，在开始稍微广泛地向英国輸出之前就停止了。但是，在法国金融市場繼續不振的情况下，法国将被迫把自己的谷物和面粉拋向英国市場，而同时德国也将把自己的农产品大力塞进英国市場。随后春天一到，船只将从美国載运貨物而来，給不列顛的粮食市場以致命的打击。全部价格史使我們有根据这样推測，如果

---

接着来几次丰收,那我們就会看到,谷物法的廢除,首先对于农业工人來說,其次对于农場主來說,归根到底对于整个不列顛土地所有制來說,其真正后果将会是什么。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12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7 年 12 月 22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202 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欧洲的危机

我們昨天收到的一份由“尼亚加拉号”輪船带来的邮件，以及我們对現有整套的各种英国报纸的細心研究，都只是证明我們在不久以前所闡明的关于英国危机进一步发展的看法<sup>①</sup>是正确的。倫敦金融市場肯定地在好轉，也就是說，英格蘭銀行地下室的黃金在积聚，在英格蘭銀行要求期票貼現的在减少，第一流的有价证券在倫巴特街<sup>269</sup>可以按9.5—9.75%貼現，国家有价证券的行市保持稳定，证券交易所的状况也有了某种程度的好轉。然而，这种表面上的乐观情景却因为以下种种事实而黯然失色：在倫敦，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些大的破产事件发生；每天的电訊可悲地报道外地的災难；倫敦“泰晤士报”大发雷霆，对英国商业階級普遍的无可救药的墮落无比憤懣。本来，最好的期票可以比較容易地貼現，但是由于能够被认为是最好的期票愈来愈难找到，在实际上，这种机会显然就十分难得了。因而，我們在倫敦最近发表的关于金融問題的論文里看到，針綫街的业务活动非常“有限”，而倫巴特街的交易也很少。可是，因为来自英格蘭銀行和貼現所的供应日益增加，而对它們的压力即它們的主顾的需求日益减少，所以應該承认，金融市場

① 見本卷第369—371頁。——編者注

的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尽管如此，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还是不敢降低贴现率，因为他们显然相信，金融危机的再次出现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取决于贴现率，因此降低贴现率必定会引起金融危机的重复出现。

虽然伦敦金融市场的状况开始有了某种好转，但英国商品市场的紧张程度依然在不断增加，尽管价格一直下跌，购买商品的人还是愈来愈少。甚至像油脂这种从前是例外的商品，现在由于不得不出售，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把12月18日以前一周的价格同11月份几周的价格作一比较，可以看出11月出现的价格急剧下跌的情形又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不是恐慌性的下跌，而是一步步的下跌。至于工业，郎卡郡的六家纺织厂、西莱丁毛纺织业中的三家主要商行和伍斯特地毯生产中的一家大商行的倒闭，现在证明了我們关于严重的工业危机的预言<sup>①</sup>是正确的。

商品市场上和工业部门中的这种双重危机的现象将愈来愈明显，现在我們来看一看从曼彻斯特寄给本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摘录下来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了：

“您未必会想像得到市场受到的连续不断的压力及其严重后果。任何人也不能把任何东西卖掉。价格一天天地下跌。情况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连殷实可靠的商行都根本不願意拿出自己的商品。纺织业者陷于绝望的境地。棉纱商人只收現金或者要有双倍的保证金才把棉纱卖给织布业者。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一定会引起可怕的破产。”<sup>270</sup>

汉堡的危机刚刚平息。这是过去见过的所有金融危机中最正

<sup>①</sup> 見本卷第350—351、362—363頁。——編者注。

規最典型的例子。除了白銀和黃金，一切都貶值。老商行倒閉，因為它們連一張到期的期票也不能用現金償付，雖然它們保險櫃里放着的期票比提出要支付的期票的價值高百倍。然而在這個時候，這些期票不值分文，這並不是由於期票已失去信用，而是由於期票不可能貼現。據現有的消息，如富有的克·馬·施勒德爾老商行在倒閉以前曾經接到他的兄弟勒·亨·施勒德爾從倫敦來的電報，說要撥給它價值 200 萬的白銀，但是該商行在回電中說：“300 萬，否則分文不要。”這 300 萬沒有來到，克·馬·施勒德爾就破產了。再看看完全不同的一種例子：歐洲報刊曾經多次提到的烏爾貝格商行負債 1 200 萬馬克，其中期票 700 萬，而現在表明，這個商行用來經營其整個龐大業務的資本總共只有 30 萬馬克。

在瑞士，特別是在丹麥，危機顯著地加劇了。災難似乎剛剛過去而又出現，這是由於漢堡、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有大批款項到了支付期限。例如，在 12 月，從里約熱內盧運咖啡到漢堡的出口商提取的價值 900 萬的期票到期了；所有這些期票都遭到了拒付，而這種大量的拒付引起了新的恐慌。在 1 月，用來支付巴伊亞和佩囊布庫運來的砂糖的貸款的期票，大概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而這又會重新導致危機的發生。

卡·馬克思寫於 1857 年 12 月 18 日

作為社論載於 1858 年 1 月 5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213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卡·馬克思 法国的危机<sup>271</sup>

法兰西銀行不断降低它的貼現率，从11月12日以后規定的10%降到11月26日的9%，12月5日的8%，12月17日的6%。皇家的报刊当然利用这一点作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商业动蕩趋于下降，“法国将不发生任何災禍而通过严格的考驗”。用他們的話來說，拿破侖第三的金融体制造成了“法国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明显的貿易上的优越性”，保证法国現在和将来永远“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比同它竞争的国家遭受的苦难要小”。但是，6%这一銀行貼現率在法国除了1800年2月，在伯父<sup>①</sup>建立法兰西銀行几天后有过外，从本世紀开始以来一直到侄子<sup>②</sup>执政时的1855年和1856年危險时期从未有过。但是，即使法兰西銀行把自己的利率再降低一些，譬如降低到4%，結果又怎样呢？在1847年12月27日，貼現率曾經降低到4%，当时普遍危机还在繼續，危机在法国还没有达到頂点。那时也像現在一样，政府庆賀法国幸免于普遍危机，只不过輕微地擦伤了一点，而且这点伤也是最表面的。但是过了两个月以后，財政上的地震却顛翻了皇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聪明人<sup>③</sup>。

① 拿破侖第一。——編者注

②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③ 路易-菲力浦。——編者注

当然，我們不会来辯駁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現在为止危机对法国商业的伤害要比所預料的輕微。这一点原因很簡單：法国同美国、大不列顛和汉撒城市的貿易差額是——并且早就是有利的。所以，要上述国家所遭受的災难直接影响到法国，那必須是法国对上述国家发放了广泛的信貸，或者是为了投机积压了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但是这些情况都沒有。因此，美国、英国和汉撒城市中所发生的事件不会引起法国的貴金屬外流；法兰西銀行之所以在几个星期之中曾經把利率提高到英格兰銀行的水平，也只是因为害怕法国資本开始向国外寻找更有利的投資場所。

但是，不能否认，普遍危机甚至在目前的阶段上，也是以相应于法国同美国、英国和汉撒城市的貿易关系的形式影响了法国，这种形式就是經常性的停滯。这种情况迫使曾經在11月11日的信件中說“災难仅仅存在于想像之中”的波拿巴，发表了另外一則正式文告，文告的大意是，“虽然法国商界历来具有审慎的作風，政府保持着警觉，商业危机仍然迫使許多工业部門即使沒有停止生产，至少也縮減了生产或降低了工資”，因而“大批工人苦于被迫賦閑”。所以他設立一笔100万法郎的貸款来救济貧民和賦予他們就业手段，命令在里昂采取軍事預防措施，并通过自己的报纸对私人慈善事业发出呼吁。儲蓄銀行的取款額开始大大超过新存入的存款額。很多厂主由于在美国和英国的破产而遭受了巨大損失。巴黎、里昂、牟尔豪森、魯貝、卢昂、利尔、南特、圣亚田及其他工业中心的生产急剧縮減；馬賽、哈佛尔和波尔多等地也感觉到严重的困难。

全国商业的普遍停滯特別明显地反映在法兰西銀行最近一次的月报中，这份月报表明12月份貨幣流通量較10月份减少了

7 304 万法郎，較 11 月份减少了 48 955 900 法郎。同时，貼現期票的总額比 10 月份大約减少 1 亿法郎，比 11 月份减少 77 067 059 法郎。在法国报刊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确切弄清楚外省城市发生的破产事件的性质，至于巴黎的破产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目前当然还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的性质，但毕竟有日益发展的趋势，不仅就遭到破产的企业的数量来说是这样，而且就其质量来说也是这样。在从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 日的两个星期中，巴黎共发生 34 起破产事件，其中至少有 24 起是发生在这样一些人中間，如：旧衣商、牛奶商、成衣匠、假花匠、木匠、女式手提包制造商、鍍金工匠、皮件商、珠宝商、流苏制造商、米醋商、便帽制造商、水果商等等。从 12 月 1 日至 8 日至少发生了 31 起破产事件，而从 9 日至 15 日則增加到 34 起，其中包括几家比較大的商行，如布尔頓、杜比克先生的銀行，voitures de remise〔出租馬車〕总公司，提花織机制造公司，一家植物油制造公司，等等。另一方面，波拿巴以取消禁令来阻止小麦和面粉价格狂跌的企图遭到了失敗：从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1 日价格一直往下跌，而且，尽管在倫敦出售这种产品可以得到厚利，截至 12 月 22 日，运往那里的小麦和面粉仍不超过 3 000 袋(110 公斤装)。

但是，如果說法国同美国、英国和汉撒城市的貿易差額为順差，那末对南俄、关税同盟、荷兰、比利时、列万特和意大利的貿易差額是不利的。瑞士在目前貿易上始終是逆差，但是法国却欠了它那么多的錢，——因为大多数亚尔薩斯工厂靠瑞士的資本进行生产，——以致于在瑞士缺錢的时候，总是会給法国的金融市場以很大的压力。目前，也和过去一样，只要上述各国的貿易上的困难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在法国便不会出现尖銳的危机。只要考

慮一下荷兰的数目仍然相当大的貿易几乎仅仅限于那些价格已經跌落、并且繼續狂跌的物品，就会明白荷兰不可能順利地通过目前这一次考驗。在关税同盟的各工业中心中，預示危机的到来的征兆已經明显地出現。的里雅斯特报纸不断表示担心在黑海和列万特的貿易破产，并且只要一出現这个行将到来的災难的預兆，就会使馬賽数家大商行垮台。最后，当金融恐慌在欧洲北部似乎开始平靜下去的时候，在意大利它却又猛烈地爆发起来了，这一点可以从12月18日米兰“輿論报”<sup>272</sup>的下列一段話中看出：

“当前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破产达到了可怕的規模；在帕勒阿里、巴拉博公司、契格拉、雷达埃里、韦赫勒和馬佐拉破产之后，在国外发生了那些也影响到我国的破产事件之后，在維罗那、威尼斯、烏迪訥和貝尔加莫的最好的商行停止了支付以后，我国最有实力的商号也动蕩起来并开始結算。而这些結算数字是很惨的。只要看看我国經營綢緞的最大商行沒有一家的仓库里不放着至少5万磅的綢緞就明白了；由此不难算出，按照現行价格計算其中每一家都要損失50万到200万法郎，因为其中有些商行的存貨超过15万磅。勃兰比尔兄弟商行得到了150万法郎借款的支援，巴蒂斯特·加瓦威商行正在結束事务，其他公司也在这样做。每一个人都在問自己：他的前途如何。很多財產已經消失，还有很多財產减少了一半；許多从前富裕的家庭現在淪于赤貧；許多工人沒有工作，沒有面包，沒有任何生存手段。”

当法国的危机由于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而成熟起来的时候，它必然会打击那班投机倒把之徒，也許就是商业冒險家；也会打击政府，这个政府在法国所起的作用同私人商业在这个国家<sup>①</sup>、英国和汉堡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危机将猛烈地冲击证券市场并使它的主要支柱即国家本身遭受危險。法国的商业

<sup>①</sup> 美国。——編者注

和工业縮減的自然結果将是，交易所取得对货币的支配，尤其是法兰西銀行还必須发放以国家有息证券和铁路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貸款。法国商业和工业目前的停滯局面并没有妨碍交易所的活动，而是有利于这种活动。例如，我們从法兰西銀行最近一次的月报中看到，該行以铁路股票为抵押的借款数字在期票貼現和货币流通縮減的同时增多了。因此，尽管法国大部分铁路的收入銳減，但它們的证券行市却提高了；例如，奥尔良綫的收入以 11 月底同去年同期比較减少了 22.5%，但是它的股票价格 12 月 22 日为 1 355 法郎，而 10 月 23 日只有 1 310 法郎。

当法国的商业开始蕭条的时候，几家铁路公司立即被迫停止营业，而同样的遭遇也威胁着几乎其余所有的铁路公司。为了扭轉它們的这种情况，皇帝强迫法兰西銀行同铁路公司簽訂合同，由于合同的关系，法兰西銀行实际上变成真正的铁路承包人。法兰西銀行应当发放以下列新本票为抵押的货币貸款，即根据 1856 年 11 月 30 日的协定規定铁路公司有权在 1858 年发行的本票，以及其中在 1857 年就应当发行的那部分本票。准許在 1858 年发行的本票，其总額为 4 250 万。看来 *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也受到一旦遭到危机的打击就要破产的威胁，12 月 3 日該行只得在对自己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出售該行数量龐大的有价证券中的一部分。目前有一个把 *Crédit Mobilier* 同 *Crédit Foncier* 和 *Comptoire d'Es-compte*<sup>273</sup> 合并的方案，以便把賦予后面两个机关的权利扩大适用于前者，使它也能在法兰西銀行办理自己的期票貼現和以自己的有价证券为抵押取得借款。因此，这个計劃显然是要法兰西銀行負担所有这些康采恩的責任，使它們經受得住風暴，这样做无疑使法兰西銀行本身遭到破产的危險。但是，甚至連拿破侖第三也不



会想到去迫使法兰西銀行按照对那些各种各样股份公司的私人股东提出的要求办理支付。不算小額款項,到12月底須要办理支付的要求如下:馬德里工商业公司(路特希尔德家族)每股为30美元,法美航运公司每股为10美元,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铁路公司每股为30美元,厄尔謝朗施铁工厂公司每股为20美元,地中海铁路公司每股为30美元,奥地利铁路公司每股为15美元,薩拉哥沙铁路公司每股为10美元,法国瑞士铁路公司每股为10美元,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tanneries〔皮革厂总公司〕每股为10美元, Compañie de la carbonisation de houilles〔炼焦公司〕每股为10美元,等等。在本年年初,即将办理支付的有:希梅-馬里恩堡铁路公司每股为20美元,倫巴第一威尼斯铁路公司每股为12.5美元,比利时和南美洲各輪船公司每股为20美元。根据1856年11月30日的协定,1858年仅法国铁路的要求的总額就几乎有5000万美元。毫無疑問,存在着严重的危險,这就是由于这些沉重的負担,法国在1858年会像英国在1846—1847年那样遭到破产。不仅如此,德国、瑞士和尼德兰的資本家还持有大宗的法国有价证券,当危机在这些国家繼續发展时,这些有价值证券的大部分将会由它們的持有人投入巴黎的交易所,不問任何价格来把它們变为現金。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12月25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8年1月12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219号

## 弗·恩格斯

### \*勒克瑙的圍攻和強攻

加尔各答寄出的最近一班邮件带来了一些詳細报道，它們通过倫敦的报纸傳到了我們这里。根据这些报道，人們可以对科林·坎伯尔爵士在勒克瑙的活动做出判断。既然英国报纸断言，这个战功在战史上享有无上的光荣，我們不妨稍微仔細地考察一下这个問題。

勒克瑙城位于古姆提河右岸，該河在这个地区是順东南方向流的。在离河 2—3 英里的地方，有一条几乎与它平行的运河，运河穿过城市，在城市下方逐漸靠近古姆提河，在离城約 1 英里的地方流入該河。在古姆提河两岸沒有人群熙攘的街道，只有一些宮苑和个别的公共建筑。在运河和古姆提河汇合的地方，在它們的右岸即南岸，拉馬蒂尼埃尔学院和迪尔庫什宮苑并肩而立。在运河的另一岸，但仍在古姆提河的南边，紧靠着河岸，首先是錫康德尔巴格宮苑，再向西是兵营和軍人餐厅<sup>274</sup>，然后是馬提-馬哈尔(珍珠宮)，它距离駐劄官官邸只有几百碼远。駐劄官官邸矗立在这一带唯一的高地上，它瞰制全城，有高墙圍护，內有几座宮殿和附屬的房屋。这些建筑物以南就是人烟最稠密的市区，再向南 2 英里是阿朗巴格宮苑。

駐劄官官邸所处的天然优势立即說明，为什么英国人能够坚

守官邸，抵抗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但是这件事本身同时也说明：奥德人是哪一种战士。的确，这些人多少受过欧洲军官的训练而且拥有很多火炮，可是直到现在还攻不破欧洲人防守的唯一的一道不堪一击的围墙，这种人，从军事观点来看，无非是些野人；所以不管他们在数量上占多么大的优势，战胜他们并不能给军队增添多少荣誉。还有另一件事实可以说明奥德人是最不堪一击的敌人，那就是哈弗洛克不顾街垒和设有射孔的房屋等等，冲过了最稠密的市区。他的损失的确很大，但这战斗行动连 1848 年最糟糕的巷战也比不上！如果进行了真正的战斗，他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能安然通过。显然，房屋根本没有加以防守，不然，要想占领足以保证一条畅通通道那样多的房屋，就需要用几个星期。至于哈弗洛克这样猛冲猛打表现了多少谋略，我们还无法判断；据说，他是由于驻劄官邸处于极严重的情况才被迫这样做的，还有人举出其他的理由；但确实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

当科林·坎伯尔爵士抵达的时候，他带来约 2 000 名欧洲步兵、1 000 名锡克步兵、350 名欧洲骑兵、600 名锡克骑兵、18 门骑兵炮兵的火炮、4 门攻城炮、300 名水兵和一些重海军炮，总共 5 000 人，其中欧洲兵有 3 000 人。就数量来说，这支部队同曾经立过大功的大多数英印军队不相上下；事实上，查理·纳皮尔爵士在征服信德时所率领的野战部队恐怕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往往还要更少一些。另一方面，这支部队中有大量欧洲人，而且所有的土著士兵都属于印度最饒勇善战的民族，即锡克人，这就使得这支部队的内在力量和团结程度比一般的英印军队强得多。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支部队的敌人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拼凑而成的民兵，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诚然，奥德人被认为是下印度斯





坦最尚武的部落，但這只是與那由於世界上最使人懶散的气候和世世代代的壓迫而精神面貌已被徹底摧殘的怯懦的孟加拉人相對而言。奧德人那樣聽任自己的國家被“海盜式”地併入東印度公司的領地以及他們在起義期間的一切表現，無疑地使人認為，他們在勇敢和智慧方面都趕不上西帕依。不錯，有人告訴我們，數量彌補了質量的不足。有些通訊的作者說，城里足有 10 萬奧德人。無疑，他們在數量上比英國人多三倍或五倍，甚至可能還要多些；但是，和這樣的敵人作戰，這一點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任何陣地只能由一定數量的士兵防守；如果這些士兵決心要逃跑，即使在半英里內有比這多三四倍的這樣的英雄，也沒有多大意義。毫無疑問，就是在這些奧德人中間也曾出現不少個人英勇的例子。其中有些人也可能勇猛如獅；但是，當守軍中的那些烏合之眾已逃走，這些人對於他們已經無力防守的地方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們似乎沒有企圖把所有的人統一在共同的指揮之下；他們的地方首領只在自己的人中間才享有威信，而首領們自己也不願意服從任何人。

科林·坎伯爾爵士首先向阿朗巴格前進；然後，他沒有像哈弗洛克那樣硬衝過市區，而是利用這位將軍的經驗，轉向迪爾庫什和拉馬蒂尼埃爾。11 月 13 日，這些建築物的圍牆前面的奧德散兵被肅清了。15 日開始攻擊。敵人却非常疏忽大意，直到這時還沒有完成以塹壕加固迪爾庫什的準備工作；迪爾庫什立刻就被攻下，沒有遇到多少抵抗，拉馬蒂尼埃爾也是如此。這兩個陣地使英國人掌握了運河綫。敵人越過這個障礙，進行反攻，企圖奪回早晨喪失的這兩個地點，但很快就被擊退，並遭到嚴重的損失。16 日，英軍渡過運河，向錫康德爾巴格宮攻擊。這裡的塹壕比較好些，因此坎伯爾將軍慎重地利用炮兵攻打這個地點。等到防禦工事被破壞以

后，步兵向前冲锋，占领了该地。接着，另一个据点薩穆克遭到 3 小时的炮击，按照坎伯尔爵士的说法，它是“经过他亲眼见过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之后”才被攻下的，一位聪明的战地记者补充说：“很少有人像这位将军这样，见过这么多激烈的战斗。”我们倒想知道，坎伯尔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些战斗。肯定不是在克里木，因为他在阿尔馬河会战<sup>275</sup>后就在巴拉克拉瓦过着安静的生活；他手下只有一个团参加了巴拉克拉瓦会战，而参加因克尔芒会战的，一个团也没有。

17 日，炮兵对准通往駐劄官官邸道路上的下一个障地——兵营和軍人餐厅轰击。炮击继续到 3 点钟，然后步兵攻占了这个地区。逃跑的敌人受到猛烈的追击。在进攻的军队和駐劄官官邸之间还剩下一个障地——馬提-馬哈尔。黄昏前，这个障地也被攻下，与警备部队的联系完全恢复了。

当然，坎伯尔选择了比较容易打通的路綫，在他的队伍开始进攻之前利用重炮摧毁据点，他在这方面所表现的謀略是值得赞許的。但是英軍在这次战斗中具有以训练有素的、服从于一位指揮官的士兵来对付根本无人指揮的半野人的有利条件，而我们也看到，他們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他們非不得已不让自己的士兵冒险。只要还有目标需要破坏，他們就不断地使用炮兵。毫无疑问，他們是勇敢作战的；但是值得贊揚的是他們的小心謹慎。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伤亡的人数。虽然士兵伤亡人数尚未公布；但是在軍官中仅死 5 人，伤 32 人。在 5 000 人的军队中，軍官至少应当有 250 到 300 名。英国軍官当然是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的。給自己的部下树立英勇的榜样，常常是他們所知道的唯一职责。但是，如果說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知道需要牺牲极多

的人才能攻占的这种陣地上連續进行了三天的战斗，損失却只有八分之一或九分之一，这就談不上是激烈的战斗了。从英国的历史上举一个例子来看，与滑铁卢会战时的烏古蒙和拉埃桑特的防禦战<sup>276</sup>对照一下，在印度的这些战斗全部加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現在把每一次小接触都說成是酣战的通訊作者們，对于使一方喪失一半兵力而另一方喪失三分之一兵力的博罗迪諾会战<sup>277</sup>，又将怎样說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1 月 30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235 号



## 卡·馬克思

# 英 國 的 貿 易

在英国議會最近举行的非常會議上，得比勛爵在上院宣布：最近三年以来，英国进口价值已超过英国出口价值 16 000 万英鎊。这项声明在議會外面引起了爭論，有些人向貿易大臣奧尔德利的斯坦利勛爵征詢得比勳爵的說法是否正确。貿易大臣在写給征詢者的一封信中这样回答道：

“得比勳爵在上院說，最近三年以来，我国进口价值已超过我国出口价值 16 000 万英鎊，是不对的，得比勳爵之所以这样說，是因为他所取的进口总值包括了我国从殖民地和外国的全部进口，但是在出口总值中却没有把我們从殖民地和外国购来的商品的再出口計算在內。所以得比勳爵的計算是：

	英 鎊
进 口.....	468 000 000
出 口.....	308 000 000
	差 額.....160 000 000

其实应当是：

	英 鎊
进 口.....	468 000 000
出 口.....	371 000 000
	差 額..... 97 000 000”

貿易大臣为了证实这段話，又把 1855 年、1856 年和 1857 年联合王国的进出口价值作了比較。我們把这份在倫敦各家報紙上

找不到的最有趣的文件印在后边<sup>①</sup>。首先，我們会看到，可以賦予这些統計数字以一种能证实得比勛爵的說法的形式，即：

	英 鎊
全部进口·····	468 000 000
英国貨的出口·····	308 000 000
<hr/>	
进口超过英国貨的出口·····	160 000 000
外国貨的再出口·····	63 000 000
<hr/>	
大不列顛入超·····	97 000 000

因此，外国貨的进口确实比英国貨的出口超过了 16 000 万英鎊，除了外国貨的再出口 6 300 万英鎊以外，按照貿易大臣本人的說法，英国入超 9 700 万英鎊，也就是在 1855 年、1856 年和 1857 年三年中，每年平均入超 3 200 多万英鎊。不久前倫敦“泰晤士报”就是由于这个緣故而埋怨道：“实际上，最近五六年以来我国一直有亏损，而我們只是現在才发现。”但是，造成这些亏损的原因并不是进口超过了出口，而是一大部分出口貨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問題在于：再出口中有一半都是外国原料，它被外国工业用来加剧不利于英国工业利益的竞争，并且有一部分又以制成品形式回到英国人手中，供他們国内的消費。但是，必須考虑到的决定性因素是，大陆工业的竞争所造成的原料的大量再出口，使原料价格高涨到几乎要完全吞沒英国工厂主的利潤。以前，我們曾在这种意义上对英国棉織工业发表过一些意見。既然現在英国毛織工业地区工业危机最猖獗，企业不断倒閉，既然倫敦报纸竭力向公众隐瞒这一切，在这里就不妨援引一些数字來說明欧洲大陆上的工厂

<sup>①</sup> 見本卷第 392 頁。——編者注

主为了羊毛而与英国工厂主展开了多么激烈的竞争，这场竞争使这种原料的价格空前高涨，漲風毁灭了工厂主，同时也助长了目前对这种商品的大量投机。下面这个表包括最近五年中每一年的前九个月的材料：

**进口 (单位:磅)**

年份	从外国	从殖民地	总 計
1853.....	37 568 199	46 277 276	83 845 475
1854.....	27 006 173	50 187 692	77 193 865
1855.....	17 293 842	53 896 173	71 190 015
1856.....	22 377 714	62 148 467	84 526 181
1857.....	27 607 364	63 053 100	90 657 464

**出口 (单位:磅)**

年份	向外国	向殖民地	总 計
1853.....	2 480 410	4 343 166	6 823 576
1854.....	5 993 366	13 117 102	19 110 468
1855.....	8 860 909	12 948 561	21 809 470
1856.....	5 523 345	17 433 958	22 957 303
1857.....	4 561 000	25 068 787	29 629 787

因此，英国国内消费的外国羊毛和殖民地羊毛的数量就表现为下述数字：

**羊毛 (单位:磅)**

年份	
1853.....	77 021 899
1854.....	58 083 397
1855.....	49 380 545
1856.....	61 568 878
1857.....	61 027 677

另一方面，英国国产羊毛的出口量是：

年份	磅 数
1853.....	4 755 443
1854.....	9 477 396
1855.....	13 592 756
1856.....	11 539 201
1857.....	13 492 386

如果从联合王国进口的外国羊毛的总数中，先减去向国外再出口的数量，再减去英国羊毛的出口数量，就可以得出英国国内消費的外国羊毛的实际数量：

年份	磅 数
1853.....	72 266 456
1854.....	48 606 001
1855.....	35 787 789
1856.....	50 029 677
1857.....	47 535 291

这就是說，联合王国进口的殖民地羊毛从1853年前九个月的46 277 276磅增加到1857年同一时期的63 053 100磅，各种羊毛的进口总额在那两个同样的时期从83 845 475磅增加到90 657 464磅，然而欧洲大陆上对羊毛的需求大有增长，以致英国国内消費的外国羊毛和殖民地羊毛的数量在这五年中从1853年的77 021 899磅縮减到1857年的61 027 677磅；如果再計入英国羊毛的出口量，就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縮减数字，即从1853年的72 266 456磅縮减到1857年的47 535 291磅。如果注意到倫敦“泰晤士报”一篇金融論文中所揭示的事实，即联合王国在增加羊毛出口的同时增加着大陆毛織品特别是法国毛織品的进口，那末这里所說的这些情况的意义就变得更明白易曉了。

根据奥尔德利的斯坦利勳爵所提供的数字，我們編制了以下这个表格，說明与大不列顛通商各国的出超或入超的程度：

## 1855、1856 和 1857 年对英国的貿易出超

	英 鎊
1. 美国·····	28 571 764
2. 中国·····	22 675 433
3. 东印度·····	19 605 742
4. 俄国·····	16 642 167
5. 普魯士·····	12 842 488
6. 埃及·····	8 214 941
7. 西班牙·····	7 146 917
8. 英屬西印度·····	6 906 314
9. 秘魯·····	6 282 382
10. 瑞典·····	5 027 934
11. 古巴和波多黎各·····	4 853 484
12. 毛里求斯島·····	4 672 090
13. 新不倫瑞克·····	3 431 303
14. 丹麦·····	3 391 144
15. 錫兰·····	3 134 575
16. 法国·····	2 696 291
17. 加拿大·····	1 808 454
18. 挪威·····	1 686 962
19. 非洲(西部)·····	1 432 195
20. 葡萄牙·····	1 283 075
21. 双西西里王国·····	1 030 139
22. 智利·····	693 155
23. 布宜諾斯艾利斯·····	107 676

## 1855、1856 和 1857 年对英国的貿易入超

	英 鎊
1. 汉撒城市·····	18 883 428
2. 澳大利亚·····	17 761 889
3. 土耳其·····	6 947 220
4. 巴西·····	7 131 160
5. 比利时·····	2 214 207
6. 荷兰·····	1 600 904
7. 好望角·····	59 661

单是英国在三年中进口比出口超过 9 700 万英鎊的事实，还决不能作为英国人目前叫嚷“他們每年在貿易中亏损 3 300 万英鎊”、他們的貿易只是对外国有利的根据。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和日益增长的投資，必須支付利息、股息和利潤，这些錢有很大一部分必須以外国产品的形式寄回英国，因而使英国的进口量扩大。除了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以外，还必须有不只是为了支付所提供的商品、而是作为資本收益的額外的进口。因此，一般說来，所謂貿易差額應該对外国說来总是出超，对英国說来总是入超，因为世界各国每年不仅要向英国偿付貨款，而且还要支付所欠英国債務的利息。上述数字唯一可能使英国真正感到不安的，是英国显然不能在國內为它的巨額資本找到足够广闊的場所，因而不得不愈来愈大量地出借这些資本，并且像处于衰落时代的荷兰、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亲手为自己的竞争者鍛造武器。英国为了給它的剩余資本寻找投資場所而放出大量貸款，必然会助长別国的投机，这样就无异于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財富而拿这笔財富去冒險。英国被迫向其他工业国例如欧洲大陆借出大量貸款，就是自己向它的工业竞争者提供与它爭夺原料的資金，因而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的工厂抬高原料价格。英国工厂主因此只剩下很微薄的利潤，并且，由于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与世界工場的壟断地位有密切联系，必須經常比其他国家卖得更便宜，这种很微薄的利潤还要减少。但是，这种利潤的减少从工人工資的削減和國內貧困現象的迅速增长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英国为自己的工商业优势而付出的自然价格。

1854、1855 和 1856 年联合王国从一些主要外国和  
英屬領地进口和向这些地方出口的价值对照表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計算价值	联合王国 产品的申 报 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計算价值	合 計
(单位: 英鎊)					
外 国					
俄 国·····	{ 1854	4 252 288	54 301	19 738	74 089
	{ 1855	478 169	—	—	—
	{ 1856	11 561 924	1 595 237	1 775 617	3 370 854
瑞 典·····	{ 1854	2 509 539	334 518	249 792	584 310
	{ 1855	2 325 171	545 384	279 515	824 899
	{ 1856	2 031 861	629 697	300 795	930 492
挪 威·····	{ 1854	1 369 440	402 290	106 244	508 534
	{ 1855	1 099 642	487 400	102 551	589 951
	{ 1856	947 934	488 489	143 080	631 569
丹 麦·····	{ 1854	2 706 186	758 228	230 010	988 238
	{ 1855	3 086 979	756 967	260 624	1 017 591
	{ 1856	2 201 831	1 033 142	352 173	1 385 315
普魯士·····	{ 1854	9 055 503	798 434	1 717 285	2 515 719
	{ 1855	10 242 862	1 100 021	2 016 650	3 116 671
	{ 1856	4 534 815	933 715	624 908	1 558 623
汉撒城市·····	{ 1854	6 221 524	7 413 715	2 720 274	10 133 989
	{ 1855	4 816 298	8 350 228	3 344 416	11 694 644
	{ 1856	5 302 739	10 134 813	3 260 543	13 395 356
荷 兰·····	{ 1854	6 731 141	4 573 034	2 320 877	6 893 911
	{ 1855	6 460 932	4 558 210	2 611 767	7 169 977
	{ 1856	7 433 442	5 728 253	2 434 278	8 162 531
比利时·····	{ 1854	3 631 161	1 406 932	1 948 740	3 355 672
	{ 1855	2 533 732	1 707 693	2 239 514	3 947 207
	{ 1856	2 936 796	1 689 975	2 323 042	4 013 017
法 国·····	{ 1854	10 447 774	3 175 290	3 216 175	6 391 465
	{ 1855	9 146 418	6 012 658	4 409 223	10 421 881
	{ 1856	10 386 522	6 432 650	4 038 427	10 471 077

(續)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計算价值	联合王国 产品的申 报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計算价值	合 計
(单位: 英鎊)					
西班牙.....	1854	3 594 501	1 270 464	165 642	1 436 106
	1855	4 799 728	1 158 800	135 192	1 293 992
	1856	3 645 083	1 734 483	377 820	2 112 303
古巴和波 多黎各.....	1854	3 369 444	1 073 861	4 727	1 078 588
	1855	2 332 753	1 077 745	22 933	1 100 678
	1856	2 654 580	1 398 837	25 190	1 424 027
葡萄牙.....	1854	2 101 126	1 370 603	148 997	1 519 600
	1855	1 962 044	1 350 791	184 580	1 535 371
	1856	2 164 090	1 455 754	433 470	1 889 224
双西西里王国...	1854	1 411 457	563 033	109 258	672 291
	1855	1 281 940	921 220	175 221	1 096 441
	1856	1 505 582	1 202 183	197 925	1 400 108
土耳其本部.....	1854	2 219 298	2 758 605	317 476	3 076 081
	1855	2 294 571	5 639 898	419 119	6 059 017
	1856	2 383 029	4 416 029	291 991	4 708 020
埃 及.....	1854	3 355 928	1 253 353	113 895	1 367 248
	1855	3 674 682	1 454 371	117 235	1 571 606
	1856	5 753 518	1 587 682	43 151	1 630 833
美国(包括加 利福尼亚) ...	1854	29 795 302	21 410 369	923 034	22 333 403
	1855	25 741 752	17 318 086	744 517	18 062 603
	1856	36 047 773	21 918 105	698 772	22 616 877
巴 西.....	1854	2 083 589	2 891 840	119 982	3 011 822
	1855	2 273 819	3 312 728	128 550	3 441 278
	1856	2 229 048	4 084 537	179 979	4 264 516
布宜諾斯 艾利斯.....	1854	1 285 186	1 267 125	32 565	1 299 690
	1855	1 052 033	742 442	26 383	768 825
	1856	981 193	998 329	43 892	1 042 221
智 利.....	1854	1 380 563	1 421 855	43 589	1 465 444
	1855	1 925 271	1 330 385	56 688	1 387 073
	1856	1 700 776	1 396 446	64 492	1 460 938



(續)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計算价值	联合王国 产品的申 报 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計算价值	合 計
(单位: 英鎊)					
秘 魯.....	1854	3 138 527	949 289	22 236	971 525
	1855	3 484 288	1 285 160	60 278	1 345 438
	1856	3 048 694	1 046 010	26 154	1 072 164
中国 (包括..... 香港)	1854	9 125 040	1 000 716	26 400	1 027 116
	1855	8 746 590	1 277 944	26 052	1 303 996
	1856	9 421 648	2 216 123	70 611	2 286 734
非洲西岸 (不 包括英国領... 地和法国領 地)	1854	1 528 896	646 868	174 073	820 941
	1855	1 516 729	839 831	219 827	1 059 658
	1856	1 657 375	666 374	223 842	890 216
外国总计.....	1854	118 239 554	63 800 605	15 645 612	79 446 217
	1855	109 959 539	69 524 475	18 710 749	88 235 224
	1856	129 517 568	83 327 154	20 035 442	103 362 596
<b>英国領地</b>					
加拿大.....	1854	4 007 052	3 957 085	180 569	4 137 654
	1855	2 296 277	1 515 823	90 298	1 606 121
	1856	3 779 741	2 418 250	123 591	2 541 841
新不倫瑞克.....	1854	2 079 674	863 704	40 273	903 977
	1855	4 379 041	370 560	27 718	398 278
	1856	1 891 707	572 542	34 322	606 864
英屬西印 度群島.....	1854	3 977 271	1 870 674①	166 690	2 037 364
	1855	3 978 278	1 389 992	136 022	1 526 014
	1856	4 157 098	1 462 156	180 799	1 642 955
英屬圭亚那.....	1854	1 636 267	— ②	31 779	31 779
	1855	1 491 935	421 398	35 189	456 587
	1856	1 418 264	411 241	41 248	452 489

① 包括英屬圭亚那。

② 已計入西印度。

(續)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計算价值	联合王国 产品的申 报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計算价值	合 計
(单位: 英鎊)					
澳大利亚的 英国移民区...	1854	4 301 868	11 931 352	1 474 634	13 405 986
	1855	4 500 200	6 278 966	942 659	7 221 625
	1856	5 736 043	9 912 575	1 759 814	11 672 389
英屬东印度.....	1854	10 672 862	9 127 556	493 154	9 620 710
	1855	12 668 732	9 949 154	404 321	10 358 475
	1856	17 262 851	10 546 190	478 328	11 024 518
錫 兰.....	1854	1 506 646	382 276	31 228	413 504
	1855	1 474 251	305 576	20 321	325 897
	1856	1 304 174	388 435	22 660	411 095
毛里求斯島.....	1854	1 677 533	383 210	17 936	401 146
	1855	1 723 807	303 173	14 772	317 945
	1856	2 427 007	420 180	16 977	437 157
好望角和英国 南非洲領地...	1854	691 352	921 957	63 309	985 266
	1855	949 640	791 313	45 437	836 750
	1856	1 502 828	1 344 338	73 127	1 417 465
英国領地总計...	1854	34 149 499	33 384 121	2 990 754	36 374 875
	1855	33 583 311	26 163 610	2 292 466	28 456 076
	1856	43 026 586	32 499 794	3 357 963	35 857 757
外国和英国 領地总計.....	1854	152 389 053	97 184 726	18 636 366	115 821 092
	1855	143 542 850	95 688 085	21 003 215	116 691 300
	1856	172 544 154	115 826 948	23 393 405	139 220 353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 月 7 日  
左右

載于 1858 年 2 月 3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23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解救

我們终于得到科林·坎伯尔爵士关于解救勒克瑙的正式报告。这个报告在各方面证实了我們根据这次战斗行动的最早的非官方报道所做的結論<sup>①</sup>。奥德人的抵抗不堪一击,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得更加明显,而另一方面,坎伯尔本人所引以自豪的似乎更多的是他个人指揮的高明,而不是他或他的军队所表現的任何非凡的英勇。这个报告說,英軍兵力約 5 000 人,其中步兵 3 200 人,騎兵 700 人,其他为炮兵、水兵、工兵等。如同以前所报道的,战斗行动是以对迪尔庫什的进攻开始的。这个宮苑經過短时间的战斗后被攻下。“損失微不足道。敌人由于迅速退却,損失也很輕微。”在这种情形下,确实沒有机会表現英勇精神。奥德人退却非常仓卒,甚至来不及利用拉馬蒂尼埃尔附近地形所提供的新防綫,就一下子通过了这个地区。比較頑强的抵抗的最初表現是在錫康德尔巴格。这是一个由开有射孔的高大圍牆圍护着的、长寬各 120 碼的方形障地,在相距約 100 碼的地方有一个設防的村庄作为側防。在这里,坎伯尔采用了他那虽非勇敢但却謹慎的作战方法。重炮和野炮集中火力对这个宮殿的圍牆进行轰击,一个旅攻打設防的

<sup>①</sup> 見本卷第 381—387 頁。——編者注

村庄，同时另一个旅把試行出击的敌人打回去。防御是很差的。像刚才所說的那两个可以相互以火力支援的筑有工事的陣地，即使由很普通的士兵，或者甚至由虽然勇敢但毫无训练的起义者防守，通常也需要相当大的努力才能攻下。但是这次似乎抵抗既不勇敢，动作又不配合，甚至連一点合乎常識的东西都沒有。沒有任何报道提及防守者曾使用过炮兵。村庄（显然只有很少几戶人家）一攻而下。在圍墙外的部队，不費什么力气就被打散了。这样，錫康德尔巴格很快就被完全孤立起来。經過一小时的炮击以后，有一处圍墙被破坏，苏格兰团的士兵便闖进这个缺口，消灭了所有的防守者。据科林·坎伯尔爵士說，在那里約有 2 000 个土人被杀。

下一个据点是夏納治夫，这个陣地四周有圍墙，設有防御工事，有一座清真寺作为多面堡；它又是那些虽然勇敢但沒有受过充分训练的部队的任何一个指揮官所求之不得的那种陣地。在三个小时的炮击使圍墙遭到破坏以后，这个地点就被攻下。次日，11月17日，攻打軍人餐厅。这是周圍有土墙和由12呎寬的陡壕环繞的一群建筑物，換句話說，这是壕沟不大、胸墙的厚度和高度都成問題的很平常的野战工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陣地在坎伯尔將軍看来似乎是很难攻取的，因为他立即决定先給炮兵以充分時間摧毁这个陣地，然后再发起攻击。于是，炮击繼續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直到下午3时，才出动步兵，一举夺取了陣地。总之，在这里也沒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在通往駐劄官官邸路上的奥德人的最后一个据点馬提-馬哈尔，被炮轰了一个小时，打开几个缺口以后，便不費力气地被攻下来。这样就結束了解救警备部队的战斗。

整个战斗行动都帶有这样一种性质：訓練有素、配备有足够的軍官、习惯于作战并且具有一般勇气的欧洲軍隊，进攻一群既未受

过任何训练，又没有军官，也没有作战经验，甚至没有足够的武器，并且还由于感到敌人有双重优势——士兵对平民和欧洲人对亚洲人的优势——而丧失了勇气的犹如乌合之众的亚洲人。我们看到，科林·坎伯尔爵士似乎无论在哪里都没有遇到敌人炮兵的抵抗。往下，根据英格利斯准将的报告，我们还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起义军一定根本没有火器；并且如果确实有2000土人在锡康德尔巴格被屠杀，那末很显然，他们一定没有配备什么武器，否则，哪怕最胆小的人也能抵抗住一个进攻的纵队，守住这个阵地。

另一方面，坎伯尔将军在指挥战斗方面所表现的战术修养是很值得称赞的。他一定了解到，由于敌人没有炮兵，他的前进是不会遇到抵抗的；因此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兵种来为他的纵队的攻击扫清道路。对锡康德尔巴格及其侧防工事的攻击是进行这种战斗的范例。同时，当他一弄清防御微弱无力时，他就对这种敌人不再客气；只要围墙上一打开缺口，他就立即出动步兵。一般地说，从在勒克瑙作战之日起，科林·坎伯尔爵士就可以归入将帅之列；在此以前，他只是一名大兵而已。

勒克瑙解围后，我们终于得到一份叙述驻劄官官邸被围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的文件。继亨·劳伦斯爵士之后担任指挥的英格利斯准将，向总督提出了报告。根据乌特勒姆将军的说法和英国报纸的 *unisono* [一致意见]，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英雄行为的范例，的确，因为据说，这种勇敢顽强的精神，这种不辞劳苦、不畏困难的毅力是从来不曾见到过的，这次勒克瑙的防御在抵御围攻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英格利斯准将的报告告诉我们，6月30日，英军曾出击当时正好在驻劄官官邸周围集中的士兵，但是被击退，损失惨重，以致他们不得不立即只限于防守官邸，甚至把附近一批存

放有 240 箱火药和 600 万发枪弹的建筑物也放棄和炸毀了。敌人立即包圍了官邸, 攻占并加固了与它毗邻的一些建筑物(有些距防御工事不到 50 碼), 这些建筑物是先前亨·劳倫斯爵士不听工兵的劝告而拒絕予以拆毀的。英軍防御工事的胸墙到这时还没有全部修筑好, 只有两个炮兵連的陣地可以投入战斗; 但是尽管 8 000 人“不間断地”以可怕的連續的火力“同时向陣地”射击, 英軍还是迅速完成了工事的构筑, 設置了 30 門火炮。这种可怕的火力一定是漫无目标的乱射, 絕對够不上英格利斯將軍所称的准确射击, 不然的話, 約有 1 200 人防守的官邸中还会有一个人幸存嗎? 为了证实这次射击的可怕而举出的事例, 如呆在被认为隱蔽严密的地方的妇女、儿童和伤員被打死, 是很不成功的例子, 因为这种情况正是在敌人的火力不是对准一定的目标而是对准整个防御工事, 因而从来不会杀伤真正的防守者时最容易发生的。7 月 1 日, 劳倫斯受了致命伤, 英格利斯继任指揮。这时敌人在陣地上有 20 到 25 門火炮, “都配置在我們的周圍”。这对防守來說是很幸运的, 因为如果敌人集中火力对垒墙的一点或两点射击, 陣地很可能被攻占。这些火炮中有一部分配置在“我們自己的重炮射击不到”的地点。而由于駐劄官邸位于高处, 进攻者配置在这些地点的火炮就不可能射到垒墙, 而只能射到駐劄官邸內建筑物的頂部; 这对于防守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这不会引起很大的損害, 而如果用这些火炮来轰击胸墙或街垒, 是会收到大得多的效果的。总之, 看来双方的炮兵都使用得很糟, 否則, 像这样短距离的炮击, 会由于相互摧毀对方的炮兵陣地而很快停止下来的。但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 这一直是个謎。

7 月 20 日, 奧德人在胸墙下进行了一次爆破, 但胸墙并没有

被炸坏。紧接着,两支主要的队伍进行强攻,同时在其他地段上进行了佯攻。但是警备部队一开火,就把他们打退了。8月10日,又进行了一次爆破,炸开了一个缺口,

“从这里可以秩序井然地通过整整一个团。一个纵队在两翼助攻下向缺口攻击,但是只有少数最坚决的敌人才到达了缺口”。

这些为数不多的敌人很快被警备部队的侧射火力击毙,而这时在两翼上进攻的一群未受训练的敌人被手榴弹和几次步枪齐射火力击退。8月18日,进行了第三次爆破,又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接着发起的强攻比以前几次更软弱无力,很容易地就被打退了。最后一次爆破和强攻是在9月5日发生的,但是攻击又在手榴弹和步枪火力下被打退了。自此以后,一直到援军开来时为止,围攻似乎变成了简单的封锁,只是断断续续有步枪和火炮的射击。

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战斗。由勒克瑙及其周围地区居民组成的5万人或者甚至更多的人群,其中还可能包括5000或6000名受过训练的士兵,把1200或1500名欧洲人封锁在勒克瑙的驻劄官官邸,企图迫使他们投降。封锁者竟然如此束手无策,以致虽然截断了警备部队与康波尔的联络,但显然始终未能使他们的补给完全断绝。这种所谓“围攻”无非是亚洲的愚昧和粗野以及在欧洲人统治时期得来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的一种混合物而已。显然,在奥德人中间,有一些炮兵和工兵人员知道如何设置炮位,但是他们的工作看来只限于构筑防避敌人炮火的掩蔽工事。看来,他们甚至把构筑掩蔽工事的方法改进到这种程度,以致使他们的炮台不仅对于射手们是十分安全的,而且对于被围者也是十分无害的,因为在这样的掩蔽工事里,没有一门炮能够有效地射击。这些火炮也没有好好地射击过,否则怎样解释这样罕见的事实,即驻劄官

官邸內的 30 門火炮和官邸外的 25 門火炮彼此在極近的距离（有些甚至不超過 50 碼）相互射擊，可是我們却沒有聽說有火炮被打壞或者一方迫使另一方停止射擊？至於說步槍射擊，我們首先要問：8 000 名土著士兵在英軍炮台附近的步槍射程以內占領陣地而沒有被炮兵擊退，這怎麼可能呢？如果他們果真在那里占領了陣地，那末他們為什麼沒有把所有的防守者打死打傷呢？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告訴我們說，他們的确在那里保有陣地並且夜以繼日地射擊，而且不管有這一切情況，在 6 月 30 日以後最多只可能有 500 人並且不得不承擔抵抗圍攻的全部重擔的第三十二團，在圍攻結束時仍然有 300 人！這不是完全抄襲那個開往普魯士時有軍官 88 名和士兵 1 815 名的“第四（波蘭）團最後有 10 人生還”的故事，又是什麼呢？英國人說得非常正確，像勒克瑙這樣的戰鬥是從來沒有過的，——確實是從來沒有過的。儘管英格利斯的報告語氣謙遜，表面看來並不虛夸，但是他的一些奇怪的說法，如火炮配置的位置使人無法還擊，8 000 名士兵日夜射擊而沒有任何效果，有 5 萬起義者封鎖他，子彈飛到根本沒有必要去的地方而造成了損傷，敵人非常堅決地進行攻擊，然而總是毫不費力就被打退，——所有這些說法使我們不得不承認，整個報告顯然過於夸大，一點都經不起公正的批評。

但是被圍者一定經受了異乎尋常的困難吧？請聽：

“土著僕役不敷用，這也是嚴重困苦的根本。有些太太不得不自己照管孩子，甚至自己洗衬衣，自己烹調簡單的飯食而完全沒有人幫忙。”

可憐的勒克瑙的太太們！固然，在這種動蕩不安的時代里，旦夕之間就改朝換代，革命和經濟破產使一切人生幸福都變得異常飄搖不定，要是我們聽說某一位舊日王后不得不親自縫補甚至洗



袜子,更不用說亲自烹制羊肉餅,我們是不会深表同情的。但是問題是一位英印夫人,是退伍軍官、印度政府官員、商人、办事員或冒險家的那一大批姊妹、表姊妹或侄女当中的一个,是那每年,或者更确切地說,在爆发起义前每年直接从寄宿学校送到印度广大的婚姻市場上去(和漂亮的切尔克斯女人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市場上去是同样魯莽而且常常是更不情願)的女郎中的一个,——只要一想到这样一位太太不得不亲自洗衬衣,亲自烹調簡單的飯食而完完全全沒有人帮忙,你就会火上来!完全沒有“土著僕役”,唉,还得自己照管孩子!真是气人,真是还不如在康波尔的情形哪<sup>①</sup>!

圍攻駐劄官官邸的人群也可能有5万人,但其中絕大部分显然不可能有火器。8000名“准确的射手”可能有火器,但是他們的武器怎样,他們是些什么样的射手,从他們的射击效果就可以看出。事实证明,他們的25門火炮使用得非常糟糕。掘壕和射击一样,毫无目的。攻击甚至連偵察动作都够不上。圍攻者的情形就是这样。

被圍者的毅力值得大大称贊,他們坚持了大約五个月,而且在这当中的大部分時間里沒有得到英軍的任何消息。他們战斗着,存着万一的希望,正像必須以尽可能更高的代价献出自己的生命并且保护妇孺免遭亚洲人殘杀的人們所应当做的那样。的确,他們的坚定和頑强应得到应有的評价。但是在知道了威勒尔在康波尔投降的結局以后,誰还会有另外的做法呢?

至于想把勒克瑙的防禦說成是一件英勇作战的无可比拟的范例,那簡直是可笑的,尤其是在讀了英格利斯將軍不高明的报告以

---

<sup>①</sup> 見本卷第302—303頁。——編者注

后更是如此。警备部队所受的艰苦也无非是缺乏可以抵御恶劣气候的房舍(但气候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疾病);至于食粮,那末最坏的也不过是“粗劣的牛肉和更粗劣的面粉”,比欧洲被围困的士兵所常吃的饭菜要好多了!只须把这次勒克瑙对一群愚昧无知的野蛮人的防御与1832年安特卫普的防御或者与1848—1849年威尼斯附近马尔格腊堡垒的防御<sup>278</sup>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更不用说塞瓦斯托波尔,托特列本将军在那里遇到的困难比英格利斯将军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围攻马尔格腊堡垒的是奥地利最优秀的工兵和炮兵,而防守它的是一支新征入伍的人数不多的部队;守军有五分之四没有避弹所;低洼的地势引起了瘧疾,这比印度的气候更危险;将近100门火炮对堡垒进行射击,并且在最后三天的炮击中每分钟发射40发炮弹。尽管如此,堡垒还是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如果不是奥军占领了一处重要的障地,迫使防守者退却的话,一定还能坚持更长的时间。或者以但澤的例子来说,拉普率领由俄国撤回的法军残部,在这里坚守了十一个月<sup>279</sup>。实际上拿现代任何一次像样的围攻作例子,你都会发现,虽然被围者所面临的众寡悬殊的局面丝毫不亚于这次勒克瑙的情形,但是他们却施展了更大的本领,表现了更高的士气,在胆略和毅力方面也毫不逊色。

奥德的起义者虽然在战场上不堪一击,但在坎伯尔到来后立刻表现出民族起义的力量。坎伯尔马上看出,用他的兵力不但不能攻击勒克瑙市区,而且也守不住自己的障地。这是极其自然的,而且只要仔细研究过法军在拿破仑时代入侵西班牙的史实的人,都一定能理解这种情形。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因此,坎伯尔和组织进攻时一样精心地布置了撤退。他还攻占了驻劄官

官邸附近的几处障地。他这样做是为了欺騙敌人，不让他们看出他的企图，发觉退却的准备。除了一支不大的预备队外，整个军队都被大胆地（对付这种敌人完全可以这样）分散配置在前哨线上，在前哨线掩护下撤退妇女、伤病员和辎重。这一预备行动一完成，被派出的前哨就撤回来，逐渐集中成较大的部队，而其中最前面的部队则通过后一道前哨线退到后方组成预备队。这次调动自始至终有条不紊地实现了，没有受到起义者的任何干扰。除了留在阿朗巴格的一小支由乌特勒姆率领的警备部队外（暂时还不清楚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整个军队就这样撤出奥德王国，开往康波尔。

在这个期间，康波尔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凸角堡英雄”温德姆<sup>280</sup>——又是一位据说已经以个人的非凡英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的军官，——于26日击溃了瓜廖尔部队的前卫，但是在27日他自己却遭到惨败；他的兵营被攻占和焚毁，而他本人不得不躲在威勒尔使用过的康波尔的古堡中。28日，起义者攻击这个障地，但是被击退了，而在6日，坎伯尔击溃了他们，自己几乎未受任何损失，缴获了他们所有的火炮和辎重并追击了14英里。关于所有这些行动的详细报道目前还很缺乏，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印度起义还远未被镇压下去，虽然英军大部分甚至全部增援部队已在印度登陆，但是他们几乎莫名其妙地都消失了。大约有2万人在孟加拉登陆，可是现在作战的部队仍然不比攻占德里的时候多。这里有点不妙。很可能，气候使新开来的部队受到极大的消耗。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月14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8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36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馬克思

# 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債

1858年1月22日于倫敦

因大量資金从通常的生产性使用領域抽出来从而轉入証券市場而造成的倫敦金融市場上的兴隆气象，最近两周以来由于可能即将发行 800 万或 1 000 万英鎊的**印度公債**而略微减色了。将在英国举借、并且議会在 2 月間一开会即应予以核准的这项公債，目的是为了滿足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債主对该公司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偿付因印度起义而引起的有关軍用物資、軍需品和部队調动等項特別开支。1857 年 8 月議会閉会前夕，英国政府曾經在下院郑重宣布，它根本不打算发行这种公債，因为該公司本身的財政后备对应付紧急局面綽綽有余。但是这样給予約翰牛的美妙幻想，在东印度公司通过极端可疑的手段攫取了各公司交給它在印度修筑铁路用的大約 350 万英鎊、此外还秘密地向英格蘭銀行借用了 100 万英鎊、另外又向倫敦各家股份銀行借用了 100 万英鎊的消息傳出来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公众因此而对最坏的情况有了心理准备时，政府終於决定扯下假面具，在“泰晤士报”、“地球报”以及其他的政府机关报上通过半官方的文章公开承认了发行公債的必要性。

可能有人会問，发行这种公債为什么需要立法部門的特別法

令,而且为什么这种事件竟会引起人們的顾虑。要知道,現在英国資本正在徒劳无益地寻求有利可图的使用領域,在这种情况下为它提供的任何出路似乎都应该算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和制止資本迅速貶值的絕妙途徑。

大家知道,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在 1834 年就停止了,当时取消了它还保有的一个主要的商业利潤来源,即对华貿易的壟断权<sup>281</sup>。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有者至少在名义上是从該公司的商业利潤中領取紅利,所以必須采取新的財政措施来予以保证。于是一向靠該公司的商业利潤来支付的紅利,开始靠它的政治收入来支付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从此以后应该从該公司作为印度政府所得的收入中領取紅利,該公司的总数为 600 万英鎊的支付 10% 利潤的股票,則由于議会的法案而变成了价值 100 万英鎊的股票按 200 万英鎊結算的資本。換句話說,东印度公司原来的 600 万英鎊的股份資本变成了 1 200 万英鎊由印度居民稅收中支付 5% 利潤的資本。于是,东印度公司的債務借助議会的魔法变成了印度人民的債務。此外,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本国还借用了 5 000 多万英鎊,这笔債務只有靠这个国家的国家收入来偿还。該公司在印度本国所借的这种債款,一向被认为是議會立法无权过問的,是同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所借的債款一样与它毫无关系的。

然而在英国本国,东印度公司如果没有議会的特別批准就不得举借有息債款。几年以前,該公司着手在印度修筑铁路和架設电报綫的时候,曾請求允許它在倫敦市場上发行印度債券,当时它得到允許发行 700 万英鎊仅以印度国家收入为担保的四厘本票。在印度起义开始时,这些本票还只发行了 3 894 400 英鎊,而它現

在又必須向議會提出請求，这表明，在印度起义期間，东印度公司已經把它在英国发行公債的合法权利使用淨尽了。

如今尽人皆知，东印度公司在重新采取这一步驟以前，曾在加尔各答发行公債，但是遭到彻底的失敗。一方面，这证明印度資本家对于英国在印度的統治的前途远不如倫敦報紙那样乐观；而另一方面，这使約翰牛极端恼怒，因为他知道，最近七年当中在印度如何大量地积存了資金，按照最近公布的哈格德和皮克斯萊公司的报告，仅仅从倫敦港口运往印度的金銀就有 2 100 万英鎊。倫敦“泰晤士报”以最肯定的語气告誡自己的讀者道：

“在促使土著居民忠誠于王室的一切方法中，最可靠的就是使他們变成我們的債主；而另一方面，最易使这种容易激动、心思隱秘和貪得无饜的民族产生不滿和叛离情緒的，也莫过于使他們感到，每年向他們征稅，是为了給別国的富有的債主分送紅利。”

但是印度人对于这种不仅能靠印度資本恢复英国統治而且还能間接为英国商业打开印度宝藏的計劃的全部妙处，也許并不理解。的确，如果印度資本家真的热爱英国的統治，像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把这当做一种信条，那末再也不可能給他們一个比这更好的表示忠誠和奉献白銀的机会了。可是，既然印度資本家緊閉錢柜，約翰牛只好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真理，即对印度起义的开支，至少在最初一个时候，得由自己掏腰包，而得不到土著居民的任何协助。不但如此，即将发行的公債只是一个开端，就好像是“英印內債”这本总賬簿的第一頁。誰都知道，东印度公司需要的不是 800 万或 1 000 万英鎊，而是 2 500 万到 3 000 万英鎊，甚至这个数目也还只是第一笔开銷，而且不是做新的用途，而是为了偿付旧債。最近三年預算的赤字是 500 万英鎊，根据印度的政府报

紙“鳳凰”<sup>282</sup> 的报道，截至去年 10 月 15 日，起义軍从国庫中劫掠了 1 000 万英鎊；由于起义，东北各省的收入减少了 500 万英鎊，而軍費至少是 1 000 万英鎊。

誠然，东印度公司在倫敦金融市場上接二連三的举債，会提高貨幣价值，防止資本的日益貶值，也就是說，防止貼現率的繼續下跌；但是这种下跌正是为活跃英国工商业所必需的。对貼現率下跌作任何人为的阻止，就等于生产費用和信用价值的提高，而这种提高是目前还孱弱的英国工商业所不堪忍受的。这就是对于宣布发行印度公債发出一片怨声的原因。虽然議会的批准沒有給該公司举債提供帝国方面的保证，但是如果按照別的条件不能弄到錢，这种保证就必须提供，而且当东印度公司一旦被英国政府所取代，它的債務就会不分彼此地与英国的国債合而为一。因此，本来就重的国債的进一步增长，也許将是印度起义的初步財政后果之一。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 月 2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2 月 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243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温德姆的失败<sup>283</sup>

正当整个英国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物色善于组织和统率英军的人才的时候，正当像腊格伦、辛普森和科德林顿这样的庸才被授予指挥权的时候，在克里木却有一位堪称将才的军人。我们说的就是科林·坎伯尔爵士，他现在每天都在印度证明：他精通本行的业务。在克里木，坎伯尔受命在阿尔马河畔指挥一个旅，可是，英军死板的线式战术使他在那里无从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后，他就被留在巴拉克拉瓦，再也没有让他参加后来的战斗行动。但是，他的军事天才很早以前就在印度为一个权威人士所赏识，这个人就是英国自马尔波罗以来所推崇的最伟大的将领查理·詹姆斯·纳皮尔爵士。不过，纳皮尔为人刚直，过于高傲，不甘心在当权的寡头集团面前卑躬屈膝，因此，他的推荐只足以使坎伯尔成为名声不好、不可信赖的人物。

于是，克里木战争的功劳和荣誉落到了别人身上。其中有威廉·芬威克·威廉斯，即卡尔斯爵士，他现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靠恬不知耻、自吹自擂和窃取理应归克美蒂将军的功劳等手段所得来的荣誉。从男爵的封号，每年一千英镑的薪金，乌里治的美差和议会的席位——这一切完全足以使他不必要自己的名誉到印度去冒险。和他不同，“凸角堡英雄”温德姆将军却率领一师人去攻打



西帕依，可是他的最初几次行动就使他信誉扫地。就是这位温德姆是一个有很好的家族关系的不出名的上校，曾在攻打凸角堡时指挥一个旅，作战极其迟钝无力；最后，因为援军未到，他两次棄置自己的部队于不顾，自己回到后方去探听援军的消息。这种十分可疑的行径，在别的军队里一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追究，可是他反而因此立即晋升为将军，不久以后又被任命为参谋长。

当科林·坎伯尔开始向勒克瑙进攻的时候，他把康波尔的古堡、兵营和城市连同恒河大桥都交给温德姆将军掌管，还给他留下一支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队伍。这支队伍包括5个步兵团（有的满员，有的缺额）、许多要塞炮、10门野炮、两门海军炮以及100名骑兵，共2000多人。正当坎伯尔在勒克瑙作战的时候，游散在达普的各路起义队伍就集合起来，准备袭击康波尔。除了由起义的柴明达尔<sup>236</sup>所招募的各种乌合之众以外，这支袭击的队伍中还有受过训练的部队（不能认为他们受过正规军的训练）；这就是第纳普尔的西帕依的残部和瓜廖尔部队的一部分。后者可以说是编制超过连以上的唯一的起义部队，因为他们过去几乎全部由土著军官指挥，所以，有自己的陆军校官和尉官，还维持着类似有组织的营的规模。由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对他们具有相当的戒心。温德姆奉有严格指示，仅仅进行防御，但是由于联络中断，没有接到坎伯尔对他的报告的答复，他就决定个人负责，采取行动。11月26日，他率领步兵1200人和骑兵100人并携带火炮8门去迎击进攻的起义者。他很容易就把他们的前卫击溃了，可是后来发现起义者的主力部队接近，就退到康波尔城下。在这里，他在城市前面占领阵地，把第三十四团配置在左翼，把猎兵（5个连）和第八十二团的两个连配置在右翼。退路是穿过城市，在左翼后方还有几座砖窑。在

距正面 400 碼以及更靠近两翼的某些地方有丛林和莽林，成为进攻的敌軍的絕妙掩蔽。老实說，再也选不出比这更坏的陣地了：英軍配置在开闊的平地上，而印度人却能够依靠掩蔽接近到三四百碼的距离！从下面这一情况更能清楚地看出温德姆的“英勇精神”：就在附近，有一处十分合适的陣地，陣地前后都是平地，前面还有运河作为屏障；但是，他当然坚持选择最坏的陣地。11月27日，敌人把火炮推进到莽林所形成的掩蔽地的边沿，开始射击。温德姆以英雄所特有的謙逊态度，把这叫做“轰击”，并且說，他的队伍在这种轰击之下支持了五个小时。但是在这以后所发生的事，无论是温德姆或在場的任何人，无论是印度报纸或英国报纸，直到現在都不敢报道。自从炮击轉入会战时起，向我們提供消息的一切直接来源都断絕了，我們只能从手头所有的含糊不清、模稜两可而又不完整的材料中做出自己的結論。温德姆只做过如下的毫无条理的报道：

“我軍冒猛烈的轰击，抵抗敌人的攻击（把对野战部队的射击称为**攻击**，真是奇聞！）达五个小时之久，并繼續守住陣地，直到我从第八十八团士兵所杀死的敌軍人数上知道暴徒已完全突入城市时为止；当**有人向我报告**，他們正在攻击堡垒时，我就命令杜毕伊將軍撤退。天黑前不久，全軍携带全部軍需品和火炮退入堡垒。由于随軍僕役逃散，我未能将兵营設備和一部分輜重撤出。如果不是在傳達我的命令时发生差錯，我相信，我能够把陣地至少坚守到天黑。”

温德姆將軍以他在凸角堡时所表現的那种本能去到預备队（因为我們应当得出的結論是：第八十八团当时占領着城市），在这里他遇到的不是活着并且战斗着的敌人，而是被第八十八团士兵杀死的大量敌人，而这事实就使他得出結論：敌人（他沒有說是死的还是活的）已完全突入城市！这个結論对于讀者以及对于他本人來說当然都是令人惊恐不安的，但是，我們的英雄并不此为

止。他得到报告說，堡垒受到攻击。任何一个别的將軍都会考察一下这种傳說的虚实，当然会发现这是假的。可是温德姆却不这样。他下令撤退，尽管說，要不是在傳达他的一項命令时发生了錯誤，他的部队可以把陣地至少坚守到天黑！由此我們首先可以看到温德姆的合乎英雄身分的結論是，凡是西帕依死亡甚众的地方必定是活着的西帕依甚众的地方；第二，关于堡垒的攻击是一場虛惊；第三，在傳达命令的时候发生了錯誤。这三个不幸合起来就使得人数众多的一群土著士兵打敗了凸角堡英雄，挫折了他的部下所具有的百折不撓的英国式的勇气。

另一个当时在場的軍官报道說：

“我不相信有誰能够确切地描写今天上午所发生的战斗和退却。退却的命令已下达。皇家第三十四步兵团奉令退到磚窑后面去，但是無論是該团的軍官或士兵都不知道磚窑在什么地方！消息很快就傳遍軍隊駐地，說我軍被击潰，正在退却。于是所有的人都拚命闖入內堡，其勢不可阻擋，有如尼亚加拉瀑布的洪流。数不清的步兵和水兵、歐洲人和本地人、男人和妇孺、馬匹、駱駝和犍牛，从下午 2 时开始就向內堡涌来。到夜里，营垒挤滿了人群、牲畜、貨物、行李和成千上万难以言状的累贅物，真像混沌初开时一样乱成一团。”

最后，“泰晤士报”駐加尔各答記者报道，英国人显然在 27 日吃了“极像敗仗的一次亏”，但是英印报纸从爱国的观点出发，用慈悲心腸把这个耻辱密不透風地包藏起来了。然而他們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大部分由新兵組成的皇家步兵团，虽然沒有放棄自己的陣地，但在轉瞬間陷入了混乱；由于温德姆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軍隊，堡垒里极度混乱，一直到 28 日晚上坎伯尔到来，“申斥了几句”，使所有的人回到自己的崗位时为止。

那末，从所有这些混乱不清和支吾搪塞的报道里可以得出的明显結論是什么呢？結論只能是这样的：温德姆的无能的指揮使

英軍吃了一次大敗仗，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下令撤退的时候，第三十四团的軍官由于根本没有认真熟悉作战的地形，无法找到他們奉命撤退的地点，全团陷入混乱，终于逃散；这引起了兵营里的惊慌，結果所有的秩序和紀律都破坏了，兵营設備和一部分輜重遭到了損失；最后，和温德姆关于軍需品的說法相反，15 000 发米涅枪彈、錢柜以及够很多团和新兵穿用的鞋子、服装都落在敌人手里。

英国步兵在組成橫队或者纵队时都很少潰逃。和俄国步兵一样，他們具有那种通常只是老兵才有的自然的結合力，这固然部分地是由于在两国軍队中都有很大数目的老兵，但部分地显然也是由于他們的民族特性。这种性格与“勇敢”毫不相同，相反地，不如說是自卫本能的一种独特的表現，虽然如此，它还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在防禦中。此外，这种性格同英国人冷靜的天性一样，也可以防止惊慌失措；但是必須指出，当爱尔兰部队一旦陷于混乱而惊慌失措时，是不容易重新整頓他們的。11月27日，温德姆所面临的情况正是这样。今后，他将列入那些使自己的軍队惊慌逃散的、为数不多但却引人注目的英国將軍的名单了。

28日，瓜廖尔起义部队得到了从比都尔来的大量援軍，并前进到距离英軍筑有工事的前哨400碼的地点。战斗再起，但进攻者作战十分无力。这次，第六十四团的官兵树立了真正英勇的例子，我們乐于指出这一点，虽然事迹本身和有名的巴拉克拉瓦进攻<sup>284</sup>一样，是不足取的。这件事的責任也是推到一个陣亡者即該团的威尔逊上校身上。据傳他曾率領180名士兵向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敵軍防守的4門火炮攻击。我們沒有听說，敵軍是哪里的队伍；但是战斗的結果使我們得出結論：这是瓜廖尔的部队。英軍

靠急襲夺取了火炮，釘塞了其中 3 門火炮的火門并且坚守了一些时候，但由于沒有得到援軍，不得不退却，牺牲了 60 名士兵和大部分軍官。这些損失說明了战斗的激烈。在这里，我們所說的这支小部队，从它所受的損失来看，必然是受到了敌人猛烈的回击，但是他們坚守炮台陣地直到他們的人死伤三分之一时为止。这的确是一場激战，而且是德里被攻占以来进行激战的第一个例子。然而，策划这次进攻的人应送交軍事法庭审判并枪决。温德姆說，这是威尔逊干的。但是威尔逊已經陣亡，不能答辯了。

晚間，英軍全部被赶入堡垒，这里仍然混乱不堪，大桥处的陣地处于显然的危險之中。但是这时坎伯尔来到了。他恢复了秩序，早晨調来了生力軍，把敌人赶到相当远的地方，使大桥和堡垒脱离危險。然后，他把全部伤员、妇孺和行李送过河去，自己則固守防御陣地，直到这些人沿着去阿拉哈巴德的道路走出很远时为止。他把这件事一办完，立即于 12 月 6 日向西帕依进攻，把他們击潰，而且他的騎兵和炮兵在当天把他們追击了 14 英里。从坎伯尔的报告可以看出，起义者抵抗微弱，因为他只叙述自己的軍隊如何前进，根本沒有提敌軍有什么抵抗或机动；这里沒有抵抗，沒有战斗，而只是一場 *battue* [屠杀]。霍普·格兰特准将率領輕装师追击逃敌，8 日在渡河时追上了他們；这使他們陷入絕境，于是轉身反抗，遭到了惨重的損失。坎伯尔在勒克瑙和康波尔的第一次战局于此結束。今后一定还有一系列新的战斗。关于这些战斗的初步发展情况，我們也許将在最近两三星期內听到。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2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2 月 20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253 号

## 卡·馬克思 对波拿巴的謀杀<sup>285</sup>

Quos deus vult perdere prius dementat〔上帝欲毀其人，必先夺其理智〕，看来，这是欧洲对法国篡夺者的极为普遍的看法。只不过几个星期以前，所有各个国家的、操着各种不同語言的无数趋炎附势的人們，曾異口同声地把这个篡夺者捧成人間的一位天神。現在，驟然間，当真正的危險剛剛临近，又认为这位半人半神的人物发疯了。但是，在那些不为初步印象所惑的人看来，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位布倫英雄<sup>286</sup> 今天一如既往，无非是一个賭徒。如果說他現在攤出最后一張牌，孤注一擲，那末不是这个人变了，而是賭运变了。以前也曾有过謀杀波拿巴的事件，可是从未对帝国的經濟状况产生任何显著后果。为什么1月14日爆炸的雷汞，不但炸死了許多人，而且結束了一种局面呢？勒佩勒蒂埃街上的手榴彈正同在巴腊克普尔分发的油脂子彈一样<sup>①</sup>，它們並沒有使帝国发生变化，而只是撕破了那块掩盖着已經发生的变化了的帷幕。

波拿巴得以飞黃騰达的秘密，一方面固然在于互相敌对的党派彼此弄得精疲力尽，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的 coup d'état〔政变〕恰好碰上了商业界进入繁荣期。因此，商业危机就必然破坏了帝国

① 見本卷第252頁。——編者注

的物质基础；至于說精神基础，除所有各階級和所有各党派暫時精神不振而外，帝国从未有过任何精神基础。工人階級一遭到失业，立刻又对現政府采取了敌对态度。工商业資產階級中一大部分人因危机而陷入的处境，恰好是曾經迫使路易-拿破侖加速其 coup d'état 的那种处境；大家知道，他是由于害怕被关进克里希的債務監獄才停止猶豫的。同样的原因會促使巴黎資產階級在 1848 年慌忙跑向街垒，而在目前則会使他們把任何政局動蕩当成上天的恩賜。現在已經完全证实，在恐慌心理达到高潮的时候，法兰西銀行按照政府的命令更換了所有到期的期票——順便提一下，这是該銀行再度被迫在 1 月 31 日提供的一个方便之門；但是这种暫緩清算債務的办法並沒有恢复商业的活跃，而只是使恐慌成为慢性的罢了。巴黎資產階級中另外一些占很大比重而且很有影响的人——petits rentiers [小食利者]，或者說有小額固定收入的人——由于交易所證券价格的巨大波动而遭到了彻底破产；这种波动是皇朝及其投机冒險的扈从們一手造成的，并且使他們大发其財。法国上层階級的一部分人，至少是自命代表所謂法兰西文明的那一部分人，除了把帝国当做必需的权宜手段以外，从来没有承认帝国，从来没有隱諱他們对那位“伯父的侄子”的仇視，而且近来只要一找到借口，就对那妄想把他們认为只不过是权宜手段的帝国变为永存体制的企图表示憤怒。这就是由于勒佩勒蒂埃街謀杀事件而表露出来的普遍情緒。另一方面，这种情緒的表露使冒牌的波拿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預感，使他不得不推出最后一張牌。“通报”就皇帝和皇后走出歌剧院遇到群众欢呼以及“公众的热情場面”写了大量报道。这个街头热情場面的价值如何，可由下述一段插曲看出。这段插曲是这件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傳出来的，并

且有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担保它真实可靠：

“14日夜晚，皇宫侍从室一位当晚不值勤的高级人员正穿过林荫道，忽然听到爆炸声，看到人们向歌剧院跑去。他也向那里跑，目睹了全部情景。当时他立即被人认出，有一个同所发生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对他說：‘噢，先生，看上帝的份上，去找一个土伊勒里宫里的人，派他去再找些马车来吧。要是找不到人，就請你亲自去一趟。’他听了以后，立刻就去寻找宫廷的侍从人员，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大大小小的侍从人员，从执事到僕役，除一两名忠勇可嘉者外，全都飞快地溜之大吉了。但是过了一刻钟的功夫，他终于抓到了一个信差，并且立刻要他到皇宫去办这件事。过了大约二十五分钟至半小时，他回到了勒佩勒蒂埃街，因为人太拥挤，費了很大力气才挤回到剧院的立柱廊上。四周仍然躺着受伤的人们，显然到处都是一团混乱。这位先生在不远的地方无意中看见了警察局长比埃特里先生，就喊住他，要他别走开，等着自己。这位先生一过去就立刻大声說：‘我求求你，赶快使这条街道断絕交通吧。一会又要有马车来了，这样是不能把马车赶到門前的。再說，請看这里乱成什么样子了。我求求你，清理一下街道吧。’比埃特里先生詫异地望了他一眼。‘清理街道！’——他应声回答說，‘街道已經清理过了。花了五分钟的功夫就把街道清理好了。’对方听后瞪起眼睛問他：‘那末，这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这密密层层的、挤得水泄不通的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比埃特里先生回答說，‘那全是我的人，現在勒佩勒蒂埃街这一段上没有一个外人；你所看到的全都是我的手下。’”

如果这就是“通报”所吹嘘的街头热情場面的秘密，那末，报上关于“謀杀事件发生后人们自动在林荫道上張灯結彩”的报道，当然騙不了曾經目睹这种張灯結彩場面的巴黎人，因为張灯結彩的仅限于那些替皇帝和皇后办事的商店。就連这些人也是逢人便說，在那个“鬼机关”爆炸之后半小时，警探曾登門造訪，提醒他們，應該立刻張灯結彩，表明他們如何为皇帝幸免于难而感到欢欣不已。

更能证明皇帝处于完全孤立地位的，是那些慰問辞和对他表



示忠誠的公众献辞的底細。在这些东西上面签名的人，沒有一个不这样或那样隶属于那个吸吮法国人民脂膏的无孔不入的寄生虫——政府，沒有一个不像木偶一样受內务大臣的摆弄。“通报”必須逐日把这些由皇帝本人献给皇帝的单調无味的慰問辞当做表示人民对 coup d'état 无限热爱的許多证明記錄下来。的确，曾企图从巴黎居民方面弄到一篇慰問辞；为了这个目的，警探們曾拿着一篇慰問辞到处奔走；但是，由于发现签名的人数不会很多，这个計划也就作罢了。連巴黎的小店主都敢于拒絕在这篇慰問辞上签名，說这事不宜由警界发起。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費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它們或者像不幸的“旁观者”那样，吞吞吐吐地談論继承下来的权利，或者像“卢瓦尔河上的灯塔”<sup>287</sup> 那样，引述半官方报纸来作为自己报道群众热情場面的依据，或者像“辯論日报”那样，把自己的慰問祝賀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內，或者仅限于轉載“通报”上的文章。总之，已經很明显，如果說法国还没有准备拿起武器来反对帝国，那它无疑已經决心一有机会就要把帝国抛掉了。

倫敦“泰晤士报”駐維也納記者写道：“据最近巴黎來人談，这个城市里的普遍看法是，現今的王朝已搖搖欲墜。”<sup>288</sup>

在此以前，波拿巴一直是法国唯一相信 coup d'état 已取得最終胜利的人，这时他自己也忽然觉察出他的幻想毫无根据了。虽然所有的社会团体和报刊都在賭咒发誓地說，勒佩勒蒂埃街的罪行是意大利人一手干下的，其結果只是更加突出法国对路易-拿破侖的爱戴，路易-拿破侖自己却急忙跑到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去，在那里公开宣称，这次密謀是全国性的，因此法国需要新的“鎮压性法律”加以压制。已經提出的那些以 loi des suspects<sup>289</sup>

为首的法律，只不过是当初发动 coup d'état 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再版。不过那时是把它們当做临时办法，而現在把它們宣布为构成法了。这样，路易-拿破侖就自己宣布了：帝国只有依靠那些它所由誕生的卑劣手段才能永世长存；它对于采取比較体面的常态政府形式的一切奢望都必须拋棄；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默认背信棄义的篡夺者的协会<sup>290</sup> 进行統治的时代，已經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在实行 coup d'état 之前不久，路易-拿破侖还設法从所有的省份，主要是农业区，弄到了对国民議會进行攻击、对总统表示无限信任的声明。現在这个来源既已枯竭，就只有求諸軍队了。軍队方面的声明簡直就是赤裸裸地宣布在法国实行御用軍人<sup>291</sup> 的統治；在其中一篇声明中，朱阿夫兵“几乎悔恨沒有得到机会出色地表示他們对皇帝的忠心”。把法国分为五大帕沙軍事轄区，由五位元帅分別担任各区长官，以佩利西埃为主帅予以統轄<sup>292</sup>，这不过是由那个前提得出的必然結論。另一方面，設立了一个樞密院，它在由某一位蒙蒂霍摄政时将同时作为国务委员会进行工作，它的成員都是富尔德、莫尔尼、培尔西尼、巴罗什等这一类可笑人物，这就向法国表明了，这些新上台的政治家給它准备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个樞密院的設立，以及路易-拿破侖在“通报”上的一封信中向目瞪口呆的世人宣布的家族妥协（由于这一家族妥协，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日罗姆被指定在皇帝缺席时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切，正如人們所正确指出的，“看来就像是朝圣者准备动身去作一次危险的旅行”<sup>293</sup>。斯特拉斯堡英雄<sup>294</sup> 到底打算进行什么新的冒险呢？有人說他想靠出兵非洲得到慰借；有人說他想进攻英国。前一种設想使人回忆起他以前有过到塞瓦斯托波

尔走一遭的打算<sup>295</sup>；可是現在也和过去一样，很可能他的智慮終將证明是他的勇敢的最大要素<sup>①</sup>。至于說对英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那只会使波拿巴看到自己在欧洲是多么孤立，正像勒佩勒蒂埃街的謀杀事件表明了他在法国的孤立一样。軍人的声明中所包含的对英国的威胁，已經最終断送了早已 in articulo mortis [奄奄一息]的英法联盟。帕麦斯顿的外侨管理法案<sup>296</sup>只会促使約翰牛本来已經被伤害的自豪感变得极端憤激。不論波拿巴可能采取什么步驟——他总要想法子来恢复他的威望的——都只会加速他的毁灭。他已經临近他那奇特的、罪恶的、致命的事业的尽头。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2 月 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2 月 22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254 号

---

① 参看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場。——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法国的經濟危机

在其他国家已經消退了的商业危机一旦在法国达到自己的頂点的时候，路易-拿破侖勉强維持住的、还使他能够自称为法国人的皇帝的政权，就要大吃苦头，这一点是不必证明的了。目前这个頂点临近的征兆，应当主要从法兰西銀行和法国农产品市場的状况中去寻找。法兰西銀行 2 月份第二周的报告表，同 1 月份最后一周相比較，有下列一些能說明問題的數字：

貨幣流通的減少 .....	8 776 400 法郎
存款的減少 .....	29 018 054 法郎
銀行期票貼現業務的減少 .....	47 746 641 法郎
分支行期票貼現業務的減少 .....	23 264 271 法郎
期票貼現業務減少的總數 .....	71 010 912 法郎
逾期期票的增加 .....	2 761 435 法郎
金屬儲備的增加 .....	31 508 278 法郎
購買黃金和白銀支付的貼水的增加 .....	3 284 691 法郎

在所有的商业国里，銀行的金屬儲備都随着商务活动的減少而增加了。銀行的状况，一般都随着工业生活減弱的程度而更加穩固，因而法兰西銀行地下室里的金屬儲備的积累会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在紐約这里以及在倫敦和漢堡所看到的特殊經濟現象的又一个例子罢了。可是，法国金屬儲備的变动有一个特点，就是购买

黃金和白銀所支付的貼水增加到了 3 284 691 法郎，2 月份法蘭西銀行在這方面支出的總數達到了 4 438 549 法郎。這個事實的嚴重意義從下面的比較中就可以看清楚：

#### 法蘭西銀行購買黃金和白銀支付的貼水

1858 年 2 月 .....	4 438 549 法郎
1858 年 1 月 .....	1 153 858 法郎
1857 年 12 月 .....	1 176 029 法郎
1857 年 11 月 .....	1 327 443 法郎
1857 年 10 月 .....	949 656 法郎
從 185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	3 100 000 法郎
從 185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11 日 .....	3 250 000 法郎
從 185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4 000 000 法郎

這樣，我們就看到，為了人為地暫時增加法蘭西銀行的金屬儲備，2 月份支付的貼水，同 1857 年 10 月至 1858 年 1 月這四個月內為了同一目的而支付的數目幾乎相等，並且超過了 1856 年和 1855 年各個六個月所支出的貼水的數目，而 1857 年 10 月到 1858 年 2 月支出的貼水，總數達 9 045 535 法郎，幾乎超過 1856 年全年支付的貼水總數的 50%。這就是說，雖然表面看來資金過剩，但實際上目前法蘭西銀行的金屬儲備卻比前三年少了。法蘭西銀行的金屬儲備根本不是過多，只是人為地提高到了必要的水平。單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商業危機在法國還沒有進入在美國、英國和北歐已經過的階段。正如貨幣流通和期票貼現業務的同時減少所表明的，法國的商業普遍蕭條已經出現；然而真正的破產還在頭前，在購買黃金和白銀所支付的貼水增加的同時，存款的減少和逾期期票數量的增加就證明了這一點。

法蘭西銀行還不得不宣布，它自己本身的、目前還沒有完全繳

清的新股票，有相当大一部分将要出售。此外，政府使法兰西銀行成了法国所有铁路建設的总承包人，因而法兰西銀行必須在一定时期內向各铁路公司发放大量貸款，这些貸款仅在1月和2月两个月就达5 000万法郎。誠然，作为对这些貸款的交换，法兰西銀行得到了这些公司的本票，只要有可能，它就有权出售这些本票。但目前对于出售这种債券特別不利，铁路每周的周报表明，它們的收入不断降低，这些周报所描繪的这方面前景远远不能令人乐观。例如，1月份同1857年同月比較，奥尔良铁路的收入减少了21%，东部铁路减少了18%，里昂铁路减少了大約11%，西部铁路减少了14%。

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买主对物价上漲所进行的抵抗，而尤其是卖主对物价下跌所进行的抵抗总是很强烈的；大家也都清楚，市場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趋势沒有終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显露出来以前，往往有一个相当长的時間，出售发生困难，而且价格低。商品的所有者和购买者之間的这种偶然发生的斗争一点也沒有什么特別的；但是，像法国商人和法国消費者之間那样持久的斗争，从11月初一直延續到今天，这在价格史上似乎还是空前的。在法国工业正苦于停滞，許許多多工人沒有工作，所有的人的生活資料都减少了的时候，价格在其他国家虽然平均下跌了30%—40%，而在法国却仍然維持在普遍危机以前时期的投机水平。如果有人問我們，这种經濟奇迹是用什么办法取得的，答复很簡單：法兰西銀行在政府的压力下，曾两次不得不把应付的期票和貸款延期，于是，法兰西銀行地下室里积存的法国人民的錢財就直接或間接地被用来維持哄抬起来的价格，而使法国人民自己蒙受損失。大概政府以为，通过这种极为簡單的方法——在一切需要銀行券的地

方把銀行券散发出去，——就可以彻底防止災禍。而实际上，使用这种伎俩的結果，一方面是消費者更加貧困，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减少並沒有使价格降低，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积存在海关倉庫里，而这些商品終归要拋向市場，結果由于它自身的数量而跌价。下面是从法国官方的一个出版物上抄下来的关于法国海关在 1857、1856 和 1855 这三年 12 月底存貨量的比較表，這張表使人絲毫不怀疑法国将来还会有价格的灾难性的自行調整：

	1857 年	1856 年	1855 年
	(单位:公担)		
可可.....	19 419	17 799	10 188
咖啡.....	210 741	100 758	57 644
棉花.....	156 006	76 322	28 766
銅.....	15 377	1 253	3 197
錫.....	4 053	1 853	1 811
生铁.....	132 924	102 202	76 337
油料作物籽.....	253 596	198 982	74 537
油脂.....	25 299	15 292	11 276
靛藍.....	5 253	2 411	3 783
羊毛.....	72 150	31 560	38 146
胡椒.....	23 448	18 442	10 682
糖(从殖民地来的).....	170 334	56 735	55 387
糖(从其他国家来的).....	89 607	89 807	71 913

可是，在粮食貿易方面，价格斗争的結果是商品所有者彻底失败了。然而他們的損失同法国农业居民在目前行情下的一般状况比起来，其意义毕竟还是要小得多。不久前，在法国农村戶主的會議上曾指出，全法国每百公升(約等于 2.75 蒲式耳)小麦的平均价格在 1854 年 1 月底为 31 法郎 94 生丁，1855 年同月为 27 法郎 24

生丁,1856年1月为32法郎46生丁,1857年1月为27法郎9生丁,1858年1月为17法郎38生丁。會議一致认为:

“价格的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法国农业遭到巨大損失,在目前平均价格为17法郎38生丁的状况下,法国一些地区的生产者只能得到极其微小的利潤,而其他地区的生产者則受到严重損失。”

看来,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大部分土地属于农民本人,只有比較小的一部分产品流入市場,其谷物的丰裕似乎不应看成是禍,而应看成是福。然而路易十八于1821年11月26日在御前演說中就曾經說过:“任何法律也不能消除过大的丰收所造成的灾难。”問題在于,大多数的法国农民仅仅在名义上是所有者,而真正的所有者則是抵押債权人和政府。法国农民能否履行他占有的一小块土地加在他身上的沉重义务,这不取决于产品的数量,而取决于产品的价格。

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蕭条,工业的停滯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財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們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試驗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經濟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繼續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

卡·馬克思写于1858年2月12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8年3月12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270号



## 卡·馬克思

# 御用軍人的統治

1858年2月22日于巴黎

“猎獅能手热拉尔什么时候将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大臣呢？”自从因出征多布魯甲而揚名<sup>297</sup>的埃斯潘納斯將軍被任命为內务和公安大臣以来，这就成了巴黎郊外爭相傳問的一句时髦話。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一个騎兵將軍可以主持正教行政总署。既然法国已完全成为御用軍人的領地，为什么埃斯潘納斯不可以主持法国的內务部呢？波拿巴借着这种显而易見的不协调現象毫不隱諱地宣布了雪亮軍刀的統治，想使法国清楚地認識到，帝国的統治所依靠的不是人民的意志，而是60万軍隊。于是就有了各团团长摹仿土伊勒里宮提供的范本而拟定的御用軍人宣言——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談所謂“人民的意志”的宣言；于是就把法国划分为五个帕沙轄区；于是就使內务部变成了軍隊的附庸。然而变化并不到此为止。据說，約有60名省长将被辞退，其中大部分将由軍人接任。省的行政管理要移交給退休的上校和中校。軍隊和居民之間的对立应成为“社会安全”，也就是薩托里英雄<sup>298</sup>及其王朝的安全的保障。

一位杰出的現代历史学家告訴我們，不管你怎么掩飾这事实，法国从大革命以来一直是受軍隊支配的。当然，在帝国时代、

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以及在 1848 年的共和国时期,进行統治的階級有所不同。在帝国时期是农民这个 1789 年革命的后裔占統治地位;在复辟时期是大地主占統治地位;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是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而 1848 年的共和国,則与共和国奠基者的願望相反,实际上是正統王朝派和七月王朝派企图分而治之的一次失败的嘗試。然而所有这些政治体制都同样依靠軍隊。甚至 1848 年的共和国宪法,不也正是在戒严状态下,也就是在刺刀統治下制訂和宣布的嗎?这个共和国不正是由卡芬雅克將軍来体现的嗎?它不正是在 1848 年 6 月和 1849 年 6 月一再因軍隊而得救,最后在 1851 年 12 月又被同一支軍隊結束掉的嗎?那末,現在路易·波拿巴公开宣布的政治体制有什么新貨色呢?他借助軍隊来进行統治嗎?然而所有他那些从热月政变<sup>299</sup>以来的前輩都是这样做的。不过,虽然在以往各个时期,与法国社会的独特发展相应而起的統治階級,都依靠軍隊作为它反对敌手的 *ultima ratio* ①,占統治地位的还是社会的一定階級的利益。在第二帝国时期,軍隊本身的利益要占統治地位。軍隊不必再去維持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統治。軍隊要維持它自己对全体法国人民的統治,即維持它自己的王朝。

軍隊要代表与社会相对立的国家。不要以为波拿巴不知道他所进行的实验的危險性质。他在宣布自己是御用軍首領的同时,也就把每一个御用軍的头目都宣布为自己的竞争者。他的党羽,以瓦揚將軍为首,都反对把法国軍隊分成五个元帅的部屬,他們說,即使这样做有助于維持秩序,但对帝国却毫无好处,有朝一日

① 最后論据,极端手段。——編者注

終会酿成內战。对帝国政策的新轉变感到万分气恼的皇宮<sup>300</sup>，搬出了拿破侖手下以貝尔蒂埃为首的元帅們进行背叛的事例。

至于那五位彼此視若死敌的元帅将来在某个危急关头的行动如何，根据他們的过去来下判断，是再好也沒有的了。馬尼揚背叛过路易-菲力浦；巴拉盖·狄利埃背叛过拿破侖；博斯凯背叛过共和国，虽然他全仗着共和国才得以飞黃騰达，而且誰都知道，他是同情共和国的原則的。卡斯特朗甚至不曾等到发生真正的災禍就背叛了路易·波拿巴本人。在与俄国进行战争期間，他收到一封电报，大意是說：“皇帝逝世”。他便立即起草了一个拥护亨利五世的宣言，并且送去付印。里昂市长却接到一封比較确凿的电报，电文是：“俄国皇帝逝世”。那份宣言沒有发出去，然而这件事却傳开了。至于康罗貝尔，他也許是帝国的拥护者，但他只能算作一个分数，重要的是，他缺乏作为整数的才干。这五位元帅自己也感到要他們承担的任务极其艰巨，总是犹豫不定，不肯接受各自的指揮职务，因此根本不可能預先征得他們的同意；于是波拿巴亲自給每个人确定了管区的名字，把名单交給富尔德先生，要他填好，送交“通报”，这样，不管他們願意与否，終于正式公布了对他們的委任。不过，波拿巴不敢任命佩利西埃为主帅，以彻底实现他的計劃。关于他实行的元帅五头政治，我們完全同意所傳关于日罗姆·拿破侖亲王对富尔德先生讲的話。波拿巴派富尔德先生去向他叔叔面呈委任摄政委员会主席的委任状，这位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悍然拒絕接受，并且据巴黎人傳說，还以这样的話把富尔德先生打发走：“Du reste [其实]，你們这个摄政委员会人选的搭配，使你們只能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彼此尽可能快地互相进行逮捕。”我們再說一遍，决不能以为路易·波拿巴对他这个新想出来的体制所包

藏的禍机一无所知。可是他沒有选择的余地。他了解自己的处境，了解法国社会急于想摆脱他和他所玩弄的帝国把戏。他知道各党派已經从瘫痪中复苏，他那交易所性质的政治体制的物质基础，已經被商业上的震蕩摧毁了。因此，他不仅准备同法国社会作战，而且还大声地宣布这一事实。同他对法国采取好战态度这一决定相一致的，是他与各色各样的政党为敌。当卡桑尼亚克在“立宪主义者报”上譴責維尔曼先生为对帝国的“仇恨的煽动者”，并且指控“辯論日报”“默默参与了”这个 attentat〔陰謀〕的时候，人們起初以为这是基佐称为 roi des drôles〔丑王〕的那个人所献的傻殷勤。可是不久便透露出来，这篇文章是国民教育大臣卢兰先生硬要“立宪主义者报”发表的，他还亲自校閱了清样。順便提一下，这个解釋是“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米勒斯先生对“辯論日报”的薩西先生作的，因为米勒斯先生不願对这篇文章承担责任。可見，指責所有的党派都是他个人的仇敌，这是波拿巴的意图。这是他的整个体系的一部分。他毫不含糊地告訴他們，他对他的統治所引起的普遍嫌恶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他准备用霰彈和步枪来对付它。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2 月 2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3 月 1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27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得比內閣。——帕麥斯頓的 假辭職<sup>301</sup>

如果說奧爾西尼沒有能够刺死路易-拿破侖，那末他毫無疑問地把帕麥斯頓砍倒了。既然這個政治賭棍是被廣州的一位中國官員推上了英國獨裁者的地位，那末從歷史眼光來看，他到頭來應該被巴黎的一個意大利燒炭黨人推下台去，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sup>302</sup>。但是，得比勳爵應當做他的繼任者，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歷史現象，而是近乎歷史規律的範疇了。這是完全符合英國憲法傳統的。繼皮特而起的是福克斯；繼福克斯而起的是皮特的拙劣副本派西沃；繼威靈頓而起的是福克斯的拙劣副本格雷；繼格雷而起的是威靈頓；繼威靈頓而起的是格雷的拙劣副本墨爾本；繼墨爾本而起的是又一個威靈頓，即皮爾；繼皮爾而起的是又一個墨爾本，即羅素；繼羅素而起的是皮爾的代替人得比；繼得比而起的又是羅素。為什麼僭取羅素职位的帕麥斯頓不該由得比來替換呢？

如果說在英國有什麼新生力量，能够結束約定俗成的舊習，如坐在議院這一邊的尊貴紳士同坐在議院另一邊的尊貴紳士最近這次調換位置<sup>303</sup>就是這種舊習的一個例子；如果說有哪一個人或哪一批人能够出來反對並取代傳統的統治階級，那末世界上還不知道有這樣的人。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托利黨人執政遠比任

何其他人執政更有利于推进一切进步事物。最近五十年以来，一切广泛开展起来的运动不是发生于托利党人执政时期，就是完成于托利党人执政时期。托利內閣通过了解放天主教徒<sup>304</sup>法案。在托利內閣时期，議會改革运动<sup>305</sup>变得势不可擋。实行所得税——尽管現在这种所得税很不合理，但它毕竟包含着比例稅的萌芽——是托利內閣一手完成的。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在輝格党人执政时期軟弱无力和畏首畏尾，而在托利內閣时期，却造成了革命的声势；罗素即使尽量壮着胆子也从来不敢越出像他本人一样温和的固定关税的范围，而皮尔却不得不把谷物法送进了凱普萊脫<sup>306</sup>全家的坟墓。而且可以說正是托利党人把貴族平民化了，为了加强貴族的势力而給它注入了平民的力量和才智。多亏托利党人，女演员的儿子坎宁才能对英国的旧土地貴族发号施令；一度当过手織工人后来成为棉紗厂主的暴发戶的儿子皮尔，也才能凌駕于旧土地貴族之上；一个普通文人的儿子而且还是犹太人的迪斯累里，現在也能駕馭旧土地貴族。得比勛爵本人就曾使刘伊斯一个小店主的儿子以圣萊昂納茲勛爵的称号当上了英国大法官。而輝格党却一向很厉害：把为它出力的平民走卒埋葬在眩人耳目的裝飾下面，或者傲慢无礼地把他們一脚踢开。布魯姆，議會改革运动的首脑人物，就被提升为上院議員，使他不能作对，而对于反谷物法同盟的領袖科布頓，則这些由他重新扶上內閣大臣交椅的輝格党人給了他一个貿易副大臣的职位<sup>307</sup>。

仅就人才方面而論，新內閣完全比得上前届內閣。像迪斯累里、斯坦利、埃倫伯勒这些人，比起下面这一班人馬，如前督察委员会主席維农·斯密斯先生、只凭“請照顾一下多布”<sup>308</sup>这一句話就可以名垂千古的陸軍大臣潘繆尔勛爵、枯燥无味的“爱丁堡評論”

的化身乔·康·路易斯爵士、甚至德高望重的掌璽大臣克兰里卡德，可謂毫不逊色。事实上，当初帕麦斯顿不仅以一个无党派的內閣代替了一个包括各党各派的內閣，而且以一个除他本人以外別无賢才的內閣代替了一个群賢內閣。

毫無疑問，帕麦斯顿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到，他的垮台已最終注定。他还以为，得比勋爵这一次也会像克里木战争时期一样，拒絕担任首相。这样，女王就会把罗素召去；但是他手下那批人馬大部分都在帕麦斯顿任內做过事，而与他敌对的人馬大部分都曾站在迪斯累里的旗帜下，所以罗素将不得不放棄組閣的希望，况且，他是輝格党人，因此不能采取“极端手段”——解散在輝格党旗帜下选出来的議會。这样，經過一个星期的搖摆以后，帕麦斯顿重新执政将是势在必行。这个如意算盘由于得比同意就职而成了泡影。現在不知道这个托利內閣执政是否长久。也許他們支撐了几个月以后不得不采取解散議会的行动——这是他們最后放棄政权以前必定要做的事。但是有两件事我們是毫不怀疑的，即托利党人执政的特色将是在社会改革方面提出富有自由主义傾向的法律草案（斯坦利勋爵到目前为止的活动以及約翰·帕金頓爵士关于国民教育的法案可以做担保），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会給对外政策带来极其有益而良好的轉机。固然，許多見識肤淺的观察家和政論家断言，帕麦斯顿的垮台不会給路易-拿破侖以重大的打击，因为，在他們看来，新托利內閣的某些閣員同法国的这位暴君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英国也沒有条件同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打仗。但是，正因为英国无力进行新的战争，我們认为它对路易-拿破侖手下那些小暴君的粗暴威胁和蛮横要求的答复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議會中的独立自由派反映全国真实的、强烈的情緒，以否决帕

麥斯頓的取締陰謀活動法案來回答了瓦列夫斯基的緊急照會<sup>309</sup>，這決不是因為要讓馬姆茲伯里和迪斯累里參加內閣。得比勳爵可能會失足下台，但是不管怎樣，採用米爾納·基卜生的修正案這一決議<sup>310</sup> 仍然有效並將收到效果。

我們不相信英國的托利黨同法國的波拿巴派會結成什麼真誠而持久的聯盟。雙方的直覺、傳統和願望都厭惡這樣做。我們並不認為新內閣會像巴黎報刊所認定的那樣重新回到帕麥斯頓的取締陰謀活動法案上來並且堅持通過這項法案。即使它會這樣做，也得先本着皮特和卡斯爾里的精神答复瓦列夫斯基和莫爾尼。儘管托利黨一無是處，它要是同意按波拿巴的指示改變英國法律，必先改變自己的本性。

另一方面，假定在不久的將來兩國政府關係破裂，這也並不降低不久前所通過的決議的意義。我們認為，這一決議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它向歐洲宣布，不列顛已不再充當法蘭西帝國的幫手了。布魯塞爾、都靈、甚至維也納的人們都有此感覺；柏林、馬德里、聖彼得堡的人們不久也會有這種看法的。長久以來在拿破侖第一手下充當爪牙的英國，已經公然拒絕再充當他的繼承人的走卒了<sup>311</sup>。

卡·馬克思寫於 1858 年 2 月 2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於 1858 年 3 月 15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272 號



## 卡·馬克思 时代的表征

1858年3月11日于巴黎

3月5日星期五的夜晚，在索恩河岸夏龙，共和派举行了一次不大的叛乱。3月9日星期二的夜晚，阴谋分子在这个城市举行了一次会议。从2月24日，即从二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这次逮捕按其性质来说，与阿尔及利亚的搜捕<sup>312</sup>极其相似，以致正如伦敦的“笨拙”杂志所说的，不久在法国就会只剩下囚犯和狱吏两个阶级了。有一本半官方的抨击性的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英国”<sup>313</sup>出现了，同时在“通报”上刊载了拿破仑第一的书信片断。最后，有半数巴黎人所关心的是，在至今尚在缓期执行的奥尔西尼被处决时他们能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对于皇帝的这份菜单所列的最后一道菜还应该指出，由于很少有人知道的种种情况的凑合，奥尔西尼被“打发去见祖先”——按照伦敦小市民的讽刺说法——的问题，甚至比路易-菲力浦时期处决比桑歇骚动的参加者<sup>314</sup>更具有决定性的转变。当时，群情所以激愤，就是因为这个血腥的案件——虽然它是通过法庭，根据法兰西法律的一切手续处理的——暴露了路易-菲力浦伪善统治的十分丑恶的面貌。给普拉兰公爵开的不是良药而是毒药，目的是使他能逃脱普通刑事犯应该受到的可耻的死刑<sup>315</sup>，然而那些 émeutiers〔参

加騷动的人們)，穷困到半死不活地步的农民，由于饥饿，在拿走粮食而发生冲突时并非有意地杀了人，却被残忍地送交给刽子手。相反地，奥尔西尼勇敢地承认自己参与谋杀，并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被依法判了罪，虽然巴黎的居民群众很同情他，但他的遭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使第二帝国威信扫地的东西。可是，只要注意一下围绕这个案件发生的许多情况，那末这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在整个诉讼案的过程中，这种在法国政治诉讼史册上从无先例的、不寻常的行径激动着巴黎人的好奇心。

控诉意见的措词温和而有节制。其中只含混地引证了一些由 *jugé d'instruction* [法院侦查员] 确定下来的事实，而警察当局那些通常在这类案子中起主要作用的冗长的不止一次的审问，却完全省略了。看来，文件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关于这件事谈得越少越好。被告人在帝国法庭上第一次受到了礼遇。据目睹者说，“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恐吓、傲慢态度或企图打断发言的现象”。奥尔西尼的辩护人居里·法夫尔甚至在大胆地发表了下列言论时，也没有受到斥责：

“我憎恨暴力，如果暴力不是为正义事业服务的话。假使一个民族已经处于暴君统治的悲惨境地，那末，匕首也就无力斩断它的锁链了。上帝正在计算暴君的寿命，并且为他安排下比凶手的匕首更难逃脱的劫运。”

这番话博得了低声的赞扬，可是没有惹起庭长德朗格尔先生的职业的恼怒。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大家都知道，居里·法夫尔本人还把奥尔西尼的一封信送到土伊勒里宫交给了皇帝，皇帝读完了这封信以后，据说删掉了其中两句话，就批示把它刊登出来。但是，判决刚一做出，对奥尔西尼的态度就变得极其残酷了，当他请求允许“整理一下自己的文件”时，得到的答复却是马上给

他套上 *camisole de force* [紧束衣]。

这样，事情越来越明显，这里玩弄的是一套凶恶的两面把戏。奥尔西尼可以而且实际上已经告诉比埃特里，他揭发了拿破仑参与烧炭党人运动，揭发了拿破仑甚至在 *coup d'état* [政变] 以后，即在他尚未决定采取什么策略时，就曾对意大利爱国者许下了完全肯定的诺言。为了劝说奥尔西尼审慎从事，仿佛这是为了他本人的利益，以免宣扬出去当众出丑，人们答应赦免他，尽管对这个诺言丝毫也没有打算兑现。这种诉讼方式在第二帝国史册上是屡见不鲜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法国著名律师和正统派贝利耶的儿子的诉讼案吧。当时，涉及的是一家股份企业——*Docks Napoléoniens* [拿破仑造船厂] 所干的诈骗案。要知道，老贝利耶掌握着大批文件，足以证明拿破仑亲王和玛蒂尔达公主也曾用这种使他的儿子贝利耶坐在被告席上的欺骗行为赚得了大宗款项。贝利耶是一位具有法国风格的善于雄辩的巨匠，他的这种完全依靠演说家的举止、声调、目光和手势的技能，可以把那些写在纸上看来索然无味的字，用熾烈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贝利耶在法庭上宣读这些文件，再加上一些说明，那末皇帝的宝座就会动摇不稳了。所以，皇帝的近臣前去劝说贝利耶放弃他的意图，并且肯定地答应他，只要他保持缄默，就可以保证他的儿子无罪。他同意了，但是他的儿子却判了罪，父子双双成了欺骗的牺牲品。对于奥尔西尼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法，并且取得了同样的成绩。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人们说服了他，不仅使波拿巴免于大出其丑，而且还使他为了同一个波拿巴的利益，打破了自己的缄默，也毁掉了自己的名誉。人们对奥尔西尼示意说，皇帝是暗地里同情意大利解放事业的，于是唆使他写了一封信。随后居里·法夫尔就上演了一场

戏。奥尔西尼的信刊登在“通报”上。为了使奥地利清楚地了解波拿巴还能够操纵意大利人的爱国意向，就必须吓唬一下奥地利，迫使它接受波拿巴的要求。奥地利竟认为是侮辱自己。处决奥尔西尼本应当缓和奥地利的忿怒，但是奥地利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增加了意大利对它的憎恨和扼杀了维也纳的出版自由的弱芽。不管正确与否，奥尔西尼案件的总的理解就是如此。

至于夏龙的 émeute [叛乱]，这只是一个预兆罢了。在法国即使连一个勇敢的人也没有，人们仅仅出于自卫感也会继续诉诸起义的。或者死于街头的战斗，或者丧身于凯恩城<sup>20</sup>，他们是沒有別的选择的。根据什么理由进行逮捕，——而且每一次逮捕都有可能发送到凯恩，正如条条道路通向罗马一样，——可以作为例证的总共只有一个事实。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巴黎的三个律师被逮捕了。法律界，或者更确切些说，律师委员会处理了这件事，并且向司法大臣提出了质询。得到的回答是，上述三位先生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在十个月以前巴黎的最后一次选举期间搞了“阴谋和诡计”，此外，不应当再作任何解释。所以，如果说夏龙的 émeute 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末，夏龙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在这种场合下的行为，就未必符合法军代表奉命送到“通报”去的那篇非常激烈的声明。兵营位于索恩河的右岸，而大部分军官的住宅是在发生叛乱的左岸。军官们不但没有急速率领自己的士兵去捍卫帝国，反而谨慎地采取了一些外交步骤，以便查明巴黎是否宣告成立了共和国。对于这件事实，连“通报”也不敢完全避而不谈。该报写道：

“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匆匆奔向专区政府，以便对流传的谣言得到某些消息。他们手里握着军刀为自己开辟道路。”

“祖国报”<sup>316</sup> 企图按照自己的看法来说明这一微妙的事件，硬

說這些欲明真相的軍官企圖“逮捕專區區長，如果他是站在共和國一边的話”；其實，他們急于去見專區區長，是要從他那里知道巴黎是否真的宣告成立共和國了。只是在得到專區區長的否定的回答以後，他們才認為必須表現出自己的職業的熱心了。卡斯特朗已經從里昂出發去調查他們的行為。簡單說來，軍隊中出現了不滿的跡象。“通報”把軍隊大肆夸奖的手法，反而成為整個歐洲的笑柄，後來為了討好約翰牛，這一點干脆就不提了。波拿巴把軍隊分成單獨五個部分，是由于擔心軍隊會把最高指揮權交給近來對自己的主子越來越冷淡的佩利西埃；尚加爾涅和貝多在語氣輕蔑的信中拒絕返回法國；被任命擔負要職的埃斯潘納斯在向多布魯甲進軍以後就曾引起全軍營的普遍不滿；最後，對事件進程中的急劇變化產生的一種模糊的預感，從來不能使法國的“有思想的軍隊”<sup>317</sup> 受騙，——所有這一切都促使軍隊中那些謹慎的頭子們的聲望一落千丈。除了夏龍事件以外，麥克馬洪將軍在法蘭西參議院中的行為，也能證明這種離奇的、大概也是出人意料的變化。他針對 loi des suspects [嫌疑犯處治法] 發表的意見以非常坦率著稱，而他這位波拿巴手下的穿綉金綫制服的僕從，竟對這個法律投了反對票。

卡·馬克思寫于 1858 年 3 月 11 日

載于 1858 年 3 月 30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5285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卡·馬克思

### 波拿巴目前的状况<sup>318</sup>

1858年3月18日于巴黎

«Risorgerò nemico ognor piu crudo  
Cenere anco sepolto e spirito ignudo».

(我将从死人中間复活，成为更加可怕的敌人，虽然我不过是坟墓中的灰烬和无形的幽灵。)这是奥尔西尼在法夫尔发言以后带着异样的笑容向自己的辯护人低声吟誦的塔索的“耶路撒冷”<sup>①</sup>中的两行詩，它已經开始应驗了。一位目睹者曾这样描写群众观看这位意大利爱国者被判死刑时的心情：

“政府非常恐惧，因而由將軍亲自指揮的整整一师人被派往刑場。15 000名士兵准备信号一响就行动起来，一切入口和出口都像起义时期一样有人警戒。据我估計，从郊区来的9万到10万名穿工作服的工人，挤滿了拉-罗克特广场附近的所有空地和街道；但是軍队的队形排列得使观众看不清楚或者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当屠刀落在奥尔西尼頸頸上的声音隱約可聞时，响起了一阵强大的虽然是压抑着的回声：«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我很难用言語来形容，它好似轰鸣声；它不是喊声，不是呼声，仿佛是千千万万人的低語声和叹息声。当局十分了解这种声音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刹那間，士兵掀起了难以想像的嘈杂声，摆弄武器頻頻作响，鞭打自己的馬匹踢跳不已；这样，他們不直接使用武力就能把人群的轰鸣声压下去。但是，毫无疑问，«Vive la République!»这句话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我特意步行回家，慢慢地从最拥挤的人群中穿过去。我应当坦白地說，我到处都听到同情

<sup>①</sup> 托尔克瓦托·塔索的叙事詩“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第9章。——編者注

和欽佩奥尔西尼的話。看来，他的罪状已經完全被忘記了，留下的印象只是他那勇敢的精神和对自己的同謀者的高尚态度。我一次也沒有听見誰提起过比埃里这个名字。我要說，人民的情緒是非常危險的。可以看出，蘊藏在內心的憎恨和复仇的欲望已經深到非用言語来表达不可了。我所听到的一切議論几乎都是低声細語的，仿佛随时随地都在担心警察暗探的光临。”

看来，为了肃清共和派分子而采取的“公安”措施，大規模的監禁和流放，并不比 cités ouvrières [工人区]、新建的作坊以及企图收买法国工人階級良心的其他措施取得的成績更大。以前<sup>①</sup>已經詳細談过的圍繞奥尔西尼案件发生的种种情况，現在变成了整个巴黎的共同話題。甚至大家都知道，在檢查奥尔西尼和比埃里的大批来往信件时，发现了路易-拿破侖在許多年以前写的亲笔签名的书信。如果法国的“立宪主义者报”仍然像在基佐先生时期那样处于有利的地位，那末，我們天天都可以听到 «L'horizon politique s'obscurcit» [“政治視野黯淡了”] 这句庄严的話了。的确也是这样。当土伊勒里宮的人們知道夏龙卫戍部队的軍官的所作所为时，都吓呆了。那里的人們对“通报”的 naïveté [天真行为] 感到极其憤怒，因为該报告訴法国和欧洲說，夏龙的軍官沒有立刻叫自己的士兵做好战斗准备，沒有对士兵說，即使巴黎真的宣布成立共和国，他們也要为反对共和国和保卫帝国而战斗，夏龙的軍官沒有把所有这些事情变成笑柄，却先跑去見专区区长。可見，他們事先沒有证实究竟是否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就拒絕拿自己的生命和地位来为皇帝冒險。这一事实证明，大部分軍隊是不可靠的。除了軍隊中一些高級官員或者由于做了极其敗坏名誉的事，或者由于得到非常榮耀的嘉奖，因而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的命运分开以外，也

<sup>①</sup> 見本卷第 436—440 頁。——編者注

許只有一部分軍隊应当得到充分的信任，那就是近衛軍。這個軍團的確很強大，並且無疑懂得，它在任何其他政府之下都會被併入常備軍或者全部解散。近衛步兵由 4 個精選團、2 個 voltigeurs [射擊兵] 團、1 個憲兵團、1 個朱阿夫團和 1 個 chasseurs [獵兵] 營——總共 17 個步兵營組成。此外，近衛軍有 2 個重騎兵團、2 個龍騎兵團、1 個精選騎兵團、1 個驃騎兵團和 1 個 chasseurs 團——總共 21 個騎兵連。近衛炮兵也是一支相當可觀的力量。近衛軍的全部兵力約為 2 萬人，擁有 40 或 50 門大炮。這是一個十分強大的核心，在一旦同巴黎居民進行嚴重鬥爭時足以制止常備軍可能發生的動搖傾向。此外，從省里迅速集結軍隊的一切工作已經安排妥善，只要大略看一下法國的鐵路圖就可以明了這一點。因此，一旦發生政府突然無法掌握的运动，就必然會遇上這支擁有 6 萬—8 萬人的巨大力量。正是波拿巴為鎮壓武裝起義而採取的這些措施，完全排斥了爆發武裝起義的可能性，除非武裝起義是由於某個非常意外的大事件引起的，因為那時資產階級的明顯的反波拿巴態度，在軍隊下層進行破壞活動的秘密社團，使軍隊上層分裂的渺小的嫉妒心、背信棄義的行為、奧爾良派或正統派的同情，大概都會使天平倒向革命的群眾方面。對革命的群眾說來，最糟糕的就是謀殺波拿巴。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莫爾尼的答复便成了預言，莫爾尼在對俄戰爭爆發時對波拿巴提出的一旦他意外身亡他們將怎麼辦的問題所作的答复如下：

«Nous commencerions de jeter tous les Jérômes par la fenêtre, et puis nous tâcherions de nous arranger tant bien que mal avec les Orléans». (“我們先把所有的日羅姆派拋到窗外，然後千方百計地同奧爾良王朝達成協議。”)



在郊区居民决定他們如何行动之前，莫尔尼可能先行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奥尔良王朝，从而把资产阶级拉到反革命阵营中去。

同时，波拿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失望，大大地驅使他在国内走上实行恐怖政策的道路。他在外面遭遇的每一次失败，都暴露出他的地位动摇不稳，并且使他的对手产生了希望，这必然会使所谓“巩固的政府当局”有一些新的表现。要知道，在对外方面失败的次数最近几个星期大大增加了。首先在英国方面遭到了严重的失败<sup>319</sup>。其次就连一向非常胆怯、多次让步的瑞士也鼓足了勇气，反对以后用最无礼的方式强加于它的一些措施。瑞士联邦曾接到正式通知說，如有必要，法国步兵团将开入它的国境，履行瑞士警察本身所无法履行的警察职责。当时甚至连凱倫先生也认为必须申请本国的护照，法国政府只好让了步。曾经根据波拿巴的指示修改了本国法律<sup>320</sup>的比利时，也拒绝了波拿巴提出的驅逐尙加尔涅将军的要求。皮蒙特议院中受权审查使撒丁设施适合 *idées napoléoniennes* <sup>321</sup> 这一法案的委员会，以 5 票对 2 票的多数提出了完全否定波拿巴草案的建议。奥地利虽然清楚地懂得，奥尔西尼的处决向它暴露了斯特拉斯堡英雄<sup>294</sup>的真相，而且后者再也不会因为同意大利的关系而使它不安，但是它对波拿巴却表示了明显的冷淡。

陷入可笑的境地——这是法国政府走向灭亡的必经之路。波拿巴意识到，他最近几次扮演欧洲独裁者角色的失败尝试使他处于多么可笑的境地。他在欧洲的地位愈卑微，就愈强烈地感到必须在国内显得威严可畏。因此，恐怖统治就变本加厉了。内务大臣埃斯潘纳斯将军现在得到了前驃骑兵团团长、现任警察局局长布阿泰尔先生的支持。“大陆评论”<sup>322</sup>在描写第二帝国的这批军事爪牙所采用的方法时写道：

“他們拿着 1848 年和 1851 年騷乱以后由警察局当做危險分子而开列的旧名单，并且按照这个名单在巴黎和各省大肆逮捕。他們在这样做以前，絲毫不調查一下，这些人自从那时以后是不是有过可以被提出任何控告的理由。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有許多可尊敬的公民，虽然他們曾醉心于 1848 年全国風暴，并且同情进步思想，但是后来完全脫离了政治，况且其中有許多人現在已經成了家长和热心經商了，而警察却使这样一些人放下自己的工作，离开自己的亲人。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逮捕的理由是多么不充分，即使从表面上看来，采取恐怖行动又是多么缺乏合法性或必要性。在警察局爪牙所要逮捕的人中間，有的至少已經在国外呆了六年，因而不可能犯有任何过错，但是，如果他們这时在法国出現，似乎为了‘公安’起見，他們必定会被关进监牢。甚至还有一种情况，警察竟跑到那些几年以前已經死了的人家里去逮捕。他們的名字写在以前被捕者的名单中(其中許多人当时被捕，不过是因为他們在街头人群中出現，这就是他們的唯一罪行)。因此很清楚，警察不是要对付犯罪分子，而是要对付可疑分子，实行这个法律所采用的方法本身就证明輿論对它的称呼是名副其实的。各省的情况都同巴黎差不多。嫌疑犯的名单是行政当局开列的，倒霉的是那些在最近的六月选举中对省长所推荐的候选人敢于表示反对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宪法、选举法和内务大臣的通告是确实可以實現的并认为可能会采取措施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見选举候选人的人。現在这些候选人被看成是最坏的罪犯，他們要末就是很有錢有势的，要末就是受到有权势的朋友庇护的，才不致遭到被他們擋着道路的那些官吏的报复。省里被捕的人中間，有庫尔泰將軍的名字，他在 1848 年是巴黎国民自卫軍的总司令，但是近十年来他脫离了社会，脫离了政治和公共事务而独居在阿利埃省的一个乡村庄园里。”

在实行“公安”制度的时候，在慢性的商业危机爆发的时候，法国資產階級很快就会达到这个地步，即在它看来，革命将是为“恢复信任”所必不可少的某种东西。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3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4 月 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287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

1858年3月27日于巴黎

对于統治者說来，最困难的处境是一个非軍人高居专制軍事国家之首的处境。在东方，这种困难由于专制君主被看成天神而多少被消除了，因为这种政权的神权性质不允許把統治者同他的軍人武士等同看待。在羅馬帝国时代，皇帝之被神化并没有起到这种防护作用，但也是出自同样的需要。路易·波拿巴是一个非軍人(尽管他著有**大炮史**<sup>323</sup>)；但是他无法援用羅馬的先例。因此他的处境就益发困难。随着法国越来越感到軍队的羈絆不堪忍受，軍队越来越大胆地力求把这种羈絆加在波拿巴身上。12月10日<sup>324</sup>以后，波拿巴可以认为他是农民即法国人民的絕大多数选举出来的，而聊以自慰。自从1月14日的謀杀事件以后，他知道他只是靠着軍队的恩賜才存在。既然他不得不公开承认他是通过軍队进行統治，自然軍队也就企图通过他本人来进行統治了。

由此可見，法国分为五个帕沙轄区，这只不过是任命埃斯潘納斯为內务大臣的一支序曲。接着就是任命布阿泰尔先生做巴黎警察的头子。这位先生在1830年是一名下級軍官，曾在拉費尔同培尔西尼先生在一个团里服役；七月革命爆发时，他曾试图强迫自己的伙伴高呼 «Vive Napoléon II!» [“拿破侖第二万岁!”]。与布

阿泰尔荣升的同时，馬拉霍夫公爵佩利西埃被任命为皇帝陛下駐圣詹姆斯宫的代表。这个任命无非是对军队的討好和对英国的威胁。誠然，“通报”想把这件事說成是对約翰牛的討好，可是“世界报”<sup>325</sup>的維伊奧（大家知道，他在土伊勒里宫有 *petites et grandes entrées* [出入正式和非正式場合的資格]），在一篇火气十足的文章中預示过这件事，其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話：

“英国的自豪感被損伤了，而且早就被損伤了。在克里木的阿尔馬附近、因克尔芒附近和馬拉霍夫岡，在凡是法軍在戰場上一馬当先而且比所有的人都更深入敵軍陣地的一切地方，都受到了損伤。圣阿尔諾、博斯凱、康罗貝尔、佩利西埃、麦克馬洪——正是这些人損伤了英国的自豪感。”

总之，拿破侖第三把自己的緬施科夫派到倫敦去了。順便提一下，他甚至很高兴能有一个时期摆脱一下这位緬施科夫，因为佩利西埃在剛一撤銷委任他为五个帕沙轄区总司令的命令后，就表現得桀驁不馴。当佩利西埃被派赴倫敦的消息一傳出去，巴黎証券交易所的股票行情立刻下跌。

佩利西埃可以举出不少理由来对英国实行报复。1842年，帕麦斯頓在梯維尔頓对选民发表演說时，公开罵他是恶魔，并示意倫敦报界群起而攻之。克里木战争以后，雷希·伊文思將軍在下院更露骨地表示，佩利西埃是使英軍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遭到惨敗的主要根由。英国报刊在評論伊文思將軍的这种意見时，对佩利西埃也是十分粗暴无礼。最后，佩利西埃本人在为参加克里木战争的將領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干脆把这場战争的全部荣誉——如果談得上荣誉的話——归之于法国的武力，对約翰牛的合作竟不屑一提。为了报复这件事，倫敦报界又狠狠地抨击了佩利西埃。此外，大家也都知道，佩利西埃是不能扮演希腊神話中那个唯一能

治好自己亲手所造成的創傷的角色的<sup>326</sup>。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同意那些倫敦報紙的看法，它們以古羅馬人的心情勸告執政官多加小心，*«ne re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 [“以免共和國遭殃”]。佩利西埃是威吓，而不是戰爭。對他的任命只不過是 *coup de théâtre* [戲劇手法]。

將 *perfide Albion* [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sup>①</sup>] 與 *la belle France* [美麗的法國] 隔開的寬溝，是法國的 *Lacus Curtius*<sup>327</sup>，然而波拿巴却不是那情願跳進這個深淵去、為了使深淵合攏起來而拋棄生命的浪漫青年。在全歐洲誰也沒有他明白！他的不穩固的政權要依靠同英國的聯盟，但是對於要為滑鐵盧一戰雪耻的人說來，這條真理是致命的東西，他必須想方設法，通過對約翰牛的橫加指責，來向自己的武裝部下隱瞞它，使這個由法國所強加而為英國所接受的聯盟看上去像一種附庸從屬的關係。

這就是波拿巴的最危險的把戲，它可能加速他的末日的來臨，雖然它的目的是為了推遲這個末日。如果佩利西埃完不成要他前去進行威吓的使命，——這是很可能的，——那就會是輸掉了最後一張牌，勢必要用實際行動來代替演戲，否則波拿巴在自己的軍隊眼裡將成為一個原形畢露的騙子，這個騙子裝出拿破侖的神氣來掩蓋 1848 年 4 月 10 日的倫敦警察的可憐相<sup>328</sup>。

說老實話，幸亏同英國結成聯盟，才使這個侄子能夠一時仿效他的伯父。英法之間的緊密聯繫給了神聖同盟以致命的打擊，徹底破壞了歐洲的均勢，自然也就使這個同盟在大陸上的代表波拿巴儼然以歐洲命運主宰者的姿態出現。當對俄戰爭和法國國內形

① “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是拿破侖第一對英國的稱呼。阿尔比昂是不列顛群島的古稱。——譯者注

勢許可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于这种徒有其表的霸权是心滿意足的。但是自从和平統治了欧洲,而军队統治了法国以来,情况就完全改变了。現在军队要求他像真正的拿破侖那样,表示出他做欧洲的霸主,不是受英国的委托而是違反英国的意願。难也就难在这里。一方面,他威胁約翰牛,另一方面又暗示約翰牛,說对它毫无恶意。他簡直是在央求約翰牛,要它为了礼貌起見,装出一副样子来表示害怕自己的“至圣的盟友”的虛假威胁。然而这恰恰是使約翰牛强硬起来的最好办法;約翰牛知道,自己摆出一副英雄姿态是万无一失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3 月 26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4 月 1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299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馬志尼和拿破侖

馬志尼先生最近給法国皇帝写了一封信<sup>329</sup>，从文学的观点来看，这封信大概在他的著作中要占首屈一指的地位。馬志尼的許多作品所固有的那种假装热情、一味夸大、冗长嚙嚙和故弄玄虛的現象（这可以說是他所創立的那个意大利文学派別的特征），在这封信里只能看到少許的痕迹。同时可以看到，他的視野已变得較为广闊。到現在为止，他一直是欧洲共和派形式主义者的領袖。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組織的意义。他們以其虛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經濟现实有損自己的尊严。代別人去做个理想主义者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肚子脹得飽飽的人很容易嘲笑餓着肚子的人們不要崇高思想而要普通面包的实际主义。听任康帕尼亚农民处于比他們羅馬帝国时代的祖先更悲慘的奴隶境地的 1848 年羅馬共和国的三执政<sup>330</sup>，当然不难大談其农村居民的低下精神水平。

現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馬尔以探究古羅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經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較，孟德斯鳩关于羅馬盛衰的論述<sup>331</sup> 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

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細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經濟条件<sup>332</sup>，在闡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貨色仅仅是詛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貢獻。現在馬志尼先生也不认为注意社会实际、注意不同階級的利益、注意出口和进口、注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房租以及諸如此类的庸俗东西有損自己的尊严了，这也許是由于他亲眼看到了使第二帝国遭到强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的，不是各民主委員會的宣言，而是那由紐約开始之后波及到全世界的經濟震蕩。但願馬志尼不要就此止步，不屈服于虛偽的自尊心，而进一步按照經濟科学来改造自己的全部政治綱領。他的信是以这样一段对路易-拿破侖的憤怒言詞开始的：

“最后的时刻正在临近；帝国的浪潮正在明显地消退。这一点你也感觉得到。你从1月14日以来在法国采取的一切措施，你从这个不幸的日子以来向四面八方散发的一切外交照会和請求，都說明你惶恐不安。你的心灵正像麦克佩斯的一样，受着剧烈痛苦的折磨，——不論你說什么，做什么，这一点都可以感觉出来。你的内心已預感到 *summa dies et ineluctabile fatum* ① 正在临近。就像以前的‘葛萊密斯爵士、考特爵士和君王’一样，現在僭望者、總統和篡位者是注定要灭亡的②。魔力已經消失。人类的良心已經觉醒；它正在严峻地望着你；正在与你面对面地站着，仔細地檢驗你的行为，并且要求你对自己的諾言的执行情况做出交代。从現在起你的命运已經决定。你現在只能活几个月，但决不能活几年了。”

① 最后的日子和不可避免的时刻(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二册)。——編者注

② 这里用莎士比亚悲劇中的主人公麦克佩斯来比喻路易-拿破侖。麦克佩斯先当上葛萊密斯爵士，然后当上考特爵士，最后通过謀杀手段夺得了王位。麦克佩斯后来被杀。路易-拿破侖則先是王位僭望者，后来在1848年任法兰西共和国總統，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使自己成为終生總統，并于1852年称帝。——譯者注



馬志尼在这样宣布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之后，将法国目前的經濟状况与拿破侖关于普遍繁荣的漂亮諾言作了一番对比：

“当你非法夺得政权之后，你好像为了弥补政权的这种非法来路，曾經許下諾言，說要这样治理国家，以使惶惶不安的、自己动乱不定并且也使別人动乱不定的法国得到太平。可是，难道监禁、箝制言論和放逐就是治理嗎？难道宪兵就是教員嗎？难道密探就是宣揚道德和相互信任的使徒嗎？你會向閉塞无知的法国农民說，国家由你来治理，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紀元，使他們叫苦連天的沉重負擔就会一个一个地消失。可是哪怕有一个負擔消失了嗎？你能說他們的命运會有一点点好轉，他們的苛捐杂稅有一点点减少嗎？你能解釋为什么农民現在要参加 Marianne 333 嗎？你能否认过去本来用于农业的資金現在都被你所开辟的工业投机的門路吞噬了，而使农民无法获得貸款来购置农具、改良土壤嗎？你會引誘无所适从的工人，說你要做 *empereur du peuple* [人民的皇帝]，新型的亨利四世，說你要給工人保证固定的工作，高工資和 *la poule au pot* [鍋里的鸡]①。現在 *la poule au pot* 的价錢在法国不是正好漲得太不成話嗎？而房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价錢不是漲得更高嗎？你开辟了新的街道——为了达到你的鎮压政策的战略目的而鋪設的新交通綫，——你把街道拆了又重新修建。可是，难道工人階級的大部分都是在你施予恩惠的建筑部門工作嗎？你能为了給无产者开辟工作和工資的来源而毫无止境地翻修巴黎和各主要省城嗎？你能甚至梦想以这种人为的、暫时的办法来代替正常的进步和够本的生产嗎？难道生产的状况現在令人滿意嗎？难道巴黎不是有五分之三的細木工、粗木工和机械师現在沒有活干嗎？你會使很容易吓唬住也很容易迷惑住的資產階級充滿美妙的梦想和希望，以为将成倍增加工业活动，将有新的收入来源，将实现大量出口和扩大国际联系的‘黄金国’。这一切在哪里呢？全部工业生活在你的法国都陷于停滯状态，商业訂貨已日益减少，資本已开始退却。为了摘果子，你像野蛮人那样，把树砍倒了。你人为地过分鼓励了狂热的、不道德的、只許願不兌現的投机事业；你以大吹大擂的、极其夸大的企业建設方案把法国各地小資本家的

①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89—1610）曾經說道：“如果上帝再給予我一次生命的話，那我一定要保证我的王国里每一个农民都有可能鍋里有鸡。”——譯者注

积蓄吸收到巴黎来，使它們脫离了国民財富唯一真正长远可靠的源泉——农业、商业和工业。这些积蓄好像掉进无底深淵，在几十个大投机家的手里消失了；它們被白白地穷奢极侈地揮霍掉了；或者被人們小心地悄悄轉移到別的安全的国度里去了——我可以举出你家里的一些人作例子。所有这些企业建設方案中有一半已經不存在并且被人遺忘。有一些方案的制定人，为了謹慎起見正在国外旅行。現在你面对着不滿的資產階級；你所有一切正常的財源都已枯竭；耗費于法国几个主要城市的非生产性公共工程的5亿法郎，像梦魇似地糾纏着你；你上年度的預算中显然有3亿法郎的赤字；巴黎城債台高筑，它只得发行16000万法郎的新債（不是用你的名义——因为这样会一无所成，——而是用市政委员会本身的名义），并且为了偿付这项債款的利息不得不把人們所痛恨的市稅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城外的堡垒地区。这个补救办法将大大加重工人階級的負担，并且促使至今一直忠实于你的郊区起来反对你。你的阴谋詭計都已用尽；今后你为消除你的財政困难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只会加速你的末日。迄今为止你一直是靠不断的举債和貸款維持生存，但是現在你在哪里能保证繼續得到貸款呢？羅馬和拿破侖曾經掠奪全世界，而你現在只有一个法国可以掠奪。他們的軍隊是靠征服他人來維持的，而你的軍隊就办不到。你只能梦想征服他人，但是你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去冒險嘗試。羅馬的独裁者們和你的伯父曾經率領无往不胜的軍隊，至于你，尽管你喜欢穿金光閃閃的軍礼服，可是我怀疑，你是否能够率領一支哪怕只有几营人的队伍。”

馬志尼从第二帝国的物质前景进而談到它的精神前景，当然，他在綜合证据来证明自由不穿波拿巴的僕役制服这个命題时感到有点为难。自由，不仅它的軀体，而且它的灵魂，它的精神生活，都被那些想使过去的时代复活的人們粗手粗脚地弄得枯槁不堪了。結果，法国思想界的大部分代表，虽然从来不以过分讲究政治良心著称，并且随时都准备为任何政体效劳，不管它是摄政王<sup>①</sup>还是罗伯斯比尔，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菲力浦，是第一帝国还是第二共

<sup>①</sup> 奥尔良的菲力浦。——編者注

和國，現在却在法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背離了現存的政府。

“法國思想界，從梯也爾到基佐，從庫辛到維爾曼，從米希勒到讓·雷璣，都避免和你接觸，怕你玷污他們。只有巴托羅繆之夜<sup>①</sup>和宗教裁判的辯護士維伊奧，黑人奴役制的庇護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才是你的追隨者。為了要找到一個能夠以自己的威信來支持你那抨擊英國的文章的人，你只好去尋找既背叛正統主義又背叛共和主義的人。”

接着馬志尼正確地解釋了1月14日事件的真實意義，他說炸彈沒有击中皇帝，却击中了帝國，揭穿了帝國所說的大話全是胡謔。

“不久前，你還向歐洲夸口說，安寧、幸福和平靜的法國的心是屬於你的，法國把你當做它的救星來贊頌。但是幾個月之後，勒佩勒蒂埃街上就發出了爆炸聲，接着你採取野蠻的、慌張的鎮壓措施，向歐洲發出半帶威脅、半帶哀求的呼喚，從軍事角度把全國分成許多區，並且指派一名武夫掌管內務部，——你現在以這一切證明了，儘管經過七年的絕對統治之後，你擁有龐大而集中的軍隊，清除了國內所有使你擔心的領袖人物，可是，如果不把法國變成一個大巴士底獄，不把歐洲變成帝國的一個警署，你就不可能生存和統治下去……的確，帝國原來是一個騙局。閣下，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樣子把它塑造出來的。上半個世紀在歐洲，除了達來朗以外，誰也沒有像你那樣多地撒過謊；而這就是你得以暫時掌權的秘密。”

接着信中提綱挈領地歷數了這位社會救主的一切謊言，從1831年開始，當時他參加羅馬居民反對教皇的起義<sup>334</sup>，說是把它看做“神聖事業”；直到1851年，當時他在 coup d'état [政變] 的前幾天向軍隊說，“除憲法所承認的權利以外，我不向你們要求任何東西”；最後到12月2日，當時由於他的篡奪計劃的最後結果還未見分曉，他宣布說：“他的責任在於保護共和國。”最後，馬志尼直截

<sup>①</sup> 巴托羅繆之夜是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大規模地慘殺胡格諾教徒的事件；發生於1572年8月24日聖巴托羅繆節的前夕。——譯者注

了当地对拿破侖說，要不是英国，他早就成了革命的牺牲品了。接着，他駁斥了拿破侖关于法国与英国之間似乎已經建立同盟的說法，并且用下面这样两句話作了結束：

“閣下，不管虛偽的、假裝的外交怎么說，你現在在整个欧洲都是孤立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3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5 月 1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321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倫敦的法國人審判案

1858年4月4日于巴黎

維克多·雨果給侄子起了個綽號叫小拿破侖，於是承認其伯父為大拿破侖了。他的著名小冊子<sup>335</sup>的標題就意味著一種對照，並且是對那種迷信拿破侖的現象表示一定程度的肯定，因為奧當斯·博阿爾奈的兒子就是依靠這種心理巧妙地建立了自己幸福的血腥大廈。但是，對目前這一代人更有益處的是要清楚了解，小拿破侖實際上反映了大拿破侖的劣跡。這一事實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不久以前英法之間發生的“令人可悲的誤解”，以及英國政府在这种“誤解”的壓力之下對僑民和印刷商進行的刑事審判。簡短的历史回顧將證明，在這一出卑鄙的傳奇劇中，小拿破侖只是不折不扣地重演了早先大拿破侖所構思和扮演過的卑劣角色。

僅在締結亞眠和約（1802年3月25日）和大不列顛重新宣戰（1803年5月18日）之間的這一短短時期內，拿破侖就恣意地干涉了大不列顛的內政。他沒有白費時間。早在和談還在進行的時候，“通報”就向所有敢于對“波拿巴的溫和的和誠懇的意圖”表示懷疑的倫敦報紙大肆攻擊，並且露骨地暗示說，“這樣的懷疑很快就會得到懲罰”。但是執政不僅限于充任英國報刊語氣和意見的檢查官。“通報”攻擊格倫維耳勳爵和溫德姆先生在討論和約問題時采

取的立場。首席檢察官派西沃曾在下院要議會議員埃利奧特先生對表示懷疑波拿巴的意圖一事負責。卡斯爾里勳爵和小皮特本人都成了鼓吹克制的人，他們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諄諄告誡地說，當談論到法國的執政時必須謹慎一些。締結和約以後大約六個星期，在1802年6月3日，達來朗通知英國駐巴黎公使梅里先生說，波拿巴出於對英國的尊敬，決定派真正的大使安得列奧西將軍接替法國駐倫敦公使奧托先生，但是第一執政真誠地希望，在這位高級人物抵達倫敦以前，能夠“消除橫亘在兩國和兩國政府之間達到充分和解的道路上的障礙”。不客氣地說，他要求從英國領土上驅逐

“所有法國親王及其追隨者，連同法國主教和在政治主張及行動方面必然會引起法國政府很大懷疑的其他法國人……如果上述這些人在同法國緊相毗鄰的國家里繼續得到庇護和厚待，那末僅僅這一點，也會被看做是鼓勵這裡的不滿分子，即使這些人沒有犯下任何在這個國家里煽起新的騷亂的罪行；但是法國政府掌握的材料證明，他們濫用英國對他們的庇護以及利用同法國靠得近的有利條件，確實進行了這類犯罪活動，因為前不久截獲的一些印刷品，如所周知，是他們為了建立政府的反對派而運到法國來散發的”。

當時英國有一種外僑管理法，然而這種外僑管理法是專門為保護不列顛政府而制訂的。當時的外交大臣霍克斯柏里勳爵答复達來朗的請求時說：

“國王陛下當然希望僑居在他領土內的一切外僑，不僅使自己的行為符合英國的法律，而且對同陛下保持和睦關係的任何國家的政府不採取任何敵對行動。然而陛下認為，只要外僑遵守這個原則，如果拒絕保護他們，那是同自己的尊嚴、榮譽和好客習慣不相容的。只有僑居在陛下領土內的人本身有不軌行為，陛下才不予保護。達來朗先生在談話中所提到的那些人，大部分完全是過着安分守己的生活。”

梅里先生把霍克斯柏里勳爵的急電轉交給達來朗時再三保證“可以告慰第一執政，讓他放心和滿意”。但是達來朗堅持要自己的一磅肉<sup>①</sup>，硬說第一執政的要求，並未超出英國政府本身在覬覦者<sup>②</sup>僑居法國時曾向路易十四提出的要求，硬說他根本看不出採取上述措施有任何屈辱的地方，並說他必須再次聲明，“接受這種措施會使第一執政感到非常愉快和十分滿意”，執政會把這件事看做是“陛下要在兩國之間建立真誠了解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證”。1802年7月25日，奧托先生從他的波特曼廣場官邸寫信給霍克斯柏里勳爵，信中恰恰是堅決要求在一切涉及波拿巴及其政府的問題上取消英國的出版自由。

他寫道：“不久以前，我轉給哈蒙德先生一份貝爾蒂埃出版的對法國政府和整個法國極盡誣蔑之能事的刊物。同時我表示，我多半會接到要求懲罰這種濫用出版物的行為的命令。這樣的命令果然送來了。我不能向您閣下諱言，聚集在倫敦密謀反對法國政府的一小撮僑民一再進行的侮辱行為，極惡劣地影響了兩國之間的真誠了解……我應當提請陛下政府不僅注意貝爾蒂埃，而且要注意《*Courrier Français de Londres*》的編輯（雷尼埃）、科貝特和其他類似的作家……沒有一定的旨在對付這類罪行的法律，是不能作為違背國際法的借口的。根據國際法的原則，締結和約就必須停止一切敵對行動。毫無疑問，一切有損於政府榮譽和聲望並導致那些把利益委諸政府的人民掀起暴亂的行為，都是最足以削弱和約的好處和引起國家的憤慨的。”

霍克斯柏里勳爵在7月28日給奧托先生的信中沒有堅決、嚴正地回答波拿巴對出版問題進行干涉時第一次提出的這些指責，反而對存在出版自由的問題低三下四地表示歉意。他在信中寫道：

①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場。——編者注

② 詹姆士二世。——編者注

“陛下政府看到貝爾蒂埃的文章后，不能不深表憤慨，不能不極欲使發表這篇文章的人受到應有的懲罰。”

然後，他訴說“不便”對誹謗進行起訴，“碍難”對誹謗者進行審判，他在結尾中說，他已經把案件轉給皇家首席檢察官，“以便由首席檢察官裁決這是不是誹謗”。

正當不列顛政府準備用這種辦法對出版自由發起十字軍討伐以使自己的強大的新盟國息怒的時候，8月9日的“通報”突然發表了一篇帶威脅性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僅指責英國容納法國的強盜和兇手，讓他們在澤稷島避難和派遣他們到法國海岸進行掠奪性的襲擊，甚至還把英國國王本人描繪成殺人行為的鼓舞者和慫恿者。

“‘泰晤士報’，這家所謂受政府直接領導的機關報連篇累牘地謾罵法國。該報的四版中間每天有兩版篇幅散布肆無忌憚的誹謗。這家毫不榮譽的報紙把一切可能想像出來的下賤、卑鄙、丑惡的東西都硬加在法國政府身上。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是誰為此付了錢呢？這將導致什麼結果呢？一些卑賤的僑民，一些沒有祖國、沒有人格、罪行累累、不可饒恕的極端卑鄙下流的殘余分子所出版的法文期刊，比‘泰晤士報’有過之無不及。”“在倫敦聚集着以阿拉斯的凶殘的主教為首的11個主教，他們是反對自己的國家和教會的叛逆分子。他們發表誹謗法國主教和僧侶的言論。”“澤稷島上麇集着在締結和約之後因殺人、搶劫和縱火而被法庭判處死刑的匪徒。若爾日<sup>①</sup>在倫敦公然佩戴他的紅色勳章帶，這是他以定時炸彈炸毀了巴黎的部分地區和炸死了30個婦女和兒童或和平居民而得到的獎賞。這樣的特殊庇護使人確信，如果他的圖謀得逞，他將會榮膺祿帶勳章<sup>②</sup>。”“兩者必居其一：要末是英國政府准許和容忍這類政治的和刑事的罪行，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說這種行為符合英國的寬宏、文明和榮譽；要末是英國政府無能防止這類罪行，在這種情況下，它就不配稱為政府，特別是它沒有辦法去制止謀殺和誹謗行為以及維持社會秩序。”

① 卡杜達爾。——編者注

② “祿帶勳章”(Order of the Garter)，是英國爵士的最高級勳章。——譯者注



当这份充滿威胁性詞句的“通报”在深夜送到倫敦时，群情十分激憤，以致政府机关报“誠实的不列顛人报”<sup>336</sup> 不得不声明：“这篇文章登在‘通报’上，不可能是法国政府知道或者同意的。”劳倫斯博士在下院就法国对陛下的誹謗一事向阿丁頓先生（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质問。大臣答复說，“很抱歉，他不能向博学的先生介紹对这个問題所做的令人滿意的解釋”。答复的含意是，当不列顛政府把譏諷波拿巴及其夫人的案件按法律处理时，貝尔蒂埃先生由于挖苦这两位人物而被皇家法院<sup>337</sup> 当做刑事犯傳訊；可是当法国官方报纸誹謗英国并把英国国王称做杀人事件的鼓舞者时，全部問題就用“解釋”来調解，甚至秘密得都不能告訴給議會。英国内閣这种明显的优柔寡断，鼓励了奥托在1802年8月17日交給霍克斯柏里勋爵一份极其蛮橫的照会，照会中公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英国报刊登載一切不妥当的煽动性的通告，把某些人赶出澤稷島，驅逐法国主教，遣送若尔日及其追随者到加拿大，放逐法国亲王到华沙。至于外侨管理法，奥托先生坚持說，政府必須具有“合法的、强有力的权力，不必訴諸法庭而能約束外侨”；同时又說：

“为了表示在这个問題上完全互惠，法国政府认为，它要求把那些一貫阴謀在两国之間制造糾紛的人驅逐出去，就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和平意图。”

在最近同波拿巴第三发生的爭論中，霍克斯柏里勋爵8月28日以急电的形式給英国駐巴黎公使的答复，被倫敦报刊引为具有国家活动家尊严的典范。但是必須承认，尽管这个答复充滿了合乎美德的憤慨言詞，然而还是允諾以損害法国侨民来消釋第一执政的疑虑。

1803年初，拿破侖曾着手整頓英国議会的程序和限制議會議

員的言論自由。他在自己的“通報”上直接影射前任大臣溫德姆先生、格倫維耳勛爵和敏托勛爵說：

“禁止前任大臣在辭職後七年之內擔任英國議會議員的法律，是一條愛國的明智的法律。另外一條對侮辱友好人民及其政府的任何議員剝奪兩年發言權的法律，也是明智的法律。舌頭犯了罪，舌頭就應當受懲罰。”

正在這時抵達倫敦的安得列奧西將軍在致霍克斯柏里勛爵的照會中表示不滿說，英國報刊上那些撰寫短評和詆毀文章的卑鄙的作者“在他們的無禮的短評中一貫引用某些著名議會議員言論中的個別詞句”。他在照會中就這些言論說，“任何明事達理的英國人都會為這種聞所未聞的穢語感到恥辱”。他代表第一執政希望

“採取措施禁止將來以任何方式（無論是在官方的辯論中或者是在英國發表的辯論性文章中）涉及法國所發生的事件，正像法國的官方辯論和辯論性文章不應當涉及英國所發生的事件一樣”。

當波拿巴以這種虛偽而又傲慢的語調同英國政府秘密通信時，“通報”竟肆無忌憚地对英國人民橫加侮辱，並且發表了塞巴斯提昂尼上校的官方報告，報告中对駐埃及的英軍進行了極端侮辱性的責難。1803年2月5日，法國駐澤稷島 commissaire de relation commerciale [商務委員] 儘管沒有任何官方權力，却蠻橫地埋怨一些印刷商從倫敦報紙上轉載了一段侮辱波拿巴的章節，並且威脅說，如果不取締這類陰謀，波拿巴一定會對澤稷島進行報復。這種威脅產生了預期的效果。皇家法庭便傳訊其中兩名印刷商，並且決定以後嚴禁他們再印刷任何有辱法國的東西，即使這些東西是摘自倫敦報紙的。1803年2月20日，即貝爾蒂埃受審的前一天，英國駐巴黎大使惠特沃斯勛爵被那位偉人親自召見。波拿巴自己在桌子的一端坐下以後，就讓被邀請到他辦公室來的惠

特沃斯坐在另一端。波拿巴列举了一些似乎是他从英国方面受到的挑衅。

“他談到了英国报刊对他的侮辱，但是他說，他对此并不像对倫敦出版的法文报纸上发表的东西那样注意。他认为后者包藏着更大得多的禍心，因为法文报纸的目的是要鼓动他的国家反对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他抱怨不該对若尔日及其同伙加以庇护。他承认，他对英国的憤慨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因为从英国来的一切，除了对他的敌意和憎恨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为了证明自己維護和平的願望，他說他看不出同英国打仗对自己有任何好处。登陆是他防止遭受侮辱的唯一手段，他决定亲自领导远征軍来試一試这种手段。他承认，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次談判的結果将是战争的話，他还是决定試一試这种手段。他补充說，軍隊的士气很高，准备前仆后继地远征…… 为了保持和平，必須遵守亚眠和約。如果不彻底制止报刊上的侮辱言論，至少也应当加以限制，而且仅限于对英国报纸，同时必須禁止对他的极凶恶的敌人进行如此公开的庇护。”

2月21日，貝尔蒂埃在埃倫伯勒勋爵和特別指定的陪審官面前受审，他的罪名是发表誹謗波拿巴的文章和“唆使法国人民謀刺自己的元首”。埃倫伯勒勋爵在結束他对陪審官的讲话时卑賤地說：

“先生們，我深信你們的裁決将会增进我国利益同法国利益所維系着的关系。这种裁決将在世界各地证实并加强早就举世傳誦的一种信念：英国司法是公正无私的。”

陪審官即席立即宣判了貝尔蒂埃先生有罪。然而，由于后来两国之間断絕了关系，貝尔蒂埃先生沒有被傳去接受判决书，訴訟就此終止了。誠实而英勇的“通报”在迫使英国政府对出版事业开始了这种压制，使它不得不宣判貝尔蒂埃有罪以后，就在1803年3月2日发表了如下的評論：

“一个名叫貝尔蒂埃的人被倫敦法庭判了罪，因为他印发了一些恶毒地

誹謗第一執政的東西。令人不解的只是，為什麼英國政府極力圍繞這件事掀起這樣的 *éclat* [喧嚷]。鑑於英國報紙硬說，審判是應法國政府的要求進行的，甚至當陪審官在審判會上宣布判決時，似乎還有法國大使在場，我們受權聲明，從來沒有過這類事情。第一執政在沒有看到貝爾蒂埃審判案的廣告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貝爾蒂埃的誹謗這件事…… 但是必須承認，這次審判案在其他方面雖然沒有什麼好處，卻使主持審判的法官有機會以自己的明智和公正來表明，他們在這個許多方面受人尊敬的、這麼開明的國家里確實当之无愧地行使了司法權。”

當“通報”在同一篇文章中堅決強調一切“文明的歐洲國家”都有責任共同消滅報刊野人的時候，法國駐漢堡公使雷納爾先生曾召集漢堡參議會討論第一執政要求在“漢堡記者”<sup>338</sup> 上發表竭力侮辱英國政府的文章的問題。參議會希望至少應當容許刪改最帶侮辱性的地方，但是雷納爾先生聲稱，他接到的一項堅決的命令是要全文刊載。後來這篇文章就原封不動地發表了。法國公使要求阿爾托納各報也登載這篇文章，但是丹麥的長官宣稱，在沒有接到本國政府的确切命令時他們決不容許這樣做。由於受到這樣的拒絕，法國駐哥本哈根的公使阿格索先生就從漢堡的同事那里收到了這篇文章，請他爭取容許在丹麥報紙上發表這篇文章。當惠特沃斯勳爵為了這種誹謗去拜會達來朗先生的時候，達來朗先生聲稱：

“當第一執政得知這樣一篇文章是奉命發表的時候，他感到的震驚不小於英國大臣，並且立即要求雷納爾先生進行解釋”云云。

大拿破侖就是這樣的人物。

卡·馬克思寫於 1858 年 4 月 4 日

載於 1858 年 4 月 27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309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卡·馬克思

### \*法国財政状况

1858年4月13日于巴黎

情况越来越迫使复辟了的帝国拋棄装腔作势的姿态，現出自己全部丑恶的原形。招认的时刻对它來說来得十分突然。它已經不再自命为合法的統治形式或«suffrage universel»〔“普选权”〕的产儿了。它已經宣布自己是暴发戶、告密者和十二磅炮的制度<sup>339</sup>。現在它更进了一步，公开地供认自己是騙子的制度。4月11日的“通报”发表了一篇短評，說有几家报纸过早地宣布了許多铁路公司以及其他工业公司的股票股息，并且宣布的数字低于董事会早已規定的数字。

“必須保护我国的工业和資本免受这一类詭計的損害。帝国的檢察官傳訊了上述各报的編輯，警告他們說，今后这种事件将提交法院按別有用心地公布假消息論处。报纸刊物的义务是开导公众，而不是謠言惑众。”

換句話說，报纸刊物的工作人員的义务——如果他們不希望流放到凱恩去的話——是維護 Cr dit Mobilier<sup>28</sup> 的声誉，而不是像他們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樣，向公众預告这个駭人听聞的詐騙机关即将破产，即使措詞十分謹慎和委婉。Cr dit Mobilier 的每年一次的股东大会定于4月29日举行，会上将宣布公司上年度的股息。尽管該公司的董事們严守秘密，但是最坏的消息却在流傳

着，推測該公司会采用什么方式“虛构出”期待着的股息，有一家报纸甚至敢于旁敲侧击地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家同 Crédit Mobilier 有联系的股份公司的不很久以前召开的会议上，公司的董事非常泰然地说，纵然他可能宣布只有 8% 的股息，公司的业务却比一年以前在股息为 25% 的情况下要好得多。文章的作者冒险地表示怀疑，说这家公司“以及其他”公司恐怕是拿资本而不是拿所得的利润来偿付全部股息的吧。这一切使得“通报”勃然大怒。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的行市，2 月 10 日为 957—960 法郎，3 月 10 日跌到 820—860 法郎，4 月 10 日再跌到 715—720 法郎，甚至这个行市也仅仅是名义上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股票持有者决定至少出售 6 000 股，而貝列拉兄弟的奇妙的创作之一“海事总公司”在卷入了絕非“海事”的投机活动以后，已經 articulo mortis〔奄奄一息〕，这些不体面的事实是用任何手段也掩盖不了的。完全不愧为埃斯潘納斯將軍的那一类政治经济学家的好一个妙計，以为“通报”的威胁将保证信贷的增长，同时也使人们不敢说话。警告是发生作用的，不过恰好是发生相反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警告发自一个其财政詭計早已成为人们谈话中的笑柄的政府。大家知道，财政大臣曼涅先生編制的預算上載明有結余，但是，由于 cour de révision〔检查委员会〕的一个委員不識分寸的多嘴，暴露了这个預算实际上有将近 1 亿法郎的赤字。当曼涅先生被召見向“财产的救主”<sup>①</sup> 作解釋时，他恬不知耻地对自己的主子說，他知道主子有“結余”的嗜好，所以就像在他以前的路易-菲力浦的大臣們所做的那样“虛构了”一个預算。事情就这样了結，但是这一事件傳开以

①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后，迫使政府做了一次招认。政府虽然在“通报”上郑重宣布关税在2月份有了增长，却又不肯坚持自己的说法。3月底公布的海关月报表明，今年2月份的进口税甚至根据官方的说法总共也只有13 614 251法郎，而1857年同月却有14 160 013法郎；今年1月和2月进口税总共为25 842 256法郎，而1857年这两个月份为28 044 478法郎。官方所说的“保护我国的工业和资本免受诡计的损害”和“开导公众”而不要“谣言惑众”，原来就是这种意思。

Coup d'état [政变]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大批的流放，法国被分割成为御用军的兵营，关于战争的風聞，外部的糾葛和內部的阴谋——简单地說，1月14日謀杀事件以后，小帝国的焦躁不安的抽搐稍微轉移了人們对法国的財政状况的普遍注意。否則，公众会看到，就在这个时候，波拿巴政体的装出来的繁荣已經还原为自己的最初的元素——盗窃国家财产和进行投机活动了。为了证明这种情况，我只要列举这样一些事实，有关这些事实的消息不时地渗入欧洲的报界。先拿普洛斯特先生领导的 Compagnie générale de caisses d'escompte [貼現銀行总公司] 來說。这家总公司不仅参与了一切证券投机活动，而且忙于在全法国創立貼現銀行。公司的資本为600万美元，分6万股。这家公司已与葡萄牙的Crédit Mobilier 合并，并且是馬德里Crédit Mobilier的 magna pars [重要部分]。但是公司的全部資本已經枯竭，而且負債将近300万美元。Compagnie parisienne des équipages de grandes remises [巴黎大型馬車出租公司]的达莫尼約先生因騙取了自己股东的現款和股票10万美元，使他們承担40万美元的債務，胡乱浪費了公司的全部資本160万美元，已被 police correctionnelle [違警裁判所]判罪。另一家公司(Lignéenne [木材业]，似乎是从事木材造紙的)

的經理也因为浪費了 80 万美元的資本而被判罪。另外两个波拿巴的“财产的救主”同銀行家集团勾結在一起，决定把他們自己以 20 万美元买进的在遙远的多瑙河畔的某些森林和矿場以 1 000 万或 1 500 万美元的价格脫手卖给大众，因而被判罪。还查明了亚琛附近一家矿业公司的經理們把只值 20 万美元（后来他們不得已供认出来的）的矿井以 5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給自己的股东。由于揭露出了这种种情况，Messageries générales〔运输公司〕的股票行市从以前的 1 510 法郎跌到大約 500 法郎。Compagnie des petites voitures〔小型馬車公司〕的股票发行后不久曾哄抬到 210 法郎，現在跌到了 40 法郎。联合公司的股票从 500 法郎跌到 65 法郎。法美航运公司的股票曾經值 750 法郎，現在用 30 法郎便能买到。瓦斯联合公司的股票价格从 1 120 法郎跌到 620 法郎。Caisse des actionnaires〔股份銀行〕的董事、小帝国的暴发的百万富翁之一米洛先生对自己的股东們說：

“最近半年来的营业沒有取得分毫利潤，因而他不仅无法宣布股息，甚至无法支付这半年通常的利息，但是这种利息他一定会掏自己私人的腰包来支付的。”

小帝国的社会潰瘍就这样接二連三地暴露出来。路易·波拿巴竟同证券投机商人的上层荒謬地商談采取什么手段来帮助法国的商业和工业，当然这种商談沒有产生任何結果。法兰西銀行自己的处境也十分悲惨，因为它无法出售铁路公司的本票，这些本票是法兰西銀行为了使铁路公司进行自己的工程而不得不貸款給它們时作为抵押品收进的。正当法国的铁路公司的全部财产迅速贬值，铁路的每周周报表明铁路的收入不断减少的时候，誰也不願意买进这种本票。



倫敦“經濟學家”雜誌駐巴黎記者指出：“至于法國商業的狀況，仍舊和過去是一樣的；換句話說，它表現了好轉的趨勢，但是還沒有好轉。”

與此同時，波拿巴固執地繼續向非生產性企業投資，但是，正像塞納省省長歐斯曼先生坦率地告訴巴黎居民的那樣，這種企業“從戰略觀點來看”是重要的，可以用來防止“隨時可能發生和危害社會安全的意外事件”。例如，為了防衛的目的，防備這個城市爆發不滿事件，巴黎將建設價值 18 000 萬法郎的新的林蔭道和街道。塞瓦斯托波爾林蔭道的新地段的開辟也完全符合這一“戰略觀點”。起先純粹是市民的和市政的盛典，由於所謂發現了旨在暗殺波拿巴的新陰謀而突然變成了軍事示威。“通報”在解釋這一 quid pro quo [誤解] 時說道：

“舉行閱兵來隆重慶祝首都這條新動脈的落成是完全正確的，我國的士兵繼皇帝以後首先踏上這片有如此光榮的勝利的名稱的土地，也是完全正確的。”

卡·馬克思寫於 1858 年 4 月 13 日

載於 1858 年 4 月 30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5312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攻占<sup>340</sup>

印度起义的第二个危急时期结束了。第一个时期以德里为中心，并以该城的被攻占而告终；第二个时期的中心在勒克瑙，现在该城也陷落了。除非那些至今仍然平静的地方爆发新的起义，否则起义势必逐渐转入拖延持久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期，起义者终将变成土匪和强盗，他们会发现，本国居民将和英国人一样，成为他们的敌人。

强攻勒克瑙的詳細报道还没有接到，但是最初的战斗部署以及最終的战斗的大致情况已经知道了。我們的讀者都記得<sup>①</sup>，在勒克瑙駐劄官邸解圍以后，坎伯尔將軍就把官邸炸毀了，但是让烏特勒姆將軍率領 5 000 人左右留在离城几英里的一个設防据点阿朗巴格。他自己則率領其余的部队返回康波尔，在这里温德姆將軍被一支起义軍打敗。坎伯尔彻底击潰了这支起义軍，并迫使他們在卡耳皮附近渡过朱木拿河。然后他就在康波尔等待援軍和重炮到来，准备自己的进攻計劃，下令集中被指定去进攻奥德的各路队伍，特别是設法把康波尔变成一个力量雄厚和規模巨大的营垒，以便使它成为对勒克瑙作战的最近的和主要的基地。当这一

<sup>①</sup> 見本卷第 405—406 頁。——編者注

切准备就绪以后，他认为还要完成另一项工作才能安心出征，这项工作的提出使他立刻显得和几乎所有以前的驻印英军指挥官有所不同。他不愿意有妇女在兵营里游逛。他在勒克瑙以及在开往康波尔的途中，对这些“女英雄”算是领教够了。她们以为，军队的行动，就像在印度常常遇到的那样，要服从她们的喜好，听随她们的方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坎伯尔到达康波尔以后，立即把这群有趣的但又招惹麻烦的人全部送往阿拉哈巴德，免得碍事；接着，马上又把当时住在阿格拉的第二批太太小姐们召来。直到她们到达康波尔，他又送她们安全地前往阿拉哈巴德，然后才回到向勒克瑙进发的军队里去。

为这次出征奥德进行的准备工作，其规模之大，在印度是前所未有的。英军在印度过去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是入侵阿富汗<sup>341</sup>，参战的军队从来没有超过两万人，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土著士兵。在这次出征奥德时，仅欧洲人的数目就超过派往阿富汗的所有部队的人数。在科林·坎伯尔爵士亲自指挥下的主力部队，包括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炮兵师和工兵部队。乌特勒姆指挥的第一个步兵师守在阿朗巴格。这个师由5个欧洲团和1个土著团组成。第二个师（4个欧洲团和1个土著团）、第三个师（5个欧洲团和1个土著团）、霍普·格兰特爵士指挥的骑兵师（3个欧洲团和4个或5个土著团）以及全部炮兵（48门野炮、攻城炮兵纵列和工兵部队）组成了坎伯尔由康波尔出动的作战部队。弗兰克斯准将所指挥的、集中在古姆提河和恒河之间的章普尔和阿扎姆加尔两地的一个旅则应沿古姆提河向勒克瑙前进。这个旅除土著部队外，有3个欧洲团和2个炮兵连，应构成坎伯尔的右翼。连同这个旅在内，坎伯尔的兵力总数是：

	步 兵	騎 兵	炮 兵 和 工 兵	合 計
欧洲部队·····	15 000	2 000	3 000	20 000
土著部队·····	5 000	3 000	2 000	10 000

也就是說，总数达 3 万人；此外，还应当加上在章格·巴哈杜尔指揮下由果腊克普尔向苏耳坦普尔前进的 1 万尼泊尔廓尔喀人，这就使入侵军队的总数达到 4 万人，而且几乎全是正規部队。但这还不是全部。在康波尔以南，亨·罗斯爵士率領一支强大的队伍由薩加尔向卡耳皮和朱木拿河下游前进，以便堵击任何可能从弗兰克斯和坎伯尔两軍之間溜过去的脱逃者。在西北方面，張伯倫准将于 2 月底左右在恒河上游渡河，进入奥德西北部偏北的罗希尔汗，而且不出所料，这里是起义军队退却的主要地点。奥德四周圍城市的警备部队也应当列入直接或間接向奥德王国进攻的兵力之内，这样一来，这支兵力的总数必定有 7 万—8 万人。根据官方材料，其中英国人不下 28 000 人。上述的兵力总数中还不包括約翰·劳倫斯爵士的大量部队，这支部队在德里占領着一种側防陣地，由米拉特和德里的 5 500 名欧洲兵和 2 万或 3 万旁遮普土著士兵組成。

这样龐大的兵力的集中，一部分是坎伯尔將軍策划的結果，但一部分也是印度斯坦各地起义被鎮压的結果，由于各地起义被鎮压，部队就自然集中到有战事的地方。毫無疑問，坎伯尔本来是會冒險以較少的兵力作战的，但是当他等待这些兵力的时候，种种情况使他得到了新的兵力；而他这个人，即使明知道在勒克瑙将会遇到的敌人是多么可怜，也不至于拒絕利用这些兵力。而且不要忘记，虽然这些部队的数目看来很大，但是他們却分散在一个像法国

那样大的地区里；在决战的地点勒克瑙，他只能用上大约 2 万欧洲兵，1 万印度兵和 1 万廓尔喀兵，而在土著军官指挥下的廓尔喀兵究竟有多大价值，至少还是值得怀疑的。这支军队单靠它的欧洲兵就确实可以绰绰有余地保证迅速取胜，但是全军的数量与它所担负的任务并不是不相称的。很可能，坎伯尔这一次打算向奥德居民显示一下印度任何民族都从未见过的一支威武的白人大军，作为对印度人利用欧洲人为数不多而又广泛分散全国各地的情况举行起义的回答。

起义者在奥德的兵力是由大多数起义的孟加拉团的残部和奥德本地的新兵组成的。前者最多不超过 35 000 或 40 000 人。战斗、逃亡和军心涣散一定使原先达 8 万人的这支兵力至少减少一半，而留下来的则是组织涣散，士气不振，装备恶劣，完全不适于作战的。根据不同的报道，新兵约有 10 万到 15 万人；但是他们数量究竟有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只有一部分人装备有构造拙劣的火器，大部分人只有进行白刃战的兵器，而这种战斗他们是很少会遇到的。这支兵力的大部分在勒克瑙，与詹·乌特勒姆爵士的部队作战，但是有两支队伍向阿拉哈巴德和章普尔方面行动。

向勒克瑙分进合击的运动约在 2 月中开始。从 15 日到 26 日，主力部队同它的大量辎重（仅随军僕役就有 6 万人）由康波尔向奥德的首府前进，未遇抵抗。同时敌军在 2 月 21 日和 24 日曾攻打乌特勒姆的阵地，没有成功。19 日，弗兰克斯向苏耳坦普尔进攻，一天之内把起义者的两支队伍都击溃了，并且在没有骑兵的情况下尽力进行了追击。这两支被击溃的队伍会合后，弗兰克斯又在 23 日把他们击溃，使他们损失了 20 门火炮以及全部兵营设

备和輜重。指揮主力前卫的霍普·格兰特將軍，在强行軍过程中离开主力，繞到左面，于23日和24日摧毀了位于由勒克瑙到罗希尔汗途中的两个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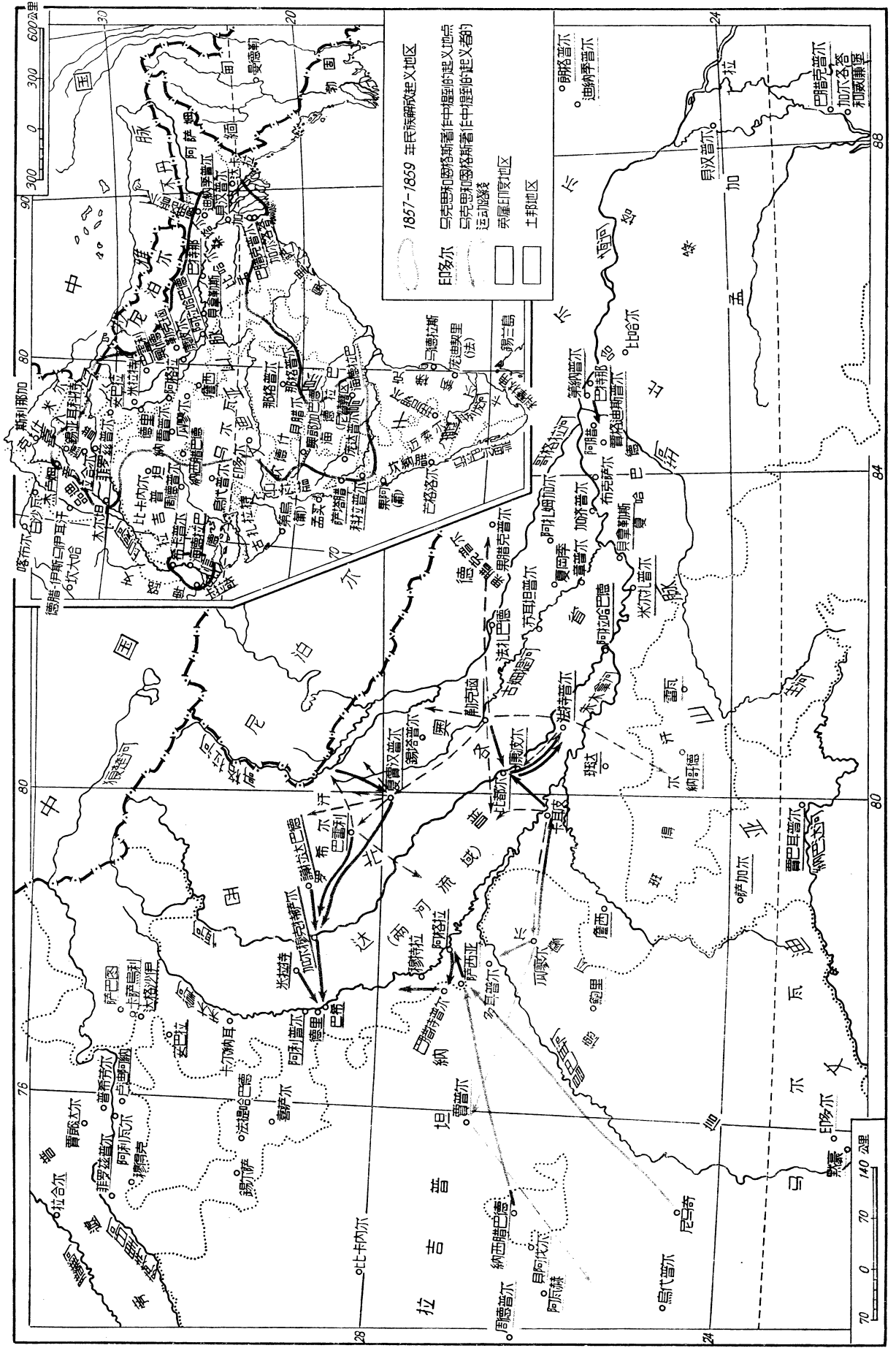
3月2日，主力集中在勒克瑙南面。城市在这方面有运河圍护，坎伯尔在前次攻城时曾不得不渡过这条运河；运河后面現在已經筑有坚固的工事。3日，英軍占領了迪尔庫什宮苑，第一次进攻勒克瑙时，也是由攻击这个宮苑开始的。4日，弗兰克斯准将与主力会合，形成它的右翼，而他自己的右翼則以古姆提河为依靠。这时，对付敌人工事的炮台已建成，并在城市下方古姆提河上架起两座浮桥。当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以后，詹·烏特勒姆爵士立即率領他的步兵师、1400名騎兵和30門火炮渡河去占領左岸（即东北岸）的陣地。从这里他可以用纵射火力射击敌人在运河岸边的大部分陣地及其后的很多設防的宮殿。他还切断了敌人与奥德整个东北部的交通。6日和7日，他遇到相当頑强的抵抗，但仍驅退了敌人。8日，他再次受到攻击，但攻击仍被击退。这时，配置在右岸的炮台开火；烏特勒姆的炮台沿河岸射击起义者的翼側和后方；9日，爱·路加德爵士指揮的第二师攻占了馬蒂尼埃尔，讀者也許还記得<sup>①</sup>，这是一所带花园的学院，位于运河南岸，在运河与古姆提河汇合处，和迪尔庫什宮苑相对。10日，銀行大厦被打开了缺口并被攻下。烏特勒姆沿河而上，更往前进，用他的火炮对起义者的陣地逐个进行纵射。11日，两个苏格兰团（第四十二团和第九十三团）攻占了王后宮，烏特勒姆攻占了連結左岸与城市的几座石桥。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队伍調过河去，参加攻打对面最近的一座

<sup>①</sup> 見本卷第381頁。——編者注

建筑物。3月13日,对下一个设防的建筑物伊曼巴拉大厦的攻击开始了。为了设置隐蔽的炮位,向大厦挖掘了一道对壕。次日,在那里造成缺口,这座建筑物遂被攻占。逃向愷撒巴格(即王宫)的敌军遭到猛烈的追击,英军紧跟着逃军冲入了王宫。激战继之而起,但到下午3时,王宫已落入英军手中。这看来已使战斗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至少,抵抗的意志已丧失净尽,于是坎伯尔立即部署追赶和堵击脱逃的敌人。坎伯尔准将奉命率领一个骑兵旅和少部骑炮兵去追击他们,而格兰特则率领另一个旅绕到位于勒克瑙到罗希尔汗途中的锡塔普尔去堵击他们。在对逃跑的那一部分守军采取了上述措施以后,步兵和炮兵继续向城内前进,肃清还在那里坚持的敌军,从15日到19日,战斗显然主要是在城内狭窄的街道上进行,因为沿河岸的宫殿和花园地带早已被占领。可是在19日,全城已落入坎伯尔手中。据说,约有5万起义者逃跑,一部分逃向罗希尔汗,一部分逃向达普和班得尔汗。他们往后一个方向有可能逃脱,因为罗斯将军和他的队伍距朱木拿河至少还有60英里,并且据说他前面还有3万起义者。在罗希尔汗方向上,起义者还有机会重新集中,因为坎伯尔不能够很迅速地追赶他们,至于张伯伦现在何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而且该省之大足以使起义者暂时安身。因此,起义的下一阶段的特点,很可能是在班得尔汗和罗希尔汗成立两支起义军,而后一支军队可能很快就被勒克瑙和德里的军队用分进合击的运动消灭掉。

就我们现在所能判断的,科·坎伯尔爵士在这次战役中的行动仍以他所常有的谨慎和毅力为特点。他对勒克瑙实行分进合击的部署是出色的,而且在进攻的准备中看来也充分利用了一切有利情况。另一方面,起义者的行动大概比以前更加可怜了,任何地

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方只要一看见红制服，就惊慌失措。弗兰克斯的队伍击溃了比自己多 20 倍的兵力，自己却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虽然电讯照例说什么“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搏斗”，但报道中提到的英军的损失却少得出奇，因此，恐怕这次在勒克瑙不需要英国人比上次进攻该城<sup>①</sup>时表现更多的勇敢，他们在那里所取得的荣誉也不会比上次更大些。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4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4 月 30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12 号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81—387、398—406 页。——编者注

## 卡·馬克思 迪斯累里先生的預算

1858年4月20日于倫敦

迪斯累里先生4月19日在下院发表的关于預算的演說，虽然在倫敦“泰晤士报”上占了大約十栏的版面，但是不管怎样，讀起来却很愉快，也許甚至比讀这同一位作者的长篇小说“年輕的公爵”<sup>342</sup>还要更愉快些。就分析透彻、結構簡练、布局巧妙和細节处理适中等方面來說，这篇演說比他那位在帕麦斯顿执政时的前任的笨拙冗长的言論要高一头。演說并没有包括任何特別新的东西，而且也沒有企图这样做。迪斯累里先生处于不是和他自己造成的赤字、而是和对手遺留下来的赤字打交道的財政大臣的有利地位。他扮演的角色是医师，而不是病人。这样，一方面他得找出弥补赤字的資金；而另一方面，根本談不上大量縮减由于英国已在帕麦斯顿勋爵庇护下从事的冒險而引起的开支。迪斯累里先生直截了当地向下院的議員們宣布，如果他們想要实行侵襲和侵略的政策，他們就应当拿出錢来，而且他們关于節約的喊叫只不过是一种嘲笑，因为与此同时下院曾表示願意付出任何开支。按照他的声明，1858—1859年財政年度的支出應該如下：

	英 鎊
償付長期公債·····	28 400 000
經常費開支·····	1 900 000
軍隊給養·····	11 750 000
海軍(包括郵船在內)·····	9 860 000
民政事務·····	7 000 000
國家稅務部門·····	4 700 000
需於 1858 年 5 月還清的國庫債券 ·····	2 000 000
償還軍債的基金·····	1 500 000
全部支出·····	67 110 000

1858—1859 年的收入估計如下：

	英 鎊
關稅·····	23 400 000
消費稅·····	18 000 000
印花稅·····	7 550 000
土地稅和不動產稅·····	3 200 000
郵政事業·····	3 200 000
財產稅和所得稅·····	6 100 000
國家土地·····	270 000
其他收入·····	1 300 000
全部收入·····	63 020 000

把預計的支出和收入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儘管迪斯累里先生對於關稅、消費稅和郵政事業可能提供的收入估計得相當樂觀，但是純赤字還是有 400 萬英鎊。如何來彌補呢？帕麥斯頓派一想到迪斯累里先生明年不得不暫緩把所得稅從每一英鎊徵收 7 辨士降低到 5 辨士，就不禁暗自發笑，——因為當康瓦爾·路易斯爵士提出這項建議的時候，迪斯累里先生和格萊斯頓先生曾極力反對

过。帕麦斯顿派那时就会高声叫喊这是无原则的反对，并且利用所得税的不受欢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所得税是帕麦斯顿派曾大胆预言得比内阁这艘船一定会因而碰得粉碎的暗礁。然而迪斯累里先生是一只不致于陷入这种圈套的老狐狸。迪斯累里出人意外地向议院宣称：约翰牛在最近五年以来在钱财方面曾“表现得”像乖孩子一样，他愉快地承担了国家的负担，因此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不应该用他一向特别厌恶的捐税来苦恼他；何况根据大多数议员通过的1853年协定<sup>343</sup>，已经答应乖孩子要逐渐减少这种捐税，并且在若干年之内把它完全取消。迪斯累里先生自己那张用来弥补赤字、甚至用来保证收入略高于支出的单方就是：暂时推迟200万英镑的国库债券的偿还；为偿清军债所需的130万英镑，在还没有可以撥作此用的 bona fide [真正的] 多余收入以前不予支付；平衡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酒税，把爱尔兰的酒税从每加侖6先令10辨士提高到8先令，这可使国库收入增加50万英镑；最后，对银行支票征收1辨士的印花税，这可使收入增加30万英镑。

至于迪斯累里先生所征收的为数不大的新税，它们是不可能引起重大的反对的。帕蒂<sup>①</sup>的代表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提出抗议，虽然如此，但是对爱尔兰使用酒精饮料的任何障碍，应该看成是治疗措施。财政大臣在提出这项措施的时候，忍不住要对他的爱尔兰朋友开开玩笑。他“以最真诚的精神”要求“急性的爱尔兰人”同意对“爱尔兰的酒精饮料”课税的建议，要求他们把自己的“灵魂”<sup>②</sup>与英格兰人的和苏格兰人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对银行支

① “帕蒂”是“帕特里克”的小名，也是爱尔兰人的绰号。——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原文是 «spirit»，这个词既有“酒精饮料”的意思，也有“精神”、“灵魂”的意思。——编者注

票征收一个辨士的印花稅，遭到了代表倫敦銀行家和股票經紀人利益的格林先生的猛烈抨击。他表示确信，这个不幸的辨士一定会妨碍国家的貨幣流通执行自己的职责；但是，無論格林先生对于居然敢对銀行家和股票經紀人課以微不足道的捐稅这件事觉得或者假装觉得多么恐怖，他的感觉未必能在广大的英国人民中得到反响。

迪斯累里先生的預算的最大特点就是取消人为的还債基金——这是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由于对俄作战时拉借了債款而重新采取的財政上的大欺騙手段。真正英国的还債基金，是那些使整个这一代人認識模糊、并且下一代人也未必能理解其实质的可怕的錯觉之一。1771年，理查·普萊斯博士在他的关于继承支付的評論<sup>344</sup>中，第一次向世人揭开了复利息和还債基金的內幕。

他写道：“生复利息的錢，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其速度就超出任何想像。一个辨士，在耶穌降生那一年以5%的利息放出，到現在会增长成一个比15 000万个純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可是如果以单利息放出，在同样长的時間里，它至多只能变成7先令4 1/2辨士。直到現在，我們的政府宁可用后一种方法而不用前一种方法来理财。一个国家总是能摆脱困难的，因为它只要有一小笔积蓄就能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限内清偿大笔的債務。至于国家必須付出多少利息，这个問題并不重要，因为利息愈高，則可以更快地用这种基金来偿还基本債款。”

因此普萊斯建議

“每年儲备一笔錢，把它和它所产生的利息专门用来偿还國債，換句話說，就是建立还債基金。”

这个荒誕的計劃远不如塞万提斯小說<sup>①</sup>中一个傻子的財政方

① 塞万提斯“怨惡揚善故事集”。狗的談話。——編者注

案那样聪明（那个傻子建議全体西班牙人民只要在两个星期內不吃不喝就可以取得偿付国債的基金），然而还是博得了皮特的青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于1786年建立了自己的还債基金，規定每年必須“一文不少地”撥出500万英鎊作这项用途。一直到1825年，下院通过了只能用国家 bona fide〔真正的〕多余收入来偿付国債的決議，这个制度才被廢止。这种奇怪的还債基金把国家的整个信貸制度弄得混乱不堪。在迫于需要而借的款和为了娱乐而借的款之間，在增加債務的公債和用以偿还債務的公債之間，造成了一片混乱。利息和复利息、借債和还債，在人們眼前川流不息地跳来跳去；統一公債和本票，債券和国庫期票，无利息的資本和无資本的利息是这样变幻不定，即使头脑最健全的人也会感到眼花繚乱。普萊斯博士的观点就是：国家应当以单利息借款，以复利息放債。其实联合王国已經借了10亿英鎊，在賬面上它收到了大約6亿，可是其中的39000万不是用来还債，而是用来維持还債基金。帕麦斯頓的財政大臣曾經企图使約翰牛再担負起这个标志着股票經紀人和投机家的黄金时代的出色基金。迪斯累里先生給了它一个 coup de grâce〔最后的打击〕。

卡·馬克思写于1858年4月20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8年5月7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318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英法聯盟

1858年4月22日于巴黎

自从貝尔納博士被宣告无罪开釋，受到公众的热情欢呼，英法聯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是“世界报”这家报纸（它相当精明地懂得，“杜弗市政当局对天性渾厚的馬拉霍夫公爵礼遇有加”，并不比“人民在老貝利<sup>135</sup> 法庭上的可恶的欢呼声”更能說明“英国的真情实意”）宣称英国不仅是“杀人犯的巢穴”，而且是杀人犯的民族，包括陪审員和法官在內。于是上校們提出的最初的原理<sup>345</sup>就得到了更广泛的基础。紧跟在“世界报”之后，“立宪主义者报”发表了一篇由勒奈先生署名的社論，勒奈先生是麦凱尔先生的女婿，而麦凱尔先生，大家知道，又是波拿巴的私人秘书、心腹朋友和总管。如果說“世界报”同意了上校們給英国人民所下的定义，只是扩大了它的意义，那末“立宪主义者报”則是重复他們的威胁，所不同的只是力图以臆想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憤怒来論证兵营的不滿情緒。它故意用第二帝国的庸俗文学所特有的那种无辜受屈的声調大嚷大叫：

“我們不再来詳細談論那种使公共道德蒙受空前侮辱的无罪开釋了；因为凡是法国和英国的正直人士，誰不相信貝尔納犯了罪呢？我們只想通知那些願意維持两国友好关系的邻国，万一貝尔納的辯护人的发言，那篇被准許



对皇帝、对推选他的国民、对军队和我国制度滥施诽谤和侮辱的发言，不幸在法国的城市、兵营和乡村地区传播开来（兵营这个位置放得很有趣，竟在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那末政府即使十分愿意也很难防止国民公愤的后果。”

原来是这么回事。法国是否将进攻英国，只是取决于“立宪主义者报”本身所宣扬的詹姆士先生的发言是否会在法国传播开来。但是在这种可以说是宣战以后，第二天“祖国报”上却来了一个有趣的、令人惊奇的转变，说什么法国入侵英国是可能避免的，只是必须使英法联盟进入一个新阶段。貝尔納的无罪开释，暴露了英国社会的无政府势力日有增长。得比勋爵必须采用波拿巴拯救法国社会的方法来拯救英国社会。这就是这一联盟必然会产生结局，这也是它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这家报纸又说，得比伯爵“是一个有雄韬大略的人，几乎与皇室有亲戚关系”，因此拯救英国社会，他是责无旁贷的！英国的日报自然注意到了在这种愤怒、威胁和诡辩的交替后面所隐藏着的虚弱无力、变化无常和束手无策。“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援引了这样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即波拿巴有两派谋士——晚间是酩酊大醉的酒鬼，早晨是神志清醒的顾问，以为这就是“世界报”、“立宪主义者报”和“祖国报”上的那些朦朧画面的奥秘所在。这位驻巴黎记者从“世界报”和“立宪主义者报”的文章中闻到了沙托-瑪丽奥酒和雪茄的芳香，而从“祖国报”的文章中则感到了冷水淋浴的飞沫。但是要知道，在波拿巴与法兰西共和国决斗时也是这两派人活动。一派在1849年1月以后曾从他们的小型晚报上以 *coup d'état* [政变] 相威胁，而另一派则在“通报”的累赘篇幅中直接揭穿他们是在说谎。可是毕竟不是“通报”上的“呆板”文章，而是“权力报”<sup>346</sup>上的醉汉的欢呼，反映出了未来事件的影子。然而，我们决不认为波拿巴有顺利

渡过“寬濠沟”<sup>①</sup>的手段。由“紐約先驅報”<sup>347</sup>着手发表的、在这个問題上經過苦思冥想而得出的可笑成果，甚至初学軍事科学的人也会付之一笑。可是我們坚决相信，作为一位非軍人——这一点絕不應該忘記——来领导軍人政府的波拿巴，已經在“祖国报”上对英法联盟作了能使他的“上校們”感到滿意的、最后的、唯一可能的解釋。他的处境非常荒唐同时也非常危險。为了欺騙外国政府，他必須揮舞宝劍。为了安慰自己的劍客，不讓他們把他的吹牛信以为真，他必須求助于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 *fictiones juris* [法律上的虛构]，即英法联盟意味着用行之有效的波拿巴的方法来拯救英国社会。当然，事实总是和他的理論相抵触的，如果革命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样来結束他的王朝，那末結果他就会像他交运时一样倒运，也就是說，他最后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冒險，来一次更大規模的 *expédition de Boulogne* [布倫远征]<sup>348</sup>。正像当年冒險家变成皇帝一样，皇帝将要变成冒險家。

既然“祖国报”已經把波拿巴关于英法联盟的意义所能說的一切都說出来了，那末就值得注意一下英国統治階級目前关于这个联盟持什么論調。在这方面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倫敦“經濟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論英法联盟及其性质、价值和代价”。这篇文章是用有意卖弄学問的笔調写成的，这倒很适合帕麦斯頓內閣前任財政部秘书长和英国資本家經濟观点的代言人的身分。威尔逊先生从这样一个命題开始，即“到手的東西可能不完全是所約定的那样”。他說：“对真正的英法联盟的意义是無論給予多高的估价也未必过分的”；但是要知道，联盟有各种各样的，有真正的联

---

① 拉芒什海峽。——編者注

盟和人为的联盟，有一点不假的联盟和温室里成长的联盟，有“自然的”联盟和“政府的”联盟，有“政府的”联盟和“个人的”联盟。首先“经济学家”听任自己的“想像”自由驰骋；而关于律师所說过的那句話也可以用来說“经济学家”：一个人越是平庸，他的想像就越爱同他开玩笑。“经济学家”未必能靠自己的

“想像，来仔細地考察关于领导現代文明的两大民族的真正联盟可能影响欧洲命运和其他各国的幸福和兴隆的問題”。

可是它不得不承认，尽管它希望并且相信这两个民族結成真正联盟的时机“正在成熟”，然而这种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說英国和法国結成真正的民族联盟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那末自然就会发生这样一个問題：目前的英法联盟到底是哪一种联盟呢？

这位帕麦斯顿內閣的前任閣員、英国資本家的先知承认道：“我們承认，最近我們締結的联盟在很大的程度上簡直可以說是与政府締結的联盟，而不是与民族締結的联盟，是与皇帝締結的联盟，而不是与帝国締結的联盟，是与路易·波拿巴締結的联盟，而不是与法国締結的联盟。而且我們对这个联盟所做的估价以及我們为它所付的代价，已經使我們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事实。”

当然，波拿巴是法国民族选出来的，以及諸如此类的廢話等等，但是可惜，

“他代表的只是法国人民的数量上的多数，而不是理智方面的多数。不幸的是，那些不拥护波拿巴的社会階級中，恰巧包括着几乎在文明的全部重大問題上和我們持有同样看法的党派”。

“经济学家”就这样用非常慎重而客气的方式和累贅嚙嚙的詞句（我們不想用它們来麻煩讀者），确定了目前所謂的英法联盟与其說是民族的联盟不如說是政府的联盟这个公理，然后又进而

认为这个联盟与其說是純粹政府的联盟，甚至还不如說是个人的联盟。

它写道：“路易-拿破侖不像一个偉大民族的首脑所做的那样，他曾經十分明白地暗示，正是他是我們在法国的一位特殊的朋友，与其說是法国人民，不如說是他本人願意与英国締結联盟并且保持这种联盟；可能我們比真正的謹慎和誠懇所要求的更加情願和无条件地同意了这种观点。”

总而言之，英法联盟是一个假造的冒牌貨，是同路易·波拿巴締結的联盟，而不是同法国締結的联盟。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問題：是否值得为这个冒牌貨付出代价呢？在这里“經濟学家”捶着胸脯，代表英国的統治階級高声喊道：«Pater, peccavi!» [“父亲，我犯了罪！”]首先，英国是立宪的国家，而波拿巴則是专制的君主。

“单是为了尊重自己，我們也应当注意使我們对法国 *de facto* [事实上的] 統治者的忠誠的謙恭，只是随着他的政策变得能够得到我們衷心贊同的程度而发展成由衷的热情贊賞。”

英国人民，实行立宪制的人民，不是这样用一把計算尺来衡量自己的波拿巴主义，而是

“对这位消灭了自己臣民的宪法上的自由的皇帝殷勤备至，任何一位恩賜这种自由并且尊重这种自由的立宪君主，都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关注。当波拿巴生气和感情激动的时候，我們就低声下气地用那种肉麻得很难令人相信是出自英国人之口的奉承話去安慰他。我們的言行使法国人民中那些认为路易-拿破侖不是篡位者就是凭借武力的独裁者的集团与我們疏远了。这也使得法国的議會派，無論共和主义者或奥尔良派，都感到特別憤怒和难堪。”

最后，“經濟学家”发现对这位幸运的篡位者卑躬屈膝是太不慎重了。

它說：“決不能認為法國的現存制度就是這個精力充沛的民族願意生活於其中的永遠不變的制度……因此，同法國統治的過渡階段締結聯盟，一種只會使法國在其將來更穩固的發展時期仇恨我們的聯盟，這是不是合理呢？”

不僅如此，波拿巴需要與英國結成聯盟遠遠勝過英國需要與他結成聯盟。在1852年，他只是一個冒險家——雖然一帆風順，但終究還是冒險家。

“當時在歐洲沒有人承認他，現在是否有人承認他，還是一個問題。但是英國迅速地並且毫不猶豫地承認了他；它立刻承認了他的政權，讓他進入皇族的狹窄圈子，從而使他有权進入歐洲的一切宮廷。此外，我國宮廷通過互相拜訪和締結親善同盟，使泛泛之交變成了密友……那些有進取心的金融階級和商業階級——他特別需要他們的支持——立刻看出了他靠與英國締結親密聯盟獲得了多么大的力量。”

這個聯盟是他所迫切需要的，因此他“會不惜為它付出任何代價”。英國政府在要價的時候是否表現了生意人的敏銳和必不可少的洞察力呢？它根本沒有要價，也沒有提出任何條件，而是像東方的小暴吏那樣，跪在地上把這個聯盟當做禮物呈獻給他。不管波拿巴干了多么卑鄙的勾當，都未能使英國政府片刻停止它那“無邊的慷慨”，——這是“經濟學家”的說法，我們則說：無度的頂禮膜拜。

這位英國的罪人有所悔悟地說：“很難證明，我們對於波拿巴為了壓迫新教、箝制思想、取締市政當局的活动以及把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活动變成丑劇而採取的所有各種各樣的措施，哪怕是對於其中的一件也好，曾經以冷淡的表情或皺緊眉頭來表示我們的不滿。”“不管他做了什麼事，不管他迫害了什麼人，不管他查封和禁止了多少報紙，不管他用什麼不足道的借口解雇了可尊敬的、杰出的教授，——我們對他的態度都未改變；在我們看來他仍然是一個偉人，仍然是精明幹練的政治家，仍然是杰出的、果斷的統治者。”

英国人不仅这样助长、支持和鼓励了波拿巴的卑鄙的对内政策，而且还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让他阻碍、改变、阉割和取消了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

“经济学家”最后做出结论说：“如果让这种反常的状态再继续下去，那末这决不会提高我们的威信，增加我们的收入，使各民族的友好家庭有所裨益。”

把这一声明和“祖国报”上的声明对比一下，你就丝毫不会怀疑，英法联盟已经垮台了，随着，第二帝国的唯一国际支柱也垮台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4 月 22 日

载于 1858 年 5 月 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31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

1858年4月30日于倫敦

最近，英国政府发表了几份統計材料：貿易部1858年第一季度报告，1857年1月和1858年1月的赤貧現象的比較材料和工厂視察員的半年报告<sup>349</sup>。貿易部的报告果然不出所料，指出了在1858年的头三个月，无論是进口或出口，都比去年同一季度縮減了許多。全部出口商品的申报价值总数在1857年第一季度为28 827 493 英鎊，在今年头三个月降低到了23 510 290 英鎊，因此，英国的全部出口估計大約縮減了19%。只計算到2月底为止的主要进口項目的价值表說明，与1857年的头两个月相比，进口价值从14 694 806 英鎊降低到了10 117 920 英鎊，因此进口的縮減就比出口的縮減更加明显。从以下这份摘要材料中，可以看出联合王国在1857年头三个月和1858年头三个月对美国出口貿易的对比情况：

联合王国对美国的出口

	数 量		申报价值(英鎊)	
	1857年	1858年	1857年	1858年
啤酒和麦酒(桶)...	9 504	6 581	40 893	29 269
煤和灰煤(吨).....	19 972	44 299	11 975	24 818

(續)

	数 量		申报价值(英鎊)	
	1857 年	1858 年	1857 年	1858 年
棉織品(碼).....	61 198 140	35 371 538	1 128 453	618 540
五金商品(公担)...	44 096	14 623	301 275	104 668
亚麻織品(碼).....	18 373 022	8 757 750	527 076	265 536
铁块(吨).....	10 172	6 569	39 927	20 344
条铁(吨).....	70 877	6 417	610 124	54 602
鑄铁錠(吨).....	207	2 362	4 659	14 475
各种鍛铁.....	12 578	2 097	151 602	29 218
原鋼.....	3 607	1 118	128 178	43 666
銅(公担).....	11 075	1 954	69 286	10 595
鉛(吨).....	941	60	21 793	1 324
植物油(加侖).....	400 200	42 790	62 576	5 768
盐(吨).....	66 022	35 205	33 169	16 990
絲織品(磅).....	66 973	22 920	82 280	25 212
毛織品, 呢絨(匹)	106 519	30 624	351 911	110 096
混毛織品(匹).....	9 030 643	6 368 551	401 249	232 202
精梳毛織品(匹)...	212 763	80 601	249 013	106 913
陶瓷器.....	—	—	155 700	70 998
裝飾品和帽类.....	—	—	614 825	288 752
白铁(張).....	—	—	273 409	105 847

除了极少数微不足道的例外，这个表說明各种出口商品都有很大的削減；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口价值的跌落几乎都与出口数量的减少不符。在这方面，美国这个市場要比別的国家好得多，因为在別的国家，英国人拿出更大量的貨物，而撈回的錢反而更少。例如，英国人向荷兰出口的羊毛，1858年为277 342磅，1857年为254 593磅，但是在1858年只得到24 949



英鎊，而在 1857 年反而得到 25 563 英鎊；同樣，他們在 1858 年向法國出口 1 505 621 磅羊毛，總共只得到 103 235 英鎊，而在 1857 年出口的羊毛數量較少，即 1 445 322 磅，反而得到 108 412 英鎊。此外，如果我們把報告中關於 1858 年整個第一季度的材料與 3 月份這一個月的材料對比一下，我們就會發現英國對美國的出口貿易有恢復過去水平的趨勢。例如，1858 年 3 月的精梳毛織物的出口，與 1857 年 3 月相比，只從 66 617 英鎊減少到 54 376 英鎊，而在一個季度中，就從 249 013 英鎊減少到 106 913 英鎊。但是，唯一不在此例並且對英國工業品的需求不是減少而是大有增長的國家就是印度，這一點可以從以下這些數字看出來：

	數 量		申報價值 (英鎊)	
	1857 年	1858 年	1857 年	1858 年
啤酒和麥酒(桶)...	24 817	51 913	77 845	166 567
棉織品(碼).....	120 092 475	151 463 533	1 385 888	1 787 943
五金商品(公担)...	10 642	16 776	42 849	67 287
棉紗(碼).....	5 145 044	10 609 434	276 469	531 567
條鐵(噸).....	20 674	26 266	191 528	217 539
銅(銅片、銅條) (公担).....	18 503	23 313	115 927	132 156
羊毛呢絨.....	12 123	19 571	63 846	90 584
陶瓷器.....	—	—	9 989	19 631
裝飾品和帽類.....	—	—	21 350	31 427
蒸汽機.....	—	—	31 408	36 019

英國對印度出口的某些項目的增加，例如毛織品，可以說是由於戰爭的需要。但是總的說來，這種增長的原因應該從另一方面去尋找。其實事情很簡單：幾個月的起義把印度的市場完全封鎖

了，使那里所有的商品全部售光，形成了一种真空，现在在把这种真空重新填补起来。至于澳大利亚，报告中也指出英国出口的某些项目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从悉尼和墨尔本寄来的信件使人确信：往那里运商品带有纯粹投机的性质，这些商品将不是按照申报价值出售，而是要大打折扣。

关于在 1857 年 1 月底和 1858 年 1 月底领取官方津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贫民的比较材料，说明贫民人数已经从去年的 920 608 人增长到今年的 976 773 人，共增加了 6.1%。但是在中央地区的北部、西北行政区和约克郡行政区，也就是说在工业地区，贫民人数增长的百分比分别为：20.52%，44.87%，23.13%。此外，必须看到，工人阶级中有一大部分人真是宁愿挨饿也不入习艺所。下面这个从官方报告中摘出的材料表明，真正工厂居民在全体人民中所占的百分比即使在英国也是多么微小，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材料是极其有趣的。

工 业 统 计

地 区	20岁以上 的人 数	20 岁以上的人从事以 下各行业的百分比：			
		手工业、 商业和 家 务	农 业	工 业 生 产	采 矿 工 业
1. 首都.....	1 394 963	47.6	1.1	6.0	3.5
2. 东南地区.....	887 134	30.7	20.8	2.5	2.4
3. 中央地区的南部	660 775	28.8	25.4	7.1	2.4
4. 东部地区.....	603 720	27.4	26.5	4.0	2.3
5. 西南地区.....	978 025	28.6	23.3	4.6	5.6
6. 中央地区的西部	1 160 387	29.1	15.5	5.2	12.6
7. 中央地区的北部	654 679	31.8	21.7	6.4	5.3

(續)

地 区	20岁以上 人数的	20岁以上的人从事以 下各行业的百分比：			
		手工业、 商业和 家务	农 业	工 业 生 产	采 矿 工 业
8. 西北地区………	1 351 830	29.8	8.3	21.5	5.4
9. 約克郡………	961 945	25.2	14.3	17.5	7.3
10. 北部地区………	521 460	27.7	16.1	4.2	12.4
11. 威尔士………	641 680	21.8	25.7	2.5	12.4
英格蘭和威尔士	9 816 597	31.0	16.1	8.4	6.3

所包括的材料只到 1857 年 10 月底为止的工厂視察員报告，并不像往常那样有趣，因为正如視察員一致宣称的，工厂的停閉、工作时间的縮減、工厂主的紛紛破产以及恰好在視察員写报告时开始了的全面經濟蕭条，使他們不能搜集到他們在过去能够据以編写关于新工厂数目、以及关于增添发动机的工厂和停工的工厂的报告的确切資料。因此，只有在他們以后的报告中才有可能找到反映危机后果的工业統計数字。目前这份报告中唯一新穎的东西，是它多少揭露了花布印染工厂的童工和青年工人的状况。英国立法机关的檢查只是在 1845 年才从紡織工厂扩展到花布印染工厂。花布印染工厂条例丝毫不差地重复了工厂法关于視察員的权利，关于他們对違法者的处理方式以及关于在执行时可能发生的工厂法中所提到的各种困难的規定。正如在織布工厂一样，这个条例在这里也規定必須登記雇佣人員、在接納未成年者从事长期工作之前要对他們进行身体檢查、严格遵守每天开工和收工的規定时间。这个条例也采用工厂法为划分工人类別而汇编造册的

办法，但是在确定哪些人应该属于哪一类，因而在确定哪些人应该受到限制劳动的保护方面，与工厂法大有悬殊。

工厂法把工人划分为三类：（1）18 岁以上的男工，其劳动不受限制；（2）13 岁到 18 岁的男工以及 13 岁以上的女工，其劳动应有限制；（3）8 岁到 13 岁的童工，其劳动应有限制，而且他们必须每天上学。

花布印染工厂中与此相当的三类是：（1）13 岁以上的男工，其劳动不受限制；（2）13 岁以上的女工，其劳动时间应有限制；（3）8 岁到 13 岁的男女童工，其劳动应有限制，而且他们必须定期地上学。花布印染工厂条例与工厂法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以下几点没有作任何规定：划出吃饭时间，星期六休息，在圣诞节和耶稣受难日停工，定期的半日休假，对危险机器的防护设备，不幸事件的登记和对受害者的津贴，厂房的定期粉刷。现在，工厂的劳动时间与熟练工人以及其他一般工人的通常劳动时间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从上午 6 时到下午 6 时，其中有一个半小时吃饭时间。花布印染工厂的劳动时间，尽管有法定的限制，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对劳动的唯一限制，包括在花布印染工厂条例（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第八年和第九年时通过，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二款中，它规定不应当使用 8 岁至 13 岁的童工和妇女做夜工，并且夜工时间是指从晚上 10 时到翌晨 6 时。因此，8 岁的儿童完全合法地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常常被雇用来从事在许多方面都与纺织工厂的劳动类似的、主要是在高温室内进行的劳动，从上午 6 时一直到晚上 10 时，没有休息或吃饭的间歇时间；而年满 13 岁的孩子完全合法地可以而且常常被雇用来在白天黑夜进行任何时数的劳动，根本没有限制。关于花布印染工厂的童工上学的问题，是这样规

定的；每个儿童应该在进入花布印染工厂以前至少上学 30 天，或者在受雇以前的六个月中至少在学校学习了 150 小时；然后在受雇于花布印染工厂期间，他应该上学 30 天，或者每六个月上学 150 小时。上学时间应该在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之间。同一天内在校时间不足两个半小时或超过 5 小时，都不算入这 150 小时。花布印染工厂厂主的仁慈特别表现在他如何执行这条规定的方式上。儿童上学校去度过法定的时数，总是有时在这个时候，有时在那个时候，毫无定准；例如，他可能有一天是从上午 8 时到 11 时呆在学校里，在另一天则是从下午 1 时到 4 时，然后可能好几天不在学校露面，以后又可能在下午 3 时到 6 时去上学；或者他可能一连上学三天或四天，甚至一个星期，然后隔上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去，以后工厂主想放他去了，他又在偶然的日子或时间里去学习一下。儿童就是这样在学校和工作之间被抛来抛去，直到上学 150 小时的故事讲完为止。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4 月 30 日

载于 1858 年 5 月 20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32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 \* 攻占勒克瑙的詳情

我們終於得到关于勒克瑙的强攻和陷落的詳細消息。固然，科林·坎伯尔爵士的报告——从軍事观点来看，这是情报的主要来源，——至今尚未公布，但英国报纸的报道，特别是倫敦“泰晤士报”上罗素先生的通訊（其主要內容已向我們的讀者介紹过了），完全足以使我們对进攻方面的行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們根据电訊所做出的关于防御方面表现了无知和怯懦的結論，已全部为詳細的报告所证实了<sup>①</sup>。印度人所构筑的工事在外表上虽然很威武，但实际上不比中国兵勇在他們的盾牌上或者城墙上繪画的火龙和鬼臉有更大的意义。每一单个的工事，从正面来看都是攻不破的障地，到处是带有炮眼、枪眼的垒墙和胸墙，工事前面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到处架着枪炮。但是每个障地的翼側和后方却被完全忽略了，从来不曾想到各工事之間的相互支援，而且甚至工事之間和工事前面的地区都从不扫清，因而进攻者可以准备無論正面或側面的攻击而不致被防守者觉察，可以在很好的掩蔽之下接近到距胸墙几碼的地方。像这样一堆工事，只有一群沒有軍官指揮、在愚昧和无紀律占統治地位的軍隊中服务的普

<sup>①</sup> 見本卷第 398—400、472—475 頁。——編者注

通工兵才能构筑出来。勒克瑙周围的工事只是全部西帕依式作战方法通过粘土围墙和土胸墙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欧洲战术的机械方面，他们也部分地领略了一些。他们对步枪的操法和排教练相当熟悉，他们也会设置炮位和在围墙上凿射孔，但是在阵地防御中如何配合各连和各营的行动，或者如何把炮位与开了射孔的房屋和围墙配合起来构成有抵抗能力的营垒，所有这些他们就一窍不通了。例如，他们在坚固的石砌宫墙上凿的射孔过多，因而减弱了宫墙的抗力，他们让炮眼和枪眼一层叠一层，把有胸墙围护的炮位设置在宫顶上，而所有这一切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从翼侧绕过所有这一切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同样地，他们由于意识到自己在战术上的劣势，就尽量把每个据点塞满人，来弥补这一弱点，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英军炮兵有机会发挥可怖的威力，而且，只要进攻的队伍从出其不意的方向袭击这一群乌合之众，就根本没办法进行有秩序、有组织的防御。即使英军因某种偶然的情况而不得不对工事的威武可畏的正面进行攻击，这些工事也都由于构筑失当，致使英军几乎不冒任何危险就可以接近它们，打开缺口，进行强攻。伊曼巴拉大厦的情形就是这样。距这所大厦几码的地方有一道坚固的粘土墙。英国人挖了一条短短的对壕接到这道墙脚下(这充分证明：大厦上部的枪眼和炮眼不能对大厦紧跟前的地区进行俯射)，于是就利用这一道墙作为攻城炮的炮位，而这正是印度人自己为英国人准备好的！他们在这道墙后面设置了两门六十八磅炮(海军炮)。英军中最轻的六十八磅炮不连炮架重 87 英担，甚至假定说的是仅用空心弹的八吋炮，这类炮最轻的也有 50 英担重，加上炮架，则至少有 3 吨重。这样的重炮竟能够运到有几层楼高的、而且顶上设有炮位的王宫的跟前，可见防守者对于制高点多

么忽視，对于軍事工程多么无知，这种情况是任何一支文明軍隊中的任何一个普通工兵都不会有的。

英軍对手的軍事知識水平就是这样。至于說到勇敢和頑強，这在防守者方面也是同样沒有的。从馬蒂尼埃尔到穆薩巴格，土著部队只有一种普遍一致的行动，即一当敵軍向前进攻时，他們就拚命逃跑。上一次，当坎伯尔給駐劄官官邸解圍的时候，在錫康德尔巴格还发生过一場屠杀（很难把它叫做战斗），而这一次在所有的冲突中，甚至連一点可以与那場屠杀相比的东西都沒有。进攻的部队一开始前进，起义者就立即向后方仓皇潰逃，在只有几处狭窄的出口、拥挤的人群不得不停下的地方，他們就毫不抵抗地紛紛倒在进攻的英軍的扫射火力和刺刀之下。“英国刺刀”在对惊慌失措的土人进行任何一次攻击时所收的效果，比他們在欧美两洲的一切战争中所收的效果还要大。在东方，像这样只有一方积极作战而另一方則怯懦地消极应付的白刃战，是战争中的常事；緬甸防柵<sup>350</sup>在每一次战事中都可以作为例证。据罗素先生說，英軍的主要損失，都是由那些被截断后路、堵在宮殿房舍里的印度人从窗口向庭院和花园里的軍官射击所造成的。

在伊曼巴拉和愷撒巴格被攻时，印度人逃得非常快，因此那里不是被攻下，而簡直是长驅直入。可是有趣的場面这才开始，因为据罗素先生泰然自若地說，那天愷撒巴格的攻占是那样出乎意料之外，甚至沒有来得及設法防止肆无忌惮的搶劫。真正的、爱好自由的約翰牛看着他們的不列顛擲彈兵們自由自在地拿走奧德国王陛下的珍宝、貴重武器、衣物及其他一切家用物品，那該是个很开心的場面。錫克人、廓尔喀人和随軍僕役們是十分乐意仿效他們的榜样的，接着而来的一場搶劫和破坏的情景显然甚至超过了



罗素先生的描繪能力。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搶劫和蹂躪。愷撒巴格于14日陷落；过了半小时，軍隊就喪失了任何紀律，軍官对部下完全不能控制。17日，坎伯尔將軍不得不派出糾察队来制止搶劫，“在目前这种胡乱行为沒有中止以前”，停止一切軍事行动。显然，軍隊已完全失去控制。18日，我們听說，最肆无忌惮的搶劫行徑虽已中止，但是蹂躪破坏还在自由自在地进行着。在市區內，当前卫与从房屋里射击的土著士兵爭夺的时候，后卫就尽情地搶劫和破坏。晚間，又发出另一道禁止搶劫的命令；由每一团派出强有力的队伍带回本团人員，并且不让随軍僕役离开部队駐地；除值勤者外，任何人不得擅离兵营。20日，再度发出了同样的命令。就在該日，有两个英国“軍官兼紳士”凱普中尉和塞克維尔中尉“进城搶劫，在一所房屋里被杀害”。26日的情况还是那样糟，以致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禁止搶劫和暴行；規定对士兵每小时点名一次；严禁一切士兵入城；随軍僕役持武器入城者，一經发现即处以絞刑；士兵非值勤不得携带武器；所有非战斗人員均解除武装。为了使这些命令得到应有的懾服力，在“适当地点”設置了許多鞭笞用的三角架。

这在十九世紀的文明軍隊中确实不是体面的事情；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軍隊哪怕只干了这些暴行的十分之一，义憤填膺的英国報紙会如何詛咒它們啊！但是这些却是英国軍隊干出来的，所以人們告訴我們說：这种事情只不过是战争的正常后果。英国軍官兼紳士完全可以随意把他們在自己揚名显威的舞台上所碰到的銀匙、钻石手鐲以及其他細小珍品据为己有；如果說坎伯尔不得不在战斗正酣的时候把自己的軍隊解除武装来制止大規模的搶劫和暴行，那末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軍事上的考虑；当然誰也不会舍不

得让这些可怜的小伙子們在經受过这么許多艰难困苦之后休息个把礼拜,稍微消遣一下的。

事实是,無論在欧洲或者在美洲都沒有像英国軍队这样殘暴的軍队。搶劫、暴行、屠杀——这在任何別国軍队里都是已經严格禁止和完全排除了的行为,——是英国士兵由来已久的特权,是他們的合法权利。英軍在西班牙战争中攻占巴达霍斯和圣塞瓦斯田<sup>351</sup>以后几天內所干的卑鄙事情,是自从法国革命爆发以来任何其他民族历史中所无以比拟的;洗劫被攻占的城市这种中世紀的习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已被禁止,可是在英軍中仍然是老規矩。在德里,迫于軍事原因,破例沒有这样干,但是軍队虽然領取了特別津貼,仍然滿腹牢騷,因此这次他們在勒克瑙就补偿了在德里错过的机会。在十二个昼夜內,在勒克瑙的不是英国軍队,而是一群无法无天、酗酒肇事、粗暴无礼的烏合之众,分散为一帮帮的强盜,他們比剛剛从这里被赶出去的西帕依更加无法无天,更加粗野狂暴,更加貪得无饜。1858年勒克瑙的洗劫是英国軍队永远洗不掉的耻辱。

如果說魯莽的大兵打着傳布文明和人道的旗号在印度横行无忌时只能搶劫土著居民的动产,那末英国政府則紧跟着把他們的不动产也一起夺去。他們說,第一次法国革命就沒收过貴族和教会的土地!他們說,路易-拿破侖也沒收过奥尔良王朝的财产!于是言語委婉、态度和藹、性情温和的英国貴族坎宁勋爵奉自己上司帕麦斯顿子爵之命来沒收整个民族的土地,沒收上万平方英里面积上的每一寸、每一块、每一亩土地<sup>352</sup>。这是約翰牛的多么好的掠夺物啊!当埃倫伯勒勋爵代表新政府对这一前所未聞的措施表示非議的时候,“泰晤士报”和英国其他一伙小报立即挺身出来为

这一大规模的搶劫作辯护，并爭論說，約翰牛有权利想沒收什么就沒收什么。因为，約翰是个特殊人物，按照“泰晤士报”的說法，对別人是耻辱的东西，对他却是一种美德。

这时，由于英軍只顧搶劫而完全陷于瓦解，起义者沒有受到追击，而逃出了該城。他們集中在罗希尔汗，同时有一部分在奥德开始进行游击战争，另一部分則逃向班得尔汗。不过，热天和雨季很快就要到来，不能指望天气对欧洲人会再像去年那样異乎尋常地有利。去年，欧洲部队大部分已多少习惯于那种气候，而今年大部分都是剛到印度来的。毫無疑問，6月、7月、8月的战事将使英軍喪失大量的生命，并且由于每拿下一座城市都得留些警备部队，野战部队将很快地消散。現在我們已經听說，每月补充1000人几乎还不足以保持軍队現有的战斗力；至于說警备部队，仅仅勒克瑙一地就至少需要8000人，即坎伯尔軍队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为进攻罗希尔汗而組織的队伍，未必会比勒克瑙的这支警备部队更加强。我們还听說，英国軍官中越来越普遍地认为：随着大规模起义部队的分散而必然到来的游击战，比起現在以战役和圍攻为內容的战争，将使英国人更加难以应付并将夺去更多的生命。最后，錫克人也开始用一种对英国人來說不是什么好兆头的口气讲话了。他們感觉到，沒有他們的帮助，英国人很难保住印度，假如他們和起义者合伙，印度斯坦肯定会从英国人手中失去，至少是暂时失去。他們高声談論这个，并用他們东方人的方式加以夸大。在他們眼中，英国人再也不是在穆得克、菲魯茲沙赫尔和阿利瓦尔打敗过他們<sup>353</sup>的高貴种族了。从这种信念到公开的敌对行动，对于东方民族說来只有一步之隔：星星之火可成熊熊之焰。

总之，勒克瑙的攻占也和德里的攻占一样，远沒有結束印度的

起义。今年夏季的战事可能造成这种结果：英军在今年冬季实际上还得再度转战于这片土地上，甚至得重新征服旁遮普。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着使人疲于奔命的长期的游击战，而在印度的烈日之下，这对于欧洲人决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5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5 月 25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33 号

## 卡·馬克思 奧德的兼并<sup>354</sup>

大約一年半以前，英國政府在廣州宣布了一種新奇的國際法原則，按照這種原則，一個國家可以對另一個國家的任何地區採取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而無需同這個國家宣戰或宣布處於戰爭狀態。現在，又是這個英國政府，由印度總督坎寧勳爵出面，更進一步破壞了現行的國際法。它宣稱：

“奧德省的土地所有權應予沒收，歸英國政府所有；英國政府將本着它認為適宜的方式行使此項權利。”<sup>355</sup>

1831年華沙陷落以後，俄國皇帝沒收了那時屬於許多波蘭貴族的“土地所有權”，這件事在英國報界和議會中引起了一致的憤怒。諾瓦拉戰役以後，奧地利政府並沒有沒收而只是查封了積極參加獨立戰爭的倫巴第貴族的地產，這在英國又引起了一致的憤怒。最後，當路易-拿破侖在1851年12月2日以後沒收了奧爾良家族的地產——按照法國的習慣法，這些地產早在路易-菲力浦登極時就該收歸國有，但是由於一個法律上的花招而逃避了這種命運，——英國人簡直是憤怒不已，倫敦“泰晤士報”也說，這種行動破壞了社會秩序的基礎，使市民社會無法繼續存在。實踐說明了這全部高尙的憤怒有多大價值。英國只是大筆一揮，就不僅把幾個有爵位的人的地產、不僅把王族的地產給沒收了，而且把一個幾

乎与爱尔兰大小相仿的王国<sup>356</sup>的全部領土，即埃倫伯勒勳爵本人所謂的“整整一个民族的世襲財產”給沒收了。

但是，我們来看看坎宁勳爵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了什么样的口实——我們无法把这叫做理由——来为这种曠古未聞的行为辯护吧。第一，“勒克璠現在在軍队的統治之下”；第二，“叛軍的反抗得到这个城市以及全省居民的支持”；第三，“他們犯下了重罪，自己招致正义的懲罰”。說得明白一点：因为英国軍队占領了勒克璠，所以英国政府有权沒收它尙未到手的奥德土地。因为靠英国人供养的土著士兵變了，所以原来在武力压迫下屈从于英国統治之下的奥德当地居民就沒有权利为爭取自己的民族独立而举行起义。简单地說，奥德人民举行起义反对英国政府的合法权力，現在英国政府就厉声宣布，起义是实行沒收的充分根据。可見，如果撇开坎宁勳爵的夸夸其談，那末全部問題就归結为这样：在他看来，英国在奥德的統治权是合法地建立起来的。

其实，英国在奥德的統治权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856年达尔豪西勳爵断定行动的时机已到，他就在康波尔集中了軍队，而告訴奥德国王<sup>①</sup>說这支軍队是用来監視尼泊尔的。突然間，这支軍队侵入了奥德，占領了勒克璠，俘擄了国王。他們要国王把自己的国家让給英国人統治，但是枉費心机。于是国王被送往加尔各答，奥德这块地方就被并入东印度公司的領地。这种背信棄义的入侵行为的依据，是威尔斯里勳爵經手簽訂的1801年条約第六条<sup>357</sup>。这个条約是另一个条約即約翰·肖尔爵士在1798年經手簽訂的条約的自然产物。按照英印政府在同土著王公交往时所遵循的一般

---

① 瓦吉德·阿利-沙赫。——編者注

政策，这个第一次签订的 1798 年的条约是締約双方的攻守同盟条约。它保证东印度公司每年得到 76 拉克<sup>①</sup>（380 万美元）的津贴；但是按照第十二、十三条的规定，国王必须减少国家的捐税。不言而喻，国王无法同时履行这两个显然互相矛盾的条件。结果，正如东印度公司所指望的，出现了新的复杂的情况，最后终于签订了 1801 年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国王必须割让领土来补偿似乎已经出现的对原有条约的破坏行为。顺便提一下，当时在议会里曾对这次领土割让严加指责，认为是一种公开的掠夺，而且威尔斯里勋爵那时要不是倚仗着自己家族的政治势力，就会因此而被提交调查委员会查办。

作为这次领土割让的交换条件，东印度公司根据第三条，负责保护留给国王的领土不受任何内外敌人的侵犯，而根据第六条，还保证国王及其后裔和继位者永久占有这些领土。但是这第六条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对国王设下的圈套，那就是：国王必须建立一套通过他的官吏来执行的行政制度，这套制度要能促进他的臣民的福利，并且要能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现在我们假定，奥德国王破坏了这个条约，他没有用他的行政制度来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财产（譬如说，把他们绑在炮口上轰死，没收他们的全部土地）；那末东印度公司能做些什么呢？条约上承认国王是独立的国君，是行动自主的人，是締約的一方。东印度公司在宣布条约遭到破坏从而宣告无效时，只能采取两种行动：或者通过谈判施加一定压力来达成新的协议，或者向国王宣战。但是，不宣战就侵入他的领土，出其不意地将他俘获，夺去他的王位和兼并他的国家，——所有这一

---

① 每一拉克等于 10 万卢比。——编者注

切不仅仅是破坏条约，而且也是破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

有一件奇怪的事实证明，兼并奥德不是英国政府突然决定的。帕麦斯顿勋爵刚刚就任外交大臣，就马上在 1831 年命令当时的总督兼并奥德。他的这位僚属当时拒不执行这项命令。但是这个消息传到了奥德国王<sup>①</sup>那里，他就找了一个借口派一个使团到伦敦去。使团不顾一切阻挠，终于向当时还被完全蒙在鼓里的威廉四世陈述了奥德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于是，威廉四世和帕麦斯顿大闹了一场，结果帕麦斯顿奉到极严厉的上谕：今后不得再发生这类 coup d'état<sup>②</sup>，否则立予免职。这里很有必要提醒一下：这次兼并奥德和没收其全部地产正是在帕麦斯顿重新当政的时候发生的。几个星期以前，下院曾要求调阅有关 1831 年第一次企图兼并奥德的文件，但是督察委员会秘书贝利先生宣称这些文件已经遗失。

1837 年，当帕麦斯顿再度出任外交大臣，奥克兰勋爵出任印度总督时，奥德国王<sup>③</sup>又一次被迫同东印度公司签订新的条约。这个条约使 1801 年条约的第六条有所改变，因为“其中没有规定，如果不履行本条所包括的义务”（善自治理国家），“当如何惩处”；因此第七条特别规定：

“奥德国王应会同英国驻劄官立即拟制最有效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统治地域内警务、司法、财政方面的弊端；如果国王陛下无视英国政府的建议和指示，如果在奥德境内普遍存在着粗暴而一贯的压榨、无政府和混乱状态，以致严重危害社会安宁，英国政府则保留权利委派自己的官员在英国政府认为必

① 纳集尔-埃德-丁。——编者注

② 直译是：政变；这里是：变故。——编者注

③ 穆罕默德·阿利-沙赫。——编者注



要的期限內治理奧德任何一部分发现有这类施政恶劣情事的領土，不論其地域大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中扣除一切开支以后的余額当交入王国國庫，并将收支情况如实呈报国王陛下。”

其次，条約的第八条还規定：

“印度总督及其参事会不得已而行使第七条所賦予他的权力时，将在可能範圍內力求保持并尽量改善該地区的本地行政机关和政府形式，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将該地区交还奧德的国君。”

在形式上，这个条約是由英印总督及其参事会<sup>358</sup>同奧德国王簽訂的。它作为这样一个条約，由双方遵照一切正式手續予以批准，并按应有的方式交換了批准书。可是，当它被提交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核准时，后者认为它破坏公司和奧德国王之間的友好关系，是总督对这位君主的权利的侵犯，而把它宣告作廢了（1838年4月10日）。帕麦斯顿并没有請求公司許可簽訂这个条約，因此他也就根本没有理睬公司关于宣告条約作廢的决定。同样，奧德国王也从来没有得到宣告条約作廢的通知。达尔豪西勋爵本人证明了这一点（1856年1月5日會議記錄）：

“很可能，国王在即将同駐劄官进行的談判中会提起他同前任駐劄官在1837年簽訂的条約。駐劄官知道，条約已經无效，因为英国剛剛接到它之后，它立刻就被董事会宣告作廢了。其次，駐劄官知道，虽然奧德国王那时曾得到通知，說1837年条約中某些有关增加軍事力量的沉重条款将不能实现，但是关于完全廢除条約这件事却从来没有通知国王陛下。由于这样隱諱和吞吞吐吐，現在已使人感到棘手。而且由于这个已經宣告无效的条約仍然被收进1845年奉政府命令出版的条約汇编，更使人感到棘手。”

就在同一份議会記錄的第十七节中还有这样的話：

“如果国王援引1837年的条約，并提出詢問：为什么——假使目前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管理奧德——英国政府不行使前述条約賦予它的广泛权

力，則應該通知國王陛下：這項條約自從提交董事會那一天起已經不復存在，因為董事會已宣告它完全作廢。應該提醒國王陛下，勒克瑙宮廷那時會得到通知：1837年條約中關於由國王負擔新添武裝力量的軍餉的若干條款應宣告作廢。必須承認，當時認為沒有必要把條約中那些不立即生效的條款通知國王陛下，由於疏忽，以後也沒有通知國王陛下。”

但是，這個條約不僅被收進1845年出版的官方編纂的條約匯編，而且在1839年7月8日奧克蘭勳爵給奧德國王的通知里、1847年11月23日哈丁勳爵（當時的總督）向同一位國王所上的條陳以及1851年12月10日斯利曼上校（在勒克瑙的駐劄官）致達爾豪西勳爵本人的信件里，都把它當做現行條約而正式引用。達爾豪西勳爵的所有前任、連同他自己的僚屬在和奧德國王的來往信件里，都把這個條約視為有效條約，為什麼達爾豪西勳爵本人偏偏這樣頑固地否認條約的合法性呢？唯一的原因是，按照這個條約，不論國王為干涉自己的事務提供了什麼樣的口實，這種干涉總是受到限制：英國的官員們只能在奧德國王的名義下掌握這個國家的行政權，而且他們必須將剩餘的收入交給國王。但是英國人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只有兼并才能使他們心滿意足。否認二十多年來構成相互關係的公認基礎的條約的合法性；用公開違背公認的條約的方式強占獨立的領土，徹底沒收整個國家的每一畝土地——英國人對印度本地人使用的所有這一切背信棄義、令人發指的手法，目前不僅在印度，而且在英國國內，都已開始得到它應有的報復。

卡·馬克思寫於1858年5月14日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於1858年5月28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336號

## 卡·馬克思

### 历史上有趣的一頁

1858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英国)

在上次对俄战争刚结束不久，报上出现过一条消息，說土耳其军队的一个上校穆罕默德-貝伊，即前匈牙利军队的上校班迪亚先生，随同一些波兰志愿人员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切尔克西亚。他一到那里，就立刻在切尔克斯人的首领塞弗尔-帕沙那里成了参谋长之类的人物。凡是了解切尔克西亚的这个匈牙利解放者以往经历的人，都毫不怀疑，他到这个国家去的唯一目的，是把它出卖给俄国。以前已公开而确凿地证实，此人在伦敦和巴黎时，就是同时从法国警察机关和普鲁士警察机关领取薪俸的间谍<sup>①</sup>。所以毫不足奇，大约一个月前，欧洲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說已确实查明，班迪亚，即穆罕默德-貝伊，同俄国的菲利浦逊将军有叛卖性的通信往来，并且审讯他的军事法庭已将他判决死刑。然而过了不久，班迪亚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把自己装扮成阴谋的牺牲者，以他特有的无耻口吻宣称，这一切关于他的叛卖以及军事法庭等等的说法，纯粹是他的敌人捏造出来的。

我們获得了与切尔克西亚战争中这一有趣插曲有关的最重要

---

<sup>①</sup> 見本卷第179—180頁。——編者注

的文件，在这里我們把其中的几件摘引出来。这些文件是由审讯班迪亚的軍事法庭的成員之一、切尔克西亚波兰营的中尉弗朗契舍克·斯托克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这些文件无须加以解釋。

以下就是在切尔克西亚阿迭尔比开庭审讯伊洛什法尔瓦人穆罕默德-貝伊(亞·班迪亚)的軍事法庭的紀录摘要。

(第1号) 1858年1月9日的审讯。諾迪厄科尼若省人穆斯塔法的证詞：

“……穆罕默德-貝伊上校来到舍普苏古尔后，要我把一封信交給黑海哥薩克指揮官菲力浦逊將軍。我說，不向塞弗尔-帕沙报告和未經他的許可，我不能这样做，穆罕默德-貝伊对我說，作为鉢諦沙赫的使者和代表以及切尔克西亚軍队的司令官，他有权同俄国人交换信件，塞弗尔-帕沙知道这件事，他的目的是要迷惑俄国人…… 当塞弗尔-帕沙和国民議會把致沙皇的切尔克西亚宣言交給我时，穆罕默德-貝伊也把一封給菲力浦逊將軍的信交給。我在阿納帕没有找到菲力浦逊將軍，便把信交給了指揮当地部队的一个少校。少校答应轉递宣言，但是拒絕收下这封既沒有地址又沒有署名的信。于是我把信帶了回来，但是穆罕默德-貝伊頻繁的通信引起了我的怀疑，由于害怕受連累，我把这一切情况报告了当局……”

(第2号)曾給穆罕默德-貝伊当过秘书的土耳其人阿罕默德-埃芬蒂的证詞：

“……穆罕默德-貝伊非常憎恨泰菲克-貝伊(拉品斯基上校)，把他說得很坏，說他要用尽一切办法去和他作对。在我們来到阿迭尔比的第二天晚上……天剛亮，穆罕默德-貝伊的馬夫把我叫醒了。穆罕默德-貝伊亲自对我說，格連洽克那边有激烈的炮击声。他已經起床，似乎心情不安…… 早在炮击停止以前，阿迭尔比方面就得到了拉品斯基上校和他的部队全体被俘的消息，消息是怎样得到的，我不知道。我是听穆罕默德-貝伊这样說的。后来，当上校和他的部下都沒有被俘的消息傳來后，穆罕默德-貝伊非常生气地說：‘大概，他把自己的大炮賣給俄国人了’……”

(第3号)駐扎在阿迭尔比的波兰部队官兵的证詞：

“在格連洽克被突襲的前一天，穆罕默德-貝伊来到营地，說他接到君士坦丁堡来信，通知他，如果他們从各处都得不到援助，那只能归咎于拉品斯基

上校一人…… 穆罕默德-貝伊下令發酒給士兵們，並許諾給他們種種好處，只要他們離開自己的上校而跟他走…… 後來，查明這個消息（拉品斯基被俘）不確實後，穆罕默德-貝伊親自來到營地，向士兵演講，勸他們拒絕服從上校。而在上校回來後，穆罕默德-貝伊卻假裝什麼也不知道，舍棄了某些追隨他的人，允許懲罰這些人，而不加庇護。後來，穆罕默德-貝伊企圖趁上校外出的機會依靠某些匈牙利人在軍隊中煽起暴動。這些匈牙利人寫了一份對上校的控訴書，想要士兵們簽名。除了三個人承認他們被說服簽了名以外，其餘的人都發誓說，他們的簽名是偽造的…… 偽造簽名是很容易的，因為在部隊中只有極少數士兵會寫字。”

（第4號）班迪亞在軍事法庭上的供詞：

“冗長的詢問使我感到厭倦，因此我把這份由我親手寫就並署名的供狀呈交委員會。我希望我的法官，由於我的供狀使他們擺脫了頗費時間的艱巨工作，而能夠更快地考慮到我的無辜家庭<sup>①</sup>的命運也是同我的命運連接在一起的。我是伊洛什法爾瓦人，原名亞諾什·班迪亞，現名穆罕默德-貝伊，40歲，原來信奉羅馬天主教，但在1853年改信伊斯蘭教…… 我的政治活動……受我國過去的領袖拉約什·科蘇特的指揮…… 1853年12月22日，我帶著我的政治領袖的介紹信來到君士坦丁堡……我參加了土耳其軍隊，軍銜是上校。在這個期間，我經常收到科蘇特有關我國利益的信件和指示。同時科蘇特寫信給奧斯曼政府，熱心地勸土耳其人不要同法國、英國或奧地利結成聯盟，勸他們寧可同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者建立聯繫…… 根據發給我的指示，我必須設法打進派往切爾克西亞沿岸地區作戰的部隊…… 到達切爾克西亞後最初一個時期，我只是研究當地情況，並把我觀察的結果告訴我的政治朋友…… 我設法同塞弗爾-帕沙接近…… 根據指示，我必須防止切爾克斯人方面的一切進攻行動，反對在切爾克西亞的一切外國勢力。在我離開君士坦丁堡前不久，和我從同一來源接受指示、多年來和我在政治上較接近的圖爾上校，接到了參加希臘起義的命令。也屬於我們這一伙的施泰因將軍（費爾哈德-帕沙），被派到安那托里亞。同塞弗爾-帕沙接近的計劃實現了，因此我很快就博得了他的完全信任。由於博得了這種信任，我得以順利

<sup>①</sup> 在這裡他指的是班迪亞第三號家庭。他除了在君士坦丁堡的伊斯蘭教家庭以外，還在匈牙利有一個妻子，在巴黎有一個妻子。

地执行并实现給我的指示…… 我使塞弗尔-帕沙相信，战争结束后切尔克西亚将归还苏丹統治…… 我向土耳其指揮官证明，他們军队的一切进攻行动都有危險，因为切尔克斯人……在紧急关头会离开他們的。情况对我很有利，虽然俄国人把军队調上战场而使边境空虚，但他們始終沒有受到切尔克斯人任何猛烈的进攻，我定期地向我的政治領袖汇报我的秘密活动情况…… 同时，我遇到了一些妨碍我的计划的人物和情况。我指的是英国領事朗沃思先生来到阿納帕。朗沃思先生奉命前来劝塞弗尔-帕沙用英国經費建立一支由 6 000 个切尔克斯人組成的部队，把这支部队派到克里木去…… 我从土耳其当局方面也接到同样的命令，但在这同时，我的秘密領袖对我发出了最坚决的命令，要我竭尽全力破坏英国領事的使命…… 在我和朗沃思先生的一次談話中……我要求让我在英国军队中担任上校职务或者給我 1 万英鎊…… 朗沃思先生想出 5 万披亚斯特把我拉过去…… 結果我的阴谋成功了。受过空洞諾言不少次欺騙的塞弗尔大公疑心起来，他断然拒絕了領事对他的人民所提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我便和原定指揮 6 000 个切尔克斯人的塞弗尔-帕沙的儿子伊布拉辛·卡拉巴特尔大公結下了冤仇……

1856 年 3 月 21 日塞弗尔-帕沙告訴我說，国民議會決定派一个代表团到土耳其、法国和英国政府那里去要求把切尔克西亚同土耳其重新合并。我設法使塞弗尔-帕沙把我派进这个代表团…… 到达君士坦丁堡后……我向我的政治朋友和科苏特詳細报告了切尔克西亚的情况…… 結果我接到指示，要我同图尔上校以及施泰因將軍建立联系，和他們协同工作，并尽量爭取更多的匈牙利人参加工作。同时，我同原为切尔克斯人的奥斯曼帝国邮政总长伊斯馬伊耳-帕沙建立了联系，我觉得他是一个能为自己祖国牺牲的爱国者。我同他研究了把武器、彈药、軍械技工用的工具、以及优秀軍官和工匠运进切尔克西亚的办法。但是真正的运送計劃，是由施泰因將軍、图尔上校和我三个人制定的。俄国公使的軍事秘书弗兰基尼上尉参加过我們的几次會議。我們的目的是用和平緩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尔克西亚拉到俄国人方面去…… 如果能使切尔克西亚服从我和施泰因將軍的領導，那末我們必定按照这样的計劃行事：

- (1) 选出一个当地的大公来統治全国；
- (2) 使切尔克斯人相信，他們無論从苏丹或是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

(3) 用軍事失敗(周密考慮和事先策劃的失敗)瓦解山民的士氣;

(4) 設法使他們承認沙皇是他們名義上的元首，他們無需向他繳納任何貢品，但必須允許他派兵進駐他們的國家…… 準備用引進切爾克西亞的匈牙利人來包圍這個大公；把其中最富有才能的人安置到重要職位上…… 弗蘭基尼上尉要我相信，俄國所要求的只不過是形式上的順從…… 其餘的事情則由帝國恩惠的標志、金錢和俄國勳章來完成……

1856年9月22日，伊斯馬伊耳-帕沙建議我把斯庫塔里兵營內幾百名曾在扎莫伊斯基軍團服役的波蘭人，吸引到切爾克西亞去…… 這個建議不合我們的計劃，但是又不便加以拒絕…… 我以前就知道拉品斯基先生，他在匈牙利工作時很有成績…… 他住在斯庫塔里…… 我們同施泰因將軍一致認為，最好的辦法是使用對我絕對信任的拉品斯基上校…… 9月24日，我寫信通知拉品斯基上校，說切爾克西亞愛國者委託他在切爾克西亞建立波蘭軍團。上校回信要求發給供700個波蘭人使用的武器和制服…… 後來經施泰因將軍、圖爾、弗蘭基尼和我共同研究，決定由圖爾前往英國購買製造彈藥的工具和機器，但暫時不把任何武器運送回來。我們想在發給武器以前，考驗一下波蘭人…… 拉品斯基上校的激烈反對…… 迫使我倉卒動身，使我不可能把我招募的匈牙利軍官帶走…… 1857年1月我接到科蘇特和我的其他政治朋友的來信和指示。我的計劃得到了贊同…… 在我動身前不久，我和施泰因將軍假裝我們之間的关系冷淡下來了。我想再延期動身，以使某些匈牙利人能夠和我同行，但是弗蘭基尼上尉說，一天也不能耽誤，因為整個君士坦丁堡對我們運送的事議論紛紛，如果俄國大使館不出面加以干涉，他就會被指責參與此事。2月15日，拉品斯基上校登上了英國的‘袋鼠號’輪船。我也上了船…… 到達多勃(俄國人把它叫做卡巴爾定斯克)後，我分別寫信給塞弗爾-帕沙、納伊勃<sup>①</sup>以及其他部落首領，說蘇丹皇帝陛下委派我指揮切爾克西亞軍隊…… 我對拉品斯基上校的做法不很放心…… 在波蘭部隊開到沙朴蘇霍(俄國人把它叫做田辛斯克炮台)的塞弗爾-帕沙官邸之後幾個星期，呂默爾先生搭乘裝載着我們留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武器、彈藥的二桅橫帆艦抵達多勃…… 俄國人在5月經由阿塔庫姆突然入侵，使全國各地幾千名切爾克西亞戰士集合起來。切爾克斯人第一次看到他們自

① 近東或中東某些國家中首長或教長的副手或助手。——譯者注

己的炮兵胜利地轰击俄国炮兵。虽然这次战斗本身規模不大，但它賦予波兰部队和我以重大的意义…… 我利用切尔克斯人的这种情緒来完成我的任务；我公开以苏丹使者的身分出現；我要求服从…… 后来我得悉，拉品斯基上校曾竭尽全力破坏我的計劃…… 我力图在他的部队的官兵中爭取拥护者，同时由于他的部队情况危急，我就把这归咎于指揮官…… 一艘俄国船在苏茹克和格連治克港夺走了一些檀香树，于是我有了借口，把上校調到跟阿塔庫姆附近的戰場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去，把他完全隔离开来…… 过了几天，我接到拉品斯基上校的来信，他报告說在格連治克根本没有军队，他无法守住陣地…… 我亲自前往格連治克，拉品斯基上校當場向我說明他处境危險，俄国人必然会前来进攻。过了九天，他的預言应驗了……

我使阿迭尔比的官兵在格連治克发生悲剧的当时和以后保持的那种激昂情緒，只不过是决定在拉品斯基上校和他的部队之間散布不和的結果…… 我通过我的密使在切尔克斯人中間散布流言，說上校把大炮卖給了俄国人…… 我上了上校的当，我被他的伪装誠实所欺騙，事实上，他比以前更警惕地監視着我……

根据給我的指示，我必須同俄国將軍建立联系…… 現在委员会所掌握的我的那封匿名信，应该是建立經常通信的开端，但是由于俄国指揮官的愚蠢，落到了你們手中……

拉品斯基上校突然拋棄了假面具，他在塞弗尔-帕沙家中直截了当地对我說，他既不承认我是他的上司，也不承认我是切尔克西亚军队的司令官，他同我断絕了一切关系…… 并且还向他的波兰部队发出了同样內容的命令。我企图向部队士兵另发一項撤銷他职务的命令，但我的努力徒劳无益……

(签名)穆罕默德-貝伊”

(第5号)亞諾什·班迪亚給菲力浦遜將軍的信。

“难道使切尔克西亚誠服不是对俄国有利嗎？可以以重大牺牲作代价暂时占据切尔克西亚的平原，但是它的山岭和天然堡垒永远也不能占領。俄国大炮已失去意义。切尔克西亚的炮兵将有效地还击俄国的炮兵。切尔克斯人已不是五年前的切尔克斯人了；他們有一支不大的正規軍的支援，同俄国军队一样善战，并将为自己的信仰和祖国战斗到最后一人。給与切尔克斯人一种虛有其名的自由，在切尔克西亚建立一个本民族大公的政权，把这个大公置于俄国沙皇的保护之下，岂不更好嗎？总之，把切尔克西亚变成第二



个格魯吉亚或是与此类似的什么东西，岂不更好嗎？如果切尔克西亚同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为俄国人开辟了通向安那托里亚和印度的大道。Sapienti sat〔对聪明人來說已經很够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开始談判。希慎重考虑并予以答复。”

(第6号) 1858年1月20日的判决书：

“在听取了穆罕默德-貝伊在1月2日、3日、4日、5日、6日、7日和11日审讯时的供詞，以及证人在1月9日审讯时的证詞以后，本軍事法庭今天开庭宣布，根据穆罕默德-貝伊本人的招供以及证人的证詞，穆罕默德-貝伊确实犯有叛国、与敌人秘密通信的罪行，特此宣布褫夺他的公权，撤销他在本国的軍銜，并判处死刑——全体通过。

签名：雅科布·貝克尔特(列兵)；菲力浦·特帖尔陶布(炮手)；馬捷伊·貝德涅塞克(中士)；奥托·利諾夫斯基(炮手)；弗朗契舍克·斯托克(少尉)；安东·克雷契維奇(少尉)；米哈尔·馬列茨基(中尉)；萊昂·查瓦德斯基(炮手)；斯塔尼斯拉夫·坦茨科夫斯基(下士)；楊·哈馬尼斯基(中士)；亚历山大·米希茨基(上士)；卡季米尔·維斯托茨基(少尉)；約瑟夫·阿朗諾斯基(中尉)；彼得·斯坦凱維奇(上尉)；泰奥菲尔·拉品斯基(上校)。”

对上述文件我們只有一点补充：塞弗尔-帕沙不願意对一个在苏丹軍隊中有上校軍銜的人执行死刑，因此把他押送到特拉比曾德。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人宣称，关于穆罕默德-貝伊背叛的消息，純粹是捏造的；但是波兰軍官立即出来反駁这种說法，并且威胁說，在必要时将公布这一案件的有关文件。我們在前面摘引了这些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无疑是对切尔克西亚战争史的极有趣的貢獻。

关于俄国大使館在这个案件期間的行动，我們还可以举出以下的事实。在君士坦丁堡尽人皆知，“袋鼠号”輪船是被租来运送軍隊、彈药到切尔克西亚去的。可是俄国大使館对土耳其政府只字未提这件事；但是就在“袋鼠号”駛出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当天，俄

国大使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議，要求进行調查，追究这件事的发起人。大使館竭力想把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的扎莫伊斯基伯爵牵扯进去，但遭到了彻底的失敗。当时，显然是根据俄国的要求，施泰因將軍和伊斯馬伊耳-帕沙以曾参与这一事件而被流放。經過几个月的流放后，在俄国皇帝的某个节日，又是根据俄国大使的要求，施泰因將軍和伊斯馬伊耳-帕沙被允許回到君士坦丁堡。

对文件的評論由卡·馬克思

于 1858 年 5 月 18 日写成

載于 1858 年 6 月 16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35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 土地占有問題

坎宁勋爵关于奥德的公告（我們曾就这事于上星期六发表了几个重要文件<sup>359</sup>），重新引起了关于印度土地占有問題的討論。这个問題在过去曾經是引起大量爭論和意見分歧的題目。有一种意見认为，对这个問題的不正确理解，使得在对印度那些归英国直接統治的地区<sup>360</sup>的治理工作中造成了极严重的实际錯誤。这场爭論的主要問題是：所謂柴明达尔、塔魯克达尔或謝尔达尔<sup>361</sup>在印度經濟体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当把他們看做土地所有者还是仅仅看做收稅人？

大家都同意：印度同亚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土地的最高所有权是屬於国家的。但是爭論的一方认为，應該把国家看做土地的所有者，它把土地按分成制租給农人；另一方則认为，实质上土地在印度就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私人所有，而所謂国家所有不外是指土地由君主封贈——这种封贈在所有以封建权利为法律基础的国度中都得到理論上的承认，并且还毫无例外地在所有一切国度中被实际实行着，因为政府有权按自己的需要征收土地稅，除政治上的考虑以外，絲毫不照顾占有者的方便。

然而，如果假定在印度土地是私人所有，私人占有者对土地的

权利也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肯定无疑，那末应该认为誰是真正的所有者呢？可以获得这种地位的有两类人。其中的一类是通称为柴明达尔和塔魯克达尔的阶级，他們曾被比做欧洲的有爵位的和无爵位的土地貴族。他們也就被认为是只須向国家繳納一定捐稅，并且作为所有者有权随意更換直接耕种者的土地真正所有者；而直接耕种者，从这种观点来看，則只是必須听任柴明达尔随意征收地租的无权的佃戶。这一观点自然符合英国人关于无爵位的土地貴族作为社会制度主要支柱是重要和必需的这种概念，因此，在七十年以前，在康沃利斯勋爵担任总督时，这一观点就成了著名的孟加拉土地法<sup>362</sup>的基础。这一土地法目前仍然有效，但是許多人认为，它曾使政府和直接耕种者遭到了不少禍害。在对印度斯坦的习俗和孟加拉土地法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困难做較为仔細的研究之后，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根据古印度教徒的习俗，土地所有权屬於村社，村社有权把土地分配給个人耕种；柴明达尔和塔魯克达尔当初只不过是政府委派去监收农村繳納的稅款并将其汇齐交給王公的官吏。

这种观点对近几年在英国人直接管轄的那些印度省份里进行的土地所有权和稅收的調整起了很大的影响。已认为塔魯克达尔和柴明达尔所要求的絕對所有权是来源于对国家和耕种者的篡夺，因此曾竭尽全力要把他們当做窒息直接耕种者并且阻碍国家普遍进步的梦魔来消除掉。但是，既然这些中間人，不論其权利从何而来，能够援引慣例来維護自身的利益，就不能不承认他們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不管这些要求对人民是如何难堪、专橫和沉重。在奧德，在土著王公的微弱統治下，这些封建土地占有者在削減政府的要求和耕种者的权利方面都做得很过分，因此，当不久

前这个王国被兼并后，对这个問題又进行重新审查的时候，受委托实行新土地法的官吏很快就和这些封建土地占有者就其权利的实际范围发生了极其激烈的爭論。因此也就在他們中間产生了不滿，促使他們与起义的西帕依联合起来。

拥护上述政策的人們(上述政策即村社土地整理制度的政策，它把直接耕种者看做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这种权利駕凌于国家賴以取得其一份农产品的中間人的权利之上)，为坎宁勋爵的公告辯护，认为它成功地利用了大多数柴明达尔和塔魯克达尔在奥德所处的地位；他們說这一公告的目的是为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更广泛得多的改革鋪平道路；他們說，根据这一公告沒收的所有权只是柴明达尔或塔魯克达尔的权利，只涉及很小一部分居民，而且完全不包括直接耕种者。

另一方面，得比內閣对坎宁勋爵的公告所持的立場(如果把关于正义和人道的各种議論撇开不談)，完全符合托利党即保守党所遵循的关于合法权利的不容侵犯和維護土地貴族利益的重要性的一般原則。托利党在說到英国的与土地有关的階級时，总是与其說是指繳租人和直接耕种者，倒不如說是指土地所有者和收租人，因此他們要把柴明达尔和塔魯克达尔(尽管他們的人数实际上很少)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量齐观，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从英国来管理印度，最大的不便和困难之处也就在于：在考察印度問題时，很容易受到純粹英国人的偏見和信念的影响，尽管这些偏見和信念在这里是被应用在与它們几乎毫无关系的社会状态和情况上。今天发表的消息中，坎宁勋爵不顾奥德專員詹姆斯·烏特勒姆爵士的反对，十分自信地坚持他在公告中提出的政策，虽然看上去好像他对專員的主張做了让步，而在自己的公告

中加入了在已发往英国的、作为埃倫伯勒勋爵报告<sup>363</sup>的基本內容的原文中所沒有的緩和詞句。

坎宁勋爵关于应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参加起义的奥德土地占有者的行为的意見，看来同詹姆斯·烏特勒姆爵士和埃倫伯勒勋爵的意見沒有重大分歧。坎宁勋爵认为，这些土地占有者的立場不仅与叛乱的西帕依的立場极不相同，而且与不列顛統治已久的那些起义地区的居民的立場也大有不同。他认为应当把他們当做胁从者看待；但是同时他坚持必須使他們認識到，发动叛乱就会給自己招来严重的后果。我們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公告的发表起了什么作用，在判断这一公告可能引起的后果方面誰更接近真理，是坎宁勋爵，还是詹姆斯·烏特勒姆爵士。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5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6 月 7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344 号

卡·馬克思  
\*波拿巴的財政手段。——  
軍事專制

1858年5月27日于巴黎

現在已經沒有誰能反駁波拿巴的國庫陷于瓦解的事實。“財產的救主”<sup>364</sup> 本人也公開談到了這一點。否則，埃斯潘納斯將軍給法國各省長發通知信，號召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在必要時運用權力”使醫院和其他慈善機關的監護人把他們用來獲得收入的不動產轉為三厘統一公債的事情便無法解釋。這一部分財產的價值為1億美元，但是，正如波拿巴代表窮人抱怨說，這部分財產只帶來不超過2.5%的收入。如果把這部分財產轉為國家證券，收入至少會增加一半。不久前波拿巴以慈父般的關懷曾建議國務會議通過關於把慈善機關的房地產轉為國家有息證券的法令，然而多麼奇怪的是，波拿巴自己的國務會議卻固執地不理睬對它的這種暗示。於是，現在波拿巴企圖“用行政方法”和軍事 *ordre du jour* [命令] 來實現他用立法手段行不通的事情。有一些够老實的人，以為他玩弄這種手法只是竭力要增加國家有價證券的數額。不能想像比這更遠離真相的了。如果上述地產按標價1億美元出售，那末用來購買地產的大部分錢當然是從以前投入統一公債和其他國家有價證券的資本中提取出來的，於是人為的對有價證券的需求就被

向公開市場大量拋出有價證券所抵銷。這樣甚至會使有價證券市場進一步蕭條。但是波拿巴的計劃要實際和簡單得多了。他打算設立 1 億美元新的無期公債來代替 1 億美元地產。他預備一手攫取慈善機關的財產，另一手用國家 «grand livre» [“債券簿”] 的支票來補償它們。我們在研究 1857 年法蘭西銀行法<sup>①</sup> 時，已經詳細談過波拿巴為了保證自己發行可憐的 2 000 萬美元公債，而犧牲國家利益賜給法蘭西銀行極大特權的問題。當時我們認為這個法蘭西銀行法是“社會救主”在財政上的絕望的哀號，然而，從那時起法國商業、工業、農業遭到的災難也殃及了本來就在以駭人比例增長着支出的國庫。各部在 1858 年的實際需要是 79 804 004 法郎，超過了 1855 年的實際需要；僅軍費開支一項就占國家總預算收入的 51%。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已經不能像 1854 年和 1855 年那樣進行援救和在“民主”的原則上幫助發行公債。如果仔細看一看該公司最近的報告，就可以看出負債大大地超過了資產，因而對自己股東付不出股息。在這種情況下，波拿巴只好在財政方面重新採用他在政治方面已不得不採用的 coup d'état [政變] 的最初的原則，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子了。從盜竊法蘭西銀行地下室 2 500 萬法郎開始的、繼而又沒收奧爾良家族產業的財政政策現在竟進一步發展到沒收慈善機關的財產了。

然而，最近這一次行動需要波拿巴使用他的一支軍隊，而且正是他的管理絕大多數慈善機關的教士大軍。從 coup d'état 以來“世界報”就第一個敢於公開不同意“社會救主”的做法，甚至懸求“世紀報”<sup>365</sup> 同自己聯合起來反對這種準備侵犯“私有財產”的

① 見本卷第 241—245 頁。——編者注



罪行。

正当“教会的长子”<sup>①</sup>对自己的圣軍的态度十分曖昧的时候，他的俗軍也有不听从指揮的危險。如果他真的試图打擾像默西、列奧德和伊安先生这些英雄的消遣，他就会在他唯一所能依靠的这一部分軍隊中喪失威望。相反，如果他放縱御用軍人的貪贓枉法（自薩托里兵營檢閱的那天起他一直鼓勵这种貪贓枉法），那末任何紀律都会完了，軍隊也就不能經受外来的最小的一个震動。現在还有像杀害“費加罗报”<sup>366</sup>編輯这样的事件，而且也一定会有震動。从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知道普遍的憤怒充滿各地，当決斗的消息一傳到巴黎，大約就有5 000个青年人开始成群地聚集在“費加罗报”bureaux〔編輯部〕，要求把他們的名字列入准备同任何一个前来挑衅的少尉进行搏斗的人的名单。当然，“費加罗报”本身就是波拿巴扶植起来的，它率領着一类专干丑事、进行訛詐和誣蔑的刊物，这类刊物是在对政治报刊施加暴力鎮压以后一下子办起来的，因为它們在現在的小帝国的条件下得到了使自己蓬勃繁荣的有利基地和环境。波拿巴集团文武代表之間的这场流血搏斗是即将到来的冲突的信号，这正是对历史諷刺的十分微妙的表現。

卡·馬克思寫于1858年5月27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8年6月11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5348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①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 弗·恩格斯

### \*印度起义

虽然英国人曾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先后攻占德里和勒克瑙这两个相继成为西帕依起义大本营的城市，但是印度的平定还远没有完成。事实上甚至可以說，这方面真正的困难才刚开始。当起义的西帕依还是大批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当问题还是进行大规模围攻和正规战的时候，英军在这类行动中的巨大优越性使他们占到种种优势。但是当战争现在具有新的性质时，这些优势可能将会大量丧失。攻占勒克瑙并没有使奥德归顺；即使奥德归顺也不会使印度平定下来。奥德王国全境布满大大小小的要塞，虽然其中也许任何一个也不能长久抵御正规的攻击，但逐一夺取这些要塞，不仅是极端令人厌倦的事情，而且还要比进攻德里和勒克瑙这样的大城市遭到更大的损失。

但是需要征服和平定的还不仅是奥德王国。溃败的西帕依被赶出勒克瑙以后，向四处逃散。他们有一大部分人藏匿在北部罗希尔汗的山区，罗希尔汗仍然全部为起义者所控制。另外一些人逃到东部的果腊克普尔，英军部队虽然在向勒克瑙进军时曾通过该地，但现在又不得不再次征服它。还有许多人成功地潜入到南方的班得尔汗。

的确，似乎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即什么是最好的行动方式，如

果首先征服那些可以作为起义者藏身之处的边缘地区，然后再与集结在勒克瑙的主力作战，是否更好些。据说，这曾经是军事家们愿意采取的作战计划；但是很难理解，以英国人现有的这样有限的兵力如何能有效地占领这些边缘地区，使逃跑的西帕依最后被赶出勒克瑙后不能渗入到那里去，从而使英国人不需要像在果腊克普尔所发生的那样，来重新征服这些地区。

自从攻占勒克瑙以后，起义者的主力似乎退到了巴雷利。据传，纳那·萨希布也在那里。有人认为，必须在夏季出征勒克瑙西北 100 英里以外的这个城市和地区，并且，根据最后的报道，科林·坎伯尔爵士也亲自到那里去了。

可是，游击战似乎正向各方扩展。当英军调往北方的时候，零散的小股起义的士兵就渡过恒河，进入达普，截断英军与加尔各答的交通，到处破坏，使农民不能交纳地租，或者至少给他们不交地租造成借口。

甚至巴雷利的攻占，不但不能防止这些祸患，也许反而会扩大这些祸患。西帕依的优点就在于这种不规则的作战方法。他们在行军方面优越于英军，正如同英军在战斗方面优越于他们一样。英军纵队不能一天行军 20 英里，而西帕依队伍却可以一天走 40 英里，如果努力一些，甚至可以走 60 英里。运动迅速是西帕依部队的主要优点，再加上他们服水土，粮食供应也比较容易些，这就使他们成为印度战争中的一支不可少的力量。英军在出征中，特别是在夏季战局中，损失是浩大的。现在已经深感人员不足。也许不得不把逃跑的起义者从印度的这一端追击到那一端。在这方面，欧洲部队是很难胜任的，同时，起义者到处游荡，因而可能与至今还忠实于英军的孟买和馬德拉斯各土著团发生接触，这样就又

有可能引起新的起义。

但是即使不再有新的起义者参加，在战场上的武装人员，已不下 15 万人，而没有武装的居民则既不帮助英军，也不给英军送消息。

此外，孟加拉缺雨，有发生荒年的危险——这是本世纪还未发生过的灾害，即使在过去，甚至在英国人占领印度以后，这种灾害也是可怕的苦难的源泉。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5 月末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6 月 1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5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弗·恩格斯

### \*英国军队在印度

我們的不够謹慎的朋友，倫敦“泰晤士报”的威廉·罗素先生，由于喜作生动的描述，在不久以前又一次繪声繪色地描写了搶劫勒克瑙的情景，使得外国人对英国人的性格产生一种并不特別令人称美的印象。現在看来，德里也受到相当大規模的“掠夺”，并且除了愷撒巴格以外，勒克瑙全城也被用来犒劳曾經备尝艰辛和英勇奋战的英国兵。現在引用罗素先生的一段話：

“有些連真可以夸耀它們的一些拥有几千英鎊財物的士兵。我听說，有一个兵洋洋自得地要借錢給一个軍官，‘如果他想賄买上尉官銜的話，要多少就借多少’。另外一些士兵汇大笔款子給他們的朋友。在这封信还未寄到英国以前，許許多多的钻石、翡翠和珍珠一定已經非常安詳而愉快地告訴你們关于攻击和搶劫愷撒巴格的故事。好在佩带这些珠宝的漂亮妇女們……沒有看見这些光彩夺目的东西是怎样得来的，也想像不出这些宝物被强夺时的那种情景…… 有些軍官真正发了大財…… 在放軍装的破箱子里，藏着一些小匣子，里面装着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整个庄园，装着世界上盛产飞禽走兽和魚类的各个地方的舒适的漁猎別墅。”

这就說明为什么英軍在攻占勒克瑙后无所作为。用来从事大肆搶劫的两个星期沒有白白浪費。軍官和士兵进城的时候是穷光蛋或者負債累累，而出城的时候都突然变成了富豪。他們已經不再是原来那样的人了，可是有人还期待他們重新执行原来的軍事

职务，俯首听命，默然服从，甘心忍受疲劳、艰难和征战之苦。但这是不可能的了。军队一旦任其抢劫，就永远变样了；将军的任何命令和威信都无法使它恢复原状。请再听听罗素先生的话吧：

“看看钱财怎样引起疾病的发展，抢劫怎样使人变得凶狠无情，在家庭里，在最亲近的、最可爱的人们中间一些光泽的石炭结晶会造成怎样巨大的灾害，这是很有意思的……列兵腰间所系的装满卢比和金币的沉甸甸的皮带，使他们确信自己的梦想（在祖国逍遥自在）可以变成现实，无怪乎‘集合、集合！’的口令会使他们发怒……两次会战、双份奖金、两个城市的洗劫和很多顺手发财的机会，使得我们有些士兵过于富足，以致不安心当兵了。”

于是我们听说有 150 名以上的军官向科林·坎伯尔爵士提出退职的请求，——这在与敌人对峙的军队中确实是极少有的行为。在任何其他的军队中，由于这种行为将会在 24 小时内受到撤职以及其他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在英国军队中显然把这种行为看做是突然发财致富的“军官兼绅士”的十分自然的举动。至于士兵，做法就两样了。抢劫产生再抢劫的欲望；并且如果附近再没有印度人的财宝可供抢劫，那末为什么不能抢劫英国政府的财宝呢？无怪乎罗素先生这样写道：

“欧洲兵护送的两辆钱柜车可疑地翻了车，丢失了一些卢比，因此军需官表示宁愿要土著士兵来执行护送公款的任务！”

真是妙事！印度兵或者锡克兵更有纪律，他们中间做贼做盗的、贪财好利的竟少于那些无可比拟的军人模范英国兵！但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个别英国人的行动。现在来看看集体“行劫”的英国军队吧：

“战利品日益增多，据估计，这些财产出售后，可得 60 万英镑。据说，康波尔城堆满了在勒克瑙抢来的东西；如果能估算出公共建筑所受的损失、私

人财产的毁坏、房屋地产的跌价以及人口减少的影响，那末就会发现，**奥德首府**的损失总数约为**500万或600万英镑。**”

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卡尔梅克寇群，像蝗群一样袭击了许多城市，沿途所遇，无不吞噬一光，但是要与这些信奉基督教的、文明的、有骑士风度的、文雅的英国士兵的侵略比较起来，对于受害的国家来说，却未必不是一种善行。至少前者按照他们的游荡不定的路线很快就过去了；而这些有条不紊的英国人却到处带着自己的搜括人员，把抢劫变成制度，把抢来的东西登记下来，公开拍卖，并特别注意使英国兵的英勇受赏的权利不受欺骗。看看这支因大规模行劫而纪律松弛了的军队，当炎暑季节作战的困难要求最严格的纪律时，还能有多大作为，将是很有意思的。

尽管印度人到这时一定比他们在勒克瑙时更不适于作正规战了，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如果起义者在佯作抵抗之后，又重新改变作战地区，比如说，把它移到拉吉普坦纳（那是一个远未平定的地方），那时应当采取什么办法。科林·坎伯尔爵士不得不到处留驻警备部队；他的野战部队已经减少，不及他在未攻克勒克瑙时所有兵力的一半。如果他要占领罗希尔汗，他还有什么部队来进行野战呢？现在他正碰到炎热的季节；6月的霖雨大概中止了积极的军事行动，而使起义者获得喘息的机会。从4月中旬起当天气变得炎热不堪的时候，欧洲兵因疾病造成的损失一定逐日增多，尤其是去年冬天运到印度来的新兵，他们中成为气候的牺牲品的必然会比去年夏天在哈弗洛克和威尔逊指挥下久经印度征战的老兵多得多。罗希尔汗已不是像过去的勒克瑙或德里那样的具有决定性的地点。固然，起义者已大大丧失了进行正规战的能力，但是现在他们处于分散状态，使英国人

不得不由于在不利的氣候条件下不断出征而拖垮自己的軍隊，这是更加可怕的。試看有多少新的抵抗中心：罗希尔汗，那里集中有大批的老西帕依；哥格拉河彼岸的奥德的东北部，那里奥德人已設置了陣地；卡耳皮，現在那里已成了班得尔汗起义者的集中地点。很可能，几个星期之內，也許还要早些，我們將要听到攻克巴雷利以及卡耳皮的消息。攻克巴雷利的意义不大，因为这个任务要占用坎伯尔手中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兵力。至于現在正受到惠特洛克將軍和罗斯將軍威胁的卡耳皮，則是比較重要的猎取物，前者正率領自己的部队由那格普尔开到班得尔汗的班达，后者由詹西方向开来，已击败卡耳皮部队的前卫。攻克卡耳皮，将解除坎伯尔的作战基地康波尔所面临的唯一危險，从而也許使他能够以因此而騰出的部队对他的野战軍作某种程度的补充。但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是：他的部队除了肃清奥德的起义者以外，是否还有多余的力量。

这样一来，这支在印度从来没有这样集中于一地的最强大的英国軍隊，又重新分散到各地，并且它需要做的事比它能够做的事要多。夏季溽暑和霪雨的气候所造成的損失一定是駭人听聞的；同时，無論欧洲人在士气上比印度人高多少，但仍然使人不得不怀疑，难道印度人不畏当地夏季溽暑和霪雨的这个体质上的优越性不也是有助于他們消灭英国的軍事力量嗎？現在只有少数英国部队在前往印度的途中，7月或8月前又不打算向那里派遣大批援軍。因此，在10月和11月以前，坎伯尔只有靠这样一支正在迅速消散的軍隊来支撑局面。如果这时起义的印度人在拉吉普坦納和馬拉提人地区发动起义成功，那又将会怎样呢？如果現在有8万人在英国軍隊里服务的錫克人（他們想把胜利的全部荣誉据为己



有,并且对英国人不很友好)发动起义,那又将会怎样呢?

总之,看来英国人在印度至少还得进行一次冬季战局,而且如果不从英国再派军队来,是无法进行这一战局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6 月 4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6 月 2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61 号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貿易状况

1858年6月8日于倫敦

英国貿易部剛剛发表的关于貿易和航运的統計材料，包括联合王国截至3月31日为止的1858年头三个月与1857年同一时期相比的出口申报价值，截至4月30日为止的1858年头四个月与1856年和1857年同一时期相比的来往貨船的数量和吨数，以及截至1858年4月30日为止的四个月当中的主要进出口項目。1858年的4月份出口价值为9 451 000 英鎊，1857年的为9 965 000 英鎊，1856年的为9 424 000 英鎊，而1858年头四个月的出口总值减少了将近6 000 000 英鎊。因此，1858年4月份的英国出口，似乎不仅超过了1856年的水平，而且几乎达到了1857年的、即在美国爆发商业危机几个月之前的指数。由此可能得出結論：危机的最后痕迹正在迅速消失，英国貿易至少又在重新进入繁荣时期。但是得出这种結論是极端錯誤的。首先必須看到，官方的統計，既然只涉及申报价值，所反映的就不是实际数字，而只是出口商自己的估价。并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出口材料，就会看出，英国貿易的表面繁荣主要是由于对东印度的过度出口造成的，这必然会导致該市場的劇烈縮減。在乔治·弗雷澤公司最近的商务通报上已經这样写道：

“最近来自东方的消息表明，与孟买和加尔各答在供货有限制的时期所出现的特别高昂的价格水平比较起来，价格有下跌的征象。在英国 12 月以前发出的货物到达后，价格就已显著下跌。从那时起，对这两个市场的供应极其充裕，甚至可以说过分充裕，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然会看到，由东方 1 月初开始的大量需求所造成的价格水平将不大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除了印度以外，那些至今尚未受到商业危机影响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也不是由于增长了需求，而只是为了试验而堆满了英国货。如此受惠的国家有比利时、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某些意大利国家（特别是双西西里王国）、埃及、墨西哥、中美洲、秘鲁、中国、还有一些很小的市场。当由于从巴西传来极坏的消息，对这个国家的总的出口已经停顿的时候，某些不得不为剩余产品寻找出路的英国工业部门，不但没有减少甚至还增加了对该市场的供货。例如，在 4 月份，运往巴西的亚麻制品、陶瓷器的数量和申报价值都有所增长。谁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 *bona fide* [真正的] 出口。对于在危机的头几个月成为大量吸收商品的中心的澳大利亚，同样可以这样说。澳大利亚当时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存货充塞；突然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反应；对这个地方的总的出口减少了。然而英国某些工业部门不顾澳大利亚所有地方报纸的警告，不是减少供货，而是实际上增加了供货——自然是为了投机的目的。因此，4 月份的出口报告不能看做是英国工业繁荣的 *bona fide* 指标，而只能看做是为了确定世界各个市场目前能经受多大压力而做出的试探。下面这个统计表包括 1858 年截至 3 月 31 日为止的三个月与 1857 年同一时期相比的英国和爱尔兰的出口申报价值的材料：

## 輸入英国貨的外国

	1857 年	1858 年
	英 鎊	
俄国, 北方港口·····	3 015	8 853
俄国, 南方港口·····	72 777	42 493
瑞典·····	48 007	3 717
挪威·····	30 217	5 911
丹麦·····	92 046	40 148
普魯士·····	133 000	78 917
梅克倫堡·····	9 502	3 099
汉諾威·····	288 648	236 689
奥登堡·····	3 520	1 957
汉撒城市·····	2 318 260	1 645 419
荷兰·····	1 305 606	975 428
比利时·····	515 175	546 033
法国·····	1 631 672	1 035 096
葡萄牙本土·····	380 160	356 178
亚速尔群島·····	10 793	12 581
馬德拉·····	9 955	16 245
西班牙·····	496 788	584 287
卡內里群島·····	18 817	8 475
撒丁·····	290 131	293 138
托斯卡納·····	189 584	257 508
教皇領·····	69 953	123 059
双西西里王国·····	284 045	375 177
奥地利領地·····	253 042	323 086
希腊·····	40 860	69 570
土耳其·····	969 288	821 204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	111 052	93 135

	(續)	
	1857年	1858年
	英 鎊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199 070	81 874
埃及(地中海沿岸各港口)·····	449 497	483 516
突尼斯·····	865	2 323
阿尔及利亚·····	4 790	4 831
摩洛哥·····	55 826	37 206
非洲西海岸(非英屬)·····	235 527	196 484
非洲东海岸·····	301	1 927
紅海的非洲港口·····	1 130	567
佛德角群島·····	2 419	3 965
爪哇·····	234 071	149 493
菲律賓群島·····	144 992	212 942
中国(香港除外)·····	290 441	389 647
玻里尼西亚群島·····	—	585
西印度(非英屬)·····	620 022	321 435
美国(大西洋沿岸各港口)·····	6 231 501	2 565 566
加利福尼亚·····	50 219	94 147
墨西哥·····	112 277	151 890
中美洲·····	22 453	46 201
新格拉納达·····	88 502	117 411
委內瑞拉·····	105 417	62 685
厄瓜多尔·····	2 099	—
巴西·····	1 292 325	826 583
烏拉圭·····	145 481	177 281
布宜諾斯艾利斯·····	285 187	279 913
智利·····	336 309	270 176
秘魯·····	209 889	299 725
对外國輸出總計·····	20 636 473	14 940 756

		(續)	
英国領地			
	1857年	英 鎊	
		1857年	1858年
拉芒什海峽各島.....	136 071		120 431
直布罗陀.....	152 826		210 575
馬尔他.....	116 821		131 238
伊奥尼亚群島.....	66 148		52 849
非洲西海岸(英屬).....	135 452		62 343
好望角.....	442 796		403 579
納塔爾.....	26 605		23 106
阿森訶島.....	3 832		2 308
圣海倫島.....	3 837		8 416
毛里求斯島.....	142 303		164 042
亞丁.....	11 263		11 996
英屬东印度(新加坡和錫兰除外).....	2 822 000		3 502 664
新加坡.....	101 535		308 545
錫兰.....	98 817		153 090
香港.....	133 743		242 757
澳大利亞西部.....	15 515		13 813
澳大利亞南部.....	180 123		249 162
新南威爾士.....	706 337		682 265
維多利亞.....	1 427 248		1 056 537
塔斯馬尼亞.....	67 550		82 942
新西兰.....	96 893		93 768
北美洲英国殖民地.....	818 560		439 433
英屬西印度群島.....	334 024		426 421
英屬圭亞那.....	122 249		95 385
洪都拉斯(英国租界).....	28 362		31 869
<hr/>			
对英国領地輸出总計.....	8 191 020		8 569 534
对外国和对英国領地			
輸出总計.....	28 827 493		23 510 290

“經濟學家”雜誌認為，精確地分析這些數字，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英國出口的減少只是在對外國的貿易方面，而不是在對自己殖民地的貿易方面”。的確，上面的統計表可以扼要地表達如下：

### 三個月的出口額

	1857 年	1858 年
	英 鎊	
對外國.....	20 636 473	14 940 756
對英國領地.....	8 191 020	8 569 534
共 計.....	28 827 493	23 510 290

儘管如此，“經濟學家”雜誌所得出的結論在我們看來是錯誤的。按照總計數字，似乎對外國的貿易減少了 5 695 717 英鎊，而同時對殖民地的貿易卻增加了 378 514 英鎊。但是，如果我們不算對直布羅陀、馬爾他、香港這種英國走私中心的出口的增长，不算對新加坡這種只是作為對外國貿易貨倉的地点的出口的增长，那末對殖民地的貿易總額就會有顯著的減少；如果再不算印度，這種減少就會極大。在對外國的貿易方面，主要是以下這些國家有減少：

	1857 年	1858 年
	英 鎊	
美國.....	6 231 501	2 565 566
巴西.....	1 292 325	826 583
漢撒城市.....	2 318 260	1 645 410
法國.....	1 631 672	1 035 096
荷蘭.....	1 305 606	975 428

關於航運的材料說明，進港的英國船隻的數量和噸數稍有增加，但是出港船隻的數量和噸數有所減少。在外國當中，照舊是美

国在航运方面占首位。以下的数字表明进出英国港口的美国船只的数量：

1856 年		1857 年		1858 年	
		进 港			
船只	吨数	船只	吨数	船只	吨数
美国……	382 383 255	367	366 407	366	366 650
		出 港			
美国……	414 395 102	440	427 221	343	321 015

从同一份材料中可以看出，挪威、丹麦和俄国是在航运方面受商业危机的影响似乎特别严重的国家。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6 月 8 日

載于 1858 年 6 月 21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35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目前，英国正呈現出一幅国家上层发生瓦解而社会下层却似乎全都靜止不动的奇特景象。在民众中听不出有任何动蕩不安，然而在他们的統治者当中却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但是果真会有上层在熔解而下层却照旧呆滯不动的事嗎？当然，我們不是指帕麦斯顿及其同僚想把財政部“撈到手”的那些卑劣企图<sup>367</sup>。英国議会史上当权派和在野派之間的斗争，跟意大利城市中世紀編年史上流亡者和放逐者之間的战争一样，是寻常的事情。可是請看，下院的托利党首領<sup>①</sup>以这种不祥的声明結束他的演說：

“在我們〈激进党人和托利党人〉之間，有一种使我們在这个議院和这个国家中联合一致的东西，那就是，我們將不再充当陈腐的寡头政体的工具或牺牲品！”

上院通过人民宪章中的一个条款——廢除下院議員的財產資格限制<sup>368</sup>；輝格党改革家的后裔格雷勋爵警告他的出身高貴的同僚，說他們將“使他們政府的整个制度和他們的宪法的性质发生全面的革命”；拉特兰德公爵由于看到可能要把“宪章的所有五項条款，甚至更多的东西”全部吞下去的前景而吓得魂不附体。还

---

① 迪斯累里。——編者注

有，倫敦“泰晤士報”前一天用不祥的語調告誡資產階級，說迪斯累里和布尔韦尔对它心怀叵測，为了制服它，可能同微賤的民众联合一致，第二天这家报纸又警告土地貴族要防备被小业主扼死的危險，說小业主将借着剛在下院通过二讀的洛克·金的法案登上王位，因为这个法案把选举权扩大到了各郡每年繳納 10 英鎊房金的居民。

事实是，英国这两个执政的寡头政党，早已变成沒有任何明确原則的單純的派系了。它們在試圖先联合一致、然后建立专政的努力遭到失敗以后，現在已落到这种地步，即它們只有把它們的共同利益奉送給共同的敌人——在下院拥有約翰·布萊特这样强有力的代表的激进資產階級政党，才能指望延长各自的寿命。到目前为止，托利党是以貴族階級名义执政的一群貴族，輝格党是以資產階級名义执政的一群貴族；但是資產階級既已开始以自己的名义执政，輝格党就无事可做了。托利党为了不让輝格党当权，将屈从于資產階級政党的压力之下，直到使輝格党完全不能忍受，直到使这些寡头政治家确信，为了挽救本阶层的利益，他們必須融化在保守派的队伍中，并且放棄他們的企图代表自由派利益或者自成一体的一貫要求。輝格派并入托利派，并且共同轉变为与新兴的資產階級政党（它在自己的領袖领导下，打着自己的旗帜、喊着自己的口号进行活动）相对立的貴族階級政党——这就是我們目前在英国所看到的过程。

如果我們考虑到英国这种内部状况，再联想到印度战争仍将大量耗費英国的人力和財力，我們就会完全明白，英国已不可能像它在 1848 年那样去阻碍显然在日益临近的欧洲革命。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十年前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我們指的是

俄国。但是現在它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陣大風，就会立刻燃燒起来。农奴战争的征兆在俄国内部已这样明显，以致地方行政长官感到除了指責奥地利不該通过秘密間諜在全俄各地宣傳社会主义学說和革命学說而外，无法解釋这种少見的紛扰現象。真有意思，居然不仅是怀疑而且公开指控奥地利进行革命間諜的活动！的确，加里西亚惨案<sup>369</sup>已向全世界明显地证明了，維也納政府是知道在必要的时候把它自己的社会主义傳授給农奴的。然而，奥地利憤怒地反对这种指控，它說，它的东方各省布滿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密探，并且被他們所毒化，而它的意大利臣民則被波拿巴和沙皇的联合陰謀弄得暈头轉向。最后，普魯士深切地感觉到情势的危險；但是它手足被縛，無論往哪个方向都不能动彈。王权实际上由于国王患瘋癲症和摄政王沒有充分权力而陷于瘫痪。在拒絕退位的国王和不敢掌权的亲王这两者的党羽之間，进行着明爭暗斗，而給人民群众的洪流打开了閘門。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法国了。可是在法国，商业上和农业上的灾难、財政上的 coup d'état<sup>①</sup>、借助于軍队的統治为軍队本身的統治所代替，这都更加速了爆发的来临。甚至法国报纸也終於承认，現在必須不再寄一切希望于恢复繁荣时期了。“立宪主义者报”說道：“我們认为，以很快就会复原的空想去愚弄人民是蠢笨的。”“祖国报”說道：“不景气的状况在繼續，尽管存在着有利因素，我們不应当期待会立刻发生变化。”“同盟报”<sup>370</sup>和“世界报”随声附和了这些怨言。倫敦“泰晤士报”駐巴黎記者說道：“大家承认，自从1848年革命以来，巴黎从未經受过目前这样的商业危机”；而

---

① 直譯是：政变；这里是：变革、改革。——編者注

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的股票价格跌到了 550 法郎左右，即比出售给公众的票面价格还低。另一方面，帝国国库的极度空虚迫使拿破仑不得不坚持他的没收计划<sup>①</sup>。在昂茹出版的一家教权主义报纸写道：“唯一要问的是要不要尊重财产权。”现在还管得了财产权！波拿巴回答说：目前唯一要问的是如何保住军队；并且他以自己惯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全军重新进行收买。他下令普遍增加军队的薪俸。这时，英国感到惶恐不安，奥地利则惊慌失措。大家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路易-拿破仑没有别的办法逃脱迅速的毁灭。结局的开端已经临近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6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6 月 24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59 号

---

① 见本卷第 520—522 页。——编者注

## 卡·馬克思

# 英国政府和奴隶貿易

1858年6月18日于倫敦

在上院6月17日的會議上，牛津主教提出了奴隶貿易問題，并且代表牙买加島圣瑪丽教区呈递了反对这种貿易的請願书。这次辯論必然会对所有不抱什么成見的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英国現政府在这个問題上态度极其慎重，坚决要避免引起同美国发生糾葛的任何口实。馬姆茲伯里勋爵以下面这段話完全取消了对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的“檢查权”：

“美国声称，無論在什么情况下，無論为了什么目的，或無論发生什么怀疑，除美国船只以外，任何船只都不能駛近悬挂美国旗的船只；否則，駛近或扣留这种船只的官員应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負全部責任。美国外交部长的这项声明在未得到皇家司法官員贊同和批准以前，我并未承认它符合国际法。而在承认之后，我已极其强硬地警告美国政府，如果获悉美国国旗能庇护任何不法行为，那末世上所有的海盜和奴隶販子就会只悬挂美国国旗；这必定会使現在受尊敬的美国国旗蒙受耻辱；美国人如果坚持他們現在的声明，不仅不能維護国家的荣誉，反而会得到相反的結果；最后，美国国旗会被人賄买来干最卑鄙的勾当。我将繼續坚持，在現今的文明时代，海洋上航行的船只千千万万，因此必須在海洋上設置警察；必須由各国商定——如果国际法不做出規定——如何来判明船只的国籍、确定悬挂某国旗帜的权利。我說話的語調、我同美国駐我国代理公使的談話、盖斯將軍在其精心拟制的报告中就这个問題所提出的意見，使我对同美国达成協議抱很大希望，这种協議在两国官員

接到命令之后，就使我們能够檢查各国的旗帜，而不致触犯船只所屬国。”

在反对党的議席上也沒有人試图維護英国对美国船只进行檢查的权利，但是格雷伯爵說道：

“英国人曾跟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締結了防止奴隶貿易的条約，如果他們有合理的根据怀疑某一艘船从事这种可耻的貿易，而这艘船当时是利用美国旗帜，实际上根本不是美国船，那末他們就有权利追上它并对它进行搜查。但是，如果这艘船能拿出美国证件，那末即使它滿船都是奴隶，他們也应该釋放它，让美国去蒙受这种罪恶貿易的耻辱。我希望并且相信，我們的巡洋舰在这方面将接到严格的命令，任何違背这些規定的官員将受到应有的懲罰。”

以后問題就只是圍繞着这一点轉圈子，即是否可以要求被怀疑非法利用美国国旗的船只提出证件，而馬姆茲伯里勋爵似乎連这一点也抛开不管了。阿伯丁勋爵直接否认这样做可能产生任何爭論，因为英国官員在这种場合据以行事的指令，即由拉欣頓博士和乔·科克柏恩爵士起草的指令，当时已經通知美国政府，并且已經得到这个政府的代表韦伯斯特先生的同意。所以，如果这项指令沒有什么改变，如果官員的行动沒有超出指令的範圍，那末“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抱怨”。的确，当时社会輿論似乎很疑心帕麦斯頓又玩了一个他慣用的戏法，在給英国巡洋舰的命令中任意做了一些变更。大家知道，帕麦斯頓虽然夸耀他对禁止奴隶貿易的热心，然而却在他执掌外交事务的十一年中（直到1841年）撕毀了所有涉及奴隶貿易的現行条約，頒布了一些被英国司法当局认为是罪恶的法令，它們实际上曾使他的命令的執行者之一受到法律制裁，而将一个奴隶販子置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使他免受英国本国政府的追究。帕麦斯頓为自己選擇了奴隶貿易作为戰場，把它变成了在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間挑起爭端的簡單工具。他

在 1841 年离职以前曾发出这样的指令，据罗伯特·皮尔爵士說，这些指令“如果没有及时被撤销，一定会造成与美国的冲突”。帕麦斯顿自己說过，他曾命令海軍軍官“不要太尊重国际法”。馬姆茲伯里勋爵虽然措詞非常婉轉，然而曾經暗示过，帕麦斯顿“把英国舰队派到古巴海面上去，而不让它留在非洲海岸附近”，是使英国舰队离开它在英俄战争爆发前几乎已經消灭了奴隶貿易的地方而到一个它只能挑起与美国的爭端的地方去。帕麦斯顿自己委派的前駐圣彼得堡大使沃德豪斯勋爵同意这种看法，他說：

“不管发出了什么样的指示，如果政府下令派遣这样大量的英国船只进入美国洋面，那末在我們和美国之間迟早会发生糾紛。”

然而，不管帕麦斯顿抱着什么样的秘密意图，很明显，他的意图在 1858 年也像在 1842 年一样，已被托利党政府所粉碎，在国会中和报刊上掀起的疯狂的战争叫囂已注定成为“无事烦恼”。

至于奴隶貿易問題本身，牛津主教和布魯姆勋爵斥責西班牙是这种罪恶貿易的主要中心。他們两人都呼吁英国政府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迫使这个国家奉行符合現行条約的政策。早在 1814 年，大不列顛和西班牙之間就締結了一个一般条約，在这个条約中，西班牙明确地譴責了奴隶貿易。在 1817 年締結了一个特別条約，按照这个条約，西班牙承担了义务，从 1820 年起禁止它自己的臣民从事奴隶貿易，并且得到了一笔 40 万英鎊的賠償費，以弥补它的臣民由于实现这项条約而可能受到的損失。錢是装进了口袋，可是义务却没有履行。在 1835 年又締結了一項新的条約，按照这项条約，西班牙在形式上承担了义务——頒布一項相当严厉的刑法，以使它的臣民不可能繼續从事这种貿易。但是又拖延下来了，一切又完全按照那句西班牙成語 «A la mañana» [“明天

再說”〕行事。只是过了十年以后才頒布了这项刑法；可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刑法中遺漏了英国所极力爭取的主要条文，即把奴隶貿易当做海盗行为看待。一句話，什么事也沒有做；只是古巴鎮守司令，內务大臣，宮廷奸党，如果傳聞屬实的話，还有皇室本身，在这方面大发其財，他們向奴隶販子征收私稅，并且出售以每口值多少杜布隆<sup>①</sup>的价格販卖人类血肉的特許证。

牛津主教說：“西班牙不能以这种貿易是它的政府沒有足够力量来禁止的体系作为辯解的理由，因为瓦尔德斯將軍已經证明，这种借口是絲毫不足为凭的。他到島上以后，召集了最聞名的奴隶販子，限他們在六個月之內結束奴隶貿易方面的一切交易，并且告訴他們，他决心在这个期限結束时禁絕奴隶貿易。結果怎样呢？在1840年，即瓦尔德斯將軍上任的前一年，有56艘船从非洲載运奴隶到古巴来；而在1842年，当瓦尔德斯將軍任鎮守司令的时候，这样的船只只有3艘。在1840年，运到島上来的奴隶至少有14470个；而在1842年只有3100个。”

現在英国應該对西班牙怎么办呢？重申抗議，增发函电，恢复談判嗎？馬姆茲伯里勛爵自己承认，用两国政府之間徒然交換的文件已能把从西班牙海岸到古巴的淼淼汪洋完全盖住。也許英国應該坚持它那为这么多条約所肯定的要求吧？然而这里正是开始出现主要困难的地方。这里加进来了一个“至圣的盟友”、現在公认为奴隶貿易的护卫天使的不祥形象。波拿巴第三这个一切奴隶制的庇护者，禁止英国按照它的信念和条約行事。大家知道，人們曾大大怀疑馬姆茲伯里勳爵跟薩托里英雄<sup>298</sup>保持有非法的亲密关系。然而这並沒有妨碍他极其坦率地揭露出波拿巴第三是全欧聞名的奴隶販子，是一个以最卑劣的形式，即借口黑人向法国殖民

---

<sup>①</sup> 西班牙的金币。——編者注



地“自由移民”来恢复这种可耻貿易的人。格雷伯爵对这一揭露补充了一点，他說，“在非洲进行战争是为了捕获俘虏，然后把他們卖给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克拉倫登伯爵补充道，“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非洲市場上竞争，它們为一个人出一定的价錢；这些黑人，不論是被运到古巴还是被运到法国殖民地，所受到的待遇沒有絲毫差別。”

这就是英国在帮助这个人推翻共和国以后所处的絕妙处境。第二共和国跟第一共和国一样，消灭了奴隶制。完全靠迎合人的最卑劣情欲而获得政权的波拿巴，只有每天收买新的党羽才能維持这种政权。他这样做不仅恢复了奴隶制，而且以恢复奴隶貿易收买了庄园主。任何玷污民族良心的事情，对他都是延續政权的新保证。奴役法国的最牢靠的手段，就是把法国变成买卖奴隶的国家。可是要知道，这个法国曾經有勇气面对着全世界宣布：打倒殖民地，原則万岁！波拿巴至少做到了一件事情：奴隶貿易已成为帝国陣营和共和派陣营之間的斗争的口号。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今天恢复，那末明天西班牙就会被迫放棄这种可耻的貿易。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6 月 18 日

載于 1858 年 7 月 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36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印度的捐稅

据倫敦報紙报道，印度的有价证券和铁路股票最近在倫敦交易所有下跌的趨勢，这决不能证明約翰牛对印度游击战的进展情况所爱表示的乐观看法出自真心，無論如何这是对印度財力的伸縮性絕不信任的表示。对于印度的財力，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見。一种意見认为，印度的捐稅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苛重；在多数管区，特别是在英国統治最久的管区内，农民，即印度人民的絕大多数，通常是处在赤貧和絕望的状态中，可見印度的捐稅已增加到极限，印度的財政情况因而是无法改善的。目前这是令人頗为煩惱的結論，因为据格萊斯頓先生說，今后几年內印度仅特別开支一項每年总計即将达 2 000 万英鎊。另一种意見认为，——并且还用許多統計資料来加以证明，——沒有哪个国家的捐稅像印度那样少；如果开支增加，則收入也可以增加；认为印度人民似乎已担負不起新的捐稅的看法是极端錯誤的。布萊特先生可以說是“令人煩惱”的理論的一个最热心和最有威望的代表，他在关于印度政府的新法案<sup>371</sup> 进行第二讀时发表了如下的意見：

“印度政府管理印度所花的錢要比它从其人口中所能挤出的錢为多，虽然政府無論是在派稅項目或征稅方法方面都毫无顧忌。管理印度要花 3 000 万英鎊以上，总稅收也是这样多，然而国家預算总是有赤字，而赤字又只好用

利息很高的貸款來彌補。目前印度債務為 6 000 萬英鎊，並在繼續增加，同時政府的信用却在下降，這部分地是因為政府有一兩次對債權人不很老實，而現在又由於印度不久以前遭到了災難。我曾提到總稅收，但是因為其中也包括鴉片貿易的收入，這種收入很難說是印度人民負擔的捐稅，所以我把實際由印度人民負擔的捐稅估定為 2 500 萬英鎊。但是不應把這 2 500 萬英鎊同在我國所征收的 6 000 萬英鎊相比較。議院應該記得，用在英國只能購買一天勞動的黃金或白銀，在印度可以購買十二天的勞動。這 2 500 萬英鎊在印度所能購買到的勞動數量，在英國要用 3 億英鎊才能買到。有人會問我：印度人的勞動價值是多少？我就說：如果印度人的勞動一天只值 2 辨士，那末很明顯我們就不能期望他繳納如果他的勞動值 2 先令時那樣多的捐稅。在大不列顛和愛爾蘭我們有 3 000 萬人口；在印度則有 15 000 萬居民。在國內我們征收 6 000 萬英鎊的捐稅；在印度，按人口的日勞動推算，我們要征收 3 億英鎊稅款或者說征收的稅款為我們在英國所收的五倍。由於看到印度人口為大不列顛人口的五倍，人們會說按人口計算印度和英國每人分攤的捐稅大致一樣，因此這種負擔不能說特別重。然而英國擁有機器和蒸汽的巨大動力，有運輸工具，有資本和人的發明能力為幫助人民的勞動而創造出來的一切。在印度完全沒有這類東西。那里甚至連一條像樣一點的道路也沒有。”

應該承認，這種把印度的捐稅與英國的捐稅相比較的方法並不完全恰當。一則印度人口為英國人口的五倍，再則印度的捐稅只為英國的一半。可是，布萊特先生說，印度的勞動大約只等於英國的勞動的十二分之一。因此印度的 3 000 萬英鎊捐稅就相當於大不列顛的 3 億英鎊捐稅，而不是相當於其实际征收的 6 000 萬英鎊。那末布萊特應該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考慮到印度居民比較貧困的話，印度人民按人口比例和大不列顛人民繳納着同樣多的捐稅；因此 3 000 萬英鎊對於 15 000 萬印度人的負擔正如 6 000 萬英鎊對 3 000 萬不列顛人的負擔一樣。但是在這種前提下，他如果說窮人繳不起和富人一樣多的捐稅，當然是錯誤的，在證明印度人繳納的捐稅與不列顛人一樣多的

时候，已經把印度人民比較貧困的情况考虑进去了。实际上这里会产生另外一个問題。試問按公道來說，能不能指望一个每天賺 1 角 2 分錢的人繳稅 1 分錢和每天賺 12 元錢的人繳稅 1 元錢同样容易？按比例來說，他們兩人都交出了自己收入中的同样的一份，但是这一捐稅對他們的生活需要的影响，程度却完全不同。可是布萊特先生至今沒有这样提出过問題；其实，要是他这样做的话，那末把不列顛雇佣工人負擔的捐稅和不列顛資本家負擔的捐稅加以比較，可能会比用印度和不列顛的捐稅相比較显得更加清楚，更加令人信服。此外，他本人承认，應該从 3 000 万英鎊的印度稅款中扣除从鴉片貿易中所得的 500 万英鎊收入，因为，实在說，这笔收入不是印度人民所負擔的捐稅，而倒是中国消費者所負擔的出口稅。其次，英印政府的辯护者們又提醒我們說，政府收入中有 1 600 万英鎊是来自土地的收入或地租，而地租从太古时代起就屬於作为土地最高所有者的国家，从来就不是农民个人財產的一部分，因此，实际上，这也很难算作真正的捐稅，就像不列顛农民向不列顛貴族繳納的地租不能归入捐稅一样。按照这种观点，印度的捐稅總額可表示如下：

	英 鎊
征收捐稅總額.....	30 000 000
扣除鴉片的收入.....	5 000 000
扣除地租.....	16 000 000
真正的捐稅.....	9 000 000

此外，据說还必須承认，在这 900 万英鎊捐稅中，某些重要項目，如郵政稅、印花稅和海關稅，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涉及到居民大众。因此，在不久以前提交給不列顛統計协会的关于印度財政

情况的报告中，汉德里克斯先生企图根据議會及其他官方文件证明，取自印度居民的收入总额中，目前以捐稅形式征收的，即征自居民实际收入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在孟加拉真正的捐稅只占总收入的 27%，在旁遮普只占 23%，在馬德拉斯只占 21%，在西北各省只占 17%，而在孟买則只占 16%。

下面是我們从汉德里克斯先生的报告中引用的关于 1855—1856 年印度和联合王国每一居民平均所納稅款的比較資料：

	取自每一居民的收入总额		其中真正的捐稅		
	先令	辨士	英鎊	先令	辨士
孟加拉……………	5	0	—	1	4
西北各省……………	3	5	—	0	7
馬德拉斯……………	4	7	—	1	0
孟买……………	8	3	—	1	4
旁遮普……………	3	3	—	0	9
联合王国……………	—	—	1	10	0

布里格斯將軍列举了如下数字來說明其他年度各国按人口平均的稅款情况：

	英鎊	先令	辨士
英国(1852年)……………	1	19	4
法国……………	1	12	0
普魯士……………	—	19	3
印度(1854年)……………	—	3	8 1/2

根据这些数字，英印政府的辯护者們做出結論說，即使把印度居民比較貧困的情况估計在內，在欧洲也沒有一个国家的捐稅像在印度那样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关于印度的捐稅問題不仅意見有分歧，而且这些意見所根据的事实本身也相互矛盾。一方面，

我們應該承認，印度捐稅名义上的金額相当小，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从議会文件中和印度問題最大权威的著作中援引許多資料，这些資料清楚地证明，这种似乎很輕的捐稅对印度人民大众是极沉重的負擔，为了征稅不得不求助于像刑罰这样的可耻方法。可是除了印度債務的不断迅速增加和印度赤字的增大以外，是否还需要其他证据呢？当然誰也不会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宁願增加債務和赤字，是因为它不想过多地耗用居民的資財。它所以走上借債的道路是因为不这样它就不能做到收支相抵。1805年印度債務等于25 626 631英鎊，1829年約达到3 400万英鎊；1850年是47 151 018英鎊；而目前大約为6 000万英鎊。順便提一下，我們还没有把东印度公司欠英国的債務計算进去，这批債務也是要用东印度的收入来偿还的。

年度赤字（1805年約为250万英鎊）在达尔豪西勋爵管理下平均达到500万英鎊。乔治·坎伯尔先生是孟加拉的一个文职官員，对英印政府是很有好感的，然而他在1852年就不得不公开承认：

“虽然从来没有哪个东方征服者在印度取得了像我們这样充分的优势，这样平靜的、普遍的和不可爭辯的統治，但是他們所有的人都靠該国的稅收发了財，而且其中有很多人从自己的財富中拿出大笔款項来办公共設施……我們却没有这种可能性…… 虽然捐稅总額〈在英国統治时期〉毫未减少，然而我們却没有剩余。”

在估計捐稅負擔时，應該考虑的主要不是它的名义上的數額，而是捐稅的征收方法和使用方法。印度的征稅方法极为可恶，譬如就土地稅來說，在現行的方法下，大概糟蹋的产品要比收获的为多。至于說到征收来的捐稅的使用情况，那末只要指出以下两点

就够了；它沒有拿出一絲一毫來以公益設施的形式還用于人民（這種公益設施對亞洲國家比對任何地方都更加必不可少），再就是如布萊特先生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統治階級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印度那樣大發其財。

卡·馬克思寫于 1858 年 6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于 1858 年 7 月 23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383 號

## 弗·恩格斯 印度軍隊<sup>372</sup>

印度的战争正在逐渐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的阶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sup>①</sup>，这是必将面临的和最危险的一个发展阶段。起义者在正规战、在城市和营垒防御战中接连失败后，逐渐化为一些从2000人到6000或8000人的比较小的队伍，每一支小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行动，但也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对任何可以单独予以奇袭的英军部队进行短促的战斗。在科·坎伯尔爵士的野战军战斗部队被引出勒克瑙大约80英里以后，巴雷利未经战斗就弃守了，这是起义者的主力在这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卡耳皮的弃守对于土人的第二支大队伍，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两种情况都是把最后可以防守的中心作战基地放弃了，因此全军作战已不可能，起义者就分成许多较小的队伍，向四面退却。这些机动的队伍并不需要大城市作为中心作战基地，他们在所到的各个地区有办法弄到生存资料、补充弹药和增添新兵；而且，一个小城镇或大村庄，对于每一支小队伍来说都可以成为整顿队伍的中心，其价值正如德里、勒克瑙或卡耳皮对于较大的军队一样。经过这样的变动，战争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起义者各支队伍的行踪无法详细了解，

<sup>①</sup> 見本卷第389、500—501、523—525頁。——編者注



而有关的情报也很混乱；英軍指揮官的作战行动几乎无法加以批評，因为这些行动所依据的前提根本就是模糊的；胜败成了唯一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无疑是最能騙人的。

土人行踪不定的这种情况現在已經很严重。勒克瑙被攻占以后，他們向四面八方退却，有的往东南，有的往东北，有的往西北。最后一支队伍最强，被坎伯尔一直追到罗希尔汗。他們在巴雷利集中，进行了整頓，但是当英軍赶到时，他們沒有抵抗就放棄該地，又向不同的方向撤退了。关于撤退的各条路綫，現在是詳情不明。我們只知道一部分人撤往尼泊尔边境的山岳地带，同时有一支或几支队伍似乎是向相反的方向推进，前往恒河和达普（即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域）。但是，坎伯尔剛剛占領了巴雷利，原来向东撤退的起义者就立即与奥德边界的几支队伍会合起来，襲击了有少数英軍警备部队留守的夏賈汉普尔；这时又有其他的起义队伍沿着这个方向赶来。总算警备部队运气好，琼斯准将带着援兵在5月11日就赶到了并击败了土人，不过土人也得到了向夏賈汉普尔集中的队伍的支援，于15日又包圍了这个城市。同一天，坎伯尔留下一支警备部队防守巴雷利，自己率兵前去解圍，但是直到5月24日他才对起义者发动进攻，并击退了他們，而参加这次联合行动的各支起义队伍又向不同的方向散开了。

当坎伯尔在罗希尔汗边界这样作战的时候，霍普·格兰特將軍在奥德的南部带着自己的部队东奔西跑，这除了使部队在印度的炎炎夏日之下疲憊不堪而遭到折損以外，毫无結果。对他說来，起义者是太神速了。他們到处都是，只是在他要去搜寻的地方就没有了；当他以为可以在前面碰上他們时，他們早又繞到了他的背后。順恒河而下，在第納普尔、賈格迪斯普尔和布克薩尔一带地

区，路加德將軍也跟在这样的影子后面追来追去。土人使他不停地奔波，在把他誘离賈格迪斯普尔以后，就突然向該地的警备部队襲击。路加德又赶回去。接着就有电訊报道說，他已于26日获得了胜利。这些起义者的战术和奥德、罗希尔汗的队伍的战术完全相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路加德所获得的胜利未必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样的队伍能够經得起多次失敗而不致于丧失士气和兵力。

这样，到5月中，印度北部所有的起义部队都放棄了大規模的战争，只有在卡耳皮的軍隊除外。这支軍隊用比較短的时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作战中心。他們有大量的粮食、彈药和其他儲备，有許多火炮，甚至还有鑄造厂和步枪制造厂。虽然这支軍隊和康波尔的距离不超过25英里，坎伯尔却不去惊动他們；他只是派兵在朱木拿河靠达普那一岸即东岸監視着他們。罗斯和惠特洛克將軍早已向卡耳皮进军；最后，罗斯終於到达，在卡耳皮前沿陣地附近經過多次交鋒才把起义者打敗。同时，在朱木拿河对岸監視的队伍开炮轰击城市和要塞；起义者突然撤守，把他們最后这一支大軍分成若干独立的队伍。根据現有的报道，还完全弄不清楚他們所選擇的路綫；我們只知道有些队伍前往达普，另一些队伍到瓜廖尔去。

于是，从喜馬拉雅山脉到比哈尔和文迪亚山脉，从瓜廖尔和德里到果腊克普尔和第納普尔，整个地区都布滿了活跃的起义队伍。他們由于有了十二个月的作战經驗而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組織性；他們吃过不少敗仗，但是每一次敗仗都还不能决定大局，英軍只是占了一些小便宜，因而他們仍然斗志昂揚。的确，他們所有的据点和作战中心都失敗了，大部分儲备品和大炮都損失了，重要的城市

全落在敌人的手里。但是另一方面，英軍在这一大片地区内所占領的仅仅是一座座城市，而在曠野地带所占領的也只是他們的机动部队偶然停駐的小块地方；英軍不得不追击机警灵活的敌人而又毫无希望赶上他們；英軍被迫在一年当中最致命的季节采取这种疲于奔命的作战方式。当地印度人能够比較自如地經受本国夏季正午的炎热，而欧洲人单单是呆在烈日下就几乎要送命；印度人在这种季节能够每日行軍 40 英里，而他們北方的敌人走上 10 英里就吃不消了；对于印度人，甚至热带的霪雨和潮湿的密林都沒有多大害处，而欧洲人在雨季或潮湿地带只要一劳累，痢疾、霍乱和瘧疾便跟踪而来。我們現在沒有关于英軍卫生状况的詳細材料，但是根据罗斯將軍部队中暑人数和被敌人杀伤人数的比例数字，根据关于勒克瑙警备部队中疾病流行、第三十八团在去年秋天开到时有 1 000 多人而現在几乎不到 550 人这份报告，再根据其他一些迹象来看，我們可以断定 4 月和 5 月的夏季酷热，已經在那些为了頂替去年在印度参加战役的晒得黝黑的老兵而于最近派去的青壯年中間奏效了。以現有的軍队，坎伯尔无法举行哈弗洛克式的强行軍，也无法在雨季展开一次像圍攻德里那样的攻城战。尽管英国政府又在派遣强大的援軍，但他們能否补足在今年夏季战局中所受的損耗是令人怀疑的事情，在这次战局中英軍所遇到的是除非在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不肯交鋒的敌人。

起义者的战斗行动現在开始有点像阿尔及利亚的貝都英人在反抗法国人时所采取的行动了，不同的是，印度人远不是那样狂热，并且不是善于騎馬的民族。后面这一点在一个拥有广闊平原的国家里是很重要的。起义者中間有許多伊斯兰教徒很可以組成优秀的非正規騎兵队；可是到目前为止印度那些擅长騎馬的主要

民族还没有参加起义。起义军队的主力是步兵，可是这样的兵种不适于在旷野同英军作战，成为平原游击战争的累赘，因为要在这种地方进行游击战，主要是靠非正规的骑兵。起义者趁英军在雨季被迫休战的时期能把这个缺陷弥补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段休战时期给土人以整顿和补充兵员的充分机会。除了组织骑兵以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冷天一到，只靠游击战是不行的，必需建立起作战中心，要有储备品、大炮以及营垒或城市，以便使英国人在冬季结束以前闲不下来；否则，游击战等不到明年夏天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就要熄灭了。瓜廖尔看来是对起义者有利的据点之一，要是他们真的占据了它的话。其次，起义的成败决定于起义能否扩大。如果分散的队伍不能设法穿过罗希尔汗进抵拉吉普坦纳和马拉提人地区，如果他们的行动仍然局限于北部中央地区，毫无疑问，只要今年一个冬天，就会使这些队伍溃散，并且成为盗匪，他们很快就会甚至比白面孔的侵略者更引起居民的憎恨。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7月6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7月21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81号

## 卡·馬克思 关于印度的法案<sup>373</sup>

关于印度的最近一項法案已在下院三讀通过，既然处于得比影响下的上院未必会反对這項法案，东印度公司的命运可以說已經决定。应该承认，公司决不是像英雄那样死去；但是它已将自己的权力，以它取得时的那种方式，即一点一滴地，通过巧妙的交易变卖出去。实际上，它的全部历史就是一篇买进卖出的故事。它以买进主权开始，而以卖出主权告終。它不是在决战中倒了下去，而是在拍卖人的木槌声中落到了出价最高的人手里。1693年，公司由于給里子公爵和其他国家官員付了大批款項，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張为期二十一年的特許状。1767年，它由于答应每年向帝国国庫繳納40万英鎊，而使自己的权力延长了两年。1769年，它又成交了同样的一笔为期五年的交易；但是此后不久，由于国庫放棄所規定的每年納款并且向它提供了利率四厘的140万英鎊貸款，它让出了自己主权的某些部分，即第一次将总督及其四个参事的任命权移交給議会，完全让国王来任命最高法官及其所屬的三个法官，并同意将股东会由民主机关变成寡头机关<sup>374</sup>。1858年，东印度公司在向股东会庄严保证了要用宪法所許可的一切“手段”来反对将自己的行政权力移交給国王之后，自己却接受了这个原則，并且同意了一个对公司不利、但却为其主要董事們保证了收入和

职位的法案。如果像席勒所說的那樣，英雄的死犹如太阳落山<sup>①</sup>，那末东印度公司的下場更像是破产者与其債权人签定的協議。

根据上述法案，主要行政职权移交給印度事务大臣及其参事会<sup>375</sup>，就如在加尔各答管理事务由总督及其参事会执掌一样。但是这两个官員，即在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和在印度的总督，同样有权不顾其助理們的建議而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新法案将目前由督察委员会主席通过机密委员会所行使的一切权力，即在非常情况下不征詢参事会的意見徑向印度发出指示的权力，也授予印度事务大臣。在組成这个参事会时，它的人选除由国王任命的以外，終究不能不依賴东印度公司作为唯一现实的来源。参事会中由选举产生的参事，均应由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們从他們自己当中选出。

这样，东印度公司的名称終究注定比它的实质命长。得比內閣在最后一分钟承认，內閣的法案不包含董事会所提出的廢除东印度公司的条款，但是今后該公司的性质将同最初一样是一个股份公司，分配各种立法決議所保障的股息。1784年的皮特法案实际上已以督察委员会的名义使公司的政策服从于內閣的权力。1813年的法令取消了公司的貿易壟断权（对中国的貿易壟断权例外）。1834年的法令使公司彻底失去了一个商业机构的性质，而1854年的法令則消灭了它的权力的最后殘余，但是它仍保留着对印度的行政管理。历史在重演：1612年变成股份公司的东印度公司，重新获得了其最初的形式；只是現在它是一个沒有貿易的貿易公司和沒有經營資本而只有取得定息权利的股份公司罢了。

---

① 席勒的剧本“强盜”第三幕第二場。——編者注

关于印度的法案产生的經過，比現代議會立法的任何其他法令都更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当西帕依开始起义的时候，英国社会的一切階級都大声疾呼要求在印度实行改革。有关印度刑罰的消息在人民中間引起了强烈的激憤；在印度供职的高級軍官和高級文官公开譴責了政府干涉当地人民的宗教事务。不过是唐宁街工具的达尔豪西勋爵所执行的貪婪的兼并政策；由帕麦斯頓本人授意在波斯和中国挑起和进行的海盜式战争在亚洲居民心中所貿然引起的动乱；他为鎮压起义所采取的軟弱措施——运送軍队用帆船，而不是用輪船，并且是繞道好望角，而不是經過苏伊土地峽，——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不滿情緒的增长，而使得公众大声疾呼地要求在印度实行改革，改革公司对印度的行政管理，改革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帕麦斯頓支持了人民的这一要求，但是决定利用它来純粹为他本身的利益服务。既然政府和公司都丢尽了臉，那就應該牺牲公司，而使政府成为全能的东西。公司的权力應該干脆移交給現今的独裁者。这位独裁者企图既代表王权与議會相抗衡，又代表議會与王权相抗衡，从而把双方的特权集中于一身。依靠印度軍队，掌握印度国庫，把在印度的官員的任命权攫为己有，帕麦斯頓就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絕难攻破的陣地。

他的法案經過第一讀就順利地通过了，但是他的前程却由著名的取締陰謀活动法案，继之是托利党的上台所断送了。

托利党在正式回到內閣的头一天就声明，为了尊重下院坚决提出的要求，他們不再反对把印度的管理权从公司移交給国王。埃倫伯勒勋爵立法上的失敗看来已在使帕麦斯頓迅速重掌政权；但是这时約翰·罗素勋爵却插手进来慫恿独裁者妥协，并建議把印度法案当做是由議會提出，而不是由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以此

挽救了政府。于是帕麦斯顿就急忙起来利用埃倫伯勒勋爵关于奥德的电报,利用他的突然辞职和由此引起的內閣內部的混乱,以謀私利。托利党在把自己短暫的全部执政时期都用来摧毁本党对沒收东印度公司的反抗之后,又要被打入反对派的冷宮。但是人們已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帕麦斯顿未能在东印度公司的廢墟上东山再起,反而葬身在它下面。在辯論印度問題的整个期間,看来下院特別得意的是百般地侮辱这位 *civis romanus* [羅馬公民]<sup>376</sup>。所有他的大大小的修正案都遭到丢人的否决;人家时常当着他的面以令人最不愉快的冷言冷語談到阿富汗的战争、波斯的战争和中国的战争;而格萊斯顿先生关于取消印度事务大臣在印度以外发动战争的权力的提案(这一提案等于是对帕麦斯顿过去执行的全部对外政策的不信任表决),尽管遭到帕麦斯顿的强烈反抗,仍然以絕大多数票通过。但是,虽然这个人被抛开了,他的原則大体上却仍在生效。由于对印度的正式兼并,行政权尽管受到印度事务参事会(实质上它只是前董事会的高薪的幽灵)有抑制性权力的某些限制,仍然被提高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为了与这一权力取得平衡,必須在議会的天平上放上民主的砝碼。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7 月 9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7 月 24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38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 1940 年

“无产階級革命”杂志第 2 期



## 卡·馬克思 布尔韦尔-利頓夫人的囚禁

1858年7月23日于倫敦

轰动一时的布尔韦尔家庭糾紛，在倫敦“泰晤士报”看来，已經通过友善的家庭協議而得到“圓滿”解决，但实际上还远沒有平息下来。的确，尽管这场糾紛严重地涉及党派利益，首都各家报纸，除极少数外，都用尽一切办法通同一气保持緘默，以图暗中了結这一事件。要知道，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是那控制着倫敦新聞界的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橫，当事情鬧到公开斗爭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們一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晨邮报”第一个披露了布尔韦尔夫人的友人有意要求法庭审理的消息；倫敦“泰晤士报”仅仅轉載了“晨邮报”的这条簡訊；就連在文化界沒有地位因而完全不必为此担心的“晨报”，也只敢轉載“索美塞特报”<sup>377</sup>上的三言两語的报道。甚至帕麦斯顿，尽管有势力，一时也不能从他的文化界走卒那里挤出什么东西来；当布尔韦尔的儿子写的那封敷衍塞責的檢討书发表出来以后，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人身自由捍卫者都表示滿意之至，不願意再莽撞地干涉这一“沉痛事件”。托利党的报纸自然早就把自己滿腔高貴的怒火发泄到克兰里卡德勋爵身上，而多少受到曼彻斯特学派精神熏陶的激进派报纸，則唯恐給当今政府惹麻煩。可是，除

了正派的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并竭力抓紧一切机会在公众眼前显示自己是勇敢精神的唯一体现者。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本能一经激发，也就没有必要再耍花招了。只要激起了公众的义愤，那时就连伦敦“泰晤士报”也会撕下矜持的面具，并且（当然是抱着沉痛心情），把“社会舆论”的判决甚至加到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頓爵士这样的文化把头身上，借此打击得比政府。

目前事态的演变正是这样。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暗示过的<sup>378</sup>，帕麦斯顿勋爵是这场戏的幕后导演；用法国人的话来说，现在这已经是«un secret qui court les rues»〔“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伦敦一家周刊写道：“On dit〔据传〕，在整个事件中，为布尔韦尔-利頓夫人出力最多的是帕麦斯顿夫人。我们都记得，当墨尔本勋爵因那位诺尔顿绅士的夫人而处于尴尬境地的时候，托利党人是多么急切地出来替诺尔顿先生说话啊。一报还一报，这是公道的。但是细想起来，我们觉得这样的事很令人痛心：在我们这个时代，内阁大臣竟利用自己的权势干出暴力行为，而一位内阁大臣的夫人竟唆使另一位内阁大臣的夫人去反对政府。”

事情的真相常常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政治倾轧方式才能在英国报端的一个角落里透露出来。对于一件真正的凶恶行为所持的似乎出自内心的义愤，归根到底不过是别有用心装的腔作势；呼吁社会主持公道不过是为了发泄私愤。至于那些大无畏的舞文弄墨的骑士，则不论布尔韦尔夫人是永远呆在伦敦的疯人收容所里，还是被人家比在圣彼得堡或维也纳更加巧妙、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地收拾掉，实际上他们都是毫不在乎的；要不是她运气好，被帕麦斯

頓一眼看中，认为可以借她来作为分裂托利政府的工具，文化界因襲守旧的礼仪是会使她沒有任何可能进行申述的。

約略研究一下布尔韦尔的儿子給倫敦报界的信，很有助于說明事情的真相。罗伯特·布尔韦尔-利頓先生首先声明，对他的“老实话”應該“深信不疑”，因为他“作为布尔韦尔-利頓夫人的儿子，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出来保护她，自然，对全部情况也比其他人了解得更真切”。但是这个孝子不仅不关心他的母亲，不仅不同她通信，甚至将近十七年沒有见过她的面，而在他父亲被重新选入議会的哈特福的选民会上才同她相会。当布尔韦尔夫夫人离开选民会，到哈特福市长那里去向他借用市政厅大厦做讲演会场时，罗伯特·布尔韦尔-利頓先生派了一位医生到市长公館去檢查他母亲的精神状态。后来，他母亲在倫敦克拉哲斯街黑耳·湯普逊先生家里遭到綁架，她的堂姊妹萊夫斯女士跑到街上，看到利頓先生等在外面，就央求他管一管这件事，不要让別人把他母亲送到布倫特弗德去，这时利頓先生竟无动于衷地說，这与他不相干。起初他是他父亲所策划的阴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現在他又改变了立場，出来做他母亲的当然保护人了。利頓先生为自己辯护所寻找的第二点依据是，他母亲“根本沒有被送进瘋人收容所”，而只不过是送进了医生罗伯特·加丁納·希尔先生的“私立病院”。其实这不过是詭辯。由于希尔先生管理的魏克病院按照法律并不屬於“收容所”之列，而屬於“首都官准私立瘋人病院”之列，因此，說布尔韦尔夫夫人不是被关进“瘋人收容所”，而是被关进了瘋人病院，这从表面上看是完全正确的。

靠“精神錯乱症”吃飯，自担風險的希尔医生也出来辯解，他說：布尔韦尔夫夫人完全沒有受到禁閉，相反地，她可以使用馬車，而

且在她被迫留住期間，几乎每天晚上都乘車到里士滿、阿克頓、汉威耳或艾茲卢艾尔特去散心。希尔先生忘記告訴公众，他实行的这种“对瘋人的改良待遇”完全符合精神病委员会的明文規定。装模作样的亲热、耐着性子的笑臉、哄小孩般的劝导、曲意逢迎的廢話、机巧投递的眼色、一群訓練有素的护理人员故作鎮靜，——这一切，都像灌水法、紧束衣、粗暴的監視人和黑暗的病房一样，能有效地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逼瘋。不論怎么說，医生希尔先生和利頓先生的声明簡單归結起来就是，他們的的确确是把布尔韦尔夫人当成瘋子，只不过对她使用的是新办法，而不是旧規矩。

利頓先生在他的信中说：“我经常同我母亲保持接触……而我是遵照我父亲的吩咐办事的，他总是把他的一切打算完全告訴我……他要我照舍夫茨別利勋爵的主意去做，只要这能給利頓夫人带来好处和安慰。”

誰都知道，舍夫茨別利勋爵是总部設在埃克塞特会堂<sup>379</sup>的那班人馬的总头目。用他的神圣香味来驅散骯髒勾当的臭气——这是配得上小說家的天才想像的 *coup de théâtre* [戏剧手法]。舍夫茨別利勋爵已經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被派过用場，例如中国問題和劍桥館密謀。但是利頓先生对公众只交代了真相的一半，不然的話，他就得坦白說出，就在他母亲被綁架以后，帕麦斯頓夫人的一封命令式的来信推翻了爱德华爵士的計劃，并要他“照舍夫茨別利勋爵的主意去做”。这位舍夫茨別利勋爵偏偏又是帕麦斯頓的姻兄弟，同时也是精神病委员会的主席。为了让公众感到神秘，利頓先生又接着說：

“我的父亲自从不得已而同意使用那些为許多人曲解的办法时起，就极力征詢最有經驗和最权威的医生的意見，以求对我母亲的自由的約束絕不超出絕對必要的期限。他对我的囑咐就是这样的。”

从这一整段硬編出来的笨拙的遁辞中可以看出，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之所以需要权威医生提供意見，似乎不是为了把他的夫人作为瘋子隔离起来，倒像是为了把她作为 *mentis compos* [精神正常的人] 来恢复她的自由。事实上，同意綁架布尔韦尔夫人的那些医生，絕不是什么“最有經驗和最权威的医生”。爱德华爵士雇来的人里面，有那么一位罗斯先生，他是倫敦的一个药商，显然是由于获准經售药品而一跃为精神病名医；还有一位黑耳·湯普逊先生，他曾同韦斯明斯特病院有点往来，但同科学却一点关系也沒有。只是由于外来的温和的压力，爱德华爵士着了慌，感到必須让步时，他才去找医学界真正著名的人物。他的儿子发表了他們的证明书，可是他們证明了什么呢？布尔韦尔夫人的法律顧問們早就請教过的那位“心理学医学杂志”<sup>380</sup> 編輯福布斯·温斯劳医生宣称，“檢查了布尔韦尔-利頓夫人的心理状态以后”，他认为“完全可以不再限制她的自由”。需要向公众证明的不是可以恢复布尔韦尔夫人的自由，相反地，是剥夺她的自由是否合法。利頓先生就是不敢接触这个問題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微妙的一面。如果一个巡警被控非法扣押了自由的英国人，而他竟說，他已經恢复了被押者的自由，因此自己沒有做錯事，他把这作为理由来替自己辯解，岂不令人好笑？但是布尔韦尔夫人真的恢复自由了嗎？

利頓先生接着說，“我的母亲**現在住在我这里**，她的行动不受限制。她自己願意同我、还有她自己選擇的一位女伴和亲戚做一次短期旅行。”

利頓先生的信上注明的是“公园街 1 号”，即他父亲在市內的住址。这不就是說他們已經把布尔韦尔夫人从布倫特弗德的拘禁处轉移到倫敦一个新的拘禁处，完全把她送到凶狠敌人的掌心中去了嗎？有誰保证她的“行动不受限制”呢？至少，她在交給她的

和解书上签字时不是自由的，而是在經受着希尔医生的改良治疗法的折磨。这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德华爵士讲话的时候，布尔韦尔夫人总是沉默的。虽然人們都知道她长于文字，可是公众沒有見到过一篇她所写的声明。她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的报告，却被人巧妙地从接到这份报告的人那里弄走了。

不論他們夫妇之間目前取得了什么样的協議，英国公众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問題：能以重金收买两个貪財医师的无耻闊人有没有权利在瘋人待遇法的掩盖下发出 lettres de cachet [拘捕令]？还有一个問題：能不能听任一个內閣大臣用简单的家庭和解来了結一件昭然若揭的罪行？不久以前揭露了一件事：今年精神病委员会在約克郡調查一个收容所时，发现有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被秘密地关在地窖里已經有好几年了。沃尔波尔先生在答复菲茨罗伊先生在下院就这件事提出的問題时說，他沒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件事的記錄”；这样他只是否认記錄的存在，但沒有否认事实。事情不会就此了結，这从泰特先生的声明里就可以看出。泰特先生的声明表示：“議會下届会期一开始，他就要提議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調查如何使用瘋人待遇法的問題。”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7 月 23 日

載于 1858 年 8 月 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39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英国瘋人数目的增加

英国社会史上恐怕找不出比现代财富和赤贫现象相应增长这一点更确凿无疑的事实了。有趣的是，这条规律大概对疯人数目也适用。大不列颠疯人数目的增加不下于出口额的增长，而且超过人口的增长。下面是一张引自 1852 年、1854 年和 1857 年关于贫民、疯人和痴呆者的年度报告<sup>381</sup> 的对照表，它清楚地说明，在 1852 年至 1857 年商业空前繁荣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疯人数目迅速增大：

日 期	人 口	各郡、 市瘋人 病院病 人	官准私 立瘋人 病院病 人	习艺所 收容瘋 病患者	由亲友 等照管 者	瘋人和 痴呆者 总数	瘋人、痴 呆者人数 同总人口 的比例
1852 年 1 月 1 日	17 927 609	9 412	2 584	5 055	4 107	21 158	1:847
1854 年 1 月 1 日	18 649 849	11 956	1 878	5 713	4 940	24 487	1:762
1857 年 1 月 1 日	19 408 464	13 488	1 908	6 800	5 497	27 693	1:701

1856 年年底，急性的和可以医治的病症数目同慢性的和显然不可医治的病症数目的比例略低于 1:5。这从下列的官方报告可以看出：

	各类精神病患者	經診斷认为 可以医治者
各郡、市瘋人病院……………	14 393	2 070
医院 ……………	1 742	340
首都各官准私立瘋人病院 ………	2 578	390
地方私立瘋人病院 ……………	2 598	527
总 計 ……………	21 311	3 327
經診斷认为可以医治者 ……………	3 327	
經診斷认为不可医治者 ……………	17 984	

为了收容各种各样的和不同程度的瘋人和痴呆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設有 37 个公立收容所，其中 33 个分設在各郡，4 个設在城市；还有 15 个医院、116 个官准私立瘋人病院，其中 37 个設在首都，79 个分設在外地；最后还有习艺所。公立瘋人收容所或一般所称的瘋人病院，按照法律規定，是为收容居民中貧苦阶层的瘋病患者而专门設立的，应当是能够进行适当的医疗工作的診所，而不仅仅是隔离瘋子的地方。大致可以认为，至少在各郡，这些收容所是按正規原則建立的机构，虽然由于过分龐大而无法保证适当的管理；它們都挤得很滿，不是严格地根据病情来分別对待病人；而且它們所能收容的只比貧苦居民中全部瘋病患者的半数略多一些。归根到底，这 37 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收容所按其面积來說总共只能容納大約 15 690 个病人。这些收容所是如何赶不上精神病患者的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說明。1831 年，当可以容納 500 个病人的汉威耳瘋人病院（在密多塞克斯郡）修建起来的时候，都以为它可以滿足全郡的需要。可是过了两年，这所瘋人病院就已經滿員；又过两年，該院不得不扩充，以便再容納 300 个病人；而現在（虽然这一时期內又修建了一所科尼·海奇瘋人病院来安插



該郡的 1 200 名貧民瘋病患者)，汉威耳瘋人病院收容的病人已在 1 000 人以上了。科尼·海奇瘋人病院是在 1851 年開設的；不到五年就不得不向納稅人要錢來修建新的收容所；最近的調查報告表明，1856 年底，該郡居民中已有 1 100 名以上的貧民瘋病患者在這兩個瘋人病院中都得不到安置。一方面，現有的瘋人病院太龐大了，以致無法使它們維持正常的狀態，而另一方面，它們的數量又太少，趕不上精神病的迅速增長。首先必須把瘋人病院嚴格劃分為兩類：不可醫治的病人的收容所和可以醫治的病人的醫院。把不可醫治的病人和可以醫治的病人混合收容，兩者都不能得到應有的護理或治療。

官准私立瘋人病院一般是為比較有錢的病人設立的。但就是這些“安樂窩”（它們的老板都喜欢这样称呼它們），在最近一個時期也招致了普遍的憤怒，起因是布尔韦尔夫人被强迫送进魏克病院，以及特納太太在約克的艾科姆病院遭到虐待。由於最近議會就要調查英國精神病行業的秘密，所以本題的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放在以後再談。現在我們只考察一下濟貧所以及其他地方機構按照合同托付給官准私立瘋人病院的 2 000 名貧苦瘋病患者的生活狀況。付給這些私人企業主供病人吃穿和醫療的款項，每人每周是 5 至 12 先令，而實際用於病人的費用平均是 5 先令至 8 先令 4 辨士。企業主們的心思當然是全部集中在一個唯一的目標上——從這筆菲薄款項里榨取大量收入，盡量少花錢來維持病人的生活。精神病委員會在最近的報告<sup>382</sup>中證實，甚至在那些領有相當大量的病人生活費的私立瘋人病院里，實際上也沒有提供什麼良好的生活條件，而對病人的護理則惡劣到極點。

固然，大法官有權根據精神病委員會的呈請，撤銷私立瘋人病

院的营业执照或不准它更换新照；然而在許多場合下，附近沒有公立瘋人病院或者現有的瘋人病院已經滿額，委員會不延長它們的執照期限，就得把大批貧苦的精神病患者送进各种各样的习艺所去。但是这个委員會认为，不論私立瘋人病院多么糟糕，总比让这些貧苦病人几乎毫无照料地住在习艺所里要安全些，好一些。目前住在习艺所里的瘋病患者将近 7 000 人。起初，习艺所中的瘋人收容部只是为了收容那些只需比一般人略多要一些照料而且能与习艺所中其他人相处的貧苦病人。但是由于很难給貧苦的精神病患者在設備良好的收容所中找到位置，再加上为了省錢起見，教區委員會就漸漸地把习艺所变成了瘋人病院，只是这种瘋人病院沒有照料、医疗和监护，也就是說沒有正規收容所中的病人所应享有的一切基本待遇。很多較大的习艺所里都設有瘋人收容部，收容着 40 名至 120 名病人。这都是阴森森的地方，病人住在里面什么也不能做，不能散步，沒有什么娱乐。照管他們的大半是住在习艺所里的貧民，这些人根本不适合于担負派給他們的差使。至于对不幸的精神病患者說来具有特別重要意义的飲食，則难得比习艺所里那些身心正常的人的飲食好一些。很自然，由于这一切，本来供收容患文靜精神病的貧民的习艺所，不仅使这种病人住在那里之后状况恶化，而且还可能使甚至可以及时治好的病症也变成慢性痼疾。然而对于济貧所說来，主要的是省錢。

按照法律規定，貧困的精神病患者应首先到分教區医师那里去檢查，分教區医师負責把病人的情况通知济貧所的官員；济貧所的官員应当报告地方长官；按照地方长官的命令，病人被送进瘋人收容所。实际上这些規定一条也沒有执行。貧民瘋病患者被直截了当地送进习艺所，只要他們不癲狂，就会在里面住上一輩子。精

神病委員會的委員在視察习艺所时，如果建議把所有那些可以医治的或得不到适当护理的病人轉入瘋人病院，这种建議往往都因济貧所医务人员证明該病人“无癲狂表現”而不能生效。习艺所中瘋人的生活条件如何，从最近的精神病調查報告中所举的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个報告“如实地描繪了习艺所中瘋人生活条件的一般情景”。

在諾里奇的瘋人病院里，甚至身体虛弱的病人所用的床垫和枕头都是用稻草填塞的。13間小屋都是磚地。沒有带抽水馬桶的廁所。男病人的住处取消了夜間守护。被子、毛巾、法兰絨內衣、紧束衣、洗臉盆、椅子、碟子、羹匙以及其他食具都非常缺乏。通風設備很坏。且从報告中摘引下面这一段話：

“甚至对那些在外表上初看起来能給人以良好印象的事情，也不能相信。例如，曾发现有这样的情况：骯髒的病人所使用的大多数被褥通常总是早晨收起来，白天則换上仅仅为了装样子用的比較整洁的被褥，床上鋪的是干净的床单和被子，到晚上干净的床单和被子照例收起，又鋪上污秽的被褥。”

再以布莱克本的习艺所为例：

“男人們白天在楼下所占的房間又小又矮、又暗又髒；供11名病人容身的地方有一大部分被几只笨重的椅子（病人都用皮帶拴在椅子上）以及向外伸出的大炉擋占去了。楼上女人們的房間也是拥挤不堪，其中一間兼作寢室，室內有一大块地方被隔开当廁所；床鋪一个紧挨着一个。在一間住着16名男病人的寢室里，空气悶人，臭气熏天。这间屋子长29呎，寬17呎10吋，高7呎5吋；这样，每个病人占的空間只有2.39立方呎。床垫一律都是稻草做的，連病号或臥床不起的病人所使用的都不例外。所有的枕套都很髒，上面都有铁床架子的锈痕。床鋪的整理显然主要由病人自己动手。很多病人都特別不爱干净，这主要是由于对他们缺乏应有的护理和照料。夜里用的便壶很少，只是在一大間公共寢室的中央，夜里放上一个水桶給男人們公用。散步的庭院——男女各有两处——滿地都是磚头瓦块，周圍是高牆，也沒有

长凳。这些庭院最大的长 74 呎，寬 30 呎 7 吋；最小的长 32 呎，寬 17 呎 6 吋。其中一个庭院內有一間常常用来隔离癡狂的病人的小屋。这间小屋完全用石头筑成，有一个小方洞可以透光，方洞上隔有防止病人逃跑的铁栅栏，但是却沒有护窗板和窗框。小屋的地上有一个大的稻草舖，在屋子的一角放着一把笨重的椅子。这个部門完全包給了一个卫生員和护士管理；习艺所的主管人很少过問他們的工作，对所里的这一部門根本不像对其他部門那样注意。”

我們实在不願意在这里引述委员会的委員关于有如地獄一般的倫敦圣潘克拉斯习艺所的报告。总而言之：英国絕大多数馬厩，与习艺所的瘋人病房相比，就像是客厅一样；馬厩里四条腿的牲畜受到的待遇，与貧苦居民阶层的瘋病患者受到的待遇相比，不能不說是爱护备至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7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8 月 20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407 号

卡·馬克思

##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蘭銀行法

讀者也許還記得，在 1857 年，由於首相和財政大臣於 11 月 12 日即金融恐慌最緊張的時刻自己承擔責任，命令銀行法停止生效，英國議會曾匆忙地召開了會議<sup>①</sup>。在通過不追究政府破壞銀行法的責任的議案之後，議會便馬上宣布休會，但是責成特別委員會“調查 1844 年和 1845 年的英格蘭銀行法的作用以及最近一次貿易危機的原因”。其實，這個委員會從 1857 年年初起就已開始進行工作，並且已經發表兩大冊關於 1844 年和 1845 年英格蘭銀行法的作用和後果的報告——一冊是証詞，另一冊是附錄<sup>383</sup>。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在已經開始的貿易危機重新使它恢復活動並且給它提供了“額外的調查材料”的時候，幾乎已被人遺忘。這個委員會恰好在發生巨大貿易危機之前兩個月，曾經在我們上面提到的那兩大冊報告中宣布：英國的貿易是“健康的”，它“沒有任何危險”。至於羅伯特·皮爾爵士的銀行法的作用，奧維爾斯頓勳爵曾於 1857 年 7 月 14 日在這個委員會面前大唱起這樣的贊美歌：

“由於嚴格而迅速地實現 1844 年法律的原則，一切都進行得有条理，很順利；貨幣制度變得鞏固而不可動搖；國家的繁榮無庸置疑；公眾對 1844 年

---

① 見本卷第 345 頁。——編者注

法律的明智所寄予的信任与日俱增；如果委员会想进一步实际考察这项法律所依据的原则是否正确，或了解它所保证的良好结果，那末，对委员会的适当而充分的答复就是：請看看周圍吧，看看我国目前的貿易状况吧，看看人民的丰足生活吧，看看我国所有各阶级的富裕和繁荣吧。在这样做过之后，就让委员会去决定，它是否应该取消这项已经收到这种结果的法律。”

六个月之后，这同一个委员会不得不因为政府停止了这一項法律的效力而向它表示祝賀！

这个委员会的委員中，至少有五位財政大臣和前任財政大臣，这就是：迪斯累里先生，乔·康·路易斯爵士，格萊斯頓先生，查理·伍德爵士，弗兰西斯·貝林爵士，另外还有威尔逊先生和卡德威尔先生这两个一向替英国財政部出主意的人。除了这些人以外，参加委员会的还有英国官僚政治的一切大头目。事实上委员会里有二十多个委員，集中了財政經濟方面的全部智慧。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1844年英格兰銀行法的原则；第二，发行可以随时兌換的銀行券对于貿易危机的影响；第三，最近这次危机的一般原因。我們想在这里簡要地評論一下委员会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1844年的法律禁止英格兰銀行在沒有黄金保证的条件下使銀行券发行量超出1450万英鎊，这项法律的議会教父罗伯尔·皮尔爵士和接受懺悔的牧师奧維尔斯頓勳爵，曾洋洋得意地自以为已经防止了那种在1815年至1844年期間周期地发生的金融紧张和恐慌。但是在十年中，他們的希望曾两度落空，尽管这项法律由于发现新的大金矿而获得了非常显著的、出乎意料的支持。从給委员会提供的证詞中可以看出，1847年和1857年的恐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严重，更富于破坏性。政府不得不在1847年和1857

年两度破坏銀行法，来挽救英格兰銀行和圍着它旋轉的金融界。

委员会似乎应该从以下这两个极其简单的結論中选择一个：或者政府周期地破坏法律是正确的，那末法律本身当然就是錯誤的；或者法律是正确的，那末就应该禁止政府任意破坏它。但是讀者能否相信，委员会居然会同时既认为法律必須存在下去，又认为它可以受到周期的破坏？法律的用处通常是限制政府的絕對权力。而在这里却恰好相反，把法律保存下来似乎只是为了保存行政方面繞过这一法律的絕對权力。政府那封授权英格兰銀行按照現有的保证在 1844 年法律規定的貨幣流通限額以上进行貼現和发放貸款的公函，是在 11 月 12 日发表的，但是一直到 11 月 30 日，英格兰銀行平均每天要把超过法定限額大約 50 万英鎊銀行券投入流通。11 月 20 日，非法增加的流通貨幣大約等于 100 万。在这以后，是否还需要证明，罗伯特·皮尔爵士“調节”貨幣流通的企图是多么有害无益？委员会认定“任何貨幣流通制度都不能使一个商业国家不遭受到它本身冒失从事的后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英明的意見並沒有击中要害。問題不如說是在另一方面：立法措施是否能人为地加剧只是作为貿易危机的一个阶段的金融恐慌。

委员会在为銀行法辯护时說道：

“毫無疑問，所說的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联合王国紙币流通量的变化符合于金屬貨幣流通量所据以变化的規律。絕不会有人說这个目的沒有达到。”

我們首先要指出，委员会沒有对金屬貨幣流通量所据以变化的規律表示自己的意見；原因是委员会担心它“不能得出某种沒有重大意見分歧的結論”。在以罗伯特·皮尔爵士为首的硬幣論者

看来，純金屬貨幣的流通应当随着汇兌行市而相应地减少或增加，这就是說，在行市有利时，黃金應該流入，行市不利时，黃金就應該流出。在前一种情况下，一般价格水平應該上升，在后一种情况下，則應該下降。但是如果假定价格的这种急剧波动是純金屬貨幣流通所固有的，那末約·斯·穆勒先生向委員會說，紙幣流通的目的是糾正和防止这种灾难性的变化而决不是模仿它，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事实证明，硬幣論者在推論时所依据的前提，只是他們的幻想的产物。在沒有信貸业务因而沒有紙幣流通的国家里，黃金和白銀的儲备到处都聚集在私人手里；不久以前在法国大致就是这样，在所有亚洲国家到目前為止几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这样。当汇兌行市不利，造成貴金屬外流的时候，这些儲备由于提高貼現率而被吸引出来。汇兌行市一变而有利时，多余的貴金屬又轉为儲备。無論在哪种情况下，在流通中都不会产生貨幣空缺或者貨幣多余的現象。貴金屬的流出和流入，影响私人儲备的状况，而不影响貨幣流通的状况，因此絲毫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那末，委員會替 1844 年的英格兰銀行法的辯护，硬說這項法律在金融市場緊張时期能帮助造成价格的突然波动（委員會錯誤地以为这种波动是在純金屬貨幣流通的基础上发生的），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委員會却說，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至少保证了銀行券的兌換，而这是英格兰銀行的起碼职责。委員會又补充說：

“按照 1844 年的法律規定，現在这家銀行的金庫里所保存的必要保证，比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市場緊張时期所保存的保证都要多。在 1825 年的危机时期，金屬儲备减少到 1 261 000 英鎊，在 1837 年减少到 3 831 000 英鎊，在 1839 年减少到 2 406 000 英鎊；但是它在 1844 年以后减少到的最低点是：在



1847年为8 313 000英鎊,在1857年为6 080 000英鎊。”

首先,在这些恐慌时期,銀行券的兌換之所以能够維持,并不是因为英格兰銀行拥有足以履行义务的大量貴金屬,而只是因为人們沒有要求它用黃金支付。例如在1825年,英格兰銀行发行了一鎊券才算勉强应付了挤兌現象。如果认为1847年和1857年拥有比較大量的金屬儲备只是1844年的法律的結果,那末根据同样的理由,1857年的金屬儲备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黃金涌現的情况下比1847年减少了两百多万英鎊这一事实,也应该归咎于这项法律。虽然英格兰銀行当时拥有的黃金比在1825年和1836年多一两倍,可是由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它在1847年和1857年都瀕于破产。据英格兰銀行的經理說,在1857年11月12日即財政部发表公函的那一天,銀行部的全部准备金只有580 751英鎊;当时它的存款是2 250万英鎊,其中大約有650万英鎊是屬於倫敦各家銀行的。如果沒有財政部的这封公函,只好关門大吉。提高或降低貼現率——而英格兰銀行承认,它沒有別的办法来影响貨幣流通,——这是在1844年的法律頒布以前就已采用的办法,当然也是在它廢除之后可以采用的办法。可是,英格兰銀行說,董事們希望借助这项法律来維持他們的声望,不宜于“听任他們按照自己的智慧和决心行事”。平时,在銀行法明明是一紙空文的时候,董事們希望的确行使着这项法律的假象中找到支持,而在紧迫时期,即在这项法律唯一能起作用的时期,他們却希望借助政府的命令来摆脱它。

卡·馬克思写于1858年8月6日

作为社論載于1858年8月23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40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貿易危机和貨幣流通

在政治經濟学上，也許沒有比所謂发行銀行能够通过扩大或縮減貨幣流通来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这种看法更流行的誤会了。认为銀行濫发通貨就会造成物价飞漲，只有在經過危机之后才能予以强行調整，这种看法是对任何一次危机的过分簡單化的、因而也是极受欢迎的解釋。應該了解，問題并不在于銀行是否能促使建立虛假的信用体系，而在于銀行是否能控制公众手中的貨幣数量。

恐怕未必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点，即每一家发行銀行的利益都促使它把自己发行的銀行券尽可能多地保持在流通当中。如果世界上有一家銀行，它不仅有这样的願望，而且还有实现这种願望的能力，这当然是英格兰銀行了。但是，如果我們来看一看例如从1844年至1857年这一段时间，我們就会发现，除了商业恐慌时期以外，这家銀行尽管有着通过购买公債把自己的銀行券投入市場的特权，尽管連續降低利率，也从来没有能使它投入流通的銀行券达到法定的最高限量。然而，还有另一种更令人惊異的現象。在1844年至1857年这段时期，联合王国的貿易总额大約增加了两倍。而英国在最近十年的出口額，我們知道，增加了一倍。可是，与这种貿易的巨大增长的同时，英格兰銀行的流通銀行券数目实际上却减少了，而且还在陆陸續續地减少。

請看下面的数字：

年份	出口 英 鎊	銀行券的流通 英 鎊
1845.....	60 110 000	20 722 000
1854.....	97 184 000	20 709 000
1856.....	115 826 000	19 648 000
1857.....	122 155 000	19 467 000

可見，在出口增加了 62 645 000 英鎊的同時，貨幣流通却減少了 1 255 000 英鎊，雖然在同一時期，由於 1844 年的銀行法，英格蘭銀行的分行數目增加了，與它競爭的地方發行銀行的數目減少了，而它自己的銀行券變成了地方銀行的合法支付手段。可能有人以為，由新的富裕的金產地湧來的金幣，排擠了英格蘭銀行的一部分銀行券，奪去了原來為這些銀行券佔據的流通地盤。的確，在 1857 年擔任英格蘭銀行經理的魏格林先生在下院的委員會上說道，據最權威的人士估計，黃金流通在最近六年中增加了 30%。他本人認為，全部黃金通貨目前達到 5 000 萬英鎊。但是，金幣數量的這種增加與紙幣的減少很少聯繫，像五鎊和十鎊的這種比較小額的銀行券（這是在零售貿易中和在商人与消費者的結算中唯一可以用金幣代替的銀行券），實際上反而在金屬貨幣流通量增加的同時也有所增加。下面這個表說明這種增加的比例：

年份	五鎊和十鎊的銀行券 英 鎊	對全部流通銀行券 的百分比
1845.....	9 698 000	46.9
1854.....	10 565 000	51.0
1855.....	10 628 000	53.6
1856.....	10 680 000	54.4
1857.....	10 659 000	54.7

因此,减少只限于票額較高的銀行券,即从两百鎊到一千鎊的銀行券。这种銀行券所执行的那种国内流通的职能,严格說来,是几乎完全不用硬币的。这种銀行券用得非常节省,因此尽管貿易扩大了,价格普遍提高了,小額紙币的流通量增长了,銀行券的流通量总的說来还是在逐漸减少。两百鎊到一千鎊的銀行券数量在1852年曾达到5 856 000英鎊,而在1857年下降到了3 241 000英鎊。在1844年,这种銀行券还占銀行券全部流通的26%,在1854年就只占20.5%,在1855年占17.5%,在1856年占16.9%,到了1857年則只占16.7%了。

大不列顛的紙币流通所以产生这种新的特点,是因为倫敦的股份銀行与私人銀行进行着有增无已的競争,并且因为股份銀行实行按存款付息而在手中积累了大量資金。倫敦的私人銀行家在进行了长期的然而徒劳无益的抵抗以后,不得不于1854年6月8日同意股份銀行参与票据交換所的业务,并且不久之后,最終結算就开始在英格兰銀行内部进行了。由于現在各家銀行在英格兰銀行立有戶头,每天的結算都用轉賬的办法进行,銀行家們过去用来彼此清賬的巨額銀行券就失去了广泛使用的領域,因此大部分巨額銀行券也就不再流通了。同时,倫敦所有九家股份銀行的存款,按照它們发表的报告,已經从1847年的8 850 774英鎊增加到1857年的43 100 724英鎊。因此,銀行对貿易的一般趋势和价格可能发生的影响,應該是通过它們的存款业务即信貸业务,而不是通过濫发銀行券来实现的,因为銀行并不能使銀行券的流通量甚至达到早已規定的限額。

倫敦的一家最大商号的股东斯雷特先生向下院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对每年流水达几百万英鎊的交易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

英格兰銀行的現款、黃金和銀行券参加英国貿易批发交易的数量是多么少。1856 年的收入和支出的数額只不过 100 万英鎊，收支手段的情况如下：

## 收 入

	英 鎊
各銀行的匯票和各种期限的期票·····	533 596
各銀行随时承兌的支票·····	357 715
地方銀行的銀行券·····	9 627
共 計·····	900 938
英格兰銀行的銀行券·····	68 554
黃金·····	28 089
白銀和銅·····	1 486
郵匯·····	933
共 計·····	99 062
總 計·····	1 000 000

## 支 出

	英 鎊
各种期限的期票·····	302 674
倫敦各銀行的支票·····	663 672
共 計·····	966 346
英格兰銀行的銀行券·····	22 743
黃金·····	9 427
白銀和銅·····	1 484
共 計·····	33 654
總 計·····	1 000 000

这些数字可以作为对以倫敦为中心的英国批发貿易的說明。从中可以看出，在全部收入中，以英格兰銀行的銀行券支付的还不

足 10%，而以黃金和白銀支付的只占 3%。在支出中，以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支付的只占 2%，而以黃金和白銀支付的只占 1%。另一方面，全部收入的大約 90% 和全部支出的大約 97% 都是用貿易者本人的賬款和資金支付的。

根据对紐約各銀行最近六年来的发行量的分析，我們必須得出同样的結論，即流通銀行券的数量不是銀行本身所能控制的，它們在貿易扩大和发生最終会引起崩潰的物价飞漲的同时，实际上有所减少。因此，把最近这次危机以及一般危机同濫发銀行券联系起来的庸俗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談，必須予以拋棄。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8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8 月 28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414 号

## 卡·馬克思 鴉片貿易史<sup>384</sup>

关于联軍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訂立新条約<sup>385</sup>的消息，大概引起了大大扩充貿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与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商人們在 1845 年所浮現的幻想是一样的。即使彼得堡的电訊所傳屬实，是否能够完全相信，通商口岸的数目增多了，就一定会扩大对华貿易呢？是否能够指望 1857—1858 年的战争会比 1841—1842 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結果呢？要知道，有一件事是无可置辯的：1843 年的条約，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 1847 年的商业危机。現时的这个条約也是这样，它引起人們幻想取之不尽的市場，鼓励投机事业，可能在世界市場剛剛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元的时候，又加速酝酿一次新的危机。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鴉片战争还刺激了鴉片貿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貿易受到損失，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不能迫使英国不用强制办法在印度种植鴉片和不用武力在中国推銷鴉片，那末这第二次鴉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們不想詳細讲述这种貿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一点，連英国人蒙哥馬利·馬丁都这样写道：

“可不是嗎，同鴉片貿易比較起来，奴隶貿易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摧殘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坏他們

的品格，沒有腐蝕他們的思想，沒有扼殺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後，還折磨他們的肉體；貪得無厭的摩洛哥時時刻刻都要求給自己貢獻更多的犧牲品，而充當凶手的英國人和吸毒自殺的中國人彼此競爭着向摩洛哥的祭台上貢獻犧牲品。”<sup>386</sup>

中國人不能同時既購買商品又購買毒品；在目前條件下，擴大對華貿易，就是擴大鴉片貿易；而增加鴉片貿易是和發展合法貿易不相容的，——這些論點早在兩年以前已經得到相當普遍的承認了。1847年為調查中英貿易關係的狀況而委派的一個下院委員會，曾提出報告說：

“可惜我們應當承認：近來同這個國家的貿易處於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擴大我們的交往的結果並沒有證實我們的合理的期望，自然，這種期望是以自由進入這個蔚為壯觀的市場為依據的。我們認為，妨礙這種貿易發展的，根本不是由於中國不需要英國商品，也不是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競爭；花錢買鴉片——這消耗了所有的白銀而使中國人一般的貿易遭受巨大的損失；他們不得不用茶葉和絲來支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華之友”在概括這些事實時，十分肯定地指出：

“鴉片貿易在不斷地增長。英國和美國對於茶葉和絲的需求增大，只會使鴉片貿易繼續增長；工廠主的情況是不妙的。”

一位旅居中國的美國大商人給漢特所出版的1850年1月份的“商人雜誌”<sup>387</sup>寫了一篇文章，把對華貿易的全部問題歸結如下：

“究竟哪一種貿易應該取消——鴉片貿易還是美英商品的出口貿易？”

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也正是這樣。蒙哥馬利·馬丁敘述道：

“我曾問過上海道台：在他看來，什麼才是促進對華貿易的最好辦法。他



当着英国領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說：‘別再向我們运送那么多鴉片，我們就能够购买你們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的全部貿易史給这个論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說明；但是在研究鴉片貿易对于合法貿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們要談一下这种不寻常的貿易产生和发展的概况。这种貿易，無論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轉的所謂軸心的悲慘冲突，或者就它对东西方之間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現象。

在 1767 年以前，由印度輸出的鴉片数量不超过 200 箱，每箱約重 133 磅。中国法律許可輸入鴉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鴉片納稅 3 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販运鴉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輸入鴉片的出口商。

1773 年，堪与埃芒蒂埃之流、帕麦尔之流以及其他世界聞名的毒品販子并駕齐驅的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議东印度公司开始同中国进行鴉片貿易。于是在澳門西南海灣里下碇的輪船上，建立起囤积鴉片的堆棧。但是这笔投机买卖沒有成功。1781 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滿載鴉片的武装商船駛往中国，而在 1794 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鴉片的大船停在黃埔——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黃埔比澳門更适合于做堆棧，因为黃埔被选定做堆棧以后两年，中国政府才认为有必要頒布法令，用鞭笞和枷号示众的刑罰来威吓中国的鴉片走私商。大約在 1798 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鴉片的直接出口商，可是它却成了鴉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建立了鴉片生产的壟断組織，同时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輪船被伪善地禁止經營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該公司发給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規定这些輪船不得載运非东印度

公司生产的鴉片，否則要处以罰金。

1800年，輸入中国的鴉片已經达到2000箱。如果在十八世紀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間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間的一般爭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末从十九世紀初叶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輸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鴉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鴉片变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則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員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勢，仍然安于現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騙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終于要在这样一場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則，而最現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賤买貴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創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題材。

卡·馬克思写于1858年8月31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8年9月20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433号

## 卡·馬克思 鴉片貿易史<sup>388</sup>

正因为英国政府把在印度种植鴉片的壟断权据为己有，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鴉片貿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違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懲罰以及中国海关所頒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蝕中国当局、海关職員和一般的官員。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鴉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黃埔的英国躉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虽經北京中央政府禁止而无效的鴉片貿易的規模日益增大，在1816年，鴉片貿易总額已将近250万美元。1816年在印度允許自由貿易（唯一例外的是直到現在仍然被东印度公司壟断的茶叶貿易），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走私商人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鴉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而1824年达12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抗議，同时也懲办了一些与外国商人同謀共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鴉片吸食者，并且在本国海关內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終結果，正像1794年一样，只是使鴉片堆棧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經營鴉片貿易的地点。鴉片堆棧从澳門和黃埔轉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島，在那里，具有全

副武装設備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鴉片棧。同样地，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窰口<sup>①</sup>营业时，鴉片貿易只是轉了一道手，轉到比較小的商人手里，他們不惜冒着一切危險和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貿易。在这些更有利于鴉片貿易的新条件下，鴉片貿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十年当中，就由12 639箱增加到21 785箱。

1834年，也像1800年、1816年和1824年一样，在鴉片貿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被取消了买卖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須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組为純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貿易就完全轉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們干得非常起勁，以致不顾天朝的拚命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2 500万美元的39 000箱鴉片順利地偷运入中国。这里有两件事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貿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走私的鴉片貿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对鴉片貿易的純商业性利害关系逐漸消失的同时，英印政府对这种非法貿易在財政上的利害关系却日益增加了。1837年，中国政府終於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鴉片的輸入而引起的白銀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庫收支和貨幣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許乃济，曾提議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經過帝国全体高級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討論，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貿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庫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

<sup>①</sup> 私卖鴉片烟的店舖。——譯者注

的野人当时拒絕征收一項必定会随着人民墮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稅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皇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鴉片輸入而做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結果，但仍然信守自己祖先的坚定政策。En passant〔順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鴉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締，从而使鴉片貿易得到了宗教宣傳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頂点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沒收、焚毀走私的鴉片；这成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起因，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虛，使俄国能够順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鴉片貿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英国以簽訂条約結束了旨在維護鴉片貿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虽然鴉片貿易为条約所禁止，可是从1843年起，鴉片貿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輸入中国的鴉片，总值約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鴉片壟断貿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造成第二次鴉片战争的借口的某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再作任何解釋。

在結束我們的分析时，我們不能不特別指出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鴉片走私貿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訂立禁止这种貿易的条約。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鴉片，使該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損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的萊特<sup>229</sup>种植罌粟，用貸款的办法引誘另一部分萊特也去种植罌粟。它严密地壟断了这种毒药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偵探来監視一切：栽种罌粟，把罌粟交付指定地点，使罌粟的蒸晒和鴉片的調制适合于中国鴉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鴉片装入为便于偷运而

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鴉片運往加爾各答，在那里，鴉片由政府標價拍賣，國家官吏把鴉片移交給投機商人，然後又轉給走私商人，由他們運往中國。英國政府在每箱鴉片上所花的費用將近 250 盧比，而在加爾各答市場上的賣價是每箱 1 210 到 1 600 盧比。可是，這個政府並不滿足於這種實際上的共謀行為，它直到現在還直接跟那些從事於毒害整個帝國的冒險營業的商人和船主們合伙，分享利潤和分擔虧損。

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只是依賴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正是依賴這種貿易的走私性質。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同時允許在中國栽種罌粟，這意味着英印國庫會遭到嚴重的損失。英國政府公開宣傳自由買賣毒品，暗中卻保持自己對於毒品生產的壟斷權。只要我們注意考察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幾乎可以處處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礎就是壟斷。

卡·馬克思寫於 1858 年 9 月 3 日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於 1858 年 9 月 25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438 號

## 卡·馬克思

### 現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

1858年9月7日于倫敦

數月以前，我寄給你們一系列有關穆罕默德-貝伊（班迪亞上校）企圖出賣切爾克斯人的文件<sup>①</sup>。從那時以來，切爾克西亞戰爭中的這一奇怪的事件又增添了新的一章；各有關方面的宣言和反宣言，首先是引起了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和波蘭流亡者之間的嚴重糾紛，其次是在倫敦的歐洲流亡者大本營內引起了就某些知名人士似乎與班迪亞一案有關的問題的激烈爭辯。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各種色彩和各種民族的革命流亡者對“論壇報”刊載的一切是如何感到興趣，所以我在沒有親眼看到載在君士坦丁堡各報上的、但對其真實性後來有所爭論的那幾封信的原件，從而完全證實上述案件的全部事實以前，故意沒有再提這個問題。然而，如果對那旨在阻止做進一步調查和掩蓋這一全部事件真相的怯懦伎倆不加以反對，我認為是一種失職行為。如果在革命流亡者中間有人想同俄國政府勾結，或者甚至站在像班迪亞這樣一些職業間諜一邊，那就讓他們出來說話，拿出勇氣來捍衛自己的觀點吧。

讀者記得，班迪亞的供詞和有關他的其餘文件是由在切爾克

---

<sup>①</sup> 見本卷第508—515頁。——編者注

西亚的波兰部队的中尉斯托克带到君士坦丁堡的，他为自己的上司拉品斯基上校傳送过紧急报告，当过审判班迪亚的軍事委员会的委員。斯托克中尉在君士坦丁堡逗留了四个月，以便在必須由法院进行审理时为拉品斯基对班迪亚叛卖行为的控告的正确性作证。班迪亚在其供詞中指控科苏特、施泰因將軍、图尔上校和由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流亡者的一部分人参与了他在切尔克西亚的阴谋。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波兰人在得到消息和斯托克中尉带来的文件后，沒有馬上相信班迪亚对他的同胞所提出的控告，由于怀疑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而决定将文件留了下来。他們在等待来自切尔克西亚的进一步的消息时，只在“东方新聞报”上登載了一篇关于穆罕默德-貝伊（班迪亚）的叛卖行为及軍事法庭的判決的簡訊。在这篇簡訊登出之后，有几个匈牙利人到过他們那里，其中有图尔上校，他声称这篇簡訊对他这个匈牙利人和全体流亡者來說是一种侮辱。然而当图尔看过从切尔克西亚带来的文件之后，起初他是非常无力地反駁班迪亚指控他曾亲身参与其事的說法，而后則高声地說應該把班迪亚絞死，并請波兰人派一个密使去說服塞弗尔-帕沙批准和执行軍事法庭的判決。于是他就得到波兰人的許可，把班迪亚那封劝自己的同胞不要侵入切尔克西亚并且放棄反对波兰人的任何阴谋的信带去。

“至于我們的計劃”，——班迪亚在該信中說，——“它們已彻底破灭，而我的命运正掌握在拉品斯基的手里。”

波兰人不仅把后来刊載在“論壇报”上的文件轉交給了图尔和其他匈牙利人，而且还为自己的善意另外提供了一个无可辯駁的证明。班迪亚在被判死刑后，为了博得审判官的好感和向他們证明他决心坦白招认他所知道的一切，曾向軍事法庭庭长拉品斯基



說出他的同胞为反对奥地利所做的准备工作的全部經過。他告訴他，他們拥有何种資源，說出他們設有軍械庫的城市和受托保护这些倉庫的人。波兰人馬上就告訴匈牙利人他們所面临的危險，給他們看了与該案有关的全部未发表的文件，并且为了使匈牙利人相信这些文件将永不公布，提出要当着他們的面把文件加以密封，并盖上他們自己的印章。这些文件至今存在，密封的印記也仍完整无損。参加密封文件的人有图尔、土孔尼（塞里姆-阿加）、塔尔迈尔（艾敏-阿加）和以卡耳馬尔为首的君士坦丁堡流亡者的其他首領。他們后来都在保护班迪亚的宣言上签了名。

图尔和波兰人会晤后不久，在巴黎的哈瓦斯通訊社的石印通訊上出現了一則有如下內容的电訊：

“在馬賽收到的图尔上校的一封信揭露了‘东方新聞报’关于穆罕默德-貝伊上校的叛卖行为和被判罪的謊言。”

这条簡訊曾被欧洲大部分报刊轉載。同时有几个匈牙利人向“东方新聞报”編輯部提供了来自切尔克西亚的信件，信上說穆罕默德-貝伊并未被捕，而且仍旧和塞弗尔-帕沙保持着联系。班迪亚被宣揚为自由事业的受难者；拉品斯基上校被指控有伪造和其他罪行，而在君士坦丁堡的波兰人則被說成是他的同謀者。也进行了恐吓波兰人的可笑嘗試。只是这时波兰人才在“論壇报”和倫敦“自由新聞”上公布了班迪亚的供詞及有关該案的一系列文件。这时班迪亚已来到君士坦丁堡，他前往“东方新聞报”編輯部。該报編輯們对他說，他們发表了有关他的报道，因为他們毫无根据去怀疑这一报道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班迪亚能够提出确凿证据来证明这一报道是謊傳的話，他們准备辟謊。班迪亚只能回答說这一切都是謊言，說他是陰謀的牺牲者，而后来自动談了許多有关切尔

克西亚事件的細节。当有人問他，他既是一名土耳其軍官和切尔克西亚的总司令，怎么会写一封显然是給俄国菲力浦逊將軍的，而且完全能证明对他提出的一切控告的信时，班迪亚随意应对說，他正在准备对硬說是他招认的供詞給以答复，从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关。他最后說他要在报上答复对他提出的控告；这个要求被接受了，但条件是不得在信中进行任何人身攻击。参加这次談話的有一个法国軍官，一个法国牧师和一个阿尔明尼亚政論家，他們表示願意在任何法庭上出庭作证。4月25日，班迪亚第二次去报館，把他的一封信交給了“东方新聞报”編輯部，这封信違背了約定的条件，充滿了对拉品斯基上校和伊布拉辛-貝伊的卑鄙的攻击；但是信上沒有提到斯托克中尉的名字，对班迪亚不幸的是，斯托克那时还在君士坦丁堡。这封信在按照編輯部的要求做了某些修改之后，在“东方新聞报”上发表了。下面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我是伊布拉辛-貝伊和拉品斯基先生的卑鄙陰謀的牺牲者。去年12月31日傍晚，伊布拉辛-貝伊叫到我家里去进行私人談話。我去了，身边沒有带武器。伊布拉辛-貝伊的房間里早已聚集了我的敌人，我刚一走进去就被捕了，并于当晚被押往阿迭尔比。因为我处在我的敌人們的控制之下，所以我的生命和我全家的生命都遭到极大的危險，如果不是切尔克斯人的威胁，我已被杀了。但是，切尔克西亚的領袖們终于在3月19日釋放了我，現在該輪到拉品斯基、伊布拉辛-貝伊和塞弗尔-帕沙本人发抖和請求我寬恕他們对我所做的一切恶事了。只要我的一句話，就足以叫他們掉脑袋了……至于說到截获的证明叛卖行为的文件，或者切尔克西亚領袖們和欧洲軍官举行过會議，以及什么判罪等等……所有这些有趣的細节都不过是記者——拉品斯基先生的代理人 and 应声虫的虚构……冒充記述事件經過的文件——有一份摆在你們面前——是一种捏造，一部分是由 T 先生在君士坦丁堡假造的，并得到了拉品斯基先生的认可。这是一个策划已久、在我动身去切尔克

西亞后就准备好了的阴谋。这一文件是用来损害一个知名人士的名誉和向某一大国骗取金钱的。”

“东方新闻报”刊出这封信后没有几天，班迪亚怀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动机，以他特有的厚颜无耻在“君士坦丁堡报”<sup>389</sup>上声明说，“东方新闻报”的编辑把他的信歪曲得使他不能承认是他自己写的。然而我看见过信的原件，我认识班迪亚的笔迹，并且可以证明，他所抱怨的全部修改只不过是用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代替了名字，开头增加了几句称赞“东方新闻报”编辑部报道准确的话。班迪亚的全部目的在于欺骗舆论。由于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就决意——仿佛 *re bene gesta* [万事如意] 一样——按照风行的美德保持顽强的沉默。这时伦敦报纸上出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的领导人签名的，另一个是由图尔上校签名的。那些曾经把证明班迪亚有罪的文件加以密封的人，在头一个文件上表示相信“班迪亚能够为自己辩白清楚”，假装“认为穆罕默德-贝伊的全部案件只是与他个人有关的”和“没有任何国际性的问题”；同时他们咒骂拉品斯基上校的朋友们是“存心在两个流亡团体之间散布不和的魔鬼”。在这时一变而为阿罕默德·基阿米尔-贝伊的图尔，在信中说：

“刚听说穆罕默德-贝伊到达君士坦丁堡，我就由卡巴特上尉(波兰人)陪同去见他，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报上公布的备忘录中所有的供词是否确实。他回答说，他会被阴险地逮捕起来并被送交波兰人组成的委员会审判；然而在該委员会审讯两次之后，在切尔克西亚的一支由 82 个人组成的波兰部队的指挥官拉品斯基先生来到他被囚禁的地方，对他說：他在委员会上的一切供词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而为了帮助他(拉品斯基)的计划，他(穆罕默德-贝伊)应该亲手写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事先已由拉品斯基拟好和写就。他(穆罕默德-贝伊)拒绝抄写交给他的第一份备忘录，即报上公布过的

那份备忘录。这时拉品斯基将它部分地改动了一下，弄成了第二份备忘录，他（穆罕默德-貝伊）抄写了它并在上面签了名；他是在威胁之下做这件事的，因为不然就要被枪毙，从而失去对指控进行申辯的机会，而拉品斯基是一定会用指控来玷污他死后的名声的。这一文件的原件至今誰也沒有見過。

听了穆罕默德-貝伊这一番話之后，我无法断定，两人之中誰是坏蛋。”

由此，我們清楚地看到，图尔认为，班迪亚在自己的供詞上签过名不过是出于拉品斯基的逼迫，害怕拉品斯基的威吓，而班迪亚本人却說，他的供詞是在君士坦丁堡，甚至在他动身去切尔克西亚之前就假造好了的。

当塞弗尔-帕沙的信件和許多切尔克斯人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所有这些鬼蜮伎俩終究被揭穿了。切尔克斯人的代表团訪問了“东方新聞报”的一个編輯，证实了已經公布的班迪亚叛卖行为的一切詳細情况，并表示准备当着班迪亚本人和無論多少证人的面手按可兰經发誓来证明自己的证詞的正确。然而班迪亚不敢接受这一公意审判，图尔、土孔尼、卡耳馬尔、維萊什以及其他庇护他的人也不坚持要他出面证明自己的无辜。

还在对俄战争时，法国大使图温奈尔先生，就往巴黎写信索取有关班迪亚的情报；回信說，班迪亚是一个誰給錢就为誰服务的間諜。图温奈尔先生曾要求把他驅逐出阿納帕，但是班迪亚借助科苏特的介紹信为自己作了辯白。对于我們上面談过的匈牙利宣言中呼吁各族人民亲密团結的号召，波兰人以充分的权利作了如下的回答：

“你們向我們談論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結；我們給你們看了在喀尔巴阡山峡谷中，在特兰西瓦尼亚驛道上，在蒂薩河和多瑙河平原上的这种亲密团結的榜样。匈牙利人民不会忘記这点。忘記这点的是那些在1848年投票表决数百万弗罗倫和投票贊成派1000人去反对意大利的立宪派分子，忘記这点

的是那些在1849年向俄国祈請国王的共和派分子，忘記这点的是那些正當爭取独立和自由的战争进行得热火朝天时要求把全体瓦拉几亚人民赶出匈牙利国土的国家領袖們，忘記这点的是在美洲流浪的街头演說家。他是否至少向美国人（他們过去付錢給他就同他們現在付錢給劳拉·孟戴斯或珍妮·林德一样）說过，他这个最先离开了自己的正在灭亡的祖国、最后离开这个走向苦难的浴滿鮮血的国家的街头演說家，是一位年老的將軍、英雄、波兰人——貝姆？”

为了补充我們的报道，我們把拉品斯基上校的信附在下面：

### 拉品斯基上校致……帕沙

（信的摘录）

切尔克西亚，阿迭尔比……

閣下：自从我因答应您的請求和信任您的諾言而来到这里已經快两年了。我没有必要提醒閣下，您是怎样履行了这一諾言的。我在这里沒有武器，沒有衣服，沒有金錢，甚至沒有足够的食物。

我希望所有这些不是来自閣下的某种恶意，而是由于其他原因，特别是由于您和那些同貴国利益背道而馳的人們的不幸的联系。一年来，人們硬塞給我一个最狡猾的俄国間諜。我靠上帝的帮助挫折了他的阴谋，让他知道我明白他是干什么的，現在我已控制住他。恳求閣下和匈牙利人断絕一切联系，特别是您要設法摆脱施泰因和图尔——这是些俄国間諜。其余的匈牙利人都在为俄国人服务，有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不要被各种各样的開設工厂、开采矿山和扩大貿易的計劃所欺騙。这样花費的每一文錢都是白費——而图尔先生的全部努力都放在这上面，他只希望您把錢花在既于貴国无益，又于俄国无害的方面。我們这里需要：火药制造場、鑄币机、小型印刷机、磨面机和武器，我們这里的武器不仅质量不好，而且比君士坦丁堡貴一倍；就連本地不像样的馬鞍也要比法国的軍用馬鞍多花一倍的錢。至于說到矿場，有这种想法就是很幼稚的。在这里，每一文錢都应当用来保卫国家，而不是用来进行投机。把您全部的錢財用来訓練軍隊吧；这样您不仅将有助于貴国的安宁，而且还可以加强您个人的影响。不要因为想使某一派拥护您而浪費您的錢財。目前国内的局勢表面上是平靜的，但实际上形勢却危險之

至。塞弗尔-帕沙和納伊勃<sup>①</sup> 尙未和解，这是因为俄国間諜在阻碍他們。不要吝惜您将要花在訓練这里的軍隊上的錢。錢只有这样才算花得有益处。不要去想炮。我是一个研究过炮兵的人，我很了解炮的价值。我动身前所預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起初俄国人被炮火击潰了，可是現在他們对炮火則置之一笑。在我設置兩門炮的地方，他們則設置 20 門；如果我将来沒有正規部队来保护我的大炮（而切尔克斯人不会保护它們），那末俄国人就会夺去它們，而我們自己也就会成为他們的俘虏。

还有一句話。我和我的人，帕沙，都准备为保卫貴国而献身，并且从今天起过八个月，我要把我的部队增加到 600 名射手，260 名騎手，260 名炮手，如果您能給我送来他們所必需的一切彈药和武器的話。

如果在两个月之內我什么也得不到，我就将搭船回土耳其，那末全部过錯就要落在您身上，而不是落在我身上和波兰人身上。我不打算利用切尔克斯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打算欺騙他們。如果我不能适当地為他們和我本人的事业服务，那末我就离开他們。

我已派斯托克去君士坦丁堡。我建議您把您所能給的一切都交給他，并立即将他遣回。願上帝保佑您。恳求您什么也不要拖延。一分钟也不要放过，否則您就会为損失的時間付出重大的代价。

**拉品斯基**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9 月 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9 月 23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43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① 近东和中东某些国家中首长或教长的副手或助手。——譯者注

## 卡·馬克思 \*英中条約

1842年8月29日由亨利·璞鼎查爵士簽署的、并且像一切新近与中国訂立的条約一样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訂立的中国条約<sup>①</sup>，从商务观点上看来，是不成功的；現在甚至英国自由貿易派的著名机关刊物、倫敦的“經濟学家”也承认了这一点。这家杂志曾經是不久以前发生的入侵中国事件的最积极的贊助者之一，現在它觉得自己應該“抑制一下”某些方面人士所抱的乐观期望。“經濟学家”杂志把1842年的条約对于英国出口貿易的影响，看做是“應該使我們防止錯誤行动的后果的先例”。这当然是明智的劝告。但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說明用武力扩大西洋商品在中国的市場的最初企图遭到了失敗而举出的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他說：在璞鼎查訂立条約以后的最初三年中，中国市場上由于投机而发生商品过多的現象，英国商人不注意中国需求的性质，是造成这次严重失敗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額在1836年是1 326 388英鎊，在1842年下降到960 000英鎊。它在以后四年中的不断迅速增长情况表现为下列数字：

---

<sup>①</sup> 即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締結的南京条約。——譯者注

年代	英 鎊
1842.....	969 000
1843.....	1 456 000
1844.....	2 305 000
1845.....	2 396 000

可是，到 1846 年，不仅出口額降低到 1836 年的水平以下，而且倫敦从事对华貿易的商行在 1847 年危机时期遭到的災难也证明：官方报告統計表中所列的 1843 年至 1846 年出口的計算价值同出口的**实际价值**一点也不符合。由此可見，如果說英国出口商在卖給中国消費者的商品数量上計算錯誤，那末他們在商品种类的选择上也同样有錯誤。为了证明后一种說法，“經濟学家”杂志援引了前倫敦“泰晤士报”駐上海和广州通訊員温·庫克先生的一段話：

“1843 年、1844 年和 1845 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剛剛开放的时候，英国人抱着一种难以言状的跃跃欲試的心情。設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且声明它准备給全中国供应刀类制品。这些商品的卖价几乎抵不上運費。另一家极有名的倫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鋼琴，这些鋼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类制品和鋼琴的遭遇，也光临到毛織品和棉織品，不过形式沒有那么尖銳。当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曼彻斯特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失败了。从此以后，它就消极等待，只把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

最后，“經濟学家”为了证明貿易的縮减、稳定和增长要取决于对消費者需求的考察，还从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 1856 年的材料：

	1845 年	1846 年	1856 年
精梳毛織物(匹).....	13 569	8 415	7 428
羽毛布.....	13 374	8 034	4 470



粗嗶嘰·····	91 530	75 784	36 642
毛織品·····	62 731	56 996	88 583
印花布·····	100 615	81 150	281 784
平紋棉布·····	2 998 126	1 854 740	2 817 624
棉紗(磅)·····	2 640 098	5 324 050	5 579 600

但是，所有这一切論据和例证，除了說明继 1843—1845 年之后市場过于饱和而起的反应以外，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貿易的驟增为貿易的大大縮減所代替，或者新开辟的市場充斥了剩余的英国商品，此外，向这个市場拋售商品时，对消費者的实际需要和购买力缺乏精确的估計，这种現象决不是对华貿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場历史上一种普通的現象。拿破侖垮台以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那时从英国的进口与大陆的购买能力这样大不相称，以致“由战争轉向和平”比大陆的封鎖本身具有更大的灾难性。坎宁承认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也促进了 1825 年商业危机的发生。为适应莫斯科的气候而定做的商品，当时被运往墨西哥和哥倫比亚。再說，今天甚至連澳大利亚，尽管它有巨大的潜力，也沒有摆脱一切新市場所共有的命运，那里堆滿了商品，既沒有消費者也沒有足够的支付手段来吸收它們。中国市場的特点是：自从它根据 1842 年的条約开放以来，中国的茶叶和絲向大不列顛的出口額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額，整个說来却沒有变化。这种有利于中国的繼續不断增长的貿易差額，可以說同俄国和大不列顛之間的貿易差額的状况相似；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是由于俄国施行了保护关税的政策，可是中国的进口稅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1842 年以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額，大約等于 700 万英鎊，1856 年約达到 950 万英鎊。而輸入大

不列顛的茶叶数量，在 1842 年以前从未超过 5 000 万磅，在 1856 年，大約增加到 9 000 万磅。另一方面，英国进口中国絲，只是从 1852 年起才具有巨大的意义。关于它的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出：

	1852 年	1853 年	1854 年	1855 年	1856 年
絲的进口額(磅)	2 418 343	2 838 047	4 576 706	4 436 862	3 723 693
价值(英鎊)	—	—	3 318 112	3 013 396	3 676 116

另一方面，我們現在看一看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額的变动：

年代	英 鎊	年代	英 鎊
1834.....	842 852	1836.....	1 326 388
1835.....	1 074 708	1838.....	1 204 356

关于 1842 年市場开放和英国得到香港以后的时期，我們有下列材料：

年代	英 鎊	年代	英 鎊
1845.....	2 359 000	1853.....	1 749 597
1846.....	1 200 000	1854.....	1 000 716
1848.....	1 445 950	1855.....	1 122 241
1852.....	2 508 599	1856.....	2 000 000 以上

“經濟学家”杂志企图以外国的竞争来解釋为什么英国工业品对中国市場的輸入会停滞和相对地减少，并且再一次援引庫克先生的話来加以論证。按照这位权威人士的意見，在中国市場上进行的正当的竞争使英国人在許多商业部門內遭到失敗。他說，美国人在輸出斜紋布和被单布方面胜过了英国人。1856 年，輸入上海的美国斜紋布是 221 716 匹，而英国是 8 745 匹；美国被单布是

14 420 匹，而英國是 1 240 匹。另一方面，在羊毛商品的貿易方面，似乎德國和俄國大大地排擠着他們的英國競爭者。我們不需要其他的證明，僅憑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到：無論庫克先生或是“經濟學家”雜誌對於中國市場的估計都是錯誤的。他們硬說英中貿易有它的特点，其實美國和天朝之間的貿易也帶有這些特点。1837 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超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約 86 萬英鎊。在 1842 年條約訂立以後的時期中，美國每年平均得到 200 萬英鎊的中國產品，而它以總值 90 萬英鎊的商品來支付中國產品。1855 年，上海的進口總額達 1 602 849 英鎊（硬幣和鴉片不算在內），其中英國所占份額是 1 122 241 英鎊，美國所占份額是 272 708 英鎊，其他國家所占份額是 207 900 英鎊；而上海的出口總額達 12 603 540 英鎊，其中英國所占份額是 6 405 040 英鎊，美國所占份額是 5 396 406 英鎊，其他國家所占份額是 102 088 英鎊。我們只消把美國對上海的 272 708 英鎊出口額同美國從上海得到的 500 萬英鎊以上的進口額對比一下。如果美國的競爭仍然使英國的貿易蒙受若干重大的損失，那末，這表明中國市場要容納外國的全部貿易活動是多麼有限。

人們用來說明中國進口市場自 1842 年開放以來意義不大的最後一個原因，就是中國革命<sup>390</sup>；可是，儘管發生了這次革命，1851—1852 年對中國的出口，仍然隨着貿易的一般增長而增長了，而鴉片貿易在整個革命時期，不但沒有縮減，反而迅速達到了很大的規模。然而無論如何，這是很明顯的：由於最近這次海盜式的戰爭和統治王朝遭到的新的屈辱，帝國內部的紛亂不寧對外國進口所造成的一切障礙，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我們仔細地考察了中國貿易的歷史以後得出的結論是：一般

說來，人們过高估計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購買力。在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為核心的當前中國社會經濟制度下，談不上什麼大宗進口外國貨。儘管如此，只要取消鴉片貿易，中國可以在它對英美貿易大致出超 800 萬英鎊這個數字的範圍內逐漸地吸收更多的英美商品。這是從分析下面這個簡單事實而自然得出的結論：儘管有着貿易順差，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流通却因為鴉片輸入總額約達 700 萬英鎊而陷於嚴重的破壞狀態。

然而，慣於吹噓自己道德高尚的約翰牛，却寧願用海盜式的借口經常向中國勒索軍事賠款，來彌補自己的貿易逆差。他只是忘記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羅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國人的金錢，必然會在這兩種方法之間引起相互衝突和相互消滅。

卡·馬克思寫於 1858 年 9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於 1858 年 10 月 5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446 號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貿易和金融

1858年9月14日于倫敦

我們在評論下院委員會关于1857—1858年危机的报告时，首先指出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銀行法的有害傾向，其次揭穿了所謂发行銀行只要随意扩大或縮減紙币流通就能影响一般价格水平的錯誤看法<sup>①</sup>。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問題：究竟什么是危机的真正原因呢？委員會宣称，它已“滿意地查明，英国、美国和北欧最近一次貿易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过度投机和濫用信貸造成的”。这个結論的价值，自然不会因为世人无需下院委員會的帮助就能得出它，不会因为社会从这个启示中所能吸取的一切教訓目前已經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而有絲毫减少。假定这个說法是正确的——而我們根本不想来反駁它，——但是它能解决社会問題，还是只能改变問題的提法呢？要产生空头信貸制度，总是需要有借款人和放債人这两个方面。借款人总是想利用別人的資金来做买卖，竭力使別人冒險而自己发财，——这种意图是这样明显，以致相反的意图对于我們說来簡直不可理解。問題倒不如說是在另一方面，即怎么可能在所有的現代工业国里，人們竟抵抗不住最明显的幻

---

① 見本卷第574—583頁。——編者注

想的影响，不顾每隔十年就重复一次的最严重的警告，而周期地屈从于和自己的資金分手的强烈願望呢？是什么社会条件几乎有規律地反复造成这种普遍自欺、过度投机和空头信貸的时期呢？只要我們对这些社会条件哪怕进行一次細心的观察，我們就会得出一个很簡單的結論。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社会能够控制这些社会条件，或者是这些社会条件是現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能够防止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

我們认为，不仅最近的議会报告，就連“关于1847年貿易危机的报告”以及所有以前发表的其他类似的报告，都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缺点：它們把每一次新危机都解釋成第一次在社会地平綫上出現的孤立現象，因而說它仿佛是由只为一个时期即两次震蕩之間的时期所特有的（或者被认为是只为这一个时期所特有的）那些事件、运动和因素造成的。如果物理学家也采用这种幼稚的方法，那末甚至彗星的出現也会每一次都使世人惊慌失措了。要想弄清那些左右世界市場危机的規律，必須不仅說明危机的周期性质，而且也要說明这种周期性的准确日期。此外，决不能容許每一次新的貿易危机所固有的特点遮掩所有各次危机共有的特征。如果我們要在這裡給这种研究描繪出一个哪怕是最一般的輪廓，那就会超出本文的任务。大概誰也不会反对这一点，即委员会不仅沒有解决問題，而且也未能正确地提出問題。

委员会为了說明空头信貸制度而提出的那些事实，当然并不新穎。这个制度本身，在英国是用非常簡單的方法来实现的。空头信貸是通过空头期票建立的。空头期票主要是在地方股份銀行

貼現，地方股份銀行又把它們拿到倫敦的期票經紀人那里去再貼現。倫敦的期票經紀人只注意銀行的背书，而不注意期票本身，他們所倚靠的又不是他們自己的資金，而是英格蘭銀行給他們提供的可能性。關於倫敦期票經紀人的原則，可以听听利物浦市銀行前任行長狄克遜先生向委員會敘述的這件趣聞。

“在關於整個這件事情的一次偶然的談話中，一位期票經紀人指出，如果沒有羅伯特·皮爾爵士的法律，市銀行也不致於停止支付。在回答這一點時，我說道，無論羅伯特·皮爾爵士的法律有什麼優點，我都懶得插手去幫助市銀行渡過困難，如果我知道這樣會促使現在實行的這種有害的經營制度繼續下去，接着我又加了一句，如果我在接任行長以前對市銀行的業務所了解的情況，抵得上你由於看到市銀行的大量貼現期票而應該了解到的一半，你就永遠不會看到我成為股東了。”對這點的回答是：“但是你也看不到我是股東；搞期票貼現對我說來非常有利，然而我也不同意做什麼股東。”

在胡亂經營方面首屈一指的，大概是利物浦市銀行、格拉斯哥的蘇格蘭西區銀行以及諾森伯蘭和德勒穆的地方銀行；委員會曾極其仔細地研究過它們的業務。格拉斯哥的西區銀行，在全蘇格蘭有 101 家分行，並且與美國有業務聯繫，它僅僅為了收取佣金而接受期票；它在 1854 年把股利從 7% 提高到 8%，在 1856 年又從 8% 提高到 9%，甚至在 1857 年 6 月，它的大部資金已經耗光，它還宣布股利為 9%。由它貼現的期票在 1853 年是 14 987 000 英鎊，在 1857 年增加到了 20 691 000 英鎊。這家銀行在倫敦進行的再貼現，在 1852 年為 407 000 英鎊，在 1856 年增加到了 5 407 000 英鎊，雖然該銀行的全部資本一共才有 1 500 000 英鎊；它在 1857 年 11 月破產時所有的 1 603 000 英鎊，只是麥克唐納、蒙提思、華萊士和派蒂遜這四家公司的欠款。銀行的主要業務之一，就是根據一種獨特的“保證”發放貸款，也就是：給工廠主供應資金，其保

证在于将来出售預定用这笔預支的貸款制造出来的产品。对于貼現业务的輕率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事实看出来:麦克唐納公司的期票曾有 127 个不同的人和公司承兌;可是只对 37 个的情况进行了查詢,并且关于其中 21 个的反应是令人不滿的或者是很坏的。然而麦克唐納公司的信用貸款并没有减少。从 1848 年起,銀行的賬簿上就玩弄改头換面的把戏,把債務变成了信貸,把亏损变成了资产。

在報告书中說道:“要理解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也許最好是看一看:列在另一个资产栏中的一项称做斯卡特的債務是如何勾銷掉的。这项債務共 12 万英鎊,本应列为拒付期票。但是它被用斯卡特的期票承兌人的名字分立了四五个无担保信用貸款戶头。这些戶头的貸方記他們各自承兌期票的数目,并且几个債務人保了 75 000 英鎊的人寿險。从这笔保險費中,銀行付出了 33 000 英鎊的保險費。現在这一切都作为资产記在賬簿上。”

最后,調查結果表明,銀行自己的股东还欠銀行 988 000 英鎊。

諾森伯兰和德勒穆地方銀行的全部資金只有 60 万英鎊,可是这家銀行还是把大約 100 万英鎊借給了无偿还能能力的德温特铁厂公司。虽然这家銀行的主要人物,事实上主持銀行一切事务的乔納森·理查逊先生本人并不是德温特公司的股东,但是他对于这个沒有前途的企业却极其关心,因为他可以从开采铁矿的地区收取地租。所以,这事实可以作为股份銀行的全部資本完全被行长用于私人投机目的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委员会报告中这两个揭露的实例,給股份企业的道德原則和一切事务投上了相当阴暗的影子。显然,这些制度——它們对国民經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沒有



---

为自己創造出适当的結構。它們是發展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強大杠杆，但是它們還沒有像中世紀的幫會那樣，形成自己團體的良心，來代替它們那由於組織本身的緣故而擺脫了的個人責任感。

卡·馬克思寫於 1858 年 9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8 年 10 月 4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5445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弗·恩格斯 \*印度起义

在夏季炎热多雨的月份里，印度的战事几乎完全陷于停頓了。科林·坎伯尔爵士在夏初經過一番奋战，掌握了奥德和罗希尔汗的一切重要陣地以后，非常明智地把自己的军队驻扎下来，让曠野地带留在起义者手里，而集中自己的力量維持交通綫。这个时期，在奥德只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这就是：霍普·格兰特爵士出兵夏岡季去营救經過多次推托才在不久以前同英軍讲和、而現在遭到过去的土著同盟者封鎖的土著領袖曼·辛格。这次出兵不过是一次軍事漫游，虽然中暑和霍乱也一定会使英軍遭受很大的損失。土著士兵不战而逃，于是曼·辛格就和英軍会合了。虽然这次征討的輕易取胜还不能說明整个奥德也将同样容易地被征服，但这仍然說明起义者的士气已丧失淨尽。如果說在英軍方面重要的是在热天进行休整，那末对于起义者來說重要的是尽量襲扰英軍。但是土著士兵不去組織活跃的游击战、截断敌人占領的城市之間的交通、伏击小股敌人、扰乱粮秣的征发、切断粮食的供应（沒有粮食，英国人占領的任何大城市都无法維持），反而满足于征收捐稅和安享敌人留給他們的空閑時間。不仅如此，他們之間似乎还发生了內訌。他們看来也沒有利用这几个星期的安靜時間重整自己的力量，补充彈药，补充已經損失的大炮。这次在夏岡季的潰

敗比以前任何一次失敗都更能說明，他們对自己和自己的領袖缺乏信心。同时，大多数領袖和英国政府之間都有着秘密的信件来往，英国政府终于認識到，把奥德的全部土地装进自己的口袋是相当不实际的，而情願在适当的条件下把它归还原主。这样，既然英国人的最后胜利目前已无疑义，奥德的起义看样子将不經過积极的游击战争阶段而平息下去。一旦大多数地主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起义者的队伍将立即瓦解，其中那些有充分根据害怕政府的人会成为土匪 (dacoits)，而农民是乐于协助捕捉他們的。

奥德东南部的賈格迪斯普尔密林似乎是这种土匪集聚的中心。这些难以穿越的竹林和灌木林为阿馬尔·辛格率領的一支起义队伍所占据。阿馬尔·辛格对游击战显得相当积极而有經驗；总之，他不消极等待，一有可能就去襲击英軍。如果像有人担心的那样，一部分奥德起义者在阿馬尔·辛格还没有被赶出他的据点以前就同他会合，英軍就要面临比最近一个时期更为艰巨的任务。起义队伍把这些密林作为隱蔽之处已将近八个月了，他們使加尔各答到阿拉哈巴德的干綫大道这条英軍的主要交通綫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印度西部，瓜廖尔的起义者仍遭到罗伯茨將軍和霍姆斯上校的追击。在瓜廖尔被攻占时，退却的軍队选择哪个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因为在整个馬拉提人地区和拉吉普坦納部分地区，只要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正規部队开到，形成起义的核心，看来就会立刻爆发起义。瓜廖尔部队向西南方向退却，在当时似乎是实现这一計劃最有利的机动。但是，起义者由于某些根据現有情报还猜測不出的理由，却选择了西北方向。他們向賈普尔进发，从那里向南折往烏代普尔，企图达到通向馬拉提人地区的道路。但是这

一迂迴运动使得罗伯茨乘机赶上了他们，并且不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完全打败。这支队伍的残部没有火炮，没有组织，没有弹药，也没有声望卓越的领袖，因此不大可能引起新的起义。相反地，他们携带的妨碍他们一切行动的大量抢来的财物，看来已经激起了农民的贪欲。农民杀死每一个掉队的西帕依，取走他身上的金币。情况既然如此，罗伯茨将军就可以放心地让农村居民去把这些西帕依全部驱散。辛迪亚的财宝被他本人的军队抢劫，竟使得英国人免于在一个比印度斯坦更危险的地区遇到新的起义，要知道，在马拉提人地区爆发起义会使孟买的军队受到相当严重的考验。

在瓜廖尔附近又发生了新的起义。辛迪亚的一个小藩臣曼·辛格（不是奥德的那个曼·辛格）参加到起义者方面来，并占领了不大的鲍里要塞。但是这个要塞已被英军包围，不久必定会被攻下。

这时，被征服的各州渐渐趋于平定，据传，约·劳伦斯爵士已使德里四郊完全平静下来，欧洲人可以不带武器和警卫人员而非常安全地到处游逛。其实这是因为每一个村庄的居民要对本村发生的任何罪行或暴乱共同负责；英国人组织了宪兵队；更重要的是到处实行了使东方人产生特别强烈印象的军事法庭的紧急诉讼程序。不过，这种顺利的情况看来是个例外，因为我们没有听说其他各地有类似这样的事。罗希尔汗、奥德、班得尔汗以及其他许多大省份完全平定下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还要英国军队和军事法庭做不少事情。

但是当印度斯坦的起义缩小到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时候，在和阿富汗接壤的遥远地区却发生了将来可能引起很大困难的事件。在德腊-伊斯马伊耳汉的几个锡克团里发现了刺杀军官

和起义反英的密謀。这一密謀蔓延的范围有多么广，还很难說。也許，这只是在个别錫克人集团中間发生的地方性事件，但是我們还不能断然肯定这一点。无论如何，这是极其危险的征兆。現在英軍中約有 10 万錫克人，而且我們听說过，他們是何等强悍；照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今天給英国人打仗，而明天也許就会按上帝的意旨起来反对英国人。他們勇猛、暴躁、变化无常，因此甚至比其他东方人还要容易出人意料地突然冲动起来。如果他們中間真正发生起义，那末英国人的确很难支持得住。在印度土著居民中間，錫克人一向是英国人最难对付的敌人；他們建立过相当强盛的国家<sup>391</sup>；他們屬於婆罗門教的一个特別支派，既仇恨印度教徒，又仇恨伊斯兰教徒。他們曾看到英国的 «raj» [“統治”] 岌岌可危；他們也曾为恢复它費了很大力气，而且甚至自信，他們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們产生了这种念头，认为英国的統治由錫克人的統治取代的时机已到，认为应当由一位錫克皇帝从德里或加尔各答来統治印度，这不是非常自然的嗎？可能这种念头在錫克人中間还很不成熟，可能他們在軍隊中被安插得很巧妙，以致他們的力量为欧洲人所抵銷，因此任何起义都能够很容易地被鎮压下去；但是，我們认为，凡是讀过关于錫克人在德里和勒克瑙事件后所作所为的报道的人，一定都会看出，他們中間确实存在着这种念头。

尽管如此，目前英国人毕竟又重新征服了印度。由孟加拉軍嘩变掀起的偉大起义，看来是真的平息下去了。但是，这再次的征服并没有加强英国对印度民心的控制。英軍在所謂土著居民暴虐殘杀这种夸大和捏造的傳說驅使下所进行的殘酷报复，以及整批和零星地沒收奥德王国的企图，并没有使胜利者博得任何特殊的

好感。相反地，他們自己都承认，無論在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中間，对基督徒入侵者的宿仇旧怨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了。也許这种仇恨目前还没有力量，但是可怕的乌云既已籠罩着錫克人的旁遮普，它并不是沒有重要意义的。而問題还不止于此。英国和俄国这两个亚洲大国現在都在爭夺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間的一个地点，在这里俄国和英国的利益必然要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地点就是北京。不久，从这里向西横过整个亚洲大陆，将形成这些互相敌对的利益不断发生冲突的一条綫。这样，“西帕依和哥薩克相遇于奥克苏斯平原”的日子可能确实不会很远了，如果这件事真正发生的話，那末 15 万印度土著士兵的反英情緒将是一个值得严肃考虑的問題。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9 月 17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10 月 1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443 号

## 卡·馬克思 馬志尼的新宣言

1858年9月21日于倫敦

由于热那亚的“上帝和人民”这家在意大利国土上出版的最后一家共和派报纸，终于受不住撒丁政府的不断迫害而宣布停刊，顽强不屈的馬志尼在倫敦创办了一家意大利文报纸——取名 «Pensiero ed Azione»（“思想和行动”）的半月刊。

我們就是从該报的上期中翻譯了他的一篇新宣言，我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使讀者能够自己判断聚集在羅馬三执政旗帜下的那部分革命流亡者的生命力和前途。馬志尼并没有研究那些使1848—1849年的革命遭到失败的巨大社会因素，也没有试图描繪那些在过去十年里无形中成熟起来并且一齐为新的更强大的运动奠定了基础的真实条件，在我們看来，他又重新回到他以前的幻想里，给自己提出一个臆造的問題，自然也就只能得出虚假的解决办法。他仍然认为何以流亡者作为一个团体未能实现他們想革新世界的意图這個問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并且他仍然在兜售医治他們的政治瘫痪症的万应灵药。他說：

“我在1852年給欧洲民主派的备忘录中就問过：現在党的口号，党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什么？答复很簡單。只有两个字——**行动**，不过是联合的、全欧洲的、不断的、彻底的、大胆的行动。你們只有有了对自由的意識，才能爭

取到自由，而你們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取得这种意識。你們的命运掌握在你們自己的手里。世界在等待着你們。只要哪里的人们准备起义，准备战斗，并且必要时为了挽救全体而准备牺牲，只要哪里的人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上帝、人民、正义、真理、美德，那里的人们就能率先发动。为了大家而起义，大家就会跟着前进。全党必需清楚地了解这点。每个人都可以繼續探討他认为已經略窺端倪的解决办法，但是請他不要带上个人的色彩，不要背离这支未来的大軍…… 我們并不就是民主主义；我們只不过是它的先鋒。我們的任务只是为它扫清道路。我們需要的是群策群力…… 自从这个呼吁发出后，六年过去了，而情况依旧。党的力量在数量上是增长了，可是党的統一还没有达到。几个有組織的小集体，以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令敌人感到的恐惧，证实了团结的力量；可是党的大部分党员依然是一盘散沙，因而无能为力。少数忠心耿耿的人，不能容忍这种可耻的无所作为的情况，像 *tirailleurs*（自由射手）那样在整个战线上东攻西打，每个人都冒着自己个人的風險，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没有对共同目标的理解；他們力量太弱，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他們只是抗議和死亡。主力部队无法去援助他們；它既无計劃，又无資力，更无領袖…… 各国政府的联盟曾一度瓦解。克里木战争給了各国被压迫人民一个良好的机会，它們理应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可是它們由于缺乏組織而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們曾看到真正的革命者把自己国家的解放同某一个认为干預国事和号召起义意味着必然毁灭的人的假想的計劃联系起来。我們曾看到波兰人忘記了薩比斯基以及波兰在基督教欧洲所完成的历史使命，而給土耳其充当哥薩克。有一些民族，例如羅馬尼亚人，曾幻想他們能够借助外交达到統一，仿佛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經過自己儿女們的斗争就建立起来了。另外有一些民族，如意大利人，則决定等待奥地利参加斗争，好像奥地利除了武装中立以外还能够采取别的什么立場。只有希腊投入了战争；可是它没有了解到，在存在着各国政府联盟的情况下，如果不爆发能够瓦解这些力量的革命，如果希腊人不和斯拉夫-羅馬尼亚人联合起来以便使起义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希腊就不可能有任何民族运动。我所指責的缺乏組織，缺乏計劃的情况从来没有表現得这样明显。因此我們的行列中有时到处都是令人窒息的沮丧情緒。孤立无援的单独一个人，很少經費，甚至毫无經費，怎么能够解决涉及全欧洲的問題呢？只有联合才能解决这个任务…… 1848年我們以所有偉大的和神圣的事物的名义在十



个地方举行了起义。自由、团结、人民、联盟、祖国、欧洲——所有这些当时都属于我们。后来，我们被骗了，不知道被什么怯懦的罪恶的妄想迷住了心窍，竟让这些运动变成了地方性的运动…… 我们把路易-菲利浦推翻之后，却重复了那句可以概括他的统治的亵神的话：«Chacun pour soi, chacun chez soi»〔“人人为自己，人人顾自己”〕。因此我们遭到了失败。难道我们一点没有从这种痛苦的經驗中得到教訓嗎？难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团结而且只有团结才能产生力量嗎？

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見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上帝之所以为上帝，因为他是思想和行动的绝对同一。人之所以为人，只有在不断努力尽量接近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如果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之間，个人义务和集体义务之間，著作家和阴谋家或者战士之間划上一条反常的和荒唐的鸿沟，把我们的党分成思想家和实践家，分成理论家和实行家，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我们都宣扬联合，把它当做以我们为先驱的这个时代的口号，可是我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实际上是和自己的弟兄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呢？我们在口头上都讲忍让、友爱、自由，可是只要我们的同志在某一个问题上同我们观点不一致，我们就会和他们决裂。我们都热烈赞扬那些不惜牺牲生命为我们扫清行动道路的同志；可是我们却不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我们都指责小规模的内战鲁莽轻率，可是我们又不设法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内战。我们都叹惜党缺乏經費，可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定期向党繳納几文党費的呢？我们說我们的失败是由于敌人有强大的組織，可是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试图建立总的统一的組織——这个組織在目前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将来会产生成果——以使我们党无比强大的呢？…… 难道没有办法使我们党摆脱目前这种可悲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嗎？我们都认为思想是神圣的，它的表现应当是自由的、不可侵犯的；都认为，如果一种社会組織由于物质上的极端不平等而使工人注定成为机器的附屬物，使他们丧失精神生活，那末这种社会組織就毫无可取之处。我们认为，人们的个人生活是神圣的。我们认为，人们的联合也同样是神圣的；它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特殊使命的口号。我们认为，国家不应当用强制的办法来实行这种联合，而是应当采取鼓励的办法。我们热烈期望，有朝一日，生产者将普遍联合起来，工資将由分享利潤来代替。我们相信劳动神圣，并且认为，任何社会，如果那里的人们愿意自食

其力而不可能做到，那就是罪惡的社會。我們相信民族，我們相信人類……我們所理解的人類，就是自由平等的各民族在這樣兩個原則上的聯合：內部獨立發展以及為了調節國際生活和爭取共同進步而互助友愛。我們認為，為了使我們所理解的那種民族和人類能夠存在，歐洲地圖必須重畫；我們認為必需重新劃分領土，以代替維也納條約所做的任意劃分；這次劃分應以語言、傳統、宗教的近似為依據，以每個國家的地理條件和政治特點為依據。你們不認為根據這些共同的信念足以建立互助友愛的組織嗎？我不是要你們服從唯一的一種學說，唯一的一種觀點。我只是說：讓我們齊來向否定一切學說的現象作鬥爭；讓我們聯合起來，和今天有可能重新征服歐洲的那種東方的消極無為的原則作鬥爭，爭取第二個馬拉松式的勝利。所有的人，不管他們屬於共和主義的哪一派，只要贊同我上面列舉的那些意見，都應當組織成一種歐洲的行動黨，法國、意大利、德國、瑞士、波蘭、希臘、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其他被壓迫的民族都應當各自建立起這個黨的支部；每個民族的支部都獨立存在，設有自己單獨的金庫；設有中央金庫的中央委員會，應當由各民族支部的代表組成，等等。

黨的統一達到後，歐洲問題就會變為從何著手的问题。在革命中也和在戰爭中一樣，勝利取決於在某一點上迅速地集中尽可能眾多的力量。如果黨想使革命取得勝利，它就應該在歐洲地圖上選擇一個最易于和最利于表現主動性的地點，把各支部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都投到那里去。羅馬和巴黎就是兩個應該開始聯合行動的戰略據點。法國，由於它的強大的統一，由於對它的大革命和拿破侖軍隊的回憶，由於巴黎每次發生的運動對歐洲人心的影響，迄今還是一個只要一發起行動就一定能喚起所有其他被壓迫民族的國家，儘管它的每一次真正的革命發動都必然遭到歐洲各國政府的全力攻擊。如果除開這個唯一的例外，那末，今天只有意大利是顯然集中著發起行動所必備的各種條件的國家。不必來談促使意大利前進的觀點的普遍性；在過去十年中那里就發生過一系列歐洲絕對看不到的出色的反抗行動。意大利民族的事業就是所有被維也納分贓所摧毀或者肢解了的各民族的事業。意大利的起義，由於使奧地利遭受打擊，會立刻使那些在這個帝國內部爭取擺脫羈絆的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亞人得到行動的機會。分布在帝國境內那些不滿情緒極端嚴重的地區的意大利軍隊，會支持他們的運動。奧地利派往意大利的兩萬名匈牙利士兵會站在我們起義的旗幟下面。因此，意大利的運動不可

能成为地方性的运动。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它的2500万人口将保证起义运动能够坚持足够的时间，使其他民族能够来得及利用它。奥地利和法国，法国和英国在意大利都没有能使它们采取共同政策的共同利益。由于意大利不推翻教皇的统治就无法起义，所以它一旦起义，就会解决欧洲良心自由的问题，就会获得所有珍视这一自由的人的同情。”

对馬志尼的宣言的評論由卡·馬克思

于1858年9月21日写成

載于1858年10月13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45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中国和英国的条約

1858年9月28日于倫敦

英国政府终于发表了的关于英中条約的正式摘要<sup>392</sup>，对于早已由其他方面傳开的消息，大体上很少补充。其实，对于英国有意义的只有条約中的第一款和最后一款。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約締結以后所規定的“善后旧約并通商章程”“作为廢紙”<sup>①</sup>。这个善后补充条約會規定：在香港以及为英国貿易开放的五个中国口岸，英国領事在遇到裝載鴉片的英国船只駛入英国領事裁判权所轄地区时，必須給中国当局以协助。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輸入这种違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一名天朝海关職員的角色。第二次鴉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鴉片战争在表面上加于鴉片貿易的禁令而告終，这是十分合乎邏輯的結果，是那些特別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們以为英国正式放棄它对鴉片貿易的假惺惺的反对行动，不会导致与原来的希望完全相反的結果，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中国政府請英国政府协助取締鴉片貿易，也就是承认了自己不能依靠本身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南京条約的善后补充

① 本篇內有关条約的引文的中譯文，均見中英天津条約的中文本。——譯者注

條約是企圖借助外國人的幫助來擺脫鴉片輸入而作的最後的也是絕望的努力。既然這種企圖遭到了失敗——而現在已公開談論這次失敗——既然英國現在已在法律上認可鴉片貿易，那末毫無疑問，中國政府無論從政治上和財政上着想，都將試行一種辦法，即准許在中國栽種罌粟並對外國鴉片征收進口稅。不論當前的中國政府的意向如何，中國政府因天津條約而陷入的情況本身就向它提出了這個辦法。

這種改變一經實行，印度的鴉片壟斷以及印度的國庫一定會受到致命的打擊，而英國的鴉片貿易會縮小到尋常貿易的規模，並且很快就會成為虧本生意。到目前為止，這一直是約翰牛用假骰子來進行的一場賭博。因此，約翰牛的算盤完全落空，大概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最明顯的結果。

慷慨的英國對俄國宣布了“正義戰爭”，在訂立和約時，不會要求任何軍事賠款。另一方面，英國雖然不斷聲明它同中國處於和平狀態，同時卻強迫中國必須償付這次戰爭的費用，這些費用，按照英國自己現任大臣們的意見，是由它自己的海盜行為引起的。不管怎麼樣，天朝的百姓將償付 1 500 萬或 2 000 萬英鎊的消息一傳來，甚至對於最清高的英國人的良心都起了鎮定作用。“經濟學家”雜誌以及一般寫作金融論文的作者們，都興致勃勃地計算着中國白銀對於貿易差額和英格蘭銀行金銀儲備狀況將發生多么良好的影響。但是真可惜！帕麥斯頓派的報紙煞費苦心製造出來的那些初步印象太脆弱了，經不起關於事情真相的消息所帶來的打擊：

專條規定：“前因粵城大案辦理不善致英民受損”，中國應償付“商虧銀二百萬兩，軍需經費銀二百萬兩二項”。

這兩筆款項總共才 1 334 000 英鎊，而在 1842 年，中國皇帝

却應該償付 420 万英鎊，其中 120 万英鎊抵償被沒收的走私鴉片，300 万英鎊抵償軍費。由 420 万英鎊外加香港，減少到只有 1 334 000 英鎊，這畢竟不像是一樁漂亮的買賣；可是，最壞的事情我們還沒有講呢。中國皇帝說，既然你們不是同中國作戰，只是同廣州進行“地方性戰爭”，那就請你們自己向廣東省索取你們尊貴的軍艦逼迫我批給你們的那筆損失費吧。同時，你們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羅本齊將軍不妨占領廣州作為物質上的保證，並且照舊使英國武器成為連中國兵勇都會耻笑的笑柄。樂觀的約翰牛因為 1 334 000 英鎊的小戰利品所附帶的這些條件而產生的苦惱，已經發作為大聲的呻吟。倫敦有一家報紙寫道：

“不僅沒有可能將我們的 53 艘軍艦從中國調回，看到它們滿載着幾百萬銀錠凱旋歸來，我們反而必須派遣 5 000 名士兵去重新占領和守住廣州，並幫助海軍去進行我們的副領事所宣布的地方性戰爭。可是這場地方性戰爭，除了把我們的貿易從廣州移到其他中國口岸以外，會不會引起其他結果呢？……繼續進行戰爭〈地方性戰爭〉會不會使絕大部分的茶葉貿易落到俄國手里呢？歐洲大陸和英國本身會不會依靠俄國和美國來供給茶葉呢？”

約翰牛擔心“地方性戰爭”會影響茶葉貿易，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從麥克格萊哥爾的“商業稅則”<sup>393</sup>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對華戰爭的最後一年內，俄國經由恰克圖得到 12 萬箱茶葉。在同中國媾和後的一年內，俄國對茶葉的需要減少了 75%，總共只有 3 萬箱。無論如何，占領廣東將使英國人繼續耗費錢財，這筆錢一定會大量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第二次對華戰爭未必能彌補損失，愛默遜先生說得對，在英國人看來這是空前未有的大錯。

在第五十一款上載明了英國侵略所取得的另一個大勝利，按照這一條款，“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叙大英國官民，自不得

提书夷字”。約翰牛并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滿意了，这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看来，約翰牛該是多么謙恭啊！

条約中涉及貿易的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沒有享有的任何利益，而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諾言，其中大部分还不如书写条約用的羊皮紙值錢。第十款規定：

“长江一帶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現在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欽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尙书會議，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貨物通商之区。”

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动脉，正如“晨星报”<sup>394</sup>所公正地指出的，被禁止进入“英国人能将自己的工业品銷往內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們很乖，帮助帝国政府将起义者逐出目前被他們占領的区域，那时他們或許可以在大江上航行，但也只限于某几个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如果最初說的是开放“一切”口岸，那末，現在除南京条約所規定的五个口岸外，已縮減到开放五个口岸了，按照倫敦一家報紙的說法，这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島上”。此外，那种以为貿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欺人之談，現在已該拋棄了。請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其中有多少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呢？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在广州經商。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貿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关于1856—1857年各地貿易状况的議會藍皮书援引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應該記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額中也包括由广州轉往厦門和福州的商品。

年 代	由英国进口的貿易額(美元)		对英国出口的貿易額(美元)	
	广 州	上 海	广 州	上 海
1844	15 500 000	2 500 000	17 900 000	2 300 000
1845	10 700 000	5 100 000	27 700 000	6 000 000
1846	9 900 000	3 800 000	15 300 000	6 400 000
1847	9 600 000	4 300 000	15 700 000	6 700 000
1848	6 500 000	2 500 000	8 600 000	5 000 000
1849	7 900 000	4 400 000	11 400 000	6 500 000
1850	6 800 000	3 900 000	9 900 000	8 000 000
1851	10 000 000	4 500 000	13 200 000	11 500 000
1852	9 900 000	4 600 000	6 500 000	11 400 000
1853	4 000 000	3 900 000	6 500 000	13 300 000
1854	3 300 000	1 100 100	6 000 000	11 700 000
1855	3 600 000	3 400 000	2 900 000	19 900 000
1856	9 100 000	6 100 000	8 200 000	25 800 000

“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sup>395</sup>所做的结论；同时，这家报纸还嘲笑“条约中最精彩的一点”，即“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但是，无论约翰牛怎样用这个玩笑来寻开心，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 800 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



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自然，这种回顾对于約翰牛來說是不愉快的。倫敦“泰晤士報”为此深深感到痛心，所以当它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顛占便宜的消息时，竟将电报中有关俄国依照条約获得黑龙江流域那一部分故意删去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9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10 月 15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545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卡·馬克思

## \*关于俄国廢除农奴制的問題

农奴制問題目前在俄国似乎要发生一个严重的轉折；这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采取这样一个非常措施，即在圣彼得堡召开一次可說是全体貴族代表會議来討論廢除农奴制的問題，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农民事务总委员会<sup>396</sup>的工作已几乎完全失敗，只不过引起了各委員之間的激烈爭吵，在这場爭吵中，該委员会的主席康斯坦丁大公是偏袒反对沙皇的旧俄罗斯派的。省貴族委员会似乎大部分也是利用正式討論解放农民的預备步驟的机会，一心来阻撓这个措施。在俄国貴族中当然有一派人是主張廢除农奴制的，但是他們为数甚少，而且在一些最重大的問題上意見也不一致。口头上反对奴役，但是只答应在使解放有名无实的条件下給予解放，这种态度甚至在俄国自由派貴族中似乎也是很流行的。其实，老农奴主对解放农民采取的这种公开的反抗或缺乏誠意的支持，完全是很自然的。收入减少，地产跌价，他們作为圍繞着中央暴君旋轉的許多小暴君所慣于享有的政治权利受到严重侵犯，——这就是他們会預料到的、也是很难期望他們会乐于承受的直接后果。在一些省份里，現在就已經不能用地产作抵押筹得信用貸款了，因为誰也說不定地产是否不久就会貶值。俄国有很大一部分地产是抵押在国家自己手中，那些地产的所有者提出这样的問題：

他們將如何履行對政府的義務呢？許多地主的地產有私債的負擔。許多地主是靠定居在城市里當商販、手工業者 and 幫工的農奴繳納租賦過日子的。當然，這些收入會隨著農奴制的廢除而消失。還有一些小貴族，他們擁有的農奴數目很有限，但是擁有的土地還要少。如果每一個農奴都領到一塊土地（一旦解放必定如此），那末這些農奴的主人就會變成乞丐了。對於大地主說來，按照他們的觀點，解放農民幾乎等於放棄權勢地位。如果農奴被解放，這些地主還能憑借什麼去抵制皇帝的專橫呢？此外，俄國如此需要的並且取決於土地實際價值的賦稅將從何而來呢？國有農民又將如何處理呢？所有這些問題都被提了出來，並且構成了農奴制擁護者們借以藏身的許多堅固障地。這是像各國人民的历史一樣古老的故事。的確，要解放被壓迫階級而不損害靠壓迫它過活的階級，而不同時摧毀建立在这种陰暗社會基礎上的國家全部上層建築，是不可能的。當到了需要進行改革的時候，起初總是表現得熱情洋溢；人們興高采烈地互相祝賀彼此的善良願望，冠冕堂皇地大談其對進步的普遍熱愛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但是，一旦到了說話要用行動兌現的時候，有些人就害怕被他們召來的鬼魂而向后退縮，而大多數人則表示決心捍衛自己實際的或想像的利益了。歐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壓力下或由於戰爭的關係才能廢止農奴制。普魯士政府只是在吃到拿破侖鐵枷的苦頭以後才敢於考慮解放農民；然而即使那時它對這個問題也解決得不徹底，以致不得不在1848年重新予以解決，並且，這個問題儘管在形式上已有所改變，仍然有待於在未來的革命中予以徹底解決。在奧地利，解決這個問題的不是合法政府，也不是統治階級的善良意志，而是1848年革命和匈牙利起義。在俄國，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并不

是由于什么人道观念，而純粹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企图用和平方法改变人民群众的状况<sup>397</sup>，但是他們两人都失敗了。必須补充說明一下，其实在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尼古拉背棄了他自己过去提出的解放农奴的計劃，而变成了一个最頑固的保守派。至于亚历山大二世，則是否要喚醒那些沉睡的力量，对他來說未必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問題。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战争，使俄国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的規模之大，单凭这一事实就可以想見了；在 1853—1856 年这段时期，强迫流通的紙幣从 33 300 万卢布增长到大约 70 000 万卢布，而这全部增长的紙幣数量实际上只是国家預先征收的賦稅。亚历山大二世只是仿效亚历山大一世在与拿破侖作战时的做法，用解放的諾言鼓舞农民。再說，战争以丢臉的失敗告終，至少在那些决不可能通曉外交秘密的农奴看来是如此。以这种明显的失敗和丢臉来开始他的朝代，并且还公开違背在战时向农民所許的諾言，——这种做法甚至对于沙皇說来也是太冒險了。

甚至尼古拉本人，不管是否发生东方战争，能否更久地拖延这个問題，都是令人怀疑的事情。至于亚历山大二世，就无论如何沒有这种可能了；但是他曾认为（而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向服从慣了的貴族不会違抗他的命令，如果讓他們通过各种貴族委员会在这出大戏中扮演一个角色，他們甚至还会引以为荣的。然而这种估計落空了。另一方面，农民对沙皇打算給他們做的事情甚至抱有过分夸大的想法，他們对于自己領主們迟疑不决的做法已感到不能忍受。好几个省份里发生的纵火事件，就是意义很清楚的危險信号。其次，大家知道，在大俄罗斯和过去屬於波兰的各省都发生了情景非常可怕的暴动，結果使貴族們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在

那里借着城墙和駐防軍的保护，才能不怕憤怒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必須召开一次类似貴族會議的集会。如果这次會議成为俄国历史上一个新的起点，那末結果会怎样呢？如果貴族們一定要坚持以自己的政治解放作为在解放农奴問題上向沙皇让步的先决条件，那末結局又将如何呢？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10 月 19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458 号

## 卡·馬克思

# 普魯士國王的瘋癲症

1858年10月2日于柏林

德國作家豪弗在他的一篇故事里描寫了一個喜歡說短道長、專愛無事生非的小城鎮，在一天早上，突然發現它那里最時髦的人物、實際上在社交界占頭把交椅的大紅人，原來不過是一只化裝的猴子，因而大為驚愕，失去了它平素那種安然自得的心情<sup>①</sup>。現在，普魯士人民，或者說一部分普魯士人民，大概正由於一種更不愉快的發現而感到萬分沉痛：他們竟被一個瘋子統治了整整二十年。至少，人民已在暗自猜疑，忠實的普魯士“臣民”被朝廷的一個大規模騙局巧妙地愚弄了。這種疑竇的產生決不像約翰牛和他的那些滑頭編輯們斷定的那樣，是由於國王在對俄戰爭中所採取的做法。恰恰相反，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願參加這場可恥的屠殺，倒被公認為是他可以引以自負的一次最清醒的政治行動。

如果一個人，不論他的社會地位如何，也不論他多麼平凡，忽然被發覺完全不是人們原先所認為的那個樣子，那末通常他周圍那些惱怒的和受騙的人們就必然要去翻查他的經歷，搜出他的全部陳年舊賬，回想起他的一切反常的行徑，把他過去所有荒唐古怪

<sup>①</sup> 豪弗“一只扮成人的猴子”。——編者注

的举止一一連綴起来，最后，怀着病态的滿足心情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即他們早該看出这种情况才对。因此，人們現在記起来了（这件事我也記得，可以证实），济克堡的萊茵精神病院的主治医师雅科比博士突然于 1848 年 5 月被当时的內閣首相康普豪森先生召到柏林，去給当时据說正患脑炎的国王治病。据新产生的內閣的恭順奴僕們在心腹人士中間私下傳說，陛下的神經系統在三月事件中，特别是由于人民要他站在那些因故意制造的誤会而被杀害的公民的遗体面前，迫使他向这些血迹斑斑、尚未冷却的尸体脫帽賠罪<sup>398</sup>，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沒有疑問，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健康后来复原了，但是不能因此肯定他不会像乔治三世那样周期性地复发旧病。不过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时常沉湎于那种曾使忒拜的一位著名天神的女巫們大发酒瘋的纵性狂飲<sup>399</sup>，对于他偶然做出的一些奇怪举动也就不大理会了。

然而，1855 年 10 月，当他为了給准备在科倫附近修建的萊茵河的新桥主持奠基典礼而来到萊茵普魯士的时候，关于他就有許多奇怪的傳聞。他臉皮皺縮，两腿无力，挺着大肚子，一副神色焦躁不安的样子，就像是他自己的亡魂。在他致詞的时候，断断续续，結結巴巴，时而前言不接后語，簡直是狼狽不堪；而王后紧随在他身边，焦灼地注視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一反往常的习惯，不接見任何人，不和任何人談話，沒有王后陪伴他哪儿也不去，王后已經和他寸步不离。在他回到柏林以后，时常傳出一些奇怪的 on dits [傳言]，說他在突然发狂的时候，竟动手打了他的大臣，就連曼托伊費尔也难幸免。为了安定人心，只說国王得了水肿病。后来，越来越多地傳出他在自己的桑苏西花园里不幸出事的消息，他时而碰到树上撞伤了眼睛，时而碰在石头上磕伤了腿；而在 1856 年初，

开始到处有人暗中傳說他时常有瘋癲病发作。特别是說他把自己想像成一名士官，还需要通过普魯士軍曹所說的 Übungsmarsche〔机械操练〕。因此他通常独自在他的桑苏西和沙洛頓堡两处花园里练习跑步，这也就造成了不妙的后果。

現在人們正費尽心思把十年来发生的諸如此类的往事联系起来。請問，既然現在才证实，至少最近十八个月以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尽管有精神病，但仍被留在王位上，既然現在由于王族成員之間发生了爭吵，王后和大臣們假借国王名义玩弄的鬼把戏才公开暴露出来，那末，在整个那段时期里为什么不可能让一个瘋子当国王来愚弄普魯士人民呢？因脑軟化而引起瘋癲的病人，一般說来直到死以前都常会有神志清醒的时期。普魯士国王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瘋癲症的这种特点，为布置騙局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王后經常守着她的丈夫，抓住他的每一个神志清醒的时期，让他出現在人民面前，或者让他在公共場合露面，教他演习他應該扮演的角色。有时她却大大失算。例如，大家都記得，葡萄牙女王曾在柏林举行婚礼，国王本來說好要作为 per procura<sup>①</sup> 公开出席在教堂举行的結婚典礼。一切都准备就緒了，大臣、侍从武官、廷臣、外国使节和新娘本人都在等候国王，突然之間，他神經錯乱，以为自己就是新郎，王后拚命設法制止也沒有用。他說自己命运多舛，居然在第一个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再度結婚，又說他（作为新郎）穿着軍服出現很不相称，这些不倫不类的話使那些让他抛头露面的人毫无办法，只好停演這場已經宣布开幕的好戏。

---

① 直譯是：受委托；这里是指作为新郎的代表。——編者注



从下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王后做事的大胆。在波茨坦还流傳着一个古老的习俗,按照这个习俗,漁民一年一度要用魚向国王繳納一次古老的封建貢賦。王后想借此机会向这些来自老百姓的人证明,当时盛傳的有关国王的精神状况的流言蜚語是假的,她竟决定邀請几个为首的漁民出席由国王亲自主持的魚宴。的确,这次魚宴进行得很順利,国王喃喃地讲了几句事先背熟的話,面带笑容,举止相当得体。王后深恐好景不常,急于示意客人退席,可是国王这时却驀然站了起来,大声要求把他放入煎鍋。阿拉伯人关于人变魚的故事<sup>①</sup>由他变成了现实。恰恰是由于王后迫于需要而大胆采取的这种魯莽行动,这场喜剧遭到了失敗。

不言而喻,沒有一个革命家能想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貶低皇家的尊严。王后是巴伐利亚的一位公主,是臭名昭彰的奥地利的索菲婭(弗兰茨-約瑟夫之母)的同胞姊妹,在各阶层人士中从来也沒有想到柏林宫廷奸党的首領就是王后本人。1848年以前,人們都称她为“慈祥的国母”(die milde Landesmutter),以为她对国家事务完全沒有影响,而且由于秉性的緣故根本不过問政治。有人因为听說她暗中信奉天主教而感到不滿,还有人因为她是国王按照她的意思而創立的神秘的天鵝騎士团<sup>400</sup>的首領而咒罵过她,民众对她不滿的表现仅此而已。当人民在柏林取得胜利以后,国王會請求人民看在“慈祥的国母”面上寬容他,而这一請求打动了他的听众。可是在反革命得势之后,人民对奥地利的索菲婭的这位同胞姊妹就逐漸改变了看法。胜利了的人民會看在这个人的面上采取了寬宏大量的态度,而現在这个人却完全不理那些被得势的

---

① “一千零一夜”里的漁夫的故事。——編者注

反革命的魔掌奪去了兒子和兄弟的母親和姊妹們。這個“慈祥的國母”顯然會贊同這種暴君式的怪僻行為——把幾個不幸的自衛團員 (Landwehrleute) 在 1850 年國王生日的那一天，即在他們所犯的保衛人民權利的罪行似乎已被人遺忘的時候，在薩爾魯伊處決，而同時她又滿懷悲天憫人的虔誠在那些由於襲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市民而被擊斃的士兵墓前慎重其事地表示吊唁，並且還做出一些類似的反動氣焰囂張的活動。她同普魯士親王夫人的激烈爭吵不久也成了公眾議論的話題，不過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既然她沒有子女，對國王的法定繼承人的目空一切的妻子就會懷恨在心。這個題目我準備以後再談。

卡·馬克思寫於 1858 年 10 月 2 日

載於 1858 年 10 月 23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462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弗·恩格斯

### 俄国在中亚細亚的进展<sup>401</sup>

几个星期以前，我們曾指出<sup>①</sup> 俄国近年来在东亚細亚，即在太平洋西岸有着极順利的进展。今天，我們要請讀者注意这同一个大国在另一方面，即在中亚細亚的同样順利的进展。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間的某处发生冲突的問題，关于哥薩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問題，自从 1839 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細亚<sup>402</sup> 以来，常常被人們談論着。这两国軍隊的第一次远征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气候而遭到的失敗，有一个时期使人們对議論不感兴趣。英国曾以成功的然而一无所得的进軍喀布尔来弥补自己的失敗。俄国似乎是默默地忍受了自己的耻辱，可是我們就会看到，它絲毫也沒有想到要放棄自己的計劃，而且順利地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問題，又重新提出来了；但是那时大家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俄国的先遣部队已推进到什么地方以及他們在哪一个方向进行偵察。印度报纸偶尔登載一些关于俄国在中亚細亚的征服地的报道，但是人們沒有注意它們。最后，在 1856 年英国一波斯战争时期，整个問題又

---

① 見本卷第 625—626 頁。——編者注

重新引起了討論。

但是近来中亚細亚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急速地变化着<sup>①</sup>。当1812年拿破侖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莫斯科作为向印度进軍的作战基地时，他只是步彼得大帝的后尘而已。还在1717年，这位深謀远虑的、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針的帝王，

① 在1858年11月24日“自由新聞”刊載的原文中，文章从开头到“当1812年”这几个字之前是这样的：“茲附上从我所作的关于俄国近来在中亚細亚的进展的札記中摘录的几段文字。可能，这些材料有一部分对你們是新鮮的，因为据我所知，在圣彼得堡用俄文公布的、作为这些材料的主要来源的俄国官方文件，还没有来到英国。

只要注意一下年月日，就会发现帕麦斯顿勋爵的行动与俄国对中亚細亚的侵略之間的联系。例如：1839年俄軍向希瓦推进，尽管他們遭到軍事上的失敗；1854年俄国在希瓦最后固定下来，虽然它只作了簡單的軍事示威，也没有发出一枪一炮；1856年俄軍匆匆通过吉尔吉斯草原向土尔克斯坦东南部进軍，恰巧这时，在印度发生了起义。在俄国官方文件中，只提到已經发生的事实(faits accomplis)；当然，事件的內幕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而在整个这出戏里只不过充当点缀品的武装力量，却被描繪成主要的登場人物。因为你們已很熟悉这个問題在外交上的全部經過，我在所摘录的文字里就只限于按俄国自己的說法来叙述事实。我仅就俄国在中亚細亚的进展从軍事观点来看对印度有什么意义，补充了几点看法。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問題：为什么亚历山大二世公布了关于俄国入侵北亚細亚和中亚細亚的文件，而尼古拉是一直用心良苦地不肯把这些文件公布于世的。一般来讲，关于亚历山大可以这样说，他做到了他父亲没有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說，让欧洲知道俄国的秘密的‘亚洲’計劃，从而使欧洲成为他在制定这些計劃时的公开同謀者。其次，这些文件实质上只有学問淵博的德国人才能看懂，因为他們珍視亚历山大对发展地理科学的寬容态度。再者，克里木战争以后，老莫斯科派由于俄国丧失了它的威信而愚頑不化地一再表示不滿。对于这一点，亚历山大就以公布文件来答复他們，从文件中不仅可以看出俄国最近一年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而且公布文件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就是对‘威信’的坚决肯定；这是尼古拉从来下不了决心去做的事。”

接下去那一部分文章的标题是：“俄国文件概述”。——編者注

就曾派军队远征希瓦，当然，那次远征是失败了。此后，俄国在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去破坏土尔克斯坦草原上的安宁，不过这时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地区内却移去了许多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建立了哥萨克军屯。但在乌拉尔河彼岸，俄国对吉尔吉斯人的三个汗国或部落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名义上，到1833年瓦西里·彼罗夫斯基将军被派往奥连堡担任总督以前，俄国的商队总是遭到吉尔吉斯人和希瓦人的抢劫。彼罗夫斯基发现，由于这些游牧民族的袭击，俄国同亚细亚内地和南部各地区的贸易往来完全被切断了，因为甚至近几年来护送商队的武装护卫队也不能保护商队。彼罗夫斯基为了结束这种状态，首先组织了流动纵队来对付吉尔吉斯人，接着很快就在他们的地域上布置了哥萨克兵哨。他用这种办法在几年内使吉尔吉斯人屈服于俄国的实际控制和统治之下，然后便着手实现彼得大帝很久以前制定的征讨希瓦的计划。

彼罗夫斯基得到俄皇的许可后，组织了一支军队，人数大约相当于一个步兵师（8000人），并附有许多半正规的哥萨克骑兵和非正规的巴什基里亚骑兵和吉尔吉斯骑兵的队伍。征集了15000头骆驼在荒漠的草原上往来运输给养。由于缺水的缘故，没有可能在夏季进行远征。因此，彼罗夫斯基选定在冬季作战，并在1839年11月由奥连堡出动。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知道。暴风雪和严寒摧毁了他的军队，冻死了他的骆驼和馬匹，使他损失惨重，不得不撤退。虽然如此，这次进军的公开目的还是达到了：当英国还一直不能替在布哈拉被杀的使节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复仇的时候，希瓦可汗释放了全体俄国俘虏，并派使节到圣彼得堡去求和。

这时彼罗夫斯基着手开辟一条取道吉尔吉斯草原的交通线。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科学考察团和工程勘察队就已开始进行工作，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考察了亚克薩尔特河(錫尔河)和威海以北的整个区域。对于土壤的特性、修筑道路的最好綫路以及开凿大水井的最适宜的地点，都作了調查。他們把这些水井钻凿或者挖掘在彼此相隔不远的距离內，在水井四周筑起足以抵御游牧部落任何襲击的坚固工事，在工事里面留有相当寬闊的地方用以貯藏大量的粮食。奥克苏斯河上的卡腊布拉克和伊尔吉茲河上的伊尔吉茲，成了保卫吉尔吉斯草原南部的中心据点；在这两个地方和烏拉尔河沿岸各城市之間，道路两旁都修筑了小型堡垒，在每相距 10 英里或 12 英里<sup>①</sup> 的地方开凿了水井。

在 1847 年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在錫尔河上离河口約 45 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取名阿腊耳斯克。里面可以容纳一个营以上的守备部队。阿腊耳斯克馬上就成为分布在錫尔河下游以及与該河邻接的威海沿岸的廣闊的俄国农业移垦区的中心，这时，俄国便正式占有了威海和錫尔河三角洲以北的全部地区。在 1848 年和 1849 年，威海第一次受到詳細的勘察；发现了一群新的島屿，它們立刻就被划作不久就要着手建造的威海汽船队的主要停泊处。在对着錫尔河河口的一个島上建立了另一座堡垒，同时奥連堡和威海之間的交通綫也得到进一步加固并修竣完工。

1842 年卸去奥連堡总督职务的彼罗夫斯基，現在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并于 1853 年春天率领大軍向阿腊耳斯克推进。军队沒有遇到什么特別的困难就穿过了沙漠，然后沿錫尔河向上游

---

① 在“自由新聞”上不是印作“12 英里”，而是“20 英里”。——編者注

前进，当时还有淺水汽船沿河伴行。俄軍来到离河口約 450 英里、隶属于浩罕可汗的阿克麦吉特要塞时，便把它一举攻了下来，并立刻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要塞，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以致同年 12 月浩罕軍队在进攻这个要塞时遭到了惨敗。

1854 年，当欧洲的注意力投向多瑙河和克里木的战事时，彼罗夫斯基率領了 17 000 人的軍队，从錫尔河上新建立的作战基地向希瓦推进。但是希瓦可汗沒有坐等他到达奥克苏斯河就派使者前往俄国軍营，双方签订了条約，**按照条約，希瓦可汗承认俄国的最高权力**，将宣战权和媾和权让給俄国，把統治本国臣民的无限权力移交給俄国，俄国永远有权确定商队的綫路，規定捐稅和关稅，調整希瓦全境的貿易。在希瓦駐有俄国領事，他作为俄国政府的代表，也負責全权裁决希瓦的一切政治事务。

随着希瓦的归順，关于征服土尔克斯坦的問題实质上已經解决；也許現在这个問題在事实上也已經解决了。浩罕可汗和布哈拉可汗也曾派使节到圣彼得堡；俄国同他們签订的条約虽然沒有公布，但是条約的内容可想而知。这些小国家唯一的力量就在于它們难以被人攻破，可是目前，至少对俄国來說，这一点已經不成問題了，所以不論俄国願意让这些国家有多大程度的独立，这种独立終究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因为只要从希瓦或阿克麦吉特派一支两万人的軍队到比較富饒的上土尔克斯坦盆地去，就完全可以鎮压任何反抗的企图和横扫全境。应当說，俄国在 1854 年以后並沒有对这些地区置之不理，尽管它行动十分詭密；而既然它在最近二十五年来在土尔克斯坦迅速地、悄悄地和連續不断地获得了成就，就很有把握可以預料，它的国旗不久将在兴都庫什山和博洛尔塔格山的山隘上飄揚。

从軍事观点来看,这些征服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它們而为进攻印度建立了作战基地的核心;的确,自从俄軍这样深入中亚細亞以后,从北方进攻印度的計劃,已經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图,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輪廓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同温带地区为一片寬闊的、从波斯灣沿岸徑直穿过整个大陆而通向黑龙江发源地的沙漠地带分隔开来。这个沙漠地带——姑且不說黑龙江沿岸地区——直到最近为止,軍队几乎不能通行;唯一可以設想的穿越这个地带的道路,是由里海的阿斯特拉巴德取道赫拉特到喀布尔,再往印度河这样一条道路。但是現在俄軍駐在亚克薩尔特河(錫尔河)和奥克苏斯河(阿姆河)下游,而且有了供給軍队用水和粮食的軍用道路和堡垒以后,中亚細亞沙漠就不再是軍事上的障碍了。俄国本来只有一条未修好的、由阿斯特拉巴德經由赫拉特通往印度河的道路,而現在有三条不同的道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准备好供行軍之用。首先是一条穿越赫拉特的老路,在目前局势下这条路不可能再对俄国封鎖起来;其次,是从希瓦到巴耳赫的奥克苏斯谷地;第三是从阿克麦吉特到霍德仁特的錫尔河谷地,从这里軍队可以通过水源充足和人烟稠密的地区到撒馬尔汗和巴耳赫。赫拉特、撒馬尔汗和巴耳赫可以成为攻打印度的一个极好的作战基地。巴耳赫距离英印帝国的西北前哨白沙瓦总共才500英里。撒馬尔汗和巴耳赫都隶属于布哈拉可汗,布哈拉可汗現在已經完全依靠俄国;要是阿斯特拉巴德(它不是已經被俄国人占領,就是随时可能被他們占領)和巴耳赫将来落在俄国手中,只要俄国决心攻占赫拉特,赫拉特就保不住。一旦这样的作战基地实际上为俄国所占有,英国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印度帝国而斗争了。从巴耳赫到喀布尔,不見得比从喀布尔到白沙瓦更远一些,仅仅这一事实就



已經证明，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間的中立地带現在是多么狹窄。

十分清楚，如果俄国人的进展繼續保持着最近二十五年內所采取的那种速度、那种精力和始終不渝的精神，那末再过十年或十五年，俄国人就将直叩印度的大門了。他們只要穿过吉尔吉斯草原，就进入土尔克斯坦东南方那些耕种較好和肥沃富饒的地区，在征服这些地区方面，沒有人能比得上他們，这些地区可以在許多年內毫不費力地維持一支拥有 5 万或 6 万人，完全足够向任何地方，直至印度河进軍的軍队。像这样一支軍队在十年內就可以征服全境、成立警卫队保护修筑道路和保护俄国国家农民垦殖广闊的土地（就像目前在威海所做的一样）、使周圍的国家懾服、准备同印度作战时所需要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綫。是否会在什么时候进行这种进軍，那要取决于目前只能作为渺茫推測对象的政治条件<sup>①</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0 月 8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11 月 3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471 号，經  
馬克思补充后又載于“自由新聞”  
第 6 卷 1858 年 11 月 24 日第 23 号

---

① “自由新聞”上刊載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們担保，凡是研究过这个国度的地理的軍人都不會否认这一点。如果我們的推測正确無誤，那末‘哥薩克同西帕依’（假如那时还有願意替英国效劳的西帕依）之間的搏斗，就不会像原来推測的那樣，发生在奥克苏斯河沿岸，而是发生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沿岸。”——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普魯士國王的瘋癲症

1858年10月12日于柏林

國王已在今天離開柏林，en route〔啟程〕赴提羅耳和意大利。在波茨坦火車站等候給他送行的沉默的人群中，有很多人曾在1840年參加了他的加冕典禮，並且後來在他的第一篇公開的蠱惑性演說中聽到過他鄭重其事地宣稱，他決不允許一張“高盧紙片在他和他的人民之間作梗”<sup>①</sup>。不幸，這同一個人後來不但宣誓要忠於這張“高盧紙片”——為成文的憲章或憲法起了好一個浪漫的名稱！——而且自己還當上了普魯士憲法的教父，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由於這張搗亂的“紙片”而被趕下了寶座。讀者想必會看出國王給普魯士親王的詔書和普魯士親王給內閣的詔書之間存在着的矛盾。國王在他的詔書中說：

“鑒於我目前仍不能親理國政，特敦請殿下在暫時、臨時等等意義上，作為攝政王代表我行使國王權力，務期竭盡全部德才，僅對上帝負責。”

親王在他的相應的詔書中稱：

“遵照國王的要求並根據憲法第五十六條，本人作為王位的男性直接繼承者承負國家攝政之責，並依照憲法第五十六條，召集王國議會兩院會議。”

請看，國王在詔書中表現出他是一個有自主力的人，而且他是

<sup>①</sup> 見本卷第653—654頁。——編者注

自願暫時引退的。可是，亲王却同时抬出“国王的要求”和“宪法第五十六条”，而宪法第五十六条是以国王患精神病或被俘，以致不能亲自任命摄政人选为前提的。再者，国王在他的詔书中要求摄政王在行使他的权力时“仅对上帝負責”，可是这位亲王抬出了宪法，把全部責任都推給現任內閣。根据摄政王引据的条款，“王位直接继承者”应立即召集两院举行联席會議，决定“有无必要实行摄政”。为了剝夺議会的上述权力，要強調国王是自願引退的，可是为了不致完全依賴于国王的任性，又抬出了宪法。可見，摄政王提出的論点是有漏洞的，因为他所依据的是两种彼此不相容的权利。宪法第五十八条規定，

“自他〈摄政王〉宣誓〈对联合議会宣誓〉效忠宪法之日起，現任內閣应对政府的全部行动負責。”

这同“仅对上帝負責”怎么相符呢？承认国王的詔书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同时还召集了議会；而召集議会，也是一个借口，因为“有无必要”实行摄政的問題不能由議会做出决定。曾在1850年拒絕向宪法宣誓的普魯士亲王，为形势所迫，处于尷尬境地：他不仅得承认宪法，而且还得訴諸宪法。不要忘記，从1848年秋天到1850年初，专制派，特別是在軍隊里，曾蓄意有时甚至公开宣布要以头脑清醒的亲王来代替优柔寡断的国王，这位亲王至少沒有由于头脑特別圓滑而使他的意志受到压抑，此外，由于他在三月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他的逃亡英国、人民群众对他的痛恨，以及他在巴登战役中所立的功劳<sup>403</sup>，他似乎是完全能在普魯士主持一个强有力政府的人，就像弗兰茨-約瑟夫、奥当斯之子<sup>①</sup>在霍亨

①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索倫領土的南面和西面的鄰邦里一樣。親王的确從來沒有改變過他的原則。不過，他，尤其是他的夫人（歌德的学生，一個有文化修養、虛榮心強和目空一切的人）從王后及其宮廷奸黨方面遭到的蔑視，不能不使他產生多少有點對立的情緒。國王的病症使他只能是要末讓王后秉政，要末自己承認憲法。況且，這個人所抱有的那種在 1850 年曾成為他的思想負擔的顧慮現在已經消除。那時，他不過是普魯士軍隊的最高長官，這支軍隊只效忠於國王，並不效忠於憲法。如果他在 1850 年對憲法宣誓，那他就會使自己所統率的軍隊受到約束。按照現在的情況，他是可以宣誓的；但是，如果他願意，他只要辭退職務，就能夠讓他的兒子倚仗軍隊的力量來推翻憲法。如果還需要其他佐證的話，那末，他哥哥在最近八年統治時期的例子正好充分證明，憲法對國王的無上權力只是一種紙上的約束，可是同時，從財政觀點來看，憲法簡直變成了天賜財源。請回想一下，在 1842 年到 1848 年這段時期內，國王在財政上遇到多少困難：打算通過 *Seehandlung* <sup>404</sup> 借款，結果落空；向路特希爾德家族借貸幾百萬美元竟遭到悍然拒絕；1847 年的小額借款也被聯合議會否決；國庫完全空虛。而另一方面，可以把這些同 1850 年即憲法誕生的第一年在財政方面出現的順利情況比較一下，當時有 7 000 萬赤字的三個預算，轉眼之間就由兩院彌補上了。的確，誰要是不抓住這樣一棵搖錢樹，他准是一個大傻瓜！就人民而論，普魯士憲法只是給官僚制度的傳統力量增添了貴族的政治影響，而對於王權來說則相反，由於這部憲法，它已經能夠舉借一筆國債，並且把年度預算增加一倍以上。

這部憲法的歷史本身是近代史上最異乎尋常的篇章之一。起初，在 1848 年 5 月 20 日，康普豪森內閣草擬了一個憲法綱要，提

交普魯士國民議會。這個組織的主要工作是修改政府提出的草案。正當國民議會忙於這項工作的时候，它就被波美拉尼亞的刺刀驅散了。1848年12月5日，國王恩賜了一部御制憲法，然而這不過是鑒於時代還帶有相當革命的色彩而被拿來搪塞的臨時票據。為了審查這部憲法，召開了兩院會議，而兩院所做的這項工作正好是在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進行的。這兩院很像是普魯士式的路易十八的 *chambre introuvable*<sup>405</sup>。可是國王還是猶豫不決。這張“紙片”，雖然有着甜言蜜語，浸透着忠誠的氣息，刻着中世紀的圖案花紋，仍然不合國王的口味。國王用盡種種辦法使那些憲法兜售者泄氣，而後者却下定決心，不惜蒙受任何屈辱，不怕做出任何讓步，要弄出一部不問內容只求名義的憲法，哪怕卑躬屈膝也要達到目的。實際上，國王像連珠炮似地發出的左一篇右一篇的咨文所勾銷的，不是負責審查憲法的兩院制定的決議，因為兩院只是保持着一种被動的态度，相反地，它所勾銷的是國王的大臣們以國王本人的名義陸續提出的建議。今天，他們提出一个條款，過兩天，當這個條款在兩院被通過以後，又發現其中有不足的地方，於是國王宣布對它 *sine qua non*〔一定要〕加以修改。最後，國王覺得這套把戲玩膩了，便在1850年1月7日的咨文中決定採取一个最後的和徹底的步驟，試圖迫使他的忠實臣民絕望地放棄他們對憲法的热望。他在一篇專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發出的咨文中提出了一連串修正案，他以為，這些修正案大概就連兩院也无法消受。然而兩院居然把它們囫圇吞下去了，而且做得那麼爽快。這樣一來，就只好作罷，頒布憲法。國王的誓詞使人感覺出這部憲法是用怎樣滑稽可笑的方法炮制出來的。國王在他“認為有可能借助憲法進行統治”的條件下接受了憲法，而兩院把這個含糊其詞的

声明当成了誓言和全数的兑现，广大人民群众则对这项交易采取了完全冷漠的态度。

这就是这部宪法的历史。关于它的内容，我想在另一篇通讯<sup>①</sup>中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一下，因为凑巧碰在一起的情况现在已经使这“一纸空文”至少在表面上成了那些互相倾轧的政党的行动基地，而这些政党，在普鲁士也像在别处一样，注定要掀起那迟早必将登上舞台的普遍运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10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6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652—656 页。——编者注

## 卡·馬克思 普魯士的摄政

1858年10月13日于柏林

經過一場严重斗争以后，普魯士的宫廷事变终于成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普魯士亲王从国王的普普通通的代理人 and 代表一变而成为一国的摄政王。甚至从这出王朝戏的最后一幕中也可以看出，王后和宫廷奸党是多么不甘心让出自己的权位。他們的公开代表人物内务大臣馮·威斯特华倫先生，拒絕在国王将王权让给自己兄弟的法令上签字；他提出辞职，而由馮·弗洛特韦尔先生继任。另一方面，国王的让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像法令中所說的，“只是暫时的，到我本人重新有能力履行国王职责时为止”，而且保留“亲自处理与我本人有关的王室事务的权力”。前面一条使摄政王的权力具有临时性质，后面一条是让王后繼續把持王室的錢財出入。这种有条件的让位表明宫廷奸党虽然被迫让出了这个重要障地，但仍然立意不就此作罢。的确，誰都知道，上星期国王得了中風病以后，他的私人医生們已宣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們也无法保证他哪怕再多活一年了。他們的这一宣布，对于馮·曼托伊費尔先生下决心倒向另一边和打起普魯士亲王的旗号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曼托伊費尔有一点粗淺的近代历史知識，他懂得馬扎里尼的权势比路易十三的寿命长。他知道，派西沃虽

然由于充当了名为“国王之友”的宫廷奸党的盲目工具，并且按照王后和約克公爵的指示办事，而大大得罪了王太子，然而，任凭輝格党的钻营家們怎样巧施詭計，屢发不祥之兆，他还是討得了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的欢心，保住了他的官职。正是由于曼托伊費尔的这种倒戈行为，才迫使宫廷奸党以及在幕后支持它的容克們退却。如果不是这样，普魯士亲王就只能选择一条出路：或者仅仅满足于挂起一块王权招牌，或者呼吁人民群众予以干涉，后者无论同霍亨索倫王朝的傳統或他自己的原則都是不相容的。曼托伊費尔的見風轉舵使他摆脱了这个左右为难的煩惱处境。他对这个变节分子是否感恩，有待来日证明。不过，曼托伊費尔这个名字是同三月革命的失敗密切联系着的，他是普魯士 coup d'état [政变] 的主要策划人，因而他的內閣看来也是对人民群众的“篡夺行为”的活生生的持續抗議；单单这一点事实，就很可能使亲王不跟这位 «Mann der rettenden Tat» [“救命恩人”] 毅然决然地决裂，尽管亲王同他有个人嫌隙。

亲王和国王之間的对照带有霍亨索倫王朝的家傳特征。在一个多多少少有些驕奢淫逸、多多少少迷恋于拜占庭式的神学观念、多多少少卖弄中世紀的浪漫主义的小丑式的人物之后，跟着来的总是一个集軍曹、官僚、教师于一身的板面孔的人物。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間的对照是这样，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无伤大雅的奇怪行徑和現任摄政王的冷靜平庸之間的对照也是这样。

現在有許多人认为——而且英国报刊也在大事傳播这种看法——这位摄政王的上台会立刻在普魯士的外交政策上引起变



革，使普魯士擺脫俄国的控制而更向英国靠攏。很可能摄政王本人也抱有这种想法。他当然从来也沒有忘記，尼古拉曾在华沙會議上对身为普魯士全权代表和王室近亲的勃兰登堡伯爵橫加侮辱，以致逼得伯爵自杀<sup>406</sup>。与此同时，尼古拉曾强迫——而且是非常无礼地强迫——普魯士屈从奥地利的要求，同意让奥地利军队开往汉堡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并且乖乖地在整个欧洲面前蒙羞受辱，这就使他对上述的人身侮辱更是痛定思痛。不久，当英国公布了英国駐彼得堡大使的秘密函件时，这位絕非寬宏大量的亲王再一次为那位已故皇帝的有意的輕蔑态度所震惊：这位皇帝在估計一旦瓜分土耳其帝国，欧洲各大国可能采取什么态度时，对普魯士竟不屑一提。如众所周知，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会見中，普魯士亲王在起初采取了一些气势汹汹的步驟以后，对他这位莫斯科姻兄的专橫傲慢报之以执拗的沉默。在对俄战争期間，宫廷奸党怀疑亲王倒向西方联盟国家，因而对他的私人活动进行周密的 surveillance〔監視〕和刺探，这是偶然在波茨坦的一件轰动一时的訴訟案中揭露出来的。而亲王則查明了，宫廷奸党的头子們和国王的寵臣馮·格尔拉赫將軍、樞密官尼布尔（一位大历史学家的儿子）是彼得堡政府的直接代理人，他們經常向彼得堡政府詳細报告內閣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并从它那里接受任务，其中甚至有像王国各地 corps d'armée〔軍团〕的部署情况这种問題。随着尼古拉皇帝的逝世，私人冤仇的起因消失了。再說，看不出亚历山大二世会像尼古拉那样在他舅父心中引起畏惧的情緒（尼古拉在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长女結婚以后是很懂得怎样使霍亨索倫王朝产生这种畏惧情緒的）。也很可能同英国新建立的亲戚关系会对摄政王的外交政策的傾向有一些影响。但是实际上，外交政策不

决定于亲王个人的好恶，而是决定于他的国家的地位。如果普魯士不过是德意志国家之一，那問題的解决倒很简单；可是，普魯士不仅仅是奥地利（而奥地利又与俄国为敌）的競争者，而且普魯士王国的大政方針是依靠俄国的援助来霸占全德。正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同俄国結成联盟，普魯士才得以从瑞典夺走波美拉尼亚。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同叶卡特林娜締結联盟，弗里德里希大帝才能够把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据为己有，才能够得到波兰自古就有的領土；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如法炮制，收到了同样的效果。正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庇护下，普魯士才得到了萊茵河流域各省，同时得以用損害薩克森的手段实行擴張。而一旦法国人进犯，普魯士所必須依靠的又是俄国。所以，普魯士国家的地位到底能不能使它的統治者摆脱俄国的控制，公众在这个問題以及国内政策問題上的期望是否不致于落空，是很值得怀疑的。

卡·馬克思写于1858年10月13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8年10月27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465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普魯士狀況

1858年10月16日于柏林

如果說一般人对普魯士宪法一无所知或知道得极少，那末他們至少可以拿这样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实来自慰：連普魯士人民自己也同样茫然无知。就在这个时候，柏林、布勒斯劳、科尼斯堡、科倫以及自由派的所有其他大小城市的选举委员会，都在忙于翻查普魯士宪章的发黄了的篇頁，看看从这个神秘的武庫中能找出什么适用于目前情况的合法的进攻武器或防御武器。在最近十年間，即当这个宪章要人家把它看做具有內在价值的东西，看做最終的結果，看做最后的决定的时候，大多数普魯士人对它的态度非常冷淡，对它并不比对摩拏法典<sup>407</sup>更感兴趣。但是，当一发现这个官方的廢物由于时势关系而变成一把双刃利劍的时候，看来誰都急切地想認識一下这个“无名宝物”了。另一方面，官方感到非常恼火，唯恐知識之果在这一次也和在那古时代一样，竟是罪恶之果，并且对那突然席卷了普魯士人民的宪法狂热，投以阴郁的、而且我不能不說是完全有根据的怀疑目光。恰好現在普魯士亲王在考虑 coup d'état [政变] 可能是他不久将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了。如果选举委员会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計劃——在选出的議院中，由1848年国民議会时代的自由派，即由瓦尔德克、雅科比、洛貝尔图

斯、翁魯、基尔希曼之类的人物构成多数，普魯士亲王恐怕就不得不在那个 1848 年 12 月間王权似乎获胜的戰場上再来一次决战。正在重新觉醒的人民大众，只要吐口气、哼一下、喊一声，都足以使他不知所措。如果他真的像自己手下的一部分宫廷奸党建議的那样，去組織一个俾斯麦-申豪森內閣，从而公然向革命挑战，粗暴地連根扼杀人們似乎因他执政而产生的些微希望，那末，选出的議院按照宪法第五十六条和他自己的詔书，就可以将他摄政的“有无必要”問題提出討論。这样，在他的統治一开始时，就会对他的执政权是合法的还是篡夺的問題进行激烈而危險的辯論。另一方面，他哪怕是暂时地允許运动扩展开来，让它自由地采取明显的形式，那末他的困难就会更加严重，因为旧的保皇党会翻轉来攻击他，說他又启开了革命的閘門；保皇党人认为，只要让他們在患瘋病的老国王的旗帜下进行統治，他們凭着自己独有的經世治国之才，是能够把革命的閘門堵住的。君主国的历史表明，在社会革命的时代，对于一个坚决而果断的，但同时又粗暴而守旧的人說来，最危險不过的是做一个动摇、軟弱而又不讲信义的統治者的继承人。同弗里德里希-威廉极其相似的詹姆士一世，經受了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大風浪，而詹姆士二世由于抱有那种甚至一度助长查理二世的奇特威望的关于神授王权的幻想，而遭到了沒沒无聞的流放。也許，威廉亲王正是由于本能地預感到他会遇到这类困难，才执拗地反对那位在 1847 年等級联合省議会的开幕式上曾口出狂言的国王頒布宪章。国王那时曾經說道：

“我觉得有必要郑重声明，任何人世間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我把国王和人民之間的天然的、牢固的关系变成条約的、宪法的关系；我永远也不允許在上帝和我的国家之間插进来一張写滿字的紙片，或者說，插进来一个

要用自己的条文来实行統治并且要用它們来代替过去的神圣信仰的第二天神。”

我在前一篇通訊<sup>①</sup>里已經說过，作为目前这部宪法的基础的，是那由康普豪森內閣起草并經 1848 年的革命的国民議會加工过的宪法草案，但是在它成为目前这部宪法的基础之前，*coup d'état* 已經毀掉了它原来的样本，并且把它复制成欽定宪章这种歪曲形式；欽定宪章又由为审查它而召集的两院大刪大改了一番，最后国王发出的无数敕令对这个业經修訂过的宪章进行了修改。整个这一无休无止的过程，就是为了要把这块七拼八凑的东西所具备的那些令人想起它的革命淵源的特点彻底抹掉。然而这个目的並沒有完全达到，因为所有現成的宪章都必須或多或少仿照法国的样式，不論你如何摆弄它們，也不能使它們取得任何鮮明的獨創性。所以，如果粗略地讀一讀 1850 年一月宪法的第二篇，即論述“普魯士人的权利”、論述这些普魯士的所謂 *droits de l'homme* [人权] 的那部分，那末乍看起来它那里的条文是相当动听的：

“一切普魯士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障个人自由。私人住宅不容侵犯。任何人应受的合法审判都不得予以剝夺。处刑除由司法官員按合法执行职务的程序进行外，不得用作威胁的手段。財產不容侵犯。褫夺公权和沒收財產被排除于現行法律之外。除非涉及兵役問題，国家对迁徙自由不得侵犯。宗教信仰的自由、組織宗教社团和無論在私宅或教堂共同做礼拜的自由，均予以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享有不依赖于宗教信仰。准許只按照民法履行結婚手續。科学和科学学說享有自由。开办国民学校以使青年教育有充分的保证。任何人都都有教学和办学校的权利。国民学校的財務由各地基层单位負責管理。初等国民学校实行免費教育。每一个普魯士人都

<sup>①</sup> 見本卷第 645—647 頁。——編者注

有權利以口述、書寫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見。與行使此項權利有關的犯罪案件由普通法庭審理。一切普魯士人都有權利舉行集會，但只限於室內並且不得攜帶武器。他們有權利組織宗旨不與法律相抵觸的社團和俱樂部。一切普魯士人都有請願的權利。通信秘密不受侵犯。一切普魯士人都必須服兵役。武裝力量只能用於法律規定的特殊場合。限嗣繼承制由法律加以禁止，現存的封建財產制應改變為私有財產制。地產允許自由劃分。”

可是，如果你從這些寫在紙上的“普魯士人的權利”轉過來看看它們體現在現實中的可憐樣子，那末你就會充分認識到——如果你過去從未有過絲毫認識的話——理想和現實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着何等驚人的矛盾。你每邁一步，甚至只是走動一下，都要受到萬能的官僚制度這個純粹普魯士土生土長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沒有 «*ob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沒有當局的許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結婚、不能寫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買賣、不能教書、不能學習、不能集會、不能開工廠、不能遷徙，什麼都不能做。至於科學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領主裁判權、廢除等級特權、消滅限嗣繼承制和長子繼承權，所有這一切都純粹是瞎說。在所有這些方面，普魯士在 1847 年要比現在自由。為什麼會有這個矛盾呢？原來普魯士憲章所恩准的這一切自由受到一個重大保留條件的限制。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範圍內”被恩准。但現行的法律恰好是專制獨裁的法律，它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時候制定下來的，而不是隨着普魯士憲法的誕生問世的。這樣，在憲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內容之間就存在着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事實上後者已使前者成為泡影。另一方面，憲章在一些最緊要的問題上要人去看構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應該由構成法加以詳細發揮。但這些構成法本身是在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下制定的。它們取消了

甚至在君主专制政体最反动时期都有的那些保证，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独立性。宪章还不满足于这些攪混在一起的溶解剂——旧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还給国王保留了在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使宪章在任何政治問題上停止生效的权力。

尽管如此，毕竟存在着两个普魯士：宪章的普魯士和霍亨索倫王朝的普魯士。各选举委员会現在也就在忙于解决这个矛盾，尽管选举法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11 月 3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471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普魯士狀況

1858年10月19日于柏林

两院定于本月21日举行联席会议，届时亲王将要求它們“承认摄政的必要性”。不用说，这个要求会馬上被同意，而且是俯首帖耳地同意。可是，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说宪法的形式上的存在是从1850年1月30日开始，那末它作为一个反对王室特权的有效工具的实际存在則应该从1858年10月21日算起。同时，为了打消无益的热情，查封若干家报纸就提上了日程。如果注意到这些触犯律条的报纸的温順和善的特点，那只能对此感到莫大遺憾。这些报纸中最出名的要算“人民报”和“国民报”<sup>408</sup>；后者曾靠着它那体面的平庸、怯懦的退让和純普魯士式热情的洋溢，設法渡过了反革命大風暴，并且把运动（对运动的危险的极端行动，它非常明智地未予同情）的可怜的殘余，变成了叮当作响的銀錢。經過洪水浩劫之后，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比世界洪水发生以前的祖先，外貌长得較为悅目，尺寸变得較为适度了。社会的形成过程也受同一个規律的支配。虽然如此，我們仍然不禁得出这样一种結論：如果必須把柏林报界的侏儒看做是德国革命的合法代表，看做是它的最終的体现者，那末德国革命本身的渺小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不管怎样，这些报纸的編輯們虽然不是什么英雄，甚至也不是



什么普通的战士，但至少是善于推測的能手。他們感到正在发生某种动乱，作为他們那种冒牌自由主义所必需的背景、并且賞識他們的貨色的那个政治体制，正在迅速垮台。因此，他們为了使自己的主顾相信他們确实在守着崗位，就大胆地发出些低声的牢騷和埋怨的叫声。他們当然不咬人，甚至也不汪汪大叫。他們現时的全部胆量就是把亲王捧上天。他們甚至还像“国民报”最近所做的那样，劝他任意动用国庫；但是——这也是事情最滑稽的地方——他們对亲王的尚未見諸事实的政績的那一番吹捧，全都变成了对曼托伊費尔內閣的旧日施政的譴責。他們預先給亲王以信任，这使亲王感到恼火；他們事后对內閣表示不信任，这又激怒了內閣。但是，要想恰当地評价他們，就必须去讀他們的大作的原本。用任何一种別的语言，甚至用至少发着独特的 *odeur de mauvais lieu* [臭气]的十二月式的法語，也表达不出他們叨念的那套无聊乏味、又臭又长的廢話。也許有人以为他們只是在讲隱語，因为他們是在同警察捉迷藏；可是那就大錯特錯了。实际上，他們讲的都是他們所要說的，只不过极巧妙地按照自己的利益把順逆两种方法配合起来使用罢了；他們在浩如滄海的白水里只注入微乎其微的一滴药剂。另一方面，內閣大臣們似乎知道这样一种地质現象：水的不断作用能把最坚硬頑强的岩石冲毀而化为碎石。使他們恼火的与其說是这些謹小慎微的聪明人的吞吞吐吐，倒不如說是似乎由这些人所反映的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所以他們使用那一向近視的官僚方法，为了打駱背上的袋子——即公众輿論——而去打駱子。标志着新政权的开端的重新查封報紙，按照保皇党人的說法，是乱哄哄地表示对亲王寄予希望所应得的回答。官方的自由派說，不，亲王的政权还没有开始；在他得到两院的承认并宣誓

就任攝政王以前，他對憲法的極大尊重使他不能不允許內閣大臣們——按照憲章的規定——對自己的行動負責。但是要知道，在我們一切君主國的憲法中，——不管它們是照英國式還是照法國式仿造的，——這種“內閣大臣的責任”是個非常難捉摸的概念。在英國，它似乎是以最實際、最鮮明具體的形式存在的，而它在那里意味着：在某些隆重莊嚴的時刻，要末是由輝格黨把自己的不負責任的職責移交給托利黨，要末是由托利黨把它移交給輝格黨。內閣大臣的責任在這裡就是追逐有利可圖的職位，這種追逐已經成為議會中各黨派的主要操勞了。擔任內閣大臣職務的人在任職期間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他代表立法多數，而立法多數，為了幫助他取得該職位，則聽命於他的黨的議會領袖。在普魯士，資產階級最熱中於追求的目標是把內閣大臣的職位變為可以在議會比賽上贏得的獎品。但是到目前為止，普魯士內閣大臣的責任無論從什麼意義上說，都還是一個謎。憲章第四十四條規定：

“王室內閣大臣是負責任的；王室政府的一切政令，必須由內閣大臣簽署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內閣大臣負有全部責任。”

然而關於這種責任制卻沒有任何法律。上述條文本身也沒有說明內閣大臣是對誰負責的。實際上，每當兩院敢於用投不信任票來威脅內閣大臣時，他們就干脆告訴兩院說，他們對此毫不反對，因為內閣大臣雖然的確是負責任的，但只是對他們的君王負責。內閣大臣的責任問題在普魯士像在路易-菲力浦時代的法國一樣，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事實上這是整個官僚集團的責任問題。內閣大臣是這個擁有無限權力、事事都插手的寄生集團的首領，按照憲法第一〇六條，他們所屬的下級官吏只能唯他們的意圖是從，下級官吏不得過問內閣大臣的命令是否合乎法律，並且對這

些命令的执行是沒有責任的。这样，官僚的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执行机关的权威就仍然原封不动，而宪法規定的“普魯士人的权利”变成了一紙具文。

即将到来的选举是目前一切政党企图利用的一根杠杆；但是恰恰是在有关选举的問題方面，現行的欽定宪法已經把自己的革命淵源的一切痕迹連根鏟除了。誠然，为了給官吏們从議會方面另辟一个收入来源以增加他們微薄的薪俸，关于人民代表領取薪金这样一条滿有平民味道的法律保存下来了。凡年滿 25 岁的普魯士公民都有被选举权这一条也保存下来了。但是，有关选举权和选举机构方面的安排，不仅把人民的大多数排除在外，而且还使其余享有特权的一部分遭到官僚集团最肆无忌惮的摆布。选举分兩級。首先选举复选人，然后由复选人选举議員。在初选当中，不仅不繳納直接稅者都被排除在外，而且全部初选人还要分成三类：最高、中等、最低稅額繳納者。三类中的每一类都像塞尔維烏斯·土利烏斯王<sup>409</sup>的特里布斯一样，选举同等数目的議員。然而就是这个复杂的层层过滤的过程看来还是认为不够，因为官僚集团此外还得到了把选区任意划分、拼凑、改变、分开、合并的权力。譬如說，如果疑心某一个城市傾向于自由派，那就可以把它淹沒在乡村选民的大量反动选票中；內閣大臣只凭一紙命令就能把这个傾向于自由派的城市和反动的农村地区合并成一个选区。这就是束縛着选举运动的枷鎖，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可能例外地掙脫这种枷鎖的束縛。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11 月 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47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实现了。虽然格拉克列亚半岛上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伤害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并使它丧失了一块不大的领土<sup>410</sup>，但是俄国在战争结束后毕竟还是得到不少好处。“病夫”<sup>411</sup>的状况更是大大恶化了；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希腊人或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比任何时候都更认为俄国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问，最近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就已表现出来的并且为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极端衰竭和软弱，已足以说明苏丹的全体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普遍地激动不安。因此，俄国以暂时牺牲一小块领土为代价（因为很明显，俄国一有机会就要收回这块领土），在实现它对土耳其的计划方面推进了很远。加紧分裂土耳其和确立自己对于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刚开始时竭力追求的目的；而谁能说，现在俄国不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

这样，俄国甚至由于这场对它不利的战争也得到了好处。可是，俄国还是要实行报复，于是它选定了一个没有人能与它匹敌的

領域——外交領域。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場代价巨大的战争时，俄国則保持中立，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它才插手干預。結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俄国这时的处境确是少有的順利。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所談的是其中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搖搖欲墜，它甚至沒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連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經既不能够駕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級官吏爭执不下，并且在英国国内討論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本国皇帝的意旨行事这样一个重要問題的时候，俄国人已占有了黑龙江以北的領土和該河南岸滿洲的大部分土地；他們在那里建筑了工事，进行了铁路綫的勘查工作并預定了未来的城市和港口的地点。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尽管它正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領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挺身出来充当衰弱的中国的秉公无私的保护人，而在締結和約时儼然以調停者自居；如果我們將当时所締結的各项条約比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俄国有利。

各参战国得到的利益（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具有純粹商业的性质，而且正如我們以前所指出的<sup>①</sup>，这些利益大部分都是虛妄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的貿易（除鴉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度

---

① 見本卷第 621—626 頁。——編者注

棉花以外)，还是应该像过去一样，主要只限于中国商品即茶叶和絲的出口，并且这种出口与其說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給予多少方便，不如說是取决于外国的需求。在南京条約訂立以前，世界各国已經設法弄到茶叶和絲，而在这个条約訂立以后，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貿易轉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沒有进行什么貿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屬於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至于在长江上开放貿易，为了謹慎起見，在中国皇帝还不能完全恢复自己在长江沿岸起义地区內的权力以前，必須延期，也就是說遙遙无期。但是关于这个新条約的价值，还产生了另一些怀疑。有人說，英中条約第二十八条所規定的子口稅純屬子虛。过去曾有人认为这种稅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意見所持的根据，只是說中国人不很需要英国商品，因此这种商品根本就不銷往內地，然而有些能滿足中国人需要的、經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却甚至銷到沿海各地。人們沒有想到，如果这种子口稅是存在的，那末它們也会像适用于英国商品一样适用于俄国商品。可是，曾被專門派往中国內地的温格罗夫·庫克先生，未能发现这种假想的“子口稅”，他在答复人們公开向他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問題时承认，他已“痛心地認識到，我們对中国的不了解实在是极其明显的无知”<sup>412</sup>。另一方面，英国貿易大臣約·沃·汉利通过报纸回答“是否有材料說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內地稅”的問題时，十分清楚地說道：“对于你們感兴趣的、有无关于中国內地稅的材料問題，我无法奉告。”这样，約翰牛除了頗不愉快地意識到額尔金勋爵在要求賠款时未規定付款期限，并且将战事由广州轉到京都只是为了訂立一个将使英国軍隊重新由京都回到广州去作战的条約以外，脑子里还产生了一种模糊的疑虑，以为英国不得不从

自己的口袋里掏錢來償付條約中所規定的賠款，因為第二十八條很可能誘使中國當局對英國製造品規定 7.5% 的子口稅，這種稅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變為 2.5% 的進口稅。倫敦“泰晤士報”為了不讓約翰牛過細考察自己的條約，認為必須假裝遣怒於美國公使，氣勢汹汹地責罵他把事情弄糟了，雖然事實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戰爭的失敗毫不相干。

因此，就英國的貿易來說，和約所帶來的只是新的進口稅和一系列的條件，這些條件不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就是中國人無法遵守的，因而隨時可能成為挑起新戰爭的借口。英國沒有增加任何新的領土——如果它不給予法國同樣的權利，就不能提出領土要求，可是讓法國借助英國進行的戰爭來在中國沿海得到領土，對於英國來說是非常不利的。至於俄國，它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顯的利益以外，還得到了黑龍江沿岸地區，這個地區是它悄悄地占領的。俄國並不滿足於這一點，它已設法成立了俄中委員會來確定邊界，而我們知道，這種委員會在俄國手中是什麼東西。我們曾看到這種委員會在土耳其的亞洲邊界上的活動情況，二十多年來它們在那里把這個國家的領土一塊一塊地割去，直到最近這次戰爭才打斷了它們的活動，所以現在這項工作又該重新開始了。其次，在條約中有关于調整恰克圖和北京之間的郵政的條款。從前那種不定期的、只為中國當局所容忍的通信路綫，現在要變成定期組織的和法定的通信路綫。在這兩個地點之間預定每月有一次郵政交通，而且相距約 1 000 英里的路程只需走十五天；此外，在這條路上，每隔三個月將派出一支商隊。無疑地，中國人或者不願執行或者不能執行這個職務；既然郵政交通現在已作為權利賦予俄國，其結果是這種交通將逐漸轉入俄國人

手里。我們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軍事堡垒綫<sup>①</sup>；我們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綫将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关于不列顛統治中国的梦想将完全破灭，因为俄国軍隊不論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

不难想像，在北京設立常駐使館將有什么样的結果。請回想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只要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鋒的地方，俄国外交总是占上風。俄国公使在几年以后就能在与北京相隔一个月路程的恰克图拥有足以达到任何目的的强大軍隊和一条供这支軍隊順利進軍的道路，——这样一位俄国公使在北京将是威風凜凜的，有誰能怀疑这一点呢？

十分显然，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細亚和吞并了滿洲，俄国使自己的統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的領土上（俄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內），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細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滿俄国的移民。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战略障地之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障地之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領土尔克斯坦威胁着印度；占領滿洲威胁着中国。而拥有 450 000 000 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現在是亚洲的举足輕重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0 月 25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11 月 18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484 号

---

① 見本卷第 636—642 頁。——編者注



## 弗·恩格斯 对蒙塔郎貝尔的起訴

1858年11月6日于巴黎

蒙塔郎貝尔伯爵是投到路易-拿破侖的 coup d'état 方面去的法国第一个比較聞名的人物。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他曾在众議院代表天主教政党；在共和国时期，他曾屬於国民議會中那个由奥尔良派和正統派組成的反动政党，这个政党为了更有效地顛复共和国而在表面上接受了共和国，尽管它希望为波旁王朝的这个或那个支系效劳，实际上却正好为路易·波拿巴效劳，这位路易·波拿巴在一天早上把他們全部逮捕和遣散，并且承蒙酒醉酩酊的大兵的恩情掌握了絕對无上的权力。蒙塔郎貝尔遭受到这次强迫解散之后，加以他过去是一个奥尔良派分子，于是便成了头一个、并且除开杜班先生这“一个可耻的例外”至今还是唯一的投向波拿巴营垒的法国議會知名人士。当时整个法国陷于政治瘫痪的情况下，蒙塔郎貝尔的这一背叛行为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它对于当时还靠一道由士兵組成的厚墙作为护壁而与整个法国分隔开来的新政府說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使蒙塔郎貝尔迷住心窍的，是路易-拿破侖政府的明确的天主教傾向。据傳他还到手了别的更具体的东西。有一个时期，蒙塔郎貝尔以立法团成員的資格支持政府；他討好和奉承那个以軍事独裁代替議會辯論的人；

他下流到以能置身于这个幸运的篡位者的傀儡行列，受他的委托去按照他的意旨通过法律和撥款为荣（正是通过法律和撥款，而不是議論，即或議論，也只能夸耀他）。但是，蒙塔郎貝尔这样自願貶低身价，并未得到任何报偿；他已經尽到了自己的作用；他已經同先前在政治上的朋友永远分手了；他已經永远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他已經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危險的对手了；他已經像一只橘子一样被榨干了——为什么还要再对他客气呢？蒙塔郎貝尔受到冷遇之后，发现路易·波拿巴用以拯救过并且还在繼續用以拯救法国的方法，即迫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意旨行事，終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不禁把他在众議院中的地位同十年或二十年以前他在那同一座大厦里通常所占的地位作一番比較；于是他开始逐渐反对起政府来了。他这样做，曾在一定限度內得到了容忍；他最初的两三篇演說甚至得到許可予以发表。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和少数曾宣誓效忠政府的共和派議員以及一些心怀不滿的波拿巴分子，便在这个可怜的議會里形成了一种反对派——这个反对派跟它所屬的机构同样可怜。

这种对皇帝的进一步侵犯行为表示反对，看来使蒙塔郎貝尔在一部分資產階級中赢得了些許声誉，而他显然想找机会施展某种大胆而出人意外的手腕来提高这种声誉。他和“記者”杂志<sup>413</sup>有联系，这个杂志几乎完全是屬于布洛利家的，因此它所执行的是奥尔良派的政策。蒙塔郎貝尔趁布洛利家不在巴黎的空隙，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英国議會关于印度問題的辯論”的文章，如果謹小慎微的布洛利父子能當場施以影响，这篇文章是不会准予以現有形式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蒙塔郎貝尔企图为他皈依波拿巴进行 *amende honorable* [公开的懺悔]；他把英国的議

会政治捧上了天，借以毫不隐諱地斥責法国当前的政治制度。

“当我的耳朵有时被議会記者的窃窃私議声，有时被那些自命为我们主人的狂信家或者那些把我们看做牺牲品的伪君子的叫喊声鬧得发聾的时候；当我在一种充滿了奴性和腐朽臭味的环境压力下感到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赶紧跑开去呼吸一些比較清新的空气，并且到英国的自由之海去洗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海澡…… 如果在翻开这些篇頁的人們中，有誰崇尚那种时髦〈波拿巴主义的和君主专制的时髦〉，那末我就要坦率地对他們說：停下来吧，別讀下去了；我要写的东西不能博得你們的青睞或者使你們感到兴趣，还是到你們那悠閑自在的肥沃牧場上去安詳地咀嚼吧，不要羡慕那些并不羡慕你們而要保持权利繼續忠于自己的过去、忠于冥思苦索和对自由的憧憬的人們…… 我离开这个宏偉的場面〈下院的辯論〉时头一次感到渾身激动；任何人都会这样，只要他认为政府應該高于侍从室，文明民族應該优于一群只供剪羊毛用的或者在軟弱无力的安全庇护下被赶着去默默吃草的綿羊。”

这番話說得很动听，并且的确很响亮。近来听慣了法国报纸的謾罵和冷嘲热諷的約翰牛，当然十分感激蒙塔郎貝尔对它恭維备至，以致完全沒有想到要察看一下：蒙塔郎貝尔說他要繼續忠于的“过去”究竟是什么。大家知道，蒙塔郎貝尔先生是自願与那些正以窃窃私議声和叫喊声使他的耳朵发聾的議会記者、狂信家和伪君子混在一起的；如果他有意識地沉浸到現在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充滿着奴性和腐朽臭味的环境中去，那只有怪他自己。如果法国現在崇尚的时髦是厌恶任何与緬怀或惋惜过去政治生活相像的东西，那末蒙塔郎貝尔先生大張旗鼓地投到那宣布了以完全和彻底破坏“过去政治生活”为基础的新紀元的营垒里去，就是最先提倡这种时髦的人物之一。至于那些满足于在悠閑自在的肥沃牧場上安詳地咀嚼的人們，蒙塔郎貝尔是不能責备他們的。Coup d'état 原来正是在需要鎮定政治热情和創造这种安宁和悠閑自在的幌子下进行的；如果蒙塔郎貝尔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投到 coup

d'état 方面去,那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的确,无论怎样攻击路易-拿破侖都可以,但是不能指責他在 coup d'état 之后掩飾了自己的政策或意图。他打算把法国人民变成一群只供剪羊毛用的或者在軟弱无力的安全庇护下被赶着去默默吃草的綿羊,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也不曾有过任何誤解。蒙塔郎貝尔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很清楚这一点。如果他現在仍然挺身而出,要我們欽佩他,把他当做一个不羡慕旧日的波拿巴派朋友而繼續忠于自己的过去的人看待,那我們就要問:你指的是哪一个过去,蒙塔郎貝尔先生?是指你在专制議会里一貫为反动、鎮压和僧侶狂热主义的利益而发言和表决时的过去呢?还是指你在共和国議会时的过去?你在那里跟你那許多議会里的老朋友陰謀恢复君主专制,把人民的各种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結社的权利一点一点地否决掉,亲手为那个冒險家鍛造了武器,让他利用这些武器把你和你的同伙們全都攆出門外。最后,或者是指你在波拿巴的立法团时的过去?你在那里对这个一帆風順的冒險家低声下气,心甘情願投到他門下去当一名侍从。蒙塔郎貝尔先生,在这三个过去中,哪一个包含着你对自由的憧憬呢?我們以为,这需要大多数人好好地“冥思苦索”一番才能弄清楚。同时,路易-拿破侖的政府以提起公訴来回敬了这个不忠誠的僕人,并且本月份就要开庭审訊。我們將有机会把蒙塔郎貝尔先生的义憤与波拿巴政府檢察官的义憤加以比較;而且我們甚至現在就可以断定,就誠悬方面而言,他們两人几乎不相上下。这次审判案本身将在法国轰动一时,而且不管它的結局如何,都将是第二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蒙塔郎貝尔认为有必要这样明目張胆地与現政府决裂并且引起公訴,这件事本身本身就是法国資產阶级的政治生命开始苏醒的重大证明。只是

这个阶级的极度冷淡——政治上的贫乏和智力上的 blasé [衰竭] 才使路易-拿破仑建立了自己的权力。路易-拿破仑只遭到既不依靠资产阶级又不依靠工人阶级的议会的反对，而他却拥有资产阶级的消极援助和军队的积极支持。議員們馬上就被击潰了，但是工人阶级只有经过在全法国进行的一个月斗争以后才被击潰。资产阶级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是心悦诚服地顺从路易-拿破仑，但是他们毕竟是顺从的，并且把他看做是社会的救主，因而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现在，看来他们已经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渴望回到那种由他们或者至少是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而讲坛和报刊只为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的时期。他们显然又开始对自己和自己管理国家的能力充满信心，如果事实如此，他们是会找到方法来表现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在法国将会发生一个相当于普鲁士目前所进行的运动的资产阶级运动，正如 1846—1847 年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运动曾经是 1848 年革命的先声一样，这个运动也必将是一次新的革命运动的先声。看来路易-拿破仑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在瑟堡对一个多年不见的人说道：“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有教养的阶级不愿意跟着我走，这是他们的过错；但是我有军队，因此我不在乎。”可是，他很快就会发现，一旦资产阶级群众公开出来反对，军队，尤其是有他那种军官和将军的军队，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欧洲大陆看来就要出现一个动乱的时代。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1 月 2 日  
左右

载于 1858 年 11 月 2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8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馬克思 新內閣

1858年11月6日于柏林

經過再三躊躇以後，新內閣終於組成了。這個內閣最好稱做普魯士親王夫人的內閣。它比柏林庸人們所敢于希望的還要更帶有自由主義色彩，而且正如對一個女人的抉擇所能預期的那樣，在組織它時很少照顧到各個不同成分的協調一致，而是只求達到一個主要的目的——暫時博得各方面的歡心。親王夫人以道地的貴婦人姿態應酬了每個人：為了天主教徒，她任命了一個信奉天主教的人<sup>①</sup>為首相，這在普魯士是史無前例的；為了那些狂熱的新教徒，把國民教育部交給一位虔誠的福音派<sup>②</sup>掌管；為了那些有反俄傾向的人，把陸軍部委派給一個曾經完全由於沙皇尼古拉的要求而被免去這一職務的將軍<sup>③</sup>；為了那些妒恨奧地利的人，把外交部委派給一位曾因不肯俯首聽命於施瓦爾岑堡公爵而辭去這一職務的人<sup>④</sup>；為了那些滿腦袋官僚政治的人，任命昔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一位遺老<sup>⑤</sup>為內務大臣——這個職位實際上是那包括行

① 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編者注

② 貝特曼-霍爾威克。——編者注

③ 博寧。——編者注

④ 施萊尼茨。——編者注

⑤ 弗洛特韋爾。——編者注

政 (Regierung) 以至警務在內的整個官僚大軍的首腦；為了自由派，給那位曾在 1848 年革命所產生的第一屆內閣中任首相的人<sup>①</sup> 在內閣中留了一個不管部大臣的位置，這個官職有些像英國政府中的國務會議議長<sup>414</sup>；為了自由貿易派，把帕托夫先生請進了財政部；為了保護關稅派，讓海特男爵仍繼續執掌貿易部；為了貴族，讓王室的一位親王擔任內閣首腦，而且內閣中所有屬於政治工作的職位都用貴族來擔任；為了資產階級，把司法、貿易、國民教育、內務等負責實際工作的各部都給予普通的或有貴族封號的資產者；為了宮廷奸黨的敵人，以同格爾拉赫將軍等人有私仇的人物組成了內閣的大多數；而為了那些生怕任何類似議會的所謂更換內閣的做法在普魯士風行起來的保守派，則留用了一些曾經做過曼托伊費爾的同僚的大臣，這些人都是曼托伊費爾自己挑選的，他們都在 1848 年 12 月宣布 coup d'état [政變] 的命令上簽過名。

可見，新內閣的特征是折衷主義——造成這種折衷主義的原因是力求面面俱到，然而，這種面面俱到被不肯為之作出任何重大犧牲的堅定決心所限制。我只想提到新內閣的一個特征，這是冷靜的政治觀察家們毫不在意、但柏林的小市民極感興趣的一個方面。在新任命的內閣大臣中，沒有一個人的名字不令人感到是對普魯士王后打出的一張王牌，沒有一個人的名字不令人感到是她那位心懷不善的弟婦為嘲諷她個人而寫下的詩句。關於新內閣人選在柏林較有頭腦的那部分人中間所產生的總的印象，我想借用我的一位柏林朋友的話來描述。正式的公報是發表在“國家通報”<sup>415</sup> 今天的晚報版上，就是說大約在下午 6 時光景才發表的，但

<sup>①</sup> 奧爾斯瓦特。——編者注

是在这以前很久，确切的人选名单已在菩提树街<sup>416</sup>的人群中間随意地傳閱开了。我在那里遇到了剛才提到的那位朋友，他是柏林一个普通的酒店小政客。我問他对新內閣的看法如何，“城里”一般人对它的看法又如何。然而，在告訴讀者他是怎样回答的以前，我必須先向你們介紹一下柏林的普通的酒店小政客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浸透了这样一种思想：柏林是世界第一城市；除柏林以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 «Geist» [“精神”]（这是个无法翻譯的概念，尽管从語源学上讲来，英文的 ghost [鬼魂] 同它是一个字；法文的 esprit [机智] 則完全是另外的东西）；Weißbier [白啤酒]——外地来的蛮子都不爱喝的一种飲料——就是“伊利亚特”中所說的甘露，“艾达”<sup>417</sup>中所說的蜜酒。除了具有这些无伤大体的偏見之外，我們的普通的柏林明星是不可救药的空談家，喜欢信口开河、說短道长、醉心于一种在德国被称做 Berliner Witz [柏林式風趣] 的低級幽默，这种風趣与其說是玩弄思想，不如說是玩弄字眼，它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一点諷刺，有一点怀疑論，还有大量的粗俗不堪的东西。总之，这种人是人类的不太杰出的、同时也不太有趣的标本，但毕竟是一种相当有特色的类型。就这样，我的那位柏林朋友用純粹柏林式的幽默，引用席勒“大钟歌”中的这样一节来回答了我的問題。我还應該 en passant [順便] 指出一点：我們普通的柏林人通常頌揚的只是歌德，而引用的只是席勒。

«O zarte Sehnsucht, süßes Hoffen,  
Der ersten Liebe goldne Zeit!  
Das Auge sieht den Himmel offen,  
Es schwelgt das Herz in Seligkeit.  
O, daß sie ewig grünen bliebe,  
Die schöne Zeit der jungen Liebe!»



(啊,柔情的苦恼、甜蜜的希望、初恋的黄金时代!眼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心头是无边无际的快乐。啊,願初恋的黄金时代的花朵,永不雕謝!)<sup>①</sup>

現在讓我們从爱好詩篇的柏林的酒店小政客回到普魯士的新內閣上来,并且按照法国的一句古老格言:«à tout seigneur tout honneur»[“按其德才,予以荣誉”],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普魯士亲王夫人的密友、首相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亲王身上。他是葡萄牙女王的父亲,曾經坚决不肯做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丈。然而他却是波拿巴的一位近亲。他的母亲是拿破侖新封为王的繆拉特的同胞姊妹。他的夫人是巴登大公未亡人、出自博阿尔奈家族的斯蒂凡尼的次女。所以,这位亲王就是使普魯士王朝、科堡家族和波拿巴王朝之間的亲戚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个环节。南德意志的自由派曾对他极尽誣蔑辱罵之能事,因为他在1849年放棄了他在小小的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邦的王位,并依照家族协定把它卖給了統治着普魯士的那一霍亨索倫家族支系。在他做这项交易的时候,沒有一个德意志公国能值它自己三年收入的价錢,而且这位亲王是最不可能为了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的政治煽动家而繼續維持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国的存在的。此外,在南德意志升起普魯士国旗,不仅是巴登和維尔騰堡的末流政治煽动家所嫌恶的,而且同样也是奥地利所不滿意的。这位亲王逊位之后就以將軍身分到普魯士軍隊里服役,在杜塞尔多夫——一个繪画、雕刻和兵营的城市——駐下来。普魯士王朝的一个旁支从前在这里設有一个小朝廷。因为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参加了1848年革命,他們的行动最高

---

<sup>①</sup> 席勒“大钟歌”。——編者注

竟发展到在国王路过該城时向他举行群众示威，所以为了惩罚他們，杜塞尔多夫就被剥夺了在那里設置弗里德里希亲王朝廷的幸运，而被貶入普通城市之列，必須設法在沒有朝廷主顾的情况下过日子。因此，这位霍亨索倫亲王在杜塞尔多夫的出现就很可以算是一件大事了。他无需有什么出色的作为，单单是他来到此地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大出風头，正如歌德关于一位偉大人物所說过的那样，他是以自己的身分，而不是以自己的行动来酬答人們的。他的声望以異乎寻常的速度从杜塞尔多夫傳播开来。由于他同时既是王族的一員，又是天主教会的信徒，也就为他完成了其余的一切。对萊茵普魯士的那部分狂信的居民說来，再不需要什么别的品德了。可以肯定，萊茵普魯士、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以及波茲南这些地区的势力强大、組織完善的天主教僧侶，对于一个以羅馬天主教信徒为首的普魯士內閣，将不遺余力地加以支持。其实这样倒很好。对于1848年的革命，再沒有比羅馬天主教僧侶所采取的反对态度为害更大的了。他們由于革命而获得了大量好处，即贏得了可以同教皇直接来往、可以建立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的权利，还有一点并不次要的，是可以购置地产的权利。这些圣徒們为了酬答他們所贏得的这些特权，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当然是恶狠狠地来打击它。他們充当了反动派的最殘暴的工具，現在最好不要讓他們再混入反对派的陣营。关于别的內閣大臣，我以后还要找机会再談。

卡·馬克思写于1858年11月6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8年11月24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489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新內閣

1858年11月9日于柏林

“日月流轉，時間的報復難逃。”<sup>①</sup>我在前一篇通訊里已經說過<sup>②</sup>，新內閣的副首相奧爾斯瓦特先生曾任革命時期第一屆正規內閣的名義首腦。當時對他的任命被看做是反動的徵兆；而在十年以後的今天，這件事卻被認為是進步的徵兆。上一次，他是那位被革命風暴從科倫的賬房卷到柏林普魯士國王寶座跟前的谷物商人康普豪森的繼任者。奧爾斯瓦特內閣從1848年6月底存在到同年9月7日。不論他那時可能做些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單是他的名字列在內閣的名單上，在1848年6月就有巨大的意義。他的前任，康普豪森是萊茵普魯士人，奧爾斯瓦特是東普魯士省人；前者是原無一官半職的商人，後者是國家官吏；前者是資產者，後者是貴族；前者富，後者窮。可見，情況很清楚：在1848年6月底，即在三月事件以後僅僅過了一個多月，普魯士革命的鐘擺就從西部搖擺到東部，從與法國為鄰搖擺到與俄國為鄰，從凡夫俗子一邊搖擺到大官僚一邊，從資產階級一邊搖擺到貴族一邊，從錢袋上搖擺到爵位頭銜上。如果除去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意義不算，不能說奧爾

① 莎士比亞“第十二夜”第五幕第一場。——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671—672頁。——編者注

斯瓦特在他的內閣存在的三個月期間做了什麼重大的事情。如果你向一個普魯士人詢問前屆奧爾斯瓦特內閣的情況，他很可能活像古迪布腊斯<sup>418</sup>一樣，把食指戳在額頭上，滿認真地擦來擦去，最後恍然大悟似地說道：“啊，你說的是漢澤曼內閣吧！”的確，奧爾斯瓦特內閣的靈魂是在這以前參加過康普豪森內閣的財政大臣漢澤曼。所以，為了說明奧爾斯瓦特作為首相的活動，我們必須談談漢澤曼。

漢澤曼是亞琛的商人，他在1847年聯合議會上對普魯士王室所說的一句後來廣泛聞名的話，扼要地表達了他的政治信條：“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溫情可言的。”（In Geldsachen hört die Gemütlichkeit auf.）如果許可 *parva componere magnis* [以小比大]，這句話在當時的情況下無異於西哀士的名言：«Le tiers-état c'est tout»<sup>419</sup>。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統治時，即除普魯士各大學的講師以外沒有人敢動筆談論政治的時候，漢澤曼出版了一本將普魯士與法國作比較的书<sup>420</sup>，書中充滿了對法國的好感，但是寫得非常巧妙，語調非常溫和，連普魯士的書報檢查機關也不能夠禁止這一褻瀆的對比。當股份公司在德國還 *rara avis* [極其稀少] 的時候，漢澤曼就雄心勃勃地想成為德國的哈德遜，而且表明了自己在那種目前盛行於所有文明國家並且甚至已由 *Crédit Mobilier* 之類的機構變成一套制度的交易所投機生意方面是個真正的行家。當老派的德國人還認為破產有損於一個人的名聲的時候，漢澤曼就想方設法來證明，輪流破產在商業上幾乎和輪種在農業上一樣有益。這個人在奧爾斯瓦特名義下的施政，所根據的是這樣一種錯誤概念，即以為歷時幾個星期的革命似乎已經充分動搖了舊的國家基石，王朝、貴族和官僚似乎已經受到足夠的凌辱，資產階級

似乎已經永遠取得政治優勢，所以這時要做的事只是把愈益高漲的革命浪潮平息下去了。

內閣如此成功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即打垮那些想打垮現行制度的人，以致它自己存在了三個月就被打垮了；這些自由派的逢迎諂媚之徒，被他們背后的、只把他們當做工具使用的宮廷人物粗暴無比地一脚踢開了。奧爾斯瓦特和漢澤曼結果扮演了上當的騙子的可憐角色。此外，奧爾斯瓦特還陷於必須對普魯士的對外政策負責這樣一種極為不妙的處境，因為他一身兼任首相和外交大臣的職務。如果說內閣的對內政策至少是由被革命成就吓倒的資產階級的明顯利益所決定，那末對外政策完全是由宮廷奸黨所操縱，奧爾斯瓦特不過是他們手中的傀儡。1850年6月，他被任命為萊茵普魯士省省長，但不久即被威斯特華倫先生免職。威斯特華倫先生把自由派逐出普魯士官僚集團，就像蘇格蘭貴族把農民從領地上趕出去那樣鐵面無情。作為下議院（Abgeordnetenhaus）議員，奧爾斯瓦特僅限於進行微弱到只有政治上百依百順的人才能看得出的反對行動。奧爾斯瓦特是東普魯士省自由主義的貴族代表人物之一。這種自由主義所包括的內容是：對反拿破侖戰爭的懷念和當時最開明的愛國者所抱的志向；某些被科尼斯堡這個康德哲學大本營幾乎視為獨有財產的一般觀念；種植谷物的地主和經營谷物出口的濱海城市居民的利益的統一；最後還有各式各樣的自由貿易理論，因為普魯士的這一省份不是工業區，主要靠向英國出售農產品維持生計。

外交大臣施萊尼茨先生以前在1849年就曾經一度擔任過外交大臣的職務，他在短短的任期內密切接近了哥達黨<sup>421</sup>；這個黨一旦得勢，就要把德意志劈作兩半——北部併入普魯士，南部併入

奥地利。实际上，由这两个大的敌对的君主国分吞整个德意志，正是哥达党毫不隱諱的目的。如果它真能弄出两个德国，那結果就会引起你死我活的冲突，造成一次新的三十年战争，最后，两个敌对的德国互相厮杀的收場将是半个德意志被俄国拿去，另外半个落到法国手里。

陆军大臣博宁先生，我在前一篇通訊<sup>①</sup>中已經提到过。这里我只想再补充一点：他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战争<sup>422</sup>中任統帅的时候，与其說他的拿手好戏是迫害丹麦人，不如說是迫害在德意志旗帜下作战的民主派志願軍。这场战争，如所周知，是现代外交中的血腥鬧剧之一。財政大臣帕托夫先生曾經是康普豪森內閣的成員。几年以前，在下議院，他曾被 Krautjunker [頑固守旧的容克地主]指为革命分子。同时他还受到人身侮辱，結果引起了他与普費尔伯爵的决斗。这次决斗使他一度成为柏林公众的紅人。如果帕托夫是在英国，那他会成为利物浦財政改革协会会员的。

关于农业大臣皮克列尔伯爵，只有一点可說：他是“亡人遺信”一书的那位失意作者<sup>423</sup>的侄子。貝特曼-霍尔威克从前做过波恩大学的学监；学监这种职务实际上就是普魯士政府在国家学府中普遍設置的大宗教裁判官。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代，他們迫害政治鼓动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代，他們迫害異教徒。貝特曼执行的是后一种任务。在革命前，他实际上屬於国王手下的宫廷奸党，只是当这个奸党干得“太过分”的时候，他才离开了它。

司法大臣西蒙斯和貿易大臣海特男爵是曼托伊費尔內閣中留

---

① 見本卷第 671 頁。——編者注

下来的仅有的两位閣員。这两个人都是萊茵普魯士人，但又都出生在萊茵河右岸的新教地区。因为新內閣中需要包括一些萊茵普魯士人，同时又必須把萊茵的自由派排斥在外，于是这两个人便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西蒙斯可以拿来夸口的成績是，他使普魯士的法庭墮落到連普魯士王国最坏的时期都沒有达到过的地步。海特男爵是爱北斐特的富商。他在 1847 年曾这样議論国王：“这个人时常欺騙我們，以致我們无法再信任他了。”（Dieser Mensch hat uns so oft belogen, daß wir ihm nicht länger trauen können.）1848 年 12 月，他参加了 coup d'état 內閣。目前他是唯一被怀疑利用职权謀取私利的普魯士內閣大臣。到处都盛傳他經常把国家机密供給爱北斐特的海特公司利用。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11 月 27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49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普魯士狀況

1858年11月16日于柏林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訊中曾經指出過新內閣的折衷調和與成分複雜的性質<sup>①</sup>。“十字報”<sup>424</sup>就新內閣的這種性質發了一大套嘲諷的議論：

“制度行將改變。但是請問這次改變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現今被廢棄的制度到底怎樣，即將採取的新制度又將遵循什麼樣的原則？代表這個制度的指導思想的是誰？是身為內閣首腦的親王兼天主教徒呢，還是官居宗教和教育大臣的新教聯盟的盟員呢？能夠指望會做過民主派議員的財政大臣同上述人物團結一致嗎？此外，舊普魯士官僚政治的宿將能夠以自己的觀點遷就帕托夫先生的觀點嗎？”

11月12日，全王國舉行了 Urwahlen（初選）。初選選出的 Wahlmänner〔復選人〕將在本月23日選舉議員。誰也不喜歡自己妻子的適度的貞操或者自己債務人的適度的償付能力，可是，適度的自由卻是在 Urwähler〔初選人〕中間適度地傳佈的口號。在普魯士社會中迄今站在運動前頭並且奉行着可以稱做 liberalismus vulgaris〔庸俗自由主義〕的政治信條的那部分人身上，什麼品質

<sup>①</sup> 見本卷第671—672頁。——編者注



都有，唯独沒有英勇精神。1848年，在那不勒斯、巴黎、維也納爆发革命以前，他們一动也不敢动。但是目前，由于各种情况的絕妙安排，这些人的处境要求他們为大陆上的政治运动发出开始的信号。他們由于自己背后有大量的軍队監視着，周圍有十二月二日的法国、重新統一起来的奥地利、永远虎視眈眈的俄国从三方面包圍着，因此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不能不感到相当犹豫。此外，革命在他們头脑里記憶犹新，并且他們认为，不應該吓唬摄政王，使他不致抛掉他在不久以前得到的立宪主义。于是一个自由派英雄就恳求另一个自由派英雄来給他帮个忙，就像有一个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受到一个軍官的公开侮辱时对妻子所要求的那样：“拉住我，”——那位好汉高声喊道——“不然我会报复的，那就要发生流血事件。”实际上，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幻想。普魯士的运动，在当地所理解的意义上来讲，只能够存在于极有限的範圍內；只要一越出这个範圍，它就要或者开倒車，或者变为整个大陆的运动。这后一种可能，会使大資產階級和摄政王都同样感到可怕。这里有一件事實，可能沒有一家報紙会披露，但是我可以担保它的可靠性。摄政王在最近一次視察布勒斯劳时，曾在給这个城市的高級官員举行的招待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称：革命的火焰尚未熄灭；欧洲还有新的革命爆发的危險，因此，中等階級的义务和利益都要求他們團結在王室周圍，要紧的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严格地保持温和适度，从而根本杜絕无原則的蠱惑家(gesinnungslose Demagogen)可能出头的机会。这跟不久以前一位很有头脑的普魯士貴族对我說的話完全相符：“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国王发瘋的嗎？”——他說道，——“是赤色共和国的魔影。他的兄弟，尽管这是个沒有任何幻想、庸庸碌碌、平凡无奇的迂腐人物，同样也是时

时刻刻被这同一个魔影弄得心惊肉跳。”

总的說来，自由派 Wahlmänner〔复选人〕在較大的城市获得了胜利，而臭名昭彰的反动派則在乡村中获得了胜利。选举在乡村里是怎样組織的，可由这样的事实来判断：县长在自己管区内私下对 Urwähler（初选人）散发了通知书，要他們选举某人某人。必須指出，在普魯士，县长占有极特殊的地位。在普魯士所有各省（只有萊茵普魯士例外），县长都是大地主，他們的地产，正像英国郡里的治安法官的地产一样，都是在他本人所轄的行政区内。同时他又是官僚政治鏈条上的一个环节，由他所在的地方上选出，由王室任命，屬 Regierung<sup>①</sup>（一种委員制的机构）管轄，这种机构設于較大一級的行政区的一个中心城市里，但是在他的管区（普魯士人称之为 Ressort）内，他是政府的最高代表。可見，这些县长集 Krautjunker（猎狐者）<sup>425</sup> 和官僚于一身。他們和大多数政府官吏不同，并不完全靠官薪过活；他們光景最差的也是土地貴族家庭的非长子，每年向国家領取的 1 200 元薪俸，其实父兄叔伯也是能够供給他們的。因此，一般說来，他們的利益，同土地貴族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比同官僚集团的利益有更密切的关系。剛剛被推倒的内閣的主要支柱就是他們。他們根本不把自己看做中央政府的工具，反倒认为政府是为他們自己的社会利益服务的工具。目前，他們对新内閣进行反抗，新内閣沒有敢于撤免他們，这一部分是因为采取这样的坚决步骤会大大推动一切革命傾向，破坏普魯士的行政常规；一部分是因为县长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用来約束农村居民，从而造成一种对城市的自由派的均势。到目前为止，只

① 区的行政机关。——編者注

有一个县长被撤免，即波美拉尼亚的克拉索夫伯爵，因为他在給 Urwähler〔初选人〕的通知书里竟大胆地辱罵內閣。

从 1852 年起，沒有公布过任何人口調查的材料；但是由上次人口調查的数字，完全可以大致了解到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对比关系。在 1 700 万居民中間，有 1 200 万人分散在农村，只有 500 万人集中在城市里，而这些城市絕大部分都只能算做村鎮。王国的 984 个城市中，只有 12 个主要城市可以夸耀它們的居民共达 100 万，而 500 多个城市居民各不滿 2 500 人。工业人口在普魯士省占 11%，在波美拉尼亚占 15%，在波茲南占 18%，在西里西亚占 23%，在威斯特伐里亚占 26%，在薩克森占 28%，在萊茵普魯士占 25%，在勃兰登堡占 37%。不过在这最后一个省份里，几乎全部工业人口都集中在柏林。王国全部人口的 60% 都完全从事农业，平均每 263 人中間有一人是貴族。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12 月 3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497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法国調整粮食价格的方案

法兰西皇帝刚刚着手实现自己得意的方案，即在全帝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关于这种调整价格的主意，他还在1854年由于对俄国宣战而向立法团所做的一次演说中就已经明确地谈到过了。当时他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声明值得再提一下，现在我们把它重述如下：

“我特别建议你们注意巴黎市目前所采用的制度，因为如果这个制度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全法国推行，那末，今后就能防止谷物价格的急剧波动。这种波动在产品丰富时，使得农业由于小麦价格低廉而停滞不前，在荒年则由于小麦价格高昂使贫苦阶级遭受沉重的苦难。这个制度就是在所有的大居民点建立叫面包业银行(Caisse de la boulangerie)的信用机关。在产品缺乏的年代，这些银行就能供应居民比官方市场价格低得多的粮食，而在产品丰富的年代，粮食价格则稍高于市场价格。因为丰收年成一般总是比歉收年成多，所以很明白，补偿降低的价格是并不困难的。此外，由于有了信用组织还会有极大的好处，这些组织不是力图靠提高粮食的价格来得利，而是和所有的人一样关心粮食价格低廉，因为情况一反前此，这些组织将在丰收的年代获得收益，而在价格高昂的年代遭受亏损。”

这段话所表明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歉收年代出售粮食要比市场价格低“得多”，在丰收年代则仅仅“稍”高于市场价格，其中关于可望的有利的补偿费是推测丰收的年代比歉收的年代多得多而得

出来的。还在1853年12月根据皇帝的詔书建立起巴黎的面包业银行的时候，一个4磅重的面包的最高价格规定为40生丁。面包房老板有权要求银行补偿自己的损失，银行也发行了由巴黎市政厅担保的债券来建立这种必要的基金，而巴黎市政厅这方面则靠新公债和提高巴黎各关卡征收的消费税的办法也建立了保证金。此外，还有一部分款子是直接由政府从国库资金中拨付的。到1854年年底，巴黎市政厅的这些债务以及由政府拨付的款项总数已达8000万法郎。于是政府不得不食言，把一个面包的最高价格先提高到45生丁，后来又提高到了50生丁。这样巴黎居民通过提高了的消费税必须部分地付出他们在面包价格上节约下来的钱。而法国其他地方就必须由政府直接资助巴黎市政厅的形式下缴纳接济首都的普遍的慈善捐。但是这个试验却完全失败了：在1855—1857年的歉收年代，巴黎的面包价格高于官方的最高价格，而在1857年和1858年的丰收时期却又低于官方的最高价格。

路易-拿破侖对这次较小规模的试验的失败丝毫不感到难堪，现在他又根据他自己的指示在全帝国着手组织面包业和粮食贸易。几星期以前他办的一张巴黎报纸试图使人们相信，所有的大城市都必须筹设“谷物储备”。并且断定在最坏的歉收年代，谷物缺少的最大数字等于全体居民二十八天的需要量，而平均的连续不断的歉收年数是三年。由这些前提得出一个结论：“足够的三个月的储备，——这就是人的预见性所能做到的。”如果这个措施只在至少有10万居民的城市中推行，全法国这样的城市人口（巴黎不算在内）就有377万人，那末，在每人三个月的平均需要量为45公斤小麦，而现在小麦的价格每百公升大约是14法郎的情况下推算，这种储备将值3100万法郎到3200万法郎！所以11月

18日的“通报”公布了如下的法令：

“第一条：在面包业受各项法令和命令约束的城市中，面包房老板的粮食储备根据各面包房在三个月期间每天烤面包所需要的谷物或面粉量来规定。

第二条：自本日起的一个月内，各省省长向各地方自治机关了解情况以后，应该决定储备物是面粉还是谷物，并且规定应该完成储备的期限和确定可以交给公共仓库保管的那一部分储备的数量。”

这个法令还附有一份“面包业受约束”，因而必须建立储备的城市名单。除了巴黎和里昂（这两个城市已经有了储备，因而不受这个法令的支配）以外，法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城市都列入了这个名单。整个名单包括的城市不下161个；其中有马赛、圣昆廷、木兰、卡昂、昂古列姆、第戎、布尔日、伯桑松、埃夫勒、沙特尔、布勒斯特、尼姆、土鲁斯、波尔多、蒙彼利埃、勒恩、图尔、格勒诺布尔、圣亚田、南特、奥尔良、翁热、里姆、夏龙、麦茨、利尔、杜埃、瓦朗西恩、博韦、阿拉斯、圣奥梅尔、加来、梅尔河岸布隆、斯特拉斯堡、牟罗兹、卢昂、哈佛尔、马康、勒芒、亚眠、阿勃维尔、土伦等。根据最近的统计这161个城市的全部居民目前大约有800万人！因而粮食储备整个说来应该是550万公升，其价值是7000万—8000万法郎。农商大臣在将法令送发各省省长时通知他们：虽然他们“不应强迫面包房老板立即完成此项法令给予面包房老板的义务”，但是他们应当“规定完成这种义务的合理期限”。他容许各省省长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自行决定储备谷物或者储备面粉。然后他又补充说，上述措施推行得不管如何广泛，将来还要更加扩大推行。

“省长先生，政府没有夸大我所说明的这一措施的重要性。政府知道，法令涉及到的只是小部分居民，因此现在政府在研究扩大这一法令的有效范围的可能性。许多村、镇居民都是自己烤面包，并且从自己的收获中留出供他们一家全年所需的一定数量的小麦。政府干预他们的经济是徒劳无益的

和不可能的。但是，在許多省的主要城市和更多的专区首府及县城，甚至在一些人烟稠密的乡村里，食用的面包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面包房老板做出来的，而他們不是任何規定的对象，也沒有任何儲备的义务。不能使这些地方的面包房老板也服从这个制度，使他們也遵守这个有預見性的有益法規嗎？政府似乎觉得，它对这一点的規定是不会遇到任何严重的反对的。”

可是，当上述法令在法国所有其他的地方（不包括一些小村庄在內）实行以前，大臣就要各省长同那些还不受該法令約束的那些地方的地方自治机关共同商討問題。然后，大臣通知各省长應該如何进行儲备：

“面包房老板必須尽可能地利用他們店鋪里的零星房屋，因为更便于对它們进行 *surveillance*〔看管〕。但是，你們应当建議地方自治机关設立一些公用倉庫給面包房老板使用，以便按一定的收費价目接受他們自己无法儲存的儲备。我不怀疑，地方当局的开明的协作会更有助于这一工作的完成。”

然后，大臣談到一个最重要的問題——从哪里取得錢来貫徹这个法令：

“說到必要的資金的問題，我相信面包房老板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取得他們所需的數額，这种投資能提供营业上的利益，能获得的合法利潤是这么多，以致面包房老板要想获得貸款未必会有什么困难，特別是在目前貸款利息这么低的情况下。如果我們希望所有各市鎮的富人都协助面包房老板，那末，我們是否过高地估計了他們的好意呢？难道他們不能在建立起来的儲备中为他們垫出来的款項找到可靠的保证，并且是保证增值而不是在价格中貶值嗎？如果你們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那末我就很幸运了。我問自己，如果需要，难道地方自治机关不能效法 *Caisse de Paris* 筹措現金貸給面包房老板嗎？为了鼓励和便于获得这种貸款，并使它通过流通增多起来，可以賦予指定儲备粮食的谷仓以海关倉庫 (*magasins généraux*) 的性质，这样就可以使它們能够发行一些使我們的金融机关特別是法兰西銀行願意接受的提貨单。”

大臣在通告中最后指示，各省长应于二十天內向他报告，他們

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法令中的第二条；应于一个月內汇报，不受該法令約束的城乡地方自治机关如何看待这一問題。

目前我們不打算研究公共谷仓問題；但是这个經濟上的 coup d'état<sup>①</sup>的巨大意义是无需詳細論述的。大家知道，目前法国的谷物价格极其低廉，因此在农民中間出現了一些不滿的迹象。拿破侖试图通过建立三个月的粮食儲备造成人为的需求，来人为地提高价格，从而把法国这一农业国的嘴封起来。另一方面，他把自己說成似乎是城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先知，虽然他扮演这一角色并没有得到特別成功，因为他的法令的最显著的效果将是工人們为自己的面包不得不付出比以前更貴的价錢。“财产的救主”向资产阶级表明，甚至不必通过他那諷刺性的立法机构的正式干預，只要他个人一道简单的命令就可以自由掌握资产阶级的錢袋，支配地方自治机关的财产，違反貿易进程，使资产阶级的金融业务服从于他个人的妄想。

最后，問題还必须从純粹波拿巴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在整个法国将会需要作为公共谷仓的大量的建筑物；这里将为投机和盜窃开辟多么新的活动场所！粮食貿易也得到意外的流轉。多么大的利潤将落到 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和皇帝陛下的其他投机公司！总之，我們相信，戴皇冠的社会主义者在提高粮价上比他在试图降低粮价上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19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8 年 12 月 15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507 号

① 直譯是：政变；这里是：改革。——編者注



## 卡·馬克思 普魯士狀況

1858年11月23日于柏林

今天是选举日。复选人(人数决不能算多)規規矩矩地聚集起来,作为扰攘不休的大众的代理人履行了选举手續。从一度可能成为潘多拉的盒子<sup>426</sup>的选票箱里跳出来的,是一种最温和的自由主义,穿上官僚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自我否定的自由主义。本市当选者的头衔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怀有恶意。他们当中有一个 Generalsteuerektor (税务督办),一个 Oberbürgermeister (市长),一个内閣大臣,一个前内閣大臣,一个 Gerichtspräsident (高等审判厅厅长),一个 Geheimer Archivrat (皇家档案官),一个 Geheimer Rat (樞密官)。选出来輔助这一群官僚和“樞密”大員的是两个资产者:一个是莱麦尔先生,保守派兼御用出版商;另一个是費特博士,也是出版商,是由于信奉犹太教而被金融界推选出来的,因为这里的金融界,也和任何地方的金融界一样,絕大部分是属于犹太血統。然而,可以肯定地说,1848年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雅科比、翁魯、瓦尔德克、洛貝尔图斯、施泰因、埃尔斯納等人,——总之,就是大約一个月以前我在通訊中<sup>①</sup>对你們說

① 見本卷第 652—653 頁。——編者注

过很可能在大城市当选的那些人，——的确在初选人集会上起了主导作用，許多竞选綱領都是他們草拟的，而且在布勒斯劳、科尼斯堡、馬格德堡、埃尔宾，这些地方的省議會里都給他們准备好了議席。这种突然的 *changement de décoration* [改換場景] 是从何而来的呢？他們謙虛地謝絕了給他們准备的这一切荣誉。有些人这样做完全不是出于自願，只是在同 *Polizeidirector* [警察厅长] 进行了一番令人不快的而且远非自願的談話以后才决定割爱的。其他人則是屈服于目前支配着一切的、心情焦躁的那部分資產階級的压力之下。但是，警察厅长、候选人、选民，全都是在突然改变了的情勢的强烈影响下行动的，或者毋宁說，情勢並沒有改变，而是籠罩着这些人的幻想的云雾被一陣雷雨冲散了。如法国人所說，*la situation s'était dessinée* [情况明朗化了]。政府充滿了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本身驅使它不顾一切地蛮干起来。內务大臣弗洛特韦尔先生发出了一封通知书，这样的通知书在任何一种文字中也沒有見過：文理不通、措詞混乱、論据荒謬，然而还是充分明显地表达出了怒气。你們当然知道，在法国对报纸提出官方警告是什么意思。那末，弗洛特韦尔的通知书就是对选民的一个普遍警告，而且还有发給警察的密令做后盾。这封通知书直截了当地提到那些曾任 1848 年国民議會議員的激进分子的竞选演說、竞选綱領和告选民书。由于大資產階級想以温和适度来攻克堡垒，而比較倾向于民主的人民大多数懂得，目前政治主动权操在大資產階級手里，所以內閣的这一暗示立即生了效，再度中兴的 *grands airs* [奢华場景] 被丢开了，选举被套进了政府的框框。然而，当你被人粗暴地从美梦中推回到现实里来的时候，你是不会感到快意的。受到关照的那些人、演說和綱領，在其最大胆的翱翔中都极严

格地恪守了“实际理智的界限”，所以連心情焦躁的那部分資產階級也对政府的焦躁表現感到恼怒。政府借以推行这套新的自由制度的方式显得相当粗暴；因此在广大公众中发出了隱隱的失望的怨声，而旧宮廷奸党的报刊則开始紛紛嘲諷新內閣，說它終於表現出了«Selbstbesinnung»〔“明智”〕。那时倒霉的弗洛特韦尔就把他在几个星期以前秘密發給县长們的另一封通知书公布了，这封通知书警告他們不得支持任何持极端意見的候选人。为了給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捧場，內閣的喉舌“普魯士报”<sup>427</sup>对这个过去的指示做了如下的評論：

“目前选举有一个特点非常令人欣慰：所有各党派都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他們的各种政治綱領的分歧。政府所采取的进步的但是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路綫，将以达到这种团結为其主要宗旨。政府决不容許自己由于过分的希望和要求而放棄自己的既自由又温和的原則。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容許一个并不想无条件承认宪法的基础、而只是在宪章符合其本身利益的限度內承认宪章的合法性的党独占‘保皇党人’的称号。政府认为，說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屬於那个党是不正确的”云云。

其实，內閣在这里是枉費心机。亲王在 Staatsrat〔国务院〕中介绍他儿子时发表了一篇反动的演說，在共济会會員大会上发表了另一篇反动的演說，向 Treubund（一种普魯士的奧倫治会組織）<sup>428</sup>发出了反动的号召，他並沒有因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由于在內閣治理下事态的发展而大发雷霆，这却把內閣吓坏了。弗洛特韦尔的第一封通知书是对資產階級的一个善意警告，要他們切記不可使亲王剛到手的立宪主义受到考驗。当內閣大臣們由于这个步驟而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牢靠的时候，他們就打电报給普魯士亲王夫人，亲王夫人立即从科布倫茨赶到柏林，coup de

baguette〔魔杖一揮〕就使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了。上一年，親王夫人在魏瑪、卡爾斯盧厄、科布倫茨這三個地方輪換居住。只是在決定攝政問題的時候，她到柏林去了一次。由於所有當時給國王看病的醫生都不肯明確表示國王的疾病能否治好，王后通過克萊斯特-雷措夫先生找到了一位名叫貝格爾的軍醫，要他簽署了一項表明國王能夠恢復健康的文件。於是親王夫人就假裝生病，把這同一位醫生找來，要他診治，以贊譽和優禮迷惑他，當她覺得他已經上了套以後，就直截了當地問他：難道像他這樣一個學問高超、心地純正的人，真的相信他自己所做的關於國王健康狀況的聲明嗎？愚蠢的貝格爾承認說，純粹是王后的眼淚迫使他做出這個聲明的。親王夫人聽後一搖鈴，立刻跑進來兩名侍從，這位軍醫迫於服從當然的尊長，只好把剛才被套出來的供狀不僅口頭重復一遍，而且還親筆寫了下來。當親王夫人這樣達到自己的目的以後，她被逐出了柏林。在她丈夫立為攝政王以後，她自願繼續留在科布倫茨。威廉親王也像其他庸碌之輩一樣，以夫人才智超過自己而苦惱，雖然他需要人牽引，但又不喜歡看到牽引者的手。所以他的妻子只好以轉彎抹角的方式來影響他。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極其冷淡和正式的。威廉親王在年輕的時候曾熱戀布羅克豪斯女士，並且想要娶她。但是由於他父親的阻撓，這位女士在巴黎銜恨而死。霍亨索倫家族的這個性情倔強的后裔被迫娶了魏瑪公主；他為了報復，在婚後的頭幾年里毫不隱諱他對弗××克女士的深情。可見親王和他的妻子之間的關係決不是親密和睦的，親王夫人為了要在柏林建立自己的內閣，最好的辦法就是她本人躲在科布倫茨。

同時，王后也玩弄了一下 *Oeil de boeuf* 紀事<sup>429</sup> 的讀者所熟

悉的那种詭計。你們或許已經在報紙上讀到，国王和王后离开柏林的时候，王后的皮包在萊比錫被偷了；无所不能的德国警察費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抓到窃賊。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皮包忽然出現在摄政王的写字台上。在皮包里发现了他的妻子亲王夫人同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的大批来往信件。有写给拉提博尔 Gerichtspräsident〔高等审判厅厅长〕温采尔的信，他是在柏林刚刚当选的一位議員，是曼托伊費尔当政时期下議院中的反对派成員之一；还有写给普魯士天主教反对派首脑賴辛施佩格的信以及写给其他人的信，——这些信中全都充滿着矯揉造作的自由主义和統一德国的渴望。大家都知道，亲王本来已經被赤色共和国的魔影弄得心神不安，現在又由于发现他自己的妻子同革命家关系如此亲密，就更加心惊胆战了。此外还使用了其他种种手段。我之所以記述这一段 *chronique scandaleuse*〔丑聞〕——我可以担保这件事的真实性——是因为在君主国家里，往往在革命还没有采取民众騷动的形式以前，王朝的腐敗就已宣布它的来临。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8 年 12 月 13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50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 \*一八五八年的欧洲

1858年下半年，欧洲的政治生活显得特别活跃。从1851年12月2日到今年年中，就政治方面来说，欧洲大陆好像裹上了一件尸衣。统治者由于依靠自己的军队在巨大的革命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就有可能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地颁布和取消法令，遵守或者破坏法令。各地的代议机关都变成了空架子，几乎任何地方的议会反对派都不能存在下去，报刊堵上了嘴。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此起彼伏的骚动：米兰起义、薩累諾登陆<sup>430</sup>、夏龙叛乱<sup>①</sup>、谋杀路易-拿破侖<sup>②</sup>，如果没有翁热等地的某些政治审判案（在审判中，以往的革命精神短时间地、付出很大代价地表现出来，威胁地宣布它的存在），那末可以认为，1848年的经验使欧洲大陆放弃了涉及政治的任何念头，到处都认为军事专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是唯一适当的政体。甚至在英国，政治改革气氛也日益低落。英国议会全神贯注于法律、贸易和行政的立法，而后者必然趋向于集中。复活群众政治运动的企图终于完全破灭，争取改革的资产阶级政党，在1857年帕麦斯顿的普选中遭到彻底失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而宪章运动也处于完全破产的境地。

① 見本卷第436—440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417—422頁。——編者注

在欧洲各国中，俄国第一个从这种政治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虽然在克里木战争结束时领土没有多大的损失，就东方来说甚至也无损于威望，但是毕竟伤了俄国的自尊心。第一次迫使它放弃了无论如何决不让出兼并的领土的原则。它的最有组织的部门——军事部门的一切行政制度彻底地破产和崩溃了。尼古拉二十五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堡的废墟中。就国内当前的政治条件来说，除了实行霸权的和极端官僚化的制度外，是不可能实行别的行政制度的。为了给一个比较适当的制度奠定基础，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重新求助于解放农奴的主张。他不得不和两个凶恶的敌人——贵族和官僚制度本身进行斗争，他打算违背这个制度本身的意愿来改革它，而这个制度又应该成为实现他的计划的工具。除了到至今连考虑自己政治地位的权利都被剥夺的俄国农奴、商人这些死气沉沉的群众的消极的传统奴隶性中寻找支持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支持。为了使他们的支持成为现实，他必须制造一种社会舆论，至少应该创办报刊之类的东西。为此放松了检查，容许展开文雅的、善意的、有礼貌的讨论，甚至允许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轻微的客气的批评。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法国除外），现在俄国容许自由议论的程度是可笑的和微不足道的，但是了解尼古拉俄国的人们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农奴制的废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与此同时，俄国社会上比较有学识的人士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又完全是一种吉兆。

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国王暂时退位不管国事之后不久就表明：他的精神失常已不可救药，他的兄弟迟早要被任命为掌握全权的摄政王。无人任位的这个间隙时期为展开鼓动奠定

了基础；这个借要求确定摄政为名的鼓动，事实上是反对当时不得人心的內閣的。两个月以前，终于确定了摄政，撤换了內閣成員，选出了新的議院，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政治运动一下子为自己扫清了道路，几乎一个不留地从立法部門赶走了原有的大部分人員。普魯士社会生活目前的这种活跃状态最終会导致什么結果，这个问题本报已作了分析<sup>①</sup>，这里我們仅仅指出政治活跃已經开始这一事实。

德国其他地方已不能不觉察到这个运动的存在。的确，在那些小邦中它已使人有所感觉：随着这个运动在普魯士采取更为明确的形式，在这些邦中，內閣的改組、各政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上的动蕩也无疑地加剧了。这个运动不仅在德意志的一群小君主国中、而且在奥地利也日益成为极易感觉得到的了。現在奧地利立宪党不可能使政府做第二次設立代表机关的試驗，因此，把这个问题訴諸輿論的唯一手段就是贊揚在普魯士“恢复了健全的立宪政体”。普魯士在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突然享有这样大的声望，簡直是奇怪的事情。然而，不管这个运动采取什么形式，重要的是这个运动甚至在奥地利也已經发生了。

意大利是激起运动的另一策源地。在同俄国締結和約之后比較平靜下来的政治狂热病，由于波拿巴主义阴謀的助长而不可避免地籠罩了这个易于激动的民族。在倫巴第，旧的反对烟草壟断的运动重新又展开了。帕尔馬公爵夫人不顾在皮阿琴察有奥地利的駐防軍，竟允許里斯托丽扮演一个鼓吹同亚述人进行神圣战争的犹滴，来鼓动反对奥地利人<sup>431</sup>。法国占領軍在羅馬的处境就变

<sup>①</sup> 見本卷第 643—647、648—660、671—684、690—694 頁。——編者注



得像教皇政府的处境一样困难。甚至那不勒斯也在准备起义，而且，撒丁的維克多-艾曼努尔也指示他的將軍們做好准备，因为可能在春天的时候他們又不得不嗅到火药味了。

甚至在法国也弥漫着这种新的潮流。蒙塔郎貝尔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文章<sup>432</sup>，就是法国資產阶级重新积极起来的明显表现。現在已經知道，不仅蒙塔郎貝尔又写了另外一篇論文，而且路易-拿破侖的前大臣法卢先生也准备发表激烈的文章来反对現存制度。蒙塔郎貝尔的审判案已經成为法国議會著名議員对統治制度的庄严抗議，成为他們仍然力求恢复議會体制的声明。布洛利、奥迪隆·巴罗、維尔曼以及其他許多这类人物都出席了法庭审判，貝利耶代表他們全体发了言，由于律师在法庭辯护时在某种程度上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他慷慨激昂地說：

“不，我們任何时候也不会因为任何代价而背棄我們的过去。你們对我国的估計太低了。先生們，你們认为我們国家是易变的和不稳定的。既然如此，你們为什么又确信这个国家并不希望有一天会回到它所喜爱的、并且实行了半世紀的那种体制呢？是的，我們由于进行长期的斗争、受到艰苦的考驗、忍受失望的痛苦而过多地消耗了我們的力量，尽管如此，一旦祖国向我們召喚，我們就一定会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我們會像往日那样热情、頑强和无私地把自己献給祖国，而在临死前我們要高呼：‘自由和法兰西！’”

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法庭外面强大的道义力量的支持，发言者决不敢这样向当前法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公开地宣战。最后，我們看到，甚至在英国，主張改革的鼓动也重新展开了。而且，归根到底是这样：只要議會还没有通过这样一种改革来大大改变各政党的力量对比，从而破坏尊严的但是軟弱无力的不列顛宪法的基础，这个問題就一直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議會提出。

但是，在这个几乎在欧洲各国都是相同的、到目前为止始終非

常和諧地展开的运动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呢?当1848年的火山爆发突然在惊慌失措的欧洲自由资产阶级眼前喷出一个为争取自身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武装工人阶级的巨大怪影的时候,把安全地握有自己的资本看得比直接掌握政权重要得多的资产阶级,宁可牺牲它过去所争取的这个政权和一切自由,以便万无一失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承认自己政治上不成熟和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事务,甘心屈从于军事官僚专制制度。于是,开始了工厂、矿山、铁路和轮船的忙乱建设,开始了有名无实的股份公司、欺骗和证券投机的 *Crédit Mobilier*<sup>28</sup> 的时代,也是欧洲资产阶级竭力用经济上的胜利来弥补自己政治上的失败、以个人的富裕来弥补他们集体的衰弱的时代。但是,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它的社会实力增大了,它的利益也相应地扩大了;资产阶级又开始感到了加在它身上的政治桎梏。目前在欧洲展开的这个运动,正是这种感觉的自然结果和表现。由于十年来工业的发展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每个资产者重新恢复起来的统治工人的信心,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感觉。1858年的情况在很多方面同1846年相似,1846年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政治上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也出现了许多拥护改革的执政者,而在两年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地被自己为之开辟道路的革命洪流冲击到一边。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1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2月23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1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普魯士狀況

1858年12月4日于柏林

在前一篇通訊中<sup>①</sup>我告訴過你們，弗洛特韋爾先生對資產階級發出的不要把“再度中興”這場戲演得過分的秘密警告，使大選發生了多麼突然的變化。由於這個緣故，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完全絕迹了。另一方面，下層階級則無需任何警告，因為他們都自願地而且相當輕蔑地拒絕了行使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投票權。由於選舉法的規定，只要頭等選民和二等選民像目前這樣採取共同行動，下層階級投的選票是絲毫不起作用的。誠然，有少數幾個地方，例如柏林，工人階級的一小部分納稅人參加了選舉，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說，他們是按照雇主的 *mot d'ordre* [命令] 行動的。連倫敦“泰晤士報”的“本報通訊員”（他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 *couleur de rose* [玫瑰色的]）也不得不在英國的這家大報上承認：廣大群眾所抱的消極態度，在他剛強的心里也引起了沉重的憂慮。所以，這次選舉總的說來是帶有內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性質的。“十字報”的那一班人好像魔杖一揮都不見了。其中有大頭子甚至不得不重新回到他們往常發號施令的法院里去，而有些人得以當選，完全是由

---

① 見本卷第 691—692 頁。——編者注

于他們的对手的寬宏大量。他們的行列受到多大的損失，单从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在 77 名县长当中只有 27 名重新当选。总之，这一班人将只能作为决不是很重要的少数重新登台。

但是普魯士的立宪主义本性脆弱，以致它为自己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吓倒了。因为选举所产生的两院代表着內閣的自由主义，那末很显然，內閣也就代表着新选出的两院的自由主义，并且由于这个简单的过程而在实际上变成为党派內閣，議會內閣，也就是恰恰变成为那种不應該有的討厌东西。因此，內閣大臣們不得不立刻在“国家通报”上抗議給他們造成的这种新处境。他們这些由亲王挑选的謀臣，忽然間好像变成了民选的国家执行机构，要靠人民賦予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他們在抗議中——“国家通报”上刊登的他們那篇原則性的声明只能叫做抗議——以冠冕堂皇的詞句断言，議會內閣或党派政府在普魯士是根本行不通的；国王，按照上帝的意旨，應該永远是唯一的权力的源泉；內閣大臣們不能事奉二主；人民按照內閣的意旨进行了选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現在不應該人民要大臣們听从两院的領導，而應該是內閣要两院服服帖帖地跟着政府走。

現在情况就是这样。內閣是議會政府，同时又不是議會政府。它通过选举排挤掉了王后手下的宫廷奸党，但它已迫不及待地要毀掉自己借以爬上台去的阶梯。由于国王还活着，由于王后还在玩弄計謀，而且在他們的旗帜后面还隐藏着强大的有組織的集团，所以亲王只有選擇一个自由主义的內閣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个內閣又只有求諸普选才能站稳脚跟。由于选民附和了自上而下地對他們所唱的調子，內閣成了党派內閣，而亲王就成了資產階級的独裁者。可是，忽然間，一心想做稟承天命的普魯士王位继承

者的亲王，意識到事态使他陷入了一个尷尬的处境；他在气恼而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竟以为用几句话就能够把事实勾销，用些半訓誡半威吓的詞句就能够改变他执掌政权的实际条件，选举的把戏一結束，他就能夠重新摆出普魯士国王的傳統姿态。他和他手下的那班人幻想能够哄騙国民，其实只是暴露出他們自己居心不良，串演着 *malade malgré lui*<sup>①</sup> 的荒謬絕倫的滑稽戏。他們极力要扼止政治上的活跃，其实这样做只是使政治上的活跃摆脱他們的控制。亲王在国务院所做的演說，也应该认为是对內閣抗議书的一个补充，这篇演說全文发表了，因为王后手下的宮廷奸党曾抓住其中某些个别字句不肯放松。

可以說，亲王和內閣大臣們一样，也是在最尖銳的內在矛盾当中轉圈子。他選擇了一个新內閣，因为他认为解散旧內閣不是什么真正的变化。他想要点新东西，但这新东西必須只是旧东西的翻版。他譴責上届政府强加于这个国家的市政法，因为它把城市自治消灭得一干二淨；但是他不想改变它，因为这种改变在目前人們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危險的后果。他建議只用和平方法来扩大普魯士的势力，因此认为必須扩大那本来已經是致命累贅的軍隊。他承认，要扩軍就需要錢；虽然自从革命以后曾举借过一笔国債，但国庫却仍然毫不理会对它提出的要求。他宣布增立新稅，同时痛斥近十年来普魯士債務的大量增长。正像他的內閣大臣們不願做合乎选民理想的內閣大臣但却希望有合乎自己尺度的选民一样，他这位摄政王需要錢来养兵，但是对有錢的人連听也不要听。他的演說中可以认为是明确反对前届政府的唯一地方，就

---

① 无病呻吟者(莫里哀的剧本“无病呻吟”)。——編者注

是他对宗教虚伪所进行的攻击。这是他有意图王后为难，但是为了不致使公众也胆大妄为起来，他这位信奉新教的亲王同时命令警察驅散了柏林的自由天主教徒的一次集会。

你們会同意，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自相矛盾的、自杀性质的政策，即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够危险的；而目前的情况又决不是一般的情况。在法国有爆发革命的危險，为了抵住法国的革命，普魯士政府在国内必須无后顾之忧才行。延緩法国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发一場欧洲大战。在这样一場战争中，俄国、法国、撒丁将結成一伙反对奥地利。那时，普魯士为了不致成为大伙的替罪羊，就必须准备好进行一場解放战争，即爭取德意志独立的战争，因为如果它敢于同本国臣民作战，它将会像在1806年一样，被一拳打倒<sup>433</sup>。普魯士政府完全意識到，法国革命或欧洲大战会使它陷入什么样的困难境地。它也知道，欧洲目前正在这两个路口上徘徊。但是，另一方面，它知道，如果完全听任人民运动自由发展，那末这样从外部防止了的那种危險就会从内部发生：紙面上对人民让步，而在实际上把它們化为烏有——这是耍把戏，一种跟德国人民玩起来可能很危險，而可怜的普魯士政府連嘗試一下的胆量都沒有的把戏。为什么不可以，譬如說，让大资产阶级欣然以为由摄政王提名的內閣事后是經過他們选举的呢？因为就連对人民大众让步的表象也是有損王朝尊严的。对内政策是如此，对外政策也是如此。再沒有哪个国家比普魯士更害怕欧洲大战的了。然而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一次小战争，譬如，为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而同丹麦打一仗，或者为了爭夺德意志的霸权而同奥地利刀枪往来一番，可能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消遣，并且能够用抛洒一点民众鮮血的低廉代价为政府树立威望。但是在这里，所希望的又不是同时

能够做到的。在丹麦问题的背后站着俄国，而奥地利本身则无异于欧洲的地位 quo〔现状〕。可见，正如在宪法方面的让步会为革命铺平道路一样，一场小冲突会招致欧洲大战。因此，你们可以相信，普鲁士对丹麦发出的好战叫嚣，最终将归结为在“国家通报”上的纸上抗议而已。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2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12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17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馬克思 伊奧尼亞群島問題

1858年12月17日于倫敦

威廉·赫德遜·格恩賽先生，別名華盛頓·格恩賽，由於從英國殖民部圖書館中盜竊了伊奧尼亞群島首席專員約翰·楊格爵士致前屆帕麥斯頓勳爵政府的兩個密件（一個寫於1857年6月10日，另一個寫於1858年7月18日）而被追究刑事責任；這個案子剛剛由中央刑事法庭在馬丁男爵的主持下進行了審理並以宣布被告無罪而結束。這次審判無論從政治觀點和法律觀點來看都是饒有趣味的。應該注意的是，荷馬專家格萊斯頓先生剛剛離開倫敦去完成他所負的奠定伊奧尼亞群島和平的特別使命時<sup>434</sup>，在“每日新聞”上就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放出的斯基台人的箭一樣，出現了約翰·楊格爵士的密件。約翰·楊格爵士在密件上建議放棄對該群島的保護權，將該群島交給希臘，然而預先要割下它最好的一塊地（科爾富島）並將其併入大不列顛的殖民地。人們無不大為驚訝。仇視秘密外交的那部分倫敦報刊，對得比勳爵內閣揭露外交陰謀內幕的大膽措施表示祝賀，而天真熱情的“晨星報”甚至宣稱聯合王國開始了國際政治的新紀元。然而，動聽的贊揚聲立即被尖銳而憤恨的批評聲壓倒了。反內閣的報刊狠狠地抓住了這一“故意鑄成的大錯”（這是它們對這一措施的稱呼）。它們說，這個



措施的目的不是別的，首先是想取消格萊斯頓先生在政治上的獨立性并使他從議會舞台上暫時引退；而同時，它們說，這是用完全不擇手段的無恥奸詐伎倆，使得格萊斯頓先生自己的手下人不得不以公布一個立刻使他無論對行將舉行的外交談判的對方，還是對英國輿論和歐洲國際法都處於尷尬境地的文件，來阻礙他完成所負的使命。“泰晤士報”、“地球報”、“觀察家報”和反內閣的小報寫道，得比內閣為了毀害過於輕信的敵手，毅然做出了在當時的情況下無異於背叛的魯莽事情。當伊奧尼亞人不僅知道了不列顛早已事先做出決定，而且有威望的伊奧尼亞愛國人士已經由於他們同意支解七個島嶼的計劃這一事實被泄露而被弄得聲名狼籍時，格萊斯頓先生怎么能進行談判呢？當歐洲一定會對這種破壞維也納條約的行為（按照維也納條約，英國決不是科爾富島的所有者，而只不過是七個島嶼的保護者，而且該條約已把歐洲地域區劃圖永遠固定下來）提出抗議時，他怎么能進行談判呢？這些報紙文章出現以後，俄國和法國的確提出了抗議。

En passant〔順便〕指出，維也納條約，這部唯一在歐洲得到承認的國際法法典，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突出的 *fictiones juris publici*〔國際法假象〕之一。這個條約的第一條說的是什麼呢？說的是永遠推翻波拿巴王朝的法兰西王位；然而現在高踞法兰西王位的是第二帝國的奠基人路易-拿破侖，歐洲所有君主都承認了他，同他稱兄道弟，他受到了歐洲君主的厚待和膜拜。另一條規定，比利時永久被賞賜給荷蘭；可是十八年來，比利時與荷蘭分立不僅是 *fait accompli*〔既成的事實〕，而且是法定的事實。其次，維也納條約規定，讓 1846 年併入奧地利的克拉科夫永遠成為獨立共和國；條約最後的、然而同樣重要的一個條款，是被尼古拉併入俄羅斯帝國的

波兰應該成为只是通过罗曼諾夫王朝同俄国保持君合国关系的独立的立宪王国。这样,这部欧洲 jus publicum〔国际法〕的圣书便一頁一頁地被撕掉了,只有在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的軟弱决定有必要时,它才被引为根据。

得比內閣对于它是應該接受一部分报刊給它的不应得的贊揚,还是應該反駁另一部分报刊給它的不应受的誹謗,显然犹豫不决。然而經過一星期的犹豫之后,內閣决定采取后者,并且正式宣布約翰·楊格爵士的密件是在內閣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的,目前正在对这一犯罪行为的肇事人进行調查。終于发现肇事人是威廉·赫德逊·格恩賽先生;他被中央刑事法庭审讯,罪状是盜窃密件。結果得比內閣成为斗争的胜利者,此后这一訴訟案件也就失去它的政治趣味了。然而由于这一訴訟案件,大不列顛和伊奧尼亞群島之間的关系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但是約翰·楊格爵士的計劃并不是他个人幻想的产物,关于这一点,他的前任亨利·华德爵士 1850 年 4 月 13 日致伊奧尼亞議会的公开信的如下一段就可令人信服地证明:

“我并未受权代表不列顛国王来談論那在祝詞中只是模模糊糊說到其前景的遙远未来,即希腊民族的彼此隔离的人們又能取得欧洲列强的同意而联合成一个强大帝国。但是我不难說出我自己的意見(他在代表不列顛国王說話),如果这种事情是人力所及的,那末英国的君主和議會都将同样贊助伊奧尼亞人重新取得将在世界政治中占有应得地位的新的强国的成員資格。”

就在这时,大不列顛对群島所抱的人道感情,却表现为亨利·华德爵士以真正奥地利式的殘酷性鎮压了当时群島上所发生的起义。20 万居民中有 8 000 人被处絞刑,被判受鞭笞、监禁和放逐;妇女和儿童被鞭打得皮开肉綻。为了不使人疑心我夸大其詞,我

来引证一家英国报纸，即“紀事晨报”于1850年4月25日发表的一段話：

“战地法庭按照首席专员大人的命令所使用的駭人听闻的刑罰，使我們不寒而栗。在許多情况下，倒霉的犯人不經任何审理即被判处死刑、流放和体刑，而在其他情况下，則根据战时法律用速审方法判刑。21个人被判死刑，很多人遭到其他刑罰。”

然而英国人夸口說他們用自由的宪法使伊奥尼亚人得到了幸福，使他們的物质資源发展到使希腊本土的悲惨經濟状况相形見绌的水平。說起宪法，那末格雷勋爵当他受托从事整个大不列顛殖民帝国的宪法交易时，曾认为不便于不給伊奥尼亚群島以宪法；但他只不过把英国許多年以前用欺騙手段从伊奥尼亚群島夺走的东西还給了他們而已<sup>435</sup>。

依照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起草的、俄国1815年在巴黎签字的条約，对伊奥尼亚群島的保护权交給了大不列顛，但明文規定大不列顛应恪守俄国于1803年給予該群島的宪法。可是第一个英国首席专员托馬斯·梅特兰爵士就廢除了这一宪法，而代之以另一部使他享有无限权力的宪法。1839年，伊奥尼亚人穆斯托克西迪斯騎士在他的按照下院决定于1840年6月22日出版的《Pro memoria》中肯定說：

“伊奥尼亚人沒有希腊乡鎮甚至在土耳其暴政时期通常享有过的特权，即选举他們自己的官員的特权和实行自治的权利，而是服从警察派給他們的官員。他們被剝夺了每个島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所保有的极为有限的自行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为了使他們更加处于从屬地位，这些收入被移交給国庫管理。”

至于开发物质資源，那末指出下面一个情况就够了：英国，这个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国，竟恬不知耻地給伊奥尼亚人加上出口稅

的負担，——这是似乎只有在土耳其的财政法典上才可能有的野蛮手段。例如，群岛的主要贸易产品葡萄干就被課以  $22\frac{1}{4}\%$  的出口稅。

一个伊奥尼亚人說道：“可以說是各島之間主要通道的海峽，如今被关卡封鎖了，因为在每个港口对**各島彼此間交換**的一切种类的貨物都要課过境稅。”

但还不止于此。在英国統治的头二十三年当中，捐稅增加了两倍，而支出則增加了四倍。后来对捐稅有所縮減，可是以后于1850年形成了赤字，其数值等于以前全部捐稅的一半，这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年份	每年捐稅額	支 出
	(单位:英鎊)	
1815.....	68 459	48 500
1817 <sup>①</sup> .....	108 997	87 420
1850.....	147 482	170 000

总之，对他們自己的产品課出口稅，在各島之間課过境稅，捐稅增加和开支多得无力負担——这就是約翰牛賞賜給伊奥尼亚人的經濟福利。按照他的在印刷所广场<sup>436</sup>上的神托的說法，約翰牛侵占殖民地的唯一目的，是用国民自由的原則来教育它們；但是，如果我們看看事实，我們就会看到，伊奥尼亚群岛的例子，就和印度和爱尔兰一样，仅能证明：約翰牛要自己国里自由，就得到国外去奴役別国人民。因此，就在他义憤填膺地痛斥巴黎的波拿巴間諜制度的同时，他自己却在都柏林采用这个制度。

① 英国保护的头一年。

这一訴訟案在法律上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样一点：格恩賽的辯护律师承认了盜窃十份密件副本的事实，但是以格恩賽并没有把它們用于个人目的的意图，证明当事人无罪。如果偷窃罪只能根据非法侵占他人財產的意图来定罪，那末刑事法在这方面就会走入絕路。坐在陪审席上的尊敬的公民們未必打算在財產法中实行这种革命；他們的裁决只是想表明：公众的文件是財產，但不是政府的，而是公众的財產。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2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1 月 6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52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爱尔兰的惶恐

1859年12月24日于倫敦

目前的英國內閣是由一个已經瓦解的政党組成的，像这样的政府，要拋棄自己旧日的原則，总是要比断絕自己旧日的联系更为容易。得比勋爵在搬进唐宁街之后，对于过去曾使他的名字在爱尔兰成为街談巷議資料的錯誤，无疑已下了决心要加以改正；至于他那以反复无常聞名的爱尔兰首席檢察官怀特塞德先生，一定已毫不犹豫地否认了把自己和奥倫治会分会結合在一起的誓言<sup>437</sup>。但是問題在于：得比勋爵的上台同时就是向統治階級的某一集团发出信号——赶紧扑向前去夺取由于另一集团被迫下台而剛剛騰出的职位。得比組閣的意思就是，全部政府职位应由杂七杂八的这样一伙人去分，这伙人还由一个已失去任何意义的政党名称結合在一起，还照旧打着一面破烂不堪的共同的旗帜，尽管在事实上，他們除了对往事的回忆，派系的傾軋，而主要的是坚决要求分享新职位所提供的尘世福利的决心以外，再沒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样一来，埃格林頓勋爵，这位渴望在唯利是图的英国复活騎士精神的唐·吉訶德，便應該在都柏林堡就任爱尔兰总督的崇高职位，而以狂热拥护爱尔兰地主制度聞名的納斯勋爵，則應該成为他的內閣总理。不言而喻，这可尊敬的一对，arcades

ambo<sup>①</sup>，在离开倫敦时，曾得到他們的上司的坚决劝告，要他們拋棄自己的怪癖，讲究礼貌，不要用任何出人意外的狂妄举动惊扰自己的主人。我們并不怀疑，埃格林頓勋爵越过海峡的道路鋪滿着善良的願望，并且他曾以对总督佩带的小飾物的幻想安慰他的孩童般的头脑；而納斯勋爵在到达都柏林堡时，也是一心只想看到大規模的清扫領地、焚燒农舍和将农舍的可怜住戶予以无情驅逐的工作在以应有的速度进行而已。但是，既然党的关系迫使得比勋爵把不合适的人安插到了不合适的位置上，这同一种党的关系立即又使这些人陷入了尷尬的处境，不管他們的个人願望如何。在这以前，奥倫治会由于自己的令人厌烦的忠誠曾受到官方的譴責；政府本身曾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个組織是非法的，并且极不客气地向这个組織宣称，世界上誰也不再需要它，它應該完全消逝。但是，托利党内閣一上台，声名狼籍的埃格林頓和納斯一搬进都柏林堡，这些本来感到垂头丧气的奥倫治会會員又充滿希望了。太阳又开始为这些“真正的托利党人”照耀了；他們觉得，他們又将像在卡斯尔里时期那样在国内为所欲为，他們复仇的日子已經大大临近了。他們一步一步地迫使唐宁街的那些昏庸、軟弱、因而也是冒失莽撞的代表从一个尷尬的境地进到另一个尷尬的境地，終於在一天早上，世界为总督发表的公告所震撼了；这个公告宣布爱尔兰处于所謂戒严状态，并用100英鎊和50英鎊的悬賞办法把間諜、告密人、伪证人和挑衅者的职业变成为綠色艾林<sup>②</sup>的最贏利的职业。悬賞破获秘密社团的告示刚一貼出，就有一个名叫奥沙利文的恶棍，基拉尼的一个药房学徒，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和基拉尼、肯

① 一丘之貉(味吉尔“牧歌”)。——編者注

② 爱尔兰的旧称。——編者注

梅尔、班特里和斯基别林等地的几个青年人，說他們是一个大阴谋的参加者，同活跃于大西洋彼岸的海盗暗中勾结，像布莱特先生那样，不仅想“使英国机关美国化”，而且要把爱尔兰并入模范共和国。于是，克黎郡和科克郡的密探就忙碌起来了，开始夜间捕人，进行秘密调查；对阴谋分子的搜捕从西南扩展到东北；在莫纳根郡演了不少滑稽剧，拜尔法斯特的惊慌不安的居民亲眼看到几十个教员、职员和店员被押着从大街走过，被关进了监狱。由于诉讼程序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事情被弄得更糟了。被捕者没有一个得到保释，夜间搜捕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全部侦查都严守秘密，据以进行逮捕的证件通常谁也未曾见到过，法官奔忙于自己的法庭和都柏林堡的接待室之间。拜尔法斯特市的被告辩护人雷先生曾经这样谈到拜尔法斯特的情形：“我觉得，最近一周来，英国宪法已经离弃了拜尔法斯特城。”这句话对于整个爱尔兰也完全适用。

但是从这一切叫嚷和这一切神秘色彩下面愈来愈明显地透露出政府的不安来。政府对来自它那些轻信的爱尔兰代理人的压力做了让步，而这些代理人原来又只不过是奥伦治会会员手中的玩物，现在政府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荒唐的处境而不致同时丧失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了。起初政府宣布，从西南到东北密布在整个爱尔兰境内的危险阴谋来自企图使爱尔兰美国化的凤凰俱乐部<sup>438</sup>。后来，阴谋似乎变成了里本运动<sup>439</sup>的复兴；而现在这又是某种全新的、完全无人知晓的、因而还要更可怕的东西了。政府被迫运用了什么样的诡计，可以从政府机关报都柏林“每日快报”<sup>440</sup>所使用的手法看出来；这家报纸每天都要编造各种关于谋杀、武装抢劫和夜间集会的谣言以饗读者。但使这家报纸感到莫大遗憾的是，被杀死的人竟常常从坟墓中爬出来，并且就在这家报纸上抗议编



輯部这样摆布他們。

可能确有凤凰俱乐部这样的組織存在,但无论如何,既然政府认为可以把这只凤凰扼杀在它自己的灰烬里,它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至于里本运动,那末这个运动从来没有依靠过阴谋分子。当在十八世紀末,信奉新教的“黎明伙伴”联合起来反对爱尔兰北部的天主教徒时,与之相对立产生了“护教派”的团体<sup>441</sup>。当1791年,“黎明伙伴”溶合于奥倫治会会员中时,“护教派”便变成了里本派。最后,在我們的时代,由于英国政府已公开同奥倫治会决裂,使里本派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里本派的团体已自行解体了。的确,埃格林頓勋爵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可能使里本运动复活,就同目前都柏林的奥倫治会会员想安置英国軍官去领导爱尔兰警察并用自己的拥护者去充实爱尔兰警察的企图也会使里本运动复活一样。目前,在爱尔兰,除了农业地区的社团外,沒有任何秘密社团存在。但是,譴責爱尔兰产生出这种社团并不比譴責森林长出蘑菇更合邏輯。爱尔兰的地主們已联合起来殘酷无情地反对貧穷的佃戶,或如他們所說的,进行經濟上的实验——清除国内的多餘人口。他們打算像有的女僕消灭害虫那样毫不客气地消灭爱尔兰的小佃农。这些被弄得走投无路的不幸的人們想要进行微弱的反抗,才組成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只能进行个人复仇行动的秘密社团。

但是,如果說政府想要在爱尔兰揭露的阴谋只是奥倫治会会员的純粹虛构,那末,由于政府所悬的賞金,这个幻想的果实可能取得极为具体的形式。比較起来,募兵人員的先令和杜松子酒所具有的引誘王国平民参加皇家軍队的力量,还不如为揭发爱尔兰秘密社团而悬的賞金所具有的建立那些所要加以揭发的社团的力量。每个郡內都立即出現了一批叛徒,他們冒充革命代表在农业

地区四处游蕩，招募革命党，要他們宣誓，然后告发这些受騙者，把他們送上絞架，并把沾滿鮮血的錢放进腰包。为了使讀者对这一帮告密人和政府賞金对他們的影响得到一个概念，只要把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发表的一篇演說中的这样一段話摘引在下面就够了：

“当我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的时候，在休尔河畔的卡里克和克郎梅尔間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謀杀案。有位××先生对××先生怀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用每人两基尼的代价雇了四个人去杀死他。休尔河两岸都有由卡里克通往克郎梅尔的道路；他在每条路上布置了两个人，因此他的受害者是逃脫不掉的。这样，那个不幸的人就遭到了暗杀，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震惊了全国，以致政府悬賞 500 英鎊来捉拿每一个凶手。你們信不信，竟是这个收买四个凶手的恶棍亲自出来告发了他們，后来凶手被处决了，而我在都柏林堡的我的办公室里亲手把 2 000 英鎊交給了这个人面野兽。”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2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1 月 1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53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 (一)

1858年12月29日于柏林

俄国革命的偉大“首倡者”(用馬志尼的說法)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又向前跨出了一步。11月13日,掌管廢除农奴制事务的御前总委员会<sup>442</sup>终于签署了一封給皇帝的奏折,其中陈述了建議据以实行农奴解放的基本办法。这封奏折的基本原则如下:

第一篇,农民立即停止为农奴,而进入对地主負有“暂时义务”的状态。这种状态应延續十二年,在此期間,他們享有帝国所有其他納稅臣民所享有的一切人身权和財產权。农奴的依附关系及其一切后果,永远被廢除,对过去的主人付任何賠償;因为如奏折中所說,农奴的依附关系是沙皇波利斯·戈东諾夫任意推行的<sup>①</sup>,

---

① 这种說法决不正确。波利斯·戈东諾夫(1601年11月2日敕諭)剥夺了农民在帝国土地上自由迁徙的权利,把他們固定在他們由于出生或居所隶属的領地上。在他几位继承者的統治下,貴族对农民的权力迅速扩大,不久所有的农民便真正成为农奴。但是这仍然只是貴族方面非法的越权行为,到1723年彼得大帝才使它合法化。农民沒有摆脱把他們束縛在領地上的羈絆,現在又被变成貴族地主的个人财产;地主获得权利把他們单个地或成批地,随着土地或不随着土地出售,由于这个緣故,他本人便开始向政府对农民及其賦稅負

后来由于濫用职权才成为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然是由君主的意志产生的，也就可以由君主的意志廢除。至于为廢除它而偿付贖金的問題，用奏折中的話來說，这种用繳錢換取权利的办法，会构成俄国历史上真正可耻的一頁，因为这些权利是农民天賦的，根本不應該予以剝夺的。

第二篇，农民在負有暂时义务的十二年当中，仍然繼續固定在領地上；但是如果地主不能供給他至少 5 俄亩土地自己耕种，他可以自由离开領地。如果他能找到人耕种他的份地，并替他向官府完納賦稅，他也可以同样自由离去。

第三篇和第四篇，每个村社得保有社員的住房及其庭院、畜舍、菜园等等，但每年須向地主繳納这些財產估价的 3% 的租金。村社有权迫使地主接受由两个地主和两个农民組成的混合委员会对这些財產进行估价。只要村社願意，它可以付清估价，把自己的家园贖回归自己所有。

第五篇，地主應該給予农民的份地是这样規定的：在固定于領地上的每个农奴平均有 6 俄亩以上的地方，每个成年男性农民可分得 9 俄亩耕地；在土地較少的地方，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二分給农民；在固定于領地上的农民太多，这三分之二的土地不能使每个成年男性农民至少分得 5 俄亩的地方，把土地划分成 5 俄亩一块的份地，而那些抽签沒有抽到份地的农民，可向村政府領取身分证，随意到他們願意去的地方去。至于柴草，地主應該按照事先規

---

責。后来，叶卡特林娜二世大笔一揮又把新得到的西部和南部各省中的四五百萬比較自由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但是，在俄国的官方文件中是不便提到有关彼得一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这种事实的，于是要倒霉的波利斯·戈东諾夫来为他的所有继承者的罪孽負責。

定的價錢由自己的树林子里向农民提供。

第六篇，为了这些利益，农民應該給地主服以下的徭役：为領到的每一俄亩份地，要給地主做 10 天用馬的工和 10 天不用馬的工（如果領到 9 俄亩份地，一年就得出 180 天工）。按照这个标准，每个地方行政区（省）的农民徭役的价值可以用貨幣定出来，因为一天徭役的价值只等于自由工人一天劳动的价值的三分之一。在过了头七年以后，这种徭役的七分之一，此后每过一年又有七分之一，可以折成谷物代役租。

第七篇，家务农奴，即那些不是固定于一定領地，而是固定于地主宅邸或服侍地主本人的农奴，必須为他們的主人服务十年，但是領取薪資。不过他們可以随时贖买自己的自由，男子須繳 300 卢布，女子須繳 120 卢布。

第九篇，地主仍然是村社的首脑，有权否决村社的決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准許向由貴族和农民組成的混合委员会提出申訴。

这个重要文件的内容就是这样，它間接地反映出了亚历山大二世对俄国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問題的观点。我省略了專門談村社組織的第八篇，以及只不过說明有关这种改革的官方文件應該采取的法定形式的第十篇。只要稍加比較就可以看出，这封奏折实质上只不过是总委员会今年春天向帝国各地各种貴族會議提出的綱領的繼續和发展。那个綱領——它的十条完全相当于奏折中的十篇，——实际上只是一个綱要，草拟它的目的在于向貴族指出行动的方向，并指望他們对它加以补充。但是，貴族愈深入这个問題，他們的反感就愈大；极有意义的是，八个月以后，政府不得不自己来充实这个綱要，制定出那个本来是設想为貴族的自发行动的計劃。

关于上述文件的来历就談到这里为止；現在来看它的内容。

如果說，俄国貴族认为他們的“8月4日”(1789年)还没有来到，因而他們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經达到了“人权宣言”<sup>443</sup>。的确，請設想一下，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賦的、根本不應該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羅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sup>444</sup>；1858年，俄国的专制君主，道地的 samoderjetz vsrossiiski<sup>①</sup>，又宣布了人权！我們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羅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这封奏折中所涉及的头一个当事人就是貴族。如果貴族不肯庆祝自己的8月4日，那末政府十分坦率地告訴了他們，他們将被迫这样做。奏折的每一篇对于貴族說来都包含着痛心的物质損失。貴族运用他們的活人資本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农奴租出去，或者讓他們出門随意謀生而繳納一定的年金 (obrok<sup>②</sup>)。这种做法再好不过地既滿足貴族的腰包，又符合俄国农奴的漂泊生活方式。这是貴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第一篇就規定要毫无补偿地取消它。不仅如此。根据第二篇，地主不能分給5俄亩耕地的每个农奴，可以自由行使权利，去他所想去的地方。根据第三篇至第五篇，地主对他的大約三分之二的土地失去自由处理的权利，而被迫把它分配給农民。的确，农民現在也占有着这些土地，但是还是处在地主的控制之下，并且必須执行完全由地主所規定的各項徭役。

---

① “全俄罗斯独裁者”，这个詞是馬克思按照俄語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編者注

② “代役租”，这个詞是馬克思按照俄語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編者注

可是今后土地实际上應該屬於农民，他們成为土地的永久持有者，他們获得完全贖买自己家园的权利，他們的徭役虽然規定得很多，但毕竟是要由法律加以严格限定的；更糟的是，农民可以按照（對他們）很有利的价格通过贖买来摆脱这些徭役。甚至 dvorovye<sup>①</sup>，即地主家中的僕役，也应当領取工錢，并且如果願意，可以贖买自己的自由。还要更糟糕的是，农奴應該获得与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这就是說，他們将有他們至今从来不知道的控告主人和在法庭上作证反对主人的权利；虽然地主在其領地上仍然是农民的首脑，對他們保有一定的司法权利，可是使大部分俄国貴族得以积蓄金錢去供养巴黎时髦女郎和在德国温泉疗养地肆意賭博的横征暴斂将要大大地縮減。然而，为了判断这种收入的縮減可能对俄国貴族发生的影响，我們来看一看他們的財政状况吧。俄国所有土地貴族向各信用銀行（由国家設立）借了共計 4 亿銀卢布的債款，为此給这些銀行抵押了大約 1 300 万名农奴。俄国农奴总数（不包括国有农奴）为 2 375 万人（按 1857 年人口調查）。显然，銀行的主要債務人是較小的农奴主，而較大的农奴主則很少負債。1857 年的人口調查表明，大約有 1 300 万名农奴屬於拥有 1 000 名农奴以下的地主，而其余的 1 075 万名农奴則屬於拥有 1 000 名农奴以上的地主。由此可見，后者大致是俄国貴族中不負債的，而前者則是負債的。这种算法也許不十分精确，但是一般說来可以认为是相当正确的。

按照 1857 年的人口調查，拥有 1 个到 999 个农奴的地主是 105 540 人，而拥有 1 000 个农奴以上的貴族則不超过 4 015 人。

---

<sup>①</sup> “家务农奴”，这个詞是馬克思按照俄語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編者注

这样，可見按照最低的估計，俄国全部貴族中有十分之九都对信用銀行，也就是說对国家負有大量債務。但是，大家知道，俄国貴族此外还欠了私人、銀行家、商人、犹太人和高利貸者許多的債，并且大多数貴族負債都非常沉重，以致对他們的地产只保有名义上的所有权。那些还在与破产进行掙扎的貴族，被最近这场战争的沉重牺牲完全拖垮了，因为他們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要担負沉重的捐稅，出人出錢出徭役，而且还无处銷售他們的产品，于是不得不按极端苛刻的条件去借債。而如今要他們毫无补偿地把大部分收入完全放棄，并且对剩下的部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处理，即不仅要縮減它，而且今后还要把它繼續保持在縮減的限度以內。

对于像俄国这样的貴族說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很容易預料到的。除非他們願意看到他們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完全垮台或立即破产，而在将来溶化在那个完全仰賴政府来决定等級和地位的官僚貴族階級中，他們就一定要对这个解放农民的企图进行反抗。他們的确也在进行这种反抗；显然，如果他們目前的合法的反抗对君主的意志无能为力，他們将不得不訴諸別的更有效的手段。



## (二)

1858年12月31日于柏林

俄国貴族对沙皇解放农民計劃的抗拒，已經开始以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方式表現出来。亚历山大二世在巡游各省时亲自向貴族发表演說，有时用温和口吻呼吁以仁爱为怀，有时用劝說方式多方开导，有时則声色俱厉地威胁命令，但是这些演說的效果如何呢？貴族像奴隶那样俯首帖耳地聆听这些演說，然而他們的內心感觉是：这位特地来向他們大声疾呼、哄騙劝导、說服告誡、威胁命令的皇帝，已經不再是过去那位能为所欲为的全能的沙皇了。因此，他們便敢于根本不做任何答复，不附和沙皇的意見，并且在他們的各种委员会中采取最簡單的办法，即一再拖延，也就是說，做出在实质上是否定的答复。他們使皇帝无路可走，只好像羅馬教会那样：compelle intrare〔强迫进门〕。但是这种单調沉悶的、执拗的緘默终于被圣彼得堡的貴族委员会大胆地冲破了，該委员会采納了委員普拉东諾夫先生所起草的一个实际上等于“权利請願书”<sup>445</sup>的文件。貴族公然要求召开貴族議會，来与政府共同解决不仅是这一个巨大的迫切問題，而且要共同解决所有一切政治問題。尽管內务大臣兰斯科伊先生拒不接受这个文件，他把它退回給貴族，并且憤怒地向他們指出集会呈递請願书不是貴族份內的事情，他們只應該限于討論政府給他們提出的問題；但是这並沒有什么效果。舒瓦洛夫將軍以委员会名义轉入进攻，威胁要亲自把文件呈交皇帝，从而迫使兰斯科伊先生收下了它。这样，1858年

的俄国貴族就正如 1788 年的法国貴族一样，宣布了 *Assemblée des Etats généraux* [三級會議] 的口号，或者用俄国人的話來說，宣布了 *Semski Sabor* 或 *Semskaja Duma*<sup>①</sup> 的口号。这样，貴族在为了私利而企图完整地保存金字塔的陈旧社会基础的同时，自己攻击了它的政治重心。此外，*esprit de vertige* [謬誤精神]——年老的法国侨民这样称呼时代精神——如此强烈地感染了他們，以致大部分貴族都被卷入資產階級开办联合股份公司的狂热中，而在西部各省，小部分貴族还尽力表明自己在领导和保护时髦的文字宣傳。为了使讀者对这些大胆的傾向有个大致的概念，只需要指出这么两点：在 1858 年，发行的日报已經增加到 180 种，可是还有 109 种新报纸宣布将于 1859 年出版。另一方面，在 1857 年創辦了 16 个公司，其資本为 303 900 000 卢布，而在 1858 年从 1 月到 8 月又增添了 21 个新公司，其資本为 36 175 000 卢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实行的改革的另一面。不應該忘記，俄国政府曾經多次在农民眼前造成自由的 *fata morgana* [幻景]。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統治初期，曾号召貴族解放农民，但是沒有成功。在 1812 年号召农民参加 *oplchenie*<sup>②</sup> (民兵) 时，曾允許他們以廢除农奴依附身分来酬答他們的爱国行为，这个許諾虽是非正式的，但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許；当时曾說，对于保卫住神圣俄罗斯的人，决不应再以奴隶視之。甚至在尼古拉統治时期，也曾有一系列敕諭限制貴族对农奴的权利：允許农奴 (1842 年的敕諭) 与其主人簽訂有关服役期限的契約 (这便間接地允許农奴起訴控告

① “国民代表會議”、“国民杜馬”，这两个詞是馬克思按照俄語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編者注

② “义勇軍”，这个詞是馬克思按照俄語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編者注

主人)；以政府名义(1844年)保证农民履行契約所規定的义务；保证农奴(1846年)在他們所依附的領地需要拍卖时有权贖买自由；允許依附于这种領地上的农民(1847年)在該領地一出售时立即把它全部买下来。使政府和貴族都大为吃惊的是，突然发觉，农奴对此很有准备，真的接二連三地买起領地来了；不仅如此，在許多情況下，地主只是虛有其名的所有者，因为他自己的农奴出錢帮他摆脱了債務，这些农奴当然采取了各种預防办法来为自己确实保证自由和領地的所有权。当这些情况一經发现，被农奴这种机灵和干练的表現以及西欧1848年的革命爆发吓得魂不附体的政府，不得不寻找补救办法来阻止实行那势必逐漸把貴族攆出領地的法令。但是要廢止敕諭已經为时太晚，因此另一道敕諭(1848年3月15日)便把以前只屬於村社的购买权扩大到每一个个别的农奴。这个措施不仅破坏了一个个村子的以及一县境內数个村子之間的那种在此以前使农奴能够为购买領地筹集資本的联合，而且，它还附了一些特別的条件。农奴可以购买土地，但是不能购买依附于土地之上的人；換句話說，农奴在购买他們所附屬的領地时，並沒有购买他們自己的自由。恰恰相反，他們仍然是农奴，而且全部交易只有得到原来地主的同意才能有效！除此以外，有許多所謂按照自己农奴的信托而持有地产的貴族，由于那同一道敕諭，得到权利并且受到鼓励去破坏这种信托关系，收回对地产的全部所有权；同时还无条件禁止了农奴在法庭上进行任何訴訟。从那时起，农奴除小学以外都不得进其他任何学校，对解放的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了，但是上一次战争又迫使尼古拉采取普遍武装农奴的措施，并且像往常一样，以使他们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諾言来推行这项措施，——政府委托自己的下級官吏在农民中广泛散布了这些諾言。

十分自然，在这一切之后，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认真着手解放农民。他努力的结果，他的计划要点，既然已经成熟，现在公布出来了。十二年的考验将伴随着沉重的徭役，而以后会进入何种状态连政府也不敢详细描述，对于这样的考验，农民会说些什么呢？对于组织村社管理机构、法庭和警察来消除俄国每个村社自古固有的全部民主自治机关，以便仿照 1808—1809 年的普鲁士乡村立法建立一套地主世袭政权的体系<sup>446</sup>，——这种体系是那全部生活都由村社管理、毫无个人土地私有观念、认为村社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所有者的俄国农民所极端厌恶的，——农民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自从 1842 年以来，农奴反对地主及管家的起义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现象，甚至按照内务部的官方统计，每年大约有 60 名贵族死于农民之手，在上次战争期间，起义有很大的发展，而在西部各省起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政府（那里曾经策划密谋，一俟外国敌人——英法军队逼近国境，就开始起义！），那就未必可以怀疑，即使贵族不反对解放农民，企图实现委员会的建议也会成为在俄国农村居民中爆发大规模起义的信号。但是，贵族必定要反对；皇帝在国家大计和权宜办法之间、在对贵族的畏惧和对愤怒的农民的畏惧之间徬徨，必然会躊躇不前；而由于怀着巨大期望而愤激到极点的农奴，认为沙皇是在他们一边，但是被贵族束住了手脚，这时必然要开始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 1793 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2 月 29 日和 31 日  
载于 1859 年 1 月 17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53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馬克思 普魯士狀況

1859年1月11日于柏林

你們当然知道德国有句諺語：“如果周圍空无一物，皇帝也失去自己的权力。”（«Wo nichts ist, hat der Kaiser sein Recht verloren»）既然連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的規律的支配，本报通訊員当然更无法逃避这条規律了。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說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 «Weltgeist» [“世界精神”]的中心寄发通訊的极重要的原因。普魯士运动的第一阶段以大选告終，第二阶段以議會明天开幕开始。同时，我在前几篇通訊<sup>①</sup>中就这个国家的状况所做的估計（我从寄給我的一批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上看到，許多美国的条頓子孙剽窃了我的这些看法，而对他們的高見的来源未做应有的說明），已經完全为拖着懶散步伐进展的局势所证实了；說到这局势，我簡直不能說它是在进展，而是最好像人們永远記得的那位迂腐的約翰逊博士在这种情况下所会說的那樣，說它是用腹部貼地，不用脚，而像虫子一样地蠕動。德国的里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都长；但德国人用以計程的步子却短

<sup>①</sup> 見本卷第 652—660、681—684 頁。——編者注

得多。正因为如此，德国人在他們的神奇故事里总是幻想有这样的宝靴：它能使穿着它的幸运儿一步跨出一里远。

人們对这个国家过去十年的历史的評論一向是很片面的（这是德国人最爱用的字眼，他們都像布利丹的煩瑣动物一样，为了面面俱到，以致总是停步不前），所以我們不妨談一些一般的看法。当那位缺乏头脑的国王初登宝座的时候，他滿脑袋都是浪漫派的幻想。他想既当稟承天命的国王，同时又当人民的国王；既維持万能的官僚政治，又在自己周圍拥有一批独立的貴族；既当和平的使者，又当兵营的統帅；既提倡中世紀式的民权，又抵制現代自由主义的一切热望；既复兴宗教信仰，又夸耀他的臣民智力高度发展，——总而言之，他想既扮演中世紀的国王，同时又作为普魯士国王这样一个十八世紀的怪胎来行事。但是从1840年到1848年，所有一切都与此背道而馳。Landjunker〔容克地主們〕本来寄厚望于“政治周刊”的戴王冠的撰稿人<sup>447</sup>（“政治周刊”当时天天鼓吹必須給普魯士那种借助教书先生、軍曹、警察、稅吏和飽学官僚来实行的平凡无奇的政治制度中加进富有詩意的貴族統治），但是只得滿足于国王的暗中同情，而得不到他的实际让步。資產階級还太軟弱，不敢进行积极的活动，只得跟随在黑格尔門徒所領導的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論家大軍后面。在以前任何时期，哲学批判都沒有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位的头八年中那样大胆、有力和盛行；威廉四世想用中世紀神秘主义代替弗里德里希二世搬运到普魯士来的“肤淺的”唯理論。这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資產階級的实际上的軟弱；他們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讓那些在思想領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最后，那位浪漫派国王

本人毕竟和他所有的前人一样，实际上只不过是他在枉費心机企图用过去时代的美妙情感加以点綴的那个最平庸的官僚政府的工具而已。

革命，或者毋宁說是它所产生的反革命，把整个局面彻底改变了。Landjunker 从国王个人的奇怪想法中取得了实际利益，把政府不只抛回到了1848年以前，1815年以前，而且甚至抛回到了1807年以前所处的状况。羞怯的、浪漫主义的想望結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普魯士上議院；死手权<sup>448</sup>恢复了；地主裁判权在庄园里空前盛行；免稅又重新成为貴族的标志；警察和政府官員在貴族面前要毕恭毕敬；一切高官要职都奉献給土地貴族和閥閱名門的苗裔；旧派的开明官吏都被扫光，而代之以俯首听从食利者和地主的奴才；革命所爭得的一切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論自由、宪制代議权——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只是作为貴族階級的特权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如果說在过去的时期资产階級扶植了哲学运动，那末現在貴族已把它連根鏟除而代之以虔誠主义。凡是开明的教授都被赶出大学校門；viri obscuri〔蒙昧主义者〕、亨格施坦堡、施塔耳 tutti quanti〔之流〕掌握了普魯士所有的教育机构，从乡村小学校起直到柏林的高級师范学院为止。警察和行政机构不是被摧毁了，而是变成了統治階級的簡單工具。連工业自由也遭到攻击；由于专利权制度变成了一种庇护、恫吓、賄賂的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大城市的手工业者又被重新赶进行帮、行会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屬於过去时代的陈旧形式之中。这样，国王在他专制統治的头八年里梦寐以求而不得实现的那些最大胆的幻想，由于革命而全部实现了，并且在1850—1857年这八年期間，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可以感觉得出的现实。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觉，反革命打消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这样，资产阶级就被赶回去干他们唯一在行的事情——商业和工业，而且我认为，在最近十年当中，相对地说，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在这方面都没有获得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那样巨大的进步。如果你十年以前到过柏林，现在你会认不出它来了。它已经从一个严肃的阅兵场变成了喧闹的德国机器制造业中心。如果你乘车到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去走一遭，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郎卡郡和约克郡。普鲁士虽然还抬不出一个伊萨克·贝列拉来自夸，但它却有成百成千个梅维森，他们控制着各种各样的 *Crédits Mobiliers*<sup>28</sup>，这种银行在普鲁士比德意志联邦议会中的王公数目还要多。

拼命追逐财富、向前进取、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尤其是向股份公司投资和做股票投机生意，这样一股狂潮盛极一时，社会上所有各个阶级，从农民起直到一度位列 *reichsunmittelbarer Fürst*<sup>449</sup> 的头戴王冠的国君，都沾染上了这种风气。所以，你们看到，资产阶级为自己所处的巴比伦俘虏的境遇而哭泣、而垂头丧气的时候，正是他们变为国内的实际力量，而高傲的贵族从骨子里变成唯利是图的、做金钱生意的股票投机家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一个表明思辨<sup>①</sup> 哲学如何变成商业投机的例证，那就请看 1857 年的汉堡。难道这些善于思辨的德国人那时没有表现为讹诈舞弊的能手吗？可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这种上升运动（它是靠物价的普遍上涨，因此也是靠官僚统治者固定收入的普遍下跌而加强的），自然伴随着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工人阶级的集聚。过

① 原文为 *speculative*，这个词还含有“投机”的意思。——译者注



去八年里，小資產階級的破產是在全歐洲到處可以看到的普遍現象，但沒有一個地方像德國這樣突出。這個現象還需要什么解釋嗎？我可以簡單地回答：看一看那些昨天還是窮光蛋今天卻是百萬富翁的人吧。如果一個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了百萬富翁，那必然要有一千個擁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內淪為乞丐。這種變化，神奇的交易所轉瞬之間就能辦到，完全不用依賴現代工業的緩慢集中財富的方式。所以，小資產階級的不滿和工人階級的集聚，在普魯士最近十年當中是跟資產階級的成长同時發展起來的。

雖然我還沒有結束我的 Rundschau [綜合觀察] (“新普魯士報”這樣稱呼這種回顧式的評論)，可是這篇通訊現在就該寄出了。

卡·馬克思寫於 1859 年 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9 年 2 月 1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5548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卡·馬克思的遺稿



## 导 言

(摘自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sup>450</sup>

###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 1. 生 产

(a) 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一种十八世纪鲁滨逊式故事的毫无想像力的虚构,这种鲁滨逊式的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 *contrat social* [社会契约论]<sup>451</sup>,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式故事的美学的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

依据), 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 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 在他們看来, 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結果, 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 按照他們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 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 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錯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許多方面同十八世紀对立, 作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历史的見地上, 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們越往前追溯历史, 个人, 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 就显得越不独立, 越从屬于一个更大的整体; 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 后来是在由氏族間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紀, 在“市民社会”中, 社会結合的各种形式, 对个人說来, 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 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 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 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 ζῷον πολιτικόν<sup>①</sup>, 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 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見的事, 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經內在地具有社会力的文明人或許能做到——就像許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发展一样, 是不可思議的。在这方面无需多說。十八世紀的人們有这种荒誕无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不是巴师夏、凱里和蒲魯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經济学中来, 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魯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編造神話的办法, 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經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說明, 說什么这种观念对亚当或普罗米修

<sup>①</sup> 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論”第1卷第1章)。——編者注

斯已經是現成的，后来它就被付諸实行等等。再沒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 *locus communis* [陈詞濫調] 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說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产，我們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們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規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們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經過比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別有不同規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屬於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产都无从設想；如果說最发达語言的有些規律和規定也是最不发达語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語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別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別，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規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見到統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就忘記本质的差別。而忘記这种差別，正是那些证明現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諧的现代經濟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們說，沒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沒有过去的、积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見資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說，如果我們恰好拋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下来的劳动”成为資本的那个特殊的話。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

史，例如在凱里看来，就表现为历代政府的恶意窜改。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那末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門——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它們的**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要留到别处(后面)再說。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終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門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說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門。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論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如見約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sup>452</sup>），用来論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論部分包括或者好像应当包括：

(1) 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要說明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們将会知道，实际上归納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規定，却扩展成淺薄的同义反复。

(2) 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說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斯密那里作为 aperçu [提示] 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各个时期——这种研究超出本題应有的范围，但就属于本題范围來說，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是要談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說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 [Gewinn] 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 [Gewinnen] 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

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sup>453</sup>），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 in abstracto [一般] 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像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下面这一点总应该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献生活的征服者、靠租税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所有制，（2）司法、警察等等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地答复一下：

ad [关于]（1）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即



无所有作为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賽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問題,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談的。可是,如果說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談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談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据为已有的占有,是 *contradictio in subjecto* [自相矛盾]。

ad [关于](2)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濫調还原为它們的实际內容,它們所表示的就比它們的說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說,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統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純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只模糊地感到,在現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們只是忘記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繼續存在于他們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剛剛产生或者已經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維当做一般規定而确定下来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歷史的生产阶段。

## 2.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費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須观察一下經濟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項目。

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僕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分量）；交换决定个人对于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

或者是同他們站在同一个見地上,或者是在他們之下。最庸俗不過的責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家過於重視生產,把它當做目的本身。說分配也是同樣重要的。這種責備的立足點恰恰是那種把分配當做與生產並列的獨立自主的領域的經濟見解。或者是這樣的責備,說沒有把這些要素放在其統一中來理解。好像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好像這裡的問題是要把概念作辯證的平衡,而不是解釋現實的關係!

### (a) 【生產和消費】

生產直接也是消費。雙重的消費,主體的和客體的:個人在生產當中發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產行為中支出和消耗這種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種消耗完全一樣。第二,生產資料的消費,生產資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燒中)重新分解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費也是這樣,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狀和特性,這種自然形狀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產行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來說也是消費行為。不過,這一點是經濟學家所承認的,他們把直接與消費同一的生產,直接與生產合一的消費,稱做**生產的消費**。生產和消費的這種同一性,歸結起來是斯賓諾莎的命題:«determinatio est negatio»<sup>454</sup>。但是,提出生產的消費這個規定,只是為了把與生產同一的消費跟原來意義上的消費區別開來,後面這種消費被理解為起消滅作用的與生產相對的對立面,我們且觀察一下這個原來意義上的消費。

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學物質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吃喝是消費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產自己的身體,這是明顯的事。而對於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從某一方面

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 finish [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 *δυνάμει* [可能性] 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 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 finishing stroke [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 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

說，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对象是显而易見的，那末，同样显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內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費創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产。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來說：

(1) 它为消費提供材料，对象。消費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費；因而，生产在这方面創造出、生产出消費。

(2) 但是，生产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质，使消費得以完成。正如消費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費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費的。飢餓总是飢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飢餓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飢餓。因此，不仅消費的对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創造消費。

(3) 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費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結果，——消費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費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創造的。艺术对象創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賞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費：(1) 是由于生产为消費創造材料，(2) 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費的方式，(3) 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

費的对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动力。同样，消費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費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1) 直接的同—性：生产是消費；消費是生产。消費的生产。生产的消費。政治經濟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費，可是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費。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費或非生产的消費的研究。

(2) 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們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們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費創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費为生产創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沒有生产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产。这在經濟学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3) 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費，消費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費的手段，消費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說，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費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費为生产提供想像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創造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創造出来。消費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費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的时候，在消費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毀掉的时候；在消費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达到完美的程度的时候；所以，消費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費，是在生产創造出消費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后是在

生产把消費的动力、消費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創造出来的时候。这第三項所說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經濟学在論述需求和供給、对象和需要、社会創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釋。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來說，把生产和消費同一起来，是最簡單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sup>455</sup>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經濟学家也这样做过，薩伊就是个例子；他的說法是，就一个民族來說，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費。或者，就人类 in abstracto [一般]來說，也是这样。施托尔希指出过薩伊的錯誤<sup>456</sup>，因为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費掉，还要創造生产資料等等、固定資本等等。而且把社会当做一個单独的主体来观察，是把它作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就一个主体來說，生产和消費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強調的主要之点是：如果我們把生产和消費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許多单个人的活动，它們无論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費，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內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对象，因消費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費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經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說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末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間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規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費之間。

那末，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处于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

### (b) 【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当做生产要素；(2)当做收入源泉，当做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利息和利润，就它们作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要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



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談，等等，簡直是幻覺。

因此，像李嘉图那样的經濟学家，最受責备的就是他們眼中只有生产，他們却專門把分配規定为經濟学的对象，因為他們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現。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为一种社会規律，这种規律决定他在生产中——指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沒有資本，也沒有地產。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資本和地產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結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从一方面說，分配似乎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經濟的事实。一个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經過革命把大地產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產永久屬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做]世襲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級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照最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仿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員在各类生产之間的分配（个人从屬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規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結構，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

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來理解现代生产并且 *par excellence*〔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說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題。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做永恒真理來論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誕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問題。如果有人說，既然生产必須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末就应该答复他說，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們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們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結果了。它們在生产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結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結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問題，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問題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討論和分析。

然而，这些問題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样給予簡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紀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維持下去，自己



### (c) 最后, 交换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 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交换。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 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 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首先很明显, 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 直接属于生产, 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 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 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企业家之间的交换, 从它的组织方面看, 既完全决定于生产, 而且本身也是生产行为。只有在最后阶段上, 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 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外, 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 (1) 如果没有分工, 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成果, 也就没有交换; (2) 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 (3) 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 城乡之间的交换, 乡村中的交换, 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 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 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 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 而是说, 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 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 那是自明之理。分配, 作为产品的分配, 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 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

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場扩大，即交換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規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細。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資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費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間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 3. 政治經濟学的方法

当我们从政治經濟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該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門的分布，輸出和輸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費，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来，这是錯誤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資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話。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是整体的一个渾沌的表象，經過更切近的規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整体的渾沌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許多規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經濟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

家等等开始；但是他們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場的各种經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现为綜合的过程，表现为結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現。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維的結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維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現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济范疇，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它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总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疇，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来——而哲学意識就是被这样規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維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那样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疇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結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內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維总体、作为思維具体，事实上是思維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

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現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經常作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 Ça dépend [要看情况而定]。比如,黑格尔論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說有这样的家庭和氏族,它們还只是占有,而沒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的家庭的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較高級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組織的比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設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說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錯誤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說,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現,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經实现,而那些通过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現出来的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較发展的具体則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屬关系保存下来。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貨幣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說,比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現一个比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現一个比較发展的整体的

从屬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較具体的范疇表現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經存在。在这个限度內,从最簡單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維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說,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級的經濟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貨幣,秘魯就是一个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貨幣以及作为貨幣的条件的交換,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現在个别公社內部,而是出現在它的边界上,出現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內部的交換当做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地,与其說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內部的成員間,不如說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貨幣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羅馬人那里,貨幣的充分发展——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在他們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簡單的范疇,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現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沒有历尽一切經濟关系。例如,在羅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稅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貨幣制度原来只是在軍隊中得到充分发展。它也从来沒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領域。

可見,比較簡單的范疇,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較具体的范疇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屬於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較具体的范疇在一个比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簡單的范疇。它在这种一般性——作为劳动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学上从这种簡



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存在于货币中的物 [als Sache außer sich im Geld]。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局限地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学派相对立的重农学派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做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par excellence [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这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何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

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sans phrase〔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說,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在俄罗斯人那里,比如說,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了。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适应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适应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并且,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的状态,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

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結構和生产关系。资产階級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階級經濟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階級社会形式的經濟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們認識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稅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們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階級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說资产階級經濟的范疇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說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 *cum grano salis* ① 来理解。这些范疇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縮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謂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潰时期出現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謂 *δυνάμει* [在可能範圍內] 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話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階級經濟只有在资产階級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經开始时，才能理

---

① 直譯是“带一点盐”，轉义是“在一定意义上”。——編者注

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

质；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中世紀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只要不是純粹的貨幣資本——作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带着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資產階級社会中情况則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資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創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权力。它必須成为起点又成为終点，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关系。

因此，把經濟范疇按它們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們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問題不在于各种經濟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們在“观念上”（蒲魯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內部的結構。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現的單純性（抽象規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决定的。作为商业資本和貨幣資本的資本，在資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現出来。倫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經營农业的中世紀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說明同一些范疇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

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 *joint-stock companies* [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特权的、有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看来，无形中是说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 4. 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 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

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 历来的观念的历史编纂法同现实的历史编纂法的关系。特别是所谓文化史，旧时的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编纂法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3) 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 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唯物主义的关系。

(5) 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6)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现代艺术等等。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像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 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 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

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 Crédit Mobilier<sup>457</sup> 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一切神话都是在想像中和通过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因此，随着自然力在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sup>458</sup> 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



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話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彈丸并存嗎？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嗎？随着印刷机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繆斯岂不是必然要絕迹，因而史詩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嗎？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詩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够給我們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还是一种規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則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現出来嗎？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純真地复活着嗎？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不朽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們的艺术对我們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結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底至  
9 月中旬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 1902—1903 年“新时代”  
第 23—25 期(第 1 卷)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 注 釋

- 1 馬克思被邀請作为倫敦的外國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1856年4月14日為紀念憲章派報紙“人民報”(《People's Paper》)創刊四周年而舉行的宴會。他利用請他第一個講話的機會，作了關於無產階級的世界歷史使命的演說。馬克思參加“人民報”的創刊紀念會這件事明顯地說明了科學共產主義奠基人同英國憲章派保持着聯繫，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力想在思想上影響英國無產階級並且幫助憲章運動的領袖，以使英國工人運動在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復興起來。

“人民報”是憲章派的週報，1852年5月由革命的憲章運動的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瓊斯在倫敦創辦。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為該報撰稿，同時還對該報的編輯工作給以幫助。該報除了刊登馬克思和恩格斯專為它撰写的文章外，還從“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上轉載他們的重要文章。在這個時期，該報始終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瓊斯和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接近，曾經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為“人民報”撰稿並使他們和瓊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該報轉到了資產階級實業家的手中。——第3頁。

- 2 好人兒羅賓是英國民間故事中庇護人們和為人們幫忙的幻想人物，是莎士比亞的喜劇“仲夏夜之夢”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4頁。
- 3 1793年約克公爵被任命為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英軍總司令，並奉英國政府之命前往弗蘭德攻占敦克爾克。在對敦克爾克進行軟弱無效的圍攻之後，1793年9月6—8日，聯軍在岡德斯霍特戰役中被法國革命軍擊敗。英軍僅僅由於約克公爵在法軍進攻時沒有應戰，倉皇退却，才免于全軍覆沒。

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成立后，在1799年，約克公爵作为英俄联軍总司令被派往荷兰(当时的巴达維亞共和国)，英、俄联軍中的英国軍团在这年8月底在赫耳德登陆。由于公爵指揮无能，联軍在10月被法国人击潰。——第7頁。

- 4 馬克思在这里引的是科貝特的文章“科克倫·約翰斯頓先生”(«Mr. Cochrane Johnstone»),載于1806年7月5日“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报”第10卷第1期。馬克思在写关于約克公爵的文章时还利用了科貝特的其他文章。

“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是从1802—1835年在倫敦出版的激进派周报。——第7頁。

- 5 阿尔克馬降約是1799年10月18日在約克公爵指揮的第二次反法同盟的軍队在荷兰失敗后签字的(見注3)。除了規定釋放八千名法国和荷兰战俘以外，联軍还必须撤出自己在荷兰的軍队。——第8頁。

- 6 阿德里安堡和約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締結的和約。——第9頁。

- 7 福克斯集团(*Coterie Fox'*)——这是馬克思对以查理·詹姆士·福克斯为首的、人数不多的輝格党貴族“左”派的称呼。这个派別是在法国資產階級革命胜利后由于輝格党分裂而形成的。福克斯的拥护者代表英国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对反雅各宾战争，拥护英国議會改革。——第10頁。

- 8 出售軍官官銜证书的制度是十七世紀末叶在英国产生的，后来得到国王批准。1719—1720年正式規定了軍銜价格，这种价格后来曾几次审查和調整。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1871年，它保障了英国貴族在軍队中的壟断地位。——第10頁。

- 9 “国王之友”是十八世紀下半叶人們对国王乔治三世的政策的拥护者的称呼。乔治三世力图加强国王的特权，把政治領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把輝格党排除在国家管理之外。国王为此利用了輝格党中由于工商业資本的利益同地主寡头政体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产生的危机。“国王之

- 友”曾多次夺取了政权。——第 10 頁。
- 10 指匿名小册子“內閣和反对派对約克公爵殿下的行为实录”1808 年倫敦版 (《A Plain Statement of the Conduct of the Ministry and the Opposition, towards His Royal Highness the Duke of York》, London, 1808)。——第 10 頁。
- 11 “紀事晨报” (《*The Morning Chronicle*》) 是英国資產階級的一家日报, 1770 年到 1862 年在倫敦出版; 是輝格党的机关报, 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 后来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 11 頁。
- 12 馬克思引用的是威廉·科貝特的文章“約克公爵” (《Duke of York》), 載于 1808 年 8 月 20 日“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报”第 14 卷第 8 期。——第 11 頁。
- 13 白厅 (*White Hall*) 是倫敦中心的一條街, 在那里有許多政府机关, 其中有英軍总司令部、海軍部和其他的部(財政部、外交部等等)。——第 13 頁。
- 14 卡列班 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風雨”中半人半怪的角色。——第 16 頁。
- 15 “撒丁”这篇論文是馬克思为“人民报”撰写并且同时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論文之一。

“紐約每日論壇报” (《*New-York Daily Tribune*》) 是一家美国报纸, 1841—1924 年出版。該报由著名的美国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創辦,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輝格党左翼的机关报, 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 該报站在进步的立場上, 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該报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聞工作者, 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納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該报的編輯之一。馬克思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該报撰稿, 一直到 1862 年 3 月, 繼續了十年以上; 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文章, 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約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的文章先从曼彻斯特寄到倫敦, 馬克思通常在它們上面注上寄往紐約的日期; 因此, 文章上面的日期有时与它們的写作日期不符。馬克思在有些文章上还注上巴黎或柏林等字

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报”编辑部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的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从1855年年中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在该报发表时都没有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馬克思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包括的这段时期中所写的文章，遭到“紐約每日論壇报”编辑部大肆窜改以致歪曲原意的，本卷没有收入。——第17頁。

- 16 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 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进行斗争期间在意大利成立的两个政党。教皇党人是教皇的拥护者，是意大利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保皇党人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

法国和奥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01—1714）和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41—1748）。头一次战争的结果，薩瓦公国得到了西西里岛、蒙费拉托以及米兰公国的一部分土地；薩瓦大公于1713年取得了国王的称号。1718年，西西里被西班牙人夺去，但是薩瓦公国于1720年获得了撒丁作为赔偿；同年，在薩瓦、皮蒙特、撒丁的领土上建立了撒丁王国（或称皮蒙特王国），撒丁王朝的代表成了国王。由于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撒丁王国从奥地利那里得到了帕维亚公国的大部分以及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部分领地。——第17頁。

- 17 指皮蒙特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卡富尔伯爵为 1856 年巴黎會議起草的一份备忘录，其內容是关于在奥法占領各省和那不勒斯王国(双西西里王国)境內的意大利人民的貧困状态。卡富尔未能在會議上宣讀这份备忘录，他于 4 月 8 日发表严厉譴責奥地利在亚平宁半島上的統治的演說时，向會議参加者叙述了它的內容。皮蒙特的代表在 1856 年 3 月 27 日和 4 月 16 日致會議主席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的照会中，提出了削弱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消除奥地利对意大利領土的占領、停止在那不勒斯王国实行反动和恐怖政策的問題。尽管法、英、俄三国代表贊同皮蒙特的备忘录，但是意大利問題在巴黎會議上并未得到实际解决。——第 17 頁。
- 18 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英国輝格党政府(当时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口头上支持在意大利(包括皮蒙特)实行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但是無論在 1848 年或者 1849 年，都沒有帮助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統治北部意大利的斗争。——第 17 頁。
- 19 1849 年 4 月，法国資產階級政府把远征軍开往意大利，目的是干涉羅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殘酷的搏斗以后，法国軍隊于 1849 年 7 月 3 日进入羅馬，在那里一直駐留到 1870 年。——第 19 頁。
- 20 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称为凱恩、拉姆別薩和貝耳島的獄卒，是指波拿巴在执掌法国政权之后就开始大批逮捕和放逐共和派和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 凱恩 是法屬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而常常造成大批死亡，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
- 拉姆別薩(拉姆別茲)是在北非一个古羅馬城市的廢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的感化移民区，1851—1860 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 貝耳島 是比斯开灣的一个島，1849—1857 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 19、439 頁。
- 21 关于奥地利蒙受的損失，是馬克思的諷刺話。在 1856 年的巴黎會議



上，虽然法英两国代表贊同皮蒙特的备忘录（見注 17），但是这两个国家并不想稍微认真地阻止奥地利在意大利和巴尔干所实行的政策。对这点的证明，是奥地利、法国、英国于 1856 年 4 月 15 日在巴黎共同签订了关于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的协定。——第 20 頁。

- 22 在 1848—1849 年的奥意战争当中，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于 1849 年 3 月 23 日在諾瓦拉（意大利北部）战役中一败塗地。查理-阿尔伯特害怕人民的愤怒，当即在战场上把王位让給儿子維克多-艾曼努尔，并逃出意大利。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于 1849 年 3 月 26 日同奥地利人签订了停战协定，而于 8 月 6 日締結了和約。——第 20 頁。
- 23 大概是指路易·波拿巴为他的堂弟拿破侖亲王所筹划的与撒丁国王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女儿克洛蒂尔达締結婚姻一事。婚礼于 1859 年举行。——第 20 頁。
- 24 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庙里的 德尔斐神諭 以預卜希腊各城邦的内外政策而馳名，并对这种政策起很大的影响（卜辞由女巫宣布，但是編写卜辞的是洞悉希腊事态的祭司）。更古老的所謂 特罗芬尼神諭 未曾享有这种威信。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英国議員們的发言不仅对于确定英国的对外政策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沒有独创性，只不过反映了帕麦斯顿强迫議會接受的政策而已。——第 20 頁。
- 25 馬克思引证的是皮蒙特的代表 1856 年 4 月 16 日的照会（見注 17）。——第 21 頁。
- 26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 年創刊于倫敦。——第 23 頁。
- 27 馬克思指的是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稅的原理”（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第一版于 1817 年在倫敦出版。——第 23 頁。
- 28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銀行，由貝列拉兄弟創辦并为 1852 年 11 月 18 日的法令所批准。*Crédit Mobilier* 的主要目的是充当

信貸的中介和濫設企業(參加工業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創立)。該銀行廣泛地參加了法國、奧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國的鐵路建設。它的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用它所開辦的股份公司的有價證券在交易所進行投機。Crédit Mobilier 用發行本公司的股票得來的資金收買各種公司的股票,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業的有價證券作擔保,而各種公司的股票則是以它們本身的財產價值作擔保的。因此,同一項實際財產產生了兩倍的虛擬資本:一種形式是該企業的股票,一種形式是撥款給該企業並收買其股票的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該銀行同拿破侖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關係,並受它的保護。1867年,該銀行破產,1871年停業。Crédit Mobilier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作為新型金融企業出現,是由反動時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這個時代里,交易所買空賣空、投機倒把活動異常猖獗。中歐的其他許多國家也仿照法國的 Crédit Mobilier 建立了類似的機關。——第 24、218、257、313、379、464、521、541、689、699、729 頁。

- 29 小拿破侖 是維克多·雨果在 1851 年法國立法議會的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中給路易·波拿巴起的綽號;1852 年,雨果的抨擊性小冊子“小拿破侖”(«Napoléon le Petit»)問世以後,這一綽號得到了廣泛的流傳。——第 27 頁。
- 30 十二月十日會 (*Dix Décembre*) 是波拿巴派的秘密會社,成立於 1849 年,主要由墮落分子、政治冒險家、軍閥的代表人物等組成;它的成員幫助了路易·波拿巴於 1848 年 12 月 10 日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該會因此而得名)。後來,該會成員是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積極參加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頁)中對十二月十日會作了詳盡的評述。——第 30 頁。
- 31 弗倫特運動 是 1648—1653 年法國反專制制度的貴族資產階級運動。運動的貴族首領依靠自己的侍從和外國軍隊,利用這一時期發生的農民起義和城市的民主運動來為自己謀利益。——第 30 頁。
- 32 “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國資產階級的日報“政治和

- 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称, 1789年創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 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 該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 即所謂秩序党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 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31頁。
- 33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日报, 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 从1799—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32頁。
- 34 馬克思指的是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論”(«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初版于1808年在巴黎出版。——第38頁。
- 35 为了使英格兰銀行不致破产, 英国皮特政府頒布了特別法令, 規定銀行券的官定行市, 并准許該行停止銀行券兌換黃金。銀行券兌換黃金在1819年才恢复。——第40頁。
- 36 文章中指的是1856年夏季馬德里的革命事变。1854—1856年的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以这些事变結束的。1856年7月, 西班牙的反动派和教权派把埃斯帕特罗的进步派內閣弄下了台, 組成了奥当奈尔將軍的保守派內閣。反动势力的这次进攻引起了一場新的革命, 革命遭到奥当奈尔的殘酷鎮压。——第41頁。
- 37 指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举行的政变。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体即由此肇始。——第42頁。
- 38 1843年, 温和派領袖之一納尔瓦艾斯將軍利用了人們对軍事独裁者、王国摄政埃斯帕特罗領導的进步派內閣的普遍不滿, 同孔查將軍等人一起举行了反革命兵变。在把埃斯帕特罗赶下台以后, 納尔瓦艾斯組成了一個新內閣, 随后担任了新內閣首脑, 西班牙的十年反动統治时期从此开始。——第42頁。
- 39 艾阿庫婁派(Ayacuchos)——1824年12月西班牙軍隊在秘魯的艾阿庫婁平原会战失敗以后, 人們給鎮压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起义者的战争的参加者埃斯帕特罗及其他西班牙將軍起的綽号。在埃斯帕特罗摄政

时期 (1841—1843)，他所领导的受到英国支持的軍人集团的成員也被称为艾阿庫裘派。——第 42 頁。

40 指英国和法国圍繞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二世及其妹瑪麗-路易莎-費南达公主的婚姻問題而进行的外交斗争。英国最初打算让伊薩伯拉嫁给同英国宫廷关系密切的科堡亲王列奥波特，让她的妹妹嫁给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幼子蒙潘西埃公爵；可是过了一些时候，英国又不得不放棄这个打算，而坚持让瑪麗-路易莎-費南达嫁给列奥波特亲王，让伊薩伯拉嫁给西班牙波旁家族的代表人物——唐·恩利科。由于憎恨后者同进步党有联系，伊薩伯拉女王的母亲瑪麗-克里斯蒂娜（馬克思称她为蒙尼奧斯夫人，因为她同奥古斯丁·費南多·蒙尼奧斯公爵有門戶悬殊的夫妇关系）同路易-菲力浦联合了起来，結果在 1846 年 10 月，不顾英国提出的外交要求，伊薩伯拉同唐·恩利科的哥哥唐·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訂了婚，瑪麗-路易莎-費南达同蒙潘西埃公爵訂了婚。——第 42 頁。

41 馬克思指的是 1820—1823 年西班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事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期望在 1822 年 7 月 7 日拿下革命的馬德里的企图失敗以后，秘密請求神圣同盟帮助他鎮压革命。按照神圣同盟的維罗那會議決定，由法国給斐迪南以援助。法国远征軍于 1823 年进入西班牙，在这个国家恢复了专制制度；法国軍隊在西班牙留駐到 1828 年。——第 44 頁。

42 *Moderados* (溫和派) 是西班牙的君主立宪党。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的利益。这个党派是由于自由党分裂而产生的；1820—1823 年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开始时自由党分裂为右翼和左翼，右翼是溫和派，左翼是激进派，主張最大限度地限制王权。

*Progresistas* (进步派) 是西班牙的資產階級自由党，形成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进步派依靠的是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軍官，他們的基本要求是有限的君主制。——第 44 頁。

43 指的是 1854 年 6—7 月馬德里所发生的事件。1854—1856 年西班牙第四次資產階級革命即从此开始。1854 年 7 月 17 日，死硬的保皇派和

- 保守派里奧斯-伊-羅薩斯進入里瓦斯公爵領導的新內閣，引起了一場新的大起義。結果，伊薩伯拉女王被迫於7月19日撤銷了因鎮壓起義而有“榴霰彈內閣”之稱的里瓦斯內閣。7月31日，埃斯帕特羅受命主持新內閣。——第44頁。
- 44 “日報”（《Gaceta》）是西班牙的報紙“馬德里日報”（《Gaceta de Madrid》）的簡稱。該報創刊於1661年，從1762年起為政府的正式的機關報。——第44頁。
- 45 大概是暗示這樣兩件事：一件是埃斯帕特羅曾因為同卡洛斯派鬥爭有功而獲得盧恰納伯爵的封號；另一件是他曾得到一個與他不相稱的“革命之劍”的綽號，這個綽號從1843年政變（見注38），即埃斯帕特羅的進步派內閣被所謂溫和派的反動內閣代替的時候起在人民中間流行。——第46頁。
- 46 “新聞報”（《La Presse》）是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國資產階級日報，在五十年代反對第二帝國的政體。——第46頁。
- 47 指埃斯帕特羅在1856年7月14日奧當奈爾舉行政變以後所採取的兩面派的叛賣立場。埃斯帕特羅在政變的第一天就發表宣言，呼喚人們停止鬥爭並支持奧當奈爾的政策，同時他又到馬德里的街頭號召起義者抵抗反動勢力。可是由於他既不站在政變派一邊，又不站在起義者一邊，結果無論在自己的擁護者當中還是在首都革命群眾當中都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和威望。——第48頁。
- 48 “馬德里報”（《Journal de Madrid》）是西班牙的報紙，1855—1856年在馬德里出版。——第48頁。
- 49 馬克思把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反動潮流稱為卡洛斯派。卡洛斯派依靠反動的貴族、教權派和巴斯克、納瓦臘、舊加斯梯里亞、阿臘貢、卡塔盧尼亞某些地區的落后農民的支持，在1833—1840年發動了長期浴血內戰。唐·卡洛斯在1833年以西班牙王位歸屬者自居而爭奪國王之女伊薩伯拉二世的王位，發動兵變反對伊薩伯拉二世之母、女攝政王瑪麗-克里斯蒂娜。女攝政王不得已而

寻求自由派的支持，对他们許以一系列的让步。卡洛斯派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的卡洛斯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斗争。这场战争于1840年也是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第49頁。

50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日报，1780—1869年在倫敦出版。——第49頁。

51 指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和1849年5月德勒斯頓的街垒战。——第50頁。

52 指1808—1814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民族解放斗争是同比利牛斯半島上的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同时展开的。反对外国掠夺者的战争提出必須在西班牙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作为迫切任务，因此动员了西班牙社会的一切阶层，并同西班牙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結合了起来。这场斗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他们用游击战頑强地反抗侵略者，同时还为取得土地而斗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軟弱而夺取了运动领导权的自由派貴族，仅限于在1812年通过了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即所謂加迪斯宪法，这个宪法是由議会在加迪斯市开会通过的，故以該市命名）。宪法对王权加以限制，宣布最高权力屬于国民，把立法权轉交給由普选（家庭佣工不能参加）产生的一院制議会。議会获得了国内外政策方面的广泛权利。宪法規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稅、普遍兵役制；各省都成立地方国民軍，改組整个司法系統。宪法在西班牙国内事务方面实行民主化，同时却保留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統治。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在打垮拿破侖第一的政治軍事計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拿破侖第一于1812年在俄国被击败以后，被迫从西班牙撤出自己的軍隊。馬克思把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叫做“具有民族性质和王朝性质”的运动，意思是指，这一斗争既为了反抗外国的占领，同时也为了打击国王查理四世的宫廷奸党。查理四世被迫于1808年3月让位于其子斐迪南七世。斐迪南七世的統治权得到了議会附有某些限制条件的承认。——第51頁。

53 指1820—1823年的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的口号是：召开議会，取消宗教裁判，承认在1814年斐迪南七世从法国回到西班牙

牙以后被廢除的1812年宪法。但是运动仅限于实行了一系列反教权的以及某些其他的改革。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群众的退出。资产阶级没有向他们保证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第51頁。

54 1808年5月2日在馬德里爆发了反对法国占领者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遭到駐西班牙法軍总司令繆拉特的殘酷镇压。有一千多名西班牙人被屠杀。——第52頁。

55 在十九世紀，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划为十七个軍区。每个軍区的长官叫做鎮守司令(因此而有鎮守司令区的名称)。鎮守司令作为国王的代表而在自己的軍区总攬全部軍政大权。——第52頁。

56 指1814年3月斐迪南七世从法国回到西班牙以后开始的殘酷的封建专制反动时期。反动时期的特点是，軍事密謀层出不穷，西班牙政府軟弱而不稳定。1814年至1819年期間西班牙更換了二十四個內閣。

1833年到1840年的王朝战争——見注49。——第52頁。

57 为个人本身利益而蓄謀推翻圣路易斯专政的奥当奈尔將軍和杜耳塞將軍，利用国内經濟困难、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宮廷奸党的統治所引起的普遍不滿，于1854年6月28日在馬德里卫戍部队中发动了兵变，并战胜了政府軍。但是奥当奈尔深知只靠純粹的宮廷革命是不可能得到西班牙城市居民支持的，不得已而于7月7日在曼薩那累斯发表了被称为“曼薩那累斯綱領”的宣言。这个綱領包括了人民的某些要求：消灭宮廷奸党，召集已被解散的議會，减低賦稅，成立国民軍等等。人民群众被吸引加入斗争，便造成了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在这次革命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党于1854年上台执政。——第52頁。

58 克罗地亚兵 主要是从克罗地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募集来的。克罗地亚兵是拉德茨基將軍率領的奥地利軍隊中的一部分队伍。拉德茨基的軍隊参与了对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镇压。

馬克思把朱阿夫兵叫做波拿巴的非洲軍隊。朱阿夫兵是由阿尔及利亚人和一部分欧洲人編成的法国殖民軍。朱阿夫兵在法国人于1830年发动的、断断续续历时四十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掠夺战争中以殘暴

聞名。

弗兰格尔將軍指揮下的軍隊曾于1848年11月参与柏林的反革命政变和驅散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行动。馬克思把他們叫做“波美拉尼亚軍隊”，看来是指1848年被任命为勃兰登堡軍区总司令的弗兰格尔出生于波美拉尼亚而言。——第53頁。

59 馬克思諷刺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在准备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用来在軍官和士兵当中招募拥护者的方法。路易·波拿巴在圣摩尔、薩托里等地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举行招待会和閱兵式的时候，大摆酒筵，用腊腸、冷盘禽肉、香檳酒等等款待軍官和士兵。送錢也是收买軍隊所使用的办法之一。——第53頁。

60 麦克格萊哥尔最著名的統計学著作有：“各国資源和統計”1835年倫敦版(《The Resources and Statistics of Nations》. London, 1835)和“歐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稅則、条例、資源和貿易”1841—1850年倫敦版(《Commerci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Resources, 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1841—1850)。——第56頁。

61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領導，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約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許多場合下同其他高等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訴訟程序是根据所謂“正义法”进行的。——第57頁。

62 指1847年7月—1848年1月法国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一运动是1848年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

宗得崩德是瑞士經濟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締結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資產階級改革，維護教会和耶穌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議會里取得优势的資產階級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联邦議會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決議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



他的州开始采取軍事行动的导火綫。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軍队被联邦政府的軍队击潰。

联合議會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財政困难,于1847年4月在柏林召集的普魯士各省等級議会的联合会議。联合議會是在1847年4月11日召开的。由于国王拒絕滿足議會資產階級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議會拒絕對借款作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議會,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緒,加速了德国的革命。

西班牙的婚姻——見注40。

馬克思把当时統治着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丹麦同德意志联邦之間的长期斗争叫做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糾紛。1848年革命前夕,在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居民中間发生了反对丹麦和这两个公国实行統一宪法的运动,宪法草案是1848年1月28日頒布的。这个运动就其目的來說,是分立运动,沒有超出温和自由派反对立場的范围,是为了在德意志北方再建立一个德意志邦——反动普魯士的卫星国。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情况起了变化。在德意志的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革命的、解放的性质。爭取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从丹麦分离出来的斗争成了德意志一切进步力量爭取德意志国家的民族統一的斗争的組成部分。——第60頁。

- 63 “立宪主义者报” (*«Le Constitutionnel»*) 是法国資產階級的日报; 1815—1870年在巴黎出版; 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 它在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圍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观点; 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61頁。
- 64 “国民議會报” (*«L'Assemblée nationale»*) 是法国正統君主派的日报, 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第62頁。
- 65 法国1830年的七月資產階級革命对德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推动了資產階級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德意志的許多邦(不倫瑞克、薩克森、庫尔黑森等)宣布了宪法。但是, 正像法国的新宪法(“一

八三〇年宪章”)是资产阶级上层——金融贵族同土地贵族的妥协一样，德意志邦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同君主制和贵族的妥协。——第 62 頁。

- 66 針綫街是倫敦的一條街，英格蘭銀行的所在地。——第 65 頁。
- 67 1856 年春天羅尼河和盧瓦爾河盆地水災期間，拿破侖第三為了追求聲望，曾到受災的省份，乘坐小船經過一些被淹的城市和鄉村，並且對災害的損失給以資助。當時拿破侖第三在給公共工程大臣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各種措施，在他看來，這些措施能夠阻止類似的自然災害再次發生。——第 66 頁。
- 68 馬克思諷刺地把歐洲國家為和平調解普魯士和瑞士在 1856 年秋發生的所謂紐沙特爾沖突問題的會議方案稱為第二次巴黎會議。在 1707—1806 年，紐沙特爾公國及其領地瓦蘭壬（德國叫法是諾恩堡和瓦連迪斯）是普魯士所屬的一個小邦。1806 年，拿破侖戰爭期間，紐沙特爾併入法國。1815 年，根據維也納會議的決定，它參加了瑞士聯邦，成為它的第二十一州，但同時保持對普魯士的藩屬關係。1848 年 2 月 29 日，紐沙特爾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結束了普魯士的統治，宣布成立共和國。但是根據英法俄 1852 年 5 月 24 日簽訂的協定，普魯士王對紐沙特爾的權利重新得到承認。1856 年 9 月，公國爆發了保皇黨人的起義，起義者為瑞士政府逮捕。普魯士王要求釋放被捕者。瑞士在答复這一點時要求普魯士王放棄對紐沙特爾的權利。歐洲國家關於紐沙特爾會議預定在 1857 年 3 月在巴黎召開（於 3 月 5 日召開）。這個建議是法國政府提出的，因為這一沖突有在法國邊境引起戰爭的危險。

那不勒斯問題是由皮蒙特的代表在 1856 年的巴黎會議上為使會議的參加者注意那不勒斯王國（雙西西里王國）實行的恐怖政策而提出來的。法國和英國在會上譴責那不勒斯王國政府對內政策的辦法，它們擔心，統治着王國的極端的反動會引起爆發革命運動。它們在 1856 年 5 月給那不勒斯政府的照會中要求改變它的政策，但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10 月，法國和英國從那不勒斯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並使自己的艦隊——法國在土倫的艦隊和英國在馬爾他群島的艦隊做好了戰鬥

准备。但是英国和拿破侖第三发生了意見分歧，拿破侖第三企图在那不勒斯王国复辟波拿巴王朝，所以那不勒斯的远征没有实行。——第 69 頁。

69 馬克思把 1856 年巴黎會議上和會議后圍繞着在土耳其最高当局統治下的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这两个多瑙河公国合并的問題展开的外交斗争叫做多瑙河問題。法国想以波拿巴王朝的代表人物来领导这两个公国，建議把它們合并成一个羅馬尼亞国家，由一个属于在欧洲居統治地位的王朝之一的外国亲王統治。支持法国的有俄国、普魯士和撒丁。土耳其由于害怕羅馬尼亞国家会力图推翻奧斯曼帝国的压迫，因而反对两个公国合并，支持土耳其的有奥地利和英国。會議仅仅认为必須弄清楚(通过在公国举行御前會議的选举)羅馬尼亞居民自己对合并問題的态度。选举举行了，但是由于作弊，反对合并的人被选入了莫尔达維亞的御前會議；这引起了法国、俄国、普魯士和撒丁的反对，它們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因为土耳其迟迟不作答复，这些国家就在 1857 年 8 月同它断絕了外交关系。这次冲突在拿破侖第三的調停下解决了，他說服英国政府不要阻撓法国的計劃，这些計劃对英国也是同样有利的。公国的选举被宣布无效，但是新的选举的举行并没有解决公国合并的問題。这个問題到 1859 年才由羅馬尼亞人自己解决了。

貝薩拉比亞問題——馬克思指的是 1856 年巴黎條約簽訂以后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是由于确定条約未明确划定的俄土在貝薩拉比亞(它的一部分从俄国划归土耳其)的边界以及确定多瑙河三角洲和河口的島嶼之一的所有权而造成的糾紛所引起的。奥地利借口由于重新划定在貝薩拉比亞的边界而发生的困难，拖延从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撤走自己的軍隊，这就阻撓了关于这两个公国的合并問題的解决。

关于那不勒斯問題和关于新的巴黎會議，見注 68。——第 71 頁。

70 指从 1810 年延續到 1826 年的西班牙在北美和墨西哥的殖民地爭取独立的战争。由于这次战争，西班牙失去了墨西哥和自己的北美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了独立的共和国。——第 72 頁。

71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于 1600 年創立，是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政策的工

具。在十九世紀中叶最后完成的对印度的占領，是英国資本家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的，这个公司一开始就拥有同印度和中国进行貿易的壟断权。公司还得到了它在印度侵占的領土的管理权、民政机关的人事任命权和收稅权。它的貿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議會定期續发的公司特許狀規定。在十九世紀，公司的貿易活动逐漸失去其意义。1813年的特許狀取消了它同印度貿易的壟断权；它只保留有茶叶貿易的壟断权和同中国貿易的壟断权。根据1833年的特許狀，公司失去了一切貿易特权，包括同中国貿易的壟断权在內。英国人在印度占有的領土的管理权，公司一直保持到1858年，当时公司已經被最后撤銷，管理印度的权力直接轉归王国。——第73頁。

72 1851年在中国爆发了一个强大的农民战争性质的反封建的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从南方的广西省开始，后来扩展到华中各省，几乎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1851年1月，起义者建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于是整个运动就叫做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軍杀死統治中国的滿族封建主，取消捐稅，消灭大封建主所有制。这次起义还具有农民运动特别是东方农民运动特有的宗教色彩，打击支持滿清王朝的佛教僧侶和寺院。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異族侵略者的广泛斗争开了一个头，但是它并没有消灭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在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了同統治階級妥协的封建上层，这是运动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革命遭到的主要打击是英美法三国的公开干涉（最初这几个强国打着“中立”的幌子援助滿清王朝），它們的武装力量协同中国封建主們的軍隊，于1864年把太平軍起义鎮压下去了。——第74頁。

73 馬克思諷刺地暗指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領袖馬志尼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为了唤起意大利人民举行起义来反对奥地利的和其他的压迫者以及爭取統一意大利而写的許多宣言。馬志尼的“世界主义新天主教思想”的宣言，正如馬克思所評述的，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自己的理論观点的模糊、矛盾和資產階級局限性，远离人民群众的馬志尼看不到在意大利所必須依靠的真正革命力量。由于他不了解意大利被压迫的农民就是这种力量，他在自己的宣言中把整个的人民当做抽象的范疇来号召，而没有考虑到組成人民的那些階級的实际要求和利

益。三十至五十年代在馬志尼领导下組織的一切密謀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都失败了。——第76頁。

- 74 指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这场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亚洲实行侵略性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阶段。英国和波斯之间的外交关系在1855年末破裂，表面上的原因是英国駐德黑兰公使与波斯的薩德拉薩姆(首相)由于一个波斯臣民——英国使节的秘书而发生了爭执。波斯統治者要想侵占赫拉特公国的企图成为挑起战争的口实。这个公国的主要城市，即作为通商要道的樞紐和重要战略据点的赫拉特，在十九世纪中叶曾經是波斯和阿富汗之間发生紛爭的原因，在这个問題上，前者有俄国扶助，后者有英国撑腰。波斯軍队在1856年10月攻占了赫拉特，英国殖民者利用这一点进行武装干涉，其目的是奴役阿富汗和波斯。他們在11月1日向波斯宣战以后，就把軍队开往赫拉特。但是1857—1859年在印度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使英国不得不赶紧与波斯締結和約。按照在巴黎簽訂的和約，波斯于1857年3月放棄了自己对赫拉特的一切要求。1863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的艾米尔的領地。

延迟了两个月才发表馬克思这篇文章的“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在文章中补充了有关战争的事实以及文章写成后所发生的事实。——第77頁。

- 75 指英国在波斯灣强占領土。——第78頁。
- 76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經濟、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年創辦于倫敦；大工业資產階級的机关刊物。——第80頁。
- 77 “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問題报”(《Journal des Chemins de Fer, des Mines et des Travaux Publics》)是法国資產階級報紙，1842年起在巴黎出版。——第82頁。
- 78 法国临时政府于1848年3月16日批准对各种直接稅每法郎追加45生丁，使主要納稅者——农民大为不滿。資產階級共和派实行这一政策的結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在1848年12月10日的總統选举中投票选举路易·波拿巴。

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布朗組織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軍事方式組織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撥性的计划沒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反而更加受到革命的感情的熏陶，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如减少工人人数，把他們派到外省去从事公共工程的工作等)。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鎮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第84頁。

79 馬克思大概是指与1856年1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著名共和派雕塑家大卫·丹热的葬礼有关的事件。当时人們都在傳抄据說是詩人貝朗热所写的一首革命歌曲的歌詞。参加葬礼的学生們在人群中看到了貝朗热，就高呼“自由万岁！”向他致意。法国青年反波拿巴情緒的这一公开表現，在葬礼结束后引起了一系列捕人事件，并且还成了政府在以后进行迫害的原因。——第85頁。

80 “比利时独立报” (*L'Indépendance belge*) 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魯塞尔創刊；它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88頁。

81 “紐約每日論壇报”在下面又附加了这样一段話：“还有一点，我們在这里，在美国可以完全相信，即当这座欺詐大厦轰隆一声倒塌的时候，它会把我們也埋葬在它的瓦礫之下。我們夸耀我們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筑在沙土上的。我們不过是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和附屬国。只要拿破侖下台，这一事件就不仅会从华尔街证券投机商人的柜子里、尤其会从美国劳动者工作的工厂和家庭里，使人深刻地感觉得到。”——第89頁。

82 康波福米奧和約是1797年10月17日法国和奥地利之間簽訂的。它結束了开始于1792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对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按照和約，由于法軍胜利而退出該同盟的奥地利，在亚得利亚海岸上获得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領土(連同威尼斯市在內)和屬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伊斯的利亚半島和达尔馬威亚的部分地区；伊奥尼亚

群島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的海岸上的領地划归法国。

重申了康波福米奧和約条件的 呂内維尔和約，是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的軍隊战敗以后，法国和奧地利于 1801 年 2 月 9 日簽訂的。——第 90 頁。

- 83 按照 1805 年 12 月 26 日法国和奧地利簽訂的 普勒斯堡 和約，奧地利承认法国对部分意大利領土(皮蒙特、热那亚、帕尔馬、皮阿琴察等等)的强占，并将其在亚得利亚海岸的領地——威尼斯、伊斯的利亚半島和达尔馬威亚让給意大利王国(也就是让給做了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侖第一)，奧地利只保留的里雅斯特。

按照法国和奧地利于 1809 年 10 月 14 日在維也納簽訂的、名为雪恩布龙和約的一項条約(签字地点在維也納的雪恩布龙要塞)，奧地利把的里雅斯特和克萊納、克倫地亚部分地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阜姆、伊斯的利亚半島及其所屬島嶼、还有奧地利在沙瓦河右岸到波斯尼亚边界的所有領地，让給法国。因此，亚得利亚海的达尔馬威亚沿岸所有地区都从奧地利轉入法国之手。——第 90 頁。

- 84 按照 1815 年英、法、俄、普、奧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滑铁卢之战前数日在維也納會議上簽訂的条約，倫巴第、威尼斯以及某些意大利的公国又再次划归奧地利。——第 90 頁。

- 85 馬克思把 1833 年在的里雅斯特成立的輪船公司称为 奧地利的劳埃德。劳埃德原是倫敦的一个咖啡館的老板，英国第一家海船保險公司就是在这家咖啡館里組織起来的(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后来，欧洲各国很多保險輪船公司也都用劳埃德的名号。——第 91 頁。

- 86 斯特拉本“地方志”第 3 卷。——第 99 頁。

- 87 烏斯考克人(塞爾維亞文是逃亡者的意思)是巴尔干半島的斯拉夫人，在十五世紀后半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納被土耳其人占領后逃到亚得利亚海的达尔馬威亚海岸。烏斯考克人組成了特殊的秘密武装团体——义勇队，于十五至十六世紀間同土耳其人进行了斗争，他們在当地居民支援下，在陆地和海上襲击土耳其人。烏斯考克人在亚得利亚海地区的活动也破坏了威尼斯的海外貿易。烏斯考克人的斗争是被征

- 服的人民对侵略者和本地地主进行的民族的、宗教的和阶级的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至今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人民的民歌里还保存着对烏斯考克人的英勇善战及其丰功伟绩的记忆。——第 100 頁。
- 88 馬克思指的是沙·弗·博丹-博普雷所写的“关于威尼斯灣东岸停泊場、港口和錨地的报告”(«Rapports sur les rades, ports et mouillages de la côte orientale du golfe de Venise»)。这篇报告发表于 1849 年巴黎出版的“水文年鉴”第 2 卷(«Annales hydrographiques» T. 2, Paris, 1849)。——第 101 頁。
- 89 紐沙特尔問題——見注 68。——第 104 頁。
- 90 指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于 1476 年 3 月 2 日在格蘭桑(瓦得州)、1476 年 7 月 22 日在穆爾頓(夫賴堡州)同瑞士人会战的多次失利,以及 1477 年 1 月 5 日在南錫城(法国东北)会战中的失利,大胆查理的軍队在該地被瑞士人、洛林人、亞爾薩斯人和德意志人的軍队击潰。——第 105 頁。
- 91 按照 1815 年的維也納条約,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所謂瑞典波美拉尼亚划归普魯士。——第 106 頁。
- 92 康斯坦茨宗教會議(1414—1418)是在德意志皇帝西吉茲蒙特积极推动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情况下巩固天主教会的已經动搖的地位。——第 108 頁。
- 93 胡斯派是 1419—1434 年期間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参加者。胡斯派运动的思想上的鼓舞者是捷克的偉大爱国者、学者和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領袖揚·胡斯(約 1369—1415),这个运动就是因他而得名。在这次战争期間,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为主力的胡斯派的軍队,击退了由神甫和德国皇帝組織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軍征討。只是由于捷克的貴族和市民阶级分子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敗。胡斯派的运动对十六世紀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 109 頁。
- 94 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捷克胡斯派的民族解放运



- 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見注 93)中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第 109 頁。
- 95 施馬尔卡尔登联盟 (以其締結联盟地点普魯士城市施馬尔卡尔登而得名)是若干新教諸侯和許多帝国城市的联盟。产生于 1531 年初,其目的是要保卫宗教改革事业,反抗以皇帝查理五世为首的天主教諸侯。1546—1548 年,皇帝和联盟之間进行了战争,结果是查理五世胜利,施馬尔卡尔登联盟瓦解。1555 年新教徒才战胜了查理五世。——第 109 頁。
- 96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度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后来,参战的欧洲各国形成了两个阵营。羅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德意志的天主教諸侯联合在天主教旗帜下反对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以及若干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德意志邦。新教各国受到法国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在第一阶段带有反抗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性质,但后来,特别是从 1635 年起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外国掠夺者对德意志的一系列入侵。战争于 1648 年以签订使德国在政治上分散性更加巩固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第 109 頁。
- 97 三十年战争期间,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于 1631 年同瑞典结成联盟,但是作战很勉强。由于害怕波美拉尼亚会被自己的姻亲、领导新教国家联盟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夺去,乔治-威廉不久就拒绝援助他。1635 年,他背弃了瑞典,而同德国皇帝締結了和约。——第 109 頁。
- 98 1701—1714 年,为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以法国、西班牙为一方,以英国、荷兰、奥地利、普魯士及以德意志皇帝为首的其他若干德意志邦为另一方,进行了战争。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开始时是西

班牙王位的各种追求者之间的王朝战争，后来实际上变成了瓜分西班牙领土的战争，变成了法国和英国为争夺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权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部分地被瓜分了：它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割给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直布罗陀和梅诺尔卡岛割给了英国等等。由于这场战争，法国的海上和殖民地势力被削弱了。法国在北美的领地也转到了英国的手里。英国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获利最大。——第 110 页。

- 99 普鲁士参加了北方战争，站在俄国一边，反对瑞典，1720 年同瑞典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普鲁士取得了瑞典波美拉尼亚的一部、波莫瑞湾中的乌泽多姆岛和沃林岛。

波兰(波兰贵族共和国)曾于 1772、1793、1795 年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俄国分得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得了波兰本土和乌克兰西部。

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这个会议确定了战胜拿破仑的各国对欧洲的瓜分)，普鲁士取得了北萨克森、波兹南、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俄国取得了波兰王国，包括一部分以前算作普鲁士领地的波兰土地。——第 110 页。

- 100 英国人是在 1856 年 10 月挑起了同广州的中国当局的冲突。英国领事巴夏礼制造冲突的借口是：中国地方当局逮捕了中国走私船“亚罗号”的船员，而这艘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这次冲突发生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约翰·包令野蛮地下令炮轰广州，而事先并未警告。这就揭开了 1856—1858 年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序幕。——第 112 页。

- 101 指 1843 年 10 月 8 日签订的英中条约。这个条约是 1842 年 8 月 29 日英中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的补充。不平等的掠夺性的南京条约是英国殖民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结束后强加于中国的。这次战争使落后的封建的中国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国家。条约规定开放厦门、宁波、广州、福州和上海等五个中国港口同英国通商。在这些港口，外国商人有无限的贸易权利、居住自由等等。条约还规定中国要付出巨额赔款，把香港永久割让给英国，并实行对英国人有利的新关税。按照

1843年的善后补充条約，英国人又設法使中国做出了新的让步：在开放的通商港口設置特殊的侨民居住区(租界)的权利；治外法权，即外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庭审判；中国承认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即其他强国从中国方面获得的特权也自然为英国所享有。

这里指的是善后补充条約的第九款。按照这一条款的規定，同英国人有联系的中国人不受中国当局的审判(見本卷第149頁)。——第112頁。

- 102 第一次鴉片战争(1839—1842)以后，英国人同中国政府的主要爭执問題是英国商人要求給他們以在广州城內貿易和居住的权利，因为南京条約第二款沒有明文規定把这种权利給予外国人。英国人的这种强求同下面这一情况也有联系，即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还无法在北京設置外交代表，以致一切对华外交事务都只有通过广州这一个城市来办理。由于中国居民反对让外国人进入广州城，这个問題曾几次被提出。1846年4月，英国同中国当局达成了協議，广州被宣布为对外国人开放的城市。但是由于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議运动，此事未做最后决定。1847年，英国人使用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当局答应两年以后开放广州。但是当1849年香港总督文翰要求实现这一条件时，却由于害怕人民起义，被迫放棄了自己的要求。——第115頁。
- 103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一个美国过去的奴隶主威廉·沃克进行了一系列冒險远征活动，企图征服中美洲各国。1855年，在尼加拉瓜共和国发生內乱的时期，沃克在混战一方支持下占領了共和国的主要城市——格拉納达，不久即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在那里进行独裁統治，并企图恢复奴隶占有制。沃克在对洪都拉斯进行冒險远征时被俘，于1860年被枪决。沃克是夺取尼加拉瓜政权的美国大財閥万德比尔特和摩尔根的工具。他們打算通过这个国家的領土开凿一条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联結起来的运河。——第116頁。
- 104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倫敦出版。——第117頁。

- 105 第一次对华鴉片战争(1839—1842)的借口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对英国鴉片走私貿易采取了严禁措施。林則徐要求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把鴉片存貨交出,并下令将这批鴉片投入海中。英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开始了軍事行动。——第 117 頁。
- 106 馬克思指的是 1857 年初,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最富饒的中原地区被太平軍占領这一情况(見注 72)。——第 117 頁。
- 107 这里讲的是所謂紐沙特尔冲突(見注 68)。——第 118 頁。
- 108 1386 年 6 月 9 日,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軍隊交于 森帕赫(琉森州)。結果瑞士軍隊战胜。  
1315 年 11 月 15 日,瑞士民軍同列奥波特·哈布斯堡的軍隊会战于 莫尔加頓,瑞士人战胜。  
穆尔頓 和 格兰桑——見注 90。——第 118 頁。
- 109 1798 年法国执政內閣的軍隊占領了瑞士,在此宣布成立完全依附于法国的海爾維第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根据 1798 年 4 月 12 日通过的宪法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加剧了已經发展資产階級关系的进步各州同社会經濟关系落后的所謂旧森林州的斗争。恩格斯所說旧森林州的三次起义,是指这些州在 1798 年 4 月、5 月和 8 月反抗法軍的行动。由于在所有这些次行动中都被瑞士人击败,各旧州被迫投降并加入了海爾維第共和国。  
在以呂內維爾和約(見注 82)告終的法国对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战争(1798—1801)期間,瑞士成为主要戰場之一。——第 122 頁。
- 110 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法国殖民者为了征服阿尔及利亚而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法軍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民长期的頑强的反抗。法国人以极其殘酷的手段进行战争。到 1847 年,阿尔及利亚基本上被占領了,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爭取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第 124 頁。
- 111 提罗耳起义——提罗耳(奥地利西部)农民对法国軍隊进行的游击战争,爆发于 1809 年 4 月。由于沒有得到奥地利軍隊的充分支持,起义

于1810年被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鎮压下去。

西班牙游击战——見注52。

巴斯克的卡洛斯派暴动——見注49。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北高加索山区人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是由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和当地封建主在沙皇政府支持下实行的压迫所引起的。山区人进行的基本上屬於解放斗争性质的运动，同时也具有某些反动的性质。运动的首領一般都是穆里德派信徒。这是伊斯兰教的反动教派中最狂信和好战的一派。依靠伊斯兰教僧侶和利用山区人的不滿，穆里德派信徒糾集了相当可观的反对沙皇军队的力量。三十年代中，他們在达格斯坦和彻岑建成了一个以沙米尔为首的宗教性的軍事国家組織。土耳其和英国就企图利用沙米尔所领导的运动来达到它們的侵略目的——使高加索脫离俄国。同盘踞在山区城堡中的沙米尔斗争非常困难，这个斗争延續了几十年。在克里木战争結束的时候，俄国军队才陸續击败沙米尔的力量，于1859年8月拿下他們的最后退守地——古尼布堡垒。促使沙米尔失败的，是在穆里德派中形成了新的封建貴族，开始脫离沙米尔的农民受到了他們的压迫。——第125頁。

112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的手稿加的。——第127頁。

113 錫克教派是十六世紀旁遮普地区产生的宗教派別。錫克教徒关于人类平等的教义(旨在調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成了从十七世紀末叶展开的农民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掠夺者的斗争的思想体系。后来，錫克教徒中分化出封建的上层，它的代表領導着这个在十九世紀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一系列邻近地区的錫克教徒国家。——第127頁。

114 古利斯坦条約是1813年10月24日(俄历12日)签訂的。这个条約結束了1804—1813年俄国和波斯的战争。条約正式規定把下列各地区划入俄罗斯帝国：达格斯坦、格魯吉亚連同舒拉格尔省、依麦列梯亚、古里亚、明格列里亚和阿布哈茲，此外还有卡拉巴赫、干扎、舍金、希尔万、杰尔宾特、庫宾、巴庫等諸汗国以及塔雷什汗国的北部。俄国享有在里海保持舰队的特殊权利；条約还規定双方商人可以进行自由貿

易。——第 128 頁。

- 115 土庫曼彻条約是 1828 年 2 月 22 日(俄历 10 日)在土庫曼彻村簽訂的。这个条約結束了波斯的沙赫为夺取外高加索的俄国土地而引起的 1826—1828 年的俄波战争。条約規定了俄国和波斯的新的国境綫,基本上是以阿腊克斯河为界。埃里温汗国(跨阿腊克斯河两岸)和納希切万汗国的領土划归俄国。規定俄国商船可以自由航行于里海和俄国有在里海拥有舰队的特殊权利。俄国取得了領事裁判权以及同波斯貿易往来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条件。——第 128 頁。
- 116 在波斯王位的继承人阿巴斯-米尔扎于 1833 年 10 月死去以后,他的儿子、已被任命为阿捷尔拜疆統治者的穆罕默德-米尔扎被宣布为他的继承者。在穆罕默德的年迈的祖父費特赫-阿里-沙赫于 1834 年 10 月死去以后,有好几个人出来爭夺王位。英国公使坎伯尔想使新的沙赫依靠英国,于是供給穆罕默德从塔夫利茲向德黑兰进军所需的軍費,帮助他登上王位。穆罕默德-沙赫的軍隊是由英国軍官林賽指揮的。——第 128 頁。
- 117 指 1838—1842 年英国人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39 年 8 月喀布尔被占領,但是由于該地在 1841 年 11 月爆发了起义,英国人被迫于 1842 年 1 月开始向印度撤退,后来变为仓惶潰退。4 500 名英国兵和 12 000 名随軍服务人員中只有一人逃到了印度边界。——第 132 頁。
- 118 关于赫拉特,見注 74。——第 133 頁。
- 119 指 1839 年 11 月奧連堡軍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將軍率領远征队进攻希瓦汗国一事。这支由五千人組成的、帶有若干大炮和粮秣車队的远征队对于冬天穿越荒原的困难是没有准备的;人員由于大批患病而折損达半数,彼罗夫斯基未到希瓦即被迫返回奧連堡。——第 136 頁。
- 120 英軍和法軍于 1854 年 11 月 5 日(俄历 10 月 24 日)在因克尔芒附近击败俄軍。俄軍的失利,原因在于指揮上的一系列錯誤:零散地使用兵

力，哥尔查科夫將軍所部在战事正酣之际停止作战，总司令緬施科夫公爵領導不堅強。

西帕依——十八世紀中叶以后法国、英国、葡萄牙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間招募的雇佣兵。英印軍中的西帕依被英国人用来征服印度和維持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的政权。——第 138 頁。

- 121 在馬克思的 1857 年的筆記本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路易斯的預算”。这篇文章的草稿有两部分，馬克思把其中一部分标作“乔·路易斯爵士的預算”，另一部分标作“直接稅和間接稅”。——第 140 頁。
- 122 “爱丁堡評論”（《*The Edinburgh Review*》）是英国自由派的政治刊物，发行于 1802 年至 1929 年，在五十年代每三个月出版一次，該刊物有自由主义傾向。——第 140 頁。
- 123 自由貿易派主張自由貿易和国家不干涉国内的經濟生活。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形成了所謂曼彻斯特学派，即反映工业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思想中的一派。領導自由貿易派运动的是 1838 年組織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紡織厂主科布頓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141 頁。
- 124 指克里木战争結束以后于 1856 年 3 月簽訂和約。——第 142 頁。
- 125 联合內閣即阿伯丁內閣（1852—1855），参加該內閣的有輝格党人、皮尔派和急进派的代表，因此有人諷刺它，把它叫做“群賢內閣”。——第 143 頁。
- 126 皮尔派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联合在罗·皮尔周圍的一些温和的托利党人，他們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大金融家的政治統治的前提下在經濟方面向工商业資產階級让步的政策。1846 年，皮尔为了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廢除了谷物法，結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關稅派的强烈不滿并导致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850 年皮尔死后，皮尔派便成为一个沒有明确綱領的政治集团。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內閣（1852—1855）。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

由党。

1852年2月，皮尔派支持帕麦斯顿修改政府的民軍法案，从而促使罗素勋爵政府的垮台。同年12月，他們反对得比的預算，迫使得比政府辞职。1855年2月，当激进派罗巴克恢复成立塞瓦斯托波尔陆軍生活状况調查委员会，迫使阿伯丁倒閣以后，皮尔派便襄助帕麦斯顿上台执政，并表示同意加入他的內閣。但是不久以后，皮尔派的領袖們——格莱斯顿、悉尼·赫伯特和詹姆斯·格莱安（他們已經是內閣的閣員），对于帕麦斯顿未能阻撓罗巴克的委员会的成立感到不滿，便提出辞呈，这时帕麦斯顿就立即撤換了他們，并任用了輝格党的代表。——第145頁。

- 127 习艺所 是英国于十八世紀开办的；根据1834年通过的新的“济貧法”，习艺所就变成了济貧的唯一形式；习艺所具有苦役監獄式的特点，人民給它起了一个綽号叫做“穷人的巴士底獄”。——第147頁。
- 128 馬克思把英国人于1856年10月对广州的轰击称为广州屠杀（見注100）。——第149頁。
- 129 “中华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是1842—1859年在維多利亞（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的簡称。——第150頁。
- 130 “最大多数人們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們的最大幸福”，是英国資产階級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論家边沁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所闡述的主要原理。功利主义（主張“利益”或“效益”是唯一道德基础的学說）的純粹資产階級的个人主义倫理学，力图证明在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資本主义階級社会中，有可能达到普遍的“幸福”与“和諧”。——第150頁。
- 131 和平协会 是教友会派于1816年在倫敦建立的資产階級和平主义組織。协会得到自由貿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貿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貿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工业上的优势进而达到經濟上政治上的統治。——第150頁。



132 指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开始了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議會斗争。——第 153 頁。

133 馬克思是指英軍于 1855 年 6 月 18 日（俄历 6 日）和 9 月 8 日（俄历 8 月 27 日）两次突襲塞瓦斯托波尔工事的第三号棱堡（即所謂大凸角堡）未成而言。馬克思暗指下面这一事实：在突襲凸角堡的时候，英国軍队对自己的最高指揮失去了信心，害怕俄軍的霰彈火力，所以有很多次不是在进攻中不肯前进，就是临陣逃脫。

1855 年 11 月，曾参与固守土耳其卡尔斯要塞并負責领导其防务的英軍，在經過长久圍困以后，把它拱手交給了穆拉維約夫將軍指揮下的俄軍。——第 155 頁。

134 馬克思指的是 1855 年底英国和美国因在中美洲互相竞争而发生的冲突。冲突的起因之一，是英国企图在对克里木战争保守中立的美国招募志願兵补充自己的軍队。两国的关系还在更早的时候就由于对克雷頓-布尔韦尔条約的解釋发生分歧而紧张起来了。克雷頓-布尔韦尔条約是英美两国在 1850 年为了确定对原拟在尼加拉瓜境内开凿的連結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的管理办法而簽訂的。1855 年，美国政府为了对付英国想在中美洲莫斯科托海岸扎根立足的企图，而对同年 5 月拿下尼加拉瓜并自封为该共和国总统的美国冒險家威廉·沃克給以支持。英国方面提出了强硬抗議，美国以威胁断絕外交关系作为回答。然而这个冲突在 1856 年 10 月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了：即美国政府对沃克的冒險活动給以事后的譴責，而英国政府由于考虑到英国資产阶级同美国的密切經濟联系，放棄对莫斯科托海岸的領土要求。

远征那不勒斯——見注 68。

和波拿巴的表面爭吵——馬克思說的是 1856 年巴黎會議以后英国和法国在一系列国际問題上的分歧。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法国同俄国有所接近。但是英法的分歧性质并不严重，也不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因为英国政府正忙于鎮压 1857 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对波斯的侵犯——見注 74。

在中国的大屠杀——馬克思說的是 1856 年 10 月英軍炮轰广州的

- 暴行(見注 100)。——第 155 頁。
- 135 老貝利是倫敦新門監獄的守護樓的名稱。中央刑事法庭設于此處。——第 155、481 頁。
- 136 邦迪埃拉兄弟是意大利人，是奧地利軍隊中的軍官和爭取意大利擺脫奧地利壓迫的鬥士。他們在 1844 年 6 月前往卡拉利里亞發動反對那不勒斯波旁家族和奧地利統治的起義，但是由於被人出賣而被處死。詹姆斯·格萊安此時正任英國內務大臣，他有命令給英國郵政主管機關，把意大利流亡革命者的信件交由警察機關拆閱，以便將其內容轉告奧地利政府。英國廣大民主階層對此行為深感憤怒，認為邦迪埃拉兄弟就是因此犧牲的，因為這兩個人是“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員，同流亡在英國的馬志尼保持着聯繫。——第 157 頁。
- 137 在馬克思 1857 年的筆記本里，本文的標題是“帕麥斯頓和普選”。——第 161 頁。
- 138 “尸首販子”是對在英國偷掘死尸售與解剖所的人的稱呼。在這種做法特別流行的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愛丁堡市人威廉·伯克一案是非常出名的。伯克為了出售死尸，想出了一個辦法把人憋死而不露任何犯罪的痕跡。——第 161 頁。
- 139 唐寧街是倫敦中心的一條街，英國首相和其他某些內閣大臣的官邸所在地；英國政府的同義語。——第 162 頁。
- 140 “笨拙”(《Punch》)是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聲”(《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簡稱，1841 年起在倫敦出版。
- 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紀以招搖撞騙出名的卡利奧斯特羅伯爵(朱澤培·巴爾扎莫)臆造出來的一個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奧斯特羅說這個埃及祭司是一個什麼共濟會“埃及分會”的首領，而他則是該行會的創建者和活動家。他對人說，當他在埃及旅行的時候，發現了埃及人智慧的秘密，並且他在自己的行動中以他身上所體現的全能全知的大科夫塔的精神作為準繩。——第 163 頁。

- 141 藍皮書 (Blue Books) 是英國議會和外交部發表的資料和文件的總稱。藍皮書因藍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國從十七世紀開始發表藍皮書，它是英國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這裡所說的藍皮書，標題為“關於在中國發生的侮辱事件的函件。1857年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下院”，1857年倫敦版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Insults in China. Presen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7▶. [London] 1857)。——第163頁。
- 142 1851年11月4日，路易·波拿巴以一項咨文提交國民議會，咨文中提出了在國內恢復普選權的蠱惑性要求。在國民議會否決了波拿巴內閣為此而提出的法律草案以後，路易·波拿巴於1851年12月2日實行了政變。——第165頁。
- 143 1817年，利物浦領導的托利政府(卡斯爾里任外交大臣，西德默思任內務大臣，帕麥斯頓任掌管軍事財政的軍務大臣(不在內閣大臣之列))為了制止爭取選舉改革和反對谷物法的群眾性民主運動，停止實行人身保護法，並慌忙地實行了所謂“禁口法”(Gagging act)。按照此項法律，集會權受到限制，激進派的俱樂部被封閉，市政府官員有權禁止激進主義的小冊子出版和流傳。

人身保護法 (*Habeas Corpus Act*) 是1679年由英國議會通過的。按照此項法律，每一逮捕令必須有理由，被捕者應該在短期(三天至二十天)內由法庭審訊，否則應該予以釋放。人身保護法不適用於叛國罪的案件，而且根據議會的決定可以暫時停止生效。

曼徹斯特大屠殺——馬克思說的是1819年8月16日英國軍隊對手無寸鐵的群眾大會參加者實行的血腥鎮壓。這次爭取選舉改革和反對谷物法的群眾大會是在曼徹斯特附近聖彼得廣場舉行的。當時的人們仿照滑鐵盧會戰的叫法，把這一事件叫做彼得盧大慘案。

英國在1815年實行的谷物法對谷物規定了高額的進口稅，而且在國內谷物價格低於每夸特80先令的情況下禁止谷物入口。谷物法非常嚴重地影響了貧民階層的生活，同時對於工業資產階級也是不利的，因為它使勞動力漲價，縮小國內市場的容量，妨礙國內貿易的發展。谷物法經過大地主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長期鬥爭而於1846年廢除。——

第 165 頁。

- 144 指太平軍起义(見注 72)。——第 167 頁。
- 145 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在准备和实行 1851 年政变时期所采用的蠱惑手段(參看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六、七兩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91—227 頁)。——第 169 頁。
- 146 指英国議会于 1832 年 6 月实行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断,并为工业資產階級的代表进入議会打开通路。爭取改革的斗争的主要力量无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被自由資產階級所欺騙,沒有获得选举权。——第 169 頁。
- 147 正統派 是法国于 1792 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老年派的拥护者。在 1830 年,該王朝第二次顛复以后,正統派就結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 是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保皇党,拥护在 1830 年七月革命到 1848 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的少壯派,奥尔良公爵。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他們与正統派联合起来,組成所謂秩序党。——第 170 頁。
- 148 馬克思摘引的是倫敦“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上的一篇文章。——第 171 頁。
- 149 暗指关于安泰的神話。——第 171 頁。
- 150 指罗素参加了根据奥地利的倡議于 1854 年 12 月在維也納召开的、有俄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土耳其代表参加的會議。1855 年 3 月,會議变成了国际性的代表會議,它一直开到 1855 年 6 月。維也納代表會議的目的,就是制定一項准备据以开始克里木战争参战国之間的和平談判的协定。罗素曾打算促使奥地利賦予他那关于限制俄国黑海海軍的提議以最后通牒的形式,但未得倫敦內閣的贊同。俄国拒絕了西方各国的這項要求,因此談判遭到失敗。結果罗素只好退职,帕麦斯頓从而实现了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他的对手的威信。——第 172 頁。

151 宣誓法 (Test Act) 公布于 1673 年, 它要求一切公职人員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它于 1828 年廢除。

市镇机关法 (Corporation Act) 是于 1661 年通过的, 它要求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它于 1828 年廢除。

議會改革法案——見注 146。

苏格兰市政法 (1833 年) 和 英格兰市政改革法 (1835 年) 給各大城市(除倫敦以外)規定了城市自治的統一系統。市政机关在苏格兰是由年收入不少于十英鎊的房主选举的, 在英格兰是由全体納稅人选举的。由于这些法律, 輝格党的資產階級在許多大城市中获得了政权。

教会什一稅 是爱尔兰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从十六世紀起被迫向英国国教会繳納的稅, 它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 由 1838 年的法律予以廢除。但是这种“廢除”只涉及到它的征收形式: 取消实物租以后, 教会靠增加爱尔兰农民的租金, 繼續以特殊的貨幣租的形式得到收入。

非国教徒 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英国各宗教教派的教徒。允許非国教徒在他們自己的教会里举行結婚仪式的非国教徒法案, 是由罗素于 1834 年提交下院的。——第 172 頁。

152 印花稅 (stamp duty) 和 广告稅 (advertisement duty) 是英国于 1712 年施行的对报刊征收的两种捐稅, 其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并与反对派的刊物进行斗争。印花稅和广告稅使报刊价格极为昂貴, 限制报刊的銷路, 使它們不能与广大群众見面。这些捐稅逐漸增加, 以致成为新兴的工业資產階級的主要障碍, 議会在他們的压力下只好在 1836 年降低印花稅, 而在 1855 年予以廢除。广告稅是在 1853 年廢除的。对于少数高价刊物說来, 廢除这些捐稅是不利的, 因为这些捐稅的廢除引起大量廉价刊物的出現, 这就造成了与旧报刊的竞争并且减少了它們的收入。——第 173 頁。

153 反谷物法同盟 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頓和布萊特于 1838 年創立的。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 廢除谷物法(見注 143), 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資, 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經企图利用工人群众,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

- 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見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工业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在谷物法問題上的斗争，由于 1846 年关于廢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結束。——第 173 頁。
- 154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附加了这样一段話：“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和貿易的联系，最好是我們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們。”——第 178 頁。
- 155 “佩斯勞埃德氏報”（《Pester Lloyd》）是匈牙利的自由派的報紙，匈牙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報；1853 年至 1944 年在布达佩斯用德文每天出版两次。——第 179 頁。
- 156 “晨郵報”（《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 年至 1937 年在倫敦出版，在十九世紀中叶是糾集在帕麦斯頓周圍的輝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報。——第 181 頁。
- 157 馬克思在闡述曼彻斯特选举結果这个問題时，利用了恩格斯在 1857 年 3 月 11 日、20 日、特别是 31 日的信件。——第 181 頁。
- 158 1857 年 3 月 18 日科布頓在曼彻斯特的选民大会上坚持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尖銳地批評了帕麦斯頓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他对中国和波斯的侵略政策。同时，科布頓对鮑勃·娄以及其他受到政府支持的議会候选人作了否定的評價。——第 182 頁。
- 159 馬克思暗指伊索寓言“烏鴉和狐狸”。——第 182 頁。
- 160 約翰·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風流娘儿們”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是吹牛、貪吃、酗酒、淫蕩的典型。——第 183 頁。
- 161 廉价报刊的議会教父們是馬克思对那些在議会内外积极参加爭取取消印花稅和广告稅（見注 152）的宣傳的曼彻斯特資產階級激进派（包括布萊特）的称呼。——第 184 頁。
- 162 “曼彻斯特卫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資產階級報紙，自由貿易論者的机关報，后来是自由党的机关報，1821 年在曼彻斯特創辦。——第 184 頁。

- 163 布莱特作为英国自由貿易論者的領袖，反对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自由貿易論者和資產階級和平主义者一样，认为英国不必采用战争手段，只要通过自由貿易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取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霸权。——第 184 頁。
- 164 长期議会的余党 是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形成的独立党的拥护者，新教教會的信徒。1648 年底长老会信徒被赶出下院以后，他們仍留在下院中，但是已經沒有任何实权了。1653 年 4 月 20 日，克倫威尔驅散了长期議会的余党。——第 184 頁。
- 165 真正英国大臣 是罗素勋爵在 1850 年 6 月 25 日下院會議上对帕麦斯顿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會議上在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話：«civis romanus sum»（“我是羅馬公民”），受到了英国資產階級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顿认为派英国海軍去希腊保护一个原籍葡萄牙的英国臣民——商人唐·帕西菲科（他的住宅在雅典被焚毀）是正当的。帕麦斯顿宣称，正如羅馬公民的公式«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古羅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全无恙。——第 185 頁。
- 166 恩格斯指的是 1839—1842 年的第一次对华鴉片战争（見注 101）。英国軍艦于 1839 年 9 月就来到广州，但是在 1840 年 6 月英国舰队开到中国之前，軍事行动只是一些个别的小規模接触。——第 186 頁。
- 167 指 1842 年的南京条約（見注 101）。——第 190 頁。
- 168 这里讲的是中国的太平軍起义（見注 72）。1851 年太平軍建立的“太平天国”的元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領袖洪秀全，他被太平軍立为“天王”。1853 年 3 月，太平軍攻克南京，即以南京作为天国首都。——第 191 頁。
- 169 “新聞报”（«*The Press*»）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机关报，1853 年至 1866 年在倫敦出版。——第 192 頁。
- 170 “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周报，1808 年至 1881 年在倫敦出版。——第 192 頁。

- 171 群賢內閣——見注 125。——第 193 頁。
- 172 指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1854 年 4 月，英法航空中队轰炸了敖德薩，但是这种軍事行动更多地带有示威性质，城市很少受到損害。当时执政的皮尔派受到議會反对派和英国报纸的严厉批評，被指責在作战时优柔寡断。——第 195 頁。
- 173 “太阳报”(《*The Sun*》) 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日报，从 1798 年至 1876 年在倫敦出版。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 年在倫敦創刊，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資產階級的机关报。——第 195 頁。
- 174 关于罗素在維也納的外交使命——見注 150。——第 195 頁。
- 175 “工厂視察員向女王陛下內务大臣所做的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报告” 1857 年倫敦版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第 197 頁。
- 176 正义法院——見注 61。——第 197 頁。
- 177 1856 年 10 月英国人炮轰广州 (見注 100)，英国海軍一共只損失三人。——第 198 頁。
- 178 馬克思引证的是 1852 年 11 月奈斯密斯工程师写給工厂視察員萊·霍納的信，这封信曾发表在：《*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第 205 頁。
- 179 禁止在棉紡織厂、毛紡織厂、亚麻紡織厂和絲織厂雇用 9 岁以下童工的法律，由議會于 1833 年通过。——第 208 頁。
- 180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 1857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209 頁。



- 181 “无俸法官”(«*Great Unpaid*»)是英国对担任調解法官之职,官銜虽高但不領一文薪俸的人的諛称。——第 213 頁。
- 182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 1857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218 頁。
- 183 在馬克思 1857 年的筆記本里,本文的标题是“中国—波斯(之战)”。——第 228 頁。
- 184 这里讲的是 1856—1857 年英国对波斯的战争(見注 74)和 1856—1858 年的第二次对华鴉片战争。这次鴉片战争的导火綫是英国代表同广州中国当局发生冲突(見注 100)。在中国的战争断断续續地进行到 1858 年 6 月,以掠夺性的天津条約告終。——第 228 頁。
- 185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 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由欧洲教官进行过部分改編的、武器精良的土耳其軍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錫利斯特里亚、苏姆拉、瓦尔那等地附近)的未受充分訓練的俄国軍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但是,1829 年 6 月 11 日(俄历 5 月 30 日)的胜利进攻把土耳其軍队打得落花流水。土耳其同意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簽訂了阿德里安堡和約。——第 228 頁。
- 186 路·爱·諾兰“騎兵之历史与战术”(L. E. Nolan. «*Cavalry; its History and Tactics*»)。該书在 1851 年出第一版。——第 229 頁。
- 187 1806—1812 年俄土战争 的导火綫是法国利用土耳其違反过去俄土条約的某些条款而挑起的俄土冲突。在几年之中交战双方各有胜敗。1811 年米·伊·庫图佐夫被任命为多瑙河軍团总司令。在此以后,战局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俄土两国簽訂了布加勒斯特和約。——第 229 頁。
- 188 阿尔納烏特人 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 230 頁。
- 189 1853 年 11 月 4 日(俄历 10 月 23 日),俄軍由于丹年別尔格將軍指揮无方,在沃耳特尼察(多瑙河左岸的一个村庄)为土耳其人战敗。  
1854 年 1 月 6 日(俄历 1853 年 12 月 25 日)在切塔特村的一場

血战中，俄軍把土軍趕至卡拉法特，而自己也蒙受了很大損失。

在長久圍困土耳其要塞卡爾斯的時期(1855年6—11月)，俄軍於9月29日(俄曆17日)對要塞進行了突襲。這次突襲由於圍攻者力量不足以及被圍者事先得知準備突襲的消息，結果沒有成功。要塞的守軍到11月24日(俄曆12日)才向俄軍投降。

1855年11月6日(俄曆10月25日)，俄軍在印古耳河一戰中遇到了優勢的土耳其軍隊，遭受了巨大損失，撤出了明格列里亞。——第230頁。

190 土耳其稱蘇丹治下原信基督教後改信伊斯蘭教的臣民為“背教者”。——第230頁。

191 指太平軍起義(見注72)。——第233頁。

192 *Polacos* (波拉科斯派) 是從1850年至1854年在西班牙當政的一個政治集團。波拉科斯派所借以維系的，與其說是政治信仰，倒不如說是親屬關係。波拉科斯派這個名稱也用於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以前同政府首腦薩爾托里烏斯在一起的那一班人。——第235頁。

193 指法國立法團1857年5月28日通過的法令。——第241頁。

194 *Bureaux* (委員會) 是為了對問題進行初步討論而由法國立法團的主席從立法團代表中組成的。通常有幾個委員會，其成員定期地更換。——第243頁。

195 指1856—1857年的英國—波斯戰爭(見注74)。——第249頁。

196 本文標題是根據馬克思1857年的筆記本加的。——第251頁。

197 1843年英國殖民者佔領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英國阿富汗戰爭(1838—1842)時期(見注117)，東印度公司用威脅和暴力的手段使信德的封建統治者同意英國軍隊通過他們的領地。英國人利用這個機會，於1843年要求當地封建主自認是東印度公司的藩屬，並在摧殘了起義的俾路支各部族(信德的土著居民)後宣布整個信德地區併入英屬印度。

旁遮普（印度西北部）是經過英國人同錫克教徒的戰爭（1845—1846年、1848—1849年）而被征服的。1845年，英國殖民者利用錫克貴族叛變分子挑起了同錫克教徒的衝突，於1846年使錫克國變成了自己的藩屬。1848年錫克教徒舉行起義，可是於1849年被完全征服。旁遮普被占領後，整個印度就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第251頁。

- 198 1856年，英國駐印當局不顧簽訂過的條約，宣布廢黜奧德（印度北部的一個公國）的土著執政者，而將其領土併入東印度公司直接管轄地區之內（見本卷第502—507頁）。——第251頁。
- 199 這裡讲的是1857—1859年的起義，即印度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反對英國統治而舉行的一次最大的起義。在起義以前已經發生過一連串武裝反抗英國殖民者的事件，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所有各階層居民普遍痛恨殘酷的殖民剝削方法：賦稅高到難以置信的程度，以致印度農民被掠奪一空，某些封建領主階層被剝奪了領地；對尚保持獨立的印度地區實行吞併政策；在收稅時使用刑罰，殖民當局採取恐怖手段；殖民者粗暴地破壞自古以來的傳統和風俗。起義是1857年春季在隸屬孟加拉軍、駐紮在印度北部的所謂西帕依部隊（見注120）中爆發的（從1856年年中起就已開始準備）。孟加拉軍的西帕依部隊掌握着這一地區的最重要的戰略據點，掌握着大部分的大炮，於是成了起義的軍事核心。主要是從印度教徒高級種姓（婆羅門、拉吉普特人等等）和伊斯蘭教徒中募集來的西帕依軍隊，總的說來反映着西帕依士兵的父老兄弟——印度農民的不滿，同時也反映着印度北部（特別是奧德）同西帕依軍官們有密切關係的某些封建貴族的不滿。這次以推翻外國統治為目的的人民起義規模巨大，席卷印度北部、中部的最大地區，其中主要的有德里、勒克瑙、康波爾、羅希爾漢、中印度和班得爾汗。起義的主要動力是農民和城市貧窮手工業者；但是領導權卻掌握在封建主的手裡。這些封建主絕大多數在1858年殖民當局保證絕不侵犯他們的領地以後出賣了起義。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起義者缺乏統一的領導和共同的行動計劃，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印度的封建割據局面、居民種族複雜以及印度人的宗教和種姓界限所造成的。英國人在同起義鬥爭時成功地利用了這一點，大多數印度封建主都積極地幫助他們鎮壓起

义。此外，英国人在軍事技术上占有相当的优势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 1857—1859 年的印度起义没有直接触及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英国人設法使旁遮普、孟加拉和印度南部没有发生起义），但它震撼了全印度，迫使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行政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印度起义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它削弱了英国殖民者在那里的障地，就中把他們对阿富汗、波斯以及其他許多亚洲国家的侵略計劃推迟了几十年。——第 252 頁。

- 200 莫臥儿 是十六世紀初从中亚細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 年他們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臥儿帝国。莫臥儿帝国的統治者自称鉢諦沙赫，大莫臥儿是欧洲人給他們的称号。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臥儿帝国的創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臥儿”一詞的由来（«Моголы» 与 «Монголы»〔蒙古人〕諧音。——譯者注），这个名称成了对印度北部伊斯兰教徒的习惯叫法。莫臥儿帝国的势力扩展得很大，在十七世紀中叶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的加强，以及他們經常的內訌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大莫臥儿帝国便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紀的上半世紀实际上已完全瓦解。

这里指的是亚格伯二世的儿子大莫臥儿巴哈杜尔-沙赫二世。——第 253 頁。

- 201 指的是 威廉堡。这是加尔各答的一个英国城堡，建于 1696 年，为紀念当时英国国王奥倫治的威廉三世而命名。英国人在 1757 年征服孟加拉以后，把政府机关設在这个城堡里，城堡的名字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政府”，后来就指“印度英政府”。——第 253 頁。

- 202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 1857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255 頁。

- 203 馬克思提到不久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風潮时，指的是 1856 年西班牙的革命（見本卷第 41—53 頁）和 1857 年意大利发生的反对奥地利压迫和某些意大利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的革命浪潮。——第 258 頁。

- 204 拉吉普特人 是印度的高級种姓之一，也是印度的一个民族，主要居住在拉吉普坦納（現名腊賈斯坦）。孟加拉管区也有很多拉吉普特人，主

要居住在比哈尔。拉吉普特人被认为是屬於刹帝利武士等級的。在莫臥儿帝国，拉吉普特人作为軍人很受重視，因为他們具有民族團結性，而在雇佣的莫臥儿軍队中通常是缺乏这种團結性的。从階級方面看，他們一般都屬於“殷实”农民这一中間阶层。英国人很乐意接受拉吉普特人加入孟加拉軍的西帕依部队。

婆罗門 在古印度被认为是僧侶等級。从种姓制度形成的时候起，婆罗門就在种姓等級中占据最高地位，是印度四个最古老的种姓之一；后来，像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侶之外，还包括各种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連淪为貧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在內。

孟加拉的西帕依軍队(与孟买和馬德拉斯的西帕依軍队不同)招募的主要是屬於高級种姓的印度教徒，所以在孟加拉軍中有很多婆罗門和拉吉普特人。——第 260 頁。

- 205 駐劄官官邸 是英籍駐劄官(印度公国的政治顧問)的駐在地，此处专指奧德駐劄官的駐在地。——第 261 頁。
- 206 指 1808—1814 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法国占領的独立战争。——第 261 頁。
- 207 馬克思大概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英国下院議員在議會夏季會議期間，常不履行其議員职责，而去作各种消遣和料理私事。因此演說者时常不得不在几乎空洞的會場上发表演說。——第 263 頁。
- 208 指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爱·吉本的“羅馬帝国的衰亡史”(E.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前者第一版作者匿名，于 1734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者第一版于 1776—1788 年在倫敦出版。——第 264 頁。
- 209 指托利党，即英国大土地貴族和大金融貴族的党。托利党于十七世紀成立后，一貫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維護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守和腐敗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随着英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漸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它的議會壟断权。托利党的議會壟

断权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是1832年的改革，这次改革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由于废除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党内的分裂。五十年代中叶托利党党内在其阶级成分方面发生了分化和改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土地贵族与资本巨头结合的过程），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第264頁。

210 1773年以前，东印度公司在其印度的領地內有三个省督，分別駐在加尔各答（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买；每一省督下面設一由公司职位較高的職員組成的参事会。按照1773年“改进东印度公司行政管 理法令”，加尔各答省督（已称为孟加拉总督）下面設立由四人組成的参事会。总督和参事会的参事已經不是由公司任命，而通常是由英国政府指名委任，任期五年；任期屆滿以前只能按公司参事会提名由国王免职。参事会內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其参事的票数各半，則总督的一票具有决定意义。总督應該对孟加拉、比哈尔和奧里薩实行民政和軍事管理，同时对現在归他管的馬德拉斯省和孟买省，在有关进行战争和簽訂和約問題上享有最高监督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后几省才能独立行事。按照1784年法案，孟加拉参事会的参事减至三人，其中包括总司令。根据1786年的补充法案，总督获得在特殊情况下行动不受参事会限制的权利以及担任总司令职务的权利。按照1833年的法案，孟加拉总督成为印度总督，同时仍然是孟加拉省督；其下所設参事会的成員重新增至四人，同时可把总司令加进去作为参事会的第五个成員。总督及其参事会获得对整个不列颠治下的印度頒布法律的权利。孟买和馬德拉斯政府則失去这一权利；其省督下面的参事会应由两人組成。按1853年法案，除了組成具有执行机关职能的所謂小参事会的四个参事之外，規定設立具有立法职能的扩大参事会，其中应包括总督、总司令、孟加拉主审法官和最高法院中的一名法官。印度总督下設参事会的这一情况一直保持到1858年。——第265頁。

211 札吉达尔 是大莫臥儿帝国的伊斯兰教封建貴族的代表。他們曾得到暫時使用的大片領地（札吉），因此，他們必須服兵役和提供一定名額的軍隊。札吉达尔为自己的利益从居住在其札吉上的农民身上征收土地

稅，并利用他們的徭役劳动。在大莫臥儿帝国瓦解时期，札吉达尔变成了世襲的封建領主。

伊納达尔 是特殊封建賞賜（伊納）的所有者。伊納主要分給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神职人員以及宗教和慈善机关。在印度南部，村社的上层代表人物有时也获得伊納。伊納完全或部分地免納稅賦，并且可以世襲。在英国人統治时期，伊納达尔是指免納土地稅的土地所有者。

自由农 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紀的“自由所有者”。自由农向貴族繳納少量固定的貨幣地租，并且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第 266 頁。

- 212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 1857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269 頁。
- 213 印度事务 督察委员会 是根据 1784 年的“改进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在印度領地的行政管理”法令成立的。督察委员会由国王委派樞密院的六个委員組成。督察委员会主席由內閣大臣担任，实质上他是印度事务大臣和印度的最高統治者。督察委员会設在倫敦，它的決議通过由东印度公司三个董事組成的秘密委员会傳达到印度。因此，由于 1784 年的法令，設立了一套通过督察委员会（英国政府）和董事会（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双重性制度。督察委员会于 1858 年撤銷。——第 269 頁。
- 214 錫克教徒——見注 113。——第 270 頁。
- 215 1854 年 10 月初，巴黎謠傳联軍攻下了塞瓦斯托波尔。这个謠言上了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的官方报刊。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法国报纸就不得不进行辟謠。——第 273 頁。
- 216 “孟买时报”（《The Bombay Times》）是孟买出版的英文日报，1838 年創刊。——第 273 頁。
- 217 “国家报”（《Le Pays》）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 年于巴黎創辦。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 年）是拿破侖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該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第 275 頁。

- 218 見注 69。——第 277 頁。
- 219 1849—1850 年，在德意志广大社会阶层普遍要求統一的影响下，甚至反动的普魯士內閣也采取了某些改組軟弱无力的德意志联邦的措施，企图在同奥地利爭夺对德意志各邦的領導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尼古拉一世不願看到普魯士战胜奥地利而强大起来，于 1850 年 10 月把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大公和普魯士首相勃兰登堡伯爵邀到华沙。在这次称作 华沙會議 的会晤中(参加会晤的还有普魯士国王威廉以及奥地利国王弗兰茨-約瑟夫一世)，尼古拉一世坦率地表明，他最坚决地支持奥地利反对普魯士。——第 278 頁。
- 220 “多瑙河之星” (*L'Etoile du Danube*) 是羅馬尼亚自由派报纸，1856 年至 1857 年在布魯塞尔出版。——第 279 頁。
- 221 指 1857 年 8 月 20 日的下院的會議。——第 287 頁。
- 222 多瑙河地区的糾紛——見注 69。——第 289 頁。
- 223 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百年以来是在丹麦国王統治之下的。1852 年 5 月 8 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魯士、瑞典諸国，同丹麦的代表共同簽訂的有关丹麦君主国完整的倫敦議定书，承认这两个公国有自治权，但仍处于丹麦国王的最高統治之下。可是，丹麦政府不顾倫敦議定书，于 1855 年頒布了宪法，宪法取消了在丹麦治下的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独立和自治。为此，德意志国会于 1857 年 2 月发表公告，抗議在这两个公国里实行丹麦宪法，但公告上却誤写为霍尔施坦和劳恩堡(另一个在丹麦統治下的德意志公国)，而没有提什列斯維希。丹麦政府利用这一点，准备把什列斯維希并入自己的領土。結果不仅招致了不願同霍尔施坦人分离的什列斯維希人的抗議，而且也引起了普魯士、奥地利和英国的抗議，它們认为丹麦的行动破坏了倫敦議定书。——第 290 頁。
- 224 文中所讲的不确切。1852 年 5 月 8 日簽訂的倫敦議定书，承认格留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为无子女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繼承者。——第 290 頁。



- 225 “印度刑罰的調查”一文在馬克思 1857 年的筆記本上注明是他在 8 月 28 日写成的，但不知为何原因，“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却把它发表在編輯部在本文中談到的馬克思写于 9 月 4 日的“印度起义”（見本卷第 308—312 頁）一文之后。——第 291 頁。
- 226 “东印度（刑罰）” 1855—1857 年倫敦版（《East India (torture)》. London, 1855—1857）。——第 291 頁。
- 227 “馬德拉斯用刑事实調查委員會的报告” 1855 年倫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Alleged Cases of Torture at Madras》. London, 1855）。——第 291 頁。
- 228 收稅官 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員。他握有无限权力，一身兼任地方总收稅官、行政长官和首席法官之职。作为收稅官，他可以把欠稅者送交法庭；作为法官，他可以对欠稅者作出判决；作为行政当局的代表，他可以执行判决。——第 291 頁。
- 229 萊特 即印度农民；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稅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沒有破坏印度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 1793 年起实行所謂柴明达尔制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奧里薩实行，后来以稍有改变的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萊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十九世紀初孟买和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萊特瓦尔”土地稅收制后，萊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的英国政府随意規定的数额繳納地租稅。根据“萊特瓦尔”制，萊特同时被宣布为他們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稅收制，为农民規定了高得无力繳納的地稅；由于欠稅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漸轉到包买商和高利貸者手里。——第 292、308、590 頁。
- 230 阿格拉曼特——摩尔国皇帝，阿里欧斯托的长詩“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个人物。阿格拉曼特在同查理大帝打仗时圍困了巴黎，把自己的一大部分人馬集結在巴黎城下。但是不久在圍城的軍营內就发生了爭执与糾紛，这成了表示內訌的典故。馬克思把德里的英国軍营同阿格拉曼特的軍营相比，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第 298 頁。

- 231 “乡下佬”（《The Mofussilite》）是自由派的日报。从1845年起在印度用英文出版，最初在米拉特，后来在阿格拉和安巴拉发行。——第301頁。
- 232 指1853年关于东印度公司特許狀的法律。根据該法律，公司在印度的壟斷权受到某些削減。东印度公司的統治权越来越多地被划归英国国王。公司董事們被剝夺了任命官員的权利，董事人数由24人减到18人，其中6人由国王任命；督察委员会主席（見注213）的地位与印度事务大臣的地位相当。然而公司的股东却可以靠印度的捐稅取得固定的紅利。——第304頁。
- 233 关于孟买和馬德拉斯參事會，見注210。——第306頁。
- 234 也許指的是1852年的英緬战争，由于这次战争，緬甸的勃固省被并入东印度公司的領地。——第307頁。
- 235 在万第（法国西部一省份），法国保皇党人利用落后的农民，于1793年发动了反革命变乱。这次变乱为共和国軍队平息。共和国軍的士兵被称为“藍制服”（一般对于所有的国民公会拥护者也都是这样称呼）。

西班牙游击队——見注52。

拉亚契奇和耶拉契奇的軍队中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罗地亚人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参加过对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革命运动的鎮压。資產階級化了的匈牙利貴族拒絕了塞爾維亞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民族独立要求，結果使得奥地利反动势力能够为了本身的利益利用塞爾維亞人和克罗地亚人的部队来鎮压布达佩斯和維也納的起义。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具有革命情緒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主要由流氓无产者組成的队伍被利用来鎮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卡芬雅克將軍是陸軍部长，他亲自領導了对工人的鎮压。

波拿巴的秘密組織——十二月十日会（見注30）的會員是对共和派，尤其是对1848年革命参加者进行大規模鎮压的积极組織者。路易·波拿巴当选總統以后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在法国都实行过这种鎮压。——第308頁。

- 236 柴明达尔——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是指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間的封建領主。他們的世襲土地持有權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稅中抽出一定份額交給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詞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土地稅大包稅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稅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們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階級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略經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其他地区实行起来。——第310、412頁。
- 237 在1845年鎮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时期，佩利西埃將軍(后来升为法国元帅)下令把藏在山洞里的一千个起义的阿拉伯人用烟熏死。——第310頁。
- 238 这里是指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的著作“高卢战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此处所叙述的事情見第八册，这一册是凱撒的朋友、曾在他手下任执政官的奧·希尔提烏斯写的(他为凱撒續写了关于高卢战争的紀事)。——第311頁。
- 239 馬克思指的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于1532年在累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刑律的特点是懲罰极端殘酷。  
威·布萊克斯頓“英国法律釋义”第1—4卷(W.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I—IV)。初版于1765—1769年在倫敦出版。——第311頁。
- 240 札格納特(印度的叫法是札干納特)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祭祀札格納特的著名的地方是卡塔克城(印度东部)附近普里小鎮上的一座庙。这座庙的祭司們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从群众的朝圣活动(他們借此机会慫恿住在庙里的妇女卖淫)以及为紀念札格納特而举行的盛大庆典中获得大笔收入。拉特雅德拉节招徠的朝拜者特別多。届时，札格納特的神像被放在一辆龐大的車上拉着游行，狂热的信徒往往如瘋似狂地投身于車輪之下。——第311頁。
- 241 莫扎特的歌劇“后宮誘逃”第三幕第六場奧斯明的咏叹調。——第311頁。

- 242 這句話是“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加的，指的是該報常任通訊員匈牙利作家兼記者弗朗茨·普爾斯基。他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失敗以後流亡美國。他給該報寫的主要是國際問題的述評。——第318頁。
- 243 廓爾喀人(或稱廓爾克赫人)是構成尼泊爾居民主要成分的民族。一部分廓爾喀人住在印度——北方邦(過去的英屬印度時代的聯合省)和同尼泊爾毗鄰的西孟加拉各區。——第319頁。
- 244 馬克思指的顯然是“加爾各答日報”(«The Calcutta Gazette»)——自1784年在孟加拉出版的一家英文報紙，它是英國政府在印度的官方喉舌。——第319頁。
- 245 穆哈萊姆是伊斯蘭教的陰曆正月；這個月的最初十天被認為是哀悼忌期，紀念傳說中的教主侯賽因的殉難。在此期間，人們舉行通常帶有自我折磨性質的宗教禮儀。穆哈萊姆節的第一天就是新年元旦。——第320頁。
- 246 馬拉提人是印度境內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區的一個民族。從十七世紀中葉起，這個民族開始了武裝鬥爭，反對莫臥兒封建主的異族統治，他們沉重地打擊了大莫臥兒帝國並加速了它的崩潰。在這一鬥爭進程中建立了一個馬拉提人的獨立邦，這個邦的封建上層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戰爭的道路。十七世紀末，馬拉提邦被封建內訌所削弱，但是在十八世紀初，又形成了一個以最高統治者——派施華為首的諸馬拉提王國的強大聯盟。馬拉提封建主為了稱霸印度而與阿富汗人進行鬥爭，1761年遭到慘重的失敗。由於參加稱霸印度的鬥爭和馬拉提封建主的內部糾紛而弄得精疲力盡的諸馬拉提王國，在1803—1805年英國—馬拉提戰爭中被東印度公司征服。
- 這裡指的是馬拉提王公土卡吉二世霍爾卡爾和阿里·扎·吉阿吉·辛迪亞。——第321頁。
- 247 阿富汗慘劇——見注117。——第322頁。
- 248 馬克思寫這篇文章時利用了恩格斯在1857年9月24日的信中向他提供的有關印度起義經過的材料。——第323頁。

- 249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在本文開始處附加了這樣一句話：“昨天我們收到了10月7日以前的一批倫敦報紙。”——第327頁。
- 250 达普（两河流域）——此處指的是印度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間的地区。——第331頁。
- 251 桑塔爾人 是印度的一個民族，祖先是德拉維達人。桑塔爾人居住在西孟加拉、比哈爾和北奧里薩等地的山区。——第331頁。
- 252 “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是英國報紙，1818年創刊于塞腊姆普尔(孟加拉)；在五十年代，每周出版一次，該報具有資產階級自由派傾向。——第333頁。
- 253 “軍事旁观者”(《*Military Spectator*》)是英國的軍事周报，从1857年至1858年在倫敦出版。——第333頁。
- 254 “孟买信使报”(《*The Bombay Courier*》)是英國政府的報紙，东印度公司的机关报；1790年創刊。——第335頁。
- 255 馬克思做的这个表，大概是与本文一起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但編輯部却把它单独排在同一号報紙的第6頁上。——第336頁。
- 256 在馬克思的1857年的筆記本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國的金融危机。皮尔法暫停生效”。——第345頁。
- 257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附加了這樣一句話：“‘富尔頓号’带来的消息，即我們通过电报收到并于今晨发表在本報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看法。”——第345頁。
- 258 “地球报”(《*The Globe*》)是一家英國報紙“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簡称，1803年在倫敦出版，輝格党机关报，在該党执政时期是政府的官方報紙；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48頁。
- 259 明辛街(*Mincing Lane*)是倫敦的一條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國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創辦于

- 倫敦。——第 349 頁。
- 260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是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1855年至1865年由烏爾卡爾特及其擁護者發行於倫敦。——第 350 頁。
- 261 確立了共同關稅綫的德國各邦於 1834 年成立了關稅同盟。這個同盟是由於必須建立全德市場而產生的,它逐漸地包括了除奧地利和某些小邦以外的德國各邦。普魯士在同盟中起着領導作用。——第 351 頁。
- 262 馬克思指的是拿破侖第三於 1857 年 11 月 10 日簽署了一項法令,廢除了 1856 年 9 月 8 日和 1857 年 9 月 22 日的關於禁止谷物、面粉以及其他食品出口的法律。——第 351 頁。
- 263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附加了這樣一句話:“如果我們沒有弄錯,在我國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有些哲學家像我們的‘泰晤士報’和‘獨立報’的同仁那樣,認為只要人民假裝高興並三呼萬歲,災難就能避免。”——第 351 頁。
- 264 因克爾芒——見注 120。——第 352 頁。
- 265 1854 年 10 月 25 日(俄曆 13 日),俄軍和英法聯軍於巴拉克拉瓦附近會戰;在這次會戰中,英軍儘管處於有利的地勢,但是由於指揮失誤,英軍遭到很大損失,英軍的輕騎兵全部復沒。——第 353 頁。
- 266 “孟買日報”(《*The Bombay Gazette*》)是英國在印度出版的報紙;創辦於 1791 年。——第 354 頁。
- 267 “北不列顛每日郵報”(《*North British Daily Mail*》)是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1847 年創辦於格拉斯哥;它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機關報。——第 362 頁。
- 268 馬克思指的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托·圖克所寫的總稱為“價格史”的一系列著作:“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793—1837 年”1838 年倫敦版第 1—2 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價格

- 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838年、1839年”1840年倫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 London, 1840)、“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839—1847年”1848年倫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以及托·圖克和威·紐馬奇合寫的“1848—1856年九年中的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857年倫敦版第5—6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Vol. V—VI, London, 1857)。——第363頁。
- 269** 倫巴特街是倫敦的一條街名,大銀行和貼現所設在這裡,倫敦金融市場的同義語。英格蘭銀行只貼現各家銀行的第一流期票,而倫巴特街則貼現一切期票,並且這裡的貼現率,即所謂的市場貼現率,一向高於英格蘭銀行的貼現率。——第372頁。
- 270** 馬克思引用恩格斯1857年12月17日的信(未用原話),文中還利用了信中的其他事實。——第373頁。
- 271** 本文標題是根據馬克思1857年的筆記本加的。——第375頁。
- 272** “輿論報”(«Opinione»)是意大利的一家日報,1848年創辦於都靈,是卡富爾的自由保皇派的機關報。——第378頁。
- 273** *Crédit Foncier* (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國的一家股份銀行。它是1852年在前巴黎土地銀行的基礎上建立的。*Crédit Foncier* 發放以不動產作抵押並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長期貸款(期限為五十年)。*Crédit Foncier* 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貼。
- 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 (巴黎全國貼現局)成立於1848年。起初它貼現有兩個背書的期票並發放以存放在公共倉庫中的商品作抵押的貸款。在拿破侖第三時代成了股份公司(從1853年起)並取得發放以法國無期證券、工業股份公司或信用股份公司的股票或債券作抵押的貸款的特權。——第379頁。
- 274** 軍人餐廳(*Mess House*)是勒克瑙城駐防部隊用作軍官俱樂部和食堂

的处所。——第 381 頁。

- 275** 阿尔馬河会战——俄軍同法軍、英軍遇于阿尔馬河，時間是在 1854 年 9 月 20 日(俄历 8 日)。这次会战获胜的是联軍，因为他們人数多并且在軍事上占着相当的优势，此外还因为俄軍指揮不当。——第 386 頁。
- 276** 烏古蒙寨和拉埃桑特庄是滑铁卢村的外圍据点，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会战中是联軍的良好的天然壁壘。这两个陣地的守軍尽管人数很少(烏古蒙只有七个連和一个营，拉埃桑特只有一个营)，却表現了堪称典范的頑强死守的精神。結果法軍沒有能够拿下烏古蒙寨，只是經過長時間的苦战，他們才攻下了拉埃桑特。——第 387 頁。
- 277** 1812 年 9 月 7 日(俄历 8 月 26 日)博罗迪諾会战时，拿破侖的軍隊損失一半左右，庫图佐夫的軍隊損失三分之一以上。——第 387 頁。
- 278** 1832 年 10 月，英、法以及一部分比利时軍隊封鎖了荷兰的港口，圍困了安特卫普城堡，企图迫使尼德兰履行 1831 年倫敦条約关于承认比利时独立和把安特卫普割让給比利时的条款。荷兰人守卫城堡表現得很坚定頑强，只是在城堡仅剩下一片瓦礫以后，才在 1832 年 12 月底把它交出。
- 在圍困 1848 年 3 月起义反抗奥地利統治的威尼斯时，海瑞將軍指揮下的奥地利軍隊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馬尔格腊堡壘。堡壘的守軍奋力防守，抵御了长期的圍困，只是在 1849 年 5 月堡壘內部所有工事被破坏，大部分大炮被摧毀以后，才将堡壘交出。——第 405 頁。
- 279** 1813 年初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德俄軍隊包圍了法軍占領的但澤城，但是在該城外圍遇到組織得異常坚强的抵御。該城被圍十一个半月。在此期間，法軍在拉普將軍指揮下抵住了三次正規的圍攻。法軍折損計 19 000 人，联軍折損計 10 000 人。——第 405 頁。
- 280** 这里指的是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在联軍 1855 年 6 月 18 日(俄历 6 日)对塞瓦斯托波尔陣地第三号棱堡(所謂大凸角堡)的未成功的突襲当中，温德姆指揮英軍一个旅，但是行动非常迟緩，而且在战事正酣的时候曾两次极其可疑地跑到后方去，据說是为了請求援軍(見本卷第



411—416 頁)。——第 406 頁。

281 1833 年的議會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貿易的壟断权，停止了它作为貿易組織的活动。議會只給該公司保留了行政职能，把它的特許狀的有效期限延长到 1853 年。——第 408 頁。

282 “鳳凰”（《*The Phoenix*》）是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报纸，发行于加尔各答。——第 410 頁。

283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 1858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411 頁。

284 英軍总司令腊格倫公爵在 1854 年 10 月 25 日（俄历 13 日）的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命令軍隊騎馬冲击俄軍炮台，致使英軍輕騎兵复沒。这件事在英国曾轰动一时。事后，腊格倫公爵企图为自己辯解，硬說这应当归咎于諾倫上尉，因为他好像誤傳了腊格倫公爵的命令。可是要查明这件事却十分困难，因为諾倫在命令下达后几分钟就陣亡了。——第 415 頁。

285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 1858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417 頁。

286 指路易·波拿巴在 1840 年 8 月 6 日企图实行政变。他利用波拿巴主义情緒在法国相当活跃的情况，同一小撮密謀分子在布倫登陆，以图在当地駐軍中发动兵变。这一企图終于全部失敗。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于 1846 年逃往英国。——第 417 頁。

287 “旁观者”（《*Le Spectateur*》）是法国“国民議會报”（見注 64）于 1857 年 9 月至 1858 年 1 月在巴黎出版的报纸。

“卢瓦尔河上的灯塔”（《*Le Phare de la Loir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从 1815 年起在南特出版。——第 420 頁。

288 “紐約每日論壇报”在馬克思文章中的这段話的后面附加了这样一段：“又如現在在巴黎的一位美国知名人士在一封由‘阿非利加号’輪船寄来的信中写道：‘法国人自己的心里都有一种可怕的預感。前些日子，我曾和一个朋友談話，她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头脑清楚的女人；她 *sotto voce* [低声] 告訴我，她接触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在心惊胆战地担心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担心着不堪設想的复仇之日的到来。她告訴我，

- mont-de-piété〔當舖〕的收入大大减少，事实越来越明显：人民已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卖了。在她和她的朋友們看来，这肯定是最終災難临近的征兆。’”——第 420 頁。
- 289 指一項称为嫌疑犯处治法 (loi des suspects) 的社会治安法律。該法律于 1858 年 2 月 19 日由立法团通过。它使政府和皇帝有无限的权力把一切有敌視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甚至驅逐出法国領土。——第 420 頁。
- 290 指所謂的十二月十日会 (見注 30)。——第 421 頁。
- 291 在古羅馬，皇帝私人警卫部队的軍人称为 御用軍人，享有特权地位。馬克思把拿破侖第三所依靠的那些法国軍閥叫做御用軍人 (見本卷第 428—431 頁)。——第 421 頁。
- 292 把法兰西帝国全境划为五个軍区的命令是 1858 年 1 月 27 日頒布的。这些軍区的行政中心是：巴黎、南錫、里昂、土魯斯和图尔。被任命为各軍区长官的是：馬尼揚、巴拉盖·狄利埃、博斯凱、卡斯特朗和康罗貝尔等五名元帅。馬克思称这些軍区为帕沙轄区，是借用了早在 1850 年共和派报纸給軍区取的別名；这个別名的用意是強調当时任各軍区长官的反动將領的无限权力无異于土耳其帕沙的独裁大权。1858 年任命佩利西埃为主帅統轄所有軍区一事，只是拟議，并未付諸实行。——第 421 頁。
- 293 馬克思在这里援引的是曾經流行一时的約翰·班揚的小說“天路历程”。——第 421 頁。
- 294 指路易·波拿巴曾于 1836 年 10 月 30 日企图实行政变。为此，他曾在斯特拉斯堡市警备团中組織了密謀活动。結果密謀全部失敗。波拿巴被逮捕并流放到美国。——第 421、444 頁。
- 295 1855 年 3 月，路易·拿破侖曾打算前往克里木加强軍事行动，加速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以平息軍队和本国所发生的不滿情緒。但此行并未实现。——第 422 頁。
- 296 外侨管理法索 (又名取締阴謀活动法案) 是帕麦斯頓在法国政府的压

- 力下于 1858 年 2 月 8 日向下院提出的(帕麦斯顿表示自己打算提出此項法案是在 2 月 5 日)。按照这一法案,凡居住在联合王国境内者,不論英国人或外国侨民,如組織或参与旨在刺杀英国人或其他国家任何人的密謀活动,应交由英国法庭审判并予严惩。在广大群众抗議的压力下,下院否決了这一法案,帕麦斯顿亦被迫辞职。——第 422 頁。
- 297** 埃斯潘納斯將軍按照法国統帥部的命令,于 1854 年 7—8 月率領远征軍侵伐占据着土耳其屬地多布魯甲(位于頓河下游和黑海之間的地區)的俄軍。但是,埃斯潘納斯未与俄軍交战,却因軍中发生霍乱时疫,全軍死亡一半以上,而使这次侵伐以狼狽的退却告終。——第 428 頁。
- 298** 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称做薩托里英雄。1850 年 10 月 10 日,当时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在凡尔賽附近的薩托里平原举行总閱兵,并为此在那里大摆酒宴。路易·波拿巴当时准备实行政变,企图从而收买軍隊;他設法爭取到騎兵队在檢閱时向他高呼“皇帝万岁!”——第 428、545 頁。
- 299** 热月九日(1794 年 7 月 27—28 日)在法国发生了反革命政变,結果推翻雅各宾政府,建立起大資產階級的統治。——第 429 頁。
- 300** 皇宮 (*Palais Royal*) 是巴黎的一座宮殿,自 1643 年起为路易十四的宮邸,自 1692 年成为波旁王朝奥尔良系的財產。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作为拿破侖第三的叔叔,前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日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子約瑟夫·波拿巴(拿破侖第三的儿子出生以前,曾立为法国皇太子)的王府。  
这里暗指日罗姆·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之間的緊張关系。——第 430 頁。
- 301**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 1858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432 頁。
- 302** 指 1856 年 10 月英国代表和中国广州地方当局之間发生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中国方面的主要人物是总督叶名琛,他反对英国人的非法要求。这一冲突成为帕麦斯顿政府在中国发动第二次掠夺性的鴉片战争的借口。政府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很受貪求新的銷售市場的英国資產

階級的歡迎，这就使得英国貴族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帕麦斯顿能够在将近十年（1855—1858 年和 1859—1865 年）的时间內操纵了資產階級英国的國內外政策。

燒炭党人是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的参加者。这个政治团体产生于十九世紀初，它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燒炭党人所抱的目的是驅逐外国掠夺者和限制专制政治。

关于帕麦斯顿的辞职，見注 309 和 296。——第 432 頁。

- 303** 在英国議會里，按照久已形成的傳統，执政党的內閣閣員坐在下院議長（主席）右边的席位上，而身为反对党的前內閣閣員則坐在对面，即議長左边的席位上。——第 432 頁。
- 304** 天主教徒的解放 是指 1829 年英国議會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們获得了被选入議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財產資格却被提高了四倍。英国統治階級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資產階級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 433 頁。
- 305** 指爭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1832 年英国議會进行了选举法改革（見注 146）。——第 433 頁。
- 306** 凱普萊脫族和蒙太玖族是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两个敌对的家族。——第 433 頁。
- 307** 指 1845 年科布頓进行的反谷物法的宣傳鼓动。他的宣傳鼓动促使皮尔的托利內閣下台。受命組織新內閣的輝格党領袖約翰·罗素勋爵請科布頓担任貿易副大臣，科布頓拒絕了这个提議。由于輝格党的內部矛盾，罗素未能組閣。1845 年 12 月 20 日，托利党人重新上台执政。——第 433 頁。
- 308** 多布 (Dowbiggin 的簡称) 是一个参加过克里木战争的年輕軍官、英国陸軍大臣潘繆尔勋爵的侄子的名字。潘繆尔在发給克里木的英国司令部的一封电报中写过“請照顾一下多布”这句话，这句话被作为陸軍

大臣不关心国家軍务的证明而在英国盛傳开来。——第 433 頁。

**309** 在意大利革命家奥尔西尼謀杀路易-拿破侖以后,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于 1858 年 1 月 20 日向英国政府发出紧急照会,他在照会中代表法国政府以强硬的口吻对英国准許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表示不滿。瓦列夫斯基在照会中公然示意必須对此采取适当对策。瓦列夫斯基的照会使帕麦斯頓借此向下院提出了取締阴謀活动法案(見注 296)。——第 435 頁。

**310** 自由派議員米尔納·基卜生于 1858 年 2 月二讀取締阴謀活动法案过程中提出的修正案,責备帕麦斯頓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强硬照会未給以应有的回答。修正案实际上是对政府投下的不信任票;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修正案以后,否决了这个法案,結果迫使帕麦斯頓政府辞职。——第 435 頁。

**311** “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附加了以下这段話:“这样一来,欧洲一切国家的首都都松了一口气;每一个自由党人都充满信心地感到,現在距离人民胜利地站起来的日子,要比一个月以前近得多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們来引证英国一位杰出的演說家、英国最有前途的国家活动家之一、很久以来一直是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密友、牛津大学的代表人物格萊斯頓先生的一段話。在导致帕麦斯頓內閣倒台的历时很长的辯論中,格萊斯頓說:

‘我們的时代是爭取自由的艰苦时代。我們生活在十九世紀。我們談論着进步;我們相信我們正在前进;然而,細心观察过近几年的欧洲事变进程的人不能不注意到,虽然也确实存在着运动,但这是走下坡路的、开倒車的运动。有少数地方还存在着和盛行着我們所贊同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占次要地位的地方,就其物质意义而論,真可以說是欧洲的穷乡僻壤,当然我相信它們的精神意义能保证这些地方长期繁荣和幸福。而今天落在英国肩上的責任空前重大。如果确实要让英国和它的原則、它的法律、它的执政者来担負起这种責任,那末我要說,作为自由的主要支柱的下院所批准的任何法案,倘若想在我們同那些企图用鎮压手段巩固自己地位的人之間建立起道义上的合作,則对于世界

所有国家的神圣的自由事业将是一个打击，并将把这种事业置于困难境地。(暴风雨般的掌声)'

应该注意的是：得比勋爵坚持邀请格莱斯頓先生在他的內閣中担任要职；最近以前不曾有过、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不愿意让格莱斯頓先生分担一部分最重大的責任的首相。”——第 435 頁。

312 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侵略战争期間，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阿拉伯民族的兽行(見注 110)。——第 436 頁。

313 “皇帝拿破侖第三和英国” 1858 年巴黎版(《L'Empereur Napoléon III et l'Angleterre》. Paris, 1858)。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路·埃·拉·格隆尼埃尔写的，并且是匿名出版的。——第 436 頁。

314 指 1847 年初在比桑歇城(法国中部安德尔省)发生的政府军队镇压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的饥饿工人(四圍乡村的居民)的事件。比桑歇事件引起了政府的残酷镇压：有几个直接参加事件的人被处死，其他许多人被判服苦役。——第 436 頁。

315 1847 年 8 月，法国元帅普拉兰公爵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位显要人物的罪行引起了法国社会各界的忿怒。公爵在妻子安葬几天以后，突然死亡，法国报界认为这是自杀。——第 436 頁。

316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 年创刊。1850 年該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謂秩序党的利益；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440 頁。

317 “有思想的军队”(《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一語，被认为是法国保皇党将军尚加尔涅的說法。1849 年，法国制宪議會主席、资产阶级共和派馬拉斯特預感到来自波拿巴分子的威胁，請求尚加尔涅派兵保护議會，尚加尔涅拒絕了，并且声明他不喜欢有思想的军队。他以此使人明白，军队不应该根据政治的动机来行动。馬克思在这里是暗中諷刺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緒的法国军队，这支军队实际上在第二帝国的政治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第 440 頁。

318 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利用了恩格斯 1858 年 3 月 17 日的信。——第

- 441 頁。
- 319 指所謂外侨管理法案(見注 296)于 1858 年 2 月被英国下院否决,以及接着而来的从道义上支持拿破侖第三的制度并且贊同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的帕麦斯頓政府的辞职。——第 444 頁。
- 320 指法国和比利时于 1856 年 9 月 22 日簽訂、10 月 11 日批准的协定。协定限制了比利时对被控图謀杀害或杀害外国皇帝或皇族的政治流亡者給以避难的权利。——第 444 頁。
- 321 暗指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侖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 一书。书中頌揚拿破侖政治的原則、拿破侖第一的帝国秩序,并把皇帝本人写成一个理想人物。——第 444 頁。
- 322 “大陆評論”(«*The Continental Review*»)是英国的資產階級周刊,1858 年至 1859 年在倫敦出版。——第 444 頁。
- 323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現代軍隊的大炮史”1848 年巴黎版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Histoire du canon dans les armées modernes*». Paris, 1848)。——第 446 頁。
- 324 1848 年 12 月 10 日路易·波拿巴被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統。——第 446 頁。
- 325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L'Univers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是法国教权派报纸,1833 年創辦于巴黎;該报在五十年代支持波拿巴的政策。——第 447 頁。
- 326 指阿基里斯。根据希腊神話,只有他一个人能治好他使海格立斯的儿子泰列夫遭受到的創伤。——第 448 頁。
- 327 古羅馬集会場上的一个地方叫做 *Lacus Curtius* (庫尔威烏斯谷)。据傳說,这里由于地震而塌陷成一个坑,只是当一个羅馬青年庫尔威烏斯牺牲自己,跳进坑去以后,这个坑才閉合起来。——第 448 頁。

- 328 指路易·波拿巴曾参加英国政府为镇压宪章派而征募的特別巡警（警察）队。这些巡警队在破坏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为向議會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請願书而举行的游行示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 448 頁。
- 329 朱·馬志尼“致路易·拿破侖”1858 年倫敦版（J. Mazzini. «To Louis Napoléon». London, 1858）。——第 450 頁。
- 330 馬克思指 1849 年羅馬共和国三执政（馬志尼、薩菲、阿尔美里尼）的政策温和的、不彻底的性质。他們对农民采取的措施，虽然也带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并未改变农村的土地关系，也沒有使意大利农民的困难处境真正得到改善。——第 450 頁。
- 331 指杜罗·德·拉·馬尔的“羅馬人的政治經濟学”1840 年巴黎版第 1—2 卷（Dureau de la Malle. «E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 I—II, Paris, 1840）和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第一版作者匿名于 1734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 450 頁。
- 332 約·列列韦尔“論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1844 年巴黎版]（J. Lelewel. «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 politique de l'ancienne Pologne et sur l'histoire de son peuple» [Paris, 1844]）。——第 451 頁。
- 333 *Marianne*（瑪麗安娜）是法国一个秘密的共和組織的名称，成立于 1850 年；該組織以反对拿破侖第三为目的。——第 452 頁。
- 334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得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領導人的信任，参加了在教皇庇护八世死后所組織的反对羅馬教皇世俗权力的密謀。1831 年初在摩地那、罗曼尼亚、帕尔馬由此而爆发的起义，被奧地利的軍队和意大利各国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第 454 頁。
- 335 关于雨果的小册子，見注 29。——第 456 頁。



- 336 “誠實的不列顛人報”(《*The True Briton*》)是1792年在倫敦創办的英国日报;它在十九世紀初同政界有密切联系。——第460頁。
- 337 皇家法院 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皇家法院审理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級法院的判决。——第460頁。
- 338 “汉堡記者”(《*Hamburger Korrespondent*》)是德国报纸“汉堡公正記者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Korrespondenten*》)的簡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該报每天出版,倾向于反动的君主专制。——第463頁。
- 339 暗指法国实行路易-拿破侖所倡議的野战炮兵新体制。按照这个体制,各种炮均代之以輕型的十二磅炮,即所謂路易-拿破侖的榴彈炮,这种炮可以发射不大的炮彈。——第464頁。
- 340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1858年的筆記本加的。——第469頁。
- 341 指1838—1842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見注117)。——第470頁。
- 342 B. Disraeli, 《*The Young Duke*》. Vol. I—III, London, 1831. ——第476頁。
- 343 指的是財政大臣格萊斯頓于1853年4月提出并由下院通过的有关預算的提案。——第478頁。
- 344 理查·普萊斯“評繼承支付、孀老贍養金方案、人寿保險金計算法以及國債”1771年倫敦版(R. Price,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 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 and on the National Debt*》. London, 1771)。——第479頁。
- 345 指“通报”上发表的法国陸軍上校們为庆賀拿破侖第三于1858年1月14日被刺遇救而写的祝詞。祝詞中充滿了对英国的威胁。——第481頁。

- 346 “权力报”(«*Le Pouvoir*»)是法国波拿巴派的报纸,1849年创办于巴黎,从1850年至1851年用这个名称发行。——第482頁。
- 347 “紐約先驅报”(«*The New-York Herald*»)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在1835年至1924年发行于紐約。——第483頁。
- 348 布倫远征(*Expédition de Boulogne*)——見注286。——第483頁。
- 349 “工厂視察員向女王陛下內务大臣所做的截至185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报告”1857年倫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7*». London, 1857)。——第488頁。
- 350 恩格斯指的是緬甸人所广泛采取的一种用于城市和营垒周圍的最古老的防禦工事。——第497頁。
- 351 法国所占領的西班牙要塞巴达霍斯和圣塞瓦斯田先后被威灵頓所統率的英軍于1812年4月6日和1813年8月31日攻下。——第499頁。
- 352 指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于1858年3月3日的公告。根据此項公告,奥德王国的全部土地,包括参加印度起义的塔魯克达尔(大封建地主)的土地,均由英国当局予以沒收,归英国政府所有。但是英国政府为了籠絡塔魯克达尔,改变了坎宁公告的意思,允許塔魯克达尔的地产不受絲毫侵犯。在此以后,塔魯克达尔們就背叛了起义,投靠了英国当局。
- 馬克思在“奥德的兼并”和“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問題”(見本卷第502—507頁和第516—519頁)等文中詳細地評論了这一公告。——第499頁。
- 353 虽然英勇而頑强地同英軍作战的錫克軍队有良好的組織,但錫克人却于1845年12月18日在非罗茲普尔附近的穆得克村,于1845年12月21日在非魯茲沙赫尔,于1846年1月28日在卢迪阿納附近的阿利瓦尔村被英軍战敗。由于这几次敗仗,1845—1846年的第一次英錫战争,錫克人打輸了。錫克人战敗的原因是其最高指揮部的叛卖行为。——第500頁。

- 354 本文標題是根据馬克思 1858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502 頁。
- 355 馬克思援引的是印度總督坎寧勳爵 1858 年 3 月 3 日的公告。——第 502 頁。
- 356 奧德原屬莫臥兒帝國，但在十八世紀中葉，奧德的莫臥兒總督實際上已經成為獨立的統治者。自 1765 年起，英國人把奧德變成一個附屬的（臣服於英國人的）公國，奧德的實際政權遂落入英國駐劄官的手中。然而為了掩飾這種局面，英國人常常稱奧德的統治者為國王。——第 503 頁。
- 357 根據 1801 年東印度公司同奧德的納瓦布所簽訂的條約，印度總督威爾斯里借口納瓦布未償債務，兼併了他的一半領地，其中包括果賸克普爾、羅希爾汗和恒河、朱木拿河兩河之間的某些地區。——第 503 頁。
- 358 英印總督及其參事會——見注 210。——第 506 頁。
- 359 馬克思文章中的這一句話是“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加的，編輯部指的是 1858 年 6 月 5 日該報所發表的印度總督坎寧和奧德首席專員烏特列姆之間就坎寧關於奧德的公告的來往信件。——第 516 頁。
- 360 十九世紀中葉，幾乎整個印度均處於英國統治之下。與東印度公司有從屬關係的有克什米爾公國、拉吉普坦納公國、海德拉巴公國一部分、邁索爾公國和其他一些較小的公國。——第 516 頁。
- 361 柴明達爾——見注 236。  
塔魯克達爾——見注 352。  
謝爾達爾——錫克大封建主。——第 516 頁。
- 362 指 1793 年印度總督康沃利斯所公布的“永久柴明達爾”法。根據這一法律，孟加拉、比哈爾和奧里薩的幾乎全部土地均被宣布為柴明達爾所有（見注 236）。——第 517 頁。
- 363 督察委員會主席埃倫伯勒勳爵在其 1858 年 4 月 19 日的電報中對印度總督坎寧勳爵關於奧德的公告持有不同意見（見注 352）。  
埃倫伯勒勳爵由於他的電報沒有取得英國政界的贊同，而被迫辭

- 职。——第 519 頁。
- 364 “财产的救主”是 1849 年 7 月法国各城市市政委员会給路易·波拿巴的祝詞中对他的称呼。——第 520 頁。
- 365 “世紀报”(《*Le Siècle*》)是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該报反映了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在五十年代該报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报纸。——第 521 頁。
- 366 “費加罗报”(《*Figaro*》)是法国保守派的报纸,1826 年起在巴黎断断续续地出版,在五十年代該报具有波拿巴主义倾向。——第 522 頁。
- 367 暗指英国首相同时兼任財政大臣。——第 538 頁。
- 368 包括了宪章派各項要求的人民宪章,是 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議會的一項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了以下六点,普选权(賦予年滿 21 岁的男子),議會每年选举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議員候选人的财产資格限制,发給議員薪金。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請願遭到議会的拒絕。
- 对英国下院議員的财产資格限制,于 1858 年由議會廢除。——第 538 頁。
- 369 这里是指 1846 年在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省发生的乌克兰农民反对波兰地主的反封建运动。当时,奥地利当局散播了挑撥性的流言蜚語,說奥皇本来打算廢除徭役制而波兰地主(在加里西亚基本上是統治阶级)却反对这样做,利用了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貴族阶级之間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奥地利政府在头几天听任农民去攻打和消灭波兰地主,可是后来殘酷地鎮压了农民起义。——第 540 頁。
- 370 “同盟报”(《*L'Union*》)是法国教权主义君主派的日报。从 1848 年至 1869 年以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 540 頁。
- 371 这里說的是 1858 年 3 月由得比內閣提交議會、同年 7 月由議會通过的法案。該法案名为“改进印度的行政管理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印度轉归国王統治,而东印度公司則予解散,以 300 万英鎊作为对股东的补偿。撤銷的督察委员会主席由印度事务大臣取而代之,印度事务大臣

下面設一諮詢机关——印度事務參事會。印度總督改稱副王，其實只是在倫敦的印度事務大臣意志的執行者。

馬克思在“關於印度的法案”這篇論文中對該法案做了批評性的分析（見本卷第 558—561 頁）。——第 547 頁。

- 372 本文標題是根據馬克思 1858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553 頁。
- 373 本文標題是根據馬克思 1858 年的筆記本加的。——第 558 頁。
- 374 指 1773 年的“改進東印度公司行政管理法令”。該法令縮減了參加決定公司事務和選舉董事會的股東的人數。根據該法令，參加股東大會（股東會）而有表決權者只限於持有股票一千英鎊以上的人。第一屆印度總督及其參事會成員任期各五年，期滿以前只能經公司董事會提名由國王免職。後來總督及其參事會則應由公司任命。根據 1773 年的法令，在加爾各答設立最高法院，其中包括一名最高法官和三名助理。——第 558 頁。
- 375 印度事務大臣及其參事會——見注 371。——第 559 頁。
- 376 «*Civis romanus sum*» ——帕麥斯頓在下院就商人帕西非科一案發言後所得的譯名（見注 165）。——第 561 頁。
- 377 “索美塞特報”（«*Somerset Gazette*»）是英國周刊“索美塞特郡報”（«*Somerset County Gazette*»）的簡稱，1836 年創辦於湯頓。——第 562 頁。
- 378 馬克思指的顯然是他在 1858 年 7 月 16 日寫的第一篇有關布爾韋爾-利頓夫人的文章，但該文沒有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第 563 頁。
- 379 埃克塞特會堂（Exeter Hall）是倫敦斯特倫德街上的一座建築物。1831 年至 1907 年英國國教會福音派的中心組織就設在這裡。——第 565 頁。
- 380 “心理學醫學和精神病學雜誌”（«*Th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and Mental Pathology*»）是由福布斯·溫斯勞醫師自

- 1848年至1883年在倫敦出版的杂志,其間曾中斷过一个时期。——第566頁。
- 381 “精神病委员会委員向大法官呈遞的年度報告” 1852、1854、1857年 [1853—1858年倫敦版] (《Annual Reports of the Commissioners in Lunacy to the Lord Chancellor》. 1852, 1854, 1857. [London, 1853—1858])。——第568頁。
- 382 “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瘋人病院狀況的報告” 1857—1858年倫敦版 (《Return of Lunatic Asylums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1857—1858)。——第570頁。
- 383 “特別委员会关于銀行法的報告” 第1—2册 1857年 [倫敦版]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P. I—II, [London] 1857)。——第574頁。
- 384 本文標題是根据馬克思1858年的筆記本加的。——第584頁。
- 385 指1858年6月英、法、俄、美在天津与中国簽訂的不平等条約,这些条約結束了1856—1858年同中国进行的第二次鴉片战争。条約为外国在长江、滿洲、台灣和海南島上开放了新的通商口岸,还开放了天津港口;准許在北京派設常駐的外国外交代表,外国人有权在中国自由行动和在內河航行,保障傳教士的安全。——第584頁。
- 386 馬丁, 罗·蒙哥馬利 “論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 1847年倫敦版第2卷 (Martin, R. Montgomery.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Vol. 2, London, 1847)。——第585頁。
- 387 “商人杂志” (《The Merchant's Magazine》) 是弗·汉特創办的“商人杂志和商业評論” (《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的簡称。1839年至1850年用該名称在紐約出版。——第585頁。
- 388 本文標題是根据馬克思1858年的筆記本加的。——第588頁。
- 389 “君士坦丁堡報” (《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 是一家土耳其報紙,

- 从1846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給予津貼,是一个半官方报纸,同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传播者。每月出版六次。——第596頁。
- 390** 指中国的太平軍起义(見注72)。——第604頁。
- 391** 錫克国是印度的一个封建国家,十八世紀末誕生于旁遮普境內。十九世紀初在朗吉特·辛格治理下达到了极盛时期。朗吉特·辛格征服了旁遮普所有的小邦以及一系列邻近地区。在他統治时,錫克国的版图从薩特里日河延伸到开伯尔山口,北起小西藏,南到信德边界綫。朗吉特·辛格在国内建立了强有力的軍事組織。錫克軍队被认为是印度最好的軍队。十九世紀中叶,經過两次英錫战争(1845—1846、1848—1849),錫克国丧失了独立;旁遮普被英国人兼并。——第614頁。
- 392** 指天津条約(見注385)。——第621頁。
- 393** 馬克思指的是这本书:約·麦克格莱哥尔“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稅則、条例、資源和貿易”1841—1850年倫敦版(J. Mac-Gregor. «Commerci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Resources, 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1841—1850)。——第623頁。
- 394**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貿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倫敦出版。——第624頁。
- 395** “每日电訊”(«*Daily Telegraph*»)是1855年在倫敦創辦的一家英国日报;該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傾向。——第625頁。
- 396** 1857年1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由奥尔洛夫大公担任主席,从1858年1月起該委员会改称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秘密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农奴制的改革,康斯坦丁大公只是該委员会的委員。——第627頁。
- 397** 馬克思指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于1803年2月20日頒布的法令:“地主釋放农民必經双方同意并締結合同”,以及尼古拉一世于1842年、1844年、1846年、1847年頒布的各项指令(見本卷第723—724頁)。——第629頁。

- 398 1848年3月18日在柏林，正当王宮前廣場上的示威群众被驅散时，軍隊突然开了两枪。普魯士軍事当局的这种挑畔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巷战中，柏林居民有四百多人被打死，一千多人被打伤。起义的人民接管了王宮的警备事宜以后，在3月19日早晨强迫国王出来在阳台上对牺牲的战斗者的尸体脱帽行礼。——第632頁。
- 399 根据希腊神話，狄奥尼苏斯由于忒拜国王班突士不承认他是神，要对班突士进行报复，就把忒拜居民中所有的妇女都帶到塞塔隆山上去，她們在那里被灌醉以后，跳起了酒神节的狂舞。这些酒醉发狂的女人乱撕乱扯地杀死了班突士。——第632頁。
- 400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竭力想恢复反动的封建王朝的气派，于1843年頒布法令重建天鵝騎士团——中世紀的宗教騎士团。这种团体創于1443年，在宗教改革时期衰落下去。但是，普魯士国王的这种打算始終未能如願。——第634頁。
- 401 本文标题是根据馬克思1858年的筆記本加的。从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来，馬克思也在11月24日的“自由新聞”（«Free Press»）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只是文章的首尾有所改动。——第636頁。
- 402 指瓦·亚·彼罗夫斯基在1839年組織的旨在征服希瓦但終告失败的一次远征（見注119）以及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見注117）。恩格斯在讲到英国军队的种种失败时，看来是指英印军队在进军喀布尔时所遭遇的困难。——第636頁。
- 403 普魯士亲王是最仇視人民的反动宫廷奸党头子之一，在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日子里曾逃往英国。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任鎮压起义的普魯士军队总司令。——第644頁。
- 404 *Seehandlung*（海外貿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板和財政部門的經紀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改为普魯士的国家銀行。——第645頁。



- 405 《*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議院”）是1815年至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組成的法国众議院。——第646頁。
- 406 在1850年10月举行的所謂华沙會議（見注219）期間，尼古拉同普魯士代表首相勃兰登堡伯爵談話时声色俱厉，語含威胁。勃兰登堡伯爵从华沙回来后即暴卒。人們认为他的死因是由于受到了沙皇的侮辱以及因普魯士国家地位低落而焦虑不安所致。——第650頁。
- 407 摩拏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誠律集成，規定每个印度人按照婆罗門教义应尽的义务。在印度傳統上，认为这些戒律是出自神話中的人类始祖摩拏之手。——第652頁。
- 408 “人民报”（《*Volks-Zeitung*》）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的資產階級日报，从1848年至1915年以此名称在柏林出版；在五十年代傾向于自由派。——第657頁。
- 409 塞尔維烏斯·土利烏斯（公元前六世紀）据說是古羅馬社会制度的改革者。这次改革結束了氏族制度，完成了向奴隶占有制国家的过渡。根据这次改革，能携带武器、过去分为貴族和平民的羅馬居民，按財產多寡划分为五个基本等級。每一个等級有一定数量的軍事单位——百人团。百人团同时也是政治单位。百人团會議具有特殊意义。每个等級有多少个百人团，在會議上就分得多少票。这个制度使最富有的等級在决定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时占优势地位。以前羅馬人分成部落特里布斯（每一特里布斯包括一百个氏族），这时改为按地区分的特里布斯了。——第660頁。
- 410 格拉克列亚半島即所謂克里木半島上西自因克尔芒到巴拉克拉瓦的那一部分；格拉克列亚半島是因塞瓦斯托波尔被圍而开辟的重要作战地区之一。馬克思在提到从俄国夺走的那一块不大的土地时，是指俄国按照1856年的巴黎和約被迫放棄的貝薩拉比亚部分。——第661頁。
- 411 1853年1月9日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国駐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先生会晤时这样称呼土耳其，尼古拉一世曾建議俄英瓜分土耳其帝国。不願意俄

- 国富强而只关心保护弱小的奥斯曼帝国的英国,拒絕了这个建議。——第 661 頁。
- 412 約·溫·庫克“中国:1857—1858 年‘泰晤士报’特約中国通訊”1858 年倫敦版第 273 頁 (G. W.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London, 1858, p. 273)。——第 663 頁。
- 413 “記者”(«*Le Correspondant*»)是法国天主教月刊;从 1829 年起在巴黎出版;在五十年代是奥尔良派的机关刊物。——第 667 頁。
- 414 英国自十六世紀設置的国务會議(后来的樞密院)議長,作为荣誉职保留在內閣之中,类似不管大臣;任此职者对于国政不起任何作用。——第 672 頁。
- 415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是德国日报“普魯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的簡称。該报是普魯士政府的官方报纸,于 1851 年至 1871 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 672 頁。
- 416 菩提树街(*Unter den Linden*)是柏林市的主要大街之一。——第 673 頁。
- 417 “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詩,据說是傳說中的古希腊詩人荷馬所写。  
“艾达”是一部收有七至十三世紀时期冰島神話和英雄詩歌的集子,是世界史詩中最偉大的遺產之一。——第 673 頁。
- 418 古迪布腊斯是英国詩人巴特勒的同名諷刺长詩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喜好无意义的談論和爭辯,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論断“证明”最荒謬的論点。——第 677 頁。
- 419 «*Le tiers-état c'est tout*» (“第三等級就是一切”)——这里是套用艾·約·西哀士于 1789 年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前夕发表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級?” («*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 中的“什么是第三等級? ——一切”一語。——第 677 頁。

- 420 大卫·汉澤曼“普魯士与法兰西”(D. Hansemann. «Preußen und Frankreich»)。第一版于1833年出版。——第677頁。
- 421 哥达党 成立于1849年6月。它的成員是反革命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即在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絕国民議會給他加冕和国民議會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实行全国摄政的決議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議会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力求把整个德国統一在霍亨索倫王朝的普魯士的領導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678頁。
- 422 指普魯士于1848—1850年对丹麦进行的战争。普魯士战败，被迫同丹麦締結和約(1850年)。按照和約的条件，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仍旧完全归丹麦統治。——第679頁。
- 423 指德国作家皮克列尔-穆斯考。1831年他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亡人遺信”(«Briefe eines Verstorbenen»)一书。——第679頁。
- 424 “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反动透頂的德国日报“新普魯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的通行的名称，該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魯士容克地主的喉舌。“新普魯士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軍的十字章图样。——第681頁。
- 425 馬克思把德文 Krautjunker (頑固守旧的容克地主)譯作英文 fox-hunter (猎狐者)，是因为猎狐狸是英国地主的傳統消遣方式。——第683頁。
- 426 潘多拉的盒子 是裝滿罪恶和糾紛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話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裝着各种各样禍害的盒子，并把这些禍害散布出来。——第690頁。
- 427 “普魯士报”(«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日报“普魯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的簡称。該报是政府的机关报，1853年至1859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第692頁。
- 428 *Treibbund* (忠实者联盟)是1848年底普魯士保皇派在柏林建立的反动沙文主义組織。

奧倫治會 是反動的恐怖組織，是 1795 年愛爾蘭的大地主和新教僧侶為了反對愛爾蘭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成立的。它糾集了社會上一切階層的反動透頂的愛爾蘭人和英國人，有計劃地挑唆新教徒反對愛爾蘭天主教徒，在新教徒聚居的北愛爾蘭影響特別大。它的命名是為了紀念鎮壓過 1688—1689 年愛爾蘭起義的奧倫治的威廉三世。——第 692 頁。

429 馬克思指的是杜沙爾-拉弗斯的作品“客廳紀事”（《Chroniques de l'Oeil-de-Boeuf》）。該書於 1829—1833 年在巴黎分八卷出版。Oeil de boeuf 直譯是：公牛的眼睛。凡爾賽宮中法國國王寢室前面的大客廳即以此命名。——第 693 頁。

430 米蘭起義（1853 年 2 月 6 日）是意大利革命者馬志尼的擁護者發動的，並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的支持。起義者大多數是意大利的愛國工人，以推翻奧地利在意大利的統治為目的。但是，起義是根據密謀策略組織的，並沒有考慮到現實狀況，很快就遭到了失敗。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这次起義作了評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93—594、599—602、624—626 頁）。

薩普里（薩累諾省）登陸是意大利革命民主主義者卡·皮薩康率領下準備在意大利南部舉行起義的一支不大的隊伍在 1857 年 6 月底舉行的。這支軍隊沒有能夠與農民群眾建立聯繫，沒得到他們的支持，被那不勒斯軍隊殲滅了。——第 695 頁。

431 恩格斯指的是著名意大利悲劇女演員里斯托麗在意大利的演出，她在賈科美蒂編的“猶滴”一劇中扮演聖經上的女英雄猶滴。據聖經上的傳說，為了拯救自己的人民，猶滴殺死了和羅孚尼——亞述人的統帥，使猶太人能把敵人逐出國境。劇終時里斯托麗唱了一支聖歌，歌中有這樣一句話：“讓他們知道，要是外國人威脅祖國，戰爭是神聖的。”意大利的愛國者以人聲沸騰的、顯然是反對奧地利占領者的遊行示威來響應這支聖歌。當女演員在帕爾馬巡迴演出的時候，帕爾馬公爵夫人說帕爾馬沒有外國人，准許演唱整個這支聖歌。這個劇引起了觀眾的狂喜；此後，無論里斯托麗演什麼劇，群眾都要求她演唱“猶滴”中的這支聖

歌,每次演唱都激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第 697 頁。

432 指蒙塔郎貝爾的論文“英國議會關於印度問題的辯論”(«Un débat sur l'Inde au parlement anglais»), 這篇文章曾載於 1858 年 10 月 25 日“記者”(«Le Correspondant») 雜誌,新合訂本第 9 卷。——第 698 頁。

433 指 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魯士軍隊在耶拿附近被擊潰,結果普魯士向拿破侖法國投降。這次敗績徹底暴露出霍亨索倫封建君主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腐朽性。——第 703 頁。

434 在從 1815 年起受英國保護的伊奧尼亞群島,和在希臘本土一樣,爭取與希臘合併的民族運動在五十年代逐漸高漲。1858 年 11 月,格萊斯頓帶著特別使命被派往伊奧尼亞群島。雖然科爾富島(伊奧尼亞群島的主島)立法議會一致表示贊成與希臘合併,英國政府仍把這個問題的解決拖延了許多年。只是在 1864 年伊奧尼亞群島才被移交給希臘。

馬克思所以稱呼格萊斯頓為“荷馬專家”,大概是因為格萊斯頓是當時剛出版的“荷馬與荷馬時代的研究”(«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Oxford, 1858)一書的作者。——第 705 頁。

435 1799 年俄國海軍上將費·費·烏沙可夫的艦隊從法國人手中解放了伊奧尼亞群島。烏沙可夫宣布群島成立共和國並制定了憲法,該憲法給予伊奧尼亞群島以廣泛自治。1807 年群島重新交由法國統治,而拿破侖實際上廢除了這部憲法。1815 年群島轉交給英國,英國確定了對群島的保護制度,在那里制定了新憲法,該憲法授予駐該群島的英國代表——首席專員以無限權力。由於群島對外國統治不滿的日益加深,英國政府(當時格雷在政府中擔任陸軍和殖民大臣職務)被迫於 1849 年在那里進行了改革,稍微擴大了地方自治和伊奧尼亞人的選舉權。——第 708 頁。

436 印刷所廣場是倫敦的一個廣場,“泰晤士報”總編輯部所在地。——第 709 頁。

437 馬克思暗示得比於 1830—1833 年任愛爾蘭事務大臣期間,曾對愛爾蘭

人民采取高压政策的事。根据 1833 年得比通过議會实行的暫停行使宪法保障法令 (Coercion act), 爱尔兰禁止自由集会, 宣布戒严, 設立軍事法庭, 并暫停实行人身保护法 (Habeas Corpus Act)。

奧倫治会分会——見注 428。——第 711 頁。

438 凤凰俱乐部是爱尔兰的秘密社团, 由 1848 年后被粉碎的爱尔兰革命俱乐部产生的; 它的主要成員是小職員、店員和工人。該社团同侨居美国的爱尔兰革命者有关系。1858 年, 由于芬尼亚社領袖斯蒂芬斯的宣傳, 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員都加入了秘密的芬尼亚兄弟会。——第 713 頁。

439 里本运动 (来自英文 ribbon——帶子) 是十八世紀末在北爱尔兰产生的爱尔兰农民运动。爱尔兰农民結成秘密組織, 并以佩帶綠布条作为参加这些組織的标志。里本运动是人民对英国大地主的专橫和暴力驅逐佃农的一种反抗形式。里本派襲击地主庄园, 謀杀他們最仇恨的大地主和管理人。但是, 里本派的活动沒有任何共同的行动綱領, 純粹是地方性的, 分散的。——第 713 頁。

440 “每日快报” (《The Daily Express》) 是英国政府的日报, 从 1851 年在都柏林发行。——第 713 頁。

441 “黎明伙伴” (Peep-o'-Day boys) 是反动的新教 (长老会的) 組織成員的名称, 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在北爱尔兰产生, 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徒。这些組織的成員, 得到大地主的公开支持; 为自身利益而挑撥和鼓励爱尔兰人宗教摩擦的英国政府也在暗中支持他們。他們通常在黎明时分 (“黎明伙伴” 由此得名) 闖进天主教徒家中, 借口搜查武器而进行搗毀。当时根据法律, 天主教徒是禁止持有武器的。

“护教派” (《Defenders》) 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組織成員的名称, 产生于十八世紀八十年代, 其目的是抵抗“黎明伙伴”。——第 714 頁。

442 指的是农民事务总委员会 (見注 396)。——第 716 頁。

443 馬克思提到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事件。1789 年 8 月 3 日夜間, 法国立宪會議在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 庄严地宣布廢除一系列当时实际上已被起义农民取消了的封建义务。但是随后頒布的

法律只无偿地廢除了个人徭役。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是法国立宪會議于 1789 年 8 月 20 日通过的。宣言的主要一点就是宣布自由、财产等等是人的天賦的、不可剝夺的权利。——第 719 頁。

444 羅馬教皇庇护九世为了防止人民运动的发展，在 1846 年当选以后，随即出面倡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特赦部分政治犯，廢除书报預檢制度，等等)。——第 719 頁。

445 馬克思指的是“圣彼得堡省世襲領地地主农奴管理条例，圣彼得堡貴族委员会拟訂”。馬克思把这份大約于 1857 年 12 月 5 日出現的文件比做 1628 年 5 月 28 日英国議會向国王查理一世呈递的“权利請願书”，其內容是要求大大限制国王的权力。——第 722 頁。

446 1807 年在普魯士曾实行一次改革，它廢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但保留一切义务和地主对农民的法庭和警察权力。尽管这次改革很不彻底，但是地主們竭力阻撓它的实现，百般反对在农村中实行自治的改革。在 1808 年，他們获得了占有农民土地的权利。虽然在 1811 年曾允許农民有权贖买封建义务，实际上农民由于苛刻的贖买条件并不总能利用这种权利。在普魯士，农民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过程拖延了許多年。——第 725 頁。

447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报纸，出版于 1831 年至 1841 年；該报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 年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庇护。——第 727 頁。

448 死手权 是中世紀的封建主在农奴死后接收其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际农奴所占用的土地和财产在他死后留在他的继承人手中，所以继承人应以实物或現金向封建主繳納一笔极沉重的貢賦，即所謂死手(mainmorte)。——第 728 頁。

449 *Reichsunmittelbarer Fürst* (帝国直隶諸侯)是中世紀日耳曼民族的

神圣羅馬帝国存在时期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德意志邦君。当时普魯士国王也属于这类邦君。——第 729 頁。

- 450 本文是馬克思 1857—1858 年的經濟学手稿的开头部分。这批手稿到现在为止只是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 1939 年用原文发表过一次。編者在发表时加上了这样一个标题：《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馬克思在 1857 年 8 月底至 9 月中所写的“导言”是一篇沒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总导言”是为他計劃中的一部經濟学巨著而作的。馬克思打算在这部經濟学著作中研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問題，同时对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进行批判。这一巨著計劃的要点，馬克思在“导言”里已經提出来了。在繼續研究的过程中，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訂計劃，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經濟学批判”和“資本論”。上述的 1857—1858 年手稿就像是这两部著作的草稿。“导言”是 1902 年在馬克思的文稿中發現的。1903 年在柏林由“新时代”杂志（《Neue Zeit》）用德文发表；1922 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卡·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中第一次用俄文刊載了这一著作。——第 733 頁。

- 451 指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論。这个理論見让·雅·卢梭“社会契約論，或政治权利的原則”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J. J. Rousseau. 《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第 733 頁。

- 452 約·斯·穆勒“政治經濟学原理”1848 年倫敦版第 1 卷第 1 分册“生产”（J. S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London, 1848. Book I, 《Production》）。——第 736 頁。

- 453 J. S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London, 1848. Book I, 《Production》。——第 737 頁。

- 454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 ——規定即否定。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諾莎的这一命題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釋。斯宾諾莎自己用这个說法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見巴·斯宾諾莎“通信集”第 50 封信）。——



第 740 頁。

- 455 这里特別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批判了他在生产和消費之間的关系方面的观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610—614 頁)——第 744 頁。
- 456 亨·施托尔希“論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 年巴黎版第 144—159 頁(H. Storch, «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 Paris, 1824, p. 144—159)。——第 744 頁。
- 457 *Crédit Mobilier*——見注 28。——第 761 頁。
- 458 法瑪 是羅馬人对希腊的傳聞女神俄薩的称呼，象征傳播迅速的流言。——第 761 頁。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6年4月—1859年1月)

### 1856

- 4月14日** 馬克思应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編輯部的邀請，参加了該报創刊四周年紀念会。他被邀請第一个講話，发表了关于无产階級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演說。馬克思指出1848—1849年革命沒有最后完成，他強調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和无产階級胜利。4月19日“人民报”发表了馬克思的演說記錄。馬克思會繼續以写文章和提意見来經常帮助該报編輯琼斯。
- 1856年4月下半月—1857年3月** 馬克思繼續进行他在1856年2月开始的关于十八世紀英俄关系的研究工作。他从英文、德文和法文的外交文件和历史文献中做了摘要，特別是摘录了莫特利、賽居尔、博伊尔等人的著作。
- 4月16日** 馬克思在研究德国产生新的革命高潮的前景时，进一步發揮了工人階級同农民結成联盟的思想。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問題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階級革命。”  
馬克思寄給恩格斯一批資料，其中包括“伊戈尔远征記”。
- 4月25日左右** 馬克思就上院关于將約克公爵紀念像从倫敦滑铁卢广场迁走問題进行的辯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以公爵的

生平活动为例抨击了英国上层貴族社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文章标题是“上院和約克公爵的紀念像”，載于4月26日“人民报”。

**4月26日**

馬克思把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約翰·米凱尔从德国的来信轉寄給恩格斯。米凱尔在信中請馬克思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問題談談他的看法；同时米凱尔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即无产阶级应该避免使用一切可能吓退资产阶级的手段。

**5月初**

馬克思收到阿道夫·哈馬赫尔从科倫写来的一封信，信中以科倫、爱北斐特和佐林根的工人的名义向馬克思致意。由于科倫和杜塞尔多夫的工人組織之間发生了意見分歧，哈馬赫尔請求馬克思从倫敦派一位代表去就地商討萊茵省的工人运动問題。馬克思打算給科倫方面写信，并且为了保密起見，預备通过自己的夫人轉寄。

**5月5日至15日之間**

馬克思把有关科苏特的材料寄給了丹第城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伊曼特。伊曼特在他发表于某些地方报纸上的文章中利用了这部分材料。

**5月中旬**

恩格斯到爱尔兰旅行。他游历了都柏林、高尔威、里美黎克、特勒利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他指出，由于英国人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和他們对爱尔兰施行的殖民政策，爱尔兰人民到处陷于破产和貧困。

**5月16日左右**

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撒丁王国的国内外政策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撒丁”，发表于5月17日“人民报”和5月31日美国“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約自5月18日至6月3日**

馬克思患重病，有时不能工作；医生劝他到倫敦以外的地方去休养。

- 5月23日** 恩格斯从爱尔兰回到曼彻斯特，写信給馬克思。信中深刻地描述了爱尔兰的状况，称爱尔兰为“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
- 6月** 馬克思研究了法国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并写了三篇論文。第一篇論文的标题是“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发表于6月7日“人民报”。全部文章后来以同一标题載于6月21日、24日和7月1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6月—9月** 恩格斯讀了法国軍事作家巴贊庫尔以波拿巴主义的观点撰写的新书“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战局”，并做了摘录，标题是：“圣阿尔諾”。
- 6月7日左右—7月中旬** 馬克思同皮佩尔一起离倫敦赴赫尔，又从赫尔到曼彻斯特去看恩格斯。
- 6月28日—8月2日** “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和倫敦“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这两家报纸以“十八世紀外交史内幕”为題刊登了馬克思搜集的并附以說明和注釋的外交信件和文件。馬克思計劃撰写一本有关十八世紀英俄关系的书，本来預备以这些文件的发表作为开端。但馬克思后来停止发表“内幕”，因为編輯部对文稿加以歪曲和任意删节。
- 約7月初** 馬克思事先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作了研究，然后在給米凱尔的信中詳細地論述了德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問題。馬克思說明，在未来的革命中，农民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同盟軍。他坚持必須同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米凱尔在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們中間傳閱了馬克思的信。
- 7月25日—8月初** 由于馬德里发生了七月革命事件，馬克思写了兩篇描述和評价 1856 年西班牙革命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

- 載于8月8日和18日“紐約每日論壇報”。
- 8月初** 恩格斯的表兄弟埃·布兰克建議为因参加1848—1849年革命而在德国被通緝的恩格斯向普魯士当局申請赦免,恩格斯予以回絕。
- 8月下半月** 恩格斯到倫敦探望在英国小住的母亲。
- 1856年8月16日—  
1857年4月1日** 倫敦報紙“自由新聞”以“十八世紀外交史内幕”为題,发表了馬克思为計劃撰写的关于十八世紀英俄关系一书所做的长达五个印張的序言。同第一次在“設菲尔德自由新聞報”和“自由新聞”上发表的“内幕”不同,这次刊登得比較完全。序言的很大部分包括外交信件、文件和历史論文。馬克思計劃用二十个印張的篇幅撰写的这本著作沒有完成。
- 8月30日左右** 馬克思从威·沃尔弗那里得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德国无产阶级詩人格奥尔格·維尔特在哈瓦那逝世的消息。
- 9月8日左右—12月** 馬克思因夫人患病和迁移新居而忙于家务,这占去馬克思很多時間,所以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文章很少。
- 9月中旬** 馬克思收到德納退回來的恩格斯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十五篇和馬克思本人所写的关于多瑙河各公国的文章三篇。这些文章因“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在該報編者、泛斯拉夫主义者古罗夫斯基的影响下未予发表。
- 9月22日** 馬克思同美国普特南出版公司的代表奥姆斯特德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德国詩人、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斐·弗萊里格拉特,馬克思在倫敦与弗萊里格拉特經常往来。奥姆斯特德請馬克思针对巴贊庫尔的那本书撰文論述克里木战争,并写一些关于“攻堡战舰”以

- 及其他軍事題目的文章。此外他还請馬克思撰写关于不久前逝世的亨·海涅的文章。
- 9月26日左右—10月17日左右**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发生危机，馬克思最初就这个題目写了四篇文章。其中三篇作为社論发表于10月9日、27日和11月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一篇作为通訊以“欧洲的金融危机”为題于10月15日发表。
- 9月26日** 恩格斯告訴馬克思，他打算为格奥尔格·維尔特写一篇追悼文，交給一家柏林报纸发表。他談到自己对日益临近的經濟危机的征兆和前景的感想，推測危机将在1857年夏天爆发。
- 10月** 鉴于經濟危机日益临近，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經濟学，特別着重研究了白銀問題。
- 10月初** 馬克思迁往倫敦比較适合于健康的地区居住。住址是：汉普斯泰德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花园，格拉弗頓坊9号。
- 10月3日以后** 馬克思收到德国流亡者理·萊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Crédit Mobilier的年度报告，并在写文章时加以利用。
- 1856年10月下半月—1857年3月** 馬克思研究了波兰的历史，对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革命中的波兰問題特別注意，他得出結論說，从1789年起，所有革命的强烈程度和生命力，都可以根据它們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衡量出来；他讀了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波兰在欧洲均势中的作用”一书和列列韦尔的“波兰史”第1卷、“論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
- 10月30日左右** 恩格斯写完了論巴贊庫尔那本书的文章，文章标题是“圣阿尔諾”。馬克思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并把它投給紐約杂志“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

編輯部；但是文章未予发表。

**10月30日**

鉴于英国政府准备出兵远征波斯灣，夺取哈腊克(哈尔格)島，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波斯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英国在亚洲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对文章大加删节，直到1857年1月7日才作为社論刊登出来。

**11月7日左右和11月21日左右**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两篇关于欧洲金融和貿易危机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11月22日和12月6日在該报发表。

**11月下半月**

恩格斯为了准备給“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組文章而研究了有关海軍方面的文献，讀了威·詹姆斯的“英国海軍史”一书，这主要是为了写“攻堡战舰”这个題目。

**11月17日**

恩格斯告訴馬克思一系列事实，这些事实证明欧洲金融危机的尖銳化，法国危机的迫近，拿破侖第三的冒險政策和正在法国形成的有利于发动革命的条件，以及无产階級政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

**11月底**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两篇关于奥地利的經濟論文。文章标题是“奥地利的海外貿易”，于1857年1月9日和8月4日先后发表。

**12月2日左右**

鉴于普魯士同瑞士之間因紐沙特尔問題发生了冲突，馬克思研究了普魯士的历史。他把自己对普魯士历史的許多批評意見告訴了恩格斯，并就这方面的問題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标题是“霍亨索倫王朝的神权”，发表于1856年12月13日“人民报”和1857年1月9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1857

**1月—2月**

馬克思写文章(沒有写完)批駁布魯諾·鮑威尔所写的

关于俄国和英国的小册子。同时馬克思还研究了俄国的历史,并做了 973 年至 1676 年的俄国历史事件一覽表,讀了拉勒斯泰德的“*斯堪的那維亞,它的忧患和希望*”一书。

**1月—3月**

恩格斯为营业所的工作所累,差不多根本没有时间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文章。

馬克思研究了雷尼埃的“*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并做了摘录。

**1月7日**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寄去一篇关于英中在广州发生冲突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詳細地分析了作为在中国爆发第二次鴉片战争的导火綫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事件。文章作为社論于 1 月 23 日在該报发表。

**1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就紐沙特尔問題所引起的普魯士和瑞士的冲突,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山地战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 1 月 27 日在該报发表。

**1月下半月**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第二篇关于山地战的文章。馬克思写了一篇金融論文。两篇文章都沒有发表。

**1月20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紐約每日論壇报*”約有三个星期沒有刊登他和恩格斯所写的文章。

**1月27日左右—2月初**

鉴于英国和波斯发生战争,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波斯的侵略計劃的文章;恩格斯写了一篇展望英波战争的文章;两篇文章都作为社論于 2 月 14 日和 19 日在該报发表。

**2月5日**

馬克思收到米凱尔的信,信中約請他为汉堡杂志“*世紀*”(«*Das Jahrhundert*»)撰稿。但馬克思因該杂志具有小資产階級傾向而予以謝絕。



- 2月6日** 馬克思写信給德納，要求解釋“紐約每日論壇報”很少刊登他的文章的原因，并表示打算脫离該報。
- 2月中旬—7月初** 馬克思繼續研究經濟方面的文獻，特別是图克的剛剛問世的“价格史”第5卷和第6卷、麦克勞德的“銀行業務的理論与实践”，并从这些著作中做了摘录。
- 2月20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了一篇題为“英国的新預算”的文章。文章于3月9日在該報发表。
- 2月27日** 馬克思写了“議會关于对华軍事行动的辯論”一文。文章載于3月16日“紐約每日論壇報”。
- 3月—7月** 馬克思由于夫人健康状况大大恶化以及物质生活条件极端困窘，只能勉强从事工作。由于沒有錢而付不出房租。4月間馬克思自己也病了。
- 3月6日—4月7日** 由于英国进行新的議會选举，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了五篇文章：“帕麦斯頓內閣的失敗”、“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頓、布萊特和基卜生的失敗”和“选举的結果”。文章于3月25日、31日，4月6日、17日、22日在該報发表。
- 3月18日左右**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了一篇关于俄国对华貿易的文章。文章于4月7日作为社論发表。
- 3月21日** 馬克思接到德納于3月5日的来信。德納在信中請馬克思不要脫离“紐約每日論壇報”，他答应馬克思每周只照付一篇文章的稿酬，不論它发表与否；其余的文章則发表后才付稿酬。这样，該報編輯部就把馬克思的稿酬折掉了一半。馬克思由于物质生活状况困难，被迫同意这些条件。
- 3月22日左右** 馬克思又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了一篇关于英中在广州发生冲突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4月10日在該報发表。

- 4月初**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文章，論述英国人因英中冲突而派兵征討中国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闡釋了在中国第一次鴉片战争时期所采取的軍事行动的起因和过程。文章作为社論于4月17日在該报发表。
- 4月7日和10日** 由于公布了1856年度英国工厂視察員的报告，馬克思写了“工厂工人状况”和“英国工厂制度”两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英国工厂主对工人的殘酷剝削；文章載于4月22日和2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4月14日和28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新选出的下院的文章，其中談到曼彻斯特学派、輝格党和托利党，还写了一篇关于奥地利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沒有发表。
- 4月16日左右** 恩格斯应病中的馬克思的請求，写了一篇关于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俄国軍隊实行改革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发表于5月6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4月21日** 馬克思接到德納于4月6日的来信。德納在信中約請馬克思为他所筹划的一部百科辞典——“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要馬克思撰写軍事方面以及某些其他方面的条目。馬克思先同恩格斯研究以后，复信表示同意。
- 4月底—10月** 恩格斯由于长久患重病，因此对于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写軍事評論文章不能給予經常的帮助。
- 5月** 馬克思学习瑞典文和丹麦文。
- 5月1、12和15日** 馬克思写了三篇金融論文，論述英国皇家銀行的投机活动和法国的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其中一篇以“英国的金融舞弊”为題，作为通訊发表于5月16日“紐約每日論壇报”，另外两篇則作为社論于5月30日和6月1日发表。

- 5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波斯和中国”一文。文章于6月5日在該报发表。
- 5月23日** 馬克思收到德納在5月8日的来信。信中附有“美国新百科全书”第1卷《A》字头的軍事条目单子,并請馬克思特別注意“军队”和“炮兵”这两条;德納还要馬克思以英美讀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撰写有关美学的条目。他詢問馬克思是否同意供給关于欧洲工商界名人的稿子。馬克思向恩格斯了解有关这一問題的材料。
- 5月26日** 馬克思写了对奥当奈尔在西班牙参議院就西班牙1854年革命时期的事件所做的演說的批評意見。馬克思的这些批評意見以“有趣的揭露”为題,載于6月1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5月28日** 恩格斯把他要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A》字头軍事条目单子寄給馬克思。
- 5月底—6月** 由于德納要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关于美学的条目,馬克思研究了弗·費舍、E. 弥勒等人的著作。
- 1857年6月—1858年2月** 在研究政治經濟学的同时,馬克思为了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稿,在英国博物館的圖書館里进行了許多搜集資料的工作。他研究了古代的(埃及和亚述的、古希腊羅馬的)軍事史,并从威金逊、克劳塞維茨、施洛塞尔、繆弗林等人的著作中做了札記和摘录。
- 6月上半月** 恩格斯到倫敦。
- 6月2日和12日** 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新的法兰西銀行法的文章;由于英国和波斯的战争結束,他又写了一篇关于3月4日在巴黎簽訂的英波和約的文章。前一篇作为社論,后一篇以“与波斯簽訂的条約”为題作为通訊,載于6月20日和2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6月19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注明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国的伪善”。文章没有发表。
- 約6月27日** 馬克思收到德納寄来的“美国新百科全书”«B»字头所需条目的单子。
- 6月29日** 馬克思把德納于6月11日的来信轉寄給恩格斯。德納在信中不主張写“关于堡垒和战舰”的文章,因为“普特南氏月刊”的新編輯部不保证刊登这种文章。德納还退回了恩格斯就巴贊庫尔那本书所写的、未被編輯部采用的文章“圣阿尔諾”。
- 6月30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印度军队起义的文章。从这篇文章开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大組文章論述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这篇文章作为社論于7月15日发表。
- 7月** 馬克思撰写一篇經濟論文,反駁庸俗經濟学家、主張階級利益和諧的“理論家”巴师夏和凱里。論文沒有完成。
- 1857年7月—1858年3月** 为了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稿,恩格斯研究了呂斯托夫、凱、若米尼、克勞塞維茨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 7月10日** 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欧洲局势的文章。文中特別闡釋了法国財政状况的問題。文章作为社論发表于7月2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7月10日左右—24日**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第一批«A»字头条目。馬克思于7月24日將它們寄往紐約。这些条目于1858年发表。
- 7月14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对他的健康状况恶化表示非常担心,劝恩格斯立即放下营业所的工作,到海濱去

- 疗养,还劝他停止为百科全书撰稿。
- 7月17日—8月14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五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作为通訊于8月4日、14日、18日和29日发表。标题是:“印度起义”、“印度問題”、“印度起义的現状”、“印度起义”;其中一篇无标题。
- 7月24日—28日** 馬克思为了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稿而搜集有关西班牙舰队的資料;关于这个問題他做了大量的摘录,并把这些摘录寄給恩格斯。
- 7月28日—11月6日** 恩格斯在利物浦附近的滑铁卢、威特島和澤稷島等地海濱疗养。
- 8月** 恩格斯着手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军队”条。
- 8月上半月** 馬克思因恩格斯患病而研究了法、英、德等国的最新医学文献資料,以寻求对恩格斯所患病症的說明和治疗方法。
- 8月7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印度起义”一文。文章沒有发表。
- 8月10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阿富汗”和“攻击”两个大条目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余的《A》字头条目;所有这些条目都寄給了馬克思,以便寄往紐約。这些条目于1858年发表。
- 8月11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文論述欧洲列强圍繞着莫尔达維亚的选举問題所进行的外交斗争。文章标题是“东方問題”,于8月27日发表。
- 8月中旬** 从美国回来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康拉德·施拉姆拜訪了馬克思。
- 8月21日** 馬克思就帕麦斯頓在下院的演說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欧洲政治形势述評。述評作为社論于9月5

- 日发表。
- 8月26日** 馬克思把德納拟出的“美国新百科全书”◀B▶字头所需条目的单子寄給了恩格斯。
- 8月28日—10月30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八篇文章，論述印度起义、英国駐印当局对印度人民实行的压迫政策和东印度公司。其中七篇作为社論于9月15日、17日、21日，10月3日、13日、23日和11月14日发表；一篇作为通訊，以“印度起义”为題，于9月16日发表。
- 8月底—9月中旬** 馬克思着手写作他的經济学巨著，草拟了这一著作的“导言”。“导言”簡要地分析了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分配、交换、消費之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生产关系和法的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等等关系之間的辯证联系問題。馬克思在“导言”中还簡單地說明了自己对經济現象的研究方法的实质。他在“导言”的末尾拟出了他的整个經济学著作計劃的基本要点。“导言”沒有写完。
- 9月—10月**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不下十八个条目，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条；馬克思也在同时給百科全书写完了“舰队”条和九篇軍事活动家的傳記以及革命家罗·勃魯姆和約·貝姆的傳記；所有这些条目差不多都是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于1858年发表。
- 9月8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法国的銀行Crédit Mobilier 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9月26日在該报发表。
- 9月15日—10月23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两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和五篇关于波拿巴的財政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沒有发表。
- 9月21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交战”这一大条目。

該条于 1858 年发表。

9月24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军队”条。在这一条以及其他军事条目中，恩格斯第一个从唯物主义立场阐释了军事学术的全部历史，远起上古时代，近至与他同时的资产阶级军队。该条于 1858 年发表。

9月25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对他所写的“军队”条給予很高的评价，同时提醒恩格斯注意某些在条目中没有闡明的问题。

1857年10月—1858年2月底

馬克思詳細地研究了普遍的經濟危机的发展，搜集了大量有关英、美、德、法以及其他国家的危机过程的材料。馬克思做了摘录、剪报，在报刊文章中标划重点，同时准备了专题笔记本，记录这些国家的危机所引起的主要过程和现象；他同恩格斯在通信中討論了危机问题，恩格斯向他提供了許多有关曼彻斯特的危机发生过程及其后果的材料。

10月

馬克思写了“货币”这一章，揭露了蒲魯东关于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实行“劳动货币”制的思想的空想性质，阐释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学說的基本原理。

10月初

馬克思到圣黑利厄尔（在澤稷島）去看恩格斯，并探望正在患結核病的康拉德·施拉姆，这时施拉姆的經濟极为困难。馬克思答应介紹他为美国报刊写通訊稿。

10月6日

恩格斯把“美国新百科全书”的«C»字头所需条目的单子寄給馬克思。

10月6日—29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屢次談到哈尼在澤稷的生活情况和康拉德·施拉姆的健康状况。恩格斯在圣黑利厄尔居住时常常同他們見面。

10月26日

馬克思收到德納于 10 月 13 日的来信。信中說，由于經濟危机的影响，“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解聘了除

- 馬克思和布·泰勒以外的所有歐洲通訊員；要求馬克思每周只写一篇文章，同时最近时期主要写关于印度战争和关于危机的稿子。
- 1857年11月—1858年1月初** 馬克思在报纸上非常注意厄·琼斯的政治活动。琼斯由于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席位，越来越向资产阶级激进派让步。馬克思打算去拜访琼斯，向他敲一下警钟，但是，由于他继续发表机会主义的言论，馬克思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 1857年11月—1858年6月** 馬克思写了内容广博的“資本”这一章，在其中相当详细地分析了資本的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并粗略地阐释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原理。在“資本”这一章的开头，馬克思草拟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计划，他准备在这部著作中考察如下几个问题：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
- 11月6日** 恩格斯经过长时间的海滨疗养以后回到曼彻斯特。
- 11月6、13和27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三篇关于英国经济危机的文章。两篇作为社论于11月21日和12月15日在该报发表，一篇作为通讯，以“英国贸易的震荡”为题于11月30日发表。
- 11月15日** 恩格斯把自己对于经济危机发展过程的观察告诉了馬克思，他谈到经济危机在英国的表现、危机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化的影响，他说革命已经在望，因此正在加紧研究军事。
- 11月16日** 应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写了一篇关于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主要中心之一——德里城被英军攻占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12月5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11月24日以后** 馬克思从伊曼特那里得到消息说，在科伦审判案中被判处监禁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貝克尔和賴夫获释



- 出獄；消息又說畢爾格爾斯、諾特容克和勒澤爾還要在獄中監禁一年。
- 11月26日左右 恩格斯為“美國新百科全書”寫完關於炮兵史的一個大條目。這一條以“炮兵”為題於1858年發表。
- 12月4、18和25日 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三篇關於歐洲危機的文章。這些文章作為社論於1857年12月22日和1858年1月5日、12日在該報發表。
- 12月11日 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一篇關於英國的生產和在英國日益臨近的工業危機的文章。文章沒有發表。
- 12月18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表示想同恩格斯合寫一本論危機的小冊子，計劃到1858年春天用德文出版。
- 12月21日 馬克思接到維也納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新聞報”（《Die Presse》）編輯麥克斯·弗里德蘭德通過拉薩爾轉來的約稿信。弗里德蘭德約請馬克思從倫敦給該報寄發通訊。由於該報贊同帕麥斯頓的政策，馬克思沒有答應寫政論文章。
- 12月25日 馬克思把自己關於法國危機發展的結論寫信告訴恩格斯。

## 1858

- 1月上半月 馬克思在探討利潤問題時，重新讀了黑格爾的“邏輯學”。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如果有時間，他“很願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常人的理智都能夠理解”。
- 1月4日和14日 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兩篇關於印度起義第二個大中心——勒克璣的圍困和強攻的文章。前一篇

- 作为社論，后一篇以“勒克璣的解救”为題，作为通訊于1月30日和2月1日在該报发表。
- 1月7日左右**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英国的貿易”一文，文章于2月3日发表。
- 1月7日** 恩格斯写完了“美国新百科全书”的«C»字头所需的第一批条目。这些条目于1859年发表。
- 1月8日—28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約十一个条目。这些条目于1858—1859年发表。
- 1月22日** 馬克思写了“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債”一文。該文发表于2月9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1月23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德納要求給百科全书写一篇关于印度起义历史的小条目。但是由于缺乏資料，馬克思不主張恩格斯写这一条；恩格斯在回信中建議以后再写这个条目。
- 1月29日**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請他解釋各种企业中資本周轉的問題和資本周轉对利潤和价格的影响問題。
- 1月29日—5月** 馬克思讀了拉薩尔的“爱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并在給恩格斯和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中予以批評；认为这本书是用老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写的，是“非常幼稚的粗糙的作品”。
- 2月2日**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温德姆將軍在印度战敗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2月20日在該报发表。
- 2月5日—26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四篇文章，論述拿破侖第三的国内政策、波拿巴政府的財政措施和法国的經濟危机、英法联盟。三篇文章作为社論于2月22日、3月12日和15日发表，一篇作为通訊，以“御用軍

人的統治”为題于3月12日发表。

**2月10日**

馬克思收到弗萊里格拉特轉交來的一位參加過1848—1849年革命、住在美國的德國流亡者弗里德里希·康姆從紐約寫來的一封信。信中說，在紐約建立了一個由三十人聯合組成的德國共產主義協會。康姆寄來一份協會的章程，并向馬克思詢問歐洲共產黨，特別是德國共產黨的狀況，同時還向馬克思索寄最近五年中發表的共產主義文獻和若干份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馬克思準備在未從恩格斯、沃爾弗、弗萊里格拉特和伊曼特那里把康姆了解清楚以前，不作答復。

**2月22日**

馬克思在給拉薩爾的信中托他打聽有無可能在柏林出版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馬克思打算分別出版自己的論著，因為他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來寫成整整一部書；馬克思把自己寫作的總計劃告訴了拉薩爾，同時還告訴他，同意每星期為維也納的“新聞報”寫一篇關於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金融和貿易的文章。

**3月初**

馬克思為了探討工業再生產的周期而研究機器磨損問題，特別是閱讀了拜比吉的“論機器和工業的經濟”，請恩格斯說明機器設備更新的間隔時間平均有多久。

**3月2日**

馬克思提醒恩格斯注意他們的信件被警察偷看。

**3月4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詳細地解釋了生產過程中機器設備的折舊問題。

**3月9日**

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一篇關於迪斯累里在下院的演說的文章；文章沒有發表。

**3月11日—4月22日**

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七篇關於拿破侖第三的國內政策和關於英法聯盟的文章。文章標題是：“時代的表征”、“波拿巴目前的狀況”、“佩利西埃在英國的使命”、“馬志尼和拿破侖”、“倫敦的法國人審判案”、

- “英法联盟”，这些文章先后于3月30日，4月1日、15日、27日，5月8日、11日发表；还有一篇没有标题的文章，于4月30日发表。
- 3月下半月—4月** 馬克思的肝炎发作，因此不能够从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述。
- 3月29日** 馬克思得到拉薩尔的通知說，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答应印行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头两分册。
- 4月2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明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詳細計劃。著作将包括六册：“(1)資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場。
- 一、資本共分四篇：(a)資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題目)。(b)竞争……(c)信用……(d)股份資本……”
- 第一册第一篇“資本一般”将包括三章：1. 价值、2. 货币、3. 資本。
- 4月15日和5月8日**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两篇关于英国军队攻占勒克瑙的詳情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4月30日和5月25日在該报发表。
- 4月20日和30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迪斯累里先生的預算”和“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两篇文章，文章于5月7日和20日在該报发表。
- 4月29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強調在俄国开展的农奴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 5月6日—24日左右** 馬克思到曼彻斯特与恩格斯同住。馬克思为了恢复健康而从事体育鍛炼和騎馬活动；他同时也从事“資本”这一章的写作。
- 5月14日和25日** 由于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宣布沒收参加印度起义的奥德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

- 两篇論述奧德王国的被兼并和印度土地占有制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5月28日和6月7日在該报发表。
- 5月27日** 馬克思写了一篇論述波拿巴的財政手腕和法国加强軍事專制的文章；文章未加标题載于6月1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5月底—7月6日** 恩格斯写了三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作为社論发表于6月15日、26日和7月2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5月31日** 馬克思在給拉薩尔的信中，托拉薩尔告訴出版商敦克尔，他由于患病，延期交出他的經济学著作的第一分册的稿子，他保证将加紧进行工作；在同一封信里，馬克思还談了他对拉薩尔“爱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意見，指出該书的重要缺点。
- 6月—8月初** 馬克思因夫人和女儿爱琳娜患病，非常需要錢。經過弗萊里格拉特帮忙，用恩格斯出面的期票弄到一笔錢以后，立即送夫人到兰茲格特去疗养和休息几个星期。
- 6月上半月** 馬克思为他在1857年8月和1858年6月之間所写的經济学文稿編制索引。
- 6月8、11和18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三篇关于英国的文章。两篇作为通訊，以“英国的貿易状况”和“英国政府和奴隶貿易”为題，于6月21日和7月2日发表，一篇作为社論于6月24日发表。
- 6月21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騎兵”这一大条目。这个条目于1859年发表。
- 6月29日** 馬克思就布萊特在下院的演說写了一篇关于印度稅收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发表于7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6月底左右** 馬克思在弗萊里格拉特的住所同匈牙利革命家克拉普卡會見。
- 7月2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魏德迈从美国写来的信。魏德迈向馬克思介紹紐約的阿尔勃萊希特·康普，还述說了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在美国成立无产阶级常設机构的困难。
- 馬克思同时也收到了康普从紐約写来的信。康普向馬克思介紹了他和弗里德里希·康姆共同創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康普請求把在美国宣傳科学共产主义所必需用的馬克思“哲学的貧困”这一著作，以及若干份“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寄給他，并要求同协会保持經常的联系。
- 7月9日** 馬克思写了一篇文章，論述下院通过的关于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最高权力的法案。文章作为社論发表于7月2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7月14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把自己研究比較生理学、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情况告訴馬克思。恩格斯得出結論說，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越来越证明用辯证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自然界是正确的。恩格斯在以后几年仍繼續研究自然科学。
- 8月初—11月中旬** 馬克思从事自己的經济学著作第一分册的写作，他重新写了货币这一章。为了写这一章，他讀了麦克拉倫的剛剛問世的著作“货币流通史大綱”。
- 8月6日和10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两篇关于1844年罗伯特·皮尔的銀行法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8月23日和28日在該报发表。
- 8月17日和20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两篇关于中国和关于

古巴奴隶买卖的文章; 文章沒有发表。

- 8月31日—9月28日** 馬克思写了四篇关于对华鴉片貿易史和关于天津和約的文章。三篇文章作为社論, 另外一篇以“中国和英国的条約”为題作为通訊, 先后載于9月20日和25日, 10月5日和15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9月14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英国的貿易和金融”一文。文章于10月4日在該报发表。
- 9月17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 文章作为社論于10月1日在該报发表。
- 9月20日和21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論述对华条約的文章和一篇批評馬志尼的新宣言的文章。前一篇沒有发表。馬克思批評宣言的那一篇以“馬志尼的新宣言”为題載于10月13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10月1日、12月29日和31日** 馬克思写了三篇关于俄国廢除农奴制問題的文章。一篇作为社論, 其他两篇以“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为題, 作为通訊, 載于1858年10月19日和1859年1月1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10月2日—12月4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十篇关于普魯士国内政策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普魯士国王的瘋癲症”、“普魯士的摄政”、“普魯士状况”、“新內閣”, 先后于10月23日、27日, 11月3日、8日、24日、27日和12月3日、13日、27日发表。
- 10月7日** 恩格斯就琼斯走上同資产階級自由派密切合作的道路一事, 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指出英国工人階級的資产階級化, 揭示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根源。恩格斯把英国工人运动中宪章运动的低落和机会主义的暂时胜利, 直接同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断地位、同英国占有广大殖民地联系起来。

- 10月8日—2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通信中討論大陸上无产階級运动的前景。
- 11月2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对蒙塔郎貝尔的起訴”一文。文章于11月24日在該报发表。
- 1858年11月中旬—  
1859年1月21日** 馬克思写了新的一章：“商品”，修改了貨币这一章，对全部手稿进行整理和最終定稿；他給这批稿子加上标题：“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册。資本。第一篇。資本一般”，然后寄交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第一分册从原定的五六个印張扩充为十二个印張，并且不像預計的那样包括三章，而是两章：“商品”和“貨币或简单流通”。第三章“資本一般”，馬克思决定在第二分册里发表。
- 11月19日左右**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法国波拿巴政府的粮食价格調整計劃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于12月15日在該报发表。
- 11月底**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文章，对1858年欧洲的社会政治运动做了总结；同时他指明了欧洲的普遍政治觉醒的征兆。文章作为社論于12月23日在該报发表。
- 12月14日和21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一篇关于英中和約的文章和一篇关于布坎南的信件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沒有发表。
- 1858年12月17、29日  
和1859年1月11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下面几篇文章：“伊奥尼亚群島問題”、“爱尔兰的惶恐”和“普魯士状况”，这些文章先后于1859年1月6日、11日和2月1日在該报发表。



## 人名索引

### 三 画

小皮特, 威廉(Pitt the Younger, William 1759—1806)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1783—1801, 1804—1806)。——第 7、9、432、435、457、480、559 頁。

大卫·丹热, 比埃尔·让(David d'Angers, Pierre Jean 1788—1856) ——著名的法国雕塑家, 左派共和主义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第 85 頁。

大胆查理(Karl der Kühne 1433—1477) ——勃艮第公爵(1467—1477)。——第 105 頁。

大莫臥儿——見巴哈杜尔-沙赫二世。

大莫臥儿王朝(Great Moguls) ——印度赫谿沙赫的王朝(1526—1858)。——第 127、259 頁。

土孔尼(Tukony) (又名塞里姆-阿加 Selim-aga) ——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者。——第 594、597 頁。

### 四 画

文翰, 賽米尔·乔治(Bonham, Samuel George 1803—1863) ——英国殖民官员, 1847—1852 年任香港总督, 同时負責处理对华外交事务并监督对华貿易。

——第 115、177 頁。

丹納尔, 路易莎·克里斯蒂娜(Danner, Luise Christine 1815—1874) ——女伯爵, 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門戶悬殊的配偶。——第 290 頁。

邓达斯, 亨利(Dundas, Henry 1742—1811) ——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苏格兰檢察长(1775—1783), 內务大臣(1791—1794),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793—1801), 陸軍大臣(1794—1801), 海軍首席大臣(1804—1805)。——第 7 頁。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Zamojski, Wladislaw) ——伯爵, 波兰大地主, 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君主主义保守派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克里木战争时企图組織波兰軍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 512、515 頁。

孔查, 曼努埃尔·古蒂埃雷斯·德·拉(Concha, Manuel Gutiérrez de la 1808—1874) ——西班牙將軍, 属于溫和派; 1843 年反埃斯特帕特罗密謀的参加者, 镇压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組織者之一。——第 42、50 頁。

比埃里, 朱澤培·安得列阿(Pieri, Giuseppe Andrea 1808—1858) ——意大利革命家, 因与奥尔西尼共同謀刺拿破侖第三而被处死。——第 442 頁。

- 比埃特里,比埃尔·瑪丽(Pietri, Pierre Marie 1809—1864)——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2—1858)。——第419、438頁。
-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断續担任“新聞报”編輯;在政治上毫无原則。——第81頁。
- 日罗姆——見波拿巴,日罗姆。
- 日罗姆·拿破侖——見波拿巴,日罗姆。
- 戈东諾夫,波利斯(Годунов, Борис 1551左右—1605)——俄国沙皇(1598—1605)。——第716、717頁。
- 戈登,亚历山大(Gordon, Alexander)——英国上校,阿伯丁勋爵之子。——第9頁。
- 戈登,阿瑟·查理·汉密尔顿(Gordon, Arthur Charles Hamilton 1829—1912)——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后为自由党人;1854—1857年为議会議員;1861年至1890年历任英国各殖民地总督;阿伯丁勋爵之子。——第194頁。
- 戈登,詹姆斯·威洛比(Gordon, James Willoughby 1773—1851)——英国上校,1804—1809年为約克公爵的軍务秘书。——第9頁。
- 戈登,約翰(Gordon, John)——英国少校,1801年在多米尼加島駐軍中供职。——第9頁。
- 戈登,罗伯特(Gordon, Robert 1791—1847)——英国外交家,曾任駐君士坦丁堡(1828—1831)和駐維也納(1841—1846)的特派大使。——第9頁。
-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Bahadur-Shah II 1767—1862)——印度大莫臥儿王朝最后一个赫諦沙赫(1837—1858);从1849年起靠英国人供养,实际上被剥夺了政权;1857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被起义者重新立为皇帝;1857年9月德里落后被英軍逮捕并流放到緬甸(1858)。——第259、323、334頁。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資本主义的热心辯护者。——第734頁。
- 巴罗,阿道夫(Barrot, Adolphe 1803—1870)——法国外交家,1845年任駐埃及总領事。——第249頁。
-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首領;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內閣。——第256、698頁。
-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 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閣。——第421頁。
- 巴納德,亨利·威廉(Barnard, Henry William 1799—1857)——英国將軍,1854—1855年参加克里木战争;1857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指揮一支圍攻德里的英国軍隊。——第269、273—276、283、284、286、297—299、328頁。
- 巴夏礼,斯密斯(Parkes, Harry Smith 1828—1885)——英国外交家;任駐广州領事时制造了成为第二次对华鴉片战争(1856—1858)序幕的英中冲突;駐广州的三个欧洲监察員之一(1858—1859、1860—1861),駐上海領事(1864

—1865)、駐日公使(1865—1883)。——第112—114、149、150、164、176—177頁。

巴尔貝斯, 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法国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第3頁。

巴拉盖·狄利埃, 阿希尔(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元帅, 拿破侖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 后来轉向波旁王朝;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議員,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430頁。

## 五 画

瓦揚, 让·巴蒂斯特·菲利貝尔(Vailant, Jean Baptiste Philibert 1790—1872)——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陸軍大臣(1854—1859)。——第429頁。

瓦吉德·阿利-沙赫(Wajid Ali-shah)——奧德国王(1847—1856)。——第503頁。

瓦尔德克, 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奧(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 职业是律師; 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副議長和左派领导人之一; 后为进步党人。——第652、690頁。

瓦尔德斯(Valdez)——西班牙將軍, 1854—1856年革命的参加者。——第45、46、545頁。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約瑟夫·科倫納(Walewski, Alexan-

dre Florian Joseph Colonna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國家活动家, 拿破侖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姬伯爵夫人的儿子; 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 曾任外交大臣(1855—1860); 主持过巴黎會議(1856)。——第19、435頁。

包令, 約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 边沁的信徒, 自由貿易派, 高級殖民官員; 1847—1852年任駐廣州領事, 1854—1857年任香港的总督、总司令和海軍副司令, 同时負責处理对华外交事务并監督对华貿易; 促成1856—1858年第二次对华鴉片战争的爆发。——第113、149—153、157、159、164、176、310頁。

边沁, 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資產階級社会学家, 功利主义理論家。——第150頁。

白金汉公爵, 亨利·斯泰福(Buckingham, Henry Stafford 1454左右—1483)——英国封建主, 曾助理查三世登上王位, 后叛变被处死。——第161頁。

汉利, 約瑟夫·沃訥(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國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1852、1858—1859)。——第663頁。

汉特, 弗里曼(Hunt, Freeman 1804—1858)——美国政論家, “商人杂志和商业評論”的出版者。——第585頁。

汉澤曼, 大卫(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資本家, 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之一; 1848年3—9月任普魯士財政大臣, 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677、678頁。

加內特, 耶利米(Garnett, Jeremiah

- 1793—1870)——英国記者，“曼彻斯特卫报”的创办人之一，1844年至1861年任該报編輯。——第184頁。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 Louis 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員。——第264頁。
- 加尔涅-帕热斯，埃蒂耶納·約瑟夫·路易(Garnier-Pagès, Etienne Joseph Louis 1801—1841)——法国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30年革命后領導共和党反对派；众議院議員(1831—1834、1835—1841)。——第264頁。
- 叶名琛(卒于1859年)——中国国家活动家，曾任两广总督(1852—1857)。——第112—117、159、177、662頁。
-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110、167、651、717頁。
- 古列阿，伊格納西奧(Gurrea, Ignacio)——西班牙將軍，进步派。——第46頁。
-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第109頁。
- 卡杜达尔，若尔日(Cadoudal, Georges 1771—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1793年万第的反革命暴动的参加者，朱安党人的首領；多次试图在法国发动保皇暴动；1804年因在巴黎策划保皇政变而被处死。——第459、460頁。
- 卡龙赫-伊-費諾勒特，埃烏謝比奧(Calonge y Fenollet, Eusebio 1814—1874)——西班牙將軍；曾参加卡洛斯派战争，站在女王伊薩伯拉二世方面；1854年为潘普洛納鎮守司令。——第235頁。
- 卡耳馬尔(Kalmar)——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者。——第594、597頁。
- 卡尔-路德維希-約翰(Karl-Ludwig-Johann 1771—1847)——奧地利大公，元帥和軍事作家；在历次对法战争(1796、1799、1805和1809)中任总司令；曾任陸軍大臣(1805—1809)。——第124頁。
- 卡尔斯从男爵，威廉——見威廉斯，威廉·芬威克。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1831—1848)；1848年5月起为陸軍部长，极端殘酷地鎮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腦(1848年6—12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侖第三的政府。——第256、308、429頁。
- 卡洛斯，唐(Carlos, Don 1788—1855)——斐迪南七世之弟，西班牙王位追求者；曾領導反动的封建教权派发动內战(1833—1840)。——第49、51、52頁。
- 卡德威尔，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最初歸屬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領袖之一，后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貿易大臣(1852—1861)，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陸軍大臣(1868—1874)。——第194、575頁。
-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1769

- 1822)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1805—1806、1807—1809), 外交大臣(1812—1822); 以自杀終。——第 60、165、435、457、712 頁。
- 卡斯特朗, 艾斯普里·維克多·伊丽莎白·博尼法斯 (Castellane, Esprit Victor Élisabeth Boniface 1788—1862) ——法国元帅, 1850 年起任里昂卫戍司令, 1859—1862 年任里昂軍区司令。——第 430、440 頁。
- 卡桑尼亚克——見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 卡波第斯特里亚, 約翰 (Kapodistrias, Ioannes 1776—1831) ——伯爵, 希腊国家活动家, 1809—1822 年在俄国任职, 1814—1815 年参加維也納會議的工作; 1815—1822 年任俄国外交副大臣, 1827—1831 年任希腊总统。——第 708 頁。
- 伊范泰, 法孔多 (Infante, Facundo 1786—1873) ——西班牙將軍, 进步派; 曾任議會議长 (1854—1856), 陸軍大臣 (1860—1863、1865—1868)。——第 44 頁。
- 兰斯唐侯爵, 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 (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財政大臣 (1806—1807), 樞密院院长 (1830—1841、1846—1852), 不管部大臣 (1852—1863)。——第 6、10、16 頁。
- 兰斯科伊, 謝尔盖·斯切潘諾維奇 (Ланской, Серг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787—1862)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派; 曾任內务大臣 (1855—1861), 参加过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工作。——第 722 頁。
- 尼耳, 詹姆斯·乔治·史密斯 (Neill, James George Smith 1810—1857) ——英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在康波尔大肆进行殘暴活动。——第 331 頁。
- 尼布尔, 巴托尔德·格奥尔格 (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 ——德国杰出的古代史专家。——第 650 頁。
- 尼布尔, 馬尔庫斯·卡尔斯頓·尼古劳斯 (Niebuhr, Markus Carsten Nikolaus 1817—1860) ——普魯士官吏,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亲信; 曾任樞密院秘书 (1851—1857); 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之子。——第 650 頁。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128、211、625、628、629、637、650、671、696、706、723、724 頁。
- 尼科尔森, 約翰 (Nicholson, John 1821—1857) ——英国將軍, 1842 年参加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 1848—1849 年参加第二次英国对錫克人的战争, 1857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攻打德里时指揮一支英国軍隊。——第 323、328、333 頁。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溫和派 (因他的名字而被称为皮尔派) 的領袖; 曾任內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 (1834—1835 和 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 (1846)。——第 140、141、143、157、193、339—343、349、350、432、433、544、574—578、606、715 頁。
- 皮克列尔, 埃尔德曼 (Pückler, Erdmann

- 生于 1792 年)——1858 年起任普魯士农业大臣。——第 679 頁。
- 卢兰, 古斯塔夫(Rouland, Gustave 1806—1878)——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1856—1863), 国务會議議長(1863—1864), 法兰西銀行董事长(1864—1878)。——第 431 頁。
- 卢梭, 让·雅克(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733 頁。
- 卢森堡王朝(Luxemburger)——所謂的神圣羅馬帝国皇帝的王朝(1308—1437 年断續在位), 1310—1437 年兼領捷克王位, 1387—1437 年兼領匈牙利王位。——第 108 頁。
- 圣西門,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31 頁。
-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雅各宾派領袖之一。——第 31 頁。
- 圣萊昂納茲——見薩格登, 爱德华。
- 弗格森, 罗納德·克罗弗德(Ferguson, Ronald Craufurd 1773—1841)——英国將軍, 議會議員, 曾在下院抨击約克公爵的舞弊行为。——第 15 頁。
- 弗兰茨-約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 279, 634, 644 頁。
-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普魯士將軍, 反动軍閥的著名代表人物; 1848 年 11 月参加柏林的反革命政变和解散普魯士国民議會。——第 53 頁。
- 弗兰克斯, 托馬斯·哈特(Franks, Thomas Harte 1808—1862)——英国將軍, 参加过第二次英国对錫克人的战争(1848—1849)和对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鎮压。——第 470—473, 475 頁。
- 弗洛特韦尔, 爱德华·亨利希(Flottwell, Eduard Heinrich 1786—1865)——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財政大臣(1844—1846), 內务大臣(1858—1859)。——第 648, 671, 691, 692, 700 頁。
- 弗里德里希第一(Friedrich I 1371—1440)——1389 年起为紐倫堡軍政长官; 1415—1440 年为勃兰登堡选帝侯; 霍亨索倫王朝的創建人。——第 108, 109 頁。
- 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 1657—1713)——1688 年起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第三, 后为普魯士国王(1701—1713)。——第 105, 110, 649 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普魯士国王(1740—1786)。——第 107, 121, 651, 655, 727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 I 1688—1740)——普魯士国王(1713—1740)。——第 649, 651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魯士国王(1786—1797)。——第 649, 651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1797—1840)。——第 649—651, 671, 677, 679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普魯士國王 (1840—1861)。——第 540、632—635、643—646、648—650、653、675、679、693、696、701、728 頁。
- 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ck VII 1808—1863) ——丹麥國王 (1848—1863)。——第 290 頁。
- 弗雷德里克-斐迪南 (Frederick-Ferdinand 1792—1863) ——丹麥親王。——第 290 頁。
- 布朗, 汉弗利 (Brown, Humphry) ——英國企業家, 議會議員, 英國皇家銀行董事之一 (1853—1856), 因舞弊被判罪。——第 56、213—217 頁。
- 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 (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 ——法國革命家, 空想共產主義者, 許多秘密社團和密謀活動的組織者, 1830 年革命的積極參加者; 1848 年革命時期站在法國無產階級民主運動極左翼的立場, 曾多次被判處徒刑。——第 3 頁。
- 布腊沃, 穆里洛, 璜 (Bravo, Murillo Juan 1803—1873) ——西班牙政治活動家, 屬於溫和派; 政府首腦 (1851—1852)。——第 236 頁。
- 布洛利, 阿尔伯 (Broglie, Albert 1821—1901) ——公爵, 法國政治活動家, 政論家和歷史學家, 曾為天主教雜誌“記者”撰稿, 后歷任部長職務。——第 667 頁。
- 布洛利, 阿希尔·沙尔·萊昂·維克多 (Broglie, Achille Charles Léonce Victor 1785—1870) ——公爵, 法國國家活動家, 內閣首相 (1835—1836), 立法議會議員 (1849—1851), 奧爾良派, 阿尔伯·布洛利之父。——第 667、698 頁。
- 布魯姆, 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 ——男爵, 英國法學家和文學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為輝格黨的著名活動家, 1830—1834 年任大法官, 曾促進 1832 年選舉改革的實施。——第 433、544 頁。
- 布律恩, 吉約姆·瑪麗·安 (Brune, Guillaume Marie Anne 1763—1815) ——法國元帥, 拿破侖第一各次征伐的參加者; 1799 年指揮駐荷蘭的法國軍隊。——第 8 頁。
- 布萊特, 約翰 (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國廠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 從六十年代初為自由黨左翼領袖; 曾多次擔任自由黨內閣的大臣。——第 173、181—185、539、547—549、552、713 頁。
- 布阿泰尔, 散伏里安 (Boittelle, Symphorien 約生于 1814 年) ——法國上校, 曾任巴黎警察局長 (1858—1866)。——第 444、446—447 頁。
- 布尔韦尔-利頓, 爱德华·乔治·利頓 (Bulwer-Lytton, Edward George Lytton 1803—1873) ——英國作家和政治活動家, 早年為輝格黨人, 1852 年起為托利黨人; 議會議員; 曾任殖民大臣 (1858—1859)。——第 148、157、539、562—567 頁。
- 布尔韦尔-利頓, 罗西娜 (Bulwer-Lytton, Rosina 1802—1882) ——英國小說家, 爱德华·乔治·利頓·布尔韦尔-利頓之妻。——第 562—567、570 頁。
- 布尔韦尔-利頓, 爱德华·罗伯特 (Bulwer-Lytton, Edward Robert 1831—1891) ——英國外交家和詩人; 曾任

印度总督(1876—1880), 駐巴黎大使(1887—1891); 爱德华·乔治·利頓·布尔韦尔-利頓之子。——第 562、564—566 頁。

布里尔頓 (Brereton)——駐印度的英国官吏, 旁遮普卢迪阿納区专员(1855)。——第 294、295 頁。

布里格斯, 約翰 (Briggs, John 1785—1875)——英国將軍, 1801—1835 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 自由貿易派, 关于印度和波斯譯著甚多。——第 550 頁。

布罗費里奧, 安吉洛 (Brofferio, Angelo 1802—186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詩人和政論家; 1848 年起为皮蒙特众議院議員; 民主反对派的領袖; 加里波第的拥护者。——第 20 頁。

布萊克斯頓, 威廉 (Blackstone, William 1723—1780)——英国法学家, 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辯护人。——第 311 頁。

## 六 画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納 (Minié, Claude Étienne 1804—1879)——法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 曾創制一种新型步枪。——第 415 頁。

米洛, 莫伊斯 (Millaud, Moïse 1813—1871)——法国銀行家和記者, 曾創辦許多家報紙和銀行。——第 467 頁。

米尔納·基卜生——見基卜生, 托馬斯·米尔納。

米勒斯, 茹尔·伊薩克 (Mirès, Jules Isaac 1809—1871)——法国銀行家, “立宪主义者报”等報紙的所有人。——第 431 頁。

达来朗-貝里戈, 沙尔·莫里斯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 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 曾任外交部长(1797—1799、1799—1807、1814—1815), 法国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1814—1815); 以自私和政治上毫无原則著称。——第 171、454、457、458、463 頁。

达尔豪西侯爵, 詹姆斯·安得魯·拉姆西 (Dalhousie, James Andrew Ramsay 1812—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 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第 292、295、503、506、507、551、560 頁。

迈奧尔, 爱德华 (Miall, Edward 1809—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議會議員 (1852—1857、1869—1874)。——第 181 頁。

列奧波特一世 (Leopold I 1640—1705)——所謂的神圣羅馬帝国皇帝(1657—1705)。——第 110 頁。

列列韦尔, 約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家,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領袖之一。——第 451 頁。

多德, 乔治 (Dodd, George 1808—1881)——英国政論家, 論著甚多, 主要是关于工业問題; 曾为各种参考性出版物撰稿。——第 213 頁。

多斯特-穆罕默德 (Dost-Muhammad 1793—1863)——阿富汗的艾米尔 (1826—1863)。——第 132 頁。

成吉思汗 (1155 左右—1227)——著名的蒙古族征服者, 蒙古帝国的創建者。——第 528 頁。

艾克罗伊德, 爱德华 (Ackroyd, Edward)——英国厂主,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第 183 頁。

吉本, 爱德华 (Gibbon, Edward 1737—



- 1794)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著有卷次繁多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第 264 頁。
- 吉茲公爵——見洛林的昂利第二。
-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 ——英国国王(1760—1820)。——第 10、11、632 頁。
- 乔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 ——英国摄政王(1811—1820), 英国国王(1820—1830)。——第 15、649 頁。
- 乔治-威廉(Georg Wilhelm 1595—1640) ——勃兰登堡选帝侯(1619—1640)。——第 109 頁。
- 伍德, 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1846—1852 年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年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5—1858 年任海軍首席大臣, 1859—1866 年任印度事务大臣, 1870—1874 年任掌璽大臣。——第 342、575 頁。
- 伍德伯恩(Woodburn) ——英国將軍, 1857 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271 頁。
- 伏恩, 約翰·路德(Vaughan, John Luther 生于 1820 年) ——英国將軍, 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272 頁。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1694—1778)(真姓为阿魯埃 Arouet) ——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諷刺作家, 历史家, 十八世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263 頁。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 ——古代的偉大思想家; 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 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 264、734 頁。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俄国皇帝(1801—1825)。——第 110、128、628、629、651、723 頁。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1855—1881)。——第 627、629、630、637、650、696、716、718、719、722、723、725 頁。
- 安森, 乔治(Anson, George 1797—1857) ——英国將軍, 曾任駐印英軍总司令(1856—1857)。——第 259 頁。
- 安凡丹, 巴特爾米·普羅斯比尔(Enfantin, Barthelemy Prosper 1796—1864)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門亲信門徒之一; 在圣西門死后为圣西門学派之領袖。——第 31 頁。
- 安得列, 厄內斯特(Andrée, Erneste) ——法国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 的董事之一。——第 316 頁。
- 安得列奧西, 安都昂·弗朗斯瓦(André-ossi, Antoine François 1761—1828) ——法国將軍和外交家, 拿破侖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 曾任駐倫敦大使(1802), 駐維也納大使(1806—1809)和駐君士坦丁堡大使(1812—1814); 原系意大利人。——第 457、461 頁。
- 伊安(Hyenne) ——法国軍官, 因与法国記者昂利·潘恩决斗而出名。——第 522 頁。
- 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 ——英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自由派政治家, 議會議員。——第 283、287、288、447 頁。
- 伊丽莎白(Elisabeth 1801—1873) ——普魯士王后,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妻。——第 632—635、645、648、672、

- 693、701—703 頁。
- 伊薩伯拉二世 (Isabella II 1830—1904)  
——西班牙女王(1833—1868)。——第  
42、51—53 頁。
- 伊斯馬伊耳一世 (Ismail I 1487—1524)  
——波斯的沙赫(1502—1524)，沙斐維  
德王朝 (1502—1736) 的創建者。——  
第 127 頁。
- 伊斯馬伊耳-帕沙 (Ismail-Pasha) ——土  
耳其將軍，原系切尔克斯人，曾在切尔  
克西亚同俄国作战。——第 511、515  
頁。
- 休伊特 (Hewitt) ——英国將軍，1857 年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为米拉特守軍指  
揮官。——第 323 頁。
- 华德，亨利·乔治 (Ward, Henry  
George 1797—1860) ——英国殖民官  
員，曾任伊奧尼亚群島首席專員 (1849  
—1855)，錫兰总督 (1855—1860) 和馬  
德拉斯总督 (1860)。——第 707 頁。
- 托特列本，埃杜阿尔德·伊万諾維奇  
(Тотлебен, Эдуард Иванович 1818  
—1884) ——杰出的俄国軍事工程師，  
將軍，1854—1855 年英勇的塞瓦斯托  
波尔保卫战的組織者之一。——第 352、  
405 頁。
- 西哀士，艾曼紐尔·約瑟夫 (Sieyès,  
Emanuel Joseph 1748—1836) ——法  
国神甫，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  
活动家，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第 677 頁。
- 西塞罗 (馬可·土利烏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  
—43) ——杰出的羅馬雄辯家和国家活  
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107 頁。
- 西馬蘭各厘 (Seymour, Michael 1802—  
1887) ——英国海軍上將，1854—1856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第二次对华鴉片战  
争期間 (1856—1858) 任海軍司令。——  
第 112—116、159、164、176、177 頁。
- 西吉茲蒙特 (Sigismund 1368—1437)  
——德国皇帝 (1411—1437)，卢森堡王  
朝末代皇帝。——第 108、109 頁。
-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奧納尔·西蒙·  
德 (Sismondi,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 ——瑞士經  
济学家，批評資本主义的小資產階級批  
評家。——第 100 頁。
-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頓 (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1757—1844) ——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  
兼財政大臣 (1801—1804)，任內务大臣  
时 (1812—1821) 对工人运动实行鎮压  
措施。——第 165、460 頁。
- 西莫尼奇，伊万·斯切潘諾維奇 (Симо-  
нич,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1792—1855)  
——俄国將軍，曾任駐德黑兰公使  
(1832—1839)。——第 131 頁。
- 西蒙斯，路德維希 (Simons, Ludwig 1803  
—1870) ——德国法学家，反动分子；  
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屬於  
右派，曾任司法大臣 (1849—1860)。  
——第 680 頁。

## 七 画

- 沃克，威廉 (Walker, William 1824—  
1860) ——美国冒險家，曾进行多次以  
征服包括尼加拉瓜在內的中美国家为  
目的的远征活动。——第 116 頁。
- 沃森，亨利 (Watson, Henry 1737—  
1786) ——英国工程師，上校，1764 年  
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担任孟加拉的总  
工程師。——第 586 頁。
-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修 (Walpole,

-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1866—1867)。——第 567 頁。
- 沃德尔, 圭利阿姆·劳埃德 (Wardle, Gwyllym Lloyd 1762 左右—1833) ——英国上校, 議會議員, 1809 年曾在下院揭发約克公爵的舞弊行为。——第 12、13、15 頁。
- 沃德豪斯, 約翰 (Wodehouse, John 1826—1902) ——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駐彼得堡公使(1856—1858), 爱尔兰总督(1864—1866), 掌璽大臣(1868—1870), 殖民大臣(1870—1874、1880—1882)。——第 544 頁。
- 沃龙佐夫, 米哈伊尔·謝明諾維奇 (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2—1856) ——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元帅; 1844—1854 年为高加索駐軍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 195 頁。
- 沃戈里德斯(博戈里迪), 亚历山大 (Vogorides, Alexandros 1823 左右—1910) (常被称为阿列科·帕沙) ——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原系保加利亚人, 1856—1861 年任駐倫敦大使館参贊, 1876—1878 年任駐維也納大使, 1879—1884 年任东魯美利亚总督。——第 279、281 頁。
- 沃戈里德斯, 尼古拉 (Vogorides, Nikolas 1821—1863) ——1857—1859 年为莫尔达維亚的卡馬康(代理国君), 原系保加利亚人; 亚历山大·沃戈里德斯之兄。——第 277—281 頁。
- 沃戈里德斯, 斯蒂凡 (博戈罗夫, 斯托伊科) (Vogorides, Stefanaki (Bogorow, Stoiko) 1775—1859) ——1821—1822 年为莫尔达維亚的卡馬康(代理国君), 原系保加利亚人; 亚历山大·沃戈里德斯和尼古拉·沃戈里德斯之父。——第 279 頁。
- 克萊, 威廉 (Clay, William 1791—1869)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 (1832—1857)。——第 140 頁。
- 克萊斯特-雷措夫, 汉斯·胡果 (Kleist-Retzow, Hans Hugo 1814—1892) ——普魯士政治活动家, 保守党极右派的首領, “新普魯士报”的创办人之一。——第 693 頁。
- 克美蒂, 迪約尔吉 (Kmetz, Gyorgy 1810—1865) ——土耳其將軍, 原系匈牙利人,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国籍; 克里木战争期間先在多瑙河 (1853—1854), 后在高加索 (1854—1855) 任土耳其軍隊指揮官。——第 411 頁。
- 克拉克, 乔治 (Clerk 或 Clark, George 1787—1867)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曾任财政部秘书长 (1834—1835、1841—1845)、貿易副大臣和造币厂厂长 (1845—1846)。——第 194 頁。
- 克拉索夫, 卡尔·萊茵霍尔特·阿道夫 (Krassow, Karl Reinhold Adolf 1812—1892) ——伯爵, 普魯士的县长, 議會議員 (1849—1850、1850—1851、1851—1852), 属于右派, 1852—1868 年任施特拉尔宗德行政区长官。——第 684 頁。
- 克拉倫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 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残酷地镇压 1848 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1868—1870）。——第 19、159、175、195、546 頁。
- 克里斯亭娜——見瑪麗-克里斯亭娜。
- 克兰沃斯男爵，罗伯特·蒙西·罗尔夫（Cranworth, Robert Monsey Rolfe 1790—1868）——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法学家，辉格党人，曾任大法官（1852—1858 和 1865—1866）。——第 148 頁。
- 克兰里卡德侯爵，烏利克·約翰·德·巴勒（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1802—1874）——英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駐彼得堡大使（1838—1841），掌璽大臣（1857—1858）。——第 6、16、434、562 頁。
- 里德，托馬斯（Reed, Thomas 1796—1883）——英国將軍，参加过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298、299、328 頁。
- 里奥斯-伊-罗薩斯，安东尼奥（Ryos y Rosas, Antonio 1812—187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属于温和派，議會議員，曾任内务大臣（1856）。——第 44 頁。
- 里子公爵，托馬斯·奧斯本，1689 年起受封为卡馬登侯爵，1694 年起受封为里子公爵（Leeds, Thomas Osborne 1631—171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674—1679 和 1690—1695），1695 年議會控告他有貪污罪行。——第 558 頁。
- 里斯托丽，阿黛拉伊德（Ristori, Adelaide 1822—1906）——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第 697 頁。
- 里姆斯基-科尔薩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53—1840）——俄国將軍，1799 年任駐瑞士的俄国軍隊指揮官；1830 年起为国家参議院議員。——第 122 頁。
- 怀特塞德，詹姆斯（Whiteside, James 1804—1876）——爱尔兰法学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曾任首席檢察官（1858—1859、1866）。——第 157、711 頁。
- 肖尔，約翰·廷馬斯（Shore, John Teignmouth 1751—1834）——印度的英国总督（1793—1798）。——第 503 頁。
- 杜班，安得列·瑪麗·让·雅克（Dupin, André Marie Jean 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派，制宪議會議員（1848—1849）和立法議會議長（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666 頁。
- 杜罗·德·拉·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奧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 Jules César Auguste 1777—1857）——法国詩人和历史学家。——第 450 頁。
- 杜耳塞-伊-加腊伊，多敏古（Dulce y Garay, Domingo 1806—1869）——侯爵，西班牙將軍，属于温和派，曾领导 1854 年馬德里的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1856 年镇压过群众的革命行动。——第 50 頁。
- 杜尔哥侯爵，路易·費里克斯·埃蒂耶納（Turgot, Louis Félix Étienne 1796—1866）——法国外交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曾任外交部长（1851—1852），駐西班牙大使（1853）。——第 42 頁。

亨利五世——見尙博尔, 昂利·沙尔。

亨格施坦堡, 恩斯特·威廉 (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1869) ——德国神学家, 反动分子, 柏林大学教授。——第 728 頁。

辛普森, 詹姆士 (Simpson, James 1792—1868) ——英国將軍, 1855 年任克里木駐軍參謀长 (2—6 月), 后任总司令 (6—11 月)。——第 411 頁。

辛迪亚, 阿里·扎·吉阿吉 (巴吉拉特·拉奥) (Sindhia, Ali Jah Jaiaji (Bagirat Rao) 約生于 1835 年) ——馬拉提人, 1853 年起为印度瓜廖尔公国的国君;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站在英国人一边。——第 321、613 頁。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 ——杰出的德国学者, 农业化学的創始人之一。——第 231 頁。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經濟学家, 資产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第 23、733、746、747 頁。

李斯特, 賽米爾·康利弗 (Lister, Samuel Cunliffe 1815—1906) ——英国工业家和发明家。——第 206 頁。

邦迪埃拉兄弟, 阿提利奧 (1810—1844) 和埃米利奧 (1819—1844) (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員, 奧地利艦队的軍官, 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 (1844)。——第 157 頁。

貝多, 瑪麗·阿尔丰斯 (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产階級共和派;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会和立法

議会的副議長;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驅逐, 1859 年回国。——第 440 頁。

貝林, 弗兰西斯 (Baring, Francis 1796—1866)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 1839—1841 年任財政大臣, 1849—1852 年任海軍首席大臣。——第 575 頁。

貝尔納, 西蒙·弗朗斯瓦 (Bernard, Simon François 生于 1817 年) ——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派; 曾流亡英国; 1858 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侖第三的同伙犯, 但被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宣布无罪。——第 481、482 頁。

貝尔蒂埃, 路易·亚历山大 (Berthier, Louis Alexandre 1753—1815) ——法国元帅, 曾在拿破侖第一的軍队中任參謀长 (1799、1805—1807、1812—1814); 拿破侖帝国倒台 (1814 年) 以后轉向波旁王朝。——第 430 頁。

貝尔蒂埃, 让·加布里埃尔 (Peltier, Jean Gabriel 1765 左右—1825) ——法国政論家, 保皇党人; 1792 年八月十日革命后流亡倫敦, 在倫敦出版过多种期刊; 激烈地反对拿破侖第一, 因此受到刑事究办。——第 458、460、462 頁。

貝列拉, 艾米爾 (Péreire, Emile 1800—1875) ——法国銀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代表; 1852 年与其弟伊薩克·貝列拉一起創办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第 31、38、220、221、226、227、258、316、465 頁。

貝列拉, 伊薩克 (Péreire, Isaac 1806—1880) ——法国銀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代表; 1852 年与其兄艾米爾·貝列拉一起創办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第 27、31—33、38、65、

- 218—221、223—227、315、316、465、729 頁。
- 貝利, 亨利·詹姆斯 (Baillie, Henry James) ——英国政府官員, 印度事務督察委員會秘書。——第 505 頁。
- 貝利耶, 比埃尔·安都昂 (Berryer, Pierre Antoine 1790—1868) ——法国律師和政治活動家, 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 正統主義者。——第 438、698 頁。
- 貝瑟耳, 理查, 威斯特柏立男爵 (Bethell, Richard, Baron Westbury 1800—1873) ——英国國家活動家, 自由黨人; 曾任副首席檢察官 (1852—1856)、首席檢察官 (1856—1858、1860—1861)、大法官 (1861—1865)。——第 157 頁。
- 貝特曼-霍尔威克, 摩里茨·奥古斯特 (Bethmann-Hollweg, Moritz August 1795—1877) ——普魯士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保守黨領袖之一, 普魯士議會第一議院議員, 后為第二議院議員 (1849—1855); 曾任宗教、教育和衛生大臣 (1858—1862)。——第 671、679 頁。
- 麥克尼耳, 約翰 (McNeill, John 1795—1883) ——英国外交家, 曾任駐德黑蘭公使 (1836—1842)。——第 131 頁。
- 麥克馬洪, 瑪麗·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1808—1893) ——法国反動的軍事和政治活動家, 波拿巴主義者, 克里木戰爭的參加者; 曾任阿爾及利亞總督 (1864—1870); 1870 年率 10 萬法軍在色當投降; 領導過對巴黎公社的凶惡鎮壓; 1873—1879 年為第三共和國總統。——第 440 頁。
- 麥克格萊哥爾, 約翰 (MacGregor, John 1797—1857) ——英国統計學家, 自由貿易派, 議會議員, 英国皇家銀行的創辦人, 并為該行董事之一 (1849—1856), 在統計學方面著作甚多。——第 56、623 頁。
- 麥克唐納, 雅克·埃蒂耶納·約瑟夫·亚历山大 (Macdonald, Jacques Étienne Joseph Alexandre 1765—1840) ——法国元帥; 拿破侖第一各次征伐的參加者; 在征討意大利和瑞士時任法軍總司令; 在拿破侖退位后為波旁王朝效力; 1816 年至 1830 年歷任宮廷要職。——第 122 頁。
- 勞倫斯 (Lawrence) ——印度的一個英国軍官。——第 273 頁。
- 勞倫斯, 弗倫奇 (Laurence, French 1757—1809) ——英国法學家, 1796 年起為議會議員。——第 460 頁。
- 勞倫斯, 亨利·蒙哥馬利 (Lawrence, Henry Montgomery 1806—1857) ——英国軍官; 曾任尼泊爾駐劄官 (1843—1846), 旁遮普英国當局首腦 (1849—1853), 奧德首席專員 (1857), 鎮壓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時期任勒克瑙英軍指揮官。——第 253、271、303、325、400、401 頁。
- 勞倫斯, 約翰·勒阿爾德·麥阿爾 (Lawrence, John Laird Mair 1811—1879) ——英国負責殖民事務的高級官員; 曾任旁遮普首席專員 (1853—1857)、印度總督 (1864—1869)。——第 309、328、330、471、613 頁。
- 勞倫斯, 喬治·聖帕特里克 (Lawrence, George Saint-Patrick 1804—1884) ——英国將軍, 參加過鎮壓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 曾任拉吉普坦納駐劄官 (1857—1864)。——第 336 頁。

苏尔特, 尼古拉·让(Soult, Nicolas Jean 1769—1851)——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曾任首相(1832—1834、1839—1840 和 1840—1847)。——第 242 頁。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維奇(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偉大的俄国統帥。——第 122、123 頁。

坎宁, 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1822—1827), 首相(1827)。——第 433、602 頁。

坎宁, 查理·約翰(Canning, Charles John 1812—1862)——伯爵(1859年受封),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曾任郵政大臣(1853—1855), 印度總督(1856—1862); 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的組織者。——第 499、502、503、516、518、519 頁。

坎伯尔(Campbell)——英国軍官, 曾参加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第 474 頁。

坎伯尔, 乔治(Campbell, George 1824—1892)——1843—1874 年断續担任英国駐印度的殖民官員, 后为議會議員(1875—1892); 自由党人, 关于印度著述甚多。——第 551 頁。

坎伯尔, 科林, 克莱德男爵(Campbell, Colin, Baron Clyde 1792—1863)——英国將軍, 后升元帥, 1848—1849 年参加第二次英国对錫克人的战争, 1854—1855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时期任英軍总司令。——第 332、381—386、398—400、405、406、411、412、414、416、469—474、

495、497、498、500、524、527—529、553—556、611 頁。

## 八 画

金, 彼得·約翰·洛克(King, Peter John Locke 181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派, 后为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第 539 頁。

欧文(Owen, W. D.)——英国皇家銀行董事之一(1849—1854、1855—1856), 因舞弊被判罪。——第 56 頁。

欧斯曼, 若尔日·欧仁(Haussmann, Georges Eugène 1809—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参加者, 塞納省省长(1853—1870)。——第 468 頁。

雨果, 維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偉大的法国作家。——第 456 頁。

帖木儿(1336—1405)——中亚細亞的統帥和征服者, 統治毛危兰納赫爾、花刺子模和霍拉桑的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創建者。——第 528 頁。

孟德斯鳩, 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杰出的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經濟学家和作家; 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君主立宪制的理論家。——第 264、450 頁。

舍伐利埃, 米歇尔(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法国工程师, 經濟学家和政論家, 圣西門的追隨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积极支持并宣傳拿破侖第三的經濟政策, 曾长期为“辯論日报”撰稿。——第 31 頁。

舍夫茨別利伯爵, 安东尼·艾釋黎·庫伯(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1801—1885)——英国政治活

- 动家；四十年代时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团；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第161、565頁。
- 尚博尔，昂利·沙尔(Chambord, Henri Charles 1820—1883)——伯爵，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亨利五世。——第430頁。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和驱逐，1859年回国。——第440、444頁。
- 法卢，阿尔弗勒德(Falloux, Alfred 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第698頁。
-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从五十年代末起是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领袖之一；1858年曾为奥尔西尼做辩护人；1870—1871年任“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梯也尔一起领导了反对巴黎公社的斗争。——第437、438、441頁。
- 法尔孔，安东尼奥(Falcon, Antonio)——西班牙将军，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参加者。——第41、48頁。
- 阿尔古伯爵，安都昂·莫里斯·阿波利奈尔(Argout, Antoine Maurice Apollinaire 1782—1858)——法国国家活动家，1830—1834年历任内閣大臣，1834—1857年任法兰西银行董事
- 长。——第241、242頁。
- 阿尔巴，扎科博·路易斯(Alba, Jacobo Luis 1821—1881)——公爵，西班牙贵族，欧仁妮·蒙蒂霍的姐妹之夫。——第43頁。
- 阿尔勃莱希特第三(Albrecht III 1350左右—1395)——奥地利大公(1365—1395)。——第118頁。
- 阿尔勃莱希特第三阿基里斯(Albrecht III Achilles 1414—1486)——勃兰登堡选帝侯(1470—1486)。——第107頁。
- 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Albrecht-Friedrich 1553—1618)——普鲁士公爵(1568—1618)。——第110頁。
-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从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1841—1846)和联合内閣首相(1852—1855)。——第6、9、16、145、159、193、543頁。
- 阿格索侯爵，昂利·卡尔丹·让·巴蒂斯特(Aguesseau, Henri Cardin Jean Baptiste 1746—1826)——法国外交家，1803—1805年任驻哥本哈根公使。——第463頁。
- 阿米塔季，埃耳卡纳(Armitage, Elkanah)——英国议会议员，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第181頁。
- 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629—1676)——俄国沙皇(1645—1676)。——第625頁。
- 阿希伯纳姆，托马斯(Ashburnham, Thomas 1807—1872)——英国将军，1857年奉命率兵侵华；由于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爆发，被调往印度。——第



- 254 頁。
- 阿罕默德-沙赫·杜兰尼 (Ahmed-Shah Durrani 1724—1773) ——阿富汗的沙赫(1747—1773), 阿富汗国家和杜兰尼王朝的創建者。——第 127 頁。
- 阿森西奧 (Assensio)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 1854—1856 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的参加者。——第 46 頁。
- 阿馬尔·辛格 (Armar Singh) ——庫埃爾·辛格之兄弟;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庫埃爾·辛格(死于 1858 年 4 月) 死后領導奧德的起义者。——第 612 頁。
- 杰科布, 乔治·勒·格兰德 (Jacob, George le Grand 1805—1881) ——英国上校, 后升將軍; 1857 年参加英国对波斯的战争, 参加过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287 頁。
- 味吉尔 (普卜利烏斯·味吉尔·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 ——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451 頁。
- 林則徐 (1758—1850) ——中国国家活动家; 1839 年被任命为兩广总督和負責查禁鴉片貿易的欽差大臣。——第 590 頁。
- 林德赫斯特男爵, 約翰·辛格尔頓·柯普利 (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1772—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托利党人, 曾任大法官 (1827—1830, 1834—1835, 1841—1846)。——第 148、151、152 頁。
- 拉普, 让 (Rapp, Jean 1772—1821) ——法国將軍, 拿破侖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 1813 年 1 月至 1814 年 1 月担任处于俄、普軍包圍下的但澤守軍的指揮官。——第 405 頁。
- 拉欣頓, 查理·曼納斯 (Lushington, Charles Manners) ——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議會議員 (1854—1857)。——第 194 頁。
- 拉品斯基, 泰奥菲尔 (Lapinski, Theophil 1827—1886) ——波兰上校,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 改名泰菲克-貝伊投入土耳其軍隊供职, 1857—1858 年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第 593—599 頁。
- 拉布謝尔, 亨利 (Labouchere, Henry 1798—1869)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 (1839—1841, 1847—1852), 殖民大臣 (1855—1858)。——第 164 頁。
- 拉特兰德公爵, 查理·謝西尔·約翰·曼納斯 (Ruthland, Charles Cecil John Manners 1815—1888) ——英国貴族, 托利党人。——第 538 頁。
- 拉德茨基, 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奧地利元帅, 1831 年起任意大利北部的奧地利軍隊的指揮官, 1848—1849 年殘酷鎮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 1850—1856 年任倫巴第一威尼斯王国总督。——第 20、53 頁。
- 拉斯拜尔, 弗朗斯瓦 (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 ——卓越的法国学者, 自然科学家, 政論家和社会主义者, 靠近革命无产階級;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制宪議會議員; 1855 年后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派立場。——第 3 頁。
- 罗, 約翰 (Law, John 1671—1729)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金融家; 曾在法国担任財政大臣 (1719—1720); 以发行紙币进行投机活动, 結果惨敗, 因此而出名。——第 31、36、40、315 頁。

- 罗素, 威廉·霍华德 (Russell, William Howard 1820—1907) ——英国記者, “泰晤士报”的軍事通訊員。——第 495、497、526、527 頁。
- 罗素, 約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領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 樞密院院长 (1854—1855); 1855 年为出席維也納會議的英国代表。——第 6、145、147、148、155、157—159、170—173、195、342、432—434、560 頁。
- 罗斯, 休·亨利 (Rose, Hugh Henry 1801—1885) ——英国將軍, 后升元帅,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鎮压者之一; 曾任駐印軍隊司令 (1860—1865), 駐爱尔兰武装部队司令 (1865—1870)。——第 471、474、529、555、556 頁。
- 罗斯·德·奥兰諾, 安东尼奥 (Ros de Olano, Antonio 1808—1886) ——西班牙將軍, 属于溫和派,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参加者。——第 43 頁。
- 罗林森, 亨利·克雷斯威克 (Rawlinson, Henry Creswicke 1810—1895) ——英国历史学家, 东方学家, 在波斯做过軍官; 曾任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 (1858—1859、1868—1895), 駐德黑兰公使 (1859—1860)。——第 247 頁。
- 罗宾逊, 斯密斯 (Robinson, Smith P.) ——反谷物法同盟名誉書記。——第 184 頁。
- 罗巴克, 約翰·阿瑟 (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資產階級激进派, 議會議員。——第 157、170 頁。
- 罗伯茨, 亨利 (Roberts, Henry 1800—1860) ——英国將軍, 曾参加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612、613 頁。
- 罗伯逊 (Robertson) ——英国駐上海領事 (1856)。——第 74 頁。
- 罗伯斯比尔, 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派領袖, 革命政府首腦 (1793—1794)。——第 453 頁。
- 罗曼諾夫王朝 (Романовы) ——俄国沙皇和皇帝的王朝 (1613—1917)。——第 19、707 頁。
- 帕麦尔, 約翰·霍尔斯萊 (Palmer, John Horsley 1779—1858) ——英国金融家, 1830—1832 年任英格兰銀行經理, 后在財政机关担任各种职务。——第 32 頁。
- 帕麦尔, 朗德尔 (Palmer, Roundel 1812—1895) ——英国国家活动家, 早期依附于托利党, 继而成为皮尔派, 后来是自由党人; 曾任大法官 (1872—1874、1880—1885)。——第 194 頁。
- 帕麦尔, 威廉 (Palmer, William 1824—1856) ——英国医生, 为謀取保險賠償費而毒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 被判处絞刑。——第 586 頁。
- 帕麦斯頓子爵, 亨利·約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輝格党領袖之一, 依靠該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內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7、20、131、140、144—147、152、153、154—159、161—166、169—176、181—

- 183、185、192—195、246、247、263、279、284、286—289、342、422、432—435、447、476、480、483、484、499、505、506、538、543、544、560、561—565、621、625、637、705 頁。
- 帕托夫，艾拉茲穆斯·罗伯特 (Patow, Erasmus Robert 1804—1890) ——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 年 4—6 月)，財政大臣 (1858—1862)。——第 672、679 頁。
- 帕金頓，約翰·索美塞特 (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人；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 (1852)，海軍首席大臣 (1858—1859 和 1866—1867)，陸軍大臣 (1867—1868)。——第 157、434 頁。
- 帕尔馬公爵夫人——見波旁的路易莎，瑪麗亞-泰莉莎。
- 帕兰杜尔·辛格 (Parandur Singh) ——印度的拉扎。——第 336 頁。
-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霍賽 (Palafox y Melci, José 1776—1847) ——西班牙將軍，1808—1814 年独立战争的参加者，领导过薩拉哥沙保卫战 (1808—1809)。——第 46 頁。
- 奈斯密斯，詹姆士 (Nasmyth, James 1808—1890) ——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 205 頁。
- 奈穆尔公爵夫人——見奧尔良的瑪麗。
- 彼拉多，本丢 (Pilatus, Pontius 約卒于公元 37 年) ——犹太的羅馬总督 (26—36)。——第 61 頁。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 ——1682 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 年起为俄国皇帝。——第 110、128、279、637、638、716、717、725 頁。
- 彼罗夫斯基，瓦西里·阿列克謝也維奇 (Пе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5—1857) ——俄国將軍，奧連堡軍事总督 (1833—1842、1851—1857)；1839—1840 年率軍远征希瓦。——第 136、638—640 頁。
- 波立特，威廉·約翰·弗雷德里克 (Poulett, William John Frederick) ——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議會議員。——第 194 頁。
- 波特爾，約翰 (Potter, John) ——英国自由党人，議會議員，曾三度任曼彻斯特市长。——第 183 頁。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一。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 波拿巴，日罗姆 (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 ——拿破侖第一之弟，威斯特伐里亚国王 (1807—1813)。——第 421、430 頁。
- 波拿巴，約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侖亲王 (Bonaparte, Joseph Charles Paul, le Prince Napoléon 1822—1891) ——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侖第三之堂弟。——第 42、438 頁。
- 波拿巴王朝 (Bonaparte) ——法兰西帝国王朝 (1804—1814、1815、1852—1870)。——第 71、84、278、674、706 頁。
- 波旁王朝 (Bourbon) ——法国的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666 頁。
- 波旁的路易莎，瑪麗亞-泰莉莎 (Louise de Bourbon, Marie-Thérèse 1819—1864) ——帕尔馬公爵夫人，帕尔馬公国摄政 (1854—1859)。——第 697 頁。
- 佩蒂 (Petit) ——巴黎檢察长的助手 (1856)。——第 88 頁。

佩頓, 約翰·斯泰福 (Paton, John Stafford 1821—1889) ——英國軍官, 后升將軍; 曾參加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國對錫克人的戰爭 (1845—1846 和 1848—1849), 參加過鎮壓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第 328 頁。

佩利西埃, 讓·雅克 (Pellissier, Jean Jacques 1794—1864) ——法國元帥; 三十年代初參加了征服阿爾及利亞, 以極端殘酷出名; 1855 年 5 月—1856 年 7 月任克里木駐軍總司令; 因攻克馬拉霍夫岡而受封為馬拉霍夫公爵; 曾任駐英大使 (1858—1859)。——第 421、430、440、446—448、481 頁。

圖克, 托馬斯 (Tooke, Thomas 1774—1858)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傾向於古典學派, 曾抨擊李嘉圖的貨幣論。——第 363 頁。

圖爾, 伊什特萬 (Türr, István 1825—1908) (又名阿罕默德·基阿米耳·貝伊) ——流亡土耳其的匈牙利軍官; 曾參加克里木戰爭, 站在聯軍一邊; 參加過切爾克斯人反對俄國的戰爭。——第 593、594、596—598 頁。

圖爾內桑, 奧古斯特 (Thurneyssen, Auguste) ——法國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 的董事之一。——第 314—316 頁。

圖溫奈爾, 愛德華·安都昂 (Thouvenel, Edouard Antoine 1818—1866) ——法國外交家, 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5—1860), 外交大臣 (1860—1862)。——第 277、278、597 頁。

## 九 画

麥, 羅伯特 (Lowe, Robert 1811—1892) ——英國國家活動家和政治家, “泰晤

士報”的撰稿人, 輝格黨人, 后為自由黨人; 曾任貿易副大臣 (1855—1858), 財政大臣 (1868—1873), 內務大臣 (1873—1874)。——第 164、182 頁。

品得 (Pindar 約公元前 522—442) ——古希臘抒情詩人; 曾寫了許多莊嚴的頌詩。——第 161 頁。

咸豐 (1831—1861) ——中國皇帝 (1850—1861)。——第 590 頁。

施, 威廉 (Shee, William 1804—1868) ——愛爾蘭法學家, 自由黨人, 議會議員。——第 157 頁。

施塔爾, 弗里德里希·尤利烏斯 (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 ——德國極端反動的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1840 年起任柏林大學教授。——第 728 頁。

施泰因, 馬克西米利安 (Stein, Maximilian 1811—1860) ——奧地利軍官,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時任革命軍參謀長; 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 改名費哈爾特·帕沙; 曾在切爾克西亞同俄國作戰 (1857—1858)。——第 515、593 頁。

施泰因, 尤利烏斯 (Stein, Julius 1813—1889) ——西里西亞的教員, 政論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第 690 頁。

施托爾希, 安得列依·卡爾洛維奇 (亨利希) (Шторх, Андрей Карлович (Генрих) 1766—1835) ——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統計學家和歷史學家, 彼得堡科學院院士,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古典派的摹仿者。——第 744 頁。

施萊尼茨, 亞歷山大 (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 ——伯爵, 普魯士

- 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第671、678頁。
- 施瓦尔岑堡，費里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公爵，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10月維也納起义被鎮压后担任首相和外交大臣。——第671頁。
- 約翰-西吉茲蒙特(Johann-Sigismund 1572—1619)——勃兰登堡选帝侯(1608—1619)。——第110頁。
- 約翰·西塞罗(Johann Cicero 1455—1499)——勃兰登堡选帝侯(1486—1499)。——第107頁。
- 約翰斯頓，安得魯·詹姆士·科克倫(Johnstone, Andrew James Cochrane 生于1767年)——英国上校，曾任多米尼加島总督(1797—1803)。——第7—10頁。
- 約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York, Frederick-August 1763—1827)——英王乔治三世之次子，1795年起为元帅；曾任英国軍隊总司令(1798—1809, 1811—1827)。——第6—16、649頁。
- 約阿希姆-弗里德里希(Joachim-Friedrich 1546—1608)——勃兰登堡选帝侯(1598—1608)。——第110頁。
- 約阿希姆第一·奈斯托尔(Joachim I Nestor 1484—1535)——勃兰登堡选帝侯(1499—1535)。——第107、109頁。
- 約阿希姆第二·赫克脫(Joachim II Hektor 1505—1571)——勃兰登堡选帝侯(1535—1571)。——第107、109頁。
-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十七世紀英国
- 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653頁。
-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第653頁。
- 查理五世(Karl V 1500—1558)——西班牙国王(1516—1556)，所謂的神圣羅馬帝国皇帝(1519—1556)。——第109、311頁。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第290頁。
- 查理-阿尔伯特(Carlo Alberto 1798—1849)——撒丁国王(1831—1849)。——第20頁。
- 科布頓，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領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的創立者之一，議會議員。——第148、152、157、162、170、171、173、181—184、194、433頁。
- 科德林頓，威廉·約翰(Codrington, William John 1804—1884)——英国將軍，曾任克里木英国駐軍总司令(1855—1856)。——第411頁。
- 科堡家族(Coburg)——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王朝或屬於这个家族，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674頁。
- 科尔薩科夫——見里姆斯基-科尔薩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
- 科苏特，拉約什(路德維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領導資產階級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第179、593、597頁。

- 科貝特, 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 从1802年起办“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报”。——第7、12、311頁。
- 派西沃, 斯宾塞(Perceval, Spencer 1762—1812)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2—1806年任首席檢察官, 1807—1809年任財政大臣, 1809—1812年任首相。——第15、432、457、648頁。
- 洛克·金——見金, 彼得·約翰·洛克。
- 洛貝尔图斯, 約翰·卡尔(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 ——德国經濟学家, 資產階級化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思想代表;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溫和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普魯士国民議会中間派左翼的領袖, 后来成为普魯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652、653、690頁。
- 洛林的昂利第二, 吉茲公爵(Henri II de Lorraine, duc de Guise 1614—1664) ——法国的弗倫特党活动家之一。——第30頁。
- 哈丁, 亨利(Hardinge, Henry 1785—1856) ——子爵, 英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印度总督(1844—1848年1月), 英軍总司令(1852—1856)。——第507頁。
- 哈維, 阿弗里德(Hervey, Alfred) ——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議會議員。——第194頁。
- 哈德逊, 乔治(Hudson, George 1800—1871) ——英国企业家, 最大的铁路业主, 托利党人, 議會議員。——第213、677頁。
- 哈蒙德, 艾德蒙(Hammond, Edmund 1802—1890) ——英国外交家, 曾任外交副大臣(1854—1873)。——第159、458頁。
- 哈尔科特, 弗兰西斯·維农(Harcourt, Francis Vernon) ——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議會議員。——第194頁。
- 哈弗洛克, 亨利(Havelock, Henry 1795—1857) ——英国將軍, 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1838—1842)和第一次英国对錫克人的战争(1845—1846)的参加者; 1857年参加鎮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302、303、318、319、323、325、326、330、331、353、382、385、528、556頁。
- 威勒尔(Wheeler) ——东印度公司的副董事长(1773—1780)。——第586頁。
- 威勒尔, 休·馬希(Wheeler, Hugh Massy 1789—1857) ——英国將軍, 1838—1839年参加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 参加过英国对錫克人的战争(1845—1846和1848—1849), 曾任康波爾駐防軍指揮官(1856—1857), 参加过鎮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302、325、404、406頁。
- 威尔逊, 阿奇戴尔(Wilson, Archdale 1803—1874) ——英国將軍,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圍困和强攻德里时(1857)任指揮官, 在圍困勒克瑙时(1858)任炮兵指揮官。——第323、328、354、359、528頁。
- 威尔逊, 詹姆士(Wilson, James 1805—1860)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 “經濟学家”杂志的創辦人和編輯, 議會議員, 1853—1858年任財政部秘书长。——第147、483、484、575頁。

- 威尔逊, 乔治 (Wilson, George 1808—1870)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 反谷物法同盟主席 (1841—1846)。——第 184 頁。
- 威尔逊 (Wilson, N. 死于 1857 年) ——英国上校, 参加过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415、416 頁。
- 威尔斯里侯爵, 理查·科利 (Wellesley, Richard Colley 1760—1842) ——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印度总督 (1798—1805), 外交大臣 (1809—1812), 爱尔兰总督 (1821—1828, 1833—1834)。——第 503、504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普魯士亲王, 摄政王 (1858—1861), 普魯士国王 (1861—1888), 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540、635、643—645、648—653、657—659、682、692—694、696、702、703 頁。
- 威廉四世 (William IV 1765—1837) ——英国国王 (1830—1837)。——第 505 頁。
- 威廉斯, 威廉·芬威克, 卡尔斯从男爵 (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 ——英国將軍, 1855 年克里木战争时期领导过卡尔斯的防御战; 議會議員 (1856—1859), 曾任烏里治守軍指揮官 (1856—1859)。——第 157、411 頁。
-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 (Westphalen, Ferdinand 1799—1876) ——普魯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曾任内务大臣 (1850—1858)。——第 648、678 頁。
-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 ——英国元帅, 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 (1828—1830), 外交大臣 (1834—1835)。——第 432 頁。
-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 ——伯爵, 普魯士將軍, 普魯士反动內閣的首腦 (1848—1850)。——第 650 頁。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貝肯斯菲尔德伯爵 (1871 年受封)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領袖; 曾任財政大臣 (1852、1858—1859、1866—1868), 內閣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140、141、146、147、156、157、170、192、195、263—267、288、289、433、476—480、538、539、575 頁。
- 英格利斯, 約翰·艾尔德利·威尔莫特 (Inglis, John Eardley Wilmot 1814—1862) ——英国將軍, 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400、401、403—405 頁。
- 范科特兰特, 亨利·查理 (Van Cortlandt, Henry Charles 1815—1888) ——英国將軍, 1832 年至 1839 年在錫克軍隊中供职, 曾站在英軍方面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对錫克人的战争 (1845—1846、1848—1849); 参加过镇压 1857—1859 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286、301、318、330 頁。
- 范斯特罗本齐, 查理·托马斯 (Van Straubenzee, Charles Thomas 1812—1892) ——英国將軍, 1855—1856 年在克里木战争中担任英軍一个旅的指揮官, 1857—1858 年在第二次对华鴉片战争中担任英軍指揮官。——第 623 頁。

## 十 画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偉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45 頁。

海特男爵, 奧古斯特 (Heydt, August 1801—1874) ——普魯士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 曾任商業、工業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 年 12 月—1862 年)。——第 672、679、680 頁。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偉大的德国作家。——第 559、673 頁。

夏龙-奧倫治世家 (Châlons-Oranien) ——始于十四世紀的伯爵家族。——第 105 頁。

爱里斯, 亨利 (Ellis, Henry 1777—1855) ——英国外交家, 曾任駐德黑蘭公使 (1814—1815), 后任大使 (1835—1836)。——第 131 頁。

埃尔斯納, 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 ——西里西亞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激进派; 1848 年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时是“新奧得報”編輯之一。——第 690 頁。

埃利奧特, 威廉 (Elliot, William) ——英国政治活動家, 議會議員 (1802)。——第 457 頁。

埃倫伯勒男爵, 爱德华·罗 (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50—1818) ——英国法学家, 輝格黨人, 后为托利黨人, 曾任首席檢察官 (1801—1802), 皇家法庭首席法官 (1802—1818)。——第 462 頁。

埃倫伯勒伯爵, 爱德华·罗 (Ellenbor-

ough, Edward Law 1790—1871) ——英国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議會議員; 曾任印度總督 (1842—1844); 1846 年任海軍首席大臣, 1858 年任印度事務督察委員會主席; 埃倫伯勒男爵之子。——第 276、433、499、503、519、560、561 頁。

埃梅里奧, 莫里斯·茹利安 (Emeriau, Maurice Julien 1762—1845) ——法国海軍上將, 地中海戰艦隊指揮官 (1811—1814)。——第 100 頁。

埃格林頓伯爵, 阿契波德·威廉·蒙哥馬利 (Eglington, Archibald William Montgomerie 1812—1861) ——英国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曾任愛爾蘭總督 (1852、1858—1859)。——第 711、712、714 頁。

埃斯科蘇拉-伊-莫羅格, 帕特里西奧·德·拉 (Escosura y Morrogh, Patricio de la 1807—1878) ——西班牙作家和國家活動家, 1856 年任埃斯帕特羅內閣的內務大臣。——第 45 頁。

埃斯帕特羅, 巴尔多梅罗, 維多利亞公爵 (Espartero, Baldomero, duque de la Vittoria 1793—1879) ——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動家, 进步派領袖, 1841—1843 年任西班牙攝政, 1854—1856 年任政府首腦。——第 42、44—46、53、235 頁。

埃斯潘納斯, 沙尔·瑪麗·埃斯普里 (Espinasse, Charles Marie Esprit 1815—1859) ——法国將軍, 波拿巴主義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積極參加者之一; 1854 年率兵遠征多布魯甲; 1855 年參加克里木戰爭; 任內務和公安大臣時 (1858) 實行恐怖統治。——第 428、440、444、446、465、501 頁。



- 俾斯麦, 奧托·馮·申豪森 (Bismarck, Otto von Schönhausen 1815—1898) ——公爵, 普魯士和德意志国家活动家, 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 曾任駐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駐巴黎大使 (1812), 普魯士首相 (1862—1871), 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統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曾制訂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 (1878)。——第 653 頁。
- 班迪亚, 亞諾什 (Bangya, János 1817—1868) ——匈牙利新聞記者和軍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 同时也是秘密警察; 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貝伊, 到土耳其軍隊中供职; 在切尔克斯人对俄战争时作为土耳其奸細在高加索进行活动 (1855—1858)。——第 179、508、509、513、514、592—597 頁。
- 格林, 乔治·格倫費耳 (Glyn, George Grenfell 1824—1887) ——英国銀行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曾任財政部秘书长 (1868—1873)。——第 479 頁。
- 格雷, 亨利·乔治 (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 ——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軍务大臣 (1835—1839), 陸軍和殖民大臣 (1846—1852), 查理·格雷之子。——第 152、158、538、543、546、708 頁。
- 格雷, 查理 (Grey, Charles 1764—1845) ——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領袖之一, 曾任首相 (1830—1834)。——第 432 頁。
- 格拉安,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后为皮尔派; 曾任內务大臣 (1841—1846), 海軍首席大臣 (1830—1834、1852—1855)。——第 157、170—173、194 頁。
- 格兰特, 詹姆斯·霍普 (Grant, James Hope 1808—1875) ——英国將軍, 1840—1842 年参加第一次对华鴉片战争; 1845—1846 年和 1848—1849 年参加英国对錫克人的战争; 参加过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416、470、473、474、554、611 頁。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 ——法国記者, 无原則的政客; 1848 年革命前是奥尔良派,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代表 (1852—1870), 立場极右; 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第 431、454 頁。
- 格倫維耳, 威廉 (Grenville, William 1759—1834) ——男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外交大臣 (1791—1801), 內閣首相 (1806—1807)。——第 10、456、461 頁。
- 格尔拉赫, 列奧波特 (Gerlach, Leopold 1790—1861) ——普魯士將軍, 四十年代时是反动宮廷奸党的首領; 1850 年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將軍衛侍卫长。——第 650、672 頁。
- 格蘭維耳伯爵, 乔治·魯森-高尔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1815—1891)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的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51—1852、1870—1874、1880—1885), 樞密院院长 (1852—1854、1855—1858、1859—1866), 殖民大臣 (1868—1870、1886)。——第 159、262 頁。
- 格劳修斯, 胡果 (Grotius, Hugo 1583—1645) ——荷兰学者, 法学家, 资产階級

- 自然法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第 248 頁。
- 格萊斯頓，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十九世紀下半叶是自由党領袖；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5, 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第 140, 141, 144—147, 157, 159, 170, 194, 195, 477, 547, 561, 575, 705, 706 頁。
- 庫克，乔治·溫格罗夫 (Cooke, George Wingrove 1814—1865) ——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記者，1857 年为“泰晤士报”駐中国通訊員。——第 601, 603, 604, 663 頁。
- 庫埃爾·辛格 (Kuer Singh 死于 1858 年) ——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時奧德的起義者領袖之一。——第 336 頁。
-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 ——公爵，俄国將軍，曾任多瑙河俄軍司令(1853—1854)，克里木駐軍總司令(1855 年 2—12 月)，波兰王国總督(1856—1861)。——第 210 頁。
- 朗比尔·辛格 (Ranbir Singh) ——出生于克什米尔的印度拉扎；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時期站在英国人一边。——第 333 頁。
- 朗格維爾世家 (Longueville) ——法国的公爵家族(1505—1672)。——第 105 頁。
- 特納，詹姆士·阿斯皮納耳 (Turner, James Aspinall 1797—1867) ——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曼彻斯特商会主席。——第 183 頁。
- 泰特，威廉 (Tite, William 1798—1873) ——英国建筑学家，自由党人，1855 年起为議會議員。——第 567 頁。
- 翁魯，汉斯·維克多 (Unruh, Hans Victor 1806—1886) ——普魯士工程师，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中間派領導人之一，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左派；以后是进步主义者政党的創始人之一，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653, 690 頁。
- 索菲婭，奧地利大公夫人 (Sophie, Erzherzogin von Österreich 1805—1872) ——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一世之母。——第 634 頁。
- 烏沙尔，让·尼古拉 (Houchard, Jean Nicolas 1740—1793) ——法国將軍，1793 年指揮法国北方軍团击潰約克公爵的英国軍隊。——第 7 頁。
- 烏特勒姆，詹姆士 (Outram, James 1803—1863) ——英国將軍，1854—1856 年任勒克瑙駐劄官；1857 年英国对波斯战争时期曾担任英軍指揮官；1857—1858 年任奧德首席專員；参加过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第 330, 400, 406, 469, 470, 472, 473, 518, 519 頁。
- 納那·薩希布 (Nana Sahib 約生于 1825 年) ——印度的封建主，最后一个派施华巴吉·拉奧二世 (馬拉提国的統治者) 的养子，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的領袖之一。——第 302, 303, 330, 524 頁。
- 納斯，理查·薩斯威尔·伯克，美奧伯爵 (Naas, Richard Southwell Bourke, Earl of Mayo 1822—1872) ——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爱尔兰事

- 务大臣 (1852、1858—1859、1866—1868), 印度总督 (1869—1872)。——第 711、712 頁。
- 納迪尔-沙赫 (Nadir-Shah 1688—1747) ——波斯沙赫 (1736—1747), 大軍閥, 1738—1739 年对印度进行掠夺性的征伐。——第 127 頁。
- 納集尔-埃德-丁 (Nazir-ed-Din 死于 1837 年) ——奥德国王 (1827—1837)。——第 505 頁。
- 納皮尔, 查理·詹姆斯 (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 ——英国將軍, 参加过反拿破侖第一的战争, 1842—1843 年指揮駐印軍隊攻占信德, 1843—1847 年为信德执政者。——第 138、270、284、382、411 頁。
- 納尔瓦艾斯, 拉蒙·馬利阿, 瓦倫西亚公爵 (Narváez, Ramón Maria, duque de Valencia 1800—1868) ——西班牙將軍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溫和派的領袖, 政府首腦 (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1866—1868), 殘酷鎮压群众的革命活动。——第 42—44、235、236、240 頁。
- 紐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費恩斯·佩勒姆·克林頓 (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Clinton 1811—1864)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 (1852—1854), 陸軍大臣 (1854—1855), 殖民大臣 (1859—1864)。——第 159 頁。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31、42、90、92、98—102、121、123、125、311、323、324、405、430、435、436、449、456—463、602、628、637、674、678 頁。
- 拿破侖第二——見雷希施塔特公爵, 約瑟夫·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19、20、26、30、31、32—36、38、40、42、43、53、55、60—62、65、66、69、71、79、82、84、88、155、165、166、169、170、195、218、221、226、227、242—244、249、256—258、278、279、289、308、315、351、375—377、379、417—423、428—432、434、435、437、438、440—444、446—448、450、451—456、460、465—468、481—487、499、502、520—522、540、541、545、546、644、666—670、674、686、689、695、698、706、709 頁。
- 拿破侖亲王——見波拿巴, 約瑟夫·沙尔·保尔。
- 馬丁, 詹姆斯 (Martin, James 1815—1886) ——男爵, 英国法学家; 1857 年任首席檢察官, 1858 年主持中央刑事法庭。——第 705 頁。
- 馬丁, 罗伯特·蒙哥馬利 (Martin, Robert Montgomery 1803 左右—1868) ——英国历史学家和統計学家, 著名的东方旅行家。——第 584、585 頁。
- 馬尼揚, 貝尔納·比埃尔 (Magnan, Bernard Pierre 1791—1865)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第 430 頁。
-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之一, 1849 年为羅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腦, 1850 年是倫敦欧洲民主主

- 义者中央委员会組織者之一。——第 61、450—455、616、716 頁。
- 馬多斯，帕斯庫阿耳 (Madoz, Pascual 1806—1870)——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进步派；1854 年任議會議長，1855 年任財政大臣，参加过 1854—1856 年革命。——第 45 頁。
- 馬森納，安得列 (Masséna, André 1756—1817)——法国元帅，拿破侖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之一，1814 年轉向波旁王朝。——第 122 頁。
- 馬扎里尼，朱利奧·雷蒙多 (Mazzarini, Giulio Raymondo 1602—1661)——法国国家活动家，紅衣主教；1643 年起任首席大臣，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际上是法国的統治者；执行巩固法国专制制度的政策。——第 648 頁。
- 馬尔波罗公爵，約翰·丘吉尔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1650—1722)——英国統帥，1702—1711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戰爭中任英軍总司令。——第 121、411 頁。
- 馬尔格累夫伯爵，乔治·奧加斯特斯·菲普斯 (Mulgrave, George Augustus Phipps 1819—1890)——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曾任皇室司庫 (1853—1858)，后历任英国殖民地总督。——第 164 頁。
- 馬尔科姆，約翰 (Malcolm, John 1769—1833)——英国外交家，东印度公司官員，曾任駐德黑兰公使 (1799—1801、1808—1809、1810)，孟买省督 (1826—1830)，关于印度著述甚多。——第 77、頁。
- 馬拉霍夫公爵——見佩利西埃，让·雅克。
- 馬姆茲伯里伯爵，詹姆士·霍华德·哈里

- 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 (1852 和 1858—1859)，掌璽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 6、159、435、542—545 頁。
- “铁人”弗里德里希第二 (Friedrich II, der «Eiserne» 1413—1471)——勃兰登堡选帝侯 (1440—1470)。——第 108 頁。

## 十一画

- 曼·辛格 (Man Singh)——奥德王国的大封建地主，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做了英国殖民者的帮凶。——第 611、613 頁。
- 曼·辛格 (Man Singh)——印度的拉扎，1858 年 8 月依附起义者，但在 1859 年初背叛了起义，出卖了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著名領袖唐蒂亚·托庇。——第 613 頁。
- 曼涅，比埃尔 (Magne, Pierre 1806—1879)——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財政大臣 (1855—1860、1867—1869、1870、1873—1874)。——第 69、465 頁。
- 曼托伊費尔，奧托·泰奧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貴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內务大臣 (1848—1850) 和首相 (1850—1858)。——第 632、648、649、658、672、679、694 頁。
-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創始人。——第 678 頁。

康諾利,阿瑟(Conolly, Arthur 1807—1842)——英國軍官,1840年任駐希瓦公使,在布哈拉被逮捕和殺死。——第638頁。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維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國大公,尼古拉一世之子,海軍元帥,領導海軍系統(1853—1881)和艦隊(1855—1881);1858—1861年作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委員參加1861年農民改革的準備和實行;1862—1863年任波蘭王國總督。——第627頁。

康沃利斯,查理(Cornwallis, Charles 1738—1805)——侯爵,英國反動的政治活動家,曾任印度總督(1786—1793、1805);任愛爾蘭總督期間(1798—1801)鎮壓了1798年愛爾蘭起義。——第517頁。

康羅貝爾,弗朗斯瓦·塞爾坦(Canrobert, François Certain 1809—1895)——法國元帥,波拿巴主義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積極參加者之一;克里木戰爭時期任駐克里木法軍總司令(1854年9月—1855年5月)。——第430、447頁。

康普豪森,盧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國銀行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魯士首相,奉行與反動派妥協的叛賣政策。——第632、645、654、676、677、679頁。

章格·巴哈杜爾(Jang Bahdur 1816—1877)——1846年起為尼泊爾的執政者;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時期站在英國人一邊,參加鎮壓起義。——第319、471頁。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爾·吉約姆(Gui-

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國家活動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實際上操縱了法國的內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31、431、442頁。

基卜生,托馬斯·米爾納(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國政治活動家,自由貿易派領袖之一,後成為自由黨人,曾任貿易大臣(1859—1865、1865—1866)。——第173、181—183、435頁。

基爾希曼,尤利烏斯(Kirchmann, Julius 1802—1884)——德國法學家和哲學家,激進主義者;1848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第653頁。

清朝——中國滿清王朝(1644—1911)。——第233頁。

許乃濟——中國國家活動家,1834年任廣東按察使,1836年提出過一項查禁鴉片走私的計劃。——第589頁。

勒奈,朗貝爾·阿梅德(Renée, Lambert Amédée 1808—1859)——法國政論家,波拿巴主義者,1856年起為“立憲主義者報”和“國家報”的發行負責人。——第481頁。

勒諾(Renaud 死於1857年)——英國軍官,參加過鎮壓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義。——第302頁。

勒庫爾布,克勞德·雅克(Lecourbe, Claude Jacques 1759—1815)——法國將軍,十八世紀末的革命戰爭和拿破侖第一各次征伐的參加者。——第123頁。

張伯倫,尼維爾·博爾茲(Chamberlain, Neville Bowles 1820—1902)——英

- 国將軍，后升元帅，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1838—1842)和第二次英国对錫克人的战争(1848—1849)的参加者，指揮过旁遮普的非正規軍(1854—1858)，鎮压过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1876—1881年任馬德拉斯軍队司令。——第298、328、471、474頁。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国作家。——第6、10、152、161、217、458、761頁。
-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er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領袖，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領袖之一；曾任首相(1852、1858—1859、1866—1868)。——第145、148—152、155、159、164、193、388、389、432—435、478、482、518、558、559、563、705—707、711、712頁。
- 理查三世(Richard III 1452—1485)——英国国王(1483—1485)。——第161頁。
- 培尔西尼，让·日尔貝尔·維克多(Persigny, Jean Gilbert Victor 1808—1872)——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議會議員(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曾任內务大臣(1852—1854、1860—1863)、駐倫敦大使(1855—1858、1859—1860)。——第33、421、446頁。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Morny, Charles Auguste Louis Joseph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侖第三之同母異父兄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曾任內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立法團議長(1854—1856、1857—1865)，駐俄大使(1856—1857)。——第38、220、421、435、443、444頁。
- 莫臥儿——見大莫臥儿。
-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Molière, Jean Baptiste 1622—1673)(真姓为波克兰Poquelin)——偉大的法国剧作家。——第311、702頁。
-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亞馬多(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偉大的奧地利作曲家。——第311頁。
- 敏托伯爵，吉伯特·埃利奧特(Minto, Gilbert Elliot 1751—1814)——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曾任駐維也納公使(1799—1801)，印度总督(1807—1813)。——第77、461頁。
- 梅里，安东尼(Merry, Anthony)——英国外交家，1802年任駐巴黎公使。——第457、458頁。
- 梅森，乔治·亨利·蒙克(Mason, George Henry Monck 1825—1857)——英国軍官，周德普尔駐劄官，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被击毙。——第336頁。
- 梅特兰，托馬斯(Maitland, Thomas 1759左右—1824)——英国將軍，曾任馬尔他总督(1813—1824)，伊奧尼亚群島首席專員和地中海英国武装部队司令(1815—1824)。——第708頁。
- 梅維森，古斯达夫(Mevissen, Gustav 1815—1899)——德国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之一；曾創辦許多大股份信貸銀行和工业股份公司。——第729頁。

## 十二画

萊麥爾，格奧爾格·恩斯特 (Reimer, Georg Ernst 1804—1885) ——德国出版商，保守派，普魯士議會議員。——第 690 頁。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探讨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 727、751、752 頁。

博丹-博普雷，沙尔·弗朗斯瓦 (Beaumonts-Beaupré, Charles François 1766—1854) ——法国工程师，水文地理学家。——第 101 頁。

博宁，爱德华 (Bonin, Edward 1793—1865)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曾任陸軍大臣 (1852—1854、1858—1859)。——第 671、679 頁。

博斯凱，比埃尔·約瑟夫·弗朗斯瓦 (Bosquet, Pierre Joseph François 1810—1861) ——法国元帥，資產階級共和派，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参加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第 430 頁。

琼斯，約翰 (Jones, John 1811—1878) ——英国軍官，在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指揮一个旅。——第 554 頁。

琼斯，哈福德·布萊杰斯 (Jones, Harford Brydges 1764—1847) ——英国外交家，曾任駐德黑兰公使 (1807—1811)。——第 78 頁。

凱里，亨利·查理 (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 ——美国庸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資本主义的辯護人，

資本主义社会階級利益一致的反動理論創始者。——第 734、736 頁。

凱倫，約翰·康拉德 (Kern, Johann Conrad 1808—1888) ——瑞士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駐巴黎公使 (1857—1883)。——第 444 頁。

凱撒 (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 (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 ——著名的羅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99、311 頁。

凱麥隆，休·英內斯 (Cameron, Hugh Innes) ——英国皇家銀行經理 (1849—1855)，曾因舞弊被判罪。——第 56、57、214—216 頁。

腊格倫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索美塞特 (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1788—1855) ——英国元帥，1854—1855 年任克里木駐軍司令。——第 411 頁。

普切塔——見蒙尼奧斯·本納溫特，霍賽。

普萊斯，理查 (Price, Richard 1723—1791) ——英国激进派政論家，經濟學家和道德論哲學家。——第 479、480 頁。

普拉兰，沙尔，舒阿澤尔公爵 (Praslin, Charles, duc de Choiseul 1805—1847) ——法国貴族，因杀妻而出名，被捕后服毒自杀。——第 436 頁。

普魯士亲王——見威廉一世。

普魯士亲王夫人——見奧古斯塔-瑪麗-路易莎-卡塔琳娜。

普魯士王后——見伊麗莎白。

普魯士的阿尔勃萊希特——見阿尔勃萊希特-弗里德里希。

普罗克希-奧斯頓，安东 (Prokesch-Osten, Anton 1795—1876) ——伯爵，奧

- 地利外交家，曾任駐君士坦丁堡使臣(公使)(1855—1867)，后为大使(1867—1871)。——第279頁。
- 普拉斯，昂利(Place, Henri)——法国金融家，股份銀行Crédit Mobilier的董事之一。——第31、315頁。
- 普拉东諾夫，亚历山大·普拉东諾維奇(Плато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латонович)——俄国少校，县貴族会会长；1858年在准备1861年农民改革的彼得堡貴族委员会中担任副主席。——第722頁。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經濟学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733、736、754頁。
- 斯密斯，約翰·馬克·弗雷德里克(Smith, John Mark Frederick 1790—1874)——英国將軍，軍事工程师，議會議員。——第289頁。
- 斯密斯，罗伯特·維农(Smith, Robert Vernon 1800—1873)——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5—1858)。——第269、271、433頁。
- 斯利曼，威廉·亨利(Sleeman, William Henry 1788—1856)——英国殖民官員，軍官，后升將軍，1843—1849年在瓜廖尔、1849—1854年在勒克瑙任駐劄官。——第507頁。
- 斯迈思，約翰·乔治(Smythe, John George)——英国政治活动家，上校，皮尔派，議會議員。——第194頁。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1869年受封)(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1858、1882—1885)，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1874—1878)，爱德华·得比之子。——第433、434頁。
- 斯托克，弗朗契舍克(Stock, Franciszek)——波兰流亡者，土耳其軍隊中的軍官。——第509、593、595頁。
- 斯托达特，查理(Stoddart, Charles 1806—1842)——英国外交家和軍官，1838年被任命为駐布哈拉公使，在布哈拉被逮捕和杀死。——第638頁。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經濟学家，重商主义著名理論家之一。——第736頁。
- 斯图亚特，唐納德·馬丁(Stewart, Donald Martin 1824—1900)——英国軍官，后升元帅，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参加过第二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1878—1880)，曾任駐印度武装部队总司令(1881—1885)，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1885—1900)。——第321頁。
- 斯宾諾莎，巴魯赫(別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論者。——第740頁。
- 斯蒂凡尼-路易莎-阿德里安娜，父姓博阿尔奈(Stéphanie-Louise-Adrienne, geb. Beauharnais 1789—1860)——1811年起为巴登大公夫人。——第674頁。
- 斯特拉本(Strabon 約公元前63—公元20)——古希腊最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第99頁。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1786—



- 1880)——英國外交家，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 1825—1828)，后为大使(1841—1858)。——第246頁。
- 斯特罗本齐——見范斯特罗本齐，查理·托馬斯。
- 惠特洛克，乔治·柯尔尼希(Whitlock, George Cornish 1798—1868)——英國將軍，1818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529、555頁。
- 惠特沃斯，查理(Whitworth, Charles 1752—1825)——英國外交家，曾任駐巴黎大使(1802—1803)，爱尔兰总督(1813—1817)。——第461—463頁。
- 温采尔，奥古斯特(Wenzel, August 1799—1860)——普魯士司法官員，議會議員(1849—1859)，屬於左派。——第694頁。
- 温德姆，威廉(Windham, William 1750—1810)——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后为托利黨人，議會議員，曾任陸軍大臣(1794—1801)。——第456、461頁。
- 温德姆，查理·阿什(Windham, Charles Ash 1810—1870)——英國將軍，1854—1856年参加克里木战争；曾任駐拉合尔英軍指揮官(1857—1861)，镇压过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06、411—416、469頁。
- 温斯劳，福布斯(Winslow, Forbes)——英國醫生和記者，“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編輯。——第566頁。
- 費边(昆图斯·費边·馬克西姆)(Quintus Fabius Maximus 公元前275左右—203)——古羅馬統帥，因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采取观望战术，避免进行决战而有緩进者之称。——第7頁。
- 費特，摩里茨(Veit, Moritz 1808—1864)——德國出版商，自由派，普魯士議會議員。——第690頁。
- 費特赫-阿利-沙赫(Feth-Ali-Shah 1762—1834)——波斯的沙赫(1797—1834)。——第78頁。
- 費魯赫汗(Ferukh Khan)——波斯外交家，1857年英波條約的簽字人；曾任駐倫敦公使(1857)。——第246、248頁。
- 費茲帕特里克，理查(Fitzpatrick, Richard 1747—1813)——英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輝格黨人，議會議員；曾任爱尔兰事務大臣(1782)，陸軍大臣(1783、1806—1807)。——第10頁。
- 雅科比，卡尔·維干德·馬克西米利安(Jacobi, Karl Wigand Maximilian 1775—1858)——德國精神病醫師。——第632頁。
- 雅科比，約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左派的領導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極左派；七十年代歸屬社會民主黨。——第652、690頁。
- 舒瓦洛夫，彼得·巴甫洛維奇(Шувалов,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生于1824年)——彼得堡省貴族會會長，准备1861年農民改革的彼得堡貴族委員會主席。——第722頁。
-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國銀行家和國家活動家，奧爾良派，后成为波拿巴主義者，1849—1867年曾多次任財政部長，1852—1860年任皇廷事務大臣。——第220、421、430頁。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38 頁。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 由于 1848 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炮彈国王”的諱号。——第 19 頁。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 (1808 和 1814—1833)。——第 43、51、52 頁。

斐迪南亲王——見弗雷德里克-斐迪南。

菲力浦, 奥尔良公爵 (Philippe, duc d'Orléans 1674—1723)——法国的摄政王 (1715—1723)。——第 40、315、453 頁。

菲力浦逊, 格里哥里·伊万諾維奇 (Филлипсон,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9—1883)——俄国將軍, 参加过征服高加索。——第 508、595 頁。

菲利莫尔, 約翰·乔治 (Phillimore, John George 1808—1865)——英国法学家,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議會議員 (1852—1857)。——第 194 頁。

菲利莫尔, 罗伯特·約瑟夫 (Phillimore, Robert Joseph 1810—1885)——英国法学家, 輝格党人, 后为皮尔派, 議會議員 (1852—1857); 約翰·乔治·菲利莫尔之弟。——第 194 頁。

菲茨罗伊, 亨利 (Fitzroy, Henry 1807—1859)——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后为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曾任內务副大臣 (1852—1855)。——第 567 頁。

### 十三画

雷, 約翰 (Rea, John 1822—188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青年爱尔兰”社的成員。——第 713 頁。

雷希·伊文思——見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

雷希施塔特公爵, 約瑟夫·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 (Reichstadt, Joseph François Charles Bonaparte 1811—1832)——拿破侖第一和瑪麗亚-路易莎之子; 曾被波拿巴派提为法国王位繼承者。——第 446 頁。

雷納尔, 沙尔·弗雷德里克 (Reinhard, Charles Frédéric 1761—1837)——伯爵, 法国外交家, 1802 年任駐下薩克森公使, 原系德国人。——第 463 頁。

塔索, 托尔克瓦托 (Tasso, Torquato 1544—1595)——著名的意大利詩人, “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一詩的作者。——第 441 頁。

塔尔迈尔 (Thalmayr) (又名艾敏-阿加 Emin-aga)——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者。——第 594 頁。

道光——中国皇帝 (1821—1850)。——第 190 頁。

蒙蒂霍, 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 拿破侖第三之妻。——第 421 頁。

蒙尼奧斯夫人——見瑪麗-克里斯亭娜。

蒙尼奧斯·本納溫特, 霍賽 (普切塔) (Muñoz Benavente, José (Pucheta) 1820—1856)——西班牙斗牛士, 1854—1856 年資产階級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馬德里人民群众的領導者之一, 1856 年六月事件中領導馬德里的工人武装队伍; 在战斗中牺牲。——第 45、50 頁。

蒙克里夫, 詹姆斯 (Moncreiff, James 1811—1895)——英国法学家, 議會議員; 曾任苏格兰檢察长 (1851—1852、1852—1858、1859—1866、1868—1869)。——第 157 頁。

蒙塔郎貝爾, 沙爾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 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 奧爾良派, 天主教會的首領;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變時支持路易·波拿巴, 但不久又成為他的反對者。——第35、36、666—669、698頁。

攝政王——見威廉一世。

塞西杰爾, 弗雷德里克, 切耳姆斯福德男爵 (Thesiger, Frederick, Baron Chelmsford 1794—1878) —— 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1840年起為會議員, 曾任首席檢察官 (1845—1846、1852), 大法官 (1858—1859、1866—1868)。——第157頁。

塞萬提斯·德·薩維德拉, 米格爾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 偉大的西班牙現實主義作家。——第479頁。

塞爾維烏斯·土利烏斯 (Servius Tullius 公元前578—534) —— 羅馬第六個皇帝。——第660頁。

塞拉諾-伊-多敏格斯, 弗朗西斯科 (Serrano y Domínguez, Francisco 1810—1885) —— 西班牙將軍和國家活動家, 陸軍大臣 (1843), 1856年政變的參加者, 外交大臣 (1862—1863), 政府首腦 (1868—1869、1871、1874), 王國攝政 (1869—1871)。——第42、238頁。

塞弗爾-帕沙 (Sefer-Pasha) —— 切爾克西亞王公; 听命於土耳其, 曾參加俄土戰爭 (1826—1828); 1855—1859年領導了切爾克斯山民同俄國作戰。——第508、513、514、593、594、597頁。

塞巴斯提昂尼, 奧拉斯 (Sébastieni, Horace 1772—1851) —— 伯爵, 法國

元帥, 外交家; 1801—1802年在土耳其、埃及和敘利亞任拿破侖第一的外交使節;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2), 駐倫敦大使 (1835—1840)。——第461頁。

福克斯, 威廉·約翰遜 (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 —— 英國政治活動家, 傳教士, 政論家, 自由貿易派, 後來屬於自由黨, 會議員。——第181頁。

福克斯, 查理·詹姆士 (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 —— 英國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782、1783、1806)。——第10、432頁。

楊格, 約翰 (Young, John 1807—1876) —— 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曾任愛爾蘭事務大臣 (1852—1855), 伊奧尼亞群島首席專員 (1855—1859)。——第705、707頁。

詹姆斯, 愛得文·約翰 (James, Edwin John 1812—1882) —— 英國律師, 會議員, 曾做過貝爾納的辯護人。——第482頁。

詹姆斯一世 (James I 1566—1625) —— 英國國王 (1603—1625)。——第653頁。

詹姆斯二世 (James II 1633—1701) —— 英國國王 (1685—1688)。——第458、653頁。

瑟美列, 貝爾塔蘭 (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 —— 匈牙利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曾任內務部長 (1848) 和革命政府首腦 (1849); 革命失敗後逃離匈牙利。——第180頁。

路易十三 (Louis XIII 1601—1643) —— 法國國王 (1610—1643)。——第648頁。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62、78、453、458頁。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第43、427、646頁。
-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33、40、42、43、241、243、256、264、375、429、430、436、453、465、502、659、666頁。
- 路易斯,乔治·康瓦尔(Lewis, George Cornwe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1852年至1855年为“爱丁堡評論”的出版者和編輯;财政大臣(1855—1858),內务大臣(1859—1861),陸軍大臣(1861—1863)。——第140、141、144—146、434、477、479、575頁。
- 路加德,爱德华(Lugard, Edward 1810—1898)——英国將軍;在英国对波斯战争期間(1856—1857)任參謀长;参加过鎮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73、555頁。
-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銀行行长。——第31頁。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s)——金融世家,在欧洲許多国家設有銀行。——第70、243、380、645頁。
- 奥托,路易·吉約姆(Otto, Louis Guillaume 1754—1817)——法国外交家,曾任駐倫敦公使(1800—1802),駐維也納大使(1809—1813)。——第457、458、460頁。
- 奥克兰伯爵,乔治·伊登(Auckland, George Eden 1784—1849)——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多次担任內閣大臣,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第131、505、507頁。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王朝(1830—1848)。——第443、444、499、502、521頁。
- 奥尔良公爵——見路易-菲力浦。
- 奥尔良的瑪丽,奈穆尔公爵夫人(Marie d'Orléans, duchesse de Nemours 1625—1707)——朗格維尔公爵昂利第二之女。——第105頁。
-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費多罗維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公爵,俄国軍事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1856年率領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會議;国家参政院和大臣委员会主席(1856);1858年任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廢除农奴制。——第17頁。
- 奥尔西尼,費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爭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統一的斗争的杰出活动家之一;因行刺拿破侖第三被处死。——第432、436—439、441、442、444頁。
- 奥尔梭普子爵,約翰·查理·斯宾塞(Althorp, John Charles Spencer 1782—1845)——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1830—1834年任财政大臣。——第15頁。
- 奥尔斯瓦特,魯道夫(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魯士国家活动家,与资产階級相接近的自由派貴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不管部大臣(1858—1862)。——第672、676—678頁。

奥尔德利的斯坦利男爵, 爱德华·約翰·斯坦利(Stanley of Alderley, Edward John Stanley 1802—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 曾任貿易大臣(1855—1858), 郵政大臣(1860—1866)。——第388、389、391頁。

奥当斯·博阿尔奈(Hortense Beauharnais 1783—1837)——拿破侖第三之母, 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妻。——第456、644頁。

奥当奈尔, 列奥波多, 吕逊納伯爵(O'Donnell, Leopoldo, Conde de Lucena 1809—1867)——西班牙將軍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溫和派的領袖之一; 古巴总督(1843—1848), 1854年利用国内革命危机建立了軍事專政; 曾以陸軍大臣身分領導了鎮压1854—1856年資產階級革命; 历任政府首脑(1856、1858—1863、1865—1866)。——第41—46、49、50、52、53、235、236、240頁。

奥当奈尔, 恩利克·霍賽, 比斯巴尔伯爵(O'Donnell, Enrique José, Conde de la Bisbal 1769—1834)——西班牙將軍, 1808—1814年獨立戰爭的參加者; 以毫无原則著称; 在反动时期(1814—1820)同自由派保持联系, 向政府出卖过革命者。——第43頁。

奥古斯塔-瑪丽-路易莎-卡塔琳娜(Augusta-Marie-Louise-Katharina 1811—1890)——普魯士親王威廉之妻。——第635、671、674、692—694頁。

奥地利的阿尔勃萊希特——見阿尔勃萊希特第三。

奥倫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 英国国王(1689—

1702)。——第105頁。

奥維尔斯頓男爵, 賽米爾·琼斯·勞埃德(Overstone, Samuel Jones Loyd 1796—1883)——英国銀行家, 輝格党人, 对罗伯特·皮尔的財政政策, 特别是皮尔的1844年英格蘭銀行法, 起主要影响。——第339、369、574、575頁。

#### 十四画

豪弗, 威廉(Hauff, Wilhelm 1802—1827)——德国小說家。——第631頁。

瑪丽-克里斯亭娜(Maria-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29—1833), 斐迪南七世之妻, 王国攝政(1833—1840)。——第42、43、52、126、235頁。

瑪蒂尔达, 波拿巴公主(Mathilde, Bonaparte 1820—1904)——日罗姆·波拿巴之女, 拿破侖第三之堂妹。——第438頁。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645、673、675頁。

蒲魯东, 比埃尔·約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論家, 經濟學家和社会學家, 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第31、734、758頁。

赫伯特, 悉尼(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是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曾任海軍部秘书长(1841—1845), 軍務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陸軍大臣(1859—1860)。——第157、194、195頁。

維尔曼, 阿伯尔·弗朗斯瓦 (Villemain, Abel François 179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自由派, 曾任国民教育大臣 (1839—1840、1840—1844)。——第 431、698 頁。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ctor-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 (1849—1861), 意大利国王 (1861—1878)。——第 20、380、698 頁。

維萊什 (Verres)——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者。——第 597 頁。

維伊奧, 路易·弗朗斯瓦 (Veillot, Louis François 1813—1883)——法国記者, 天主教的狂热支持者, “世界报”的主編 (1848—1860)。——第 447 頁。

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第 493 頁。

## 十五画

潘繆尔男爵, 福克斯·莫尔 (Panmure, Fox Maule 1801—1874)——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軍务大臣 (1846—1852), 陸軍大臣 (1855—1858)。——第 433 頁。

墨尔本子爵, 威廉·拉姆 (Melbourne, William Lamb 1779—1848)——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內务大臣 (1830—1834) 和首相 (1834、1835—1841)。——第 432 頁。

緬施科夫, 亚历山大·謝尔盖也維奇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 俄国軍事和国家活动家, 1853 年任駐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 曾任俄国克里木陸海軍总司令 (1853—1855)。——第 277、447 頁。

德朗格尔, 克劳德·阿尔丰斯 (Delangle, Claude Alphonse 1797—1869)——法国法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 1847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以前任檢察长; 帝国法庭庭长, 1858—1859 年任內务大臣。——第 437 頁。

## 十六画

默西, 德 (Mercy, de)——法国軍官, 1858 年因凶杀本团的一名軍官而被軍事法庭判处死刑。——第 522 頁。

默里, 查理·奥加斯特斯 (Murray, Charles Augustus 1806—1895)——英国外交家, 曾任駐埃及总領事 (1846—1853), 駐德黑兰公使 (1854—1859)。——第 249、287 頁。

霍格, 詹姆士·威尔 (Hogg, James Weir 1790—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議會議員; 1846—1847 年和 1852—1853 年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 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 (1858—1872)。——第 175、194 頁。

霍策, 弗里德里希 (Hotze, Friedrich 1739—1799)——奥地利元帅。——第 122 頁。

霍納, 萊昂納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任工厂視察員 (1833—1856), 維護工人利益。——第 198 頁。

霍姆斯, 約翰 (Holmes, John 1808—1878)——英国上校, 后升將軍, 参加过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 (1838—1842) 和对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鎮压。——第 612 頁。

霍尔卡尔, 图卡吉 (Holkar, Tukadji 約生于 1836 年)——馬拉提人, 印度印多尔公国的国君, 1857—1859 年印度民

- 族解放起义时期站在英国人一边。——第 321 頁。
- 霍亨索倫王朝 (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 (1415—1701)、普魯士国王 (1701—1918) 和德国皇帝 (1871—1918) 的王朝。——第 104、105、107—111、644、649、650、656、674、693 頁。
- 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 卡尔-安东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Karl-Anton 1811—1885)——亲王, 普魯士將軍, 曾任首相 (1858—1862)。——第 671、674、675 頁。
- 霍克斯柏里,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Hawkesbury, Robert Banks Jenkinson 1770—182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外交大臣 (1801—1803、1809), 內务大臣 (1804—1806、1807—1809), 首相 (1812—1827)。——第 457、458、460、461 頁。
- 鮑切尔, 乔治 (Bourchier, George 1821—1898)——英国軍官, 曾参加鎮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328 頁。
- 璞鼎查, 亨利 (Pottinger, Henry 1789—1856)——英国外交家和將軍, 1841—1842 年任駐華公使, 1842 年第一次对华鴉片战争时任英軍司令, 1843 年任香港总督, 1847—1854 年任馬德拉斯总督。——第 189、600 頁。
- 諾兰, 路易斯·爱德华 (Nolan, Lewis Edward 1820 左右—1854)——英国軍官, 在印度服役,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著有騎兵方面的书籍甚多。——第 229 頁。
- 諾思科特, 斯泰福·亨利 (Northcote, Stafford Henry 1818—1887)——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后屬保守党, 議會議員 (1855—1857、1858—1885), 历任內閣大臣。——第 194 頁。
- 諾塞达尔, 康迪多 (Nocedal, Cándido 1821—1885)——西班牙政論家, 屬于溫和派, 議會議員; 曾任內务大臣 (1856—1857)。——第 236 頁。
- 穆勒, 約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实证論哲学家, 政治經濟学古典派的摹仿者。——第 577、736、737 頁。
- 穆苏卢斯-帕沙 (康斯坦丁) (Musurus-Pasha (Konstantin) 1807—1891)——土耳其外交家, 曾任駐倫敦公使, 后为大使 (1851—1885); 原系希腊人。——第 279、280 頁。
- 穆罕默德·阿利-沙赫 (Mohammed Ali-Shah)——奧德国王 (1837—1842)。——第 505 頁。
- 穆斯托克西迪斯, 安得列阿斯 (Moustoxydes, Andreas 1785—1860)——希腊学者和政治活动家, 从事伊奧尼亚群島历史的研究。——第 708 頁。
- 賴辛施佩格, 奧古斯特 (Reichensperger, August 1808—1895)——德国法学家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屬于左派; 从 1852 年起为普魯士議會中的天主教議員的領袖。——第 694 頁。
- 賴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領袖之一, “改革报”編輯; 1848 年是临时政府委員, 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 33 頁。

## 十七画

繆拉特, 約阿希姆(Murát, Joachim 1767—1815) ——法国元帅, 拿破侖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 1808年任駐西班牙的法軍指揮官; 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第52、674頁。

## 十八画

額尔金伯爵, 詹姆斯·布魯斯(Elgin, James Bruce 1811—1863) ——英国外交家, 1857—1858年和1860—1861年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 曾任印度总督(1862—1863)。——第254、663頁。

魏格林, 托馬斯(Weguelin, Thomas) ——英国商业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1857年是英格兰銀行經理。——第580頁。

薩西, 賽米尔·西尔韦斯特尔·德(Sacy, Samuel Silvestre de 1801—1879) ——法国政論家, 1828年起参加“辯論日报”編輯部。——第431頁。

薩伊, 让·巴蒂斯特(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 ——法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代表人物。——第746頁。

薩頓, 約翰·亨利·曼納斯(Sutton, John Henry Manners) ——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議會議員(1847—1857)。——第194頁。

薩格登, 爱德华·圣萊昂納茲男爵(Sugden, Edward, Baron St. Leonards 1781—1875) ——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2年任大法官。——第433頁。

薩德勒, 約翰(Sadleir, John 1814—1856) ——爱尔兰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議會中爱尔兰集团的領袖之一, 梯培雷里銀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 1853年任財政副大臣, 因梯培雷里銀行在1856年破产自杀。——第32、55頁。

薩瓦王朝(Savoyen) ——意大利的王朝之一, 从1720年至1861年統治撒丁王国, 从1861年至1946年統治意大利联合王国。——第17—21頁。

薩瓦亲王奧伊根(Eugen, Prinz von Savoyen 1663—1736) ——奥地利統帥和外交家。——第121頁。

薩尔托里烏斯, 費南多·路易斯·霍賽, 圣路易斯伯爵(Sartorius, Fernando Luis José, conde de San Luis 1820—1871) ——西班牙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政論家, 溫和派領袖之一, 曾任內务大臣(1847—1851), 政府首腦(1853—1854)。——第235、236頁。

## 十九画

龐培(格奈尤斯·龐培·馬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106—48) ——羅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99頁。



## 期 刊 索 引

### 二 画

- “人民报”(《*Volks-Zeitung*》)——柏林出版。——第 657 頁。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第 3 頁。  
 “十字报”(《*Kreuz-Zeitung*》)——見“新普魯士报”。

### 三 画

- “上帝和人民”(《*Dio e Popolo*》)——热那亚出版。——第 616 頁。  
 “大陆评论”(《*The Continental Review*》)——倫敦出版。——第 444 頁。  
 “大陆上中华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香港出版。——第 150、585 頁。  
 “乡下佬”(《*The Mofussilites*》)——米拉特、阿格拉、安巴拉出版。——第 301 頁。

### 四 画

- “凤凰”(《*The Phoenix*》)——加尔各答出版。——第 410 頁。  
 “太阳报”(《*The Sun*》)——倫敦出版。——第 195 頁。  
 “中华之友”(《*Friend of China*》)——見“大陆上中华之友”。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

——布魯塞爾出版。——第 88 頁。

- “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and Mental Pathology*》)——倫敦出版。——第 566 頁。

### 五 画

- “东方新闻报”(《*La Presse d'Orient*》)——君士坦丁堡出版。——第 593—597 頁。  
 “北不列颠每日邮报”(《*North British Daily Mail*》)——格拉斯哥出版。——第 362 頁。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 61、431、442、481、482、540 頁。  
 “加尔各答日报”(《*The Calcutta Gazette*》)——第 319 頁。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 521 頁。  
 “世界报”(《*Univers*》)——見“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  
 “汉堡記者”(《*Hamburger Korrespondent*》)——見“汉堡公正記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卢瓦尔河上的灯塔”(《*Le Phare de la Loire*》)——南特出版。——第 420 頁。  
 “汉堡公正記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Korrespondenten*》)——

第 463 頁。

## 六 画

- “权力报”（《Le Pouvoir》）——巴黎出版。  
——第 482 頁。
- “同盟报”（《L'Union》）——巴黎出版。  
——第 540 頁。
- “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  
塞腊姆普尔出版。——第 333、335 頁。
- “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  
倫敦出版。——第 49、348 頁。
-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倫敦  
出版。——第 350、594 頁。
- “多瑙河之星”（《L'Etoile du Danube》）  
——布魯塞爾出版。——第 279、280  
頁。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  
ler》）——倫敦出版。——第 348、407、  
706 頁。

## 七 画

- “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  
都柏林出版。——第 713 頁。
- “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倫敦  
出版。——第 625 頁。
-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  
出版。——第 117、298、300、331、348、  
482、705 頁。
-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  
tinople》）——第 596 頁。

## 八 画

- “邮报”（《Post》）——見“晨邮报”。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  
出版。——第 657、658 頁。
- “国家报”（《Le Pays》）——巴黎出版。  
——第 275 頁。

-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見  
“普魯士王国国家通报”。
- “国民議會报”（《L'Assemblée nationale》）  
——巴黎出版。——第 62 頁。
- “孟买日报”（《The Bombay Gazette》）——  
第 354 頁。
- “孟买时报”（《The Bombay Times》）——  
第 273、274 頁。
- “孟买信使报”（《The Bombay Courier》）  
——第 335 頁。
- “孟加拉日报”（《The Bengal Gazette》）  
——見“加尔各答日报”。
- “佩斯劳埃德氏报”（《Pester Lloyd》）——  
布达佩斯出版。——第 179 頁。
-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  
（《L'Univers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  
巴黎出版。——第 447、481、482、521、  
540 頁。

## 九 画

-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  
——第 439、482、483、487、540 頁。
- “观察家”（《The Examiner》）——倫敦出  
版。——第 192 頁。
-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倫敦出  
版。——第 706 頁。
- “紀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  
——倫敦出版。——第 11、348、708 頁。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巴黎出版。——第 32、41、42、65、  
66、83、221、226、418—421、430、436、  
439、440、442、447、456、459—466、468、  
482、687 頁。
- “軍事旁观者”（《Military Spectator》）——  
倫敦出版。——第 333 頁。
-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

倫敦出版。——第 616 頁。

“政治周刊”（《*Politisches Wochenblatt*》）——見“柏林政治周刊”。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第 727 頁。

“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 31、43、45、78、420、431 頁。

“政治紀事報”（《*Political Register*》）——見“科貝特氏政治紀事週報”。

“科貝特氏政治紀事週報”（《*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第 11、12 頁。

## 十 画

“記者”（《*Le Correspondant*》）——巴黎出版。——第 667 頁。

“旁觀者”（《*Le Spectateur*》）——巴黎出版。——第 420 頁。

“泰晤士報”（《*The Times*》）——倫敦出版。——第 23、24、59、78、112、116、153、158、163、182、192、247、255、260、269、289、298—300、310、311、324、341、361、372、389、391、407、409、414、420、476、495、499、500、502、526、539、540、562、563、601、626、664、700、706 頁。

“愛丁堡評論”（《*The Edinburgh Review*》）——第 140、433 頁。

“紐約先驅報”（《*The New-York Herald*》）——第 483 頁。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148、279、592—594 頁。

“馬德里報”（《*Journal de Madrid*》）——第 48 頁。

“馬德里日報”（《*Gaceta de Madrid*》）——

第 44 頁。

“索美塞特郡報”（《*Somerset County Gazette*》）——倫敦出版。——第 562 頁。

“通報”（《*Le Moniteur*》）——見“總匯通報”。

“鐵路、礦山和公共工程問題報”（《*Journal des Chemins de Fer, des Mines et des Travaux Publics*》）——巴黎出版。——第 82 頁。

## 十一 画

“晨報”（《*The Morning Advertiser*》）——倫敦出版。——第 195、330、562 頁。

“晨郵報”（《*The Morning Post*》）——倫敦出版。——第 181、192、195、284、349、562 頁。

“晨星報”（《*The Morning Star*》）——倫敦出版。——第 624、705 頁。

“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184 頁。

“笨拙，或倫敦喧聲”（《*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163、436 頁。

“商人雜誌和商業評論”（《*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紐約出版。——第 585 頁。

## 十二 画

“普魯士報”（《*Preussische Zeitung*》）——見“普魯士總匯報”。

“普魯士總匯報”（《*Allgemein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692 頁。

“普魯士王國國家通報”（《*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 672、701、704 頁。

“費加羅報”（《*Figaro*》）——巴黎出版。——第 522 頁。

十三画

- “新聞報”(《*La Presse*》)——巴黎出版。  
——第46、81頁。
- “新聞報”(《*The Press*》)——倫敦出版。  
——第192、275頁。
-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ssische Zeitung*》)  
——柏林出版。——第681、700、731  
頁。
- “誠實的不列顛人報”(《*The True Briton*》)  
——倫敦出版。——第460頁。

十四画

- “旗帜報”(《*The Standard*》)——倫敦出  
版。——第349頁。

十五画

- “論壇報”(《*Tribune*》)——見“紐約每日論  
壇報”。
-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倫敦  
出版。——第80、350、468、483—487、  
536、600、601、603、604、622頁。

十七画

- “輿論報”(《*Opinion*》)——都灵、佛罗倫  
薩、羅馬出版。——第378頁。

二十一画

- “辯論日報”(《*Débats*》)——見“政治和文  
學辯論日報”。

## 地名索引\*

## 三 画

- 土倫——第 687 頁。  
 土魯斯——第 42、82、687 頁。  
 土尔盖河——第 135 頁。  
 土尔克斯坦——第 134、135、139、637、638、640、642、665 頁。  
 上海——第 74、189、233、601、603、604、624、625、663 頁。  
 下新城(高尔基)——第 168 頁。  
 大西洋——第 713 頁。  
 小亚細亞——第 93 頁。  
 千島群島——第 168 頁。  
 广东——第 233、623 頁。  
 广西——第 233 頁。  
 广州——第 112、114—117、146、153、158、159、162—164、176、177、194、233、310、432、502、589、590、601、623—625、662、663 頁。  
 土麦那(伊斯密尔)——第 91、96 頁。

## 四 画

- 巴黎——第 20、21、25、35、42、43、59、60、65、67、69、71、78、81、85、88、170、241、243、246、287、290、376、377、428、432、437、439、440、442、457、460、461、468、

- 508、522、540、594、597、667、682、686、687、693、708、709、720 頁。  
 巴登——第 674 頁。  
 巴希——德里郊区。——第 300 頁。  
 巴庫——第 135、136 頁。  
 巴耳赫(伐齐腊巴德)——第 134、135、137、641 頁。  
 巴伊亞——第 374 頁。  
 巴格达——第 246 頁。  
 巴特那——第 303 頁。  
 巴斯拉——第 77、247 頁。  
 巴雷利——第 300、524、529、553、554 頁。  
 巴达霍斯——第 499 頁。  
 巴塞罗纳——第 41、45、48—51、82 頁。  
 巴拉克拉瓦——第 353、386、411、415 頁。  
 巴腊克普尔——第 252、417 頁。  
 巴腊特普尔——第 302 頁。  
 巴斯克地区(巴斯克)——第 48、49 頁。  
 比哈尔——印度的州。——第 319、331、555 頁。  
 比都尔——第 302、319、330、415 頁。  
 比桑歇——第 436 頁。  
 比达索阿河——第 42 頁。  
 比利牛斯山——第 42、82 頁。  
 比利牛斯半島——第 42、261 頁。  
 木兰——第 687 頁。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木尔坦——第 336 頁。  
 木尔西亚——第 41、48 頁。  
 木尔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第 48 頁。  
 木尔加布河——第 134 頁。  
 太平洋——第 73、636 頁。  
 切塔特——第 230 頁。  
 切尔西——第 9 頁。  
 切尔克西亚——第 179、180、508—514、592—598 頁。  
 牙买加島——第 542 頁。  
 文迪亚山脉——印度的山。——第 301、555 頁。  
 牛津——第 14 頁。  
 戈壁——沙漠。——第 665 頁。  
 中亚細亚——第 134、636、637、665 頁。  
 韦斯卡——第 49 頁。  
 什列斯維希——第 60、290、650、679、703 頁。  
 厄尔謝朗施——第 380 頁。  
 厄尔布尔士山脉——第 133 頁。

## 五 画

布倫——第 687 頁。  
 布什尔——第 77、133、137、139、229、231、246、248、249、253、287 頁。  
 布尔日——第 687 頁。  
 布拉格——第 650 頁。  
 布哈拉——第 134、135、137、638 頁。  
 布来洛夫(布来拉)——第 96 頁。  
 布达佩斯——第 351 頁。  
 布克薩尔——第 554 頁。  
 布勒斯特——第 687 頁。  
 布魯塞尔——第 279、435 頁。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652、682、691 頁。  
 布倫特弗德——第 564、566 頁。

布加勒斯特——第 278、280 頁。  
 卡昂——第 687 頁。  
 卡耳皮——第 330、469、471、529、553、555 頁。  
 卡尔斯——第 155、230 頁。  
 卡拉奇——第 336 頁。  
 卡賴尔——第 171、173 頁。  
 卡塔罗(科托尔)——第 99 頁。  
 卡尔納耳——第 300 頁。  
 卡利亚里——撒丁島上的居民点。——第 323 頁。  
 卡迪博納——山口。——第 121 頁。  
 卡塔黑納——第 48 頁。  
 卡尔尼奥拉(克腊伊納)——第 102 頁。  
 卡尔斯卢厄——第 693 頁。  
 卡腊布拉克——第 639 頁。  
 卡塔卢尼亚——第 41、48、49 頁。  
 汉堡——第 103、351、366—369、373、374、378、423、463、650、730 頁。  
 汉威耳——在倫敦近郊。——第 565、570 頁。  
 加来——第 687 頁。  
 加迪斯——第 48 頁。  
 加茲尼——第 134、137 頁。  
 加拉茲——第 96、103 頁。  
 加尔各答——第 78、138、252、253、260、270、275、286、306、307、326、329、330、335、338、381、409、503、524、559、591、612、614 頁。  
 加利西亚——第 49 頁。  
 加济普尔——第 320 頁。  
 加利福尼亚——第 67、71、395、534、578 頁。  
 加斯梯里亚——第 42、48 頁。  
 旧加斯梯里亚——第 49 頁。  
 圣亚田——第 376、687 頁。  
 圣昆廷——第 687 頁。

圣哥达——山口。——第122頁。  
 圣奧梅尔——第687頁。  
 圣多明哥(海地)島——第311頁。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435、563、  
 584、626、627、637、638、640、650頁。  
 圣塞瓦斯田——第499頁。  
 尼姆——第687頁。  
 尼泊尔——第262、319、326、503、554頁。  
 尼馬奇——第300、301頁。  
 北京——第166、168、189、191、233、588、  
 615、625、662、664、665頁。  
 北希尔兹——第363頁。  
 古巴——島。——第178、545頁。  
 古姆提河——第381、470、473頁。  
 古扎拉特——第303頁。  
 弗兰德——第7、9、11頁。  
 瓦兰壬——第104、105頁。  
 瓦尔那——第96、230頁。  
 瓦拉儿亚——第280、281、533、598頁。  
 瓦朗西恩——第687頁。  
 瓦倫西亚——第41、48頁。  
 瓦倫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第  
 48頁。  
 瓦瑞克郡——英国的郡。——第203頁。  
 东印度——第291、343、369、370、531  
 頁。  
 东普魯士省——第676、678頁。  
 卢昂——第83、376、687頁。  
 卢迪阿納——第294、297、301頁。  
 卢瓦尔河——第66頁。  
 皮劳尔——第260、297頁。  
 皮蒙特——第17—22、277、278、698、703  
 頁。  
 皮腊諾——第96頁。  
 皮阿琴察——第20、697頁。  
 生河——第319頁。  
 白沙瓦——居民点和公国。——第127、

137、139、262、285、303、309、328、641  
 頁。  
 瓜州——第190頁。  
 瓜廖尔——居民点和公国。——第261、  
 289、331、555、557、612、613頁。  
 印度河——第133、134、138、309、641、  
 642頁。  
 印度洋——第93、96、97頁。  
 印多尔——第285、300、301、320、331頁。  
 印古耳河——在高加索。——第230頁。  
 印度斯坦——第382、385、471、500、517、  
 613頁。  
 丘克斯貝里——第56、213、214頁。  
 幼发拉底河——第247頁。

## 六 画

达翁——爱尔兰的郡。——第203頁。  
 达普——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域。——  
 第300、331、412、524、554、555頁。  
 达烏尔山——第234頁。  
 达尔馬威亚——第100—103頁。  
 伊朗——高原。——第134、139頁。  
 伊宗察河——第98頁。  
 伊利里亚——第99、101頁。  
 伊皮罗斯——第96、99頁。  
 伊斯法罕——第134頁。  
 伊尔吉茲——炮台。——第639頁。  
 伊尔庫茨克——第167頁。  
 伊奧尼亚群島——第535、705—709頁。  
 伊斯的利亚半島——第91、99、101—103  
 頁。  
 安巴拉——第252、260、297頁。  
 安特林——爱尔兰的郡。——第203  
 頁。  
 安特卫普——第98、405頁。  
 安达魯西亚——第48、238頁。  
 亚眠——第456、462、687頁。

亚琛——第 467、677 頁。  
 亚平宁半島——第 18 頁。  
 亚平宁山脉——第 20 頁。  
 亚历山大里亚——第 93、96 頁。  
 亚得利亚海——第 20、90—93、95、96、  
 98—103 頁。  
 亚克薩尔特——見錫尔河。  
 西藏——第 663 頁。  
 西萊丁——第 373 頁。  
 西諾普——第 96 頁。  
 西里西亚——第 107、651、675、684 頁。  
 西伯利亚——第 163、167、615、636、642、  
 665 頁。  
 西北各省——第 262、301、331、550 頁。  
 多瑙河——第 93、103、123、467、640、662  
 頁。  
 多瑙河各公国——見瓦拉几亚和莫尔达  
 維亞。  
 多米尼加島——第 9 頁。  
 多布魯甲——第 428、440 頁。  
 多耳普尔——第 336 頁。  
 多尔塞特郡——英国的郡。——第 203  
 頁。  
 米兰——第 19、695 頁。  
 米拉特——第 252、253、271、274、297、  
 300、310、323、471 頁。  
 米尔扎普尔——第 303、320、331 頁。  
 朱木拿河——第 253、300、320、329—  
 331、334、469、471、474、554、555 頁。  
 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第 123 頁。  
 休斯特尔(休希特尔)——第 134、137 頁。  
 托列迈达——第 96 頁。  
 华沙——第 460、502、650 頁。  
 匈牙利——第 62 頁。  
 好望角——第 93、286、560 頁。  
 艾茲卢艾尔特——第 565 頁。  
 舟山島——第 186、189 頁。

汕头——第 663 頁。  
 地中海——第 25、96 頁。  
 伏尔加河——第 136、638 頁。  
 伍斯特——第 373 頁。  
 因克尔芒——第 138、352、353、386、447  
 頁。  
 迈索尔——第 303、310 頁。  
 吉尔吉斯草原——第 637、638、642、665  
 頁。  
 考文垂——第 203 頁。  
 牟罗兹——第 83、88、376、687 頁。  
 牟尔豪森——見牟罗兹。  
 刘伊斯——第 433 頁。  
 兴都庫什山脉——第 133、640 頁。  
 长江——第 189、191、663 頁。

## 七 画

貝云——第 43、82、237 頁。  
 貝魯特——第 96 頁。  
 貝耳島——在比斯开灣。——第 19 頁。  
 貝腊尔——印度的州。——第 266 頁。  
 貝汉普尔——第 252、320 頁。  
 貝阿伐尔——第 336 頁。  
 貝拿勒斯——第 270、302、303、310、319、  
 320、331 頁。  
 貝加尔湖——第 167、625 頁。  
 里姆——第 687 頁。  
 里昂——第 83、376、430、440、687 頁。  
 里海——第 128、133—137、250、641 頁。  
 里士滿——第 565 頁。  
 里巴瓦(里巴亞)——第 168 頁。  
 里格港——第 77 頁。  
 里斯本——第 93 頁。  
 里約热內卢——第 374 頁。  
 苏格兰——第 345、349、361、364、608  
 頁。  
 苏黎世——第 122 頁。



苏耳坦普尔——第 471、472 頁。  
 苏伊士运河——第 93、96 頁。  
 苏伊土地峽——第 560 頁。  
 克黎——爱尔兰的郡。——第 713 頁。  
 克里木——第 9、210、354、386、411、640 頁。  
 克什米尔——第 331 頁。  
 克拉科夫——第 706 頁。  
 克倫地亞——第 102 頁。  
 克里特島——第 661 頁。  
 克拉克曼楠——英国的郡。——第 203 頁。  
 克利斯提阿納(奧斯陸)——第 289 頁。  
 杜埃——第 687 頁。  
 杜塞尔多夫——第 674、675 頁。  
 坎大哈——居民点和公国。——第 127、134、135、137 頁。  
 坎納腊——第 295 頁。  
 坎德什——第 321 頁。  
 坎特伯雷——第 9 頁。  
 那不勒斯——第 17、19、682、698 頁。  
 那格普尔——居民点和印度的州。——第 303、320、321、529 頁。  
 希瓦——第 134—137、638、640、641 頁。  
 希梅——第 380 頁。  
 希卡普尔——第 336 頁。  
 利尔——第 376、687 頁。  
 利木贊——第 8 頁。  
 利物浦——第 161、162、173、184、345、348、608 頁。  
 但澤——第 368、369、405 頁。  
 伯尔尼——第 105 頁。  
 伯里克——第 363 頁。  
 伯桑松——第 687 頁。  
 沙特尔——第 687 頁。  
 沙撈越——第 232 頁。  
 沙洛頓堡——第 633 頁。

麦茨——第 687 頁。  
 麦克尔士菲尔德——第 350 頁。  
 沃耳特尼察——第 230 頁。  
 伶仃島——第 588 頁。  
 怀布里奇——第 13 頁。  
 呂內維尔——第 90、98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93、96、246、248、277、279、508—512、514、515、592—599、665 頁。

## 八 画

阿仁——第 82 頁。  
 阿腊——第 319、320 頁。  
 阿馬——爱尔兰的郡。——第 203 頁。  
 阿姆河——第 134、137、636、639—641 頁。  
 阿拉斯——第 687 頁。  
 阿拉伯——第 77 頁。  
 阿瓦赫——第 336 頁。  
 阿克頓——第 565 頁。  
 阿格拉——第 252、273、300—302、318、321、325、329、470 頁。  
 阿腊貢——第 49 頁。  
 阿納帕——第 509、511、597 頁。  
 阿尔馬河——第 386、411 頁。  
 阿利瓦尔——第 500 頁。  
 阿利康特——第 49 頁。  
 阿利普尔——第 299 頁。  
 阿尔托納——第 367、463 頁。  
 阿耳尼克——第 363 頁。  
 阿耳西拉——第 49 頁。  
 阿勃維尔——第 687 頁。  
 阿迪斯康——第 305 頁。  
 阿得雷德——第 343 頁。  
 阿速夫海——第 68 頁。  
 阿腊克斯河——第 135 頁。  
 阿尔巴尼亚——第 96 頁。

- 阿尔明尼亚——第 136 頁。  
 阿尔及利亚——第 124 頁。  
 阿拉哈巴德——第 252、302、310、326、  
 331、416、470、612 頁。  
 阿卡浦尔科——第 72 頁。  
 阿扎姆加尔——第 470 頁。  
 阿斯土里亚——第 49 頁。  
 阿斯特拉罕——第 135—138 頁。  
 阿斯特拉巴德——第 134—139、641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123 頁。  
 阿克麦吉特 (彼罗夫斯克) ——第 640、  
 641 頁。  
 阿腊耳斯克炮台——第 639 頁。  
 阿希佩拉哥群岛——在爱琴海。——第  
 96 頁。  
 拉合尔——第 253、273、300、335、336 頁。  
 拉納克——英国的郡。——第 202 頁。  
 拉費尔——第 446 頁。  
 拉曼彻——第 48 頁。  
 拉埃桑特——第 387 頁。  
 拉忠克腊——第 41 頁。  
 拉姆别薩 (拉姆别茲) ——第 19 頁。  
 拉吉普坦納——第 260、261、529、557、  
 612 頁。  
 拉科魯尼亚——第 49 頁。  
 拉芒什海峡——第 256、483 頁。  
 波拉 (普拉) ——第 101—103 頁。  
 波河——第 20、123 頁。  
 波兰——第 100、107、110、210、211、629、  
 651、665、707 頁。  
 波茲南——第 107、675、684 頁。  
 波斯灣——第 77、131、133、134、137、  
 138、287、641 頁。  
 波尔多——第 43、95、376、687 頁。  
 波茨坦——第 634、650 頁。  
 波罗的海——第 106、367 頁。  
 波斯尼亚——第 661 頁。  
 波美拉尼亚——第 106、107、651、684  
 頁。  
 羅馬——第 19、99、439、446、450、697  
 頁。  
 羅馬尼亚——第 278 頁。  
 罗曼尼亚——第 96 頁。  
 罗文尼奧 (罗文尼) ——第 96 頁。  
 罗希尔汗——第 289、300、329、335、471、  
 473、474、500、523、528、529、554、555、  
 557、611、613 頁。  
 罗契得尔——第 181 頁。  
 直布罗陀——第 535、536 頁。  
 直布罗陀海峡——第 93 頁。  
 法夫——英国的郡。——第 203 頁。  
 法特普尔——第 302、319、330 頁。  
 法扎巴德——第 330 頁。  
 法提哈巴德——第 301 頁。  
 佩斯——今布达佩斯东岸地区。——第  
 94 頁。  
 佩斯里——第 203 頁。  
 佩囊布庫——第 374 頁。  
 孟买——第 253、261、262、269、285、306、  
 307、321、331、335、524、550 頁。  
 孟加拉——印度的管区。——第 252、  
 259、267、271、285、303、320、331、406、  
 517、525、550、551、590 頁。  
 孟买管区——第 261、267、271、285、303、  
 320 頁。  
 吳淞——第 189 頁。  
 吳淞江——第 189 頁。  
 昂茹——第 541 頁。  
 昂科納——第 20、102 頁。  
 昂古列姆——第 687 頁。  
 阜姆 (里耶卡) ——第 90、96 頁。  
 杰卢姆——第 303 頁。  
 果腊克普尔——第 471、523、524、555 頁。  
 岡德斯霍特 (昂德斯科特) ——第 7 頁。

周德普尔——第 336 頁。  
 帕尔馬——第 20 頁。  
 昌巴耳河——第 336 頁。  
 易北河(拉巴河)——第 106 頁。  
 肯梅尔——第 712、713 頁。  
 的里雅斯特——第 90—96、102、103、  
 283、378 頁。  
 門的内哥罗——第 661 頁。  
 图尔——第 687 頁。

## 九 画

南京——第 189—191、233 頁。  
 南特——第 95、376、687 頁。  
 南希尔兹——第 363 頁。  
 南安普頓——第 76 頁。  
 哈安——第 48、238 頁。  
 哈卡——第 49 頁。  
 哈馬丹——第 137 頁。  
 哈佛尔——第 95、376、687 頁。  
 哈特福——第 564 頁。  
 哈腊克(哈尔格)島——第 77—79、131  
 頁。  
 哈得兹菲尔德——第 181 頁。  
 科克——爱尔兰的郡。——第 713 頁。  
 科倫——第 632、652 頁。  
 科列龙河——第 294 頁。  
 科尔富島——第 705、706 頁。  
 科摩林角——第 331 頁。  
 科拉普尔——第 320 頁。  
 科布倫茨——第 692、693 頁。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 652、678、  
 691 頁。  
 威尔士——第 57、203、491、568、569 頁。  
 威尼斯——第 17、90—93、96、98、100—  
 102、393、405 頁。  
 威尔特郡——英国的郡。——第 194、203  
 頁。

威斯特伐里亚——第 107、368、421、430、  
 675、684、729 頁。  
 勃艮第——第 105、118 頁。  
 勃兰登堡——第 106—108、110、111、684  
 頁。  
 施特廷(茲杰辛)——第 368、369 頁。  
 施梯里亚——第 102 頁。  
 香港——第 112、149、158、159、163、  
 176、186、231、233、536、603、621、623  
 頁。  
 信德——第 251、320、335、336、382 頁。  
 恒河——第 289、302、319、320、326、330、  
 331、412、470、471、524、554 頁。  
 柏林——第 59、60、104、368、435、632—  
 635、643、652、673、676、684、692—694、  
 700、703、728、729 頁。  
 紅海——第 93、96 頁。  
 威海——第 135、137、639、642 頁。  
 品迪——第 309 頁。  
 恰克图——第 167、168、623、663—665  
 頁。  
 約克郡——英国的郡。——第 202、203、  
 567、570、729 頁。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 198、200、  
 202、203、373、729 頁。  
 耶兹德——第 134 頁。  
 济克堡——第 632 頁。  
 拜尔法斯特——第 713 頁。

## 十 画

馬康——第 687 頁。  
 馬賽——第 94、95、283、276、378、687 頁。  
 馬拉加——第 48 頁。  
 馬尔瓦——第 321 頁。  
 馬德里——第 41—45、48—50、53、351、  
 435、466 頁。  
 馬里恩堡——第 380 頁。

- 馬格德堡——第 691 頁。
- 馬尔他島——第 91、535、536 頁。
- 馬德拉斯——第 273、293、306、307、524、550 頁。
- 馬德拉斯管区——第 261、285、291、292、303 頁。
- 馬拉巴尔海岸——第 295 頁。
- 馬尔格腊堡壘——第 405 頁。
- 特魯韦耳——第 49 頁。
- 特拉比魯德（特拉布松）——第 96、514 頁。
- 埃及——第 91、93、94、249、286、461、532、534 頁。
- 埃夫勒——第 687 頁。
- 埃布罗河——第 25 頁。
- 埃尔宾（埃尔布隆克）——第 691 頁。
- 埃尔斯倫（埃尔祖魯姆）——第 131 頁。
- 埃斯特勒馬杜腊——第 49 頁。
- 海利貝里——第 305 頁。
- 海德拉巴——印度的公国。——第 320、321 頁。
- 海德拉巴——海德拉巴公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03 頁。
- 海德拉巴——信德的一个居民点。——第 336 頁。
- 烏古蒙——第 387 頁。
- 烏里治——第 411 頁。
- 烏代普尔——第 612 頁。
- 烏拉尔河——第 135、638、639 頁。
- 烏拉尔山脉——第 72 頁。
- 格兰桑——第 118 頁。
- 格拉斯哥——第 56、202、343、349、608 頁。
- 格拉納达——第 48 頁。
- 格劳宾登——第 122 頁。
- 格腊西阿——巴塞罗纳城郊。——第 50 頁。
- 格罗斯特郡——英国的郡。——第 203 頁。
- 格勒諾布尔——第 687 頁。
- 格拉克列亚半島——第 661 頁。
- 紐約——第 423、451、583 頁。
- 紐沙特尔——第 104、105、110、111 頁。
- 納瓦腊——第 42、48、49 頁。
- 納哥德——第 336 頁。
- 納西腊巴德——第 301、336 頁。
- 爱尔兰——第 19、172、203、349、478、503、709、711—715、747 頁。
- 爱丁堡——第 350 頁。
- 爱北斐特——第 680 頁。
- 倫敦——第 55、56、59、64、70、80、104、144、147、172、173、233、273、279—281、305、343、345、346、348、363、368、369、372、374、377、423、447、456、457、460、461、505、508、563、564、566、573、582、592、601、608、616、705、712 頁。
- 倫巴第——第 17、21、100、697 頁。
- 倫弗魯——英国的郡。——第 202 頁。
- 哥本哈根——第 290、374、463 頁。
- 哥格拉河——第 529 頁。
- 班达——第 336、529 頁。
- 班特里——第 713 頁。
- 班加罗尔——第 310 頁。
- 班得尔汗——第 285、289、474、500、523、529、613 頁。
- 班諾尼亚——第 101 頁。
- 索里亚——第 41 頁。
- 索尔福——第 181 頁。
- 索恩河——第 436、439 頁。
- 索恩河岸夏龙——第 436、439、442、687、695 頁。
- 索美塞特（索美塞特郡）——英国的郡。——第 203 頁。
- 夏岡季——第 611 頁。

夏哈巴德——印度的州。——第 320 頁。  
 夏賈汉普尔——第 300、554 頁。  
 庫希斯坦——第 134 頁。  
 桑苏西——第 632、633 頁。  
 敖德薩——第 92、195 頁。  
 旁遮普——第 251、253、260、261、267、  
 271、285、295、297—299、303、320、328、  
 330、335、336、471、501、550、615 頁。  
 柴郡——第 203 頁。  
 珠江——第 112、149、190、588 頁。  
 高加索——第 126、128、136、212 頁。  
 恩巴河——第 135 頁。  
 热那亚——第 393 頁。  
 翁热——第 35、687、695 頁。  
 俾路支——第 135 頁。

### 十一画

基拉尼——第 712 頁。  
 基台尔明斯特——第 164 頁。  
 莫斯科——第 138、637 頁。  
 莫納根——爱尔兰的郡。——第 713 頁。  
 莫尔加頓——第 118 頁。  
 莫尔珀思——第 363 頁。  
 莫尔达維亚 (莫尔多瓦)——第 277、279  
 —281、289、533 頁。  
 康波尔——第 289、301—303、318、319、  
 325、326、330、402、404、406、412、416、  
 469—472、503、529、555 頁。  
 康瓦尔——英国的郡。——第 203 頁。  
 康帕尼亚——第 450 頁。  
 康波福米奧——第 90、98 頁。  
 勒恩——第 687 頁。  
 勒芒——第 687 頁。  
 勒克瑙——第 252、261、271、301、303、  
 318、319、323、325、326、330、331、381、  
 398、400、412、469—475、495、496、499、  
 500、503、507、523、524、526—528、553、

554、556、614 頁。

密西西比河——第 136 頁。  
 密多塞克斯——英国的郡。——第 569  
 頁。  
 第戎——第 687 頁。  
 第納普尔——第 303、320、330、331、554、  
 555 頁。  
 章普尔——第 470 頁。  
 得比郡——英国的郡。——第 203 頁。  
 梯維尔頓——第 447 頁。  
 累翁島——第 49 頁。  
 曼彻斯特——第 165、171、181—185、  
 343、363、373 頁。  
 崇明島——第 189 頁。  
 悉尼——第 343、491 頁。  
 設刺子——第 134、139、247 頁。  
 威利(策列)——第 94 頁。  
 盖提夫——第 77 頁。

### 十二画

黃海——第 189 頁。  
 黃埔島——第 586、588 頁。  
 斯基別林——第 713 頁。  
 斯特拉斯堡——第 421、444、687 頁。  
 斯堪的那維亚——第 258、289 頁。  
 斯德哥尔摩——第 367、368、374 頁。  
 普倫貝尔——第 42 頁。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第 90、99  
 頁。  
 萊比錫——第 694 頁。  
 萊茵河——第 62、122、368、632、651、680  
 頁。  
 萊茵省——第 87、107、632、675、676、  
 678、680、683、684、729 頁。  
 萊茵普魯士——見萊茵省。  
 萊斯河——在瑞士。——第 123 頁。  
 喀布尔——居民点和公国。——第 127、

134、135、137、636、641 頁。  
 喀布尔河——第 138、642 頁。  
 喀琅施塔得——第 168 頁。  
 提朗——爱尔兰的郡。——第 203 頁。  
 提罗耳——第 122、643 頁。  
 都灵——第 435 頁。  
 都柏林——第 709 頁。  
 博韦——第 687 頁。  
 博罗迪諾——第 387 頁。  
 博洛尼亚——第 20 頁。  
 博洛尔塔格(克孜拉尔特)山隘——第 640 頁。  
 博斯普魯斯海峽——第 512、514 頁。  
 菲盖腊斯——第 49 頁。  
 菲律賓群島——第 72 頁。  
 菲罗兹普尔——第 253、328 頁。  
 菲魯茲沙赫爾——第 500 頁。  
 厦門——第 186、624 頁。  
 雅西——第 279 頁。  
 黑海——第 68、93、96、100、378 頁。  
 黑龙江——第 168、234、625、626、641、662、665 頁。  
 黑龙江沿岸地区——第 641、664 頁。  
 森帕赫——第 118 頁。  
 須德海——第 7 頁。  
 喜薩爾——第 301、330 頁。  
 喜馬拉雅山脉——第 555 頁。  
 溫德海——見波罗的海。  
 費拉拉——第 20 頁。  
 凱恩——第 19、281、439、464 頁。  
 散德兰——第 363 頁。  
 腊万納——第 98 頁。  
 腊古扎(杜布罗夫尼克)——第 96 頁。  
 巽他海峽——第 93 頁。  
 堪察加——第 168 頁。  
 湯頓——第 164 頁。  
 敦克尔克——第 7 頁。

## 十三画

奧德——第 251、252、261、266、289、302、303、319、325、329、405、406、469—473、497、500、502—507、516—519、523、529、554、555、561、611—614 頁。  
 奧尔丹——第 181 頁。  
 奥尔良——第 687 頁。  
 奧連堡——第 136、137、638—639 頁。  
 奧克苏斯——見阿姆河。  
 奧維耶多——第 49 頁。  
 奧得河——第 106 頁。  
 奧郎加巴德——第 271、285、320、321 頁。  
 奧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 101 頁。  
 塞納——法国的省。——第 468 頁。  
 塞維爾——第 41、48 頁。  
 塞爾維亞——第 661 頁。  
 塞美林山隘——第 103 頁。  
 塞浦路斯島——第 93 頁。  
 塞貝尼科(希貝尼克)——第 103 頁。  
 塞瓦斯托波尔——第 273、275、283、352、353、359、405、421、422、447、661、696 頁。  
 賈普尔——第 612 頁。  
 賈郎达尔——第 297 頁。  
 賈巴耳普尔——第 336 頁。  
 賈格迪斯普尔——第 554、555 頁。  
 雷瓦——第 336 頁。  
 雷烏斯——第 49 頁。  
 塔布——第 82 頁。  
 塔耳瓦腊——德里郊区。——第 334 頁。  
 塔夫利茲(大不里士)——第 137 頁。  
 新堡——第 363 頁。  
 新加坡——第 163、232、535、536 頁。  
 新奧尔良——第 136 頁。  
 滑铁卢——第 60、387、448 頁。  
 詹西——第 285、286、529 頁。

瑟堡——第 670 頁。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第 121 頁。

#### 十四画

維也納——第 59、90、94、99、123、172、  
195、435、439、563、682 頁。

維爾騰堡——第 674 頁。

維阿馬拉——阿尔卑斯山的山口。——  
第 123 頁。

維卡耳瓦罗——第 53、237、238 頁。

赫尔(哈尔)——第 140 頁。

赫耳德——第 7、8 頁。

赫拉特——居民点和公国。——第 78、  
127、131—139、246、248、262、287、641  
頁。

赫罗纳——第 41、49 頁。

赫克謝姆——第 363 頁。

蒙古——第 167 頁。

蒙德馬松——第 82 頁。

蒙默思(蒙默思郡)——英国的郡。——  
第 203 頁。

蒙彼利埃——第 42、687 頁。

福州——第 624 頁。

滿洲——第 234、665 頁。

#### 十五画

德干——第 321 頁。

德里——第 253、254、259、260、269、270、  
273—276、283—286、288、289、297—  
302、310、311、318—321、323—330、  
332—335、352—354、357、406、416、  
469、471、474、499、500、523、526、528、  
553、555、556、613、614 頁。

德勒穆——第 363 頁。

德黑兰——第 78、79、131、134、137、248、  
249、665 頁。

德腊-伊斯馬伊耳汗——第 613 頁。

撒丁——見皮蒙特。

撒馬尔汗——第 134、137、641 頁。

魯貝——第 376 頁。

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島——第 93 頁。

潘普洛納——第 41、235 頁。

墨尔本——第 343、491 頁。

緬甸——第 261、497 頁。

韃靼海峽——第 625 頁。

#### 十六画

霍尔施坦——第 60、290、650、679、703  
頁。

霍德仁特——第 641 頁。

霍拉桑——第 133、134、136、138 頁。

諾瓦拉——第 20、502 頁。

諾里奇——第 572 頁。

諾定昂——第 203 頁。

諾定昂郡——英国的郡。——第 203 頁。

錫兰島——第 158、254、286、337、338、  
392、397、535 頁。

錫尔河——第 133—135、639—641 頁。

錫尔薩——第 286、301 頁。

錫塔普尔——第 474 頁。

錫亚耳科特——第 303 頁。

穆尔頓——第 118 頁。

穆得克——第 500 頁。

穆特拉——第 329 頁。

穆罕默腊(侯腊姆夏赫尔)——第 229、  
231、246、247 頁。

澤稷島——諾曼底群島之一。——第  
459—461 頁。

鮑里要塞——第 613 頁。

澳門——第 586、588 頁。

默豪——第 285、301、320、321 頁。

#### 十七画

戴文郡——英国的郡。——第 203 頁。

## 十八画

- 薩拉(薩达尔)——第 96 頁。  
薩克森——第 107、651、684 頁。  
薩加尔——第 285、303、331、471 頁。  
薩西亚——第 301 頁。  
薩塔腊——印度的居民点和公国。——  
第 266、303 頁。  
薩累諾——第 695 頁。  
薩尔特——法国的省。——第 85 頁。

- 薩拉哥沙——第 25、41、45、49、289 頁。  
薩尔魯伊——第 635 頁。  
薩罗尼加——第 96 頁。  
薩特里日河——第 260 頁。  
鎮江——第 189、190 頁。  
謨拉达巴德——第 300 頁。  
魏瑪——第 693 頁。

## 十九画

- 龐达普尔——第 303 頁。



## 譯 后 記

本卷“在‘人民报’創刊紀念会上的演說”一文，是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所出“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文版两卷集的基础上校訂的。关于中国問題的十二篇文章，是在人民出版社1961年所出“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文集的基础上校訂的，其中七篇的标题，是根据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因此与旧題不同：“鴉片貿易史”两篇文章，旧題为“貿易还是鴉片？”和“鴉片貿易”，現在是根据馬克思在1858年的筆記本中的标题改正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約”一文，旧題为“中英条約”，現在采用了馬克思原来所用的标题。此外，“英中冲突”一文旧題为“划艇亚罗号事件”，“英中条約”一文旧題为“貿易与条約”，“俄国的对华貿易”一文旧題为“俄国与中国”，“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旧譯为“英人对华的新侵略”，現在的标题都是俄文第二版編者所加的。

馬克思的遺稿1857—1858年經济学手稿的“导言”，是在徐坚的譯文的基础上根据1961年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十三卷校訂的。原譯者徐坚也参加了校訂工作。

参加本卷翻譯工作的有馮世熹、孙家衡，参加本卷校訂工作的有杜章智、吳达琼。部分地参加了譯校工作的有張企、孙岷、毕克、楊兴銳、周亮勛、張钟朴、王錫君、罗焚、麦明尧、于华、陈立敬、蔡愷民、郑厚安、董荣卿、錢文干、周裕昶等。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